

# 目 录

## 童年 少年 青年

第一章	自菲律宾归来 .....	1
第二章	踏上革命征途 .....	7
第三章	在斗争里成长 .....	18

## 坚持闽东三年游击战争

第四章	初到闽东 .....	28
第五章	创建闽东苏区 .....	42
第六章	艰苦的一九三五年 .....	58
第七章	闽浙边临时省委和南阳事件 .....	70
第八章	顾全大局 团结抗战 .....	79

## 驰骋大江南北

第九章	北上抗日 皖南练兵 .....	91
第十章	挺进苏南敌后 .....	105
第十一章	东进抗日 .....	120
第十二章	渡过长江 向北发展 .....	134

第十三章	驰援半塔集 .....	146
第十四章	郭村保卫战 .....	166
第十五章	战黄桥 .....	201
第十六章	反投降 反伪化 .....	251
第十七章	反“扫荡” .....	269
第十八章	苏中三分区的抗日斗争 .....	281
第十九章	整风 生产 练兵 .....	302
第二十章	车桥痛歼日军 .....	316
第二十一章	天目山反顽 .....	326
第二十二章	撤离江南前后 .....	342

### 转战华东战场

第二十三章	涟水整编 北上山东 .....	355
第二十四章	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 的战略转变问题 .....	372
第二十五章	苦战骆马湖 ——宿北战役 .....	385
第二十六章	新年的献礼 ——鲁南战役 .....	398
第二十七章	紧钳李仙洲 ——莱芜战役 .....	409
第二十八章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孟良崮战役 .....	423

第二十九章	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 .....	128
第三十章	雨季，特殊的进军	
	——鲁南突围 .....	453
第三十一章	解放战争的第二个战略转变	
	——外线出击 .....	466
第三十二章	濮阳整训 .....	480
第三十三章	中原钓“大鱼”	
	——淮杞战役 .....	495
第三十四章	淮海决战中的华野第一纵队 .....	511
第三十五章	飞越长江天堑 .....	533
第三十六章	解放上海之战 .....	553
	<b>解放福建和福建前线的斗争</b>	
第三十七章	提前入闽 解放福州 .....	568
第三十八章	渡海登陆的成功一战	
	——厦门战役 .....	582
第三十九章	金门失利 .....	597
第四十章	东山奏捷 .....	610
第四十一章	厦门海堤和空军入闽 .....	627
第四十二章	炮击金门和绞索政策 .....	643

# 童年 少年 青年

## 第一章 自菲律宾归来

### 家 庭

一九一四年五月，我诞生在菲律宾吕宋岛的一个山区小镇上。

我的父亲叶孙卫，原是福建省南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有房二间，地五分，家中一向穷困，加上农村破产，生计无着，新婚几个月后，就跟随同乡飘洋过海来到菲律宾。开始做苦工，以后做小头卖。我出生的时候，家境可以算得上小康水平。

菲律宾华裔很多，港口三宝颜就是华人聚居之地。传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到过这里，所以叫“三宝颜”。据明史记载：福建商贩数万人，往往久居吕宋（即菲律宾的一部分）不返，生育子孙。

我父亲到菲律宾后又结了婚，这也是当时华侨中常

见的现象，即在家乡结婚以后，又在侨居国当地婚娶，所以我有两个母亲，我的生母是菲律宾人。

大概是长期受西班牙和美国的统治，当地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受西方影响较深。比方说，菲律宾就不象旧中国那样“四世同堂”，而是小家庭制，而且妇女与男人一样有财产继承权。我父亲和我生母就是各开一个小店，各自独立经营。我母亲有一片椰林，父亲从母亲的椰林买来椰子打油出售，并兼营杂货。母亲开的是米店，我还记得她自己扛起稻谷到碾坊去碾米的情景。

母亲和父亲不一样，是有文化的妇女，英语很好，来往的信件都用流畅的英文。她还教我学了一年英语，所以后来我回国上学英文课就很轻松。我小时候活泼好动，调皮捣蛋，母亲却特别疼爱我，可是我五岁便离开生母回国，以后就再也没见到她了。开始还有书信往来，投身革命后，便音信断绝，一直到解放后，才得知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病故了，母亲依然经营小店，但身体已不如前，患高血压症，家计重担由我的没有出嫁的大妹妹主持。五十年代初，突然收到大妹妹的来信，告知家中负债无法偿还，要宣布破产，但弟妹还在读书，又怕病弱的母亲受刺激，走投无路，希望我能借笔钱给她。这封信使我非常为难，我当时是福建省省委书记、省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军区司令员，却没有钱可以寄给她，这是在海外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考虑了几天，给她

回了一封信，告诉她无法寄钱，但可用另外的办法帮助，我要她带母亲和弟妹一起回国，由我来负担养家的责任，并供养弟妹在国内上学。可是没有回音，不知道这一难关是如何渡过的。我生母在一九六五年病故，听说参加送葬的有一百多人。据家人说：母亲为人正直，在当地华侨中很受尊重。

我一家兄弟姐妹九个。大哥叶启迪，是家乡的母亲收养的；二哥启存，大我两岁，从小一起长大，和我一起回国，一起读书，又一起参加革命，和我关系最为密切；我是老三，下面还有四个弟弟、二个妹妹。其中启东幼年时由我二哥带回国读书，解放前夕又回菲律宾，解放后回来上大学，一直在福建工作；其他几个弟妹是在我回国后出生的，过去一直没有见过，我国和菲律宾建交后，三个弟弟才回国相聚，已经都是上年纪的人了。

我这个华侨家庭，过去叫作“海外关系”，有一段时间受“左”的影响，甚至我的女儿在六十年代初要报考大学机密专业，招生的人也要调查她的海外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关系更是成了我“里通外国”的罪证。现在想起来还好笑。其实华侨大多是非常爱国的，虽然封建王朝视华侨为“化外顽民”，后来国力日弱，华人在海外受尽歧视压迫，但总是对祖国怀着赤子之心，祖祖辈辈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我父亲就是这样，从小教育我们不要忘记家乡，不要忘记祖国。他经常对我

说：“中国人在海外受欺侮，就是因为政府太腐败，所以你们自己要争气。”我刚刚五岁，父亲就带我和二哥回祖国读书。

## 童 年

一九一九年，父亲带着二哥和我回到了故乡——福建省南安县的金淘区深垵乡。

故乡距闽南古城泉州一天路程，虽然山清水秀，但是人多地少，是个穷乡僻壤。几百年来，不断有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家乡人性格慍悍、豪爽。明末清初南安出过两个人物：郑成功和洪承畴，一忠一奸，南安人总是以他们的经历来教育后代。

父亲回到家乡才一个月，就被土匪“绑票”了，好不容易赎回来，就匆忙离乡出国，以后就再不敢回来。从此，我们兄弟俩就由家乡的母亲抚养。

家乡的母亲娘家姓谢，嫁到叶家后一直没有随父亲出国，留在故乡苦撑家业。华侨往往在海外和故乡各维持一个家庭，这大概是由于他们总盼望有朝一日“叶落归根”的缘故吧。她没有生育过，我和二哥回到家乡，她就把我们当亲生儿子一样来抚养，所以我是由两个母亲抚育成人的。以后我参加革命，开始做地下工作，后来转战南北，就断了音信。一直到一九四九年，我率大

军南下解放福建。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主意，十分惊慌，也不知道解放军的首长叶飞就是她的儿子。一九四九年九月我军进军抵达泉州，我才把母亲接来，见面后告诉她老人家：“我就是启亨，叶飞就是我”。她才惊喜交集。以后他到福州和我同住。母亲的晚年总算享了几年清福，一九六三年病故，没有跟我一起遭十年动乱的罪。

我幼年还乡后不久，就被送去读书，先上了半年私塾，念的是《三字经》。那时我还不会家乡的方言，上课什么也听不懂，只见先生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口中念念有词，不觉嘻嘻笑起来。这下可闯了祸，先生拿起竹板戒尺打我手心……小孩学说话很容易，大约两三个月时间，我就学会了家乡话，还学会读写一些汉字。

① 第二年，进了深鞍乡完全小学。那个年代，这是一种“新式教育”了，当时的完小还很稀罕，毕业后就象考上秀才一般，有人到家中报喜：“贵府少爷讳××县完全小学第×名毕业……”家里要给来人赏钱，放鞭炮，宴请四邻。

我读小学的时候，正值第一次大革命的时代，福建沿海开放较早，新思潮的传播较快。我不清楚第一次大革命时代南安县革命活动的历史，只是知道在我读高小的时候，南安县已经有国民党的区分部和农民协会等组织。众所周知，孙中山领导民主革命，开始主要是在海外活动的，是得到华侨大力支持的。他和广东、福建



沿海的三合会关系也很密切，所以南安县很早就有国民党组织并不奇怪。我读书的当年，这个小学有的教师比较进步，是国民党左派，经常给我们幼小的心灵灌输民主革命的思想，使我从小就受民主、革命、正义、平等、真诚、无畏、牺牲……这些清新而又美好的观念的感染。我还记得那时还参加过游行，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

我开始获得革命思想的启蒙，是在读高小的时候。有位数学教师叶骥才，是国民党左派，很喜欢我们弟兄俩。那时我们两兄弟功课很好，每次考试第一名和第二名总是我俩轮流占去，叶骥才老师和我们很亲近，经常给我们讲解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这位叶老师，是我幼年时代思想上的启蒙者，他现已退休住在上海，我每到上海常去看望他。

一九二五年我高小毕业了，正赶上国际性的经济危机，也涉及到海外的家庭，父亲写信回来说：家里经济困难，只能供一人升学，另一个要回菲律宾帮他经商。叶骥才老师知道这事后，找到我母亲说：“你这两个儿子都是高材生，中途辍学太可惜了，你们是小康人家，还是让俩兄弟都继续升学为好。”母亲一向盼望我们两兄弟读书上进，便同意了，又写信给父亲。叶老师自己也给父亲和我生母写了恳切的长信劝说，终于打动了父亲，同意我两兄弟一起去考中学。

## 第二章 踏上革命征途

### 走向革命之路

叶老师建议我们到厦门去投考中山中学。那时厦门有两所中山中学，厦门港中山中学是左派办的，鼓浪屿的中山中学是右派办的。我那时已经大略懂得左派和右派的区别了，当时左派和右派在闽南的斗争很激烈，公开在报纸上争论。叶老师是左派，以前在厦门读过书，那里有他的老同学、老朋友，也都是左派，所以他介绍我们兄弟去考厦门港中山中学，并托他的朋友照顾我们（后来才知道，他的朋友里有的就是中共的秘密党员）。

我们的功课底子好，到厦门中山中学考取了插班生，就直接从初中二年级读起。我上英文课很轻松，因为过去学过，读《模范英语读本》第二册就基本没有什么生词。其它的功课也不大费力。我在课外有时间就看课外书，当时最喜欢看的是小说和进步书刊。小学时喜欢看三国、水浒，中学时受当时新文学运动的作品影响较深，

鲁迅的作品也看，但恐怕是太年轻的缘故，不大懂。

那时我们也经常传看一些革命的书刊，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新青年》、《向导》是我最喜欢看的刊物，也看《共产党宣言》等共产主义运动的普及读物，但当时还看不懂，比较易懂的是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无政府主义的书也读过一点。大革命时期，这些书刊在厦门是可以公开出售的。因为家里寄来的学费不多，我们兄弟俩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买书，记得那时每逢星期日都要上一趟书店。

厦门是个海滨城市，在鸦片战争后就是“五口通商”的港口之一，是中外交往较多的城市，交通便利，当时就有定期班轮到上海、香港。文化也比较发达，思想很活跃。我在这里读中学的时候，正是大革命的高潮，各种思潮涌进这个小岛，革命气氛很浓厚。当时我接触要好的同学、朋友都是倾向左派的，还有叶老师介绍的左派的“大朋友”，也经常给我们讲一些革命道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对我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关系很大。

互相传看进步书刊，一起议论时事政治，这是那时进步青年的风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当时的情景确实是这样。有段时间我还在报刊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和诗歌。没想到“文革”中，造反派从旧报纸上找到了我写的两首诗，作为我“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派”的罪证。专

案组甚至把这些罪证送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看了后觉得好笑，对他们说：“那个时代的革命青年就是这个味道嘛！”

大革命时期，厦门左派力量最集中的地方是厦门大学、集美学校和中山中学。这三个学校是当时我们党的据点，教师、学生中都有党员、团员。曾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被王明路线打击的罗明，闽西苏区创建人之一的郭滴人等，都在集美学校读过书。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福建的反革命政变也是“四·一二”那天，首先从厦门开始，这几个学校就是重点。我们中山中学的高中学生杨坡树是共青团员、厦门学生会的主席，就被反动派抓去杀害了。国民党在厦门到处抓人、杀人，白色恐怖笼罩了美丽的鹭岛。我们厦门中山中学也被强行封闭。

学校被封后，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转学到厦门的省立第十三中学，这是厦门唯一的省立中学，就是现在厦门一中的前身。

大革命的失败使我更加坚定了走革命的路。虽然这时我对共产主义思想的认识还是初步的、模糊的，但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人，白色恐怖没有把我吓住，反而使我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了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中国革命的希望在于共产党，因为当时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人中的很

多人我都是认识的，他们都是坚决革命，很纯洁、正直的青年，这时，我才坚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下定决心走革命的路。那时我才十四岁，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吧。当然，也有一些人，被白色恐怖吓倒了，对革命消极了，有的跑到南洋去了。“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当时厦门党团组织遭到破坏，但火种依然存在，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十三中学有个数学教师就是中共省委的秘书长，他从我的朋友那里知道一些我的情况，就注意到我。那时我开始参加一些秘密活动，由于我年纪太小，还不到入团的年龄，算是外围的成员吧，跟着团员们一起出去散发传单，贴标语……

到了一九二八年下半年，福州、厦门的党团组织开始恢复。那时我虚岁十五，勉强够入团的年龄了。当时厦门的团市委书记叶贵煌找我谈话，介绍我加入“C·Y”（即共青团的简称），并交给我入团后的第一个任务：在十三中学发展团员，建立团支部。很快我就介绍了我二哥启存和同学郭弼疆入团，并建立了支部，选举我任支部书记。

我们这个团支部主要是做学生工作，组织读书会，团结进步青年。刚入团，浑身是劲，东奔西走，充满热情。这年冬天，团市委书记叶贵煌找我谈话，问我中学毕业后的打算。那时十三中是四年制，我已读完，再加一年预科，就可以考大学。叶贵煌告诉我：根据我的工

作表现和个人素质，组织上打算培养我，但这就要脱离学校，脱离家庭，放弃升学，完全转入地下。他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当时满腔革命热忱，确实没有什么个人打算，便回答说：只要是组织需要，干什么都可以。于是我便下定决心，并说服了二哥，不参加即将来临的毕业考试，不要文凭了，并且给家乡和国外的父母去信说：中学毕业了，和朋友到日本留学，由朋友负担学费，家里就不要再寄钱了。这当然都是假的，只是以此为借口断绝了与家庭的关系。

当时我们都认为，这样做才是彻底革命的。现在来看，实际是“三脱离”：脱离学校，脱离家庭，脱离社会，只和革命同志来往，这些往往导致脱离群众的结果。其实，和家庭、社会保持联系，对从事革命工作会更有利一些。当时却认为这样做才是彻底革命。我们党那时确实还在幼年时期，很多做法都是很“左”的，幼稚的。

不久，我参加了团省委在厦门开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主要是培养地下工作者，主要是讲授秘密工作的纪律和具体的活动方法，也学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概是因为我在处理家庭和个人问题上的坚决态度，所以把我送到这个训练班培养。这是我参加革命一直到现在唯一的一次“脱产”学习。训练班结束以后，就被分配担任厦门区委书记。

我的中学时期，正是第一次大革命从高潮到失败的

动荡年代，也正是这个动荡的年代，使我开始成熟，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从此终生献身于革命事业。回首当年，我依然怀念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我感谢带着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这些我青少年时代的启蒙者和同志们。

## 二 哥 启 存

每当忆及我的青少年时代，总是很怀念我的二哥启存。我们两兄弟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同睡一床，同坐一张书桌。进中学后还在同一个班级，后来又一起入团，一同做地下工作。由于我们少小离家，举目无亲，更是相依为命。

但我们两的个性大不相同，二哥好静，性格内向。记得小时候，我和他争吵打架，明明是我先惹他的，但我先去告状，母亲却护着我而惩他。打架归打架，我俩还是形影不离。回国上学以后，他不爱活动，也不交朋友，和我不一样，是个死读书的人。比如说我们同桌，他就一直不知道坐在前后左右的同学的名字。他单纯、耿直，嫉恶如仇。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固然有进步思想影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he 强烈的正义感。我们当时交往的都是进步的、很正派的青年，大家都很单纯，我们都把党团组织看得很神圣，是地上少见，天上才有的，

这一点，二哥比我更突出。

一九二八年冬，我从训练班结业后不久，就被任命担任共青团厦门区委书记，二哥是团省委宣传干事。那时党团组织均已转入地下，租房子“住机关”要调女同志来假扮夫妻，以便掩人耳目。这时的干部很年轻，最大的也就二十多岁，青年男女长期住在一起，产生了感情，往往假夫妻成了真的。和二哥住一个机关的团省委宣传部长就是这种情况，可这事给二哥撞破，他非常气愤，认为是肮脏的事，跟我说：他们这样乱搞，哪象个革命者。甚至认为这样下去和国民党差不多，因此对整个团组织感到失望。我当时也说服不了他，他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团组织，从厦门跑回菲律宾家里去了。二十年代时，中国党和外国党的关系是互相承认的，所以，二哥到菲律宾后，大概思想通了，又和当地的党组织联系上了。

一九三〇年七月，我在厦门被捕，写信给家中，和家里恢复了联系，希望家里救济。在菲律宾的二哥知道后，连忙回国营救我。我又通过二哥与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也就同时接上了党的关系。后来我刑满出狱时，组织上也是派他来接我住到机关，可以看出组织上对他是信任的。

我出狱后，在机关休息了一个星期，因为已经暴露身份，不宜再在厦门工作，就被调到福州工作，从此和



二哥分手，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由于地下工作的纪律，我和二哥一直没有通信，到解放后才打听到，启存以后担任过南安县委宣传部长，参加了安（溪）、南（安）、永（春）游击区红色游击队，一九三五年被捕，在家乡壮烈牺牲。

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二哥这段时间的详情。解放后，他被安葬在家乡的烈士陵园。

## 从事工人运动

一九二八年底，我从省委办的积极分子训练班结业后，就被派去从事工人运动。

厦门开发早，当时也算得上是福建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主要是海员和码头工人，还有两个罐头厂，是机械化生产，出的罐头商标是“水仙花”牌，一直到现在，还用这个牌子，在国际市场上也有名气。当时，党在码头工人中的工作较有基础，其次是海员，罐头厂工作基础较差，我便到罐头厂去做工人工作。

罐头厂有个黄色工会，这是公开的，合法的。我去了以后，设法组织赤色工会，但那时正处在革命低潮，工作很难开展，只好先打进黄色工会，当了个不领薪金的书记。我是学生出身，第一次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虽然住在工人宿舍里，但和工人打交道总是觉得隔了一层，

这时还缺乏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后来经过艰苦的工作，终于建立了团支部。记得发展的团员里，有位闽西龙岩的青年工人，名字忘记了，后来他参加了闽西的红军游击队。

一九二九年春，中共厦门市委改组为福建省委，罗明任省委书记。团组织也作了相应的改组，厦门团市委改组为团省委，厦门建立团区委，实际就是团市委，我担任团区委书记。到下半年召开的福建省第二次团代会上，我又被选为团省委委员、团省委宣传部长。

这时，党团和工会的各级组织，经历了一九二七年白色恐怖的考验，已经从严重的破坏中开始恢复。一九二九年冬，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在上海召开全国青工代表大会，我作为福建省的青工代表前去参加。这时我第一次到中央参加全国性的会议，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

全国青工代表大会的会场记得是在慕尔鸣路（现名茂名路）的一所公寓里，大约三十多个代表挤在一个屋里开会。代表们分散居住，当年我刚十六岁，是最年轻的两个代表之一。这时期党已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中开会，感到这才有革命气息。

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项英同志，项英同志是当时党的政治局委员，全总的党团书记，也是这次大会的领导人。我们这些青工代表对这位我国工人运动的

著名领袖十分崇敬，他的英勇的斗争经历大家都是熟知的。新四军建立以后，我又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虽然他在新四军的工作中犯了错误，但我认为：这并不会抹杀他作为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为中国的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我非常认真地听了项英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至今还印象深刻。项英同志在报告中论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当前的斗争策略，他特别强调了青年工人工作的重要性，他说：“工会中应当有青工委员会，工会支部有条件可以组织青年小组。”

会议讨论了青工工作，认为党的六大决议中关于“力争工会公开的自由”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白色恐怖虽是厉害，然而必须力争工会的公开存在……以求脱离秘密状态，所以，工作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要随机应变。此外又可想法创造出某种合适的、合法的组织来，例如体育会、自修社、戏剧社、互济会等……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名义下去工作，这是我们目前中国革命阶段中所需要的。”

我虽然刚开始做青工工作，但从自己的实践中，感到这些观点确实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当时党内因为缺乏经验，有很多幼稚的“左”的倾向，例如不愿意去利用黄色工会，搞关门主义，越搞越狭窄，结果脱离群众。互济会、反帝大同盟也是这样，本来是群众团体，但却生

怕人家不知道是“赤色”的，结果，国民党抓到就杀，就没有人敢来参加了。共青团更是有“第二党”的味道，“先锋主义”比党组织还“左”……结果是地下工作不断遭到破坏、挫折，真是严酷的教训。当年我们这些革命青年，就是在这样严酷的斗争实践中逐步成熟起来的，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先知先觉者”。

一九三〇年，我到团省委工作后，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到晋江、福州巡视工作，有幸见到了著名的青年领袖恽代英同志。我在学生时代就十分景仰恽代英同志，喜欢读他的文章，有机会见到他本人，同他交谈，感到非常荣幸。当时，他代表中央在福州巡视工作，找我谈话。我知道他学问渊博，又是中央领导，但见到他的外表却十分朴实，平易近人。他教导我：团的工作不能脱离群众，团的干部要群众化，当前的斗争目标不能脱离群众要求。谈话中，他循循善诱，非常亲切，真所谓“如沐春雨，如坐春风”。这是我第一次和中央领导同志接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感到我们党有这样优秀的领导，确实是革命青年的楷模。

不幸的是，不久之后就听说恽代英同志回上海后被捕，第二年（一九三一年）四月壮烈牺牲。我和恽代英同志见面后回到厦门也被捕入狱。

## 第三章 在斗争里成长

### 狱 中

一九三〇年七月，我在厦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我这次被捕和当年轰动一时的“厦门劫狱”事件有关。关于这次事件，解放后高云览同志专门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后来又拍成电影，当然这都是经过艺术加工了。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次劫狱行动，但大致的情況是清楚的。

当时在厦门狱中关押了共产党人四十余名，其中有的是省、市、县的骨干，如市委书记刘端生、团省委书记陈必笙同志等。一九三〇年五月，得到消息说要把这批政治犯押解福州，福建省委决定组成“破狱委员会”进行营救，由省委书记罗明主持，由省委军事部长陶铸同志率特工队负责伺机劫狱。这次劫狱行动非常成功，准备周密，行动果断，里应外合，指挥有方，整个劫狱过程只用了二十分钟，干脆利落。等到大批军警赶到，

全体人员已坐船扬帆离去。

这次劫狱成功轰动一时。当时厦门岛属思明县，监狱就在县政府里，警戒森严，岛上还有大批驻军和警察，共产党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而且神出鬼没，一举成功。消息传出后，第二天，厦门的几家报纸都在头版用大字标题赫然刊登。外地和海外报纸也争相转载，上海的《申报》还发表详细长篇连载。厦门劫狱成功当时造成了很大政治影响，有力地显示了我们党的力量，打击了反动气焰，同时解救了大批党的骨干，后来这些同志大多分配到闽西苏区和闽南各地工作。

劫狱事件发生不久，我在福州接到省委的通知，要我回厦门代理团省委书记（原团省委书记到上海汇报工作），并要我选调干部加强团省委的工作。七月初，我回到厦门，并带了两名干部，一是福州团市委书记陈之枢，一是晋江团县委书记陈举，准备到团省委工作。到厦门后都住在团省委的一个机关。

厦门劫狱成功后，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大肆搜捕。这时我们住的机关已为敌人注意，不安全，决定搬家，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只好暂时住下，采取了应变措施，让原来住在这里的同志搬走，并清理了文件及其他东西。我们对房东说，早先住在这里的人是回家探亲，我们是他的朋友，来厦门上学，暂时借他的房子住。房东见我们象文质彬彬的青年学生，便相信了。我们还先编好

一套口供，以应付意外。果然，敌人很快便来搜捕，但没有搜到证据，要抓的人也不在，于是，把我们当做“嫌疑犯”抓去交差。

被捕后最初的三四个月，我们被押在厦门警备司令部的军法处，提审了几次。由于在搜查时没有抄到任何证据，加上我们三人按事先约好的口供，一口咬定是到厦门来读书，暂时借住朋友的房子。军法处审了几次搞不出名堂，就把我们移解思明法院（当时厦门属思明县）。

到了法院，对我们就比较有利了。当时的惯例政治犯在军法处不经审判就被枪决，一旦移交法院，就是表明问题不是那么严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由于我们在被捕前做了准备，搜查时没有搜到证据，口供也没有漏洞，我们心里有数，在法庭上就一再提出：“说我们危害民国到底有什么证据？”法官是厦门人，普通话讲得不好，我们装作不懂普通话，只会说本地土话，法官只好和我们讲闽南土话。我们故意装着是年轻不问政治的青年学生，以此作一种斗争策略，在法庭上进行斗争。就这样一直拖到年底，法院发现实在找不到什么线索。军法处搞不出名堂，才移交法院审理，在法庭上我们继续采取这个斗争策略，加上当时法律规定不到十八岁不能判刑，按道理就应当释放了。但是反动法庭搞不出什么名堂，但也不愿轻易放过，所以就按“危害民国治安罪”中最轻

的一条，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了我们一年徒刑。

判决后，就把我们由拘留所送到监狱中服刑。由于当时刚发生过劫狱事件，我们几个“共产党嫌疑犯”便被投入死囚牢监禁。

死囚牢完全是石砌的，铁窗铁门，非常坚固，里面阴森森的。死囚牢里的犯人都是些被判死缓、无期徒刑或二十年以上徒刑的重犯，大多是些亡命之徒，监狱里从来就是黑幕重重，每间牢房都有所谓“犯人头”横行霸道，死囚号的“犯人头”更是残暴，其他犯人都要侍候他，家里送来的东西要给他一半，不给就整你。但奇怪的是，这些亡命之徒对政治犯却很尊重，不敢欺负。后来才慢慢知道，原来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认为自己是“英雄好汉”，而共产党人专和“官府作对”，宁死不屈，比他们更勇敢，加上又有文化教养，所以我们这几个“共产党嫌疑犯”在牢中就颇受他们的尊敬和优待。时间长了，和他们的关系处得也不错，他们便和我们谈自己的经历和社会底层的形形色色，这对我这个学生出身的青年来说，长了不少社会知识，等于上了一次社会大学。

狱中生活十分艰苦，拥挤阴湿的牢房，石板地铺上稻草就是床，吃的是霉米烂菜，我们的身体便一天一天地虚弱下去。特别是和我同年的陈举同志，在狱中患上肺癆病，更受折磨。我们三人在厦门都是举目无亲，无人



来探视，送东西，我看这样下去不堪设想，便下决心和家里人联系，以取得救助。我设法给家里人写了一封信说：到日本留学两年，回到厦门后因参加爱国活动，被当作政治犯逮捕，关在监狱。家中得讯后，在海外设法营救，我的二哥启存专门从菲律宾赶回厦门来探望。

二哥回国后和组织联系上了。他来探监，使我们终于和组织有了直接联系。菲律宾家庭每月都寄一些钱来给我们零用，我的二哥每星期来探视一次，这给我们三人解决了大问题。二哥送来的东西所包上的报纸，都有一些重要消息。

二哥还带来了我的菲律宾出生证，根据菲律宾法律，凡在菲律宾出生的就自动取得菲律宾国籍。厦门当时就有菲律宾领事馆，这就对我很有利，因为领事馆可以要求引渡我。父母亲得知我被捕消息后十分焦急，千方百计设法营救，准备通过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交涉引渡。但这时我已判决，刑期不长，我想到引渡到菲律宾后可能更麻烦，就劝家里不要交涉引渡的事了。

一年半的狱中生活终于熬过来了，这对我来说，是参加革命后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和磨炼。当时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随时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很少有同志能逃过这一关，大批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都牺牲了，和我一起被捕的陈举同志也病死在狱中，我是少数的幸存者之一。

由于在狱中和组织接上了关系，所以我出狱那天，组织上派我的二哥接我们到机关去住，一星期后，转告我，因我在厦门已经“红”了，不宜再在厦门工作，就分配我去福州担任团市委书记。但没想到几十年后，在“文革”中，坐过牢却成为我的罪证。那时凡是坐过牢的都被怀疑是叛徒，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如果共产党人被捕后都是毫无气节，都会叛变自首，那么这样的党怎么还能算是光荣伟大的呢？怎么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呢？这确实是对共产党人崇高品格的极大污蔑。当然，叛徒是有的，和我一起被捕的陈之枢，后来就叛变了革命，但毕竟是个别的。

## 出 狱 之 后

一九三一年底，我刑满出狱后，在团省委机关休息了一个星期左右，便调任福州团中心市委书记，陈之枢也随我去福州任团中心市委的组织部长。

由于这年三月，福建省委机关在厦门遭到破坏，七月间中央指示不再恢复省委，决定建立厦门和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分别领导闽南、闽东和闽中各县的工作，团的组织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我调到福州工作时，党的中心市委书记是蔡协民同志。蔡协民同志找我谈话时问我办了转党手续没有？

我当时还不大明白，认为团委书记都是同级党委的委员，还办什么转党手续呢？蔡协民同志就告诉我，立三路线结束后，恢复党、团、工、群，规定没有办过转党手续的团员都要重新履行转党手续，这样，蔡协民同志就作为我转党的介绍人。不久，蔡协民同志调回厦门，他的工作由陶铸同志继任。

蔡协民同志的革命经验非常丰富，早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又回到湖南搞农民运动，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又随朱德、陈毅同志上井冈山。一九二九年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党代表时才调到地方工作，先后任福建省委秘书长、省军委书记、福建中心市委书记，后来遭受王明路线打击，批判斗争后被派到采石工人中工作，实际是罚劳役。一九三四年四月，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在漳州英勇就义。我和蔡协民同志共事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但这位我党我军优秀的领导干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福州团的工作是有基础的。早在一九二五年就建立了全省第一个团支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虽受严重打击，但在一九二八年以后又在学校、工厂和农村开始恢复党和团的组织。到我接任团中心市委书记的时候，在连江、福清和以福安为中心的闽东地区均已建立了团组织，福州五六个中学中，茶叶工人、人力车、造纸等行业以及闽江的搬运工人中都有团支部。我到福

州工作后，整顿了人力车工人的支部，又发展了锯木、印刷等几个支部，记得人力车支部就有一个同志参加了市委的领导。

当时在福州，团的工作最有基础的是在学校学生中，福州省立一高就是比较活跃的，这个学校贫寒学生较多，后来出现了不少干部，原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就是在这个学校入团的。英华中学的学生富裕家庭的较多，但也建立了团支部。后来担任过闽北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福州办事处主任的王助同志就是在英华中学入团，后来由我介绍入党的，是名很优秀的学生出身的干部，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此外，育英女中、福州一中、格致中学、法政学校也先后建立了团支部。记得原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同志就是福州一中的学生。当时有个特点，进步学生一般都是高材生，因为他们读书多，思想活跃，知识面广，又关心时事，容易接受革命影响，所以后来许多人成为党的优秀干部。

“九·一八”事变后，福州的党团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青年运动也掀起了高潮，城区各学校广泛建立了宣传队，学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一九三二年春，福州几个学校在西湖开化寺联合举行爱国宣传大会，并演出抗日戏剧。这时，驻福州的日本领事和日本军舰“北上”号的舰长无理撕毁会场的抗日标语，并掏出了手枪威胁学生，激起学生公愤，打伤

了日舰长。各校学生还组织了“赴京请愿团”北上，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除了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以外，还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和赤色互助会等群众组织，社会活动相当活跃。但是，当时提出的一些宣传动员群众的口号是脱离群众的，例如，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民族处于危亡之秋，提出爱国主义的抗日救亡的口号是很能广泛动员群众的，而我们却偏偏要采取共产国际的立场，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要反帝大同盟，开展反帝拥苏运动，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结果，反帝拥苏的口号不但不能形成群众运动，甚至使我们不能在群众中公开活动，倒是群众自己提出的抗日救亡的口号能为各阶层广大群众所接受、拥护，因而也就能够形成有声有色的广泛的群众运动。

至于赤色互助会的活动，本来在城市和农村的劳动人民群众中就有群众自己组织的社会性的互助团体，当然不带什么革命色彩，但正因为这样，所以不引起当局的注意而合法存在，这是社会上相当流行的群众性的互助组织，偏偏当时党的“左”倾情绪，认为它是灰色团体，没有革命意义，因此不去参加，自己关起门来组织互济会，还要特别在它上面按上“赤色”两个字，即赤色互济会，变成一个狭隘的“左”倾的群众小圈子里的团体，结果不能在广大群众中进行活动，只能做一些救

济和营救因革命被捕受难的同志的工作了。这些，都是当时王明“左”倾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影响。

我在福州工作不到一年，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我以市委特派员的名义到闽东巡视工作。

# 坚持闽东三年游击战争

## 第四章 初到闽东

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我到闽东地区巡视工作，以后，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一直在闽东进行革命斗争，其中包括闽东三年游击战争。至一九三八年率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北上抗日，才离开了这块我战斗了五年的土地。

### 闽东革命的初期历史

闽东地区地处福建省东北部，包括福安、霞浦、宁德、福鼎、寿宁、柘荣、连江、罗源等县，以后又发展到古田、屏南等地。境内多山，太姥山、白云山、鹞峰山绵亘其间。海岸线长达一千五百多公里，有著名的三都澳、福宁湾、罗源湾等港口，海域辽阔。北邻浙江省，具备利用两省边界山地进行红色割据的条件。

闽东地处海隅，文化落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工农运动的影响不大。一九二六年前后，闽东一些在北京和上海念大学的青年学生参加了党，在闽东地区开展党的活动。其中著名的有宁德的郑长章，福安的郑眠石。

闽东地区能远去北京、上海等地念大学的青年学生很少，大多是在福州念中等学校的青年学生，如：马立峰、杨而菖、叶秀藩、范浚等人。他们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先后入党，以后又受福州党组织的派遣，回乡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建党活动。马立峰同志出生在福安县马厝村的中农家庭，在福州理工学校半工半读，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互济会和反帝大同盟，一九二九年二月入党，和陈铁民、郭文焕等组成福安小组。是年暑假马立峰回福安开展工作，发展小学时的同学詹如柏等入党，开始进行农村建党工作。八月，福安县委成立。杨而菖同志，连江透堡人，一九二九年二月入党，一九三〇年以透堡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进行活动，同年十二月任连江县委书记。叶秀藩同志，寿宁人，一九二九年在福州高等师范学校入党，一九三一年五月以寿宁噍阳小学校长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展党的组织，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寿宁成立特别支部，任特支书记。范浚同志与叶秀藩同志同时入党，回寿宁后任特支委员。与此同时，颜阿兰、黄丹岩等同志也回宁德、福鼎、霞浦、罗源等



地，开展党的活动。由于党员都是知识分子，活动也都局限于县城和大的城镇，如：福安、赛歧、透堡、霍童等地。

一九二九年冬，闽东人民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有组织的革命斗争。一九三一年二月，由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邓子恢同志主持，在福州召开福安工作会议。会议对年关斗争、农村、兵营、工运等作了具体决定，改组了福安县委，由马立峰任书记，并把县委机关移到农村，改变过去局限在知识分子小圈子中活动的状态。邓子恢同志原在闽西工作，富有农民运动经验。福安工作会议以后，他又两次到福安，以溪柄为重点，带领马立峰等深入农民群众中，发展农会，以春荒断粮为导火线，发动抗麦债斗争和反鸦片捐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党的威信大增，农民运动日益开展，并且推动了周围各县的工作。马立峰同志也在斗争中成为群众领袖。这年十一月，邓子恢同志又到连江巡视工作，到达透堡。连江当时没有县委组织，只有杨而菖同志与福州中心市委发生通信关系。邓子恢同志协助杨而菖同志建立了连江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随后成立了连江县委。福安、连江的群众性“平谷”、“减租”斗争，给闽东各县农民影响颇大。经过这些斗争，闽东党逐步学会了如何开展农运工作，并将工作中心由县城转向广大农村，在那里形成了风起云涌、势如雷霆的斗争局面。

农民运动蓬勃开展，党的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一九三一年八九月间成立了福安中心县委，马立峰任书记，指导福安、宁德、寿宁、霞浦、福鼎五县党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底又成立了连江中心县委，杨而菀任书记，指导连江、罗源两县党的工作。

农民运动起来以后，必然要遭到反动政权和地主豪绅的镇压，迫切需要以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打击反革命气焰，推进革命进程。

一九三〇年福安就有小型武装，那时叫做肃反队。一九三一年以后，连江开始有武装活动。稍后，寿宁也组织赤色武装。这些从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小型的分散的武装活动，主要是镇压土豪劣绅反动分子破坏农民运动的反革命行动，配合群众斗争的开展，但还不能用来对付反革命民团。

中共福建军委于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七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指出：福安县统治力量薄弱，群众生活贫苦，区域偏僻，山势险阻，便于开展工作。在连江长门炮台要塞司令部已建立党组织，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已经逐渐扩大。如果能取得一部分武装，福安即可开展游击战争。

马立峰、詹如柏等同志在闽赣各地武装斗争和苏维埃运动蓬勃开展的影响下，积极筹备武装暴动。组织武装暴动要有懂得军事的指挥员，要有骨干武装和组织起来

的革命群众，特别是要在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基础上组织暴动才有胜利的把握。但是当时缺乏搞农民运动的经验，也没有人懂得军事，先后几次暴动都失败了。一九三二年五月，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决议，强调福安党要马上将游击队组织起来，“在农村中进行解决反动武装，帮助及发动农民起来斗争，要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去创造新的苏维埃区域”。会后，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同志亲自来福安组织武装斗争。陶铸同志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广州起义时任教导团参谋长，长期担任福建省委军事部长。他到福安后，首先把几十个因受敌人迫害而不能回家的同志召集起来，成立一支精干武装，在中秋节前夕，亲自指挥马立峰、詹如柏、陈挺等同志率领二十多名勇敢的贫农团员打进兰田，取得胜利。这就是闽东革命史上著名的“兰田暴动”。九月十四日福安正式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随后陶铸同志又到连江，帮助杨而菖同志组织官坂暴动，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

一九三三年春，闽东春荒严重，地主豪绅趁机哄抬粮价，牟取暴利，群众斗争情绪急剧高涨，福安、连江中心县委决定把抗捐抗税抗粮抗租抗债的“五抗”斗争转变为土地革命运动，在基本地区内打土豪分田地，在白区内打土豪分粮食。斗争便如暴风骤雨般地展开了。到这年十月为止，除霞浦、周宁两县外，其它各县都有

红色游击队。

## 霍童暴动以后

我是一九三二年下半年由福州中心市委派遣到闽东巡视工作的。我到宁德霍童时，那里已有三十多人七条长短枪的工农自卫队，由区委书记颜阿兰率领。一九三三年五月廿八日，正是端午节，我和颜阿兰率领文湖、半岑村的工农自卫队五十多人，从小石半岑出发，一举拿下了霍童民团驻地宏街官，缴获二十六支枪，这就是闽东革命史上记载的“霍童暴动”。接着又乘胜出击，接连收缴了坑仔里、赤溪地区共八十多条枪，遂于六月底建立起闽东工农游击第三支队。

自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八月，闽东党先后创建了七支主要革命武装。第一支队（福安）支队长詹如柏、政委马立峰；第三支队（宁德）支队长颜阿兰，一九三三年七月牺牲后，由谢丙成继任支队长；第五支队（福安）支队长任铁锋（后脱离）；第七支队（寿宁）支队长范铁民；第九支队（连江）支队长魏耿（后叛变），政委杨而菖。这就为闽东全区性武装暴动打下了基础。

在群众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脱产的游击队，土生土长，与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便于隐蔽，便于坚持长期斗争，便于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这是闽东地区游击队

的优点。游击队常常深夜进入村庄，农会会员轻轻叫开基本群众家门，安排煮饭、洗脚，然后悄悄把游击队员安置在搁楼上休息，鸡犬不惊，连同村的地富分子也发觉不了。有时甚至和敌人同驻一地。一九三三年春，游击第一支队悄悄进入福安县城，就住在白匪刘宗彝警察部队隔壁楼上，从小窗看出去，白匪军官的指手划脚，士兵们有气没力的操练看得一清二楚。敌人却不知道我们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等到白匪架枪休息，一声令下，游击队冲出去干净利索地消灭了这股敌人。但游击队也存在弱点，离开了基本群众就没有办法活动，开辟新区就受到限制，而且没有基干武装，缺乏军事骨干。那时闽东稍懂军事的干部，只有杨采衡同志，他曾在旧军官学校毕业，当过连长，但对红军的一套就不甚了解。一九三三年六月，由福州中心市委派赖金彪同志来闽东，才使闽东的同志对建军问题有个了解。他是广东大埔人，红十二军排长，彭杨军事学校的优等生，选派去苏联深造，经过福州时去海参崴的交通断了，中心市委把他留下来，输送到闽东游击队。他带来了人民军队的建设经验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游击队的战斗力是不强的，不能进行较大规模的战斗，只有在战争实践中锻炼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闽东的干部基本上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的。

## “土匪”问题

游击队建立的早期，常常混进流氓无产者。闽东地区民心强悍，又多山地港湾，在残暴的封建压迫下，多有铤而走险上山下海当所谓“土匪”的，寿宁就是出名的“土匪”窝。当革命初起时，这一批人参加进来，确是“很能勇敢奋斗”，而且会使用武器，懂得军事，在暴动中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确有“破坏性”，流寇思想较严重，破坏纪律，发洋财，甚至抢劫也会发生。一支百把人的游击队，只要有五六个“土匪”分子，就能控制这支队伍，改变政治方向，发生变质为土匪部队的严重危害。闽东党及早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并且经历了一场尖锐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一月，连罗游击队以李德标为首的八九个人被透堡民团所收买，以“反对经济不公开”等口号蛊惑人心，竟将县委书记和支队长拘押，图谋率队投敌。陶铸同志闻讯后，采取果断措施，派员赶来连江，逮捕五人，并在洪塘公审，处决了李德标、张太铨二人，改组游击队领导。十月，杨而菖召开连江县委扩大会议，检查了“没有从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中选拔游击队员，所以混进一些坏分子”的教训，提出今后要“恢复游击队特支，加强对游击队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淘汰不好的队员，从群众组织中发展队员”。有的同

志本身没有当过“土匪”，但在建立游击队的过程中，与他们有来往，有感情，只见到他们敢冲敢杀的一面，对纯洁内部有不同看法。一些“土匪”分子已经担任班长、副队长；享有“勇敢”名声，掌握一部分群众，处理不当就会发生问题，福安游击队几乎发生分裂。但是能不能纯洁内部，这是能不能保证游击队不变质、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的关键问题，我们统一了思想，采取了果断的措施。

第一，坚决清除“土匪”分子，其中比较好的可以酌情留下，但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动员一批党员和纯洁的贫雇农参加，成为游击队的基本力量；抽调一批区委干部担任班长、队长和政治指导员。阮英平（玉斋）、潘伯成等同志就是这时从区委岗位调到游击队的。江平同志是一九三二年由福州中心市委派来担任福安游击第一支队政治指导员的。他是长乐县人，早年在福州政法学院附中读书，因发动抵制日货两次被捕，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二九年去苏联留学，回国后派来闽东。一九三二在

肃清流寇思想，提高每个成员的政治觉悟。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对“土匪”分子区别对待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以后漫长的艰苦岁月里保证了部队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

## 狮子头客店遇险

在我一生的战斗生涯中几经生生死死，一九三三年冬天的一次，我几乎已经到了死神的怀抱，但最终还是挣脱出来。那次遇难时敌人向我射出的子弹，至今还留在我身体内，真可谓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闽东福安县有一个叫狮子头的地方，离县城约有六十多里，是个渡口，由赛歧到福安一定要在这里过渡。这个渡口有家客店叫狮子头客店，是一座孤零零的上下两层的木头房子。来往赛歧和福安之间的行人在这里登岸后，大多要在这家客店里休息、吃饭、等船，然后再上路。这里是个交通要道口，往来的人很多，我们的同志在这里接头，不容易引起人家注意。这个客店实际上是我们闽东地下党的一个交通站。

有一天，我约一个同志中午十二时到这个客店接头。这天早上我从山上游击队的根据地下来，中午到了客店。我先在楼下坐一坐，接头的同志还没到。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店主人就把我带到楼上吃饭。楼上就是我们接头



的地方，只有我一个人在吃饭。这时，我听到楼梯响，有人上楼，我以为是来接头的同志到了，回头一望，不对，上来了三个人，我都不认识，不禁大吃一惊。就在这时，那三个人从楼梯口几步跑过来，我还来不及掏枪，他们就将我按住，朝我开枪，我头部中弹，倒在楼板上，鲜血淋漓。他们开完枪，搜去我身上的手枪和笔记本，就跑开了。我脑子还清醒，听到他们下楼的声音，便抬头一望，这下坏了，原来只下去了两个，还有一个留在楼梯口正看着我死没死。那人一看我抬头，就大叫起来：“还没死！还没死！”并跑过来朝我又连开三枪，一枪击中脑部，一枪打在上臂上。我竟还没有死！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紧接着，我听到楼下哨子声响，有人急促地叫着“快走，快走！”我听到楼上那人跑下楼的声音，楼下的人纷纷跑出去的嘈杂声，但我还是没有动。又过了好久，周围悄无人声，我才抬起头朝四周探望，确实没有人啦。我头部、胸部、手臂都中了弹，躺的地方周围都是血，不由想到这次非死不可了。我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只能躺在那里，脑子里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想到我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想到自己死得早了点，年纪还轻，才十九岁，不能再为党多做一些工作了。又躺了一会，并没有象我想的那样非死不可，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一

下子求生的欲望变得很强烈，要想办法脱险，要离开这个地方！我的血流得太多，根本站不起来，就拼着最后一点劲爬，爬到楼梯口，稳住神，憋足劲，顺着楼梯一级一级往下爬，这下如果栽下去，那就非断气不可，幸好爬下去了。到了楼下，那里还是没有一个人，我就歇一会，再爬，爬出门外，再向客店的后面爬去，一直爬到一座小磨房旁的小水沟边，再也没有力气了，昏了过去。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屋里的一张床上，还有人在旁边照顾我，而且知道是半夜十二点钟了。原来，离狮子头客店附近几里路有个村子，叫狮子头村，村里的群众基础很好，有我们的一个党支部，还有农会的组织。客店里枪响的时候，村里的同志知道有情况，可他们一时不敢来，因为白天那里来往的人多。到下午四点多，天近黄昏，路上没有什么行人了，村党支部派人来观察，发现我昏死在水沟边，就组织人把我抬进村，并且请镇上的开业医生给我治伤。我身上的棉衣、毛衣、衬衣全被已经凝结的血沾住了，脱不下来，医生用剪刀一层一层地剪开，把伤口都洗干净。由于条件的限制，一时无法取出还留在头部、胸部的子弹，只能暂时上了药，包扎起来。后来估算，我在狮子头客店后的小水沟边昏死过去时大约是下午两点多钟，直到晚上十二点才醒过来，其间整整昏死过去十个小时。

刺杀我的人是福安县国民党派出的特务队。由于狮

狮子头一带我们的力量比较强，所以那些特务刺杀了我以后不敢久留，匆匆返回福安县城。他们的头头一看搜来的我的笔记本，知道了我的名字，立刻又派他们赶回来，要砍我的脑袋。可是他们这一往一来，回到狮子头客店时已经六点多了，我早被救走了。于是他们四处搜查，可根本找不到我的踪影。第二天，敌人就派部队封锁了狮子头方圆十里内几个村子的路口，到处搜寻，整整折腾了一个星期。由于狮子头村的同志保密工作做得好，一点没暴露。慢慢地，敌人放松了，撤了哨。封锁一撤，同志们就想办法把我送到山上游击队的根据地去，这样才能完全脱险。

脱险也不容易啊！从村里到山上一路上不安全，得想个周全的办法才行。同志们想出了一条妙计。那时福安农村的妇女还裹小脚，家境好一点的妇女回娘家要坐轿子。同志们想把我装扮成一个回娘家的妇女，坐在轿子里，轿帘一放，外面的人看不见，便于隐蔽。上路的那一天，同志们给我穿上妇女的服装，包括给我找来小脚妇女穿的鞋，我当然穿不进这种“三寸金莲”，就穿进两个脚趾；头上的伤口处就用妇女出门时的头巾包上，只露出两只眼睛；我坐进轿子后，他们还在我膝上盖上一床棉被，只露出一点小鞋尖。为了不露一点破绽，还按当地回娘家的风俗，安排了一个随着轿子走的小孩，一同上路。一切准备停当，我们就出发了。抬轿子的是我们的

两个同志，非常负责，把我一直抬到山上。我终于脱险了。

山上的同志们见到我时，我的脑袋还涨得很大，因为受伤后躺在水沟边被风吹了几个钟头。他们看我伤成这个样子，都难过得掉下了眼泪。县委又把镇上那位开业医生请到根据地来给我动手术，取出了还留在头部的那颗子弹。很多事真巧，这颗子弹从我头部左侧耳前射入，碰到骨头，往下偏去，从我脸部中间穿过，留在右脸侧的皮下，如果这颗子弹往上偏去，就穿入我的脑部，那就要脑浆迸裂，我就活不了了。胸部的那颗子弹无法取出，留在那里直到今天，算是一个永久的纪念吧。

我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养好了伤，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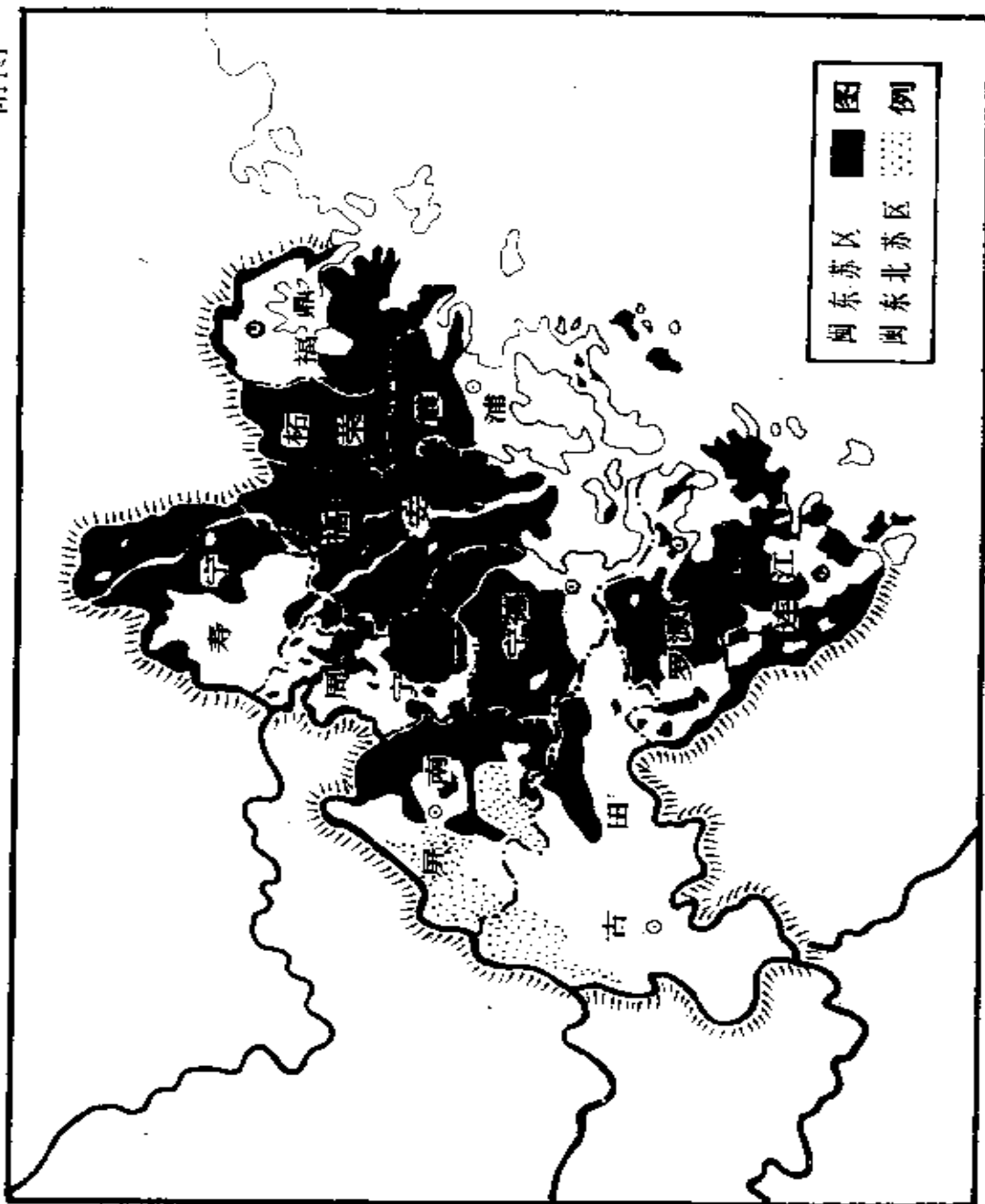
## 第五章 创建闽东苏区

### 对付大刀会的策略

闽东的大刀会很普遍，福鼎等地叫大刀会，福安、宁德等地叫一心会，寿宁、连江、霞浦等地叫红带会，尽管名目不同，实际上都是有古老传统的武装组织，具有群众性，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一般以保家防匪为号召。地主阶级除了组织民团作为镇压群众斗争的反动武装以外，还利用大刀会欺骗群众，与工农游击队为敌。大刀会徒众虽以原始武器梭镖作战，但临阵前念咒语，喝符水，如醉如痴，一拥而上，此种凶猛的密集冲锋，确实势不可当。白军民团出动，如果加上大刀会配合，就十分猖狂。开始我们吃过大刀会的亏，工农游击队第一支队政治指导员江平同志就是在与大刀会作战中牺牲的，游击队也遭受了很大损失。江平同志牺牲后，我们找了一些受党影响的大刀会法师座谈，研究对策。法师告诉我们：大刀会徒众所以勇猛冲锋，一是迷信

# 闽东苏区示意图

附图



“刀枪不入”的法术，冲锋时奔跑走动不易被子弹击中；一是临战前吞食符水，画符的朱砂起了作用，兴奋得如醉如痴；但是药力不能持久，也不能跌跤，不能浸水田，跌跤和冷水刺激都会使药力失去作用。我们根据这一情况，以及大刀会主要使用梭镖的特点，确定了打法：地形选择于隘路或水田，勿使大刀会徒众蜂拥而来，迟滞其前进；战斗队形采用三人一组或五人一组，前一人持竹叉，后两人使用步枪，或前两人持竹叉，后三人配备长矛两支、步枪一支；战斗时以身强力大的队员持竹叉，叉住大刀会先头人员的脖颈儿，挡住他们前进，然后使用长矛、步枪反击。按此打法，果然每战必捷。

闽东大刀会的普遍性和群众性迫使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与大刀会严重对立，如某些地区的“赤白对抗”，是不利于争取群众的。地主与农民仅只在“保家防匪”这一点上有共同利益，就能组织大刀会，我党与农民利益完全一致，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一形式来组织保卫农会的赤色大刀会呢？在革命斗争初起之时，利用这一传统民间武装形式是有好处的，一是开始时不公开打出赤卫队旗号，可以吸引中间状态的群众参加，既可掩护积极分子，又可使我们的武装斗争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二是可以缩小目标，避免过早暴露力量；三是发展快，而且大刀会在每个乡设一坛，只要控制了这一个坛就控制了这个乡。由于农民运动的深入，一些大

刀会成员已经参加农会，甚至法师中也有接受我党影响成为农会会员的，有个名叫可民的法师，还参加了党。有了法师就可以办农民自己的大刀会了。当时寿宁县委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于是福安中心县委作出决定：以大刀会的形式组织赤色武装。对内来说，脱产是游击队，不脱产叫赤卫队；对外则都是大刀会，或叫一心会、红带会。寿宁县委的范浚就是红带总会的发起人之一。寿宁游击队的人枪不多，主要是红带会。范浚从他的家乡大安向西北区、东区、北区有赤色农会组织的乡村去发动红带会。先选择有工作基础的村子，抽调积极分子，自带粮食到山上参加训练班，专门传授组织红带会，四十天结束训练后再分头到各村发展。一九三三年春，寿宁的西区至东区、南区普遍建立了红带会。一九三三年七八月间，福安南区也都有了红带会。闽东全面暴动时，包围霞浦县城三天三夜，游击队只有百多人，红带会却有三千多人，加上革命群众，真是红旗如海、梭镖如林。以后，巩固的地区公开打出苏维埃和红军的旗号，建立了赤卫队，但仍然没有取消大刀会这一形式，只是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逐渐用正规武装所代替。

红色大刀会组织起来以后，形成了三种势力控制的这种武装组织：我党控制，地主阶级控制，中间力量控制。这就形成了斗争的复杂性，主要是争取中间性质的



大刀会问题。一九三三年冬，福安中心县委所在地的柏柱洋地区大多数大刀会是我们的，但楼下大刀会是地主控制的，山上的大刀会则是中立的。那时还未全区性暴动，我的身份也未公开，是以福州商人的面目出现的。反动地主为了挑拨山上大刀会与我们的关系，由楼下大刀会出面，故意向他们谎称我是土匪探子。山上大刀会把我和施霖抓了去。施霖是我党区委书记，民团正悬有赏格，山上大刀会发现错抓了共产党负责人，正感到下不了台时，楼下大刀会乘机劝诱他们把我和施霖押到溪柄民团邀功请赏，妄图促使双方打起来而决裂。中心县委作了研究，当时我方力量占优势，如派游击队去攻打，可以把我和施霖救出，但正好钻进了反动地主的圈套，认为还是以和平方式解救为好，利于今后争取他们。中心县委就请当地械斗时的说合人作为中介和他们谈判，明白告诉他们我俩是共产党，劝说他们不要上当；另一方面针对他们贪图赏金和爱面子的心理，利用我的公开的商人身份，表示可以给予与赏金相当的赎金（鸦片十两）作为酬谢。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他们同意释放我和施霖，还和我方约定互不侵犯，土匪来时互相通报，进行联防，这样反倒成了同盟军。对于反动地主豪绅和敌对分子控制的大刀会，则争取其广大成员，打击首恶分子。周墩、溪底、岭头等地三十多个大刀会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被我们争取过来，反动头目何孙同等则被我们镇

压，感村、梧桐坑一带的大刀会迅速瓦解。

## 闽东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曾在上海抗日的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号，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即所谓“闽变”。我当时正在福安巡视工作，未得通知，不清楚“闽变”情况，但看到海军陆战队和教导团退缩宁德飞鸾一带，感到政局发生了对我党有利的变化，随即作了相应的布置。不久，马立峰、范式人等同志从福州出狱回到闽东，介绍了“闽变”的情况。十二月，福安中心县委在鹤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抓住时机，发动全区性武装暴动。

从哪里打响第一枪呢？会上有些同志认为霞浦县城原是闽东首府，敌人武装力量薄弱，应先打霞浦。但多数同志认为赛歧是闽东交通要道和经济中心，先打赛歧影响更大，于是决定先打赛歧。赛歧驻有敌海军陆战队一个连，曾在两个月前，遭闽东工农游击第一、五支队在甘棠镇阻击，毙伤其排长等九人。一月七日清晨，第一、五支队和赤卫队数千人进攻赛歧，缴获陆战队和民团枪支八九十支，完全占领赛歧镇。与此同时又攻占了溪柄、穆洋等镇。

一处点火，四处开花。不到四十天，福安全县农村

红成一片。西区过去斗争失败的区域，都公开起来收缴反动武装，组织赤卫队，打土豪，肃清反革命。邻近各区也随之响应，宁德龟山一带的大刀会成员纷纷参加革命。寿宁、福鼎等县相继暴动，霞浦红带总会占领了青蛟、陈墩、杯溪等二百八十一一个村庄后，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对霞浦县城的围攻。连江中心县委也组织全区暴动，第十三支队连续攻下透堡、筱埕、马鼻等地。至此，闽东党已控制了一百多万人口的地区，创立了一整块红色根据地。各县先后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赛歧成立了闽东革命委员会。二月，在柏柱洋召开了闽东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马立峰同志当选为主席，叶秀藩同志为副主席，设有组织、土地、财政、粮食、军事、肃反、交通等七部，张蒙弟、马三弟、范式人等同志分别担任各部委员。闽东苏维埃政府下辖福安、寿宁、福鼎、宁德、霞浦、连江、罗源等七个县苏维埃政府，四十二个区政府，八百多个乡政府，红色区域的范围达五百余里。

一九三四年二月，福安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全面实行土地革命。当时我们都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只有曾同志在一九三三年十月调到闽东以前，曾在井冈山和闽西苏区工作过，有分田经验，就由她参照闽西苏区的分田方法，负责起草分田大纲。曾志、马立峰、张蒙弟等同志开始在福安柏柱洋进行分田试点。

当时分田的政策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按人口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地主和反动派的家属分坏田，反动逃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的田地比地主稍好些；中农、贫农按原耕地为基础，抽肥补瘦，分配给一份好田。畲、汉两族平等对待，给红军家庭一定照顾。

为了推广柏柱洋分田经验，四月中旬召开了“分田胜利大会”，各县均派代表参加，大会宣读了分田大纲。当夜，柏柱洋三十六个村庄举行了盛大提灯游行，有龙灯、凤灯、鲤鱼灯……共庆胜利。

柏柱洋的分田经验，迅速得到推广。福安的一千四百多个村庄，霞浦的八百八十多个村庄，福鼎的一千五百多个村庄，连江的一百七十多个乡……分田人口达六十多万。

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分散的游击队已经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福安中心县委决定建立一支能在较大范围内机动的骨干武装。二月二十四日，亦即发动围攻霞浦县城的一天，在福安霞西寺，以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和第五支队，组成工农红军闽东独立第二团，计三百余人，一百八十多支枪。接着连江的工农游击第十三支队也于透堡成立闽东工农红军独立第十三团，拥有二百多人枪。寿宁成立红十六连，后改为独立营。两个独立团各在福安、连江两个中心县委所辖地区活动，在赤卫队、游击队的配合下，支援群众斗争，巩固和发展苏区。

一九三四年七月，闽东独立二团和第十三团共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地方武装也有所壮大，各县区都有独立营、警卫连、游击队、肃反队，各村普遍成立赤卫队，沿海船民还组织了三支海上游击队，一支在福鼎秦屿、大嵛山，一支在霞浦、宁德交界地区，一支在连江。还在西洋岛收编了柯成贵部队。柯成贵原是高中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敌人要抓他，他逃到海上为“匪”，发展了很多人，但孤立无援，就通过他的同学，也就是福安六屿地下党负责人陈亮同志来找我们。我们收编柯部为闽东独立团海上游击独立营，柯任营长，共一百多人枪。一九三五年三月，柯部被国民党军包围于海岛，柯成贵被俘不屈，英勇就义于福州。

闽东党在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同时，重视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在分田过程中和分田以后，组织发展生产，抓春耕、夏种、秋收，并发动群众养鸡鸭、养猪。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亦发展商业，采取“赤白区往来自由，买卖公平”的保护商业政策。一九三四年六月，闽东苏维埃政府发出“保卫字第三号”布告，保护商业自由。

在文化教育方面，苏维埃政府举办“列宁小学”和各种补习班，并决定教育经费可用公共财产支出，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贴。这段时间，闽东苏区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记得我们当时在分析形势时经常提到闽东是“五百

里政权”，称这段时间是闽东苏区的“黄金时代”。

## 成立闽东特委，独立坚持斗争

一九三四年三月，闽东的斗争正在迅猛开展，突然收到福州中心市委代理书记陈之枢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回福州。我当即从赛歧乘轮船到三都澳，准备第二天去福州。当晚到三都澳交通站百克医院。百克医院是医生丁立山的诊所，丁是党员，原在福州塔亭医院做医护工作，后在三都澳开诊所，实际上是党的交通站。我和他一见面，他吃了一惊，问道：“你要到哪里去？”我说：“回福州。”丁立山急问：“谁叫你回福州的？”我说：“陈之枢打来电报。”他惊呼：“陈之枢叛变啦！福州现在到处在抓人！”我这才恍然大悟，这电报原是诱我投入罗网的。

我知道陈之枢此人。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我到福州巡视工作时，我是团省委代理书记，他是福州团市委书记，建阳人，颇有能力，我由福州回厦门时，把他和晋江团县委书记陈举同志一起带到厦门，加强团省委工作。五月，厦门劫狱成功，敌人大肆搜捕。七月，我们三人在厦门同时被捕，但没有暴露身份，被判一年徒刑。陈举同志病死狱中。我和陈之枢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出狱，因在厦门面目较红，调到福州团中心市委工作，我任书

记，他任组织部长。这时，党的福州中心市委书记是红四军调来的纵队政委蔡协民同志。一九三二年一月蔡因遭受王明“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残酷打击，被撤职，以后在安(溪)、南(安)、永(青)游击区牺牲。陶铸同志接任福州党中心市委书记后，调陈之枢任组织部长。陶铸同志在上海被捕入狱后，陈之枢代理福州党市委书记。“闽变”失败后，蒋鼎文带部队进入福州，军统机关首先将已经暴露身份的陈之枢逮捕。这家伙上午八九点钟被抓进去，不到两小时就叛变了。中午，敌人就根据他出卖的名单进行大逮捕，把福州的党团组织、赤色团体全部破坏。敌人没有抓到我，很不甘心，第二天由陈之枢发来了诱我去福州的电报。由于有高度警惕的丁立山不懈地密切关注福州的动向，将陈之枢叛变、福州党的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告诉了我，因此敌人诱捕我的阴谋没有得逞。我立即由三都澳返回福安，通知福安中心县委，并派出交通员通知连江中心县委立即切断和福州的关系。

福州中心市委所属，除福安、连江外，还有莆田中心县委。王于洁、黄孝敏等同志在福州大逮捕时逃出，及时通知所属组织转移，莆田、福清等地党组织才没有遭到破坏。福州党组织遭敌人彻底破坏后，闽东地区不但失去了和福州的关系，同时同上海中央的关系也断了，面临需要独立坚持斗争的局面，我即以特派员身份通知福安、连江两个中心县委和在连江巡视工作的苏达同志，

在溪柄区的柏柱洋召开两个中心县委的紧急联席会议。会议由我主持。议题就是和上级党的联系断了，今后怎么办？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两个中心县委应该统一领导，才能独立坚持斗争。我建议成立闽东特委，统一领导闽东的斗争，并建议由苏达同志担任特委书记。那时讲究工人成份，苏达同志是工人，由他当特委书记有利于两地团结。我提名后，会议一致通过，并选出叶飞、马立峰、杨而菖、詹如柏、曾志、阮英平、叶秀藩、郑宗玉等同志为特委委员。

从一九三四年起到一九三七年长达四年之久，失去了中央关系，闽东特委独立坚持闽东地区斗争。中央只是从报纸上、敌方的报道中了解到闽东有一块苏区，正在进行土地革命。一九三四年，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即团）由中央苏区北上入闽，进攻福州。中央交代北上抗日先遣队设法和闽东取得联系。北上抗日先遣队攻占罗源后，到达宁德赤溪和闽东特委会合，才交给我们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关系。一九三四年冬，闽东特委派苏达同志去上海联系，但他一去未回，杳无音信，因此，我们与上海中央的联系没有接上。

## 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成立

“闽变”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腾出手来，以八十



四师、新十师和省保安队，从福州压向闽东苏区，进攻我霞浦、陈墩、洋中、青皎等根据地，围攻我活动于宁德、官岭、龟山的地方游击队。但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对闽东苏区的压力还不算大。闽东独立第二团配合当地武装，进行多次奇袭伏击，击退保安队的进攻，横扫反动的大刀会，巩固了赛溪河以东的基本地区，开辟了鼎（福鼎）平（浙江平阳）地区，闽东苏区的斗争形势继续发展。

一九三四年八月，北上抗日先遣队逼近福州北郊的大、小北岭，袭击城郊王庄机场，威逼福州。经过一昼夜的强攻，占领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西关的主要街道，但未能攻克福州，遂向闽东转移。

抗日先遣队进入闽东地区后，在连江独立十三团配合下，打开罗源县城，继续北趋宁德。我带闽东独立二团赶到赤溪，与他们胜利会师。在军团部，见到中央代表曾洪易（后叛变），并会见了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同志。他们听取我们汇报闽东情况后表示赞许，并向我们提出：闽东的党政工作已有统一领导，应该建立一支主力。我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助解决时，寻淮洲同志告诉我们：离开根据地，长途跋涉转战千里，兵员补充缺乏来源，伤病员也无法安置，确有很大困难。的确，红七军团（即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东根据地时，很使我们

奇怪：枪多兵少，有一人背两支枪的，有民工挑着枪支的。我便主动问道：“你们要不要补充新兵？”寻淮洲同志颇为吃惊地问我：“你们有办法吗？”我说：“别的办法没有。苏区嘛，群众起来了嘛，这个行。你们要补多少新兵？”寻淮洲同志考虑了一下问：“三百行不行？”我说：“行，你们是有枪没有人，不象我们是有人没有枪。”寻淮洲同志又考虑一下问道：“五百行不行？最好能有一千，能不能在三天之内动员好送到部队？”我说：“行，不要说一千，三千也行。就是时间要长一点，总要一个星期吧。”随后，闽东独立二团配合北上抗日先遣队打开穆阳后，筹集了三万现洋和五十几担烟土。停留三天后，红七军团接收了我们动员来的一千多翻身农民参军。因为敌四十七师尾随追来，北上抗日先遣队即离开穆阳向闽浙边政和、庆元方向转移，可惜没有东渡赛溪河进入闽东苏区基本根据地（该河渡口都是我们控制，来去便利）。当时闽东苏区有大片根据地，粮盐供应方便，兵员补充容易，以此有利条件，红七军团完全可以作为依托，与闽浙赣苏区、闽北苏区相配合，在浙江、江西、皖南广大地区与敌周旋，这就可以达到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行动的预期目的。可惜当时身为中央代表的曾洪易充满失败主义的情绪，计不出此，以致以后在皖南覆没。红七军团北去后，还有一千多翻身农民已经集中，参加红军的热情很高，却追赶不上他们了。闽东特委认为：

既然把新兵动员起来了，解散回家是要泄气的，不如根据寻淮洲同志建议，将其补充到部队，建立一支主力部队。

红七军团离开时，留下了一百多名伤病员，里面团、营、连、排干部都有，给了我们一笔宝贵财富；他们又将罗源战斗所缴获枪支交给连江独立十三团，多余的百余支步枪交给闽东独立二团。有枪有兵有干部，成立主力部队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九月，我亲自到连江带领独立十三团到达宁德桃花溪地区，随后福安的独立二团、寿宁独立营也开到桃花溪集中。于是在宁德桃花溪地区著名古刹天柱寺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辖三个团，以福安独立团为第一团，以连江独立团为第二团，以寿宁独立营为第三团。师长冯品泰，副师长赖金标，我任政治委员。

独立师成立后，立即向咸村周宁挺进。在半个月中，消灭民团数处，缴枪二百余支，开辟了周宁、寿宁、政和边界的新苏区，掀起了新的革命热潮。

闽东苏区的全盛时期，为时不到一年。中央红军长征不久，方志敏同志率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主力，不幸在数十倍敌人的围攻下于皖南覆没，方志敏同志被俘。敌人随即抽调大批兵力，向赣东北、闽北、闽东各红色根据地大举“清剿”。闽东苏区邻近福州，更是首当其冲。当时压向闽东苏区的敌人，除原有兵力外，增加了八十

师、七十九师、五十二师等共计八个师，加上地方保安队和民团，约有十万人，采取所谓“重点进攻，分区清剿”的方针，这就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始。但对闽东来说，即使在苏区全盛时期和成立了闽东独立师后进行的都是游击战争，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进行了五年游击战争，这也是闽东地区斗争的一个特点。

## 第六章 艰苦的一九三五年

### 一次重要的紧急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敌人分四路向闽东苏区进行“围剿”，这是闽东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始。进攻福安地区的敌人主要是新十师肖乾部，进攻连江、罗源地区的是八十七师王敬久部，进攻寿宁地区的是从山东调来的刘珍年师，另一个多师（刘和鼎部）和四十师一部兵力在闽浙赣三省边境构筑封锁线，将赣东北、闽北、闽东地区加以分割。

由于一直没有和党中央取得联系，闽东党不了解中央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情况，因而对战局的变化没有准备，直到敌人一切部署就绪，大举逼进时，我们方才发觉。这时，敌人八十七师已经进驻连江，派舰艇封锁了东冲海面，切断了罗源、连江地区和特委的联系，使连、罗地区陷于孤立境地。敌又以两个旅和一个多团的兵力，包围了霞浦苏区。寿宁苏区也遭到敌刘珍

年师的进攻。独立师在闽东苏区中心福安陷于敌军重重包围之中，情况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闽东特委在福安洋面山上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这是闽东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一次重要会议。

闽东特委紧急会议由我主持，闽东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闽东苏维埃主席马立峰、独立师师长冯品泰、副师长赖金标、政治部主任叶秀藩等出席了会议。我们当时都缺乏经验，在如何对付敌人的大举进攻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会议上，主要的意见分歧有两种。一种意见是詹如柏等地方同志，主张无论如何要保卫苏区，提出“和苏区共存亡，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口号；另外一种主要是独立师同志的意见。他们说：“在敌人这样大举进攻的面前，和敌人硬拼一定会失败。”

当时，我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不赞成提出和苏区共存亡，与敌人决一死战的口号。我懂得一条，只有保存了有生力量，保存了独立师，才能坚持斗争；如果独立师被消灭了，闽东苏区就会垮台。如果不懂这一条，那时会采取什么方针，会作出什么决定，那就很难说了。当时我这个观点是从实际中产生的。从一九三二年我到闽东参加游击战争，至一九三五年初，已有三年的实践了。闽东地区在建立苏区以前，就有游击队，就有游击区；一个县只要有一支游击队，有那么几

十个、百把个人，很纯洁、很坚决，听党的领导，纪律好，就可以坚持一个县的斗争。即使有个别地区暂时垮了，还可以恢复。这是农民运动时期武装斗争的经验。农民运动如果没有武装就难于坚持，取得这个经验是很重要的。

特委会议开了一夜，还未取得一致意见。我知道地方同志的意见不对，独立师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但他们的理由说得不充分，说服不了地方同志。争论是有好处的，道理越争越明。当时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况很清楚，和敌人决一死战正好中敌人计谋，不可能保卫苏区。这是明明白白摆在大家面前的事实，问题是怎样对付敌人？怎样坚持斗争？怎样保卫苏区？这时我考虑得比较明确，看得比较清楚的是：应该承认苏区要立即变为游击区这个事实，必须下决心把苏区变为游击区，独立师应当转入游击战争，脱离敌人的包围，转移到苏区外围，不能在苏区跟敌人进行决战。只要独立师不被敌人消灭，苏区就是一时被敌人占领，甚至暂时垮了，这都不可怕，总有一天可以恢复。在强大敌人进攻面前，暂时的退却，保存武装力量，这是最重要的。争论到最后，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是我们喜欢讲的一句话。我说：“苏区当然要保卫，但跟苏区共存亡、决一死战是不对的，这样保卫不了苏区。我们应该主动把苏区变成游击区，用游击战争对付敌人，才能不被敌人消灭。地

方被敌人占领，我们上山嘛。把苏区变成游击区，无非是回到我们以前那个局面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坚持斗争，敌人拿我们没有办法。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得，都有经验。现在敌人已经把我们围住了，死拼，和苏区共存亡，那不是正好被敌人一网打尽？独立师要不要和敌人打一下呢？要和敌人打一下，不打就跑掉不好，群众会有意见。但要好好研究打的方法，我们不能硬拼，要保存自己，给敌人一个打击就行。”对这个意见，地方同志同意了，独立师同志也同意了，分歧的意见取得一致，当即作出决定：独立师给进攻的敌人一个打击之后，即转移到苏区外围，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游击区以支持和配合苏区坚持斗争。苏区被敌人占领，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县独立营、区中队）在原地坚持，上山打游击，把苏区变为游击区。这时天快亮了。

特委紧急会议结束之后，特委负责同志詹如柏、马立峰等即分赴各地传达、部署。

第二天，独立师即在福安东区洋面后面的彭家山同敌新十师展开作战，由彭家山一直打到堵平。激战终日，敌人伤亡很大，但我军伤亡也不小。这是独立师成立以来进行的最大一次战斗，是一个消耗战，没有什么缴获。但这一仗给深入苏区的敌人一个迎头痛击，对于以后坚持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是有意义、有作用的。

独立师打了这一仗以后，当晚，即由堵平经福安上



白石附近（福安和浙江泰顺交界处）转移到寿宁地区。到达寿宁的三岔岭，正是下午三 四点钟光景，太阳已经西斜。突然队伍前后枪声大作，原来是中了敌人的埋伏。副师长赖金标同志立即指挥部队占领背侧小山头抗击。不幸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当即光荣牺牲。这是我们的一个重大损失。当晚突破包围，退到政和，又转到周墩，最后转移到宁德的杨梅岔。这时，独立师只剩下五百多人了。但是主力保存了下来，跳到苏区外围宁（德）、屏（南）、古（田）边区开展游击战争。

独立师一突围，敌人就象洪水一样，几乎淹没了整个根据地。敌人采取“分兵清剿”的战术，较大的村庄都筑起碉堡，驻上部队，封锁大小路口，由地方反动分子作向导，搜山“清剿”。对根据地人民则采取毒辣的“五光”政策，烧杀抢掠、移民并村。我们地方工作同志没有做好准备，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时，剩下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为三块：宁屏古，福安、寿宁地区和霞浦、福鼎地区。在敌人残酷的“清剿”、疯狂的镇压下，一部分人经受不住考验，有的脱离革命逃到外地去了，有些人作了可耻的叛徒。独立师师长冯品泰在敌人“清剿”开始时就悲观失望，唉声叹气，以后竟发展到阴谋叛变投敌。他鼓动参谋长投敌时，被参谋长揭发，经特委决定，将其处决。

这时，闽东遭受了一次痛心的损失，那就是苏维埃

主席马立峰、特委代理书记詹如柏和特委委员杨而菑等同志牺牲。独立师突围的第二天，马立峰同志在福安独立营营长游裕康叛变时被出卖而遭杀害；詹如柏同志在化装成和尚去宁德找我和独立师的途中，被敌人发觉，在寿宁武曲的寺庙内被捕，于福安赛歧英勇就义；杨而菑同志在马鼻战斗中壮烈牺牲；另外，特委委员施霖同志在霞浦被捕就义；安德县委书记王四弟同志也惨遭杀害……主要领导干部的牺牲，加上敌人的破坏，闽东苏区全部陷入敌手，各县的游击武装与上级的联系都中断了。这是闽东斗争形势最危急最困难的时期。可是尽管少数不坚定分子动摇叛变，但大多数干部和革命群众没有低头，阮英平、范式人、许旺等不少特委、县、区的负责同志带领少数武装在坚持斗争。独立师仍然存在，干部群众抱有希望，许多人直至饿死在山上，也不向敌人投降。

## 重建闽东特委

一九三五年三、四月间，敌人占领了闽东苏区的广大村镇，杀害了一批知名的群众领袖，收罗一伙叛徒，扶植了一批反动民团，编好了保甲，地主豪绅还乡又作威作福欺压劳苦人民。他们以为革命力量已经消灭，“清剿”任务已经完成，敌军主力遂逐渐撤出苏区。其实，

我们红军的骨干力量在闽东人民的支持下，宁屏古新的游击根据地发展起来了，独立师也逐渐扩大。我们不断派人与苏区联系，得知苏区也在逐步恢复。于是，独立师抓住这个时机，返回苏区进行反攻。

闽东独立师首先同在福安、宁德边区坚持斗争的阮英平同志会合。听他报告了苏区情况后，得知各个县、区都有人在坚持斗争。闽东独立师即留下一个纵队在宁屏古地区活动，主力向苏区挺进。首先到达福安、寿宁地区与在福寿边区坚持斗争的范式人同志会合，进一步摸清了根据地的情况，得知许旺同志在霞浦、福鼎边区坚持斗争。独立师主力返回苏区的消息传开后，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纷纷下山，摧毁敌人据点，恢复工作。

一九三五年五月，重建闽东特委。我担任书记，组织部长是阮英平同志，宣传部长是范式人同志，委员有许旺、郑宗玉、陈挺等同志。根据当时各个地区被分割的情况，特委决定下设四个办事处(相当于地委)，统一领导各个地区的斗争。宁屏古地区办事处由阮英平同志负责，福安、寿宁地区办事处由范式人同志负责，霞鼎地区办事处由许旺同志负责，鼎平地区办事处由郑宗玉同志负责。决定把独立师分为三个纵队，以纵队为单位在各个地区活动，恢复和开辟地方工作。第二纵队在宁屏古地区活动，由阮英平同志指挥；第三纵队在福安、寿宁地区活动，由范式人同志指挥；我率领独立师主力

第一纵队在各地机动。苏区时期的根据地大都在平原地区，这时候的根据地则大都是在山上，在两县或数县边区、两省交界的地区。

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敌情，我们把地方部队分成几十人、百把人不等的大量小的作战单位，经常到敌军驻地去骚扰敌人，同时做群众工作；待敌人疲惫并被迫分散后，独立师就迅速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由于我们采取了灵活的游击战术，并得到群众的支持，因而常常出奇制胜。

特委会议后，我带着一纵队去霞鼎地区与许旺同志会合。敌浙江保安旅自恃武器精良，加之没有发现我主力部队前去，以一个加强连妄图袭击许旺同志的游击武装。我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敌人出发的时间，人数、路线都弄得一清二楚，遂决定在敌人必经的栢槩岔设伏歼灭该敌。栢槩岔是两座相连的大山，中间有一条狭窄的公路。我们在拂晓前悄悄运动到栢槩岔埋伏起来。天亮以后，敌人果然从东南方向过来了。等他们进入我埋伏地带，发出攻击信号，两侧山上所有武器都开了火。敌人顿时大乱，倒下了一片，活着的乱打着枪朝来路逃跑。我们截断了敌人退路，迎头痛击。不到一个钟头，敌人便全部被歼，缴获百余支枪。这一胜利，对鼓舞群众信心，恢复和发展根据地起了很大作用。

我独立师主力在霞鼎地区大捷之后，乘胜扩大战果。我和陈挺同志又率独立师特务排四十余人，化装成划船

的、挑柴的，奇袭了福鼎港口重镇沙垵，全部消灭了该地警察局守敌，占领了沙垵一天，给敌人很大震动。郑宗玉同志率领鼎平独立团在闽浙边的福鼎、泰顺、平阳地区积极发展，建立了鼎（福鼎）平（平阳）地区新的游击根据地。

从此，闽东各块根据地的武装，都开始积极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取得了不少胜利。伏击和偷袭敌人，是当时我军经常采用的战术。例如许旺同志曾以“假敌攻敌”的办法，派了起义过来的六名战士，乔装保安队，假造了一张调防公函，拿下水门坑区白苑洋村一个坚固炮楼，消灭敌人一个班。七月，陈挺同志率领第一纵队三百多人，在福寿地区的岗垵伏击陈式正匪军数百多人，击毙四十多人，缴枪七十多支。八月，阮英平同志率领第二纵队二百余人在宁屏古地区的菖家岭，伏击敌保安三团三百余人，击毙四十余人。福鼎独立团在龟子山诱击富洋敌军，不到两小时，活捉敌营长以下四十余人，缴轻机枪两挺，步枪八十多支。象这些出色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部队，并且恢复和巩固了游击根据地。

## 政策和策略的胜利

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我们实行了革命的两面派斗

争策略，对付敌人的保甲政策。敌人在根据地编保、甲，实行法西斯统治，是很毒辣的。保甲一经编成，我军和地方干部就很难进行活动。我们最初提出破坏敌人的“保甲锁链”，发动群众拒绝户口登记或杀掉伪保长，这对鼓舞群众，震慑敌人，是有较大影响的。但是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必须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对于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联保主任、保甲长，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这些人中，一部分是属于作恶多端，死心塌地为反动派效劳的顽固分子，坚决予以镇压；另一部分人，只是应付敌人，则采取争取政策，使其中立；还有一部分人，出身较为贫苦，带有被迫性质，对人民群众接近，对我们靠拢，这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根据这个分析，虽然保甲制度是反动的，但是保甲长是可以为我所用的。我们对保甲长、联保主任的政策，采取镇压反动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同情分子。我们公开对中间立场的保甲长讲：你们可以做两面派，保护群众并供给我们情报。我部队驻你这里，你要保密；我们走后，你可以去报告敌人。采取这种对策，解除了他们的顾虑，效果很好，多数保甲长为我所用。我们通过这些人购买禁运物资，探听敌情，安置伤病员。古田县大甲珠洋的联保主任和程际村伪保长，为我们购买弹药和医药用品，还经常到古田、福州了解敌情报告我们。我们还指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充当保甲长、联保主任，公开对

付敌人，暗地进行革命活动。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来掩护革命工作，我们把这叫做“白皮红心”的政策，这个经验后来对抗战时期反“清乡”斗争很有用处。有了这个政策，紧张对立的局势便大大扭转过来。我们在敌占区的工作开展起来了，这很有利于坚持斗争。

敌人除了政治上加紧对群众的统治，企图割断我们与人民的联系，还实行经济封锁政策，想把我们困死在山上。针对敌人的经济封锁，我们依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把粮食藏在竹筒中、灰粪里，把日用品装在双层底的煤油箱内，瞒过敌人岗哨的检查，送上山来。有的群众上山砍柴时，宁愿自己挨饿，把午饭留给游击队员吃。闽东地区红白对立不尖锐，我们还采取了“买卖公平，不伤害白区来的商人利益”的商业政策，得到商人的拥护。他们不但供给我们很多东西，包括枪弹药品等，还供给我们情报，回到白区又替我们宣传。此外，我们还在经济战线上对敌人展开了反击：我们提出不给国民党交粮交税，不给地主送租还债，粮食不准运到白区。在红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就用武力镇压催粮、索税、逼租、讨债的反动派；武装力量薄弱的地区，就发动群众“推、拖、避”。党还领导群众开展了“五抗”斗争，当青黄不接时，有些地区还进行了分粮斗争，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口粮困难。

我们对待土豪的政策也作了改变，一般都是到白区

抓土豪，根据地内则采取“借款”的办法。各县还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例如福安规定向土豪派款，一般按其动产的百分之二十为标准。这就能根据实际情况办事，容易筹集款项。

⑧ 正由于闽东党根据斗争的实际情况，制定并执行了这些正确的政策，领导根据地群众和强大的敌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顽强而又机智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多次“清剿”和严密封锁，不但在这块孤立的滨海根据地内站稳了脚跟，并且得到一些发展，重建了十二个县的政权，闽东独立师还分别到屏南、古田、政和和浙江的泰顺、景宁、庆元等地活动，开辟新的游击区。党的基层组织分布到各个重要村庄，各新区先后建立了游击队和革命委员会（周墩和鼎平地区）以及青年团、妇女会、少先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我们的斗争方针也更加明确，坚持老区斗争，必须开辟新的游击区，部队才能生龙活虎，老区才有掩护。闽东的革命形势又活跃起来了。



## 第七章 闽浙边临时省委和 “南阳事件”

### 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

一九三四年冬天，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闽浙赣、皖南遭十倍于我之敌包围，不幸覆没，方志敏同志被捕。粟裕、刘英同志率突围出来的部队，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一九三五年二月，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八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围剿”浙西南游击队，在敌人的猖狂进攻面前，挺进师主力撤出浙西南中心区，转战于闽浙两省交界的景宁、庆元、松溪、政和、建阳一带。十月间，粟裕、刘英同志率领挺进师百余人，在福建省寿宁县的郑家坑和闽东特委会师。

闽东党长久以来失去了上级党的联系，迫切需要得到上级党的领导，因此我们非常欢迎挺进师的到来。随即闽东特委和以刘英同志为首的浙西南政委会举行联席

会议，会上我们主动提出接受他们的领导，刘英同志采纳了这个建议，双方共同组建了闽浙边临时省委。当然，由于挺进师此时也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闽浙边临时省委的成立无法报中央批准。临时省委由刘英同志任书记，粟裕同志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兼团省委书记，闽东特委参加省委的还有阮英平、范式人、许旺同志。并相应地成立了闽浙军区，粟裕同志任司令员，刘英同志任政治委员。

这时，挺进师建立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已遭受损失，闽东地区则有四块比较巩固的游击根据地：一块以寿宁为中心的福（安）寿（宁）地区，一块以宁德为中心的宁（德）屏（南）古（田）地区，一块以霞浦为中心的霞（浦）鼎（福鼎）地区，还有一块是以福鼎为中心的鼎（福鼎）平（阳）地区。每块地区各有一个独立团坚持原地斗争。我们看到挺进师没有根据地的情况，就把鼎平地区和鼎平独立团划给他们。这就是以后的浙南地区。刘英同志就以挺进师和独立团改称闽浙独立第一师，把闽东独立师改称为闽浙独立第二师。

### 闽浙临时省委内部的分歧

闽浙临时省委成立后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闽东和浙南双方不但关系很好，而且很密切。挺进师还抽调了一

些干部（军事干部和做肃反工作的保卫局干部）帮助闽东地区和闽东独立师的工作。但是，以后就发生了内部分歧，主要是在如何坚持斗争的方针问题上的分歧。

刘英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的，一九四二年任浙江省委书记时英勇牺牲。他对敌斗争非常坚决，但在党内斗争中却很“左”。此时虽然浙江南游击根据地和挺进师已经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没有总结经验教训，主要是刘英同志仍然坚持他那一套“左”的作法。刘英同志批评闽东独立师不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根据地，是右倾保守主义；提出要闽东独立师（此时已改称闽浙独立第二师）离开闽东到浙西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我和闽东特委的同志都不同意刘英同志的意见，认为如果闽东独立师离开了闽东老区，闽东根据地就无法坚持，有垮台的危险；而闽东独立师如果没有闽东根据地作为依托，也就无法到白区开展游击战争。粟裕同志也不同意刘英的意见，赞成我们的意见。有一次，粟裕同志和我个别谈话，详细谈了浙西南斗争的情况。由于他们在浙西南活动期间，没有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新区的条件，相应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在龙泉、丽水、龙游一带活动时仍是采取中央苏区时代的工作方式，遭到强大敌人的进攻，无法站稳脚跟，根据地和部队都受到损失，所以部队活动总是被国民党军跟踪追击，摆脱不掉。粟裕同志问我：“我们‘尾巴’

总是甩不掉，你们是怎样甩掉（尾巴）的？”所谓“尾巴”，是指跟踪的敌人。我一下回答不出来，只能这样告诉他：“象你们那样在白区横冲直撞，我们没有这个把握。我们开辟新区，在未巩固以前，党组织是不公开的，也不公开建立苏维埃政权。我们部队到白区活动时，一般是先派人去同当地党和群众组织取得联系，了解情况，然后部队才开出去活动。我们把这叫作‘群众工作在前，部队在后’。”我还告诉他：“我们共有四块根据地，还有大大小小的游击区。每次行动，部队从这块根据地到达活动地区公开活动，任务完成了，敌人调集兵力要来进攻了，部队就回到另一块根据地隐蔽休息，都是夜间活动，一夜走七八十里。这样，敌人不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出来，又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有群众，敌人没有群众，所以敌人就找不到我们的行踪。”粟裕同志深有感慨地说：“这办法好，这叫作‘狡兔三窟’，‘窟’就是根据地，没有‘窟’，兔就狡不起来。我们如果有‘窟’，就不会这样被动了！”粟裕同志又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闽东部队不能离开闽东根据地，我们挺进师就是吃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但是，刘英同志违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违反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是坚持他自己的错误意见。这样，闽浙临时省委内部就产生了原则性的分歧。可是闽浙临时省委自己又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粟裕同志就提出只有和闽北地区

取得联系，请黄道同志来主持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才有办法解决和纠正刘英同志的错误。粟裕同志还要我负责设法去同闽北独立师和黄道同志取得联系。黄道同志是闽浙赣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是闽北游击根据地党的负责人。在成立闽浙临时省委的时候，刘英同志也曾主张设法同闽北地区取得联系，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来领导闽北、闽东、浙西南三个地区的斗争。

我首先和闽北独立师取得联系，于一九三六年二月，在福建政和县洞宫山与黄道同志会晤。当时在座的除黄道同志和我以外，还有闽北军分区司令员吴先喜和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政治委员曾镜冰等同志。我向黄道同志汇报了闽东和浙西南的斗争情况，并且详述了刘英同志和我们在斗争方针上的原则分歧，建议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请黄道同志担任书记，统一领导闽北、闽东、浙南的斗争。黄道同志认为：当前远离中央领导，几个地方统一领导是有利于革命斗争的。他这次出来就是为了与闽东党会合，拟议建立闽赣临时省委的。但是，鉴于闽浙临时省委当前的情况，要建立统一领导，首先必须闽浙临时省委自己对前一阶段的工作做出总结，指出刘英同志的错误并责成他去恢复浙西南的工作，然后才能建立闽浙赣临时省委。我当即提出：“我们正是由于临时省委内部对于方针问题争论无法解决，所以请你出来担任领导的。”黄道同志坚持说：“如果你们本身不能解

决问题，闽浙赣临时省委也就无法成立。”我就进一步说：“我可以向闽东特委和粟裕同志传达这个意见。但是，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则非但浙西南斗争濒临危机，闽东又如何办？”黄道同志以高度革命责任心，忧心忡忡地说：“是呀，是呀，闽东斗争的成败，你们要对党负责的！”我提出：“如果不行，我们就受闽赣临时省委领导。”黄道同志说：“你们必须先退出闽浙临时省委，才能接受闽赣临时省委领导。”我觉得问题严重，考虑再三后提出：“这样做不是分裂行为么！”黄道同志也怔住了，他经过慎重考虑后说：“如果正常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只能采用非常方法，这是斗争的需要，何况临时省委是你们两家协商成立的，未经中央批准，可合可散嘛。”我说：“今后如和中央接上联系，打起官司来怎么办？”黄道同志毫不犹豫地说：“我一定替你们证明。”

我回到闽东后，刘英同志来了，召开了闽浙临时省委会议，有阮英平、范式人同志参加，粟裕同志未到。平时刘英同志总是和粟裕同志一起行动，这次他却是单独前来。在闽浙临时省委会议上，我向刘英同志报告了和黄道同志会合，并向他坦率汇报了黄道同志的意见。刘英同志一反常态，满口承认浙西南工作的错误，但是他不同意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并由黄道同志任书记，虽然他自己过去曾多次提议此事。他反复声称：错误我们自己纠正。并居然提出要我担任闽浙临时省委书记，他说，

我们已建立了闽浙临时省委，何必再成立闽浙赣临时省委呢。还是我们这个摊子吧。我当然坚决拒绝。会议毫无结果，闽东特委不得不宣布退出临时省委。

我完全没有料到以后竟在我们自己的队伍内部演出了一场“鸿门宴”。事情发生在浙江省庆元县的南阳村，所以就被称为“南阳事件”。

## 南 阳 事 件

一九三六年初秋，粟裕同志约我到庆元南阳会面。自我们同刘英同志的会议以后，我还没有见到粟裕同志，我也很想同他谈话。我和陈挺同志率一个连，于中午时分到达南阳，与粟裕同志会合。见到粟裕同志，我很高兴，要向他汇报会见黄道同志的情况和临时省委会议的结果。他说：“好呀，晚上吃过饭再说吧。”

当天晚饭的时候，我、陈挺和闽东的干部都入席了。如同旧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酒过三巡，掷杯为号，预先布置好坐在我两边的人把我抓了起来，把陈挺同志也抓了。我的警卫员拔出驳壳枪，打出门去，报告连队冲出去。我的手脚被捆绑起来，背上还被撑了一根竹竿，不能动弹，就象对待土豪、叛徒一样。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几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见面说话，都未予理睬。后来在路上遇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部队被打散，押解的人

忙乱中向我打了一枪，打伤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国民党士兵逼了上来，我就从十几丈高的悬崖上跳下去，恰巧挂在树上，没有摔死。陈挺同志也随我跳下悬崖。天黑后，我俩不顾伤痛，赶往闽东根据地，昼伏夜行，整整走了五夜，才到达目的地。

以后，粟裕同志告诉我，当时是刘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说明是什么原因。“南阳事件”后，刘英单独召开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紧急会议，宣布开除我和阮英平同志的党籍。同时说粟裕也参加了叶飞、黄道反对刘英的活动，也将粟裕同志隔离起来审查。

“南阳事件”导致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的彻底分裂。此后，闽东特委接受闽赣临时省委的领导。

“南阳事件”给闽浙边的革命斗争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我被抓的消息传到闽东根据地，部队、群众非常气愤，认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小叶（当时闽东军民称我为“小叶”）是红军，抓小叶的人一定是坏人。有的人情绪激动，甚至提出要带部队去找他们算帐。幸而我赶回闽东，及时向大家做工作，制止了发生武装冲突的危险。

这就是导致闽东和浙南彻底分裂的“南阳事件”，这是在当时“左”的影响下党内斗争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其表现形式又带着中国的传统色彩。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火并”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是常



见的现象，看来在革命队伍中也很难避免（大意）。我自己就亲身经历了一次。然而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我深感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毕竟不是农民武装，因为在革命队伍内部，能够为着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闽东和浙南的部队都编入了新四军，以后一直并肩作战，直到革命胜利。我和粟裕同志也长期战斗在一起，从新四军一师，华东野战军，一直到解放后，我都在粟裕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多次当他的副手，相互间配合得很好，没有因为个人意气而影响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八年有一次在上海开会时，李富春同志问我：听说在闽浙边临时省委时发生过南阳事件，有没有这回事？我就扼要地把这段党内斗争的经过告诉他。富春同志听了之后，很吃惊，并问我有没有向毛主席报告过，我说没有。富春同志对我说，有机会时应当报告毛主席。但是，以后我一直没有机会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此事。现在我认为有责任对闽浙临时省委当时那段极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作出如实的反映。

## 第八章 顾全大局 团结抗战

### 闽东山民——畲族群众

一九三六年秋天，斗争形势又紧张起来。国民党以刘建绪为绥靖主任，对闽浙、闽赣边区红色游击队进行“清剿”，先后增派八十师、九师、保安独立旅等到闽东来，配合地主反动武装分驻在根据地周围，进一步用“五光”、“十条”、“移民并村”等残酷手段，再度“围剿”我闽东根据地。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持其“剿共”方针，更加疯狂地对我南方根据地进行“清剿”，妄图消灭我南方红军游击队。

闽东党和闽东人民已有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清剿”斗争。地方武装在原地坚持斗争，独立师仍以纵队为单位在根据地周围开展游击斗争。

这里应该特别提一下闽东地区的少数民族——畲族。这个民族人数不多，约二十多万人，有一半以上散居在闽东太姥山脉、鹫峰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自称“山民”。他们在旧社会历来受到歧视和凌辱，身受几重压迫，在大山上含辛茹苦，饥寒交迫。历史上，他们也曾自发地掀起过几次斗争。闽东党很早就重视民族政策，注意在畲族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但在初期，畲族人民对汉族是不信任的，有戒心，工作很难开展。后来，发展了一个畲族党员，在畲族中的工作才开展起来。以后畲族群众有许多人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并成为骨干。在闽东三年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年代，畲族人民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们具有两大特点：第一，最保守秘密，对党很忠实；第二，最团结。在最困难的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对革命斗争支援最大。我们在山上依靠畲族掩护才能坚持。白云山支脉的竹洲山和屏峰山，闽东独立师的后方医院和修枪厂就设在这里。一九三六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军伙同当地民团曾三次焚劫了这里六个畲村。敌人抓住雷银梯等八位老人和妇女，逼问红军医院和修枪厂的所在，结果只得到“不知道”三个字。敌人烧了他们的四幢房屋，用马刀砍头威胁，捞到的仍是“不知道”三个字。敌人以更大兵力合围竹洲山，枪杀了村苏维埃主席雷良俊同志，烧毁全部茅屋，把避在山林的畲胞赶下山，实行并村，编保甲，订连坐。可是

共产党员雷成波等同志仍然活跃在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的群山之中，掩护着红军后方医院和修枪厂。在这困难的日子里，闽东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们，特别是少数民族，对我们没有一丝隔膜，把我们当自己人，成了我们的依靠。

闽东党就是这样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到一九三七年，大部分根据地已逐渐巩固。连江、罗源的部队则由海路南下莆田仙游地区，与莆田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武装会合，坚持闽东地区的斗争。我们的部队活动范围直到离福州只有三十里的下店，我党在白区城镇的工作也开展起来了。军事、政治形势对我们更有利了。

## 历史的转折关头

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整个南方地区都与中央隔断了联系，所以政策的转变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在南方各个根据地是个大问题。闽东地区政策的转变是在一九三六年冬开始的，其经过如下。

闽东党长期脱离上级党的领导，只有千方百计搜集党的公开文件和报纸刊物，从中分析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每隔一、二个月总要攻打敌占据点，固然也有补充枪支弹药、筹款、扩大政治影响等目的，更主要的是为

了夺取报纸，了解国内外的政治形势。闽东地区毕竟靠近福州，搜集香港、上海出版的报章杂志比较方便。福州的地下党组织虽然遭受了破坏，但它还有一定数量的党员，还有党的外围组织，还有党的影响。当时我们在福州有一个交通，曾是地方军阀卢兴邦洪山桥兵工厂的工人，名字已记不起来，都叫他的外号“莫斯科”。这个人很灵活，经常给我们买一些书报、武器、弹药、西药，甚至连国民党军军械库里的迫击炮都买来了。一九三六年冬，我们看到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后又得到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其他宣传品。这是从香港党的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传到福州，又从福州传给我们的。我们虽然和“南委”没有发生关系，但知道这是党中央的文件，是新的精神。从报刊上，我们又了解到全国各个城市里蓬勃的学生抗日运动，看到了新的革命高潮，所以我们政策的转变比较顺利。我们学习闽西，成立了闽东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代替闽东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布告，大量翻印《八一宣言》，到处张贴，开始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虽然没有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实际上不打苏维埃旗帜了。

那时提出的统一战线，还是反蒋抗日，号召同一切愿意抗日的友党、友军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然从土地革命到民族战争这是一大转变，但弯子转得还

不那么大。一·二八上海抗战后，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我们在进步青年中进行团结救亡的工作，也做十九路军中的士兵工作。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我们也感到光搞土地革命，不提抗日救国的口号是不行的。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们在政策上作了更大的改变，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只提抗日救国的口号，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团结起来抗日，只要愿意抗日，我们都可以团结。我们的政策进一步改变以后，开始收到效果，农村和城镇的一些商人、联保主任、乡绅、教师，都敢于和我们接触了，我们的团结面广泛了。这时，原国民党十九路军的一个排长带了一班人，投奔我军。他说，他觉悟到只有共产党人和红军是真正抗日的，所以他投奔来了。我们从这里看到，这是一个信号：抗日救亡是当时的历史潮流。我们政策的转变，由反蒋抗日变为联蒋抗日，主要是两件事震动了我们。一是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二是国共合作，红军已改编成国民革命军。

当时我们对抗战一直是积极提倡的。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蒋介石来领导抗战，红军要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为了进一步弄清全国形势的变化，八月底，我们决定攻取宁德八都重镇。

八都是宁德县沿海市镇，靠近海口，是交通要冲，三都澳航船只能开到八都。八都只有民团百多人。我亲

自带一个纵队去，很顺利地打了下来。这仗，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是为了搜集报纸。我们搜集到不少上海、南京、福州的报纸，整版整版的刊登着抗战战况：上海打响了；南口在苦战；张家口告急……我们在《申报》发现两篇重要文件：《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和《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就职通电》，赫然触目！我们才知道国共合作已经实现，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准备开赴前线抗日。我们在八都住了三天，特委做出决定，改变策略，正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向福建省政府、闽东各县政府发出了油印信。这已不是一般泛泛地进行宣传，而是采取行动了。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仍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说什么“北方合作，南方不合作”，继续进攻，企图把我们各个消灭。那时，我们已经听到闽南我军受骗缴械的消息（即何鸣事件），引起了我们的警惕。因此一面积极争取停战谈判，一面坚持进行自卫。在南阳附近消灭了进攻我们的浙江省保安团一个连，又在宁德的亲母岭打了一仗，消灭了敌人一个加强连。敌人进攻不成，又吃了苦头，这才老实一些，表示愿意与我们谈判。但国民党福建当局还摆着架子，省方不愿出面，要宁德地方当局出面谈判。上海战事紧张，国民党军事当局慌忙将七十八、八十七、八十等三个师从福建调赴上海，福建的国民党

军事力量更小了。福州直接受到我军威胁，福建当局才不得不通过“福安抗日后援会”的郭文焕同志（系我党福安城区地下支部负责人）向我方表示，愿意以省政府作为一方与我谈判。

## 停战谈判

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我亲自去谈判。对此，特委认真进行了研究。鉴于何鸣事件的教训，作出决定：不宜由我立即出面谈判，如果国民党当局把我扣留了，不好办。但也不能派一般人去，人家会以为我们没有诚意。因此决定派范式人同志作为全权代表去谈判。

第一次谈判地点在宁德县城，国民党方面由省保安处处长黄苏为代表。谈判时，我方提出五个条件：第一，闽东人民抗日红军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队，干部由共产党委派，保持共产党的领导；第二，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释放一切政治犯；第三，宁德、屏南、福安三县划为我们的驻区，如果日军进攻福建，我们主动配合；第四，根据地已分的土地维持现状，不能强迫农民退还已分得的土地；第五，国民革命军抗日游击支队应按国民党军队供给标准发给给养。但是国民党对于和平谈判并无诚意，妄图在谈判桌上获取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坚持要把红军收编为“保安师”。我们要



改编，他们要收编，一字之差，相争不下。而这一字之差正是合作的原则问题。

那时，我们把部队集中在宁德的桃花溪地区。国民党代表黄苏提出，要派人见我，以便当面向我陈述意见。派来的人叫王调勋，是个叛徒，引起了我们警惕。我们研究后认为肯定有阴谋，但也不能不让他来，看看他来究竟有什么名堂。我们决定在离宁德县城只有一天路程的半山边上的一个村子同王调勋见面。因为这个地方位于边界，消息比较灵通。我只带一个排在村子里，把主力隐蔽在村子附近五六里路的地方，以防不测。果然，这个叛徒并不是真来谈判，而是来侦察。我们估计此人回去后敌人会来袭击，就做了战斗准备。第二天拂晓，省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亲自带一个加强连来，那是很精干的部队，妄想袭击我们的首脑机关。敌人走出宁德城五六里，我们就知道了。部队就在敌人必经之路埋伏，等敌人走入我埋伏圈内，立即出击，截断了敌人后路。两边一夹，不到一小时，就把敌人全部消灭，带队的参谋长被我们打死了，他骑的枣红色的川马，很善于爬山，也被我们俘获了。我们彻底消灭来犯之敌以后，第二天立即派范式人同志下山，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他们哑口无言，说是“误会”。

大概就在这时候，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派张云逸同志到福州来找我们部队。但是国民党当局还没有放弃诱降、

分化、瓦解我们的阴谋，不让他进来。他们推托说，游击队没有固定地点，一下子找不到。又说，已经跟我们谈判了，你不必去了。张云逸同志在福州通过和我们有关系的一些进步青年看到了我们的布告、传单等，知道我们不会上当。反正国民党当局“收编”不了时，总要找到八路军办事处的，就离开了福州。

第二轮谈判，还是范式人同志去。黄苏却又推托说我党提出的条件他们不能解决，要我们到福州同省主席陈仪面谈，又把谈判拖延下来。

第三轮谈判也没有成功。

九月中旬，上海战场形势更趋紧张，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重开谈判。由范式人同志去福州，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以下几个条件上，与国民党福建当局达成协议：

一、闽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第二游击支队；

二、国民革命军福建抗日游击支队由共产党领导；

三、划屏南县为闽东红军驻区，一百里内国民党不得驻兵；

四、以中共闽东特委的名义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宣言”，并公诸报纸。

改编用的番号是我们提出的，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国共两党已经达成协议成立新四军。听说闽西用了“抗日游击支队”名义，所以我们也用这个番号。当时我们有

个想法：什么番号都是暂时的，中央会有统一部署。但是我们坚持组织上是独立的，国民党不能干涉我们内政和委派干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当时的《福建民报》上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闽东特委共赴国难宣言》。闽东党和福建国民党当局的谈判经过了复杂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范式人同志带回了闽南、闽中部队在县城集中被国民党反动派缴械的消息，我们更加警惕。斗争转而集中在集结地点上；我们坚持“独立自主靠山驻扎”的方针，部队不开到县城集中，而集中在我宁德根据地中心的桃花溪地区。

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处理好，即：无条件地采纳了停止打土豪的条款，发生了经济困难。我们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给养费问题，他们以为有机可乘，要挟说：“改称保安师，就可负责发给给养。”我们提出借，他们还是不肯。我们就说：“那好，我们自由行动，自己解决给养问题。”他们当然懂得这个话的含意：我们又要打土豪了。于是他们慌张起来，才借给我们七百套棉衣和五千块钱。也由于经费问题，我们没有能抓住抗日高潮的有利时机，扩大我们的武装力量，停战后就停止扩军，这是个失策。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新四军已在南昌设立办事处，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派来的顾玉良参谋进根据地和我们取

得联络。那时，项英、陈毅同志已到南昌筹建新四军军部，要我随同这位参谋前去领受任务。这样，我才下山经福州去南昌。

在福州，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在办公室见了我，惊讶地问：“你就是叶飞？”我说：“是呀。”他情不自禁地说：“你是个书生嘛！”晚上，陈仪宴请我，保安司令等人作陪。

我在南昌接受了新四军军部命令，部队开到屏南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任命我为团长，阮英平同志为副团长，全团约一千三百多人，开到屏南县城集中。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我们奉命离开了战斗多年的闽东，踏上抗日征途，留下范式人同志在闽东坚持斗争。

## 闽东苏区和闽东红军的特点

五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在闽东五年的战斗历程，感到：

闽东苏区和闽东红军具有其他苏区和红军的共同点，也有它自身的特点。第一，它是全国最后建立的苏区，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建立的工农革命政权。由于它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岁月里诞生的，失去中央的联系，所以中央只是从敌人报纸上知道这里有党

的活动，有红军，有苏区。第二，它的创建不同于主力红军开辟的苏区，主要是依靠本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是土生土长的。第三，一九三四年春，福建党遭到大破坏，闽东党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解决本地区的问题，独立自主的坚持斗争。第四，闽东地区的斗争过程是从农民运动的小型武装斗争到建立苏区，到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始终以游击战作为基本斗争形式。第五个特点是它有很长的海岸线，所以敌人难以封锁。

这些特点既是闽东苏区和红军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它有良好的群众基础，自始至终都是依靠群众的；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比较少，受外来的错误作法的影响也比较少。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又得不到上级的指导和兄弟苏区的经验交流，在斗争中当然要不断发生错误和遭受挫折，只能自己从错误和失败的实践中吸取教训，纠正错误，继续前进。

# 驰骋大江南北

## 第九章 北上抗日 皖南练兵

### 北上途中

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在屏南县城集中，这已是一九三八年二月。全团一千三百余人，二月十四日出发向皖南岩寺地区开拔。

这时，发生过闽南红三团被国民党一五七师骗进漳浦城，被围缴枪的何鸣事件；继又发生闽中游击队被骗进莆田城缴械，大队长刘突军被杀害事件。这就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仍在千方百计施行消灭红色游击队的诡计，引起了我们的警惕，因此我们在北上途中，以战斗姿态行军，以防不测。

我们北上开进途中的第一站是政和县城。这是个闽北的山区小县，却驻着一个保安团，看来是专门调来对付我们的。我们派前站人员前去联系，国民党县政府借

口县城狭小，无地驻扎部队，不让我团进城，只准住在城外。但城外的广德寺等三个大庙都要经过县城，而城门戒备森严，看来不怀好意。部队通过县城之前集结了一下，作好战斗准备。第一营人数足，装备好，作为前卫，一律上好刺刀，向城门开进，随时准备应付意外情况。

第一营营长陈挺同志带着部队，雄赳赳地直奔县城。城门紧闭。国民党保安团荷枪实弹，列队在城门前，城墙的女墙城堞人影幢幢，杀气腾腾。有个带队的军官，带着上尉领章，好象是个连长，神气十足地说：任何部队都不准通过。陈挺同志火气直冒，传下口令：“准备战斗！”前卫排立即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跑步前进，直逼城门口。保安团的值班军官一见这架式，知道我们已作准备，有点慌张，支支吾吾地说什么：上司命令，我实在担当不起……等等，立即转身命令士兵打开城门。陈挺同志火气未消：“我们是北上抗日的部队，谁敢阻挡就是汉奸！”回头一扬手，命令部队：“进城！”前卫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了城。那时，全团只有一匹枣红马，是桃花溪战斗缴获的福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坐骑。我骑着马进城时，国民党保安团站岗的士兵“啪”地立正，来了一个持枪礼。大队人马随即通过县城，到城外广德寺时已是黄昏时分，部队分别驻在三个大庙里，互为犄角，以战备姿态宿营。

我估计国民党反动军政头目不会甘心，还要耍名堂，很可能趁夜幕掩护制造事端，进行挑衅；也可能制造借口，进行袭击。我预作布置，要全团上下提高警惕，严密戒备，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并通知部队，不管有什么响动，只要没有打到我们头上，必须沉着应付。还作了严格规定，没有我的命令，一律不准外出。果然，半夜之后，四面山上火光点点，到处响起枪声，呼喊声：捉土匪、救人……。我们却紧闭大门，加强警戒，不加理睬，更无一人外出。敌人看我们按兵不动，又从山上以机枪向我宿营寺庙扫射，我们仍巍然不动。原来保安团在四面埋伏，妄图在我军发生慌乱时加以袭击。闹到天明，反动家伙见无隙可乘，只好自动收场。一时间，枪声都停了下来，只留下火药味混杂在黎明清新的空气里。

第二天，我派人进城向县长提出抗议。县长出面，派来专人面邀宴请我团连以上干部，被我拒绝了。县长居然把宴席派人送到广德寺来，我也要来人挑了回去。县长大人不得不亲自出马了，来到广德寺，递上名片，声称要“拜谒团座”，也被我毫不客气拒绝接见。尴尬的县长大人连声称：“误会，误会。”自己找个台阶，灰溜溜地回城里去了。

第三天出发到松溪。松溪却是另一番景象。离城十里，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国民党县长带绅士、各公法



团体负责人士……，有穿中山装的，有穿长袍，还有不少青年学生，大约数百人列队欢迎。原来这个县长早就派人到政和打探消息，知道政和弄巧成拙。共产党的军队是不好惹的。所以采取了另一套做法。一夜平安度过。白天，县长派专人送来大红请柬。满口是欢送抗日将士出征，预祝贵部旗开得胜啦；略备小宴，敬请光临，等等。我们呢，礼尚往来，连以上干部都去赴宴。宴席上气氛也还不差，对我们讲了不少恭维话，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避免发生麻烦。

第二天，我们继续由松溪向浦城开进。到达浦城，浦城县政府也照此办理……

浦城向北，越过仙霞岭，进入浙江，气氛就大不相同了。浙赣路上兵慌马乱，国民党溃退下来的部队到处都是，交通为之堵塞。居民也因之惊惶不安。这些部队还到处散布失败情绪，夸大日军武力。随同我军出发的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李子芳同志、科长杨家葆同志以及南昌带来的战地服务团，做了不少工作，对国民党部队进行了慰问，展开歌咏、街头演出活动，宣传抗日，扩大我军影响。

在开化县略事休整后，进入安徽省，到达岩寺地区集中。

## 岩寺集中

我团到达岩寺集中，已是三月下旬，一支队已经先我团到达。四月四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移到岩寺。

岩寺是歙县西南十多公里的集镇，地处黄山的东南麓，山青水秀。四月正是仲春时节，满山映山红，绚丽多彩；四方传来的军号声，抗日战歌声，增添了威武气氛。

各支队先后到达岩寺集中，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等领导同志分别到各支队看望部队；并在岩寺镇西北角的水口塔，召开了全军排以上干部参加的深入敌后、坚持抗战的誓师动员大会。

水口塔旁，一个房子高的大石台，见方二三米，台上摆着几只木凳和桌子，军首长登上了主席台。

大会在雄壮的抗日歌声中开始，会议由项英同志主持。宣誓后，袁国平同志传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对新四军任务的指示。他说，新四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八路军一样，是在敌后坚持抗战的人民军队，现在的任务，是迅速做好开赴敌后的一切准备工作。

排以上干部动员誓师大会后，又在岩寺鲍家祠堂开

了营以上干部会议。项英同志主持会议，陈毅同志代表党中央首先讲话。他介绍了全国抗战的基本形势，国共两党合作的进展情况，并对新四军的组建，尤其是对叶挺将军就任军长表示祝贺。要求大家团结一致，在东南局及军分会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完成抗日救国的大业。叶挺军长在热烈的掌声中讲了话。他说，同志们欢迎我，信任我，实在不敢当。大革命失败后，如同爬山，大家不畏艰险，坚持爬到山顶上去了，而我却在半山腰停了下来。今天，党中央如此信任我，让我当这个军长，使我能有机会向同志们学习，和大家一道战斗，深感荣幸！今后，我一定坚决遵照党所指引的道路前进，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在在座各位的帮助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军长坦率的赤诚的讲话，深深地感动了大家。接着，项英同志介绍了新四军组建的经过和各支队的整编情况，明确了部队面临的**任务**。

会后，我们六团进行了传达贯彻，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军政训练中。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岩寺，成了新四军的摇篮，这个小山镇由此而名垂史册。

岩寺一座祠堂的山墙上，至今还保存着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两个大轮子支着一管高矗的炮筒，炮口下躺着四肢朝天的日本侵略者，轮子上写着：“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左角的署名是：新四军服务团宣。对面墙上还

有用红土写的大标语：“赶快起来，组织游击队，保卫乡土，改善人民生活，解除人民痛苦”、“恢复失地”、“中国万岁”、“肃清汉奸”、“庆祝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等等。小镇留下了新四军战士的手迹，也留下了历史的痕迹。

五月五日，军部的直属队向太平进发，于七日到达泾县云岭。五月中旬，三支队支队部率五团、六团先后离开岩寺，进驻南陵、芜湖、宣城地区，然后转入铜陵、繁昌、南陵边区抗击日军。

## 皖南练兵

我团在岩寺驻扎时间不长，以后移到泾县青弋江畔，在军部附近，进行训练。这在团队的建设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页。皖南练兵是闽东部队由一支游击队训练成一支抗日的正规部队的关键。

岩寺集中后，三支队成立，辖第五团、第六团。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兼任司令员，谭震林同志任副司令员。第五团由闽北游击队编成，约一千人左右。我们六团的干部也有变动，副团长阮英平、一营营长陈挺等同志调延安学习，由吴焜接任副团长，黄元庆任参谋长，以后由乔信明接任，刘松青（以后改名刘飞）任政治处主任。营的干部也有缺额，三营教导员戴炳辉同志奉令调回闽东。因特委书记牺牲，由戴炳辉同志接任。

皖南一别，再也没有见到，戴炳辉同志在坚持闽东斗争中英勇牺牲。

项英同志在筹建新四军时，多次向中央提出派干部来新四军工作。中央答应了这一要求，从八路军和抗大调集干部，分批南来新四军。吴焜、刘松青同志以及廖政国、张潮富等一批团、营、连干部，就是从延安来六团工作的。各营、连都分配到一人，或任营长、连长，或任营教导员、连指导员。

吴焜、刘松青等延安来的各级干部，对闽东部队由一支游击队训练成一支抗日的正规部队，起了很大的作用。陈同生同志生前写过一篇《猛将吴焜》的纪念文章，引用了我的话：“吴焜同志对我们部队保持优良传统，创立新的战斗作用，有很大贡献”。这话，是说吴焜，又不仅是吴焜，也是说的延安来的干部。这批干部来自红一、二、四方面军，在正规红军中生活、工作、战斗过多年，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有些是比较负责的干部，如吴焜同志原是红六军团十八师师长，以后调来挺进纵队一团（即老六团）任政委的刘先胜同志就是这个师的政委。其余同志也相似，调来担任营职的，大多担任过团的领导职务；担任连职的，大多是过去的营职干部。他们又在红军大学或者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过。带兵、练兵、用兵，都是有经验的。

我没有学过军事，没有上过黄埔、抗大，闽东的革

命斗争形势逼得我领导军事斗争。在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下，我学会了游击战。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时，我觉得军事工作非我所长，提议由阮英平、范式人俩同志率领部队上前线。我留在福建做地方工作。但是，东南分局不同意我的意见，认为我离开部队不好，决定仍由我和阮英平同志带队伍上前线，范式人同志留守闽东。因为革命工作的需要，从此以后，我就带部队，过戎马生涯了。

闽东部队是一支游击部队，善于打游击战争，但部队游击习气很浓厚，军事技术、战术的基础较差。到了一九三九年五月，陈毅同志还指出，六团“还保持游击时代的残余”。那时尚有“残余”，一个年头之前就更不用说了。

我团在皖南练兵开始，首先抓部队正规化、正规作风养成，克服游击习气，学习内务条令，建立起一套部队的正规制度。这一下，可把闽东来的干部和战士整苦了！过去哪有作息时间，也不可能，随时要准备作战嘛，愿睡就睡半天，不愿睡就扯山海经；如今倒好，天还没有大亮，睡得迷迷糊糊，起床号响了，拖拖拉拉起了床，找不到鞋的，来不及打绑腿的，什么洋相都有。过去难得出操，现在天天出操，还要全营会操，全团会操，起床拖拉了，早操迟到了，还得挨批评。过去没有统一的军装，有什么穿什么，有军装也穿得随便；现在

有着装要求，延安来的干部抓得很紧，军帽戴不正要批评，风纪扣不扣要批评，掉了钮扣要批评，绑腿打不好要批评，出操时还要班对班面对面的检查，街上还有臂上带红箍箍的纠察队检查军风纪。过去看见上级叫老张老李；现在要行举手礼，叫做军人礼节。过去吃饭随便，端个碗到处转，说笑也行，打闹也行；现在得以连为单位集合，全班围成一个圈蹲着，还要听值星排长的哨音才能动筷子，吃饭规定了时间。睡觉规定了时间，想轻松点也不行，一声熄灯号，再也不准讲话，只能闭上眼睛。总之，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什么都不习惯，什么都受约束。再者，过去丢根步枪通条，少个步枪托底板的螺丝，不当回事，反正也没有登记，现在可成了大事，“步枪是战士的生命”，严重些的还要受处分。

队列训练也叫人受不了，尽是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尽是齐步走正步走，一转一上午，一走一下午。拔慢步，来个慢动作，更是吃不消。部队指战员都是农民出身，田地里的苦受得了，种庄稼可干一整天，队列训练就是吃不消，腰酸背痛。

习惯的改变真是十分艰难。闽东人长期处于贫苦山区，是最能吃得苦的，陈毅同志夸奖我团的艰苦作风，“是本军最突出的。”他说：“回想在去年（一九三八年）冬天，大家不发用费，用树叶当烟抽；用烂棉絮包脚当鞋穿；每天吃两餐，甚至无菜吃，吃光饭。……这是我良团

（六团代号）的特色，可做本军的模范。”但却受不了正规部队生活的约束，思想上弄不通，有开小差的。大多数人对严格管理意见很大，认为这都是那些“两个声”带来的。闽东同志把不会说闽东话的人叫“两个声”，就是说不懂方言说普通话的外地人。说那些“两个声”为了摆官架子，尽搞军阀部队的一套。不少人到我面前告外来干部的状，甚至有人对我说：可要当心再来一个“南阳事件”。大家对“南阳事件”印象很深，对外来干部抱有疑虑。

外来干部也有意见。有些人想回老部队，要求调动；有些人觉得言语不通，工作难做，也想调动；有些人本来很积极，严格管理，严格训练，部队却有意见，感到委屈，也到我面前来诉苦、来告状。

这就形成了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矛盾，战士与干部的矛盾，加上言语不通，隔阂就更大了。我在这中间，有个很好的条件，双方对我都很信任。我虽然不是闽东本地干部，但在闽东地区领导斗争，学会了讲闽东方言，闽东干部和战士听我的话。我虽然是闽东出来的，但也是外来干部，会讲普通话，我不懂军事训练向他们学习，因此外来干部也信任我，也能听我的话。所以，双方的意见和情绪，我都了解，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工作。我逐个找来谈话。来找我告状的，进行解释，打通思想，消除隔阂。这期间，吴焜、乔信明、刘松青同志向外来



干部做思想工作，注意同闽东干部战士接近，起了很好的作用；戴炳辉、二营营长沈冠国同志去向闽东干部战士进行工作，经常对部队讲话，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外来干部最大的优点是以身作则，要求别人的，自己首先做到，特别是吴焜同志带头做模范，这对闽东干部和战士是最有说服力的。经过做工作，外来干部安心了，本地干部对外来干部的成见也逐渐消失了，正规生活也逐渐习惯了。

项英同志对正规作风养成要求严格，练兵也抓得很紧。他以身作则，生活俭朴，剃光头，打绑腿，注意军容风纪，并且带头出早操，学军事。他主张兵要精，部队重在质量。虽然他当时提倡“精兵主义”不放手发展抗日武装是不对的，但提高干部和部队的军事素质是对建军有贡献的。叶挺军长是以治军严格著称的，经常检阅部队，部队竞争性强，总想弄得比别人好，正规养成和队列动作也就抓得紧了。有人说叶军长喜欢搞检阅这一套。这不是个人喜欢不喜欢，而是把各个山上下来的分散游击队改造成为统一的集中的正规部队，首先要抓的重要一环。再有，附近就驻有国民党三战区的部队，能不如他们吗？干部战士总想自己要比他们整齐一些，精神一些，威武一些。

队列训练后，接着是军事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刺杀、投弹、射击，单个教练到班、排、连教练，吴焜同

志和外来干部都有一套，都自己作示范，带领训练。

吴焜同志整天和部队在一起，平易近人，很快就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吴焜同志告诉大家，他是四川省万县人，生于雇农家庭，父母受尽地主折磨，过早亡故。两个哥哥缺衣少穿，先后夭折。吴焜十来岁就在嘉陵江上当纤夫，学撑船，靠出卖苦力养活自己。那时候的青年常有一点幻想，认为吃粮当兵就可翻身复仇，一支枪杆到手，就可横行天下。吴焜同志跑出投军，希望将来能当上军官，有个出头之日，为屈死的爹娘报仇。当时四川军阀混乱，到处招兵买马，就是不要这个又矮又瘦的吴焜。总算有个小军官，也可能因为找不到要花钱雇用的勤务兵，把吴焜收留下来。那个小军官当了连长，认为吴焜聪明，在连里补上一名号兵。这支属于四川军阀杨森的部队积极投入“剿共”。吴焜看到了红军战士作战勇敢、临死不屈，大受感动，苏区内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措施，更是大大打开了他的心窍。号兵是敌人军中最自由的人，何况吴焜年纪最小，又活泼又惹人喜爱，谁也不为难他。打到苏区后， he 可以和当地居民接近；如果有俘获人员，他可以听他们讲述许多革命道理。吴焜同志说：“这时，我心里才开了一点窍，才明白我投错了营盘，走错了路！”有一次，连上押了一个被俘的红军，不知是做什么工作的。吴焜听到连长交代值星排长说：“关在禁闭室里，明天解到上面去请赏。”而且他看到连

长用手挥了一下，暗示要将那人砍头。他下决心要救出这个同志，给这个同志穿了一套国民党士兵的军装，一起混出了警戒，投向了红军。到了红军后，吴焜同志得到大显身手的机会，从战士锻炼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两个声”和大家一样，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一根蔓上结的苦瓜！他们对战士问寒问暖，关心体贴。于是，非但隔阂消除了，心也贴近了。

吴焜同志还亲自抓干部战术训练，班教练时亲自当班长，排教练时亲自当排长，连教练时亲自当连长，逐项示范。整天摸爬滚打，一身泥水。干部进步了，部队也进步了，军事素质提高了。就我个人来说，向吴焜同志在军事上是学到了不少东西的。

皖南练兵是六团由一支游击部队改变成为正规部队的重要一章，揭开了挺进敌后的胜利序幕。

## 第十章 挺进苏南敌后

### 执行“五四”指示进军苏南

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在新四军各支队到达皖南集中的同时，日本侵略军在华中和华北的主力正沿津浦铁路南北对进，企图夺取徐州，进而占领华中广大地区。国民党军大部集结于徐州、武汉及长江一线，准备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五月十九日徐州陷落，新四军先遣支队则于是日进入苏南敌后战场。

这时，日军尚未完全控制苏南的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国民党军溃散时丢弃了大量武器装备，散兵游勇流散各地，各级政权瓦解，盗贼蜂起，土匪横行，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江苏省委没有抓住这个时机，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只有出狱的和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以及当地爱国人士组织了一些保卫家乡的抗日武装，力量很小。而国民党接受了放弃华北的教训，派遣官员，收编游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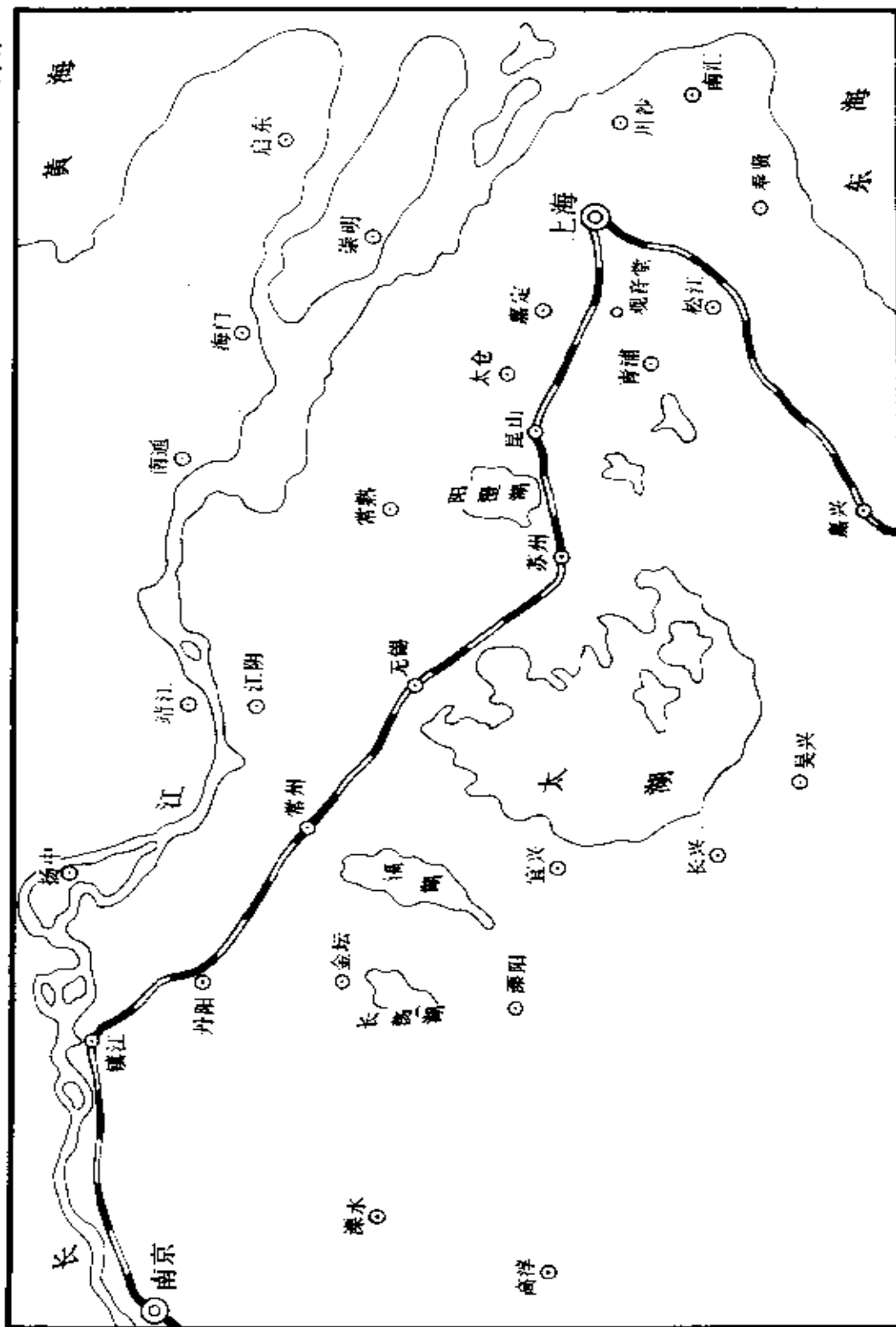
其挺进军和军统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以第三战区后方为依托，在苏南扩大势力，破坏抗日进步力量。苏南地区大量发展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最好时机，虽然已经失去了，但敌后仍有空隙，仍可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所以《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五月十四日）称当时为“有利时机”。正应利用这一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如果再一次丧失时机，那就要成为历史的罪人了！这里和华北不同的是，华中已形成了敌、顽、我三角之间复杂的斗争局面。

关于新四军的行动原则，早有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致项英、陈毅同志电：“……但在目前最有利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

五月四日，毛泽东同志《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致项英电》中，指示得更加明确：“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严重，但只要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

# 苏南作战地区略图

附图二



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的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和若干里的防地，而是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这一电文被称为第一个“五四指示”，在新四军的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是新四军的行动方针、部署和准则。概括起来：第一，要到敌后去进行游击战争；第二，平原也能发展游击战争；第三，要打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

接着，《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五月十四日）再度指出：“迭次来电均收到。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亦便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立。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谨慎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根据中央迭次指示精神，了解苏南敌后情况，确定新四军的战场位置，军部确定陈毅同志负责组建先遣支

队，共四百余人，由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同志为司令员。四月二十七日先遣支队从岩寺出发，揭开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序幕。为了确保先遣支队胜利进军，陈毅同志利用他跟川军的统战关系，送部队通过太平、青阳、南陵。五月十一日夜，先遣支队越过日军占领的宁芜铁路，向南京近郊秣陵关前进。五月十四日正式进入苏南敌后战场。

先遣支队出发不久，第一、二支队即先后向苏南敌后挺进。遵照中央第一个“五四指示”，陈毅同志率一支队于六月十四日进入茅山，旋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张鼎丞同志率第二支队于七月进入宁芜铁路和宁杭公路之间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谭震林同志率领第三支队在策应一、二支队挺进苏南之后，于七月进入皖南作战前线。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粟裕同志率先遣支队胜利完成了破坏南京至镇江间铁路的任务。十七日上午又在镇江西南十五公里的韦岗伏击日军车队，经半小时激战，击毁日军军车四辆，毙敌土井少佐以下十余人，伤敌十余人，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支。新四军进入敌后的处女战，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春雷。

此后，在苏南，一、二支队发扬近战、夜战的特长，连续对日军进行夜袭、奔袭、伏击和突袭作战，不断传出胜利捷报。著名的战斗有：七月一日，一支队二团王



必成部夜袭宁沪铁路上的新丰车站，歼灭日军四十余名。八月十二日，夜袭句容城，毙伤日伪军四十余名，摧毁了伪县政府。八月二十三日珥陵河川伏击战，毙伤日军四十九名，首次生俘日军一名。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六日，又粉碎了日军四千人对小丹阳地区的疯狂“扫荡”，毙伤日军五十余名。三个月内，大小百余战，南京的城郊机场，雨花台畔，麒麟门外，都响起了新四军健儿的枪声。这些胜利的战斗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斗志，为开辟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我军也以自己的英勇善战和模范纪律树立了军事政治威信。

我军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动员组织群众抗战，扶助地方游击队。七月下旬，一支队司令部授予管文蔚部以“新四军丹阳游击纵队”的番号，派一批军政干部去帮助工作，逐步开辟了丹北地区，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十月，一支队司令部授予上海地下党掌握的武进梅光迪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派参谋长胡发坚同志等军政干部去加强领导，为我军向东路地区发展准备力量。此外，扶植了进步人士巫恒通、朱春苑等发展抗日武装，争取了姜金昆、吴甲寅等地方游击队。二支队也争取了吕孟先以及博望、薛镇、小丹阳等地的游击队。陈毅同志亲自做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的工作，在团结抗日的精神感召下，纪振纲积极为新四军筹集粮饷，采购药品。七月，镇江、句容、

丹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成立，这是半政权性质的机构，它的诞生标志着茅山根据地的初步建立。八月，在二支队活动的当涂和宣城水阳镇也分别成立了抗战动员委员会。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的组织发动下，各地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团体也纷纷组织起来，在拥军、扩军、配合部队作战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三八年十月，傅秋涛率一团回皖南整训，我团奉命进入苏南茅山地区，归一支队指挥。

## 初 进 敌 后

六团初进敌后，面临着新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我们过去的作战对象是国民党军，现在的作战对象是日军；过去是在本乡本土作战，现在是在江南敌后作战。第二个转变是：过去是山地游击战，现在要在交通发达的平原、河网地区进行游击战。

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不少，首先是语言不通，绝大多数的闽东战士不会讲普通话，也听不懂苏南话，苏南群众当然听不懂闽东话。闽东部队在红军时期开展游击战争的特点是依靠群众，群众工作在先，军事行动随后，现在语言不通，就困难重重，变成了聋子、瞎子。其次是敌伪据点星罗棋布，犹如梅花桩，而且铁路、公路、

河流纵横，交通发达，消息传递迅速。我们从皖南到茅山的进军路上，八天就打了七仗，地形、敌情不明，敌人行动快速，常常被动应战。第三是在丘陵、平原、河网地区作战没有经验，没有了深山密林，一望无际，空空旷旷，没有任何荫蔽，就象失去了依托之处。连宿营放哨都不知道哨兵该如何放。老经验不管用了，新的一套还没有学会。

一天中午，我们部队驻在一个小村上，狡猾的日本鬼子头顶青稻草，沿着四周田埂，一步步逼近小村。我们的哨兵以为是一垛垛稻草堆，未曾注意。就在这时，一位连长押送汉奸到团部，吴焜同志送连长出门时，突然发现田里的稻草堆在移动，拿起望远镜一看，原来鬼子以稻草作掩护，正向我驻地聚拢来，准备袭击我军。他立即命令这名连长带领一个排，控制村东北的阵地，亲自率领其余部队用密集的火力的冲出一条血路，迅即控制要点，同村东北的我军阵地相呼应，形成犄角。吴焜同志亲自吹起了冲锋号，发起猛烈攻击。敌人突然遭到反击，狼狈败逃。

还有一天夜晚，经过几夜急行军，队伍十分疲劳，驻进一个小村后，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了。吴焜同志不放心，亲自查了两次哨，刚睡下又被阵阵狗吠声惊醒。他起身往窗外一望，原来被敌人包围了。他急中生智，手提快慢机，率领战士们猛打猛冲，打得敌人落荒而逃。

总不能老是被动应战，我想用化装奇袭的老办法，打它一个小胜仗，鼓舞士气，积累经验。正象陈毅同志交代的：“积小胜为大胜。”他还说，“我们做给江南人看，只要我们吃亏少，敌人吃亏多，经常保持这一比例，最后水落石出，江南民情，必然奋发起来。”

我把当过侦察班长的四连连长王明星同志找来，交代他一个任务：“给你一周时间，到宝坨镇上去捉一个鬼子，缴一条枪。”王明星似乎认为太少了，有点不大相信，问我：“一个？”我点头说：“只要一个。给你一个班，化装成老百姓混进宝坨去，捉一个活的来给大家看看。”

我给王明星布置任务后，又把宝坨的伪乡保长找来，交代他们：“我们有一个侦察班要到宝坨去，你们要负责他们的生命安全，可不许出一点鬼！”

王明星领受任务后，带了七八个侦察员，化装一下，就混进了宝坨镇。日寇的据点筑在镇东端，街上人来人往，却没有发现日军官兵，等到下午，出来了七八个日本兵，不好下手。但弄清楚了一个情况：鬼子中队长有个习惯，星期天一定到街上刮胡子。星期天，王明星带人混进街后，埋伏在河北街中心的理发店四周。一直等到下午两点来钟，鬼子据点的栅门开了，走出三个鬼子，背皮包的那个走进了理发店。王明星趁理发员拿剃刀的时候，对准鬼子就是一驳壳枪，鬼子倒在血泊里。王明星拿起鬼子的皮包和手枪，大摇大摆地从西门离开了宝

埕。

胜利似乎太小，影响却是很大。干部、战士和居民都拥到团部来看鬼子中队长的“王八匣子枪”。王明星不无遗憾地说：“鬼子真不经打，一枪就完蛋了，没有抓到活的。”说得大家都笑了。陈毅同志在《茅山一年》一文中就写了这事：“我军便衣队于去年十月在宝埕击杀敌之中队长一名，迭次击杀日军不少，敌人恼羞成怒说：‘新四军有胆量，公开来打一仗，不要这卑鄙手段。’从这里我们看见了强盗的日军军阀在挨打之后，也居然板起面孔来讲什么道德了，何等可笑。”后来王明星同志在五十四团任参谋长时，在苏南反“清乡”中英勇牺牲。

接着，十一月六日，我团又在丹镇公路上夜袭敌人，毙伤敌五名，破坏桥梁四座。

十二月上旬，又进行了白兔战斗，这是白天攻打日伪据点的一仗。白兔是镇江境内的市镇，是个水陆交通码头，驻有日军一个中队和伪军约百余人。我们接到情报，白兔敌人要撤退，所以决定立即发起攻击。一打才弄清楚，当地群众希望我们拔除这一据点，故意报告说敌人要撤退。激战六小时，我毙伤敌五十余名后撤出战斗。这一仗并没有打好，据点没有攻下来，反而遭敌人反击，被迫撤出战斗，部队受到一些伤亡。不过，这一仗虽然吃了亏，但却取得了经验。吃一堑，长一智。知道日军此时还是很顽固的，敌军据守据点的兵力虽然不

多，通常只有一个小队兵力守一个据点，但是根据当时我军的火器装备，要攻占据点并不简单。白天攻击是不成的，只能用夜间突然袭击。即使攻进了敌人据点，敌人还是不会投降的，还要进行肉搏战。日军抵抗很顽强，往往要把他们都打光了，才能占领据点。很不容易抓到活的日军，最多也就能俘虏一二人，而且是负重伤的，这就算打得很漂亮了。二团因为是最先进入敌后的，已有了经验，所以打了许多很好的仗，如攻取新丰车站、夜袭句容城等。六团还缺乏在敌后与日军作战的经验，白兔一仗，使我们取得有意义的收获。

白兔战斗还使我们具体体会到苏南敌后三角斗争的复杂性。当我团去进攻白兔镇的日寇时，国民党镇江县政府董县长竟然命令他的特务队来伏击我军，致伤亡我指战员十余人。

此后，我团以夜袭、奔袭、奇袭和伏击等手段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一九三九年五月，陈毅同志写了一封《献给良团全体同志》的信。良团是六团的代号。信中概述和评价了我团半年多的战斗。信上写道：“我们今天不应讳言，在最初东征时期，你们中间曾经有极少数人过高估计日寇的战斗力的，但是你们经过六个月的战斗，在白兔、在高庙、在宝埕、在下蜀、在龙潭、在延陵，你们与日寇交手，打败了日寇。”应该说，进入敌后作战的两个转变完成了。

回忆这段往事，吴焜同志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眼前。战斗中，吴焜同志常常挺起身子，端起机枪，带头向敌人冲击。有时，他还要拿过司号员的铜号，吹起冲锋号向前冲。直到现在，老同志回忆往事时，常有人这样说：吴副团长的号一响，能使人忘记一切。除了敌人的脑袋，什么也看不见，好象敌人的子弹都被他冲散了一样，只听见他的声音：“天红了，地红了，眼睛红了，杀呀！”

我曾对吴焜同志说过：“身先士卒，临危不惧，这是前辈名将留下的好风格；冲锋在前，退却在后，这是我军‘三猛’作风的好传统。但是，作为一个团的指挥员，就不能只起一个英勇战士的作用了。”吴焜同志认真地考虑着，第二天才郑重地回答我：“这支部队是你在闽东游击战争中带出来的，依托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是有丰富经验的。但作为坚强的能攻能守的正规团队，无论军事技术上、战斗作风上都是不够的。不错，我们团在皖南进行了军事训练，成绩不小，但在实战中还是要各级指挥员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把部队的顽强战斗作风带出来，才能打不垮，拖不烂！”

## 重重阻力

我团初进苏南敌后时，陈毅同志交代的任务很明确：

除积极寻机打击敌人外，主要是搞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扩军，巩固茅山根据地。陈毅同志还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和群众运动的关系。他说，敌人是强大的现代化的帝国主义武装，而我们仍然使用粗劣武器，在军事上要抓住敌人的弱点，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扬自己的长处和克服自己的弱点。由于是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力量的来源是抗日民众为祖国而战斗的热诚，动员的深广包括了多阶层的一切中国人，远非内战所能比拟。因此，单纯的军事家绝对不能胜任抗日的游击战争，就是我们内战的经验，也还不足以应付这全面的新的斗争局面。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茅山根据地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但群众工作是很受限制的。我们部队是有做群众工作的传统的，但只要一进行工作总是四处受干涉，使你束手无法办事。

举一个例。句容县中心乡组建地方武装，陈毅同志交代归第六团领导。我们派干部和少数战士作骨干，组成了冬防队。六团在附近活动时，可以带他们几天，影响他们。作战时，给一点轻任务，让他们听听枪声，锻炼锻炼，战后分给他们一些战利品，提高他们对战胜日军的勇气和参加战斗的积极性。人员不断扩大，中心乡冬防队也就成为这个地区发展武装的骨干，成为上升为主力的基础。这么办，就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忌。我团一营扩大了三四十名新战士，居然告到了三战区，三



战区找到项英那里。项英同志知道后，直接来电责备我们，而且来个“三不”：不发枪，不发饷，不批准。我们不得不向陈毅同志请示了。

陈毅同志得到报告后，只身骑马来到我团驻地崔庄。当时，副团长吴焜同志带着第二营在敌占区活动，我和参谋长乔信明同志、政治部主任刘松青同志，向陈毅同志说了我们的意见：“我团进入苏南时，军部扣去了第三营；从水阳一线到句容东乡，不断打击日军，不能没有伤亡，不能没有损耗，不扩军怎么办？难道我军就让如此消耗殆尽？这不是正迎合了蒋介石在抗日中消灭我军的阴谋吗？”陈毅同志思索了片刻，平静地说：“这样吧，先编进来吧。军部那边，我去反映。不要国民党发枪，也不要他们发饷，我们自己解决；我相信副军长是会同意的。”

我们一听能扩大队伍，好不高兴。陈毅同志临走时还特别叮嘱我：“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人、枪、款都要继续放手搞。”

以后，我知道，陈毅同志被项英同志批判为“人枪款主义”。就常识来说，要进行武装斗争，能不要人？要枪？要款？无非是怕得罪国民党当局罢了！

陈毅同志是严守组织纪律的，从不在我们面前暴露他和项英同志的分歧，我们以后才逐渐清楚的。

由于项英同志的“江南特殊论”，以及统一战线工作

中的右倾观点，即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力量，不敢提减租减息，而改为“让租让息”，不敢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和退让。这么一来，我们深感在敌后活动，处处束手束脚。这时我虽然没有认识到项英同志的错误是一种路线错误，我还没有这个水平，但是，六团究竟是一支经过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有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因而就本能地自觉地去做好群众工作，当然只能在“让租让息”的口号下去发动群众，严格部队的群众纪律，以及积极打击日寇，也就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同群众建立了血肉的关系。因为无法独立自主地公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还是保留敌后的国民党政权，还主动保护敌后的国民党政权，同国民党政权建立统战关系。陈毅同志逼得没办法，就采取组织抗敌总会的办法，名为抗日群众组织，实际上是一种半政权组织性质。即使我们这样受限制地进行活动，在“让租让息”的口号下来发动群众斗争，还是经常与国民党三战区以及当地的国民党政权发生矛盾，我们经常因此而受到项英同志的批评，指责我们不懂统一战线，使我们非常苦恼。如果没有陈毅同志同项英同志的斗争，支持我们，我们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什么工作也不好做了。

## 第十一章 东进抗日

### 东进决策

一九三九年五月，江南无边无际的原野上，稻苗茁壮，新竹翠绿，一片生机勃勃。五月四日这天，第四军六团干部战士情绪格外欢快，因为第二天，我们就要出发到江南东路地区去打击日本侵略者。

所谓东路地区，是指常州以东宁沪（当时叫京沪）铁路两侧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南起太湖，北至长江，东接上海。它交通方便，经济文化发达，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在大举进犯华北的同时，以重兵占领了这个地区。而在南京、上海沦陷后，江南地区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广大人民群众热望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领导抗战。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即电示新四军项英同志（即第一个五四指示）：“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

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的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并指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一九三九年二月间，周恩来同志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会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重申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还指示新四军要实行“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一九三九年二月间，陈毅同志到军部听了周恩来同志传达六中全会精神，回来后就命令我们六团准备向东作战。他在交代任务时说：“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放手向敌后发展，抗击日寇。我们不要依靠国民党发饷、发枪，要独立自主地发展队伍，壮大自己。你们这次到东路去，一要发展队伍，二要搞到武器装备自己，三要筹集款子。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人、枪、款。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这不对！有了这些，才好抗日嘛！”他详细解释了这三条，又说：“还要相机建立抗日根据地。”最后，他确定我们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出征，并亲自到部队作了鼓舞人心的动员。为了应付国民党第三战区，我改名为叶琛，副团长吴焜改为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改为汪明，政治主任刘松青改为

刘飞。我们一面派人到东路去侦察、联络，一面给部队发齐了夏装。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只等第二天早晨出发了。

刚刚吃过晚饭，支队部打来电话，说陈毅司令员要我去。我放下电话，立即跨马向一支队司令部所在地溧阳县水西村奔去。十多里地，一会就赶到了。当我走进陈司令员的住房时，看见屋内只有他一个人，默默地抽着烟。见我进来，他用手指指旁边的竹凳，一句话也没说。我坐下后，他仍是一言不发。我心里一沉，问道：“你叫我来有什么事啊？”

他还是不说话，慢慢从口袋里掏出一份电报递给我。电报是项英同志发给陈毅同志的，内容是坚决反对东进。理由有两条：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地区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部队到那里去会被敌人消灭。

看过电报，我的心情很沉重。我是从心里赞成东进的，但事关重大，就没有说话，也抽起烟来。

他在屋里走来走去，先慢后快，越走越快。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突然坐下来问我：“你看怎么样？”我一时不明白他问的“怎么样”是什么意思，没有回答。他见我没吭声，又呼地站起来，点燃一支烟，狠狠吸了几口，踱几步，在一张竹凳上坐下来。一会儿，他猛地站到我

面前，问道：“哎！叶飞，你看你们到东路去会不会被消灭？”我立即回答：“你问这个呀！我们有把握，不会被消灭。不仅不会被消灭，还会发展。我可以向你保证。”

他追问了一句：“噢！你有把握？”

“有把握！不只我一个人，全团的营连干部讨论过，都认为有把握。我敢给你立军令状！”

他摆了摆手，说：“那好！你们走，照原计划行动！”

我站起身，又问：“那个‘破坏统一战线’的问题怎么办？”

“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这不是你们的事。”说着他用右手拍拍胸脯：“破坏了统一战线，我负责！”又指指我：“部队被消灭了，你负责！”

## 夜袭浒墅关

从支队部回来，我让部队比原计划提前两个小时出发。时间是五月五日凌晨两点多钟。全团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向东路地区挺进。

走在行军的行列里，我反复想着所了解到的东路地区的情况。那里，日军的兵力很强大。我们党领导的游击队只有一小部分，而且很分散。更多的是地方武装和面目不清的杂牌部队，以及反共的军统特务组织的忠义救国军……想到这些，我更感到此去责任重大，觉得肩

上沉甸甸的。

拂晓时分，部队在常州附近越过宁沪铁路，天明后与梅光迪的部队会合。这是梅光迪拉起来的一支地方部队，号称“江南抗日义勇军”。上海党派何克希同志去担任副司令。何和新四军取得联系后，陈毅同志又加派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去工作。胡发坚同志牺牲后，又派徐绪奎同志去。我们这次向东作战，就是打的这支部队的旗号。梅光迪任总指挥，我任副总指挥。他们看到六团到来，很高兴，立即和我们会合，继续东进。不久到达无锡梅村，和强学曾的游击队会师，并与地方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地方党组织和广大群众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到来，送水送粮，充当向导，介绍情况。特别是广大群众，看到我们着装整齐，纪律严明，猜测我们是新四军，盼望我们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可是由于我们打的是“江抗”的旗号，而“江抗”是常州的地方部队，在这一带不为人知，因此对我们能不能打胜仗还存有疑虑。为了鼓舞士气，树立群众的抗日信心，扩大“江抗”的影响，我们和地方党组织商量，决定在这里打一仗，目标就选在宁沪线上的浒墅关车站。

浒墅关车站，是日军在沪宁铁路中段的重要据点，所以我们决定第一仗在这里打。据点里有地方党的“内线”。侦察员去看了地形，弄清了日军的情况后，我们

就决定夜袭。

六月二十四日黄昏，全团集结在梅村外的稻田里。我进行简短的动员后，部队就乘着夜色奔向浒墅关。雨后泥泞，战士们一步一滑地走在洒满迷蒙月色的田间小径上，偶尔可以看到村舍里的零星灯火，听到稀落的狗吠声。十二点多钟，部队到达距浒墅关半里路的地方。抬头看去，浒墅关死一般寂静。探照灯闪着苍白疲倦的眼睛。一面巨大的太阳旗在房顶有气无力地飘摇着，格外刺眼。我按预先制订的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开始攻击。

首先上去的是突击队。他们以隐蔽的动作迅速搞掉了敌哨兵，接着摸到敌人的兵房。在“江抗”到来之前，从来没有人敢来动他们，因此，他们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杀进来，都在睡大觉呢。就在突击队摸到敌兵房的同时，攻击部队也冲上去，把一排排手榴弹扔进了窗口。随着隆隆的爆炸，敌兵乱作一团。当 they 从梦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人拼命向外逃窜。这时我们的机枪响了，步枪也瞄准射击，一串串子弹射向敌人，打得兵房起火，日军惊慌狂叫。另一处，我军炸毁了铁路桥。一时间，熊熊的火焰烧红了半边天，机枪声、步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宣告着我们的胜利和日军的惨败。

三点多钟，战斗就结束了。

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前后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全



歼了这里的日军。还使铁路停止通车三天。上海和香港的一些中外报纸，发表了消息，刊登了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关于这次战斗的通讯。从此“江抗”的旗帜打出去了，日军大为震惊，广大人民欢欣鼓舞。

## 建立阳澄湖抗日根据地

浒墅关战斗后，“江抗”乘胜继续向东发展，进入常熟境内。在阳澄湖边，我们与常熟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民抗”部队取得联系，在湖上的集散地东塘寺一带初步建立了根据地。

七月的阳澄湖，苇叶青青，稻谷飘香，是鱼虾正肥的季节，渔民的汽船、木船在湖面上往来不断。但我所注意的却是无边无沿的芦苇荡。

这儿港汊星罗，水网密布，颇象《水浒》里描写的梁山泊。当地同志介绍说，这芦苇荡里的地形十分复杂，没有人带路根本进不去；就是进去了也出不来。听着，看着，我想到陈司令员关于“相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觉得阳澄湖及其周围地区就是一个建立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

群众告诉我们说，在这里行军作战都可以坐船。我们一试，果然很方便，一只汽船能拖十几条木船。河汊四通八达，两边都是芦苇荡，在岸上一般看不到，十分

隐蔽。日军无人带路，只能在一些主干线上耀武扬威，不敢到河汊里来。这样，我们的天地就广阔了。不但夜间，白天也可以活动。有时几条汽船拖着一长溜木船，浩浩荡荡，象一支机械化舰队，好不威风。如果遇上日军的“扫荡”，有利时就狠狠打一下，搞它个措手不及；不利时就转身躲进芦苇荡。敌人想进进不去，想打打不着，气得直朝湖里乱放枪，我们则在一边看热闹。日军虽然在伪军的配合下，经常进行频繁残酷的“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我们依靠广大群众和有利地形，选好机会，给予沉重的打击，使敌人的一次次“扫荡”都以损兵折将的惨败而告终。

由于我们在这里初步站稳了脚跟，地方党公开活动了。他们和部队一起，深入到埠港村浜中去，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扩大抗日武装，组织抗日团体。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在不长的时间内，谷乡各县都很快建立起自卫队、农救会、青救会和妇救会。这些组织都是抗日的骨干。他们配合部队反击日军的“扫荡”，打击和袭扰敌人，传递情报，救护伤病员，筹集粮食，赶做军鞋，十分活跃。至此，在长江三角洲的水网地带，初步建立起了以阳澄湖东塘寺为中心的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抗日根据地。有了根据地，我们就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打下了坚

实的群众基础。后来，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离开了这里，留下作战处长夏光同志带三十几个伤病员在这里养伤。这时环境已趋险恶，梅光迪叛变当了汉奸。日军一次次进行野蛮的“扫荡”。但他们在群众的掩护下，不但养好了伤，夏光同志还以他们为骨干，配合当地抗日武装，又组织了一支新的“江抗”，继续在苏常太地区坚持斗争。在不长的时间里，发展成一支拥有六个支队的抗日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了东路抗日根据地。所以后来谭震林同志到那里去的时候，只带一些干部，没有带部队。沪剧《芦荡火种》、京剧《沙家浜》，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编写的。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以后，东路抗日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

## 火烧虹桥飞机场

有一支赞颂新四军的歌谣唱道：“军号响，哒哒嘀，新四军，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散，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打仓库，缴武器；打汽车，夺军衣；打汽艇，有穿吃。日寇当了运输队，老百姓个个笑嘻嘻。”

“江抗”就是这样。在苏常太地区，我们神出鬼没，纵横驰骋，袭据点，反“扫荡”，打得日本侵略军和汉奸部队魂飞胆丧。每打一仗，不但消灭了敌人，而且能缴

获大批武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在这里丢下大批武器，我们也收缴了一部分。这样，我们不但武器增多了，而且都是新式的。“江抗”开始东进时，武器陈旧落后，到这时，都换上一色新的三八式、捷克式。每个班都装备了轻机枪，每个连都有重机枪。武器缺乏的困难解决了，甚至枪还比人多。

“江抗”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群众也逐渐知道“江抗”就是新四军。因此许多青年积极参军，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纷纷前来投奔“江抗”。短短几个月时间，部队的数量就大大增加。到了十月，包括地方武装在内，已有六千多人。六团东进时不到七百人（有一个营留在皖南军部），此时已发展到二千多人。其他部队也发展很快。战斗力都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那一大批青年学生、工人参加部队后，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有不少经过锻炼，成为优秀的军事、政工干部。

随着部队的发展，我们适时地进行了扩编。把整个“江抗”编为四路：六团为二路；梅光迪的部队为三路；无锡地方部队为四路；常熟的“民抗”为五路。这样一来，苏常太和澄锡虞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了起来。这时的“江抗”武器精良，士气旺盛，战斗力有了明显的增强。

我们在苏常太地区初步建立根据地之后，为了进一

步扩大抗日影响，决定派吴焜、何克希同志带领二路一个支队和五路一部分约一个团的兵力，向上海近郊挺进。他们日夜兼程，连续行军作战，渡过浏河，抵达嘉定地区，与当地党组织和吕炳奎部取得联系。尔后继续挺进，渡过苏州河，在青浦的观音堂地区与顾复生同志领导的游击队会合。随后，我也赶到那里。

青浦地区的群众基础相当好，我军在那里隐蔽活动了一段时间，日伪军都没有发觉。有一天，上海近郊的数百名日伪军大摇大摆地出来“扫荡”，接近了我军驻地。我们决定打它个措手不及，就命令二路主力配合当地武装出击，将日伪军击溃。日伪军受到打击后，拼命往上海虹桥机场方向逃跑。支队长廖政国同志率部追击逃敌，一口气追了六十余里，天黑后到达上海虹桥机场。他们趁着夜暗，把伪警察和办事人员关在一间房子里，然后冲进机场，看到停着四架飞机。这时，机场四周碉堡里的日军打开探照灯开枪射击。廖政国命令部队打开汽油桶，把汽油浇在飞机上，再将一支支火把扔上去，顿时火光冲天，四架飞机全部燃烧起来。我军便趁机撤了回来。

这一仗的影响相当大，上海的老百姓以为新四军要进攻上海了，有的群众还做好了欢迎的准备。第二天，上海出版的《导报》、《译报》以及《密勒氏评论报》、《士林西报》等都作了报道，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导报》主笔陈同生同志不得不撤离上海，转到“江抗”工作。日军因为搞不清情况，第二天仍没有动静。直到第三天，才出动一个联队，配一部分驹兵，“扫荡”了一天。这时我们已顺利转移，日军毫无所得。

## 撤离东路

东路地区有一支武装，名叫“忠义救国军”，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部队。它网罗了特务、流氓、封建把头和反动军官，表面上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暗地里与日军勾结，搜刮人民，杀害我党地方干部，打击抗日游击武装。我们东进之前，他们就并吞和歼灭了一些受我党影响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并杀害了江阴县一支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人承寿根等人。我们来到后曾派人去联系过，争取团结他们一起抗日。但他们坚持反动立场，不但不抗日，还公开配合日军打我们的部队。一次，我们刚进入一个名叫黄土塘的镇子，六百多名日伪军就冲了进来。狭路相逢，仗打得很激烈。我们凭着人熟地熟，和日伪军战斗一天，打死打伤大部敌人。正当我们继续扩大战果之时，身后却响起激烈的枪声。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日军的援兵，后来才发现是“忠义救国军”。在“忠救”的配合下，日军又疯狂地反扑过来。尽管这样，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垮了。“忠救”也被消灭一部分。

“忠义救国军”公开反共，配合日军妄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仍不死心。黄土塘战斗后，“忠救”又集中了三个纵队的兵力，在江阴地区大举进攻我军。第一天，“江抗”二路和三路投入战斗，打了整整一天，“忠救”伤亡很大。第二天，王必成同志带领新四军第二团赶来增援。我们研究了敌我态势，决定发起总攻。当时我们占着优势，完全有把握消灭“忠义救国军”。可是这时陈司令员来了电报，要我们停止进攻，向西撤退。

我和王必成同志都不愿意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仍然想在拂晓时总攻，并给陈司令员发了请战的电报。半夜时分，陈司令员回了电报，严令我们停止攻击，立即西撤与他会合。于是我们命令部队连夜撤出战斗，向西转移。

不久，我们就到达武进县的西石桥和陈司令员会合。他看到雄赳赳的队伍，全新的武器装备，脸上堆满笑容。我向他报告说：“我们完成了你交代的任务。”他爽朗地说：“有人说你们会被消灭，这不是壮大了嘛！他五心不定，早晚输个干干净净！”我问他：“你为什么让我们撤回来？”他压低声音说：“别有意见罗！告诉你吧，要你率部队北渡长江，到苏北去打开新的抗日局面。我们以后也要过去。”

后来我才知道，党中央早就指示新四军军部离开皖南，向江北转移。可是项英同志强调有困难，一直不执

行。陈毅同志清楚地认识到,新四军应下决心向北发展,主力过江,早点打开苏北局面,与南下的八路军会合。这样就可以建立巩固的连成一片的华中抗日根据地。从这个大局出发,他建议由自己率领江南部队过江北上,把军部迁到苏南茅山根据地。项英同志仍不同意此方案,陈毅同志只得先派我部渡江。

一听说有新的任务,我高兴地笑了。陈司令员看着部队,扬扬手说:“你们吃饱了,兄弟部队还很困难呢。叶飞呀,你们要照顾大局啊!”当即决定从我们团调出五十多挺轻重机枪给江南的部队。一天,陈司令员来我们部队,看到列队时摆出来的武器,就说:“你们还有这么多哇!”然后转过脸问我:“你们现在还有多少轻机枪?”我回答:“大概一个班还有一挺。”他惊喜地说:“啊!每个班还有一挺哪!现在皖南部队还没有机枪呢。再调!一个连留六挺轻机枪,一个营留两挺重机枪,其余的统统调走!”结果又调走了五十几挺。其实,第二次调走后,每个班还是保持了一挺。原来,廖政国同志耍了个“滑头”,他把机枪零件拆开,用麻布包起来,让炊事班挑着,因此每个连打了三挺的“埋伏”。

一九三九年底,我们到达扬中,随后跨过长江到达江都吴家桥地区,和管文蔚部会合,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



## 第十二章 渡过长江 向北发展

### 扬中整编 彻底党化

一九三九年十月，我率“江抗”主力西撤到达丹北地区，陈毅同志来部队视察，向我交代由六团担任向北发展的重要任务，决定与挺进纵队合编，“彻底党化挺纵”，执行向苏北发展的任务。对于一些具体问题，也一一作了交代。我带着六团，渡过长江，到达扬中，与挺纵会合。一九四〇年的新春，就是在长江中的扬中这个小岛上渡过的。过了新年，第二天即由扬中北渡到达江都、吴家桥地区。

“挺进纵队”原是苏南丹（阳）北抗日自卫团，由我党早期党员（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管文蔚等同志领导组建的。一九三八年七月，新四军到达苏南敌后，该部和新四军取得联系，陈毅同志将丹北抗日自卫团改番号为新四军丹阳游击纵队；九月，我一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带一批军政干部，加强这支队伍，正式编为新四军

挺进纵队。管文蔚同志任司令员，老红军干部郭猛、张福前（张震东）同志分别任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郭猛同志调任扬中办事处主任后，由龙树林同志任政治部主任。龙树林同志在反“扫荡”中牺牲后，由陈时夫同志接任。

我部与管部合编后，仍沿袭新四军挺进纵队番号。管文蔚同志仍任司令员，我改名聂扬，任副司令员，张藩同志任参谋长，吉洛（姬鹏飞）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团：一团即新四军老六团，乔信明同志任团长，刘先胜同志任政委；二团由“江抗”各部编成，徐绪奎同志任团长，何克希同志任政委；三团为挺纵的一支队和四支队，梅嘉生同志任团长，李一平同志任政委；四团为挺纵的二支队和三支队，韦永义同志任团长，刘文学同志任政委。纵队成立军政委员会，由我任书记。一九四〇年三月，江南指挥部又派梅嘉生率两个营西进，编入苏皖支队。挺进纵队直接指挥的部队为一团、四团和纵队特务营。

“党化”，就是要使这支部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实行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一切建军制度。

原挺进纵队是由丹阳地区的地方自卫武装，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新四军一支队的直接指挥下，成长和建设起来的。它在两年多的战斗锻炼中有很大提高，建立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工作制度，成为

一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部队，是一支队指挥下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这支部队成份复杂，没有主力骨干。老六团和这支部队合编的任务，就是彻底党化这支部队，它成为一支在党绝对领导下的主力部队。

“党化”，首先是干部的“党化”。要提高部队的素质，决定在干部，首先要提高干部的素质。在整编中，原团、营干部调皖南军教导大队学习，连、排干部由纵队办教导大队集训。从一团抽调一些干部作为四团的骨干，使部队面貌为之一新。

部队训练，亦如六团在皖南练兵一样，首先抓正规作风养成。军容风纪，队列动作，军人礼节，作息制度，这决不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它表现了一支队伍的精神面貌。有位老军人说过：从部队的步伐声里可以测知这支部队的士气。这有一定道理。自由散漫，士气不振，部队的行进步伐必然零零落落，参差不齐；训练有素，士气高昂，部队的行进步伐，必然整整齐齐，坚定有力。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的执行尤为重要，保证部队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保证部队的令行禁止。经过严格的军政训练，提高了这支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此外，还整顿和建立了一套正规的部队供给制度（包括财务制度）。

正象陈毅同志所说：“建军是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斗争。”挺纵的“党化”是一系列思想上组织上的建设。

经过整编和训练，挺纵四团走上了革命化正规化的道路，由地方部队改造和训练成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正规部队，成为苏北我军的主力团之一。在发展苏北的历次战斗中，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 百尺竿头，再上一步

挺纵一团（新四军老六团）在吴家桥进行了第三次大练兵。这时的一团经过苏南东进作战之后，战斗力提高了，装备大为改善，部队面貌大为改变，已成为一支劲旅。在此基础上，在吴家桥进行了一次难得的练兵，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在皖南集中整编后，进行了第一次练兵，已在上文详述。这一次的严格整训，打下了由红军游击队改造成为一支正规部队的基础。

进入苏南敌后，在东进之前，在茅山地区又进行了第二次练兵。这次整训大约一个月，是在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同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一次的练兵主要是针对日军的作战特点，总结半年来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为东进抗日作准备的，着重训练对日作战。罗炳辉同志出身行伍，身经百战，作战练兵经验丰富，军事技术和战术都好。本人又是出名的神枪手，每天练习射击，从不间断，对部队训练也很严格。训练打麻雀战时，亲自

示范，对部队影响很大。

吴家桥整训，时间比较长，有二三个月的时间。这时的部队既有打鬼子的游击战经验，也有反“摩擦”的运动战的经验。经历了平原水网地带的作战，在东路河汉湖泊行动时，常是数十条船只鱼贯而行，一遇情况，立即投入作战，这都是我们前所没有的经验。这次练兵，总结了在东路作战的经验教训，集训干部，训练部队。

执行发展苏北的任务，要在三角斗争中建立抗日根据地，既要对日寇作战，又要打反“摩擦”仗。对日寇作战主要是游击战，但有时也要进行较大规模的作战；而打“摩擦”仗，则主要是运动战。在东路的反“摩擦”战中，双方都动用二三个团以上的兵力，培养了部队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作风。一团在吴家桥练兵主要是解决提高打运动仗的作战能力的问题。干部中主要解决组织指挥问题，正面突破和穿插、迂回包围，火力与兵力的配合，运动道路的选择，运动队形……等。战士除苦练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外，还进行利用地形地物、战术技术合练，反复练习，反复运用。

这次练兵使挺纵一团既能打游击战，又能打运动战，既能在反“扫荡”中与日军作战，又能在反“摩擦”中与顽军作战；在创建苏北根据地和以后的坚持苏中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主力部队的作用。

同时，在挺纵各部队中抓紧基本政治教育，针对部

队农民成份多的特点，编写了政治教材《农民与革命》，系统地通俗地具体地阐述了农民与革命，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农民的现状和前途，农民与抗日，农民与中国共产党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用“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贫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解放；而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到达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而“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中国革命战争本质上是农民战争，等等，这样一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来教育干部和战士。军队政治工作主要是引导、启发农民战士的革命热情，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思想，使他们转化为无产阶级战士。

## 万事俱备，只等东风

陈毅同志向我交代渡江北上任务时说：“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是执行中央、毛主席一九三八年‘五四指示’的具体化。向北发展，就是发展苏北。中央有明确的指示，苏北问题解决后，可以背靠山东八路

军，依托江河湖海，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陈毅同志爽朗地笑着，豪气十足地说：“苏北那地方，我真是朝思暮想呐！叶飞啊，你先去，把落脚之地弄得扎实些。我再把江南主力带过江，大干一场，弄它十万人枪！”

陈毅同志不但“朝思暮想”，而且早就苦心经营，巧作安排了。

要向北发展，必须突破长江天险。陈毅同志反复考虑：长江之中的扬中县南岸接近宁沪线上的丹阳，北岸邻接李明扬驻地泰州，是一块理想的渡江跳板；拿下扬中、新老洲，再在北岸各取一块桥头阵地，部队就可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在经济上也可以打破国民党的封锁。

那时，国民党的游杂部队贾长富团盘踞扬中县，这个所谓“国军”，实际上是由长江帮匪、地痞和国民党军南京战役溃散官兵组成的土匪部队，无恶不作。这部队，挂着顽固反共分子江苏省保安九旅旅长张少华的招牌，在国民党省主席韩德勤的怂恿下，积极反共，残杀抗日进步青年。扬中人民纷纷派人过江，请求新四军讨伐。一九三八年十月上旬，陈毅同志派挺进纵队为民除害，第一次进攻扬中时，贾长富早已撤走；一九三九年一月，第二次攻打，全歼贾团，解放扬中。同时，挺进纵队的一个支队又在长江北岸控制了江都境内的嘶马、大桥一带狭长地区。

项英同志老是强调“江南特殊性”。江南当然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全面反共政策。除了皖中国民党第五战区和苏南、皖南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反动进攻外，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命令“讨伐”新四军挺进纵队，限期夺回扬中和扬泰沿江地区。但是，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加之新四军威名慑人，“两李”又与我军有所默契而观望不前，其它部队也就观望不前。

韩德勤见军事“讨伐”不成，便施展政治阴谋，一方面要求国民党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向新四军军部施加压力，限期将挺进纵队撤出扬中；一方面采取分散瓦解办法，不惜重金，收买挺纵二支队长方钧。这个方钧，原是反动军官，杀害过红军人员，上海沦陷后带领残部逃到丹阳，到江北后，竟然另立山头，自封为“长江九省游击总指挥”，杀害我军派去的干部。但是，三战区的无理要求，陈毅同志婉言拒绝了；渡江协助挺纵解决方钧叛变，控制了江都、大桥、嘶马地区，韩德勤的反共迷梦破灭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军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同志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苏北的新四军部队，以及所辖地区的地方武装。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有十三万发子弹无法从江南运到江北，李明扬亲笔致函陈毅司令员，要求协助护送。十一月十一日，陈毅同志派第



四团团长陶勇同志、政委卢胜同志率团部及第二营协助护送。完成任务后，即以“苏皖支队”名义，进入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

十一月底，我率六团渡江，在扬中与挺纵会合。这一行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纠集海、陆、空军三千余人对扬中进行大规模“扫荡”。挺纵预先接到情报，遂全部渡江到江北吴家桥、大桥、嘶马一带，进行军政训练。

一九四四年三月，梅嘉生同志率两个营西进，编入苏皖支队，陶勇、梅嘉生同志分任正、副司令员。一度切断天（长）扬（州）公路，声势大振。他们在皖东站住了脚跟，沟通了与我军第四、五支队的联系。

这样，我军就控制了扬州以东，泰州以西和仪征、六合、天长地区，形成了随时可以东进海安、东台、如皋、南通，北上高邮、兴化、宝应、盐城的有利形势，为开辟苏北根据地准备了有利条件。

上面所述是军事上的安排，在统一战线方面，陈毅同志也有安排，做了不少工作。陈毅同志交代向北发展任务时，还告诉我：泰州李明扬、李长江是苏北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是我方与国民党顽固派的中间力量，争取他们的中立，是解决苏北问题的关键。並说：两李与国民党省主席韩德勤矛盾比较尖锐，对我军比较友好，曾表示过愿意帮助我军东进南通、如皋一带。陈毅同志具体交代我说：“两李的上层工作由我来做，加上管文蔚、

朱克靖：两李部队的中下层工作由你们做，和他们交朋友。”

到了吴家桥地区后，对两李部队的中下层工作在原有基础上继续进行。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同志，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做过白区秘密工作，当过新闻记者、报纸总编辑，社会经验丰富，经常由他与两李部下的纵队长、支队长进行接触。必要时，我也出面来往应酬，宣传我党我军抗日主张，增进友谊。交往比较密切的是李部二纵队司令颜秀五部和陈玉生部。

当时，共产党员陈玉生同志组织的部队，借用了两李的番号：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第三纵队第八支队。开始时三纵队司令张公任曾承诺陈部“听点不听调”，意思是名义上属于他，实际上他不指挥这支部队。以后，两李发觉陈玉生是共产党员，就派他带部队到江南，通过新四军地区到三战区去领取弹药。完成任务后，李明扬就要陈部驻于通扬河以南靠近新四军的地区。我们到吴家桥后，就成为邻居了。张公任的三纵队是在南通、海门地区发展起来的，官兵大多是那个地区人，张公任调任后，由启东人陆洲舫接任。陆洲舫通过陈玉生来拉关系，我们也通过陈玉生做他的工作。陆洲舫这人，船户出身，很重江湖义气，与连云港到长江口的“海霸王”（海匪）颇有交往，抗战以后拉队伍时，陆部就有不少“海上弟兄”。我与陆洲舫接触以后，感到这人直爽，有

抗日热情，易于交往。他有点文化，好象是个中学生，与我说得也投机。来往几次以后，陆洲舫通过陈玉生向我表示：要与我们俩“义结金兰”。我说：“拜把兄弟这套把戏意思不大。”陈玉生说：“他们就相信这一套，什么党呀派呀，他们不相信，相信异姓兄弟胜一家。他们脑子里只有关云长，没有马克思。”我为这事，专门打了报告，得到了陈毅同志的批准。结拜兄弟时，没有什么仪式，由他们准备了大红帖子，上面印着“义结金兰”、“生死同心”之类的字样，写上各人的姓名、出生年月，相互交换。据陈玉生同志回忆：三人之中，我的年纪最小，但陆、陈两人推我为老大。结拜兄弟之后，别无异样，但是关系确实大不相同，更亲近更密切了，无话不说。我军东进直到海边，海边就是启东、海门，何况陆洲舫对海上很熟悉。陆洲舫呢，觉得两李对他并不信任，有东归之意。谁知李长江听到一点风声后，就要逮捕陆洲舫，张公任回去重任纵队司令。幸亏有人通风报信，陆洲舫连夜逃到江南，绕道上海，回到启东。陈玉生部则被东调泰兴蛤蟆圩地区。据说因为此事，两李对我军表示不满，认为是挖他们的“墙脚”。陈毅同志为此进行了解释。至于那个陆洲舫，回到启东后又拉起一支队伍，有时陆地，有时海上，半是军，半是匪。一九四〇年十月底，陶勇同志带三纵队到“通如海启”建立根据地，又与陆洲舫取得联络，改编了他的部队。可算是当时统战工

作的一个插曲。

当时苏北的地方党领导机构：一是江北特委，是江苏省委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派遣唐守愚、陈伟达、吴佐成三同志组成的，率领一批干部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开展工作，以后发展到崇明县。一是苏北特委，是由新四军派干部组成的，在江都、高邮、泰县、泰兴、靖江一带开展工作。书记是韦一平同志，副书记是惠浴宇同志。

苏北特委在新四军武装掩护下工作，带有半公开性质。特委的主要任务是：重新建立与发展中共组织，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成立群众抗日团体，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展统战联络工作，培训骨干力量。

一九三九年春，苏北特委在大桥附近办起了长江军政学校，吸收进步青年，培养骨干力量，并从中选择积极分子，秘密发展党员，为各地建党作准备。当地群众把军政学校称之为政治队。

同年秋天，苏北特委在江都的吴家桥举办党员训练班，下分泰兴、如皋、高邮、扬中、江都六个组，时间为两个月。主要训练内容有党的基本知识、马列主义基本常识。主要是培养、提高新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为今后大规模发展党的组织准备骨干。

江北特委和苏北特委的艰苦工作，为新四军向北发展作了组织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东风何时来呢？

## 第十三章 驰援半塔集

### 顽固派掀起反共逆流

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内出现了投降逆流。国民党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于十二月公开投敌，这是在日本诱降下国民党营垒的严重动摇和分裂。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动》的指示。这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一整套反动的“溶共”、“防共”、“反共”的具体政策。

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到一九四〇年三月达到了高潮，即第一次反共高潮。

与此同时，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把进攻八路军失败率部投降日军接受伪职的柴恩波的叛国行为称作“施行曲线救国”。从此，“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成为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依据。

华北顽固派对我军的进攻，除了柴恩波外，还有张荫梧部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我军干部战士百余人。秦启荣于三月至八月，在山东一再制造摩擦事件，袭击杀害八路军干部战士。杨森部包围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杀害我军通讯处负责人涂正坤、罗梓铭等同志，制造著名的“平江惨案”。十二月后，反共进攻愈演愈烈，阎锡山在山西进攻我党领导的抗日决死队（山西新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袭击边区属地宁县、镇远等县城，同时，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组织保安队攻打八路军。一九四〇年初，蒋介石还调遣九十七军朱怀冰等部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区。

中共中央为保持抗日阵地和打退投降反共逆流，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五中全会，指出在日军阴谋分化我国内部之际，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月，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指出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言让步。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两周年纪念日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毛泽东同志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我华北根据地军民奋起反击，在山西粉碎了阎锡山旧军的进攻。在绥德警备区赶走了专事摩擦反共的何绍南部。一九四〇年三月又消灭了进攻太行区的朱怀冰部三个师。从而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顽固派不会甘心于华北反共摩擦中的严重失败，必将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央对此作了充分估计，中央军委《关于目前华中军事策略的指示》中指出：“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成为顽方必争之地，目的在隔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陷新四军于危境。”“顽方在华北摩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海路南，摩擦中心将移至华中。”对于华中武装摩擦中我方的策略作了如下指示：“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军，力求缓和，对韩德勤部在有利有理条件下，即当其追到我军驻地时，坚决消灭之。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应当向苏北发展。”并且警告说：“在华中为新四军摩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方有可能利用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被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

果然，蒋介石一面在江南向我新四军实施政治压迫和军事逼进外，还亲自策划国民党军令部制定了《肃清淮河

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提出“第二十一集团军（即李品仙部）须派出有力之一部及地方游击团队，进出于津浦淮南两路中间地区，驱逐该地区内之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推进至洪泽湖以南地区，与第八十九军及李明扬部之各一部，协助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的异党。”“第八十九军以一部驱逐沭阳、宿迁、涟水边境非法活动的异党，以一部及李明扬部之一部，驱逐大桥、仙女庙（江都县属）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尔后分别进出于洪泽湖南北地区，与第二十一集团军之一部及第九十二军协力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之联系。预期于六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

## 半塔集保卫战

国民党顽固派向新四军军事进攻，有一点是与华北不同，华北使用的是地方部队，而华中使用的是正规军，其中包括嫡系的韩德勤部。根据中央指示，我军对“桂军力图缓和”，但当时的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却调集五千余兵力，于三月四日首先向我军驻津浦路西的江北指挥部及四支队司令部发起进



攻，我军四、五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集中路西对顽作战。趁我路东主力西援作战之际，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三四九旅、独立六旅、常备十旅、补一旅等部共约万余兵力，向我路东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及其附近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围攻。

半塔集地处苏皖五县交界处，是一个山区小集镇。驻在半塔集的是五支队教导大队六个队（三个军事队、两个学生队、一个女生和少年队），约五百人。附近有十团两个营、十五团两个连和特务营，约两千五百余人，新战士多，武器装备较差。

三月二十一日拂晓开始，国民党军分三路向半塔集发起进攻。同时，附近我军驻地均遭受顽军猛烈攻击。

胡服（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同志电报中央后，中央军委电示：“李品仙奉某方令，实行全部反动政策，坚决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欲将我张云逸、彭雪枫等部全部消灭，切断新四军、八路军联系，并使我江南新四军处于无路可退。在此情况下，我有坚决打破反动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这一紧急任务。……彻底战胜进攻部队，巩固这一极端重大的抗战战略地区。”次日，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根据这一精神，要求半塔集及其附近守军：“动员和组织一切力量，坚守半塔，待路西主力挥戈东援，

歼灭韩顽。”

战斗第一天，五支队教导大队击退了敌人三次进攻，控制了半塔集周围所有制高点，打通了半塔与苏鄂的通路。当晚，根据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的指示，邓子恢、郭述申、周骏鸣、赵启明等领导同志开会确定：要求部队固守七天以上，以待援军。部署上也作了调查，命令已到古城的十团两个营赶到西高庙，接出特务营，然后向半塔靠拢。

十团配合古城游击队击退顽军嘉山常备大队和秦庆霖常备旅一部对古城的进攻。二十三日清晨，配合特务营击退进攻西高庙之敌。尔后赶到半塔支队部，作为支队机动部队。

顽军多次进攻，均未奏效。我军民士气愈战愈旺。女同志和小鬼也表现得很出色。顽军进攻的第二天，曾以一部进攻半塔集东南十九里的乔王村，那里仅有民运组长兼指导员的女同志刘洁率领的四十多人的当地游击队，苦战一天一夜，牵制敌一个团的兵力。教导大队的女生队、少年队担任救护工作，并且开展对顽军的政治工作，号召顽军枪口对外……

## 驰援半塔集

三月二十二日，顽军围攻半塔集的第二天，江南指

挥部陈毅同志获悉后，立即给我们来电，命令挺进纵队火速日夜兼程前往增援。救兵如救火。二十二日接到电令，纵队几个领导同志商量了一下，稍作准备，二十三日即由我率领挺纵一团和四团各两个营，从吴家桥地区出发，从邵伯湖西渡运河，横跨天（长）扬（州）公路，昼夜兼程急进。

这段运河正好穿过邵伯湖，一片泽国。侦察参谋刘大观带领侦察员先头出发，在湖边筹集船只。那一带群众中对新四军印象好，渔民船户纷纷前来。部队走得也快，船只刚集中，就赶到湖畔，纷纷上船，夜间穿越邵伯湖。

白天，横跨天扬公路时，却好与一百余日伪军遭遇。狭路相逢勇者胜。前卫是一团一营，分两个箭头插上公路，拦头截尾，手榴弹没头盖脑地在敌人堆里爆炸，炸得鬼子伪军乱叫乱喊。约一个小时，即将一小队日军和一个连伪军全部歼灭，俘获日军士兵一名。记得那名日军士兵姓横田，名字已记不起来，以后成了日本反战同盟的积极分子。那时却蛮横得很，为了赶路，只好把他捆在担架上抬着走。枪声刚停，来不及打扫战场，部队又急速前进了。

二十四日，部队前进到半塔集东南二十余里之马集附近。侦察员发现顽军，着装不很整齐，好象是顽军地方部队，抓了俘虏一查问，原来是忠义救国军行动总队。

真是冤家路窄！在苏南交过手，在这里又遇到了！岂肯轻易放过。一个猛冲，就冲进了集镇里，打得顽军措手不及。我军接连打下三四个村庄，共消灭顽军一千余人，突破了顽军包围半塔集东南面的缺口。

我纵部队经过两昼夜连续战斗行军，极为疲劳，二十五日在马集休息一天并打扫战场，二十六日即由马集出发向半塔集方向攻击前进。围攻半塔集的顽军主力独立第六旅，也由竹镇方向向马集攻来。我军前卫挺纵一团六连连长汤万益报告：前面是集镇，国民党军队密密麻麻象蚂蚁一样，捉到俘虏，说是韩德勤的独立六旅十三团、十六团。这独立六旅是韩德勤的主力，兵员足，装备好，武器精良，战斗力强，顽军内部称它为“梅兰芳部队”。那个旅长翁达，军衔是中将，骄横不可一世。我军如不把它打垮，如何解除半塔集之围。我即命令部队展开向敌进攻。一团六连连长汤万益是员猛将，战斗中伤残了一只眼，人称“汤瞎子”。一听冲锋号响，他抱起一挺机枪就冲向敌阵。团参谋长廖政国就在前卫连后面，亲自抱起机枪，和十来挺机枪一线排开，向敌人猛烈扫射，发起猛烈冲锋。顽军独立六旅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已给弹雨压得尸填河沟，还能跑的就四处溃散。激战三小时，我军将独立六旅击溃，歼敌一个营，敌其余部队向竹镇方向逃窜。

我纵已从半塔集东南打开缺口，并与从路西赶来增

援的苏皖支队取得联系。坚守半塔集的部队得知援军已经到达，士气大振，摩拳擦掌，准备反击。

二十七日，张云逸、罗炳辉同志率主力亦兼程东返，先头部队到达半塔集西南四十华里的张山集。韩德勤见我军东、西两面援军已到达，溃败之势已不可挽回，全线动摇，开始后撤。

部队休息三天，部署反击，由罗炳辉同志任前敌指挥，我任副指挥。二十九日开始，分三路全线反击，追歼逃敌至三河右岸。顽军已于我军反击前狼狈逃窜，一天一夜之间跑过了三河以北，我军因反击迟了一天，未能将该敌歼灭。

战后，少奇同志向中央报告半塔集保卫战时，总结说：“韩部溃退如此之快，主要是政治原因，师出无名，不能提出讨伐新四军与共产党口号，干部士兵均不愿打，屡次叫部队冲锋亦无人来冲。围攻半塔各敌，在受到坚强抵抗后，愈攻愈使他们丧失战斗意志。”“一月来打摩擦仗的经验证明，在今天进行内战是大家反对的，是极不容易的。在开始时，要在军事上进行坚强的防御战，然后才能在政治上打击顽军，丧失顽军战斗意志与提高我军战斗意志。”

半塔集保卫战的胜利，打开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局面，我军很快建立了天长、盱眙、来安、嘉山、六合、高邮、仪征、甘泉八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路西也发展

很快。路东路西都建立了联防司令部。刘少奇同志曾说：“抗战还要有个家嘛，这个家叫淮南抗日根据地。”这终于实现了。

## 少奇同志的一次谈话

半塔集保卫战胜利结束后，有一天，邓子恢同志带我去见少奇同志，这是我第一次与少奇同志见面。这不是普通的见见面，而是少奇同志有意识地找我谈话。邓子恢同志当时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政治部主任，可能他事先向少奇同志介绍过我。少奇同志当时是中央代表，他和我这次谈话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在场的只有少奇同志，邓子恢同志和我三个人。我们是在少奇同志的房间里谈的，谈了一两个钟头。

少奇同志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皖南项英的错误，一个是解决苏北问题，把新四军和八路军打成一片，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问题。少奇同志来到华中，就是执行这个任务的。

少奇同志谈到项英同志在皖南的错误，明确地讲，项英同志在东南局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党顽固派一味退让妥协，不敢斗争，他提出口号：“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强调新四军力量小，敌人和顽固派力量大，强调华中特殊。项英认为，江南敌后

交通便利，不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所以，他不敢到敌后去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只在国民党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又不敢建立政权，更不敢和顽固派坚决进行反摩擦斗争。项英坚持错误，抵抗中央的正确路线，已经给新四军带来很大的危险，如果不及时改变，危险更大。少奇同志说，现在根据地不巩固，新四军军部就在顽固派的眼皮底下，没有回旋余地，不晓得哪一天可能会被国民党顽固派消灭掉。项英同志的错误，造成现在这个危险的局面，对我们很不利。少奇同志讲，中央要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向北发展，到江北去，项英同志就是不行动，说什么长江敌人封锁，大部队不好过。少奇同志还把党中央与东南局项英来往的电报给我看。

当时，我只知道项英同志反对派新四军以“江抗”（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苏（州）常（熟）太（仓）地区作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少奇同志这么一讲，就把问题点破了，再一看电报，恍然大悟，豁然开朗。少奇同志谈话有一个特点，当谈到重要的问题时，观点非常明确，没有模棱两可。

陈毅同志不执行项英同志那一套，不照他的办，想办法向东、向北发展。少奇同志说，陈毅同志对项英同志的错误是有斗争的，是与项英不同的。少奇同志又说，不过现在中央还在争取教育项英，所以对他的错误，目前在党内还不公布。争取项英同志到江北，执行中央

的路线。

接着，少奇同志谈道：现在的任务就是解决苏北问题。对开辟苏北的任务，他谈得很透彻，非常明白。少奇同志说，发展华中，开辟苏北，不光是新四军的任务，而是全党的任务。在相持阶段中，放手发展人民力量，不光是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还为了抗战以后中国革命的前途。

少奇同志说，现在解决苏北问题比较麻烦，因为华中的情况与华北、山东的情况有所不同。他说，抗战初期，华北的国民党军队逃跑一空。八路军是奉命挺进敌后作战，北方局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我们党和八路军迅速在华北占了主导地位，国土是我们从敌伪手里夺回来的。那时，国民党很蠢，他还不懂得我军能在敌后建立根据地发展壮大。徐州会战时，蒋介石还请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帮他扯日军的后腿。他是想借日寇来消灭我们。结果，我们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建立了山东根据地。所以，我们在华北、在山东开辟的根据地都是合法的，国民党是哑巴吃黄连，没法叫苦。这样的文章好做。

少奇同志说，现在华中的情况就不同了。国民党接受了教训，对苏、浙、皖，他们也比华北更重视，不再跑光了，留在苏北为首的就是韩德勤，约有十几万军队。他们在那里光收税，不抗日，也不让你新四军进来抗日，



他们还时常与日伪眉来眼去，暗送秋波。日寇因为兵力不足，想借韩德勤之手为他反共，因而也很少对韩顽施加压力。韩德勤便竖起了“孤悬敌后”的节孝牌坊。现在我们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只能把阻碍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赶走，要把韩德勤占着的地盘夺过来。这个文章怎么做就难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形势呢？一个是我们自己有错误，即上面说的项英犯的错误；一个是国民党接受教训，“聪明”了。少奇同志讲，国民党的策略变化了。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总结了教训，制定了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的政策，对我们限制得很厉害，不让我们到广大敌后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少奇同志说，现在蒋介石“聪明”了，我们反而蠢了，强调新四军的特殊性，规规矩矩地受约束，不敢独立自主，不敢扩大根据地。当然，这个错误不是项英个人的，他是执行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

怎么去改变这个局面呢？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分离的，还没有打成一片。少奇同志说，中央已经决定，要解决苏北问题，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如果不解决苏北问题，八路军和新四军就不能打成一片，就不能建立巩固的华中根据地。苏北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文章不好做，就是说，我们不能主动去打韩德勤。我们只能进行自卫斗争，否则我们在政治上被动，得不到全国各界的

同情。

少奇同志又说，文章还是可以做的。因为国民党顽固派已经确定了一个反动的愚蠢的政策，要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现在的重心是进攻新四军。顽固派既然来进攻，我们就有理由起而自卫，消灭他们。

这个文章怎么做？少奇同志把地图铺开，一边指点着一边告诉我说：中央已抽调山东八路军黄克诚纵队南下，已经到了陇海路边；江北指挥部在皖东，四、五支队部署已经展开；江南部队也准备到江北。我们在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部队已快靠拢了。要解决苏北问题，就要从韩德勤手里将苏北夺过来。因此，顽固派在华中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必须有一支坚强有力的部队吸引顽固派来围攻我们，孤军坚守一个星期，充分暴露了是顽固派猖狂进攻，蚌自彼开，我们就可以增援，八路军部队南下，皖东部队向东，江南部队向北，到苏北来消灭韩德勤。

少奇同志找我谈话，就是要我担负起这个引敌围攻、孤军坚守、待援歼敌的任务。开始，我有点犹豫，不敢一下承担这个任务。我考虑，我的部队只有两个团，我军其他的主力还在江南。而韩德勤有十几万人，我们孤军坚守太久了没有把握。所以，我向少奇同志提出，兵力太少，守一个星期可以，一个星期以后怎么办没有把握。少奇同志明确地说：只要你坚守一个星期。一个星

期以内是你的责任，一个星期以后就不是你的责任。那时候，八路军和新四军江南部队的增援可以到了。就象这次半塔集保卫战一样，守一个星期增援便来了。这一讲，我就明白了。我没有打过这样的仗，进了半塔集，仔细看过地形，了解过兵力部署和战斗过程，我心里有点数，我们取得了半塔集战斗的经验。少奇同志讲得这么清楚，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少奇同志看我那么痛快地接受任务，很高兴。那时候，我才二十六岁，真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最后少奇同志又交代我：政治上一定要有理有利才能打，不能主动去打人家。人家来打你们，你们坚守待援，八路军就好来增援。一定要顽固派来进攻，我们被迫自卫，政治上才站得住。少奇同志指出，既要从小韩德勤手里把苏北夺来，又不能主动去进攻人家，文章难做就在这里。这个分寸，少奇同志讲得很清楚。

接受了任务，我向少奇同志提出一个问题，回去怎么办？过去的做法不对，可那是项英同志指示的，在江南也是这样执行的。现在要改变，就得说那是错误的。可是项英同志的错误又暂不公布，回去怎么讲呢？少奇同志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并告诉我，你回去以后检查你们自己活动地区来提问题，介绍这次到皖东来的所见所闻，说皖东建立了县政府，魏文伯当了定远县长，是新四军委任的第一个县长，出布告明令减租减息，群

众发动得好。然后对照你们自己活动地区看做得对不对？总之，是要贯彻中央的正确路线，但是不要去牵涉皖南，更不要去牵涉江南。我回去就是这样做的，后来就发生了郭村保卫战。

## 重返吴家桥

既然少奇同志已经交代了任务，我就注意专门研究半塔集保卫战的经验了。象半塔集这样的仗，我过去没有打过。过去主要是攻袭敌方，打的是游击战、奇袭、伏击；如果被敌人包围，赶快组织突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如今要在强敌包围下固守待援，确定新问题。但是，半塔集守住了，半塔集及其附近没有主力，守卫半塔集的只是教导大队，圆满地完成了固守待援的任务。这正是一个启发，一个榜样。我请直接指挥坚守半塔集的周骏鸣副司令员、赵启民参谋长等领导同志介绍指挥作战的经验，并由他们陪同详细观察了地形和工事。

我们在半塔集地区休整了一个多月。本来，根据陈毅司令员的电令，半塔解围后，要我立即率部东返的。逗留如此之久，因为出现了极为微妙的情况。江北指挥部很喜欢挺纵这支部队，提出要我们留在皖东地区。陈毅同志却连连来电，催我率部东返。我觉得不好办，请

示少奇同志。可以看出，少奇同志也是想留挺纵在皖东的，但也知道陈毅同志手里部队不多，所以他说：请示中央吧。以后我有机会看到少奇同志给中央的请示电文，确是倾向我部留下的，准备集中四、五支队、苏皖支队、叶飞两个团、张爱萍一个团，形成较强大的兵力发展苏北。正在这段时间内，皖南项英同志派袁国平同志去上饶与顾祝同谈判，屈从于顽固派要“叶、张两部南下”的无理要求，多次电报中央，提出：“在某种情况下，叶飞部可允南调”（四月十日）；“在目前形势下，似应允许江北部队南调”（四月十四日）；“袁（国平）到上饶求缓和，叶、张两团南调以应付事变”（四月十六日）；“袁与顾谈判，要我军将四、五支队，叶管部队逐步南调”（四月十八日）；“坚请叶张部南调，以加强皖南力量”（四月二十日）；再度要求叶张部南调，“以增加反击力量”（四月二十二日）等等。几乎是每两天就有一个电报，急如星火。从这里可以更加清楚中央一九四〇年四月五日写给东南局的指示（即第二个四五指示），正是针对项英同志而来的，以及指示中为什么要提出：“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四、五支队，李先念纵队，彭雪枫支队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少奇同志当时就反对项英同志的意见，

在四月二十四日给中央电报中提出：我方如果同意叶管部南调，还有什么理由去苏北？

四月二十四日，陈毅同志致电中央提出：苏北敌“扫荡”高邮，预计很快陷为敌后，叶飞部应开回大桥，乘机发展。电报说：我们始终认为叶飞部必须开回大桥才能有利发展。挺纵西援后，大桥仅有两个营不能应付，尤以敌占高邮、兴化、泰州后，国民党大溃，我无主力亦不能收拾。同时大桥失守，苏南、苏北交通断绝。我们完全同意中央坚守华中、发展苏北之计。叶飞应开回苏北。

五月四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胡服：“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两万人枪。严令叶飞订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靖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韩德勤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

中央决定我部返回江都大桥地区，仍属江南指挥部建制，罗炳辉同志无限惋惜地对我讲：“没办法，你们回去吧。不过，伤病员都给我留下，抽一批基层干部给我：我给你们补充兵员，成建制的。”五支队给我部补充了一个地方部队。罗炳辉同志的要求我们也都照办，即抽调一批基层干部给五支队，我们即开回江都地区。

回到吴家桥地区，我召开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参

加的有管文蔚、吉洛（姬鹏飞）、张藩以及苏北地委书记韦一平、副书记惠浴宇。我汇报了西援情况，具体介绍了皖东地区的做法，即是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武装……等轰轰烈烈的情况。大家听了很高兴，认为这种搞法有奔头，革命发展大有可为。我就提出：我们现在搞法对头不对头？大家的思路打开了，都说应该象皖东那样的搞法。我就传达了解决苏北问题的任务，以及我们挺纵要负担的任务。大家思想统一了，改变过去死气沉沉的局面，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建设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发展人民抗日武装。会后就任命惠浴宇同志为江都县县长，贴出布告减租减息。大家都很兴奋，准备敌人来进攻，正好趁机解决苏北根据地的问題。

会议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大家议论纷纷，都觉得今后可以放手大干了，纵队有位同志却提出问题来了，他说：“我们过去执行的是皖南的路线，如果照你讲的照皖东的一套办，要末是皖南的路线错了，要末是你反党！”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大家都怔住了，逼得我不得不摊牌了。如果不明确指出皖南项英的错误，就不能执行中央的路线，不能放手发动群众，也就不能完成“吸引”顽军进攻的任务。我即宣布休会，大家认真研究明天再议。当晚我只好单独找这位同志谈话，我不得不明讲，少奇同志是如何讲的，说明白项英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因为现在中央还在争取项英改正错误，所

以不在党内宣布……我还特别强调：少奇同志说得很清楚，陈毅同志是执行正确路线的，江南和皖南不同，陈毅同志同项英同志是有斗争的。我讲了以后，这位同志说：“哦，我了解了。我是不知道，你又不给我们讲。既然是皖南的路线错了，那当然不能再去执行错误的路线了。”第二天继续开会，大家再也没有什么意见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作出了决定。



## 第十四章 郭村保卫战

### 进入郭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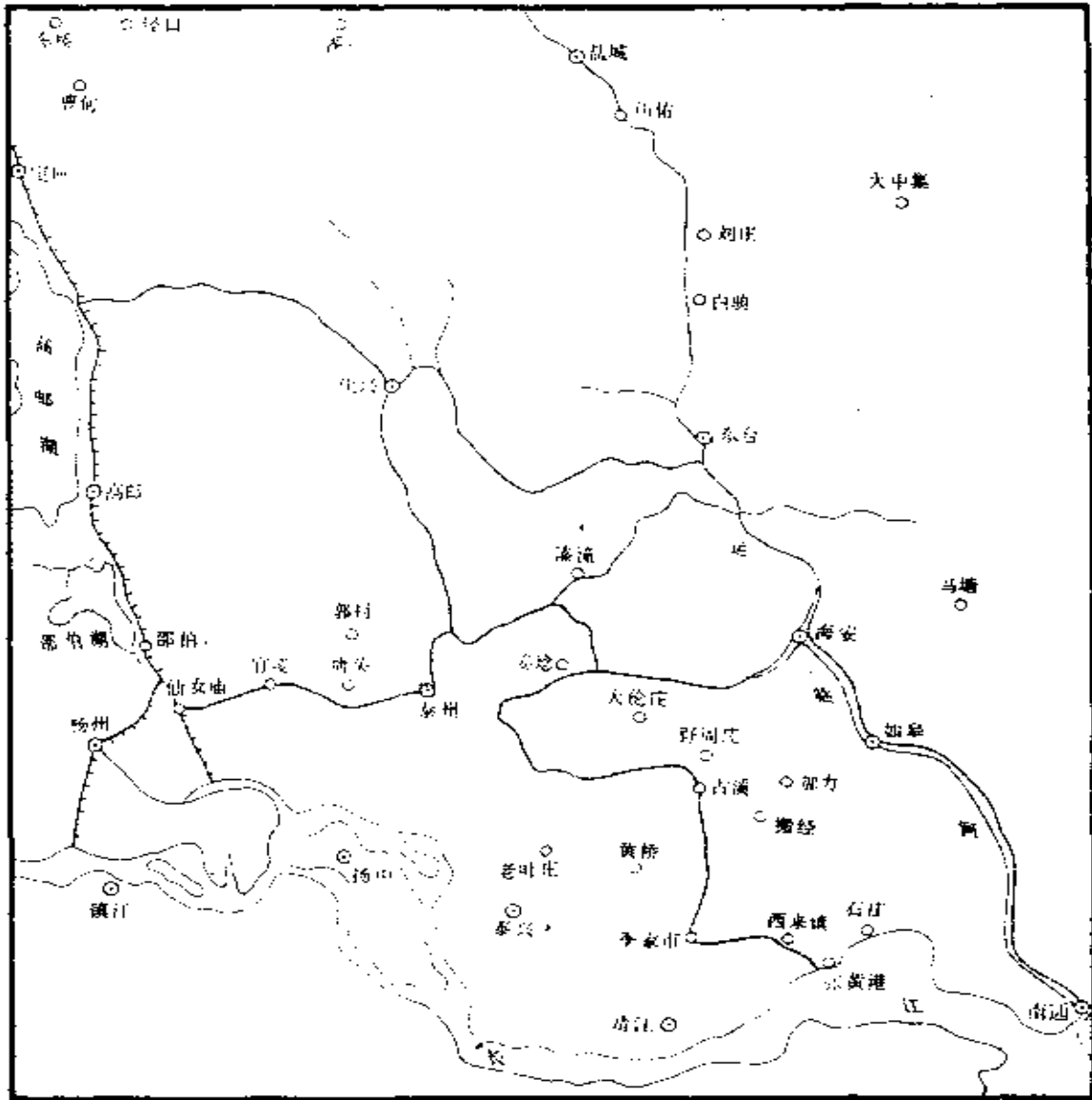
我带一团和四团两个营回到吴家桥地区，传达了少奇同志的指示，成立了江都县人民政府，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农民长期被地租和高利贷捆绑得透不过气来，我们一搞减租减息，抗战热情迸发了，一下子就把军民关系推向一个高潮。

吴家桥的工作部署好后，正要过江去向陈毅同志汇报皖东之行，主要想谈一下少奇同志交代的任务，并向他请示如何执行这一任务。谁知日伪军对吴家桥地区进行“扫荡”，我就走不成了。

五月十七日，日伪军五百多人一下子扑向吴家桥。由于我军在这里驻守时间较长，挖有野战工事，日伪军三个冲锋也没有冲进来。从拂晓打到中午，敌我双方都没有吃上饭，这在我军是经常的事，而日伪军却提不起劲头，攻势就不如上午猛了。下午，我军反攻，一个冲锋

# 苏中作战地区略图

附图三



就把敌人冲垮了。一路追击，追到大桥。日伪军继续向仙女庙据点逃窜，被我军包围在离仙女庙五里路的一个小村庄里，激战终夜，歼敌大部，我军伤亡也不少。那时，要消灭整股鬼子兵不那么容易，而且我军刚从皖东过来，部队还很疲劳，再打下去也未必能解决这股敌人，仙女庙距扬州只有三十公里，扬州之敌可能来援，我军就撤出了战斗。我军撤了，日伪军也赶紧逃回仙女庙据点。

这一仗打了一天一夜，几乎把日本鬼子全歼，是这一地区抗战以来最激烈的一仗。在这之前，一团刚到苏北，阴历大年三十（一九四〇年二月七日）拂晓，日寇“扫荡”大桥地区，也打了一仗。当时，国民党军闻风而逃，一退三十多里，我军则一个反击，追到仙女庙附近，粉碎了日寇“扫荡”。从此新四军名扬苏北，苏北人民把新四军叫作“四老爷”、“四将军”。但五月的吴家桥一仗，歼敌更多，影响也更大。

那天，下大雨。鬼子搬运尸体去火化，搬了一整夜。我军则连夜转移到靠近宜陵的地方休息，部队有的还没有住上房子，在各处躲雨。我们在那里研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日军受了我军重创之后，可能再次集结兵力向我军进行报复性“扫荡”，而吴家桥地区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因此决定通过宜陵友军颜秀五的关系，转移到通扬河以北、宜陵东北的郭村地区休整待机。

吴家桥地区的北面就是通扬河，从扬州经仙女庙、宜陵到泰州，除扬州、仙女庙是日寇据点外，其余的都是李明扬、李长江部队控制的地区。我军驻在通扬河以南，南临长江的吴家桥地区，东西三十余里，南北二十余里，如果日伪军数千人来“扫荡”报复，我军在这样狭小的范围内难得回旋机动。宜陵是李明扬、李长江部第二纵队颜秀五的防地，颜秀五与我军关系较好，惠浴宇同志一直以同乡关系在做他的工作。我们向颜秀五提出：我军打了一天一夜，很疲劳。扬州是敌军旅团部，近在咫尺，这次吃了大亏，必然要进行报复，我们就不能回吴家桥了，想借你们一块比较安全的地方休整部队。宜陵靠扬州较近，颜秀五部队都知道这场激战，都清楚鬼子用了一百多副担架抬伤兵到扬州城去的事。颜秀五开始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向李长江报告。李长江却下命令制止，他表示，不仅不能让挺进纵队到通扬河以北地区，而且说：“如果挺纵要通过宜陵的话。就打。”命令颜秀五部架起机枪，封锁通扬河上的桥梁。颜秀五不得不向我们表示：李副总指挥不同意，因为“这是我们的防地，你们不能来。”他还留有余地，没有讲你们如果强行通过，我们一定要打的话。

我们还是决心跳到通扬河以北的郭村去。为什么要选郭村这个地方呢？一来这里比较安全。二来郭村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建立了党支部，领导青年抗日救国团，

搞过春荒分粮斗争，还掌握了自卫队武装，群众基础好。三来这地方是三角地带：西边十里外，是鬼子高邮、邵伯据点；北方十里外，是韩德勤部队张星炳的保三旅；东边离泰州二十多里，南边是宜陵圩头，是李明扬、李长江的地区；正好是日伪、韩顽、两李三股势力的结合部，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在这里积极打击日伪，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搞减租减息，发展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决心一下，部队吃了中午饭以后，就以战斗姿态向宜陵前进，因为过通扬河北去必须经宜陵镇上的大桥。颜秀五部队派人来交涉，我们前卫部队说：我们和颜司令接过头，答应让我们通过的，怎么又变卦了呢？吴家桥是弹丸之地，我们和鬼子打了一天一夜的硬仗，总要有个休息的地方，还是请你们谅解！颜秀五部队看到我们以战斗姿态前进，没有敢打。我们从宜陵街上通过，颜部士兵站在街道两边看。老百姓听说这是和鬼子打了一天一夜的部队，也争着出来围观。我们就这样转移到郭村。

### 且说“两李”

当时苏北国民党军队有三股力量。其中力量最大的是韩德勤，他是鲁苏战区副总司令、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江苏省主席兼江苏省保安司令，归他指挥的有八十九军和独立六旅，还有十个保安旅，上面提到的张星炳就是保安三旅旅长。韩军号称十万，实际上只有五万余人，各方面简称他为“省韩”。其次是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所属部队，九个纵队，总兵力号称三万，实际上也只有两万多人，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总指挥部放在泰州，各方面简称他们为“泰州两李”。第三是税警团，江苏省税警团的总团长陈泰运，四个团兵力，四五千，武器精良，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部，是宋子文创建的嫡系部队。从政治上来分析：“省韩”是蒋介石嫡系，韩德勤当过五十二师师长、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属于反共顽固派。陈泰运是黄埔一期，而且是军统核心组织“复兴社”的成员，他虽并未被重用，但因是何应钦同乡而被宋子文、孔祥熙任用，曾遭韩德勤软禁过，和韩矛盾大，可争取中立。“两李”是苏北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第一，资格老，李明扬是反袁起义军中的同盟会员，北伐战争时期的第三军师长、副军长；第二，实力强，全盛时期收编过十一个纵队（相当于旅）；第三，后台硬，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有历史渊源；所以“两李”在苏北国民党部队中有一定号召力，地方实力派都唯其马首是瞻，在政治上属中间派。苏北实力主要是“省韩”和“两李”。

李明扬、李长江和韩德勤虽然都是国民党，并有隶

属关系，矛盾却很深刻。李明扬虽然资格老，可是官运不通，靠了桂系的支持才弄到了鲁苏皖游击队总的番号，屈居韩德勤之下。而韩德勤一任省主席，就把李明扬、李长江原任的江苏省保安正、副处长（即正、副保安司令）的位置抢了过去，自己兼任处长，李守维当了副处长。保安处长有权节制和组建各保安旅，油水不小，一朝被夺，两李自然怀恨在心。韩德勤还垄断弹药供给，尅扣侵吞，又暗里派人打入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所属部队，一心想分化、控制两李部队。但他们之间的矛盾，主要是争权夺利，只要威胁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都会反目无情的。

虽然并称“两李”，李明扬和李长江还是有区别的。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大革命时期与共产党人共事过。陈毅同志以毛泽东、朱德的名义向李明扬致意后，李明扬很受感动，后来还得意地夸口说：“我在这里打坍了，到延安去，玉阶（朱德字）会招待我的。”李明扬阅历多，交游广，处事也留有后路。李长江则起自行伍，匪气较重；任省保安处副处长时，手握实权，积极“清剿”苏北红十四军，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他和李明扬的关系也很微妙，年轻时本是李明扬的卫士，凭着血气之勇，江湖义气，升得很快。抗战以来，他把持帮会，广收徒弟，结拜金兰，招收游杂，“鲁苏皖”的部队大部是李长江的。他之所以拥戴李明扬为总指挥，是要借老

资格为招牌，靠旧关系得资助，撑立门户，充实军力。两李为求发展，四方周旋，到处拉关系。因此，当时泰州政治情况复杂，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日本和汪伪特务也是两李指挥部的座上客。两李的部属来自各方，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纵队司令丁聚堂、二纵队司令颜秀五、六纵队司令陈才福都是李长江的结拜兄弟。三纵队司令张公任是原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四纵队司令陈中柱是黄埔军校出身。其中，陈中柱、陈才福相当反动。陈才福是上海滩上的流氓，当过土匪，又当过“包打听”（上海租界巡捕房的便衣侦探），心狠手辣，他的部下也大多是横行不法的亡命之徒。丁聚堂的队伍是由扬泰沿线的大刀会组成的，地主武装，但战斗力薄弱。张公任虽属CC系统，但他部下的八支队支队长陈玉生是共产党员，队伍也是受共产党影响组织起来的抗日进步武装。二纵队司令颜秀五，海州人，结伙贩过私盐，喜欢讲江湖义气，早年在上海还曾与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过关系，经过惠浴宇同志做工作，靠拢我军，是我军对两李进行工作的联系人之一。他部下的五支队有个四大队，是上海地下党组织起来的启东抗日义勇军改编成的，有党的总支部，大队长王澄就是共产党员。

陈毅同志根据中央指示和对苏北力量对比的分析，提出了“击敌、联李、孤韩”的发展苏北的策略方针。

“联李”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韩德勤，正如陈毅



同志所说：两李如与省韩联合，力量强大，我们吃不消，也就很难完成发展苏北的任务；如果两李站在我们一边或暂时保持中立，我们就能同韩德勤作最后的较量，也就能在苏北完成抗日、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族任务。

早在一九三九年初，陈毅同志就通过管文蔚、惠浴宇同志的关系，与两李达成谅解，商定以江都县的大桥、吴家桥为挺进纵队的活动范围。八月，经过惠浴宇同志以同乡关系做了颜秀五的工作，陈毅同志与两李直接联系，数月之内，三进泰州与两李会晤。陈毅同志向中央军委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报告中提到：一九三九年冬，他乘代李部从江南运送十万发子弹到江北的便利再进泰州。“两李待以上宾之礼，召集部队讲话，以蒋、韩反共密件告我，自谓不反共，并商定时机助我东进，慰劳我军万元，再拟送三百名干部到我处受训。”这事，项英同志在十二月十日也向中央报告：“最近陈毅到泰州与二李会晤，所谈甚好，李主张：陈部东进到启东、海门、如皋、东台一线，他可接济经济，挂他的番号，并拨一部武装归陈指挥。”陈毅同志还从我部战利品中挑选了三十支三八式日本步枪送给颜秀五；选一匹好马，备上新鞍鞴，送给李长江；给李明扬送了一把日军指挥刀。

后来，据陈毅同志向中央军委报告中说：挺纵利用

两李进步的机会，大做两李部下的争取工作，用拜弟兄等方式（当时只决定可在中上层军官中发展秘密的特别党员）。事机不密，引起两李反感，同时罗炳辉又在洪泽湖西解决了盛子瑾（两李部下），省韩即进行挑拨，甚至引诱两李使用武力反共。陈毅同志又于是年冬派代表过江，致两李密函，承认解决盛子瑾不当，说明挺纵与两李部下交往系共同合作，图谋东进，共谋发展，绝未违反双方上层的约定，绝不是分化其部队；并劝告两李勿受省韩挑拨，说：蒋、顾、韩过去“剿共”时代是拿杂色部队作牺牲，抗战时代亦复如此，现在发动反共战争亦如此，不要中其传统政策的毒计。结果两李表示谅解，又申明不受省韩利用。这样，陈毅同志才能调我们西开，驰援半塔集。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三月。据郭述申同志所写《刘少奇同志在淮南》一文所述：这年二月七日到十二日新四军五支队政治工作会议后不久，“在半塔集消灭了企图与我对抗的国民党盛子瑾部队，迫使盛部二千余人缴枪。”三月四日国民党军李品仙部向我江北指挥部和四支队司令部发起进攻。三月二十一日韩德勤向我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及其附近地区发起进攻。由此看来，半塔集消灭盛子瑾部是淮南粉碎第一次反共高潮斗争的一部分。盛子瑾是地方实力派，属于两李部下的中间势力，所

谓“中间”，也就是摇摆于进步与反动势力之间，所以盛部在反共高潮中与我对抗是不奇怪的。

同样，两李在抗日反韩这一根本立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摇摆性，因此对他们的争取工作要准备“和”与“打”两手并用，“和”是为了争取，“打”也是为了争取，何况两李和所属各部也是大有差别的。

当我方积极争取两李时，韩德勤利用两李对蒋、顾压力的畏惧以及对我挺进纵队在江北发展的疑惧心理，又打又拉，表示要与两李“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

挺纵到郭村以后，就开展民运工作，减租减息，委任区长，扩大自卫队，主要向北发展，向西打击日伪。郭村向北二十里，就是韩德勤部保三旅张星炳的地界，我们向北发展，就把两李甩在侧后，顶到韩德勤的面前，准备他来进攻。对两李，我们一再派人谈判、解释、做工作，谁知发起向我们挺纵进攻的倒不是韩德勤部队，而是两李！

## 黑 云 压 顶

从全国形势来看郭村战斗，就会看得清楚了。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失败后，就把摩擦重心转移到华中。

蒋介石的部署是：汤恩伯、李品仙进攻豫东、皖东，顾祝同、冷欣进攻皖南、苏南，韩德勤则全力进攻苏北的新四军。韩德勤的打算是：由他出兵乘隙进攻淮南路东新四军五支队，同时策动两李进攻挺进纵队。两李部队中的顽固分子也都蠢蠢欲动，陈才福、陈中柱经常向李长江要求把挺进纵队赶走。陈才福说：“新四军一共才两千人，我去大叫三声也把他们叫垮了！”陈毅同志亲去泰州，稳住两李，我才得以率部驰援半塔集，打垮了韩德勤的反共进攻。

五月十七日我们进入郭村后，李长江多次派人索要郭村。六月下旬，李长江竟向挺纵下最后通牒，限三天内退出郭村。我们将情况分别电告中原局胡服（即刘少奇）同志和江南指挥部陈毅同志。

胡服同志给我们复电，并给项英、陈毅报中央：“目前你们在苏北的任务是在冲突前争取政治上的优势。”“即使顽固派已向你们开枪，最初还应去信，力求合作打日本。”并重申：“……由于你们积极活动，顽固派必然迟早会向你们进攻，你们要准备与选择适当的地形位置，能够固定或以游击战支持一二星期，让顽固派进攻你们，你们自卫，造成充分政治理由，然后再由八路军与四、五支队援助你们协力侧击顽固派。”

陈毅同志也给我们复电，指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尽量避免与两李冲突，不能避免也要尽量拖，以待

江南主力打退冷欣进攻后北渡长江，抑止战端；中策是如果避免冲突或拖延不了，要打，退到吴家桥打，那里背靠长江，可以机动；下策是在郭村打，易受四面包围，态势不利，并指示派出代表到泰州谈判，以争取时间。

我把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同志找来，给他看了陈毅同志的来电。我说：“现在不是我们要打，而是他们先打到我们大门边了。内战不利于抗战，顽固派死也不懂这条道理。现在陶勇同志的苏皖支队尚未到达，陈老总和老二团还未过江，你还是到泰州去谈判，把陈司令员给他们的电报转去，说清由于我军疲劳尚未恢复，要求再让我军在郭村驻一段时间，然后我军就返回吴家桥地区，让苏北人民了解我们内求团结、一致抗日的诚意。”当时大家都年轻，火气不小，都说：“谈什么，谈会有什么结果！”我说：“能多争取几天时间，对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有益的，时间对我们非常有用。”陈同生同志和调查科科长周山同志一起前往泰州。李长江却气势汹汹地吼道：“你们是天兵天将也不过二三千人，我们鲁苏皖的部队就是豆腐渣，也有七八十大堆，也要胀破老母猪的肚皮的！”他把形势估计错了，竟然把陈同生、周山扣留起来。我们不得不准备抵抗李长江的军事进攻了。

我们研究后，电报中原局和江南指挥部：郭村地形较好，吴家桥是一线七里长庄，不易坚守，还是在郭村

迎战较为有利。

陈毅同志很快来电指示，语气坚决：切不可在郭村孤军御敌，吴家桥若不好守，万不得已时则暂时退回江南，与江南部队会合，然后卷土重来。

这是第三次来电了，我连夜召集挺纵和苏北特委的领导同志联席开会，后来又把团以上干部找来一起讨论。苏北特委的正、副书记韦一平、惠浴宇同志都表示：郭村党的群众基础好，新四军来了以后，已公开建立政权，减租减息，搞红了，被迫放弃，必受反共部队摧残，太痛苦。挺纵参谋长张藩、政治部主任吉洛（即姬鹏飞）同志与团的干部都认为在郭村打有胜利把握，退守吴家桥则不利。这时，李长江在保三旅张星炳的配合下，调动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总兵力达十三个团，向郭村进逼。其第二纵队踞于塘头、宜陵、丁沟一带，隔断郭村与吴家桥和苏南我军的联系；第四纵队在泰州、刁家铺、口岸一带由东对我；张星炳保三旅则在郭村以北之小纪一带，妄图歼灭我挺纵于郭村地区。会上，张藩同志说：这时我军脱离郭村既设阵地，仓促转移，并非善策；南有长江和两李阵地，西有运河、邵伯湖，再加日寇封锁，我军向江边转移，如果两李部队追击不舍，我军就很被动。一直讨论到半夜，各方面的利弊强弱都分析到了，不但对两李，还对郭村北面的保安三旅作了估计。管文蔚同志情况熟悉，认为张星炳固然反动，但

很狡猾，不会为两李火中取栗。两李各纵队也不一致，真正反动并有战斗力的不过是陈中柱、陈才福的部队。

大家都同意保卫郭村。

可是陈司令员三次电示不同意固守郭村，怎么向他交代呢？抗命专擅，干系本就不小，万一打不好，部队大受损失，那就不得了！我沉思很久，掂量半天，下决心说：“既然大家都认为在这里打有把握，那好，就下决心在这里打。对陈司令员，我负责好了。陈司令员说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现在他不在这里，而且他只到过吴家桥，没有到过郭村，不了解这里的地形、群众条件、敌情。我们前线指挥员了解情况，要敢于实事求是，独立负责，这才是真正的向陈司令员负责！向党负责！”

于是我们复电陈毅同志，仍然坚持保卫郭村。陈毅同志急得一面命令陶勇同志火速增援郭村，一面电告我们：他在“六月二十八日便衣渡江，一切候我到时再议。……”

正在这时，陈玉生来电告急。李长江准备向郭村我军进攻之前，企图先以四个支队解决陈玉生支队。那时，陈玉生同志的共产党员身份已是路人皆知了。陈部驻泰兴县的虾蟆圩地区。他的来电是要把部队拉过来，就是说要起义，否则就要给李长江吃掉了。我看事情急迫，一面报告江南指挥部，一面电告陈玉生，同意他们起义，

我派部队前去接应。陈玉生告急，不增援不行，去的兵力少了、弱了，也不行。我估计两李之所以敢先解决陈玉生，是因为陈部名义上总是他们的部队，吃掉不吃掉，政治风险不大；如果得手，再转过头来配合韩德勤打郭村。当时情况瞬息变化，决心很难下。要保卫郭村，就很难分兵增援陈玉生，郭村兵力减弱，非常危险；不派兵去增援，陈玉生部队很可能被李长江解决，陈玉生部队实际上已是我们党领导控制的，不能坐视不救。如何才能既增援陈玉生起义，又不影响保卫郭村呢？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考虑，最后才决定派出挺纵四团去增援，留下主力一团及特务营共四个营兵力守郭村。我有意暴露我亲自率领部队去增援陈玉生，下午我骑着人们熟知的白马率四团由郭村出发，黄昏在塘头附近渡过通扬河。入夜，四团从吴家桥地区向东急进增援陈玉生，我却又秘密地由原路悄悄回到郭村。我所以有意让李长江知道，是判断他们必然会估计我带去的是主力一团，就不敢对陈玉生动手了；万一郭村打起来，实际上我和一团都在郭村，也不要紧。

真是阴差阳错，李长江果然根据我已离开郭村的情况认为：第一，挺纵分兵了；第二，叶飞率主力已离开郭村，郭村兵力空虚，这是攻打郭村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突然改变部署，决定先打郭村，然后再解决陈玉生部队。加上，陈同生又扣在他手里，他自以为时机到了，再也



不想做那个“中间派”了。

李明扬这位总指挥如何动作呢？到兴化“开会”去了。他在进攻郭村前夕避到兴化，看来用意颇深，一是不愿意亲自出马打新四军；二是留有余地，万一“副总座”出师不利，也可转圜。应该说，对这场武装冲突，他内心是充满矛盾的。韩德勤的险恶用心，他洞若观火；可是蒋、顾、韩一再施加压力，不对新四军动武就交不了官差；而对李长江的飞扬跋扈，也心有不满。看来，这位总指挥既想打，又想置身事外；既不希望大胜，更不愿大败。他还是宁愿苏北有力量不大的新四军存在，那样，在韩德勤、李长江面前，他还可以把两面讨好的角色唱下去，不至于被人冷落在台下。

李长江披挂停当，就杀气腾腾地围攻郭村了。

## 午夜报惊

六月二十七日午夜十二时许，我已经上床睡了，值班参谋把我叫醒说：“泰州城里出来一个女同志，一定要见你。”

我赶紧起床，见到一位浑身湿透，头发滴水，穿着白色旗袍的少女。她自我介绍是颜秀五纵队政训处的政训员李欣（即郑少仪），也是这个纵队直属队共产党秘密支部的书记。从二十四日起，她每天都要到泰州去观察情

况，打听消息，然后报告泰州地下县委书记陈扬同志，并派人转告郭村。今天上午她到泰州后，就感到情况异常，满街是士兵买这买那，北斗宫留守处的一个勤务兵告诉她：“城里的部队昨天发饷了，我们也快发了。”那时候的旧军队欠饷是经常的，发饷就意味着要打仗了。她赶到县委秘密联络点，县委交给她一份重要情报，是李长江围攻郭村的部署，要她找人送到郭村去。她一想，现在要赶快弄清楚两李部队进攻的确切时间，也要核实一下情报。好在她熟人多，匆匆地到泰山寺、雨声寺等司令部找熟人打听，发现他们今天都要开赴郭村前线，并且得知：丁聚堂的一纵队到宜陵，陈中柱的六纵队到塘头，陈才福的四纵队到横档铺。李长江调兵遣将，包围郭村，攻击已迫在眉睫；新四军派到泰州的谈判代表陈同生等同志，已被李长江扣留起来……等等消息。有个靠山很硬的政训员还炫耀他已得到消息：明天拂晓就要发起进攻。军情紧急！她赶回彭家庄驻地，又得知情况确是不一般，晚上的口令换了，太阳快下山了，新口令还没有发下来；向乡保长摊派的民夫，规定晚饭后一定要集中……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下决心自己把情报送到郭村。天黑后，她脱下军装，换上旗袍，混出岗哨，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避开李长江部队驻扎的村庄，在田埂上东弯西转，过了七八道河汊，十八里路竟然转了半夜，终于来到郭村东面的大河边，叫应了对岸摆渡的

老乡，把她撑过河，被我军的哨兵抓住了，于是见到了值班科长彭德清同志……

李长江要来进攻，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前天两李的参谋长许少顿来郭村谈判，以责问我军筑阵备战的手段，要求看我军的工事。这引起我们警惕，既来侦察，定会进攻。当时郭村防御工事尚未完全构筑好，许少顿走后，我们军民齐动手，抢修工事。现在弄清楚敌人的部署，弄清楚敌人发起攻击的时间，这非常重要。十二点钟知道，十二点半下命令，赶快吃饭，四点钟以前全部进入防御阵地，准备迎击敌人。我常说：郑少仪是有功的。那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只身深夜潜来郭村送情报，使我们赢得了好几个钟头的宝贵时间，真不容易。

二十八日拂晓，李长江部队进攻的枪炮声果然打响了，这姑娘还酣睡未醒，她太劳累了。

## 保卫郭村

郭村的地形确比吴家桥好，吴家桥是七里长庄，摆成狭长一条线，不好守；而郭村三个庄子呈三角形，东边向泰州，是水网地带，北边张星炳部所占，也是水网地带，西边是运河、邵伯湖，不利于部队运动，只有南面和西南面是开阔地，利于部队固守。我纵确定保卫郭村以后，根据胡服同志固守一个星期的要求，进行了部署：将在

吴家桥地区的后方机关、医院分散到农村群众中去隐蔽，将随部队到达郭村的地方机关、后方机关全部集中郭村；在郭村构筑工事，设置防御阵地；由于全部只有一团和纵队特务营合计四个营的兵力，一团全部担任防御，北面以一个营防御张星炳进攻，两个营在南面、东面防御李长江进攻，纵队控制特务营为机动兵力。根据半塔集保卫战的经验，针对李长江各部政治态度不同，配合不会十分协调，张星炳攻击不会十分积极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以阵地前的短促突击，击退敌人进攻，稳定郭村阵地。

李长江为什么选择六月二十八日向郭村我军发动进攻呢？

以后查明，六月二十八日韩德勤发出电令：“决将该匪军就江都两泰各县境内及运河东西，并洪泽湖南北地区分别包围而歼灭之。”除授予八十九军等部武装进攻我军的任务外，电令规定：“着李总指挥（明扬）指挥所部及张星炳、何克谦、张少华各部队，并泰州常备旅迅速将江都、泰县境内各匪军一鼓而歼灭之。”可见李长江对郭村的进攻，是韩德勤反共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李长江部先后到达蓝家桥、白塔河、杨家桥、庄家桥、吴家桥、黄毛墩、麻村等地，形成对郭村的包围态势。六月二十八日拂晓战斗打响后，可以看出敌军部署和郑少仪送来的情报一致。李长江部队的来势很猛。郭

村西南面是旱地，一片坟包，便于敌军接近。果然，陈中柱一个纵队从那个方向猛扑过来，来势汹汹。这里我军只有一个加强连，李长江部队逼近我军阵地，子弹打到了驻在村西端的特委机关。我在阵地上，从望远镜中看到：李长江部队正以密集队形向我阵地扑来，在我军密集手榴弹反击下仍是蜂拥而上。我判断很可能这是李军主攻方向，立即命令特务营出击。在炽烈的火力掩护下，特务营一个猛烈的反冲击，将李军击溃。一小时后，特务营押着两百多俘虏胜利归来。从俘虏中一查，果然是陈中柱的部队。陈才福部从东南方向来犯，也被我军以反冲锋击退。其余各部李军气焰稍敛。激战至黄昏，李军仍不死心，倾全力占了郭村外面的小庄子，再次向我军发起进攻。在我短促反击下，歼其两个大队。这一天李军的总攻，共动用了十三个支队（团）。

二十九日拂晓，李长江发动第二次总攻。进攻的重点改在南面，战斗开始就很激烈。据俘虏说：李长江下了死命令，要陈中柱、陈才福坚决拿下郭村，并且对部队许愿，打下郭村，放假三天。旧军队的所谓“放假”，就是任凭奸淫掳掠。这就更激起我军民的无比愤怒，斗志愈加旺盛。郭村人民冒着炮火直接支援战斗，纵队司令部侦察连连部驻地的房东全家上了战场，由老大爷领着，男女老少五口，扛着锄头钉耙，一上阵地就帮着修战壕，劝说他们下去也无效。年轻人偷跑到战场与战士

一起作战，老奶奶送来麦饼、猪肉……。部队也打得特别顽强和勇敢。教导队队长蒋鹤林亲自端起机枪向突破了前沿阵地的敌军猛扫，硬把那些兵痞压了下去，自己也身负重伤，高呼口号，壮烈牺牲。一团参谋长廖政国患疟疾，发烧四十多度，躺着昏昏沉沉的，听到枪声紧密，越打越近，硬撑着爬起来，抱病带领部队出击，把李长江部队打得抱头鼠窜。激战终日，终于把李长江部队击退到离郭村二里路的王家庄。

三十日，比较平静。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熟悉李长江的草包脾气，程咬金三斧头，只要挡住他前三斧就好办。他连续两天拂晓进攻，吃了苦头，会不会改在夜间攻击呢？夜战是我军特长，对手一般说不会采用这一战法，但郭村我军兵力薄弱，防御空隙大，李长江也就有可能在夜间将他的第三斧砍来。北面张星炳那里估计不会有积极动作；西南、南面都已经攻过，连续碰壁；东边还没有攻过，这个方向是个空隙，水网地带，由颜秀五二纵队担任进攻，颜部攻得不积极，我们防得也不严密，李长江很可能选择这里乘虚而入。根据这个判断，我加强了东边的防御，派廖政国同志带一个营去，夜间派出游动哨，发现李长江部队正在运动，我即主动出击，短兵相接，把进攻之敌逐出数里以外，李长江的进攻尚未形成就被粉碎了。

此时，突然收到少奇同志六月二十九日来电：八路

军五纵队因日寇“扫荡”不能如期赶到，新四军五支队也因大刀会所阻，无法增援。我一看，急得浑身冒冷汗！江南我军正在遭受冷欣的进攻，一时过不了江。惠浴宇同志带了一个连去接陈毅同志，但被隔在新老洲。千斤重担全部压在我身上了！

正在此时，陈毅同志急电调来增援的苏皖支队，由陶勇同志率领，跨越天扬路，夜渡邵伯湖，穿过日寇封锁线，日夜兼程二百里，到达了郭村西面的杨家桥、麻村一带，与我们取得了联系，并于当夜进入郭村，分担了对北面张星炳部的防御任务。这样，郭村我军增至七个营的兵力，形势有所缓和。

战斗的第四天，也就是七月一日，我和陶勇、管文蔚、韦一平、张藩、吉洛等同志开会研究，认为八路军五纵队和新四军五支队已不可能来援，江南部队也一时来不了，如果仍按原定部署固守待援，旷日持久，如韩德勤投入主力参战，前无救兵，后无退路，万一失利，后果不堪设想；如今我们已有七个营兵力，可以抽出一定力量进行局部反攻，打破被包围的局面。遂决定由一团乔信明团长、刘先胜政委率领两个营，向扬泰线出击，趁李军后方空虚之际，直取宜陵，撕开缺口，打通与吴家桥地区的联系。一团两个营连夜出发，插入李军后方，以坚决勇猛的动作一举攻下重镇宜陵，横扫敌阵，歼灭李长江部队三个支队（团）部。

这时，陈玉生同志率部起义，在四团接应下，到达了吴家桥地区，控制了江南江北的交通要道。王澄、姚力等同志也在泰州北面的港口率领李军五支队四大队和重机枪连暴动成功，逮捕了反动的支队长陈东生，进入郭村。这样我军兵力就相当于五个团了。非但兵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而且打破了李长江的包围，郭村到宜陵到吴家桥连成一片，使江南部队能够顺利北上，北上之后也有了集结基地。

李长江损兵折将，头破血流，一气之下，从泰州城跑到了前线。七月二日拂晓，李长江亲率高级军官指挥部队向郭村发起猛攻。我们除留少数部队监视和抗击张星炳、颜秀五两部外，全力反击。在李长江亲自督战下，李军的攻击气焰重起，整团整营的兵力猛扑上来，逼近我军阵地。我一团一营不断反击，但一进入开阔地就遭到李军火力压制，无法前进。廖政国同志抱病上阵，带着部队冲出圩子，展开了白刃战。苏皖支队将张星炳部的进攻击退后，由参谋长张震东率领一个营，从另一个方向向李长江部队侧击。刺刀撞击声里，李军的攻势被打垮了。李长江三次总攻，被歼三个团，击溃十个团，对郭村的包围被粉碎了。

清理战俘中，发现了反共骁将陈中柱，衣衫破碎，狼狈不堪。

战局大变，攻守易势，李长江部队溃退到塘头，李



长江本人仓皇逃回泰州城。陈玉生部队和四团由吴家桥开回郭村，我军全部集结在郭村、宜陵之线。

## 有 理 有 节

七月三日，惠浴宇同志把陈毅同志从新老洲接到郭村，纵队和特委的负责人都去迎接他。我们以为打了胜仗，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他骑在马上气鼓鼓的。我想：噢，怎么回事？陈老总下了马，我向他敬了礼，伸出手去，他一面和我握手一面说：“本来我是来骂你们的，一个多团就和这么多的顽固派乱揪！噶，你们打了胜仗，我还有什么好讲的！”

纵队司令部召开了作战会议，部署反攻，陈司令员也出席了。会议决定发起全面反击，攻取塘头。陈毅同志也主张一不做，二不休，扩大战果，打下塘头。一则塘头是产米区，税收多；二则塘头控制着我军东进必经的大河。全面反击的部署是：以陈玉生、王澄部队留守郭村；以一团一个营控制宜陵，两个营和四团正面进攻塘头；以苏皖支队迂回到离泰州城西七里的九尺沟，切断塘头李军归路。我请陈毅同志作指示。陈毅同志说：“很好，就这么办吧。不过，不准打进泰州城，要留有余地。我们还是‘灭敌、联李、孤韩’的方针。两李是地方势力，争取他们中立，完全是可能的。李长江发动进攻，

稍予惩治是必要的，现在他已经碰破了头，得到了教训，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争取其和我军合作抗日则更为重要。只有这样，对抗战，对开辟苏北根据地才是有利的。”

于是我纵队和苏皖支队分路出击，一举夺取塘头，俘虏李部官兵近两千，直逼泰州城下，先头部队占领了位于九尺沟的泰州城外的碾米场。

陈毅同志明确规定追击不准越过九尺沟，但是枪炮声从东南方向逐渐移向正东，从郭村出发迂回九尺沟的苏皖支队的追击方向上，枪声越来越远。陈毅同志曾三进泰州，熟悉地理位置。他刚刚进屋子去，忽然又跑了出来，脸色严峻地对我说：“不对头，不对头，这枪声好象已经过了面粉厂！叶飞，你听，怎么搞的？”

“命令上规定得清清楚楚嘛！”我说。

“命令不保险噉，你赶快去处理。”

“我马上派参谋去。”

陈司令员虎着脸说：“不行，你自己去，骑马去！传我的命令：谁没有我的命令进了泰州城，我杀谁的头！”

我飞马赶去，到了九尺沟一看，果然有人过了河，是苏皖支队的的一个连。我找到陶勇同志，对他说：“你们部队过了河啦！陈司令发脾气啦！”谁都怕陈司令发脾气，陶勇同志一看是我去传达命令，可见陈老总的脾气发大了，一面说：“进城是不敢的噢！”一面叫号兵吹号调兵。

果然，过了河的部队乖乖地回来了。

陈毅同志派出新四军服务团团团长朱克靖同志到泰州和两李谈判。朱克靖同志在北伐战争时期曾经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李明扬任第三军副军长，两人交谊颇深。朱克靖到泰州，李明扬也从兴化赶回收拾残局。朱克靖同志代表陈毅同志表明诚意：为顾全大局，“不打泰州是尊重友军及老前辈”，希望两李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八个字来推动抗战。陈毅同志又亲自给李明扬通电话，再次表明新四军为了团结抗战，愿意与他重修旧好。李明扬对此求之不得，连忙放出挺纵谈判代表陈同生、周山同志，赔礼道歉，派专使陪送回挺纵。陈毅同志又应李明扬要求，释放李军俘虏七百余人，发还部分缴获枪支，再次表明新四军的诚意；并要求李明扬团结抗日，如果将来韩德勤进攻新四军时，两李应保持中立。李明扬对此一一答应。

### 有关郭村战斗的评说

郭村保卫战迄今将近半个世纪了，历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有人说：郭村战斗不该打。

到底该不该打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察。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将摩擦中

心由华北移向华中。一九四〇年春以后，华中的反共风云日紧，摩擦事件纷至沓来。三月，韩德勤自恃兵力雄厚，在皖东进攻江北指挥部；六月，又奉蒋介石之命发动反共进攻，“决将该匪军就江都两泰各县境及运河东西，并洪泽湖地区分别包围而歼灭之。”李长江是奉韩德勤电令进攻我军的，我军不论在郭村或吴家桥，都在“包围而歼灭之”的范围之内。我军退避江南又为何呢？李长江对郭村的进攻，只是蒋介石策划的由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同时从南、北、西三路向新四军大举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苏南，冷欣指挥四十师、六十三师等部围攻我军，江南指挥部被迫退到溧武公路以北。六月十五日，李长江即将进攻郭村之际，陈毅同志决定率主力渡江北移，而冷欣紧追，袭击我军；十八日，我军奋起还击，于西塔山地区歼其两个团，余部溃逃。江南我军尚且被迫北上，挺纵如果退避江南，失去大江南北的交通枢纽地带，重辑江北时，必然要付出很大代价，势必严重影响江南主力转移苏北的方针。

李长江进攻郭村之前，先要解决陈玉生支队，这是不能不接援解救的。苏北我党领导的武装，如瞿犊王进部队、陈文部队已遭顽固派并吞，党组织被破坏，领导人惨遭杀害，殷鉴不远，不能再蹈前车之覆！

我军发现李长江有发动进攻的迹象后，曾派代表去泰州谈判，接待李军参谋长来郭村视察……等等。都是

为了尽量避免武装冲突，至少争取拖延时日，以待陈毅同志率江南部队渡江北来。但李长江挑起战火的决心已下，扣留代表，部署进攻，不仅冲突避免不了，拖延也拖延不下去。我军是被动的受攻击的一方，李长江是主动的进攻的一方，打上门来了，不打怎么办？总不能束手待毙，只有坚决自卫。所以，郭村保卫战不是该不该打的问题，而是挨打后该不该自卫的问题，如果从这方面考虑，就会得出相应的结论。

有人说：两李是中间派，不该打。

上面已经说过，郭村战斗是自卫。这里牵涉到的问题是：对待中间派是否只能团结不能斗争？其实，中央军委《关于对待中间派方针的指示》（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说得很清楚：“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我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对其一部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配合。”

我军进驻郭村，虽然这是两李地盘，但处于两李侧后，原想避开两李，直接顶到韩德勤的下巴颏下，省韩来攻则粉碎之。李长江来攻，并不在乎郭村弹丸之地，而是在省韩唆使下，自恃强大，背信弃义，妄图在我江南主力北渡之前，解决陈玉生、王澄两部，消灭挺纵，确是“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害我之根本利益。”中间派

是摇摆于进步势力与顽固派势力之间的中间势力，可能为我争取，也可能摆向顽固派。对待他们，“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能一切斗争否认团结，而是综合两方面的政策”，从斗争中求团结则团结存，从退让中求团结则团结亡。“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这是团结；“坚决打击，作为警告”这是斗争；“中途妥协，言归于好”这是经过斗争后取得的新的团结。我军自卫，这是“有理”；“对其一部给以坚决打击”，这是“有利”；“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配合”，这是“有节”。事实证明，对李长江的“警告”是有作用的，黄桥决战中两李中立，也包含这一因素，他们在挺纵一个团的面前还打了败仗，何况江南主力都已北来，不得不慎重考虑后果。陈毅同志决定不攻泰州城，是很英明的，又给予两李一定好处，做到了“打后仍求得互相配合”，否则两李无路可走，就把他们推到省韩那里去了。

中间派也不是铁板一块，第二个“五·四”指示就提出：“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就两李内部来说，李明扬和李长江不一样，张公任和陈中柱不一样，颜秀五和陈才福更不一样。对这些人 and 他们的部队都要作具体分析，不能形而上学。例如张公任，属CC系，但他支持抗日，对我军态度较好；陈中柱与陈泰运同属黄埔系，前者反共坚决，后者则摇摆。而且中间派也和任何事物一样，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变化、重行组

合。李长江后来就由中间派转化为投降派，公开投敌，我军方针也就“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有人说：郭村之战风险太大。

郭村之战确是冒了很大风险，不仅是冒孤军作战的风险，又冒分兵援救陈玉生的风险。

惠浴宇同志告诉我，他到新老洲接到了陈毅同志时，郭村战斗已经打响，陈毅同志急得跳脚骂娘，当然除了埋怨胡服，就是骂我了，骂我冒失鬼，初生之犊不畏虎，还说：这下好啦，就你叶飞和管文蔚能逃出来，就叫我收容啦……等等。

我一直等陈老总批评我，然而，他在干部会上讲话都是表扬。他这个人就是这个好，我那么违抗他的命令，换了别人那还了得。但陈毅同志却是只要你做得对，他就不会见怪，所以我敢对抗他。所以，他一进郭村的那句话，也很清楚，意思是说本来要大骂一顿，现在打了胜仗，有理了，还能批评你们？

部队出击之后，我去看陈毅同志。他正写好一首歌词，随手递给我。那歌词题名《保卫郭村》，笔名：绛夫。

六月二十八，炮火沸腾，  
顽固派十路进攻包围郭村，

想断绝人民的生命，  
想歼灭抗战的孤军。  
顽固派三次总进攻，  
冲不破军民合作的血肉长城。  
顽固派反动的大“扫荡”，  
激起了反共营垒的起义革命。  
孤军怒吼了，转守为攻，  
顽固派被打得豕突狼奔。  
孤军英勇，领导坚强，  
是胜利的核心。  
军民团结，友军起义，  
是胜利的保证。  
反共阴谋，又被粉碎，  
日寇胆落，汪派震惊。  
我们保卫了郭村，  
创造了苏北的光明。  
我们保卫了郭村，  
我们更要大无畏的前进，  
前进，前进，向前进！

⑦  
陈毅同志非常严肃地说：“叶飞同志呀，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一仗虽然打胜了，可是叫作不可为例。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以后你再不能这样冒险了。危险哪，如



果打不赢，你全军覆没！你懂不懂？”

我说：“我懂！”

“你什么时候懂的？”

我说：“接到胡服同志二十九日电报，我是一身冷汗，手都发麻啦！援军来不了，只能完全靠自己解决战斗了。”我想：你就狠狠地批评我吧！这不能怪少奇同志，当时中央决定要建立华中根据地，他就为完成这个任务到华中来的。要建立华中根据地，必须解决苏北问题，八路军和新四军才能打成一片。而解决苏北问题的最好时机已经错过了，再也不能延误了。问题是如何具体执行他的指示。

郭村保卫战的最大的风险是孤军作战，孤立无援。华中敌后处于敌顽我三角斗争中，而我方处于劣势，关山阻隔，封锁重重，兄弟部队能否来援，来援部队能否按时到达，把握都是不大的，真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因此每战都要有独立作战的把握。郭村之战预计固守一星期就可有援军到达，是讲得太绝对了，也是执行得太机械了。还是陶勇同志星夜兼程来援，否则更为艰险。郭村我军如果打败了，甚至全军覆没，江南部队过不来，堵在铁路以北长江以南那个狭小地区，将陷于极为不利的地位。陈毅同志着急也就着急在这里，生气也就生气在这里。

其次是救援陈玉生时，冒了分兵的危险。郭村本来

兵力不多，加上分兵，偏偏李长江此时来攻，风险更大。但陈玉生部是不能不救的，否则就要被李长江消灭。而且陈玉生部的基础在泰兴，对以后的东进黄桥和苏中三分区的斗争都起了一定作用。

战斗总带有一定的冒险性，何况我们也有克服不利因素的条件，那就是陈毅同志所作歌词中写的：“孤军英勇”、“领导坚强”、“军民团结”、“友军起义”。除了这四点，还应加上一点：苏皖支队及时来援。

有人说：郭村之战战役战斗上是打胜了，战略上却不是胜利的。

我觉得这种说法，并没有理解陈毅同志讲话的实质。当时的战略任务是向苏北发展，建立华中根据地。少奇同志说：“发展华中，开辟苏北，不光是新四军的任务，而且是全党的任务。在相持阶段中，放手发展人民力量，不光是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还为了抗战以后中国革命的前途。”所以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中央军委毛（泽东）王（稼祥）电令：“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两万人枪。严令叶飞订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靖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韩德勤部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因此，陈毅同志于郭村战斗刚结束的七月九日给中央的电报说：“此次战斗证明，历来对两李上层争取，积极发展其中、下层的

路线是正确的，而且将大桥巩固南北，以便向天长、扬中、仪征地区发展，打通西路，转而东进的路线亦是对的。在八天战斗中，两李以强大兵力企图歼灭我军，管叶部以攻势防御，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得到大的成功。目前，江南一支队已渡江会合，江南指挥部已陆续渡江，造成我军争取苏北发展的良好环境。”

当时的战略任务是发展苏北，任何战役战斗必须服从这个战略任务。没有郭村战斗的胜利，江南部队过江以后，光是吴家桥弹丸之地，无法集结，无法休整，给养困难，很难立脚。郭村战斗打赢了，打开了局面，从宜陵到塘头都占领了，把郭村地区和吴家桥地区联成一片，陈毅同志称之为“我军对苏北之进攻出发地”，“奠定了站稳苏北脚跟的开始”。事实证明，郭村战斗是东进序曲，是黄桥决战的前奏。

解放后，郭村战斗拍成了电影，片名就叫《东进序曲》。这部电影拍得挺生动，刘少奇同志还特地请来访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观看这部影片，并向他介绍说：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正确运用斗争策略的一个好例子。

## 第十五章 战黄桥

### 东进！东进

郭村保卫战胜利以后，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苏北问题了。陈毅同志于七月五日致电中央并新四军军部、中原局：“两李进攻已被击退，要求停战。我们意见：击敌、联李、孤韩为和平基础条件，使两李能为我们领导下的力量，使省韩、两李破裂。”

韩德勤在进攻郭村失败后，就煽动当时还在兴化城的李明扬，可以发给李明扬一笔“剿共”特别经费，还可以支援一大批弹药，八十九军还可以出动助战。

李明扬举棋不定：是俯首听命于韩德勤的摆布，还是和新四军讲和呢？中间势力总是有空可钻，何况，新四军方面以前还有一些交往呢。他决定连夜赶回泰州再作决定。

李明扬回到泰州，就接到朱克靖同志带来的陈毅书信和一首诗，信固情真，诗更意切。这诗就是《陈毅诗

词选集》中的《送友人赴泰州谈判抗日合作》：

停驂问战意如何？  
词婉情真再致书。  
军令今当斩马谡，  
歧途何事泣朱杨？  
仲连智免蹈东海，  
武穆冤成走传车。  
凭君寄语强梁辈，  
摩擦自我慎厥初。

诗中既用了斩马谡的例子，警告李明扬如果再打下去，丢师失地，难逃一“斩”；又望李明扬不要彷徨，如杨朱歧途哭泣而返；劝说他学鲁仲连保持中间力量，而不要象岳飞蒙冤身亡。在我军释放被俘人员，归还缴获的部分枪支，放弃占领地区，停止进攻泰州等一系列的政策感召下，李明扬终于摆脱了痛苦的抉择，还是走左右逢源的老路以保存自己。

这就是郭村战后，能与两李言和，趁机东进的历史背景。接着，我军又让出郭村、塘头、宜陵，并把吴家桥、大桥一带的三十里老防区及每月税收五万元一起让给两李，进一步巩固了与两李的团结合作关系。

七月八日，粟裕同志率领江南指挥部及老二团、新

六团，在江南西塔山地区，击溃了顾祝同、冷欣所部的进攻，渡江北上，到达吴家桥地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将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指挥，刘炎、钟期光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叶飞，下辖第一团（原新四军老六团）、第四团（原挺纵四团）、第五团（王澄起义部队）；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下辖第二团（原新四军老二团）、第六团（原江南新六团）、第九团（原江抗二团）；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刘先胜，下辖第三团（原苏皖支队）、第七团（原挺纵二团）、第八团（由挺纵、江都游击队和苏皖支队一个连组成）。全部共七千余人，数量虽不大，但统一了指挥，部队面貌一新。

江南主力北上以后，苏北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蒋介石、韩德勤绝不会允许我们在苏北敌后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在顽我之间将有一次决战，必须做好充分准备。

对于我军以何处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指挥部参谋处提出了向北和向东的两个方案。向北，就是北进兴化，直捣韩德勤老巢。理由是：郭村向北就是韩德勤地区，张星炳保三旅驻地，我军直接从郭村向张星炳进行反击，直趋兴化。但是我们挺进纵队的领导同志都不赞成，熟悉苏北情况的同志也不赞成。虽然消灭张星炳

旅是有把握的，但韩德勤必出兵打我，向北是水网地区，既宽且深的河道密如棋盘格，部队行动必须船只，难以展开，更难于迂回包抄打运动战和歼灭战，对我军不利。而且很快就和韩德勤主力作战，对于刚在江北会师立足未稳的我军来说，准备也不够充分。这个计划只有八路军南下到兴化附近，打下兴化即与八路军会师时才可实施。当时八路军南下部队才过陇海铁路，相距过远，时机不成熟。向东，东进黄桥。理由是：第一，黄桥处于泰州、泰兴、如皋、靖江之间，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可以控制四县，并可向南通、海门、启东发展，我军控制这一地区后，就可与江南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而且切断了韩德勤与江南冷欣的联系。第二，盘踞黄桥一带的何克谦部保安四旅，是一支土匪游杂部队，建制上属于韩德勤，实际独立为王。该部一贯勾结敌伪，猖狂反共，特别是对黄桥地区的人民苛捐杂税，绑票勒索，无恶不作，人民恨之入骨。有的军官赌红了眼，用拉出了弦的手榴弹向当铺当银元。有个团长应地方士绅招待宴饮，团长的马弁却钻进后房强奸了士绅的女儿。这支队伍如被消灭，数县群众和绅商无不拍手称快。如果知道我军东进，肯定会派人来敦请哩。第三，黄桥地区是农民暴动中建立红十四军的地方，革命影响较大；抗战初期，上海党又派人来进行活动，组建了工委和县委，发展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青年建国团，

群众基础很好。另外，开辟黄桥，韩德勤由于何克谦是他忌恨的野马，未必全力支援；待我军建立黄桥根据地后，他必不能坐视，如远道来攻，李明扬则隔河观火，我军就有了一个比较理想的战场，可以进行顺利的决战了。以上的向北、向东两案相比，当然就没有争论地认为东进黄桥为最佳。

陈毅同志把这一决心于七月十四日报新四军军部转报中央和重庆周恩来同志：“决定整顿一周，向东挺进”，“在泰兴、靖江、如皋、南通建立根据地，以黄桥为中心。”

于是，苏北新四军唱起“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一响亮的歌声。

## 胡服方案

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日，胡服与邓子恢同志联名致电陈毅并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并致彭、项、叶、黄，这一长电首先阐明了他们关于华中战略问题的意见，分析比较了大别山、伏牛山、苏北这三个地区的利弊，指出指出苏北最利于我发展，必须取得苏北，为整个中华建立一个总的巩固的根据地。

少奇同志提出了有关下一步作战计划的意见。这些意见气魄很大，在军政双胜方面也考虑周到，但在斗争策略，发展方式和战役组织上与陈毅同志的打算大不相



同。

少奇同志的计划是：陈毅所部暂不去黄桥，在原地“让韩李集中部队从东北方向”向我进攻时，我军“以逸待劳，严阵以待，最好在他来攻三五天之内我不作大出击，在原地则应准备独立坚持两星期至一个月。”以便在政治上向全国舆论和苏北群众证明“蚌自彼开”；在军事上则等待与配合强大的增援部队的到来，共同进行决战。少奇同志准备组织八路军南下部队和新四军四、五支队作数百里大迂回，“以便在东台及其以南击溃韩李主力”，“赶走韩德勤，最好李明扬也同时赶走。”

可以想见，这样一场决战，规模巨大，是半塔集保卫战的发展和扩大，也是少奇同志指示我回苏北后进行战斗的发展和扩大。如获胜利，则将一举而囊括苏北。果能如此，则华中局面就可以立即打开，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计划就可以获得决定性进展。

胡服方案应该说是完全符合中央的路线方针的。陈毅和粟裕等同志研究后，对他们原来拟定的苏北作战计划作了两个带关键性的决策：

第一，“独立布置发展苏北工作。”陈毅同志根据长期作战的经验，也根据郭村战斗中待援不得的情况，深感到日伪顽的阻挠和铁道、公路、河川、湖泊的阻隔下，不能把远道增援作为战役部署的基点，而应“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以独立作战为原则”。这就不可

能采取“一气打到底”的办法，而是“有限度地、有步骤地巩固发展”，“采取逐步跃进的姿态”。

第二，团结争取两李。胡服方案显然是根据郭村两李围攻的行动来估计，两李会与韩德勤配合向我进攻，因之说让“韩李集中部队从东北方向”向我进攻时，把李明扬也“同时赶走”。但郭村战斗之后，经过一系列工作，已经消除了两李与韩德勤配合向我进攻的可能性，韩德勤也就不可能越过两李防区向我进攻。因而，陈毅同志密电上报说：“只要我们今后争取得法，两李有由中立可争取进一步。同时，韩部之中间分子更有倾向我们的可能。”

事实很清楚，这并不是路线和战略方针的分歧。任何具体战役、战斗都可能有多种方案，当然其中有最佳方案，最佳方案的施行取得胜利，并不说明其它方案是一无可取的，或就是错误的。

七月二十三日，苏北指挥部仍维持原议，并电告中央、新四军军部和中原局，开始东进黄桥。

## 扎根黄桥

部队在扬泰地区休整了一周，在塘头整编了部队，在一个地主花园里，开了连以上干部的动员大会。陈毅同志作了动员报告，他激昂慷慨地说：我们这次东进是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必须争取胜利。如若失败了，就只好下长江喝水；只有胜利了，整个苏北的局面才能打开。大家要下最大的决心，必须打败敌人。当时，形势确实十分险恶，七千之众面对敌伪和十万顽军，而且宜陵、塘头又交给了两李，根本不能西返。

当时，非但是宜陵、塘头、郭村交给了两李，以后又将大桥、吴家桥的老防区让给两李接管。这一地区每月税收五万元。就象有人认为两李是中间派，只能团结，不能斗争，打上门来也不能还手，否则就会把中间派打跑了这种片面性一样，还有一种片面性认为陈老总搞统战老是自己吃亏。这后一种片面性主要是目光短浅，看不到“予中间派以实利”，也就换取了顺利东进，而且为以后各保安旅团都纷纷派代表来联络打下基础。

七月二十五日出发东进，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我军通过口（岸）泰（兴）线上的寺巷口、缪湾两李防区时，李军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以掩盖韩德勤耳目，我军佯作夺路而过。

韩德勤接到保四旅何克谦的报告：发现“新四军自宣家堡东侵，张公任部已撤走。”韩德勤亲自打电话给李明扬，问是否有新四军大举东进？人数多少？为什么不加阻拦？李明扬答曰：有此事，缪湾一带正在激战，据报新四军“伤亡惨重”，一部绕道东去等等。並请求“副总座”即予补充弹药。

韩德勤绝没有料到我军会放弃既得地区而全师东进，就命令何克谦保四旅由黄桥及其以南地区向北攻击，同时命令陈泰运税警总团由曲塘南下至北新街一带，妄图南北夹击，消灭我军于运动中。

我军对何克谦、陈泰运两部决定采取不同对策。对陈泰运以惩戒，目的在于警告他不要跟着韩德勤制造摩擦打内战，应该团结抗日；对何克谦则予以歼灭。遂以第二纵队为左路，保障侧翼；第三纵队迂回，断敌退路；第一纵队为右路，直取黄桥。

我二纵队行至北新街以南时，陈泰运部已进到薛家堡、北新街一带。指挥部命令二纵队调头北上，击溃陈泰运两个团，歼其一个多营。战后，我方如数遣返了俘虏，还主动送还了部分枪支。陈泰运大喜过望。这个陈泰运，刚刚由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苏鲁战区设计委员、北伐时代的老共产党员黄逸峰同志从兴化软禁中营救出来，“奉命用兵”，碰得头破血流，当然正中下怀，表示愿与我军共同抗日。而对我军来说，陈泰运驻曲塘，在黄桥以北，正好作为与省韩之间缓冲地带，便于我军集中全力歼灭何克谦部。

何克谦不知死活杀向前来，正好是你来打我，我师出有名。二纵队攻击黄桥以北的蒋垛、古溪、营溪；三纵队迂回，攻取搬经，截断何克谦退路；我纵队直捣黄桥，攻击该镇及其以南地区。经七月二十八日一夜激战，各部

胜利完成任务。我军于二十九日凌晨解放黄桥。此战歼灭何克谦主力两千余人，何部特务团四百余人在陈宗保同志率领下起义，编为新四旅第一团。

部队在黄桥镇稍事休整后，就进至如皋、如西地区。一团乘胜攻克靖江东北的西来庵镇日军据点，四团攻克孤山伪军据点。积极准备反击日伪军“扫荡”和反顽军摩擦的战场，以及开创根据地的工作。从黄桥溃散之敌，散布农村为恶，扰乱农村社会治安，各团分散进剿，俘获人枪很多，人民得以安居生产。

我军到达黄桥时，沿途群众夹道欢迎，而且热烈要求我军长期驻扎，保护地方，打击日寇。八月初，成立了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恢复了黄桥周围四个区的行政工作，由一纵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同志兼任主任，开始收税征粮，解决部队供应，粉碎国民党想从财政上、给养上卡死我们的阴谋。八月下旬，成立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管文蔚、陈同生同志分别任正副主任。同时成立泰县、泰兴、如皋、靖江四个县政府，由惠浴宇、陈同生、梁灵光、刘万里同志分任县长。

为加速根据地的建设，准备韩德勤进攻，苏北指挥部、军分会于八月二十日下达了《对于创建黄桥大根据地的指示》，着重指出：“目前的工作任务，积极充实主力，严格整训部队，努力民众运动，建立民主政权的基础，随时准备迎接反‘扫荡’、反摩擦的胜利。”并对上述

各项工作提出了具体的方针和任务。这样，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逐步开展起来。

临时行政委员会颁布了抗日民主施政纲领、“二五减租”法令和群众团体组织法。当“二五减租”的口号提出后，引起了苏北社会的反响。地主阶级听了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宣传，害怕“变相共产”、“慢性革命”；广大农民希望实行当年红十四军时的“打土豪分田地”，认为“二五减租”不解渴。我们一面以各种方式向农民、地主士绅解释减租法令，一面组织群众成立农抗会，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为培养军政干部，成立了苏北军政干校，吸收了大批知识青年；开办党员训练班，训练提高新党员；出版《抗敌报》（苏北报）；成立抗农会、妇抗会、青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

我军也得到了扩大，单是八月份就扩充新兵一千二百名以上。主力扩大了，地方武装也建立了，通如靖泰行政委员会警卫队二百多人，如皋县二百多人，靖江县一百多人，泰兴县五六十人，区里也建立了二三十人的武装组织。

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以最快的速度建设得初具规模了。

## 联床夜话

回头来说当年难忘的一夜。

陈老总的指挥所设在老叶庄。我军把何克谦的进攻击溃，粟裕同志随二纵队亲临前线。应该说：一切顺利，胜局已定。这里已近江海平原，入夜凉爽宜人，陈老总把我找去秉烛谈心。

陈毅同志沉重地说：“你那个六团不简单，土地革命锻炼出来的，党的精华啊！这些老战士久死一生，斗争经验丰富，一个人将来都可带一个连或一个营。把这样的部队同国民党拼掉了，我们要成为历史的罪人哪！”

我想不到一开始他就如此严肃，心情顿时沉重起来。我理解陈老总对郭村之战还有话跟我说，但此战也不是我冒失到不计后果而打起来的，未免感到委屈。当时就把半塔集驰援，少奇同志面授机宜，如何决定转移到郭村，以及后来决心保卫郭村及作战情况一一细说。

陈毅同志听我汇报到少奇同志关于当前全国形势和华中特点的分析，他很有力地“嗯”了一声。一说到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陈毅同志很动感情，香烟一支接着一支抽。当我说到少奇同志分析在相持阶段中，放手发展人民力量，不光是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还为了抗战以后中国革命的前途时，陈毅同志深有同感

地说：“新四军到江南已经迟了，武装都给‘忠救’抓去了，苏北也给韩德勤、李明扬抓到手里，我们不得不在反摩擦中求得发展。苏北我军力量单薄，我这才下决心把兵力集中到苏北，这才有放手发展的条件。”

我一听此话，就觉得陈毅同志和少奇同志对于“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早有具体打算，一九三八年就派挺进纵队过江控制江北江都县的嘶马、大桥一带狭长地区，作为向江北发展的桥头阵地。

陈毅同志轻轻吁了一口气，说：“郭村打起来，叶飞啊，我真着急啊！”

我告诉陈毅同志，当时我们到郭村，是把两李甩到侧后，准备韩德勤向我进攻，哪知道反而是两李来攻！

陈老总笑了：“韩德勤学会了蒋介石的一手了，拿杂牌军打先锋。两败俱伤，他就可得渔翁之利嘛。”

陈老总弄清楚了胡服并没有叫我打两李，我也不愿打两李，既然逼上门来了，是应该打的。打胜了，形势很好；打过头了，就要坏大事。他根据中央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决定不打泰州的方案，对两李打了又拉。

陈毅同志突然问：“你为什么说江南是机会主义路线？”

我愣了。

陈毅同志又直截了当地问：“你怎么没有回复我的



电报呢？有气？”

我说：“当然有气。”

事情是这样的：增援半塔集回来，我向纵队和特委的领导同志传达了少奇同志的指示以后，不久就收到陈毅同志一份电报，措辞严厉，责问我从半塔集回来后为什么说江南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我回答：陈毅同志怎样反对中央？我接到电报，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从说起；也有点窝火，怎么弄出这样的事情来了呢？电报中很难说清，准备过江当面向陈老总汇报。但去江南一趟来回要十天半个月，日寇“扫荡”，李长江挑衅，不可能离开这么长时间，战事一起，也就顾不上了，也没有回电报说明此事。现在当面开门见山谈，我就乘此机会说：“我传达胡服同志的指示讲得很清楚，他说陈毅同志对项英同志的错误是有斗争的，是与项英同志不同的。他还说，陈毅同志不执行项英同志那一套，不照他的办，想办法向东向北发展，是执行中央路线的。”

陈老总深有感触地说：“我是两个合法，两个非法！为了求得革命事业的发展，常常要合法掩护非法。”

这一点，我是有体会的。东进要用江抗的招牌，北上要用挺纵的名义。我也不得不先后改名“叶琛”，“聂扬”，向三战区请长假，另外编个新六团。即使这样，对项英同志还冒“非法”风险。我知道陈老总是煞费苦心的。

陈老总有点激动，他说：“江南没有委派县长，这并不是执行皖南的指示，也不是我陈毅不敢这样做！”

我了解陈老总的脾气，敢作敢为。他既高瞻远瞩，全局在胸；又深思熟虑，处事周详。

陈老总深深地吸了两口烟，平静下来了。他说：“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茅山地区就建立了有各界代表参加的抗敌总会，这是半政权性质。打开扬中后，项英同志要我们接受国民党派来的县长，韩德勤派来一个，冷欣也派来一个。我说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吓走了，成立了我们的扬中办事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嘛。”

陈毅同志是很严格的。他从不 在下级面前讲新四军领导的路线错误，也不讲他与项英之间的矛盾。我在东进之前有一点感觉，但也不好细问。如今，他知道我了解一些情况，才如此敞开心怀。

陈老总吐了一口烟，看着烟圈散去，吁了口气说：“现在好了，可以和中央直接通报了。”

我看着陈老总，为他感到高兴，但也有点怅惘，想起了他给我的那份电报……。

陈老总好象知道我想些什么，宽慰地说：“有人打了你的小报告，说你这样说那样讲的。我到郭村以后已经弄清楚了，你不仅政治上没有错误，组织上也没有错误，事情清楚了，也就完了。你呐，也不要问是哪个人打的

小报告了。”

我知道，陈老总很注意党内团结，即使我问，他也不会告诉我的，我也没有去问。

深夜，我留下与陈老总联床共眠。秋风习习，静无人声，我却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入睡。

老叶庄夜谈，我汇报胡服指示以及我从半塔集回来后的一切做法，不但解除了陈毅同志对我的误会，无意中，也加深了陈毅同志对少奇同志的了解。以后，我有机会读到陈毅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深刻诚挚的发言，其中讲到刘少奇同志时，他说：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南下，到华中执行毛主席的主张时……他做的工作并不多，但做了两件主要的事情，对全局解决了重大的问题。一件事是进行了反摩擦，号召新四军及全党进行了自卫战争，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反对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就是把华中新四军中一部分干部，甚至很多同志对顽固派精神上的屈服，不敢反抗，不敢向他们开枪，动摇犹豫，怕破坏统一战线，又怕打不赢，从精神上解放了。把放在自己身上的包袱放了下来，就自由了。这样就敢打顽固派，一打即能胜利。这是一个重大的关键。有些人怕打顽固派，怕破坏统一战线，怕党外叫，怕党内有人批评，怕国民党军队多，新四军弱小，怕打不赢。少奇同志南下回答了这个问题，鼓了鼓气，一定要打，非打不行，而且一定要打赢。现

在讲起来很简单，很容易解决，但那时临到这个问题时，可就脑子发烧，睡不着觉，不能解决，失败就在这个地方，因而精神上解除了武装。”

陈毅同志还说，少奇同志做的另一件主要事情是：“千百万群众发动起来了，实行了减租减息，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里就不摘抄了。

少奇同志对陈老总也是信服的，八月二日致电陈毅并报毛、朱、王的电文中，明确地提出：“苏北各部队（包括八路军南下部队及渡河支援的四、五支队）将来由你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少奇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报告《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中，评价苏南工作时说：“我军在苏南活动最久，且在陈毅同志领导之下，自始即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统一战线政策及敌后建立根据地与发展抗日武装部队的方针；因此，我军在苏南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在不断地打击日寇的战斗中，在群众中建立了很好的信仰，部分地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又由下而上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苏南各阶层人民直到现在都是拥护我军的，或对我军表同情。”

老叶庄陈老总与我联床夜话，我是永远记在心里的，这确实是共产党人胸怀坦白赤诚相见，同志间的深厚友谊。

## 营溪战斗

韩德勤对我军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部队迅猛发展，群众运动轰轰烈烈，感到莫大的威胁。他调动兵力，调整部署，补充弹药，策划向我军进攻；但为试探我军虚实，又故作姿态地派代表与我军谈判，表面上与我军拟定防区，省韩、两李与我军“三方各守原防，努力抗战，一切纠纷，静候上峰处理”，并约定“韩部驻守海安、曲塘、姜埭一线不南下，新四军东进部队驻黄桥、蒋垛、营溪、花园桥之线不北进。”

陈毅、粟裕同志判断韩德勤实是缓兵之计，待其主力集中后，必然对我军发起突然袭击。

果然，韩德勤在蒋介石、顾祝同的命令下，开始了军事行动。八月二十三日，在东台召开了三天军事会议，韩德勤认为：北面的八路军兵力强大，西面新四军四、五支队“兵力亦厚”，“且湖泊不易作战”，南面新四军陈毅部兵力较少，充其量不过三、五千人，如以主力进击，必可收效。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先南后北”的方针，先集中主力消灭或驱逐陈毅部，然后移兵北上，逐歼八路军黄克诚部。八月三十一日，韩德勤于东台副总司令部下达了作战命令，要求各部“向黄桥附近地区攻击前进”，歼灭“盘踞分界、黄桥一带之匪”，“特派李总指挥明杨

为进剿军总指挥，李军长守维、李副总指挥长江为进剿军副总指挥，并派李副总指挥长江兼右翼进剿指挥官，陈指挥官泰运为副指挥官，郭参谋长心冬为左翼进剿军指挥官，刘师长漫天为副指挥官。”

八月三十一日，陈毅同志根据情况急剧变化，致电中央，并报胡服、叶挺、项英，力主“八路军部队应迅速南下，主力要在省韩未攻我前，先行占领盐城一线，五支队则应先占领平桥、宝应之线，才能配合我们一举解决苏北问题，否则要失良机于万一。”另一方面，他也下决心“积极准备单独解决决战任务”。少奇同志积极支持这一意见，他与邓子恢同志于七月三日致电陈、粟，并报中央：“韩德勤已开始向你们进攻，这就有解决苏北问题的极大可能。现决以九个团参加，由苏北全部南下，配合你们解决韩之主力，完全占领盐城、东台、兴化、阜宁四点。这对我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在华中之作战地位具有决定意义。”但是，从八月中旬起，苏北、皖东发大水，交通受阻。韩德勤为了“先南后北”，实行南攻北守，又焚烧船只，加强对运河、旧黄河、射阳河等水道的封锁。因而，四、五支队及黄克诚部难以完成任务。少奇同志就建议陈、粟“准备两星期至一个月的独立作战”，“在开始时，只进行防御战，不作大的出击，而向全国发出呼吁，以争取我之政治理由。”

九月三日，韩德勤开始进攻。以两李、陈泰运及保

三旅编成的右翼军，在姜埝附近集结完毕；以八十九军的一一七师、独立六旅、保一旅组成的左翼军，在曲塘、胡家集、海安附近集结完毕；分别经蒋垛、古溪向黄桥攻击前进。这个战斗部署由陈泰运透露给我们了。

右翼军两李和陈泰运部在我军有效争取下，进展迟缓；左翼军是进攻主力，大胆冒进。陈毅同志的意图是歼其左翼军，因一一七师是省韩主力，拟集中一、二、三纵队全部兵力，采取以退为进、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分割围歼的战术。他对我们说，不是一一七师到古溪就打，还要引诱他深入一点。古溪正好在黄桥、曲塘的中间，相距各二十余里，要是把一一七师再放过十里，脱离他们后方，离曲塘就有四十里了，如果到了古溪就打他，后路不容易切断，也就不容易歼敌。

九月五日，保安一旅占领了营溪。同一天，一一七师打到古溪北面，随即猛攻古溪，炮弹在古溪镇上到处爆炸。古溪有我军的医院、修械所，也都挨了炮弹。如果我军还要向后撤退十里，古溪的坛坛罐罐就得大搬家，就得组织群众扶老携幼地转移。

那时，部队士气正高，求战心切。二、三纵队比一纵队还想打，他们一路打来，虽然也抓了几百人枪，但那是杂牌军、老爷枪，远远没有吃饱。我们这些指挥员习惯进攻，只要手上有几支能打能冲的部队，就不甘心老是“挨打”。粟裕同志是前敌指挥，随二纵队行动。

我们部队才集结，还没有展开，粟裕同志就召集王必成、陶勇和我去研究出击问题。我估计是王必成同志发起的，撺掇粟裕同志立即出击。粟裕同志问我们的意见，三个司令员没有一个反对的，大家都嗷嗷叫，要出击，都说不要再退了，就出击，有把握。

商量结果，出击部署是：五日夜，以一纵队为迂回部队首先攻克营溪，先解决保一旅，然后向西迂回到一一七师和独立旅的后面，以切断韩军主力的退路；二纵和三纵则于六日拂晓一同从古溪正面出击，准备在前后夹击中，歼灭韩军主力四个团。

粟裕同志把大家的强烈愿望和具体部署报告了陈毅同志。陈老总“哼”了一声，问道：“能够切断古溪敌军退路吗？”粟裕同志作了肯定的答复。陈老总又反复询问了一会，最后说：“那好吧，你们这么有把握嘛！”

按照部署，我一纵攻打营溪，一举歼灭了保安一旅的两个团，马上打扫战场，调整组织，吃饭喝水，继续前进。可是拂晓抵达预定地区时，一一七师等部只留下尾巴了。因为营溪被我军攻克后，八十九军参谋长郭心冬就慌了，准备后撤。拂晓时我军进攻开始，他用少数部队火力掩护，主力很快撤走了。这下，由于我军反击过早，没有让他进占古溪，再放他十里，他后方较近，我穿插不断，追击不及，让他缩回去了。正面进攻的部队缴获人枪也不多，我军没有完成歼灭韩军主力的任务。



十里之差，竟成了大问题。

应该说这是一个胜仗，我们一纵就歼灭了顽军两个团，以后释放这些被俘人员，对他们宣传合作抗日、不应反共的民族大义，使保一旅旅长薛承宗大为震动，成为以后一度合作的基础。而且，韩德勤的主力部队气势汹汹而来，狼狈不堪而逃，黄桥人民欢欣鼓舞。陈毅同志来到雅周庄的前敌指挥所，我们三个纵队司令员以为打了胜仗，高高兴兴地去见他，他却脸孔铁板，火气比我在郭村见到时还要大，把我们吓坏了。陈老总倒是不骂人，只是说：“有把握，有把握，包打，好，包到哪里去了？叫你们不要急，把他放进来再打，硬不干。看，你们打得好吗？还不是放跑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一声不吭。他想了一想，又说：“好吧，也是我同意的了，没得话说了，接受教训吧！”

现在想来，诱敌深入等战法，连没有听过炮声的学生也能够写篇论文，说个一二三的，做起来可不那么容易。鱼儿进网啦，总想赶快扳起来，能耐心，可得有军事修养啊！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没有古溪我们的冒失，也可能没有黄桥决战时韩军的冒进；没有我们在古溪的教训，也就没有黄桥决战时的诱敌深入。研究历史如果孤立地看一点，肯定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

我们几个冒失鬼没有打好，却使我们有不少长进，

我们才真正懂得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门学问。

## 姜埝战斗前后

古溪之战是韩德勤对我军的一次试探性进攻。他在受挫之后，改为“堡垒推进”方针，指令当过汉奸的反动家伙张少华的保安九旅进驻原税警总团防地区姜埝，严密封锁黄桥地区的粮食通道，并挟制李明扬、陈泰运两部，企图逐渐压缩我军于沿江狭窄地区，勾引日伪军对我合击。

在古溪战斗同时，天长、六合两地日军增加到一千五百余人，骑兵数百人。九月五日，日寇攻占皖东地区和津浦路东我中心地区的马家集、竹镇、半塔集、汭涧等地，与韩军的进攻遥相呼应。

张少华虽然是“反正”的伪军，但和日寇仍互派代表，明来暗去。他的部队来往于长江两岸，由日寇派兵护送，在江南经常袭击我军，难怪与日军配合如此紧密了。他所盘踞的姜埝本来是陈泰运的驻地，加之监视两李，陈、李对张少华也视为眼中钉。张少华一到姜埝，就杀害我军地方武装十余人，对绅商绑票敲诈，罪行遍地，加之粮食禁运影响人民生活，因此，他们纷纷请求我军讨伐张部。

九月十三日，我二、三纵队围攻姜埝，二纵队主攻，

一纵队在白米、马沟一带打援。二纵队以“勇敢队”两个排担任突击，砍断电网，从碉堡丛中猛插进去，首先打掉了张少华的司令部，经一昼夜激战，一举解放姜埝，歼敌千余。

陈毅、粟裕同志根据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决心集中兵力于黄桥附近，在八路军南下的战略配合下，作独立迎战韩军的准备。为保持政治上的主动，我军再次发动士绅向韩德勤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韩德勤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埝”，妄图混淆视听，制造进攻新借口。为了揭露韩德勤的这一骗局，进一步争取中间势力，于九月二十七日在姜埝召开军民代表大会上，陈毅同志慷慨陈词，断然表示，为了团结抗日，愿意退出姜埝，并一再呼吁和平：“新四军进驻黄桥以来，对省韩曾作极大让步，屡次致电省方，希望能够和平，大家团结一致。古溪战斗，我军停止追击，放回俘虏。可省方竟将我军十人杀害。此次我军攻打姜埝，再教训省方一次，仍然希望得到和平。如果省方以为我们力量不足而退出姜埝，仍旧进攻，我们就要采取必要的自卫，为祸为福，只好以将来的事实作证明。”这得到了所有代表的同声赞叹。黄桥朱履先就说：“如果你们退出姜埝，省韩还来进攻，则是欺人太甚，万分无理，不但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们，省韩必遭苏北人民共弃！”

九月三十日，我军撤出姜埝，通知李明扬、陈泰运来接防。李明扬喜出望外，因为“金姜埝、银曲圻”是苏北富饶地区，财政收入多，我军又主动送给陈泰运一百多条枪，韩德勤一无所获，加深了与李、陈的矛盾。两李和陈泰运再次表示愿意中立。韩德勤却视我军退出姜埝为软弱可欺，进一步提出无理要求：“新四军一定要撤出黄桥，开回江南，才可进行谈判。”各界人士闻讯后无不愤然，海安的韩国钧也怒骂韩德勤：“小子无义，天必殛之！”

韩国钧是海安人，当时已是八十四岁高龄，清末拔贡，当过知县，民国初年任安徽省民政长，又当过江苏省省长，在苏北上层人士中威望很高，韩德勤统治集团的不少重要人物给这位老人送过“门生”帖子。象这样的一位老先生，争取他的同情赞助是十分重要的，但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九四〇年春，陈毅同志到泰州城时，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介绍，与韩国钧通讯信，互赠对联，渐增交谊。

朱履先，黄桥人，早年追随孙中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时，他率三十四标在南京响应，后又参加反张勋复辟，是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阅兵典礼时的阅兵总指挥。这时虽然归隐，但在通如靖泰一带，发言还是颇有份量的。

陈毅同志一到黄桥，就拜访了朱履先。两人性格都

很豪爽，交浅而能言深。朱履先老人得知国民党当局竟然不发给新四军一个铜板军饷，怀着义愤之情，出面并带头在绅商中募集捐款六万元给新四军，并积极向我军建议开征田赋。朱履先又致函韩国钧，为陈毅同志作了介绍，陈毅同志亦附函致意。很快得到韩国钧的反应，表示愿意“筹划进行”从中调解，合力对外，不使内部摩擦。

我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加上陈毅同志的文韬武略，书棋风流，使韩国钧、朱履先倾倒不已。由韩国钧领衔，加上朱履先和当地绅士胡显伯、黄辟尘、关云山等二十五人，致电重庆战地党政委员会黄炎培，转致吴稚晖、钮永建、叶楚傖、冷遹、江问渔、夏敬民、余井塘、洪兰友等江苏籍人士，并“恳转委员长钧鉴”。第一个电报控诉苏北十数万军旅不能收复失地，日惟排斥异己，活埋青年，虐待人民，内战不休，“仰恳中央疾电江苏省府息战停争，或派要员蒞苏，挽救危局。”第二个电报则是专门控诉粮食封锁禁运和韩军贩粮资敌的，口气也很激愤。意思很明显，韩德勤不行，请另“派要员蒞苏”。

当我军一退再退，而韩德勤竟然出动大军，狂呼把新四军赶到长江里去喝水！以致韩国钧老先生气极，不禁深深喟叹：“大敌当前，犹拥兵内战，自然民心厌恶，士卒离心，以骄矜之将，遇必死之师，焉有不败之

理！”

顽固派失掉民心，失败在等着韩德勤了！

## 黄桥鏖战（上）

黄桥决战在军事上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有些人常把真理绝对化。毛主席的军事指导思想，歼灭敌人必须以多胜少，需要三倍、四倍，甚至五倍以上的兵力。孙子也说，“十则围之”，要超过敌人十倍才能包围。而黄桥决战，韩军十万，我军一万；战场上呢，韩军二万五千多主力，我则全军不足一万！

是不是以少胜多就违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不是以弱胜强就不符合自古以来的兵法呢？

并不是绝对的。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就列举了鲁齐长勺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有名大战。而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指出：“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之。”

陈毅同志是从我军南昌起义失败后，从实战中锻炼出军事才能，习惯于长期战争中的“以弱胜强”，在黄桥决战中得到了充分发挥。陈毅同志在黄桥决战前后的统

一战线工作是得到中央表扬的，至今人人赞誉，而他在黄桥决战的军事成就却被淹没了。黄桥决战是陈毅同志军事上的杰作，是“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的典范。

与陈老总在姜埝召开军民代表大会的同时，韩德勤在东台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进攻黄桥的计划。他以为我军撤出姜埝是“匪胆已寒”，“不敢与我作战”。于是在九月三十日，韩德勤密令：“集中力量，力求主动”，“应不惜牺牲，达到最后目的”，将新四军“包围而歼灭之”。韩德勤部署了三路大军：两李和陈泰运的部队为右路军，约一万二千余人，攻击我军黄桥以西防线，并掩护中路军的进攻；左路军由第一、第五、第六、第九、第十共五个保安旅的大部组成，约七千人，攻击我军黄桥东南地区防线，牵制我军防御兵力；中路军是进攻的主力，兵力约一万五千人，以八十九军三十三师为左翼，向黄桥东面的加力、分界攻击，独立六旅为右翼，攻击黄桥北面，李守维亲率一一七师大部、军部直属队及炮兵为中坚，由营溪南下，攻击黄桥东北。韩德勤共组织了二十六个团、三万余人的兵力，发起黄桥战斗。同时，日军加强了对长江的封锁；沿江韩军也劫走了船只，以断绝我军退路。

我军仅七千余人，兵力悬殊太大，还要分兵防御可能配合进攻的泰兴等地的日军，形势十分严重。

为迟缓韩德勤的进攻，中央于十月二日致电周恩来

同志：“韩德勤又大举压迫陈毅，据陈毅称战事不可避免，要求黄克诚增援。因此，我部署方针，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的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少奇同志根据中央指示，致电陈毅、黄克诚同志，认为苏北目前确不应向韩采取严重的进攻行动，而应完全站在自卫立场，对陈毅部的增援如无中央明令南下，就以到达阜宁、益林之线为止。而陈、粟目前的作战方针“还应是独立打破重围，求得以速决为原则”，“在胜利后即以比较谦虚的态度言和，冲突可暂时停止。”

③ 陈毅同志与粟裕、钟期光、王必成、陶勇等和我在内的有关同志，经过反复商量，苏北军分委数度集体研究，形成了一个独立解决韩德勤的方针。就是说，在八路军及四、五支队的配合下（这种战略配合是非常必要的，陈毅同志后来在党的“七大”发言时曾表示热忱的感谢），并不固守两星期待援，而是以“独立作战为原则。韩如三路或两路来，坚决各个击破之。”（陈毅于九月下旬致毛、朱、王电）这“各个击破”就不仅是“打破重围”，而是要歼韩军主力了。因为多方争取了两个月的决战战机终于到来，按照陈毅同志和苏北军分委的意愿，即使援军不能到达（如胡服所料，赴援“事实上决不会快的”），也非歼韩军主力不可。事实上，韩德勤提出的是“决一死战”，我军提出“决战”，双方都很



明确。我们很清楚：韩德勤主力全部来了，胜败在此一仗，如果打赢了，就解决了苏北问题，如果打不赢，再也无处可退。韩德勤也清楚：要末“把新四军赶到长江喝水”，要么“苏北垂危”。他的“追剿令”写得很清楚：“此次决战关系苏北及我团体整个政治军事问题至大，事已至此，应不惜牺牲达到最后目的。”

我军退出姜埭后，已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有利地位：第一，揭露了韩德勤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我军的忍让求全的态度，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同情；第二，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地方实力派在韩我之间中立的可能性；第三，我军能够缩短战线，及时集中兵力，处于进行自卫反击的有利地位。我军虽然人数较少，但军事素质却不是顽军能比拟的，被迫自卫，背水作战，“哀兵必胜”。当然，除了上述条件外，要取得战役的胜利，还需要发挥灵活机动的军事指挥艺术。

这是抗战以来全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反摩擦战斗，如何对付顽固派如此规模的进攻呢？

当时有三种作战方案：

一种是给予韩军重大杀伤后，暂时撤出黄桥，乘顽军追击时，再集中兵力歼其一路。优点是兵力集中，便于机动，诱敌深入根据地腹部歼敌，这是红军一贯战法。但是，该地区北有运盐河，东有串场河，西有泰州到口

岸的运粮河，南有长江，并有泰兴城、靖江城等日寇大据点，回旋余地甚小。而且我军撤出黄桥，非但影响民心、士气，对中间派也必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晌。

另一种方案是全力死守黄桥，待韩军进攻失败后再出击。这个方案是有道理的，黄桥西南面有日寇大据点，北面省韩来攻，腹背受敌，此种战法可以应付敌顽夹攻的严重局面。但以当时的人力、物力来看，困难较多，最多只能击溃顽军而不能歼其主力。这样就会同前一方案一样，都会大大增加中间势力参战攻击我军的可能性。这样就不能决战，使苏北问题长期拖下去，于我不利。

陈毅同志主张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案。不是以主要兵力守黄桥，而是以少数兵力（约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坚守黄桥，吸引、迟滞、消灭敌人，主要兵力（约占总兵力的四分之三）则置于侧翼机动位置，当敌人遭我军大量杀伤后，择其一路歼灭之，并继续扩大战果，以求全胜。对中间势力稳定其中立；对日寇据点则大胆不管，只派少数侦察部队进行监视。有人担心：这样是否有风险？陈毅同志分析：当顽军大举进攻时，日寇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而韩德勤也不敢公开要求日军直接参与向我军进攻。只要此战能速战速决，日、顽联合攻我的局面不会出现。陈毅同志诙谐地说：“如果战胜了，苏北大局就定了，我们就可大发展：

如果失败了，那就算了。”他是充满必胜信心的。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了这一方案。战后，俘获的顽一一七师参谋长称赞说：出其意外！

根据这一方案，具体部署是：一、二纵队兵力比较充足，用于突击方向，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的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并由二纵队派出主力老二团的两个营配置于古溪至分界一线，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另以一纵队派一个营化装进入敌后，配合地方武装，袭扰敌人。三纵队全部人员不足两千，用于防守。当时，我考虑三纵兵力少，担当如此艰巨任务，确有困难，所以提出由一纵队抽一个团增强防守黄桥的力量。陈毅同志认为这会削弱突击力量。粟裕同志提出自己坐镇黄桥，陈毅同志同意了。陈毅同志的指挥所则放在黄桥镇西北十二里的严徐庄，指挥全局。

当时，管文蔚同志奉陈毅同志之命去见李明扬，李表示“严守中立”。陈毅同志听了汇报之后说：“我们打胜仗，他不会动；我们打败了，他就会来抢黄桥了。我们一定要打好第一仗，才能稳定他的中立。”在部署战斗时，又派朱克靖、黄逸峰同志到泰州“报聘”，安抚两李，并时刻警惕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方面及日伪方面派来的说客。陈泰运、各保安旅团也都派了人去。这就稳住了左右两路约一万七千人的兵力，使得我军能集中全部力量对付敌中路军的进攻。

根据一定要打好第一仗的考虑，选择独立六旅作为首战歼灭对象。这支部队是韩德勤所属部队中战斗力较强的，按一般的战斗原则先打弱敌，这战先打独立六旅这支劲旅，可收出奇制胜之功。如果首战歼灭了独立六旅，对于拉开两李、陈泰运同韩德勤的距离，稳定李、陈的中间立场将起重要作用；该旅是韩军中路右翼，把它消灭后，就把韩军的中路打开了缺口，可以实现对韩军的包围与迂回；主力首战被歼，必给韩军士气以严重打击，并使其他杂牌军不敢妄动。所以，首先歼灭独立六旅，将会对战役全局起决定性的影响。

首歼独立六旅也是有条件的。我们一纵在增援半塔集时就打过它，把它冲得落花流水，听说打这支部队，指战员的信心很足；其次，独立六旅只三千多人，不象八十九军两个师那么庞大，战斗不致于拖延太久而影响下一步；再次，独立六旅两侧按韩德勤的作战计划规定，由两李、陈泰运的部队列阵前进为掩护，由于李、陈已和我们有密约，我军可以埋伏在他们两路之间，背李、陈而击翁达。

问题在于选择适当的攻击时机了。

韩德勤出师不利，九月三十日暴雨，部队行动不了，而且参差不齐，七零八落。十月三日，雨过天晴，才向我攻击前进，分兵几路扑向黄桥，十月四日攻城，战幕拉开。

八十九军扑上来了，攻打黄桥。翁达比较有经验，被我一纵揍过一次了，独立六旅迟迟不上。四日上午，黄桥前沿工事以东三百米处的小焦庄失守。经过一个上午的争夺，黄桥东部的发电厂在中午时分也被韩顽军攻占。有些地方，顽军已突破了镇边的河沟，手榴弹都甩到了黄桥的街头。

这时，苏北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黄桥这个弹丸之地上来了。四日下午，李明扬宣布“谢绝会客”；而李长江的佛堂里，南京来的“和尚”，兴化来的“参议”，进进出出，空气紧张。陈才福的土匪部队竟然在我西北方向打家劫舍，开始骚扰……

我冒雨到阵地上巡视。正是青纱帐起，便于接近大路观察。四日下午两点左右，正当黄桥东门争夺战愈演愈烈，我军阵地一片烟火之时，翁达率领他的独立六旅出来了。我在青纱帐里看得清楚，这部队一路纵队前进，每人一顶笠帽，完全是旅次行军的架势，好不逍遥！大概翁达正得意哩，让八十九军打了头阵，“乘人两伤，后发制胜”，蛮以为新四军主力已在黄桥以东拼得焦头烂额，正是他直入北门，攫取头功的大好时机哩。前队过去，翁达和几个高级幕僚骑着几匹高头大马，在本队前头由大批卫队簇拥而行。它的一字长蛇，正好让我军切断围歼！

我立即电话报告陈毅同志：独立六旅在我枪口下

踉踉南行，毫无戒备，正是在运动中加以歼击的绝好机会。我建议不要等他攻到黄桥北门，立即出击，把他切成几段，一举歼灭该敌。

陈毅同志说：“能不能再放近一点？会不会太早？”

我说：“过去一个团了，现在在过本队……”

陈毅果断地说：“一定要看清楚，等独立六旅全部脱离高桥，再出击！”

我说：“从行军队形的间隔判断，后卫该出高桥了。”

陈毅同志立即批准我的建议，命令二纵队配合一纵出击，首歼翁旅。他大声说：“那就出击！注意，照单全收，一个人也不要放他跑掉！”

我立即命令一团分三个箭头，直插独立六旅的腹部，四团打其前卫，五团打其后卫。顿时，把这条长蛇的躯干斩成几段。独立六旅在局部被歼以后，收缩到土墩和独立家屋固守，其后卫团还猛扑高桥，企图打开退路。我五团已先机占领高桥，一场血战，把该部十八团打下去。一团团长乔信明同志看准顽军中有一大群挎皮包、拎箱子的军官拥着骑马的头头奔跑，断定是旅部，立即率领一营扑去。接着，二营插向敌阵，和三营配合，攻歼大股大股顽军。全团三个营分三路插向敌军第十六团。独立六旅首尾被攻，展开不及，被我军一个猛冲，乱作一团。

翁达发现我军向他进攻时，相距只有一里许，只好

率领乱糟糟的旅部奔进一个村庄，声嘶力竭地命令架设电台，摇机员却连人带机不知去向。翁达气急败坏地命令通信军官，带着卫士、传令兵找李守维求援。其他部队也溃退到两个村庄里。我一纵把这三个庄子团团围住……。

二纵队赶到高桥，独立六旅已经过完，没有打上，就机动灵活地插到南边去了。这样，我纵迂回包抄的部队和二纵插到路东的部队，把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的联系切断了。

八时许，陈毅同志亲自打来电话，询问战况。我报告说：“正把独立六旅围在三个村子里。”他说：“很好。”又问和王必成联系上没有？我报告说：他向南插，迂回过去了。

十时许，陈毅同志再次亲自打来电话。这时二纵队已到八十九军后面，发现李守维亲率一一七师的三四九旅三个团正向东南兼程急进。陈毅同志问十二点以前能不能解决战斗？我说：可以，没有多少敌人了，十二点以前完全可以解决。陈毅同志立即交代我：解决战斗后，队伍马上集结，作为二纵队的第二梯队，向南迂回包围，消灭八十九军。我报告说：俘虏、缴获都很多。他说：打扫战场，收容伤员，你们不要管，总部派人去。消灭敌人后，部队立即出发。

一团向我报告：一具倒在血泊中的尸体，看来是自

杀的，身边有一件绣有“翁达”名字的风雨衣……。

## 黄桥鏖战（下）

独立六旅被歼后，韩军主力第八十九军就完全暴露和孤立了。

担任黄桥守卫任务的三纵队，战斗异常激烈。八十九军的三十三师猛攻黄桥东门，陶勇同志指挥部队连续击退韩军进攻。东门阵地硝烟弥漫，一片火海。李守维亲率军部和一一七师三四九旅向黄桥急进途中，得知独立六旅被我军围歼，不但不去救翁达，反而在黄桥东北十来里的野屋基停留下来，紧急构筑工事。

根据指挥部部署，我二纵队于四日夜，插入三四九旅和八十九军预备队的空隙，经过八字桥，赶向如（皋）黄（桥）公路上的分界地区，切断韩军退路。一纵队根据战斗结束先后，在午夜之前，依次出发，向东穿插，绕过分界以北。一、二纵两路夹击，将三四九旅和三十三师全部分割包围于黄桥东北地区，配合三纵出击，首先歼灭三十三师主力。

五日上午八时，我率一纵各部先后到达指定地点，在距离野屋基七八里处的独立家屋设下指挥所，立即与二纵取得联系，查明敌情，勘察地形，组织进攻。于此同时，命令部队休息待命，不进庄子，露天休息，争取睡眠两



小时，恢复体力，以利再战。

二纵已于拂晓开始攻击小二房庄的三十三师，并与三纵取得联系，战斗正酣。

正在此时，只听得野屋基方向枪声绵密。原来是李守维得知翁旅被歼，三十三师又正被我二、三纵围攻中，知道情况不妙，即率一一七师企图向东逃窜。正在此时，四团团长廖政国同志带着部队来到野屋基附近的小村庄，忽然发现桑树林里人马杂乱，不象我军。他立刻派二营营长焦勇同志去搜索。一下子就抓到了十几个俘虏，其中一个竟是八十九军军部的副官。当时，两军都在不断变更部署，我军上下都不知道八十九军军部正在野屋基。这一审问，便查明了他们统率机关的位置。焦勇问道：“李守维呢？他在不在野屋基？”俘虏说：“也在。”焦勇马上报告廖政国，并且建议趁李守维不知道我军已到他的侧背，猛一下捣烂他的军部，活捉李守维！廖政国是何等样人，胆大包天的！大腿一拍，立即采取断然行动，一面派人找纵队部报告，一面就指挥部队突然向野屋基进攻。

枪炮一响，一团也立即投入战斗。

于是四团从东南面，一团从东北面，向野屋基进攻。随后，五团也从三里庄向东插去，向东南方向攻击，这一下把八十九军军部打得大乱。

八十九军李守维部是韩德勤赖以横行苏北的军事支

柱，人多武器好，是顽军在苏北最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李守维慌乱一阵后，还想作困兽挣扎，组织火力拼命抗击我军进攻。我军在野屋基东北的土坝上，顶住了大部队顽军的突击。李守维甚至组织敢死队，一手快慢机，一手大砍刀，和我军肉搏拼杀。韩军要突围，子弹箱反正带不走，机枪真如急雨一般扫射。四团五连长马飞云左臂的伤口里不偏不差地射进了二颗子弹。一团政治处主任曾如清的军挎包上穿了两个子弹洞，又一颗子弹把军帽帽沿穿了个洞，帽子被掀落在地，居然没有伤及皮肉，真是靠马克思保佑！据指挥部告诉我：二纵攻打三十三师也十分激烈。所以陈毅同志战后向中央报告说：“拼刺刀七八次”，“空前恶战”。

我赶到一团指挥所，一团长乔信明同志看到我来了，立即带着警卫员赶到第一线去了。

黄昏，在前沿开了个小会，乔信明、廖政国一致同意，趁着夜幕来临，进行近迫作业，挖到距野屋基二百米时，发起攻击。

半夜以后，我军突进野屋基，逐屋争夺，战斗更加激烈。二时许，李守维终于顶不住了，带着军部向北突围。他们溜到挖尺沟河边，只有一座小木桥，人马挤成一堆，木桥边沿断了，人马纷纷落水。我军在北面警戒的一团三营立即开火，顽军又向西边突。李守维的军部躲避在小周庄后靠河边的窑里，一面仓促组织火力掩护。

一面驱赶士兵下水，企图泅水过河。我一团三营追到河边，向泅渡的韩军猛烈开火。李守维骑着马仓皇逃窜，在人马践踏中，抢先过河逃命，因躯体肥重，连人带马淹死在挖尺沟河中。

顽军不善夜战，加上建制已乱，好象一群没头苍蝇到处奔跑。我纵队指挥所刚从野外坟包丛中移到村头小屋，架起电台，点上蜡烛，打开地图，便听得一片杂乱的脚步声。探头一看，黑压压的尽是人影。急忙吹灭烛火，奔出屋外。我和张藩同志带着指挥人员及电台竟和突围败军混到一起了。我们一看他们是乌合之众，便命令司号长把顽军带到河对面我担架连方向去。司号长一声高喊：“弟兄们，不准乱跑，跟我来！”顽军乖乖地跟着过桥。担架连一下抓俘虏五百多人。

李守维的三四九旅不愧是李守维的嫡系，李守维把他们丢了以后，他们仍在野屋基拼死抵抗。我一纵发挥白刃肉搏特长，终于将他们压倒。溃散之敌，陷于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一片“缴枪不杀！”“宽待俘虏！”呼喊的感召下，纷纷缴枪投降。

至此，韩军主力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消灭殆尽，其余如保安十旅、保安三旅、保安五旅之大部也被我军消灭。

粟裕同志看清海安是个军事要冲之地，是个十字路口，控制了海安，就能割断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四

县顽军和海安以西韩军的联系，而如果省韩急调生力军来固守海安，我就不易攻克了。那么，黄桥决战就没有取得战略上的全胜。他抓住刚从江南过来的四团三营（舒雨旺营）等部队，要他们“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舒雨旺等率部队马不停蹄，占领海安。

十月十日，八路军进抵盐城，新四军进抵东台，两军先头部队便在盐城、东台之间的白驹场以北通向刘庄的桥头胜利会师了。

这是华中创建苏北根据地的胜利，也是南北两支红色队伍胜利发展的成果！

## 战争奇观

四十年代初，在一望无际的苏北平原上展开的黄桥决战，出现了一个奇观：韩“主席”在与我们大战，他的部下和日军却在看热闹。

韩军与我军激战，上面已经作了介绍。

抗日战争期间，难道日寇能“观战”吗？如果了解当时国际、国内情况，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了。那时，汪精卫以国民党名义，已经“国府还都”，蒋介石也正和日寇勾搭，“曲线救国”论甚嚣尘上，如果说日寇希望亲自出马，消灭我军和抗日力量，还不如说他们更希望借

顽固派之手“剿灭”抗日力量更为合算。当然，日寇也是精于计算的。黄桥周围的伪军都在据点里集合待命，大小头目在碉堡顶上用望远镜观望。泰兴的日军一部也前出到黄桥以西二十三公里的姚家岱观战待机。

至于“中间派”力量更是积极了，有些人还准备“捞一把”哩！可能他们比日寇的精神还要紧张。李明扬守在电话机旁，按时听取战况汇报。李长江派出当副官的亲侄子，带了参谋和传令骑兵为联络人员，驻在严徐庄陈毅同志指挥所附近村落，随时飞骑报告战况。陈泰运在运盐河堤上设立联络点，经常转报黄桥消息，有些尚未参战的保安旅旅长也不断打来电话询问军情，查明虚实，以定他们的进退。

我们如果打败了，看着吧，无数恶狼都会立即扑将过来的。

第一，我们没有打败，而且全歼了独立六旅和八十九军；第二，陈毅同志给他们做了不少工作，晓以民族大义；第三，对新四军的威力还是畏惧的，特别是李长江所部和薛承宗保一旅，伤口还没有愈合哩！

当然，他们的态度是根据战况的发展而转移的。

且说李明扬，他明明向管文蔚表示“中立”，然而在十月四日下午听说黄桥吃紧时，就闭门不出，谢绝见我军代表，逼走好友朱克靖了。听到独立六旅被歼后，却又要朱克靖打电话探听虚实。那电话正好是王于耕同

志接的，一听朱克靖询问，知道李明扬就在旁边，泰然回答道：“家里很好。人都出去了，刚才陈司令员来了命令，叫我们准备打扫战场，收容俘虏。”朱克靖同志问：“陈司令员怎么样？”王于耕同志说：“很好。昨天下午我看他在打篮球。”这是确实的，翁达被围以后，陈老总确实投了几下篮，以示庆祝。朱克靖又问：“江南的部队来了没有？”王于耕说：“来了，有的已经打出去了，有的正从这里过哩！”这当然也是真的，只是国民党军方面的情报是江南来了“两个团”，实际上只是两个营。战局急转直下，李明扬也就吃了“定心丸”了。

那个李长江呢，居然钻进佛堂里去念经了。南京来的“和尚”，兴化来的“参议”，进进出出。他在大伦庄的前线指挥所里，几位纵队司令颜秀五、丁聚堂、陈中柱、陈才福摆开八仙桌又麻将，准备韩、我双方两败俱伤，坐收渔利；更准备我军败退，好先抢占黄桥。翁达被歼，这几位司令从麻将桌旁直跳起来，把桌子上的蜡烛也碰倒了。陈才福怒斥报信者是“造谣”，“胡说八道”。颜秀五、丁聚堂则认为有此可能，新四军是厉害的，碰不得。那位当过我军俘虏的陈中柱，满腔怨恨地说：“杀敌一千，自伤八百，新四军的伤亡也不会小罗！”不管怎么说，韩德勤败了，他们也没有油水可捞了，继续打麻将吧。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朱、王批转陈毅《关

于苏北统战工作与主要经验》的电文中，总结了十条经验：

（一）我们始终遵照中央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

（二）我们首先击破了党内凡国民党军黄埔生皆顽固派的过左估计，同时纠正战斗开始即统战终结的观念，坚持政治前行、军事后行的原则，对顽固派应一面拉、一面打，先拉后打，先打后拉均应活泼运用，反对一味蛮干或一味退让。

（三）予中立派的实利，不至独吞，主张蚕食渐进，反对鲸吞冒进。

（四）充分调查对方情况，每一个集团它都有一个基本利益和中心要求，不要轻易去违犯它。

（五）充分利用问候、送礼、写信及许多私人关系，同时知道统战对象的人事关系是很重要的。

（六）态度谦虚，措词和平讲礼貌。打了仗还要做到拉，向他们说服。他们最要面子，无论如何不伤他的面子，不能答应的事不要马上拒绝，推下去过后自然不提。

（七）上层联络应有下层配合，但不能盲动，两李部下两团反正是如此。

（八）如作战缴得武器，立即退还一部分，向其讲和，每每得到成功，对于顽固派欺骗的部队最有效用。

（九）苏北对统战的缺点在于我们部队不能普遍了

解上述策略，许多自高自大、狭隘、贪小利的观点仍然存在，仍须作深入教育。

（十）现在两李与税警团有联合组织中间集团向我分肥之形势，同时又有受蒋、顾贿买继续省韩反共的可能，但尚有进一步与我合作的可能。中心决定在我们，反对目前即向两李开刀，仍然力争其进步，再同走一段路程。此外，韩德勤残部及各保安旅长，亦按中央争取友军建立外围军的办法在做工作。

## 巩 固 胜 利

遵照中央指示，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进一步揭露蒋介石、韩德勤的反共阴谋，我军与韩国钧、李明扬商定，在曲塘召开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但是，韩德勤却要求我军让出东台，并要把会议改在泰州召开。

陈毅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后，于十月三十一日在曲塘召开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会议由韩国钧、李明扬主持，黄逸峰为东道主。陈泰运、朱履先、吴云山、各保安旅、地方绅士和八县代表、我军代表共三十余人参加。因韩德勤拒派代表出席，改为谈话会。会议决定苏北各部队团结抗日的临时办法四项和基本改造苏北局面办法八项。陈毅同志在会上发言说：各方能承认新四军、八路



军在苏北的政治地位，则八路军、新四军愿与各方合作，制止阴谋家扩大反共范围，各军就原防立即着手进行必要改革，立即计划出动抗敌。他还说：新四军顾全和平大局，已竭尽智能，此后内战责任应由对方负责。韩国钧、李明扬在会上也发了言，主张调停，共同抗日救国。韩国钧以八十四岁高龄自始至终与会主持，毫无倦意。老人对这次和议条件及通电异常重视，要大家都在记录上亲笔签名，要李明扬单独发电给蒋介石，并要他当众起稿，由老人转发重庆。最后，由韩国钧、李明扬联名发出通电，呼吁实现苏北军民党政抗敌合作，国共大团结，以实现抗战建国纲领。

黄桥决战前，李明扬、陈泰运等提出由黄逸峰出面领导一支部队。陈毅同志和苏北指挥部为消除李、陈的疑惧心理，应他们的要求，同意在我军与李、陈之间建立缓冲地带，由黄逸峰同志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面，组织一支我党被导的、担任统战任务的外围军队，番号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苏鲁边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一九四〇年十月十日，经苏北指挥部批准，联抗司令部在曲塘正式成立。部队由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保安一旅各派一个连组成，收编了白米、曲塘两个常备中队，吸收了一批爱国青年参军，编为四个大队。刘少奇同志曾对联抗

连以上党员干部作过重要讲话，阐述了党的外围军队的作用，肯定这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创造，并用实际经验指出，山西“新军”和苏中“联抗”是存在于敌后执行特殊任务的党的外围军队。联抗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内，于特定的地区，去完成主力一时尚不能完成的特定任务。陈毅同志给联抗讲话时，明确地说：“你们名义上不是新四军，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的一部分。要以新四军的标准来改造部队。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持统一战线，要实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发动群众，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所以“联抗”是黄桥决战胜利后的产物，名义上不属于任何一方，实际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武装。它的任务是继续争取李、陈，做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也担任监视和相机进剿顽敌的任务。以后，李长江投敌，陈泰运部队大部分顽化或伪化，保三旅被消灭，“联抗”完成了历史任务，一九四四年十月正式隶属于新四军，归苏中三分区建制。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刘少奇、黄克诚、曾山同志先后到达海安，与陈毅、粟裕、陈丕显等同志一起研究了苏北的形势和任务。少奇同志指示，要建立能得到群众认可的合法政权，就要群众自己来选举，不可能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或委派，只有用参议会的办法，广泛团结各阶层人民，选出政权机构，才能取得合法地位。

按照这一意见，十一月十五日，在海安召开了苏北临时参政会，出席会议的有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十四个县的代表，共三百八十八人，其中共产党员七十二人，占五分之一弱。大会选举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议长；选举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自此以后，如皋县、泰东县、泰兴县、如西县相继召开了参政会，建立了民主政权，开创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新局面。

为了保卫和巩固、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从八路军、新四军已经会师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央书记处批准，成立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十月十七日，华中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在海安召开。会上，由少奇同志宣布中央军委决定：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在叶挺来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统一指挥华中八路军、新四军。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十月十九日，国民党以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诬蔑坚持华中抗战的新四军、八路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同时又以汤恩伯、李品仙部三十万大军压向华中，李品仙叫嚣“交还”整个皖东政权；韩德勤腰杆子也硬了起来，要新四

军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十一月，皖东一带桂军麇集，声言增援苏北，其先头七个团，占领津浦路为中心地区周家岗、界牌集等地；一一二师霍守义部队以“武装调停摩擦”为由，从山东南下，进至淮阴苏家嘴一带。韩德勤会同一一二师先后攻占凤谷村、益林、东沟等地，并有继续扩张之势。

为了击退蒋介石对华中的大举进攻，保卫华中抗日根据地，华中总指挥所决心争取先机，发起曹甸战役，歼灭韩军残部，彻底解决苏北问题。

我军集中主力十个团，分三路由东向西攻击前进。十一月二十九日发起战役，相继攻占了北宋庄、蒋营、陶家林等地，并完成对安丰、曹甸、平桥等地方的包围。十二月十三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第二纵队及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总攻曹甸韩德勤的主力所在地，十五日突破其前沿阵地，重创韩军。由于曹甸工事坚固，新四军、八路军初次配合作战，又缺乏水网地区攻坚作战的经验，战斗准备也不够充分，因此曹甸屡攻未克，部队伤亡较大，不得不撤出战斗。

曹甸战役历时十八天，歼韩军八千余人，又一次削弱了反共势力，缩小了反共阵地。韩德勤从此一蹶不振，蛰居一隅，再也没有力量与我军较量了。

曹甸战役后，苏北指挥部决定将部队分散，协助地方党政机构接收各县政权，推行抗战法令，进行民主改

革，开展统战工作。一纵队部署于靖江、泰兴、泰县、如西地区，二纵队部署于东台、兴化、盐东地区，三纵队部署于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

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了发展和巩固时期。

## 第十六章 反投降 反伪化

### 讨伐李长江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一面对八路军、新四军疯狂“扫荡”，一面对国民党大力开展政治诱降活动。英、美则由奉行绥靖政策转变为援助国民党抗日。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大举反共时机已到，恣意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紧接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苏北时，我正在盐城参加华中局召开的纵队以上干部参加的第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我听到皖南军部遭到国民党军的进攻，十分气愤，也非常担心。我在增援半塔集时，刘少奇同志给我看过有关军部北移的来往电报，总感到要出事情，果然在北移途中，遭到了国民党背信弃义的进攻。在会议期间，少奇、陈毅同志不断向大家传达了中央、华中局和皖南军部的来往电报，让我们了解事态的进展。记得叶挺军长在一

月十日电告中央军委：“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极为悲壮，令人忧虑。叶挺军长在一月十一日又有电报说：“本军五昼夜不停与五、六倍之敌激战于重围，计划又告失望，现将士疲劳过度，只好固守一拼。惟士气尚高。……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以后，就失去了联系。过了两天，即一月十三日，围攻皖南新四军军部的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通电称：“已歼灭新四军七千余人，奉令对新四军应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与会同志极为气愤，纷纷找少奇、陈毅同志，请他们建议中央进行反击。有人还具体建议：我们苏北包围韩德勤，山东包围国民党的省主席沈鸿烈，迫使顽固派对皖南军部停止军事行动。实际上，为时已晚，皖南部队除约二千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央决定在军事上坚决进行自卫，在政治上展开猛烈反攻，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反共阴谋。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任副军长，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华中部队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第一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委，我任副师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一纵编为第一旅，我兼任旅长、政委，

张藩任参谋长，吉洛任政治部主任。二纵编为第二旅，王必成任旅长，刘培善任政委，杜屏任参谋长，陈时夫任政治部主任。三纵编为第三旅，陶勇任旅长，刘先胜任政委，张震东任参谋长，卢胜任政治部主任。

此时，侵占苏中的日寇是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七师团一部，以后又增调第十二独立混成旅团全部。伪军数量不多，战斗力也不强。敌伪势力只控制浦口、六合、仪征、扬州、泰兴、靖江、南通、海门、启东、如皋等点线和沿江一带。苏中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有韩德勤残部，龟缩在曹甸、安丰、兴化西北一带；张星炳的保安三旅在溱潼、仇湖地区；李明扬、李长江的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部，大部在江都、泰州地区；陈泰运的税警总团活动于姜埕、曲塘地区。当此反共高潮之际，中国抗战形势逆转，“曲线救国”的理论出笼，日、伪、顽沆瀣一气，进行反共大合唱。苏中的突出事件就是李长江公开投降。

李长江是江苏的地头蛇，抗战以来受到韩德勤的歧视、排斥，克扣经费，分化他的部属等等的巧取豪夺，早想“改换门庭”。据李明扬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汪精卫从香港逃来上海，准备筹建伪政府时，就曾亲笔致函两李劝降。大汉奸周佛海的《周佛海日记》中记载：李长江曾派代表去上海和汪伪商谈投降之事。可见这是早有勾搭的，现在有人著文论证李长江是被迫投敌云云，实在不知是从哪些材料分析得出的结论。《江苏文史资料



选辑》所载《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一文中，概括介绍此事说：“李部早有投敌之心，但与韩德勤还要保持一定联系。一九四〇年三月，李长江就曾派代表往上海与汪精卫勾结，并与汪精卫、周佛海谈判该部降日投汪条件。为了达到诱使李长江参加汪伪集团的目的，周佛海当即答应委任李长江为军长，待该部全部声明投汪后，再授该部为集团军名义。当时李长江向日伪提出补充该部枪支弹药作为条件，但因数量过大，未得日方同意。汪精卫为了诱使该部投敌，一九四〇年十月，派缪斌往泰州与李谈判劝降。这个缪斌，当过北伐军的二师党代表，蒋介石的亲信，实际上是个封建腐化分子，抗战后投敌，任新民会的指导部部长。因为缪斌当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厅长时，李长江是省保安处第四团团长，素有来往。缪斌经过三个多月的诱降活动，终于使李长江率部分官兵投汪。日军则同意给予子弹二十五万发，并授予第一集团军名义，以李长江为总司令。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五日，李长江即在泰州宣布投敌。……该部投敌后仍驻泰州地区，专门进攻我苏中地区新四军。缪斌诱使李长江投敌有功，汪精卫委任其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和立法院副院长。”

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日军命令其独立混成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七等旅团，在扬州、高邮、南通、如皋等地集结，计划在李长江投敌后趁势大规模“扫荡”。

我军获悉李长江准备投降后，即从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研究对策。政治方面，确定在李长江尚未公开投敌前，仍通过交涉和“帮助他解决困难”等办法，尽量予以争取；同时，把李长江可能公开投敌及勾结日伪向我军进攻的阴谋，向根据地军民公布，进行反投降斗争的动员，对地主士绅阶层进行反投降和民族气节的教育。在军事上，分析了我军面临的严峻形势：日军三个独立混成旅团已调至苏中沿江和运河沿线，并侵占了黄桥镇，企图在策动李长江投降后，进攻海安、东台等地，威胁我军军部和苏中、苏北根据地；国民党汤恩伯部对豫皖苏边区的进攻迫在眉睫；韩德勤部为策应汤恩伯部东进，纠集盘踞在洪泽湖的顽匪，窃据了皖东北根据地，并准备在日伪军发动进攻时，以其在苏北的残部从背后袭击我军。据此，我军的部署是：第四师全部坚持豫皖苏边区，准备抵抗汤恩伯部的进犯；第二师主力抗击李品仙部进犯，坚持淮南津浦路西阵地；第三师主力在盐阜、淮海区监视韩德勤部，并以一部兵力恢复与加强皖东北根据地；我一师主力在苏中适当地点隐蔽集结，在对李长江争取无效时，坚决发起讨伐战役。

二月十三日，李长江率六个纵队一万多人公开投敌。二月十五日，中央军委向我军通报了李长江已投敌的情况。李长江在泰州通电就任伪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后，李明扬率千余人离开泰州，继续以鲁苏皖边境游击

总指挥的名义，活动于泰州以北唐家甸子一带。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和四月的日伪军对该部两次“扫荡”中，纵队司令陈中柱阵亡，三个支队被击溃，损失很大。我军为团结和支援李明扬共同抗日，通过“联抗”部队给予物资支援，并表示慰问。以后，韩德勤逃离江苏后，国民党政府委任李明扬为江苏特别行政区主任、长江下游挺进军司令。我军始终以友军对待，支持他抗战到底。这是后话。在当时来说，李长江是国民党在华中敌后部队中第一个公开投敌的，对抗战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但国民党重庆当局对此噤若寒蝉。为了坚持抗战，保卫苏北根据地，坚决打击投降派，我军顺应民心，由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于二月十八日发布《讨伐李逆长江命令》，任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我为副总指挥兼前敌指挥，刘炎为政委，着“迅率所部歼灭李逆”。

此时，我一师主力隐蔽集结于海安以西地区。一团驻胡家、大小白米，二团驻曲塘以南。一月上旬刚获悉皖南事变的噩耗，现在又传来李长江叛变投敌的消息，部队上下无比义愤。

我率一旅和保安特务团以及苏北指挥部独立支队为左路，也是先头部队，先攻克姜埕，再扫清泰州城东、城南的外围阵地，为中路担任主攻泰州城的二旅打开通道，然后协同攻打泰州城，并向扬州、泰兴方向警戒！三旅为右路，由泰州城北向南进攻。二月十八日晚，我

一团首先攻取姜埝，然后从苏陈庄横扫大小仲家院等据点，休息吃干粮后，接着又继续前进至寺巷口以北。二团由东向西急进，拔除白马庙、塘湾等据点，即转入防御地域。独立支队也从苏陈庄打到大酒庄、塘湾、口岸一线。十九日黄昏，攻城部队进入阵地发起攻击，二十日凌晨，攻下泰州城。李长江弃城向西逃窜，我军分途发起追击。

李长江投敌是背着部队进行的，突然间宣布当伪军，部队混乱，士气低落。战争中，没有正义就没有战斗力，他的部队也感到当伪军抬不起头，一打就垮。记得有这样一个插曲：有个侦察员，名叫陈永兴，闽东出来的老战士，身材魁伟，骑着一辆自行车，在从姜埝到泰州的公路上侦察敌情，一马平川，车轮飞驶，竟然没有发现李长江部队的哨兵，径直冲进了苏陈庄。苏陈庄的庄头空地上，李长江部丁聚堂的一个团正在集合，几百人你呼我喊，担子、骡马、辐重……乱糟糟地挤来拥去。陈永兴发现自己单人匹马闯到敌人堆里来了，前进不行，后退不可，忽然看见有个穿黄呢子军装的正在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就跳下车把此人抓住，掏出手榴弹，拉下弦线，大喝：“快下命令叫部队缴枪，否则，你死我也死！”此人吓坏了，乖乖地下令把枪堆在空场上，集合起四五百人跟着陈永兴走了……陈永兴以后在一团二营六连当排长，在车桥战役的芦家滩战斗中与日寇白刃格斗

中英勇牺牲。苏中军区政治部出版的反映车桥战役英雄故事集《英雄王子青》中，就有写陈永兴的纪念文章，文中就有他只身俘敌一个团的事迹。

此役，俘获叛军人枪四千余，缴获弹药、粮秣和医药等许多物资，并争取李部两个支队战场反正。

日寇得知泰州城被我军攻克，立即出动。如皋、南通之敌北上攻占我海安、东台，向西攻我曲塘、姜埭。扬州的日寇最为猖狂，在二十余架飞机掩护下，千余日军，纠集李长江部四千余人，向泰州蜂拥而来。

我二团顽强阻击，打得十分英勇；一团以全力配合二团打援，从侧翼反击。鏖战正烈，韩德勤却趁火打劫，派兵攻击我北宋庄、大邹庄，占领洪家桥，向我凤谷村进犯。

预定的讨李作战目的基本达到，于二十一日发表《新四军通告》，申明我军毅然讨逆，“证明我军绝不因重庆当局取消本军番号之无理命令，而稍变本军抗战保卫人民之初衷；证明重庆当局宣布本军‘叛变’为莫须有之澜言。”同时呼吁：“为根绝以后国军投敌叛国之事不再发生，各界同胞应一致要求重庆当局放弃反共政策”，团结抗日。当天，我军主动撤出泰州，按预定计划转入敌后进行反“扫荡”斗争。

任何漂亮的谎言也无法掩盖蒋介石在抗战相持阶段消极避战的丑行。国民党当局在李长江叛国投敌事件后，

不仅丝毫没有改变其反共政策，反而愈益默许这种“曲线救国”的汉奸行为，因而叛国投敌事件接踵而来，愈演愈烈；出现了“降将如毛，降官如潮”的逆流。仅在苏北地区，继李长江之后，又有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八旅旅长杨仲华、国民党八十九军一一七师参谋长潘干臣、国民党鲁苏联军西北集团军总指挥刘湘图、国民党江苏省保安二旅旅长徐继泰……等相继投敌。华中地区的伪军绝大部分是由国民党投降部队编成的，这是铁写的历史，谁也更改不了的。

反投降斗争一直是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任务，抗击伪军也是新四军打击日寇以外的艰巨任务。

## 开展伪军工作

由于华中国民党军的投敌，伪军激剧增加。苏中伪军三万五千余，居华中各战略区首位；三分区一万三千余，又居苏中首位。这些伪军成为日军“以华制华”阴谋的工具，成为反共的鹰犬和炮灰，以便日军逐步抽出兵力投入太平洋战争。但日军以少数人统治数倍的伪军，不得不采取分化政策，利用伪军之间的矛盾以便驾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由于兵力不足，为强化对伪军的统治，企图整编伪军，日伪矛盾更形突出。陈毅同志在分析形势时说：“敌人驱遣伪军以攻我，伪军靠利用敌我

矛盾求生存，我则靠利用敌伪矛盾以坚持”。并一再指出，如果能在军事上制服伪军，在政治上控制伪军，就等于粉碎敌人的“清剿”、“扫荡”。陈毅同志对苏中的伪军工作也作过多次指示，他强调指出：苏中伪军最多，要坚持苏中抗战，应将伪军工作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苏中党政军领导先后多次派出惠浴宇、朱克靖、黄逸峰、夏征农等人，去做李长江、颜秀五、杨仲华的工作；颜秀五也一直和我们保持着接触。

在苏中地区，三分区伪军数量最大，李长江的伪第一集团军，除伪二十六师两个团在溱潼、时埭，属二分区外，全部在我三分区。伪二十四师在泰州以南，伪二十五师在姜埭周围，伪二十六师在曲塘、溱潼一带，伪二十七师随集团军司令部驻泰州，伪独立十旅在黄桥、季家市一线，伪独立十一旅在古溪、蒋垛一线。还有属于伪一方面军任援道的暂十九师蔡鑫元部在泰兴一线，属于伪第二集团军杨仲华的三十四师田铁夫部在如皋一带。这些部队在投敌前大多与我军有过接触，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他们进行工作，实际上是过去对友军工作的继续。

一九四一年日伪对苏中秋季“扫荡”结束后，汪伪军委会即在泰州成立苏北行营，以臧卓为主任，统一指挥苏北军政。伪苏北行营成立后，加紧整编李长江部，同时扶植杨仲华的发展。杨仲华部曾由四个师扩充到九

个师、四个独立旅，到一九四二年二月又将杨仲华部整编为四个师、一个独立旅，八月间索性逮捕了杨仲华，取消集团军司令部，直属行营指挥。同时将李长江部缩编为二团制的师，取消旅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下旬，汪伪军委会取消第一集团军，将李长江调任伪军事委员会参议院副院长。苏北伪军统一编为第五集团军，委派积极反共的项致庄为司令，促使苏北伪军摆脱李长江的控制。这一改编，引起伪军的强烈反抗，日伪间、伪伪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些矛盾，是可以达到争取与瓦解伪军这一目的的。

当时，三地委有敌工委员会，朱克靖、陈玉生同志分别担任正副主任；一旅、三分区政治部设有敌工科，科长盛华同志。敌工部门包括对日军和对伪军的两方面工作。对伪军工作，主要是利用与李长江部队交往时的关系开展上中下层各种工作，竭力与上层人士交往，晓以民族大义，陈明利害，指出前途；派一批可靠干部打入伪军内部，用秘密委任方式订立秘密反正协定，个别发展组织。一些派进伪军去的干部，采取多种方法与伪军官兵交朋友，进行民族气节教育。经过大量艰苦的工作，一些伪军改变了态度，暗中为抗日军民提供情报，购买军工器材、药品，保护交通运输，掩护干部来往。

当然，我们对于伪军方针不仅是拉，而是又打又拉。有时以打为主，以拉为辅；有时以拉为主，以打为辅。



对顽固的则打，对动摇的则拉。驻泰县蒋垛、古溪一线的伪军独立十九旅孔瑞五经常在河西“扫荡”，抓壮丁，抢钱粮，为非作歹。一九四二年九月，东夏庄一仗，歼其百余人，生俘伪营长以下五十余人。孔瑞五亲率伪军九百余下乡“扫荡”时，在缪家埭遭我军伏击，又被毙伤八十余人，被俘六百余人，孔瑞五本人也被击伤，狼狈逃窜。孔瑞五被打痛后，多次恳求与我方谈判，我方同意。我方代表对孔伪代表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后，提出几点要求：不得增设据点；不得让鬼子进驻据点；不得伤害我政府工作人员；不准残害抗日烈、军属；敌伪军联合“扫荡”时必须事先通报我方。并限制伪军只能在据点五华里内活动。孔瑞五不得不接受上述条款。

一九四二年，四地委交给三地委一个伪军关系，因为伪军调防，所以把关系转到这边来。这就是驻如（皋）黄（桥）线的伪三十四师副师长兼一三五团团团长施亚夫。施亚夫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以后失掉关系，抗战开始拉起一股武装，接上了党的关系。施很早就想把部队拉到新四军来，组织决定他暂缓起义，在敌人堡垒里发挥别人起不到的作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汪精卫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出《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决定对苏中地区实行“清乡”。所谓“清乡”，就是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手段，摧毁抗日民主

根据地，由点线的占领扩大到面的控制，全面推行伪化。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汪伪“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筹备处”在苏州成立，拟定《苏北地区第一期清乡工作总纲》；同时，日军任命六十一师团长小林信男为苏北清乡地区最高指挥官，强化伪军，以一万六千余的优势兵力，以及苏南调来五个清乡大队，三个警察大队和大批特工、行政人员随军，确定一九四三年四月十日开始清乡，以我苏中四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地区”，对三分区则实行“清剿”；第一步军事清乡两个月，第二步政治清乡四个月。施亚夫所在的伪三十四师，担任“清乡”外围封锁任务，他以副师长身份参加了部署“清乡”的机密会议。会议刚结束，三地委就收到了他送来的全部有关情报和“清乡”计划、方案。我们转报上级党委后，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华中局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奋斗的指示》，苏中和四分区、三分区作好反“清乡”的准备工作。施亚夫送来的情报对粉碎敌人的“清乡”阴谋是起了作用的。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按照三地委敌工分委的决定，施亚夫在加力镇率部反正，受到热情接待，召开了欢迎大会。反正部队编为苏北人民抗日自卫军通如纵队，施亚夫为司令。

施亚夫的反正，在伪军中引起强烈反响。二十四日，驻季家市伪十九师连长吴日升带领全连反正；二十五日，驻鞠顾庄伪十九师营长龚永嘉率全营反正；二月七日，

驻石庄伪三十四师营长薛仁杰率二百余人反正。此外，芹湖、搬经、石庄、姚家埭、分界、广陵镇、毗卢寺、新镇市、生祠堂等据点，都有小股伪军投诚。在一、二两个月中，反正伪军总计两千余人。

苏中地区还多方面开展日军工作。区党委曾出版日文报纸，三地委也印刷日文宣传品，由敌占区的地下党员秘密散发或张贴。在日军据点周围唱日语歌曲，战场日语喊话。对待日军俘虏，政治上教育，生活上优待。对待日军战场遗骸，有时集体送还。还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都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 开辟边沿区工作

伪化与反伪化的斗争主要在敌我之间的边沿区比较尖锐。根据一九四二年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的材料，三分区总面积为一万九千平方里，我占区为三千八百四十平方里，敌占区大约相等，边沿区则占一万一千五百平方里。我方要变边沿区为巩固的根据地，并且推向敌占区的边沿，压缩敌占区；敌方则企图把边沿区变为伪化区，扩大敌占区，缩小抗日根据地。我军在反伪化开辟边沿区中采取多种手段进行复杂而又巧妙的斗争。

这里要介绍一下陈玉生同志。陈玉生同志于三十年

代初就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活动，以后失掉了组织关系。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拉起了一支游击队，要个名义，就依附于李明扬、李长江部队，当个支队长。苏北特委解决了他的党籍问题，并向陈部派去干部。郭村战斗时，战场起义，随后任苏中行署保安司令。以后，一旅兼苏中三分区司令部，我兼一旅旅长、政委，陈玉生同志任三分区司令员，合署办公。我俩关系很好，他也心情舒畅，没有感到兵权被剥夺了的不正常情绪。我认为，他是不错的，是个好共产党员。陈玉生同志的妻子杨桂芳同志却瞎捣鼓了：你算什么司令？空头司令！兵权都搞掉了！这当然就有点影响了。我把这情况报告了陈老总，陈老总出了个点子：“你把红帽子给杨桂芳套上！”陈老总又把王于耕同志找去，交给她一个任务，要她把杨桂芳发展入党。那工作可也不好做，要她从江湖义气一套接受共产主义，要她承认党纲党章，难哪！但是，经过不断地宣传党的思想，不断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教育，基本上具备党员条件了，就由王于耕同志介绍她入党。杨桂芳同志入党后的确努力学习，积极工作，就派她到陈宗保那个团任副团长。上面已说过了，陈团是黄桥战斗时起义的何克谦部，当地武装。杨桂芳确是飒爽英姿，腰里插两支驳壳枪，骑着高头大马，老百姓叫她“杨团长”，部队也服她。这支部队经过改编整顿，成了党绝对领导下的、坚决抗战的坚强武装。

陈玉生同志和李长江部队的上层下层都有过交往，有些本地部队的头头脑脑也比较熟悉，这些部队投敌成了伪军以后，三地委研究，确定通过陈玉生的关系开展伪军工作，成立敌工分会时由他担任副主任。

陈玉生同志是泰兴人，过去的社会基础主要在泰兴附近。当时的苏中三分区包括泰州、泰兴、靖江、如西，也都是陈玉生同志有影响的地区，他在三分区工作是起了作用的。开辟边沿区工作，群众工作不能公开进行，而这些地方又常常被流氓地痞所控制。这些流氓地痞往往又是敌我双方争夺的对象。搞好了，他们可以给我们送情报，掩护秘密工作，成为对我有利的积极因素；搞坏了，破坏性极大，甚至使我们没有办法插足那些地方。这些流氓无产者的特点是不相信组织，只相信结拜兄弟和江湖义气，帮会在他们中间有很大势力，“老头子”有左右他们的力量。陈玉生同志拉部队的时候，就利用了这一点，开香堂，收徒弟，成为他们的“老头子”，在这些人中间有一定“威望”。我们为了开辟边沿区、敌伪区的工作，争取这批流氓地痞不滑到敌人一边去，研究办法争取他们。议来议去，觉得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陈玉生重新开香堂收徒弟。这比我们做工作要省事得多，而且效果也好。陈玉生同志开始不同意这样干。他说，过去是不得已，搞了开香堂、拜把子这一套，现在怎么能再搞这些名堂；过去的那些关系也只不过相互利用，不

来往了。我们说服了他。我们把这一想法报告了区党委，区党委不敢作主，又报告了华中局，华中局批准了。陈玉生开香堂收徒弟，也是很严格的，名单要经组织上审查的。我们利用这形式，强调集中制；利用旧帮会宣扬忠孝仁义为宗旨，发挥为忠于国家，孝于民族，守信于民主政府与新四军；利用旧帮会帮规严厉的特点，规定奖惩，特别强调凡叛变投敌者，得由会众制裁。用这个办法控制根据地内和边缘地区已经存在的流氓势力，不是去发展它，而是利用它伸向敌占区。摆香堂，场面大，香烛满堂，烟雾弥漫，一次就有上千人给陈玉生送帖子，称弟子门生。收徒弟，确实起了作用，非但边沿区的工作能开辟了，而且把工作做到据点里。好多伪军头目都是李长江的部下，也有陈玉生的熟人，甚至是“把兄弟”，泰兴城里伪军暂十九师师长蔡鑫元就是当年和他结义金兰过的。许多据点的伪维持会长就是陈玉生的徒弟。有了这些徒子徒孙、把兄把弟，情报就特别灵。我们的侦察人员也能进出据点，取情报，抓坏人。敌人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知道。苏中三分区，据点林立，敌伪军数量大，“扫荡”频繁，“清剿”残酷，我军坚持得比较好，一条经验就是伪军工作做得好。我的第一个女孩出生时，正碰上鬼子“扫荡”，怎么办呢？总要有个安顿的地方呀！就把我爱人送到黄桥附近季家市据点旁二里路的地方，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住下来。我穿着便衣，带

着两三个人去看她们母女俩，也没有发生事情。从三分区的西来镇到张黄港，再由张黄港上下去上海的轮船，是很好的交通线，我们去上海采购书籍、药品和无线电器材，上海来参军的知识分子、工人和青年学生都由这条交通线来去，李亚农、阿英等同志来根据地就是走的这一路。这条路线比较保险，路过西来镇时，甚至可以在维持会长开的旅馆里住上一宿。伪军工作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有些人就不明白中国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斗争方法的灵活性。不要说“文化大革命”中年轻的红卫兵了，解放以后，陈玉生夫妻俩就给整得够呛，关了几年。证明这是组织决定的，证明这是华中局批准的，证明陈玉生收的徒弟名单也是组织上看过的，不行，谁证明也不行！一直告到陈老总那里，问题才得到解决！他们就是不懂，这是斗争的需要嘛！

江南反“清乡”中，敌人曾利用流氓给我们以极大损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二日，苏中区党委专门发了《关于反“清乡”斗争中掌握青红帮的指示信》，要“以分区为单位，由我们决定一有威望的熟悉青红帮的同志作为领袖，成为统一领导的中心，以统治分区流氓首领，使原有各首领对之绝对服从，在党内确定指导这一工作的专门干部。”这就是从三分区的上述经验总结出来的。

## 第十七章 反“扫荡”

### 相持阶段的基本斗争形式：反“扫荡”

一九四一年三月，苏中军区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抗日战争第二阶段——相持阶段在苏中地区的开始。

三月十九日，华中局正式划定苏中区范围：东台、兴化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黄海以西，面积约二万余平方公里。其中，我统治区约占百分之四十七，敌占区约占百分之三十二，友军占百分之三，游击区约占百分之十七。人口约八百一十七万人，其中我解放区约五百一十余万人。苏中分为四个行政区，相应地成立了军区和军分区。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第一旅兼第三军分区。三分区三月下旬于泰州县雅周庄成立。

刘少奇、陈毅同志在给苏中地区领导人的指示信中说：“过去顽固派集中力量对我进攻，使我不能集中力量抗敌，现在由三角斗争形势转变为对日直接斗争的形势了。反对敌人和汉奸伪化苏北，保卫苏北抗日民主根据



地，就成为我军及苏北人民目前唯一的直接任务。”这是“更直接，更严重的抗日任务。”五月，由中原局和东南局合并组成的华中局也指示苏中，要发动群众坚持长期抗战，保卫根据地。

苏中地区的日军是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原属于第十一师团。自一九三八年进到镇江、丹阳后，即担任镇（江）丹（阳）铁道警备任务。以后，十一师团调回日本，这个旅团留在镇丹地区，改为警备旅团。一九四一年一月下旬，为接应李长江叛国投敌调来苏中，并改为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无联队编制，直接辖五个大队和一个特种兵大队。这支日军是我军与之在苏南、苏中地区交战达四年之久的“老对头”，旅团部驻泰州。伪军有第一集团军李长江部、第二集团军杨仲华部、一方面军任援道部，新老伪军达三万五千余人。敌伪还投入很大力量修筑公路，增设据点，凭借优势的兵力、火力和交通的便利，对我苏中根据地进行频繁的“扫荡”。一九四一年一月出动三千余日伪军占领黄桥，并向黄桥以南地区“扫荡”，新四军也由此开始东进以后的第一次反“扫荡”。接着，二月十八日，日军为接应李长江投日，对苏中进行第二次“扫荡”，分别从扬州、高邮、黄桥、如皋等据点同时出动，侵占海安、东台、安丰、曲塘、姜埭等城镇，又在我军撤出泰州后，占领泰州。未及一个月，日寇又进行了第三次“扫荡”。

一九四一年四月的这次“扫荡”规模较大，日寇称之为七路“扫荡”。我们拟定了以黄桥为中心，在其四周选择新建据点为攻击目标，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来粉碎敌伪“扫荡”的作战计划。敌伪军向顾高庄、古溪、蒋垛、雅周庄一带“扫荡”时，我以地方武装和民兵积极袭扰，与敌纠缠，使“扫荡”进展缓慢，并派三团和独立支队伪装主力，张扬其事地向孤山、老庄头等地发起攻击。这时，我率在两泰地区隐蔽待机的一、二团突然出现在泰（兴）黄（桥）公路上，包围了姚家岱、石梅两个据点。

四月十七日，我一团围歼姚家岱之敌：日寇一个中队和二百名左右的伪军。此战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三十余人，生俘日军三名，开创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生俘日军的纪录，而且全歼伪军。二团也顺利全歼伪军三百余人。

此战锻炼了地方武装和根据地人民。泰州、泰兴、靖江三个县的警卫团，在根据地初建的形势下，发展很快，这时大约已有四千人的规模。因收编的多，成份不纯，时间又短，内部并不稳定，但经过反“扫荡”的锻炼，部队精干了，成份纯洁了，战斗力也提高了。人民群众经过反“扫荡”，也学会了坚壁清野、分散转移……等一套，对新四军的斗争胜利有了信心。同时，也大大地坚定了广大群众坚持敌后的信心。

## 调动敌人，粉碎盐城大“扫荡”

当我军军部在盐城重建后，日寇就加紧向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围歼新四军军部及主力，占领苏中、苏北。那一段时间里，投降危机甚嚣尘上，南京群丑公开宣扬要“完成皖变未竟反共之功”，日寇头目也毫不隐讳地狂妄夸称，要以“闪击战打击陈毅及其重建之军部”。一九四一年夏季，对苏北盐城、阜宁地区进行了大“扫荡”。

我军军部对日军大“扫荡”的动向早有察觉。在六月三日发出了《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指示说：综合我军地区之日军动态，日军已开始向本军地区大举“扫荡”。须知日军“扫荡”本年不可免。着重指出，敌寇此次“扫荡”不限于局部某一地区，即不是局部地区之“扫荡”，对此认识不足，必然会上当。因此，在军事部署上要求各战略区发挥主动性，积极行动，相互配合。指示还指明了反“扫荡”的战术原则：敌之战术，系采取分进合击之惯伎，我军事上以分散游击避免决战为主。但应争取有利时机，实施较大兵力之突击，粉碎日寇的疯狂“扫荡”。

敌人为了发动这次攻势作战，调整了长江北岸沿江一带和运河沿岸的兵力部署。七月上旬，日军以第十五

师团、第十七师团、第十一旅团各一部，接替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在长江北岸和运河沿线的各据点上的防务。然后，独立第十二混成旅团集结于东台、兴化、射阳一带，由旅团长南浦襄吉出任前敌指挥官，指挥日伪军一万七千人，倾巢出犯，兵分四路：东台一路，兴化一路，射阳一路，陈家洋一路。七月二十日同时出动，向盐城合击。

开始，敌伪军约有少量增加，由如皋、海安、安丰、富安、李堡等据点出动，“扫荡”我苏中二分区。另外，南通、海门、启东等据点敌伪军以原有兵力出动，“扫荡”我苏中四分区的中心地带。而敌寇唯独在我三分区没有增兵，为什么？很使我踌躇。我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南浦发动对我苏中的全面“扫荡”，由于兵力不足而作罢；二是南浦的目标不是苏中二分区，也不是苏中四分区，而是向北用兵，攻我军部，所以不在南部的三分区“扫荡”。

果然，北犯盐城的敌伪军二十日当天就占我盐城，继而进犯上岗、伍佑、刘庄、白驹、南洋岸、阜宁、东沟、益林、湖垛等地。当时正是雨季，河水大涨，日寇汽艇在水网区猖狂活动，非常便利。盐阜地区的我三师部队跳出外围。我军的一些机关，特别是在湖垛周围的后方机关，情况十分紧急。华中鲁艺的一批同志遭受敌寇袭击，著名作家丘东平、戏剧家许晴等同志英勇牺

牲。

正当我军与日伪军在阜宁东沟激战之际，龟缩在曹甸、泾口一隅的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勒，竟然出动部队猖狂地攻我益林阵地，陷我军于腹背受击的危境。

军部在盐阜区有我军主力第三师的掩护，本来是可以放心的，但从战报上看，军部终究是大机关，不大适应游击环境，有点狼狈。我们一旅的几个领导人有点着急了。确实担心，老军部给国民党搞掉了，新军部再受损失怎么行！我们研究，支援军部反“扫荡”最有效的办法是只有根据军部《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发挥主动性，积极行动，相互配合，攻其所必救，也就是古兵法说的：“围魏救赵”。

我们一旅的几个领导人认为：既然看到军部那边紧急，怎能不加支援？怎能各顾各的，无所作为？在战争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形势紧急而必要时，不能坐等上级指示，作为一个指挥员要善于主动地把握局势，特别是敌人沿江各据点的兵力都抽调向北“扫荡”去了，兵力空虚，更是可乘之机。因此，一致决定，在三分区主动发起进攻，以配合盐阜区反“扫荡”，调动敌人。当时，我手上只有一、二两个团的兵力，便选择了古溪这个敌伪军中心据点，作为第一个攻击目标。古溪有伪军一个团兵力，一千余人。它靠近黄桥，能触动鬼子，有使它回兵的可能。我们一面部署战斗，准备晚上七时发起攻

击；一面报告军部、师部。谁知下午五时，师部来了复电，不同意我旅攻击古溪的战斗行动，主要理由是：攻坚不利，易遭受重大伤亡，且未必能攻下据点。曹甸已有前车之覆，当有殷鉴！这一下使我很为难。根据古溪情况和敌我力量对比，反复权衡，是有把握可以攻取的。此仗应该打！还有，当时“扫荡”军部的敌伪军，大部分是从我们三分区调去的。无所动作，不去牵制敌人，不能为配合军部反“扫荡”的胜利打几仗，当然是不对的。我们不能不顾大局。如果按原定方案打古溪，军部当然是高兴的；但也不能越过师部的指挥。师部不同意，要我们不要轻率，万一打不下呢？我考虑一下，觉得听听下面意见为好，就召集两个团的团长、政委来开会。那时的一团团团长已是王萱春，政委是曾如清；二团团团长是廖政国，政委是李一平（吕平）。他们一看电报也愣了，都看我的态度，问我怎么办？我说：“上级主要怕我们攻不下来，伤亡一大堆，偷鸡不着蚀把米。”这样一点穿，大家便讲开了，叙述他们如何派人到据点侦察，如何勘察地形，突击队放哪里，二梯队在哪里，突破口选择的位置……等等，总之都说：“有把握”，“没问题”。于是我说：“如果确实有把握，就打；只要打下来，就没有不执行上级命令这事了。如果打不下来，就有事了……”大家说：“打！”于是就具体研究攻击部署。有时候，逼得紧一些是大有好处的，上级不同意打嘛，那就研究得

特别细致，设想得特别周到，打得也特别认真，唯恐有漏洞，决心非打赢不可；如果打不下来，责任就大了，麻烦事就来了。实际上，我有数，我侦察过，打下这据点是有把握的。果然一举突破，两个小时就解决战斗，全歼伪军一个团，伪团长在逃跑时落水毙命，而我军伤亡不到一百人。

打下古溪，我即集中全分区地方武装四面出击。我一旅主力乘胜进攻黄桥，黄桥敌人赶紧向泰兴城撤。我们占领黄桥后，一路追击，并扬言要打泰兴城。追击路上，两个主力团，加上地方武装、民兵，浩浩荡荡，横扫三分区内各敌伪据点。敌伪军闻风丧胆，我军乘胜收复季家市、加力、孤山、石庄等地。处于长江之滨的敌伪重要据点天生桥，亦被我泰兴独立团奔袭攻克，威逼长江交通线。至此，三分区敌伪据点大部被我占领。我一旅主力乘胜包围了泰兴城，占领四关。泰兴城敌伪向南浦告急，但南浦旅团继续“扫荡”我盐阜地区，仍不为我三分区的进攻所调动。我们即以分区武装接替继续围困泰兴城，一旅主力向南浦旅团部所在地泰州城进逼，三面包围之。南浦襄吉这才不得不从盐阜区南撤，回援泰州。这样，军部就解围了。

陈毅、少奇同志对我一旅指战员英勇善战，在敌后积极主动进攻，牵制、调动敌人，配合盐阜区反“扫荡”获得全胜，非常高兴。他们直接发来了电报，向一旅全

体指战员祝贺胜利，并予嘉奖。

陈毅、少奇同志同时还指示我们：要当心回头敌人的进攻。我们也已得知南浦率部南来，等他离泰州城还有半天路程时，就撤了泰州、泰兴之围，使南浦扑了空。我军主力向根据地腹地古溪、营溪地区隐蔽集结，待机应敌。南浦旅团由泰州出发向东“扫荡”，企图寻我主力决战。我旅就与他进行“蘑菇战术”，待南浦旅团东进至古溪、营溪附近，于夜间以急行军向西，转至敌背后，奔袭泰兴、黄桥之间的敌据点姚家岱，并一举攻克，歼敌一个小队。南浦旅团闻讯，又从东向西追击我军。我军待敌迫近，又于夜间由姚家岱急行军向南，经靖江地区，东返我根据地腹地南部集结。南浦旅团两次扑空，只得撤回老巢泰州城。至此，南浦旅团由盐阜区南撤，转移兵力，对我三分区的“扫荡”也被粉碎了。

这种“蘑菇战术”，敌人固然疲于奔命，我们也是很疲劳的，部队疲劳得一路行军，一路睡觉，连牲口也瞌瞌撞撞的。走到靖江地区一座桥上，“扑通”一声，我和骑的马一起掉到河里了，实在太疲劳了，哪怕睡十几分钟都是好的。不过不这样就不行，要摆脱敌人呀，要制造战机呀！后来，陈老总赞扬这样的做法，问我：从哪里学来的？我说：是从战争中摸索出来的，也可以说给鬼子逼出来的。他说：过去中央苏区也是这样搞的，这种战法一定要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才行。有时，我们与



鬼子只隔三、五里路，甚至擦肩而过，但敌人毫无发觉。这次反“扫荡”给少奇同志也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他去延安之前，找我个别谈话时就提到郭村战斗和这一仗。

此次敌人对盐阜大“扫荡”自七月十八日开始，至八月二十日，历时一月零二天，始告结束。九月十七日，新华通讯社发表新四军发言人关于苏北反“扫荡”的谈话，发言人说：此次苏北反“扫荡”，由于我军在南线发动凌厉攻势，迫敌南调，我北线部队乘机大举反攻，收复阜宁、东沟。八月七日，五路反攻盐城地区，收复湖垛、大中集、上岗诸重镇，使敌得于北而失之于南，转瞬间，得之于北者，亦不能全部保持。致向我盐阜区“扫荡”之主动权完全丧失。发言人公布了此次反“扫荡”（包括南、北线）的我军战果：我军与敌作战一百三十五次，毙、伤、俘敌伪军三千八百七十三人（其中日军伤亡一千一百人，生俘日军官兵十五人，伪军官兵一千零七十四人），击沉敌汽艇十三艘，缴获平射炮两门、轻重机枪二十五挺、步枪三千三百二十四支、子弹两万余发。发言人说：敌军“扫荡”之主要目的是歼我军部，而今“我军部仍巍然屹立在敌后，不可动摇”，“敌伪之伎俩窘矣”！

## 日寇的报复“扫荡”

日寇夏季大“扫荡”失败之后，经过精心筹划，

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上旬对我三分区发动了报复性“扫荡”。很可能南浦认为：不征服三分区，他就不可能在苏北逞威。

这时，我旅二、三团正由张藩副旅长率领去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开辟“同情区”，掌握在我手里的只有一个团和一些地方部队。

敌伪乘我主力较少的机会，兵分三路而来。着重“扫荡”如西县，合围点为卢港、高明庄一带，企图聚歼我旅部机关和主力部队。我弄清敌人这一意图后，先避开敌军“扫荡”之锋芒，显示了一下目标，然后急速转移到如皋以南隐蔽，以地方武装同敌伪军周旋，疲劳敌人，并假设目标吸引敌人合围，使敌伪军连连扑空，疲惫不堪。我判断敌伪军的“扫荡”已趋尾声，待其各自返回据点时，便率一团悄悄运动到靠近高明庄东北的白家湾附近隐蔽集结待机，密切注视各路敌伪军的转移方向，寻找弱点。终于找到了，撤向黄桥的那一路，有鬼子一百余人，伪军五百余人，由日军加藤大队长率领，由于疲劳，也由于轻敌，行动比较拖沓。我一看另两路日军已过去，正好抓住这一路，决心歼击它！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我在一团指挥所，直接命令该团三营出击。日军见我来势凶猛，且战且退，企图占领高明庄里一批比较坚固的砖房固守待援。我一团一营一个连和特务连占据高明庄西、北野外，然后派一营和二

营分别从南和北两面迂回上去，留出西北口子不包围。伪军一看不妙，抢先夺路逃跑，被我军歼灭三百余名于西北口子上。战至十五日凌晨，加藤被击伤，击毙日寇八九十人。加藤只得带着残兵狼狈溃逃了。

苏中三分区的反“扫荡”斗争是很频繁的，一般一二千兵力的区域性“扫荡”，十天、半月就有一次，全区性“扫荡”一两个月一次。敌伪军投入很大力量修筑公路，增设据点，仅一九四一年中，苏中范围内就增加了二百多处，而三分区又是敌人进攻的重点，增修公路十几条，增设据点四十余处，把我初建的抗日根据地分割开来，使我大部队活动困难，形成大面积的拉锯战，斗争十分艰苦。苏中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也是对这一民族战争胜利作了很大贡献的。

## 第十八章 苏中三分区的抗日斗争

### 在斗争中发展地方武装

为了保卫根据地，坚持敌后长期斗争，苏中三分区和一旅把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作为根据地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黄桥决战前后，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只要愿意抗日，都可编入自卫队。当时发展很快，很短时间内发展了近四千人，大部分编为地方武装，一部分补充主力部队。

当时是大发展形势，地方武装警卫团、自卫队和游击小组的成员，绝大部分是纯洁的青年农民，但也混进了一些流氓、兵痞等坏分子。也有一些是改编来的，成分就复杂得多。一九四一年初，形势有了变化，地方武装发生过叛变投敌事件，有人拖枪当了伪军。

为了建设地方武装，我们以分区警备旅五个连分别编入如西、泰县、泰兴、靖江警卫团作骨干，迅速将各

县警卫团建立起来。各团团长和政委由各该县县长、县委书记兼任，由一旅派出团、营、连、排各级干部百余人，去各县警卫团工作。各县警卫团成立后，发展很快，每个团有二至三个营，到五月底就发展到四千人的规模。各县警卫团在县范围活动，坚持游击战争。如四月九日，敌伪军一千多人“扫荡”泰县、泰兴、靖江地区，三个县警卫团配合主力一、二、三团作战，连续作战半个月，在攻克古溪、蒋垛、苏陈庄、大酒庄、孤山等据点的战斗中，都担任警戒和战勤任务。我们根据地方武装的特点：地方性。开始先在原地区活动，然后将其慢慢上升为县团，离开区乡范围，进而两县部队合编，走出县范围活动。以如西和泰州独立团合编为如泰警卫团，以靖江和泰兴警卫团合编为靖泰警卫团，分别活动于如泰和靖泰地区；以分区特务营和古溪、珊瑚区游击大队编为分区独立团；各县以留下的警卫团少数部队为基础，重建各县独立团。这年秋天，苏中军区领导机关驻如皋县丰利地区，三旅亦在该地整训。如泰警卫团奉命至丰利以西担任警戒任务。十二月底，日、伪军三千余人向丰利进攻，我旅二团与如泰警卫团协同三旅七、八团，与敌激战一周，两次争夺丰利，掩护苏中军区领导机关顺利转移。以后，如泰警卫团编入二团，靖泰警卫团编入一团。一团仍在三分区活动，二、三团在东台、泰东地区活动。

不脱产的群众武装自卫队即民兵，也随着减租减息群众运动的深入而迅速发展起来。到一九四一年六月底，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发展到五万余人，脱离生产的自卫队发展到三千余人。他们在反“扫荡”斗争中，配合主力站岗放哨、拆桥破路。八月十三日日伪军大“扫荡”（简称“八·一三大扫荡”）后，整个苏中地区出现困难局面，三分区的形势更为严峻。我们更是抓紧时机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

一九四二年初，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月下旬，坚决反共反人民又与日、汪狼狈为奸的忠义救国军，竟趁我三分区斗争艰苦之际，由汪浩然率二千余人，为了打通江南与江北张星炳、陈泰运的联系，从江南北渡，进入我靖泰地区，三分区又陷于三角斗争的局面。我一旅先后三次集中一、二、三团准备歼灭这股顽军，都因日、伪据点的阻扰，和频繁的“扫荡”，均未果。四月，我一团在泰兴县霍家庄反“扫荡”中，一营营长罗天英勇牺牲。四月二日，二团攻占距如皋城十五里的伪军新筑据点陆家庄，打破了敌人限期修好如黄公路的计划；十五日又攻占如皋城南的白蒲镇，烧毁了日军经济侵略苏北的大本营——江北公司。五月中旬，忠救窜至孔家桥一带，竟然派一部化装成伪军与伪军合驻，配合伪军丁聚堂部占领宣家堡。五月二十一日，我一、三团进攻宣家堡伪军，忠救公开出援丁聚堂汉奸部队，遭我惨痛打击

后，回窜靖泰长江边。忠救与伪军勾结一体的丑恶面目彻底暴露，于五月底渡江南窜。至此，忠义救国军北渡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

部队经过半年频繁的战斗行动，急待补充休整。但日军南浦旅团纠合伪军于六月开始对我四分区“清剿”，七月又转为对三分区“清剿”。

六月二十日，苏中区党委、一师、苏中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反“清剿”的指示，反“清剿”的总方针是：立即全面动员，团结党政军民开展以反“清剿”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以政治重于军事的原则，坚持苏中斗争，争取反“清剿”胜利，粉碎敌人的“清乡”企图。

六月二十五日，苏中军区要求各部队向日伪军发动一次反“清剿”的总攻势。我旅二团和三团攻克泰东唐洋区的小灶据点，毙伤日伪军六十余人，俘日军一名、伪军六十余名。七月一日，一团、特务营和如西独立团乘日伪“清剿”部队撤退如西之际，对如黄公路的芦港、加力、搬经、芹湖等据点发起进攻，毙伤日伪军四十余人，俘伪军七十余人，攻克芦港。八月二日，乘胜发起水洞口战斗，给伪二十六师陈才福部以重创。

在反“清剿”中锻炼了地方武装，但也遭到了一次不应有的损失。七月初，泰州独立团掩护县机关在繆家野活动，遭到从黄桥出动的敌伪军的奔袭。县委和独立团领导同志准备不足，遭敌迂回包围时未能及时迅速组

织转移，却在背水作战的不利情况下，以仅有二百多人的独立团一部和机关人员抗击强敌，犯了游击战争的大忌。结果被敌伪军包围，县委书记徐克祥同志以下三十多人牺牲，约四十人被俘。这是三分区反“清剿”中损失最大的一次。

三分区的群众是英勇顽强的，对敌斗争蓬勃发展，多次爆发群众围困伪军据点的斗争，声势甚为浩大。八月三十日，如西县渡军井区民兵和万余群众围困西河湾伪军据点。九月五日，如西县石庄区、江安区民兵和万余群众包围水洞口据点。九月二十六日，如西县泰丁庄民兵集中周围二十余里两万余人，驱逐由加力镇下来抢粮的伪军一百余人，并跟踪追至加力镇，将据点周围的竹篱笆全部拆除。靖江、泰兴民兵和万余群众围攻生祠堂据点。泰兴县三区十个乡两万多群众，在民兵的掩护下包围广陵镇据点，迫使伪军撤回征粮队，接受群众提出的四个条件。泰县群众围攻张甸据点。群众取得围攻伪军据点的胜利，大大地激励起群众要求武装起来与敌人斗争的情绪，民兵队伍发展很快。当时，根据地一支流行的歌曲唱道：

从平原到海洋，  
钢刀钢枪筑成了铜墙铁壁；  
从运河到长江，  
锄头钉耙织成了天罗地网……



## 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运动

深入进行根据地建设，关键在于发动群众，首先是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政策。

一九四〇年夏，我军在郭村地区就曾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东进黄桥以后，在中心地区东燕庄等地组织农抗会，进行“双减”。从一九四一年春天起，三分区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到农村，于是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便成为第一位的工作。县以上抗日政府，颁布了“二五”减租条例。各级领导从党政机关和部队中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民运工作队，分头深入农村，对贫雇农进行耐心细致的启发教育，帮助基层党组织，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并通过行政系统，由县、区到乡、保，张贴、散发、宣传政府发布的减租布告。

抗日民主政府规定：从一九四一年夏季起，地租按抗战前的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这项规定称之为“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广大农民处于长期封建压迫下，思想包袱较重。他们对二五减租法令虽然十分拥护，但又心存疑虑，不知是真是假；还有人顾虑减了租就种不到老板的田了；也有人担

心新四军来了搞减租，新四军一走地主要倒算。针对这些认识，民运工作队协助基层党政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减租减息的意义，提出了鼓动口号，如“实行二五减租，改善人民生活”，“减租为了抗战”，“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二五减租”等等。在教育农民的同时，还召开地主、士绅座谈会，普遍对他们进行守法教育。

在群众大体上了解减租减息的目的意义和实现的办法后，就组织农民向地主作必要的斗争，从斗争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各地在向地主斗争时，一般地首先对开明士绅进行工作。开明士绅大多能自觉地接受政府法令，开明士绅带了头，不少地主不得不实行减租，或采取明减暗不减的方法敷衍工作队。明减暗不减的花样很多，比较普遍的是白天减的租息，晚上送还地主。一些有影响的大地主态度则比较顽固，其他中小地主就采取观望态度。由于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清剿”，顽固派的干扰破坏，使“双减”工作大受影响。一般说来，根据地的中心区和群众基础好的地方实行了“双减”，而一般地区基本上仍停留在口号上。但不管怎样，农抗会的威风已经树立，广大农民感到扬眉吐气，新四军受到尊敬，不断掀起参军热潮；地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一九四二年夏季开始，广大地区较普遍地实行了“双减”。敌伪“清剿”开始后，有一些大地主乘机反攻

倒算，中小地主则对政府实行软磨手段。我们选择典型，打掉反动地主的威风，全面开展“双减”。例如，泰县选择雅周区黄柯庄的大地主孙明甫作典型。此人在泰县运粮河东势力很大，土地多，佃户多，政治上反动，当过国民党区长，历史上有过血债。区委通过农抗会组织佃农包围孙明甫的住宅，推选代表，与孙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指出“二五减租”是孙中山先生最先倡导，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也宣布要实行的。当前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农民出力抗敌，贡献甚大，凡爱国士绅都应体恤民情，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行“双减”。代表在谈话中有意点出他勾结伪军，推行“伪化”的罪行，要他在“双减”运动中立功赎罪，否则罪加一等，严惩不贷。通过说理斗争，迫使孙明甫公开表态，答应实行“双减”。中小地主见大势所趋，纷纷表示愿意遵守民主政府法令，按规定减租减息。到一九四二年年底，减租减息受益的农户达四万六千四百七十户，换新约七千四百二十七张。

由于普遍地深入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其它工作也得到了推动。发展了农抗会员五万六千五百二十五人，自卫队员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人，民兵七千三百七十人。改造区乡政权四十多个。新成立农村支部六十二个，发展新党员五百二十七人。

## 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是根据地建设的头等重要任务。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参照华北经验,抓紧政权建设,把原来大地主阶级控制的旧政权,改造成几个革命阶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我军进入黄桥以后,成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同时成立了泰县、泰兴、如皋、靖江四个县政府和若干区政府,政权都还带有临时性质,还很不完善和巩固,极需加强建设。特别是不少基层政权为封建势力所操纵,工农群众未能参加政权管理,民主制度还未完全建立。县以下基层政权很不健全。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海安召开了苏北临时参政会。选举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黄逸峰为议长,朱克靖、朱履先为副议长。选举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一九四一年三月,撤销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组成苏中行政委员会,办事机构为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第三行政区成立第三专员公署,专员朱克靖。

苏中第三行政区开始就注意吸收各阶层人士参加政权工作,比较认真执行政权中的“三三制”政策。以靖江县政府为例,初建时,就有民主人士梁朱明为司法科长,刘拜山为民政科长。这在知识分子和国民党进步分

子中收到了极为明显的效果。小学教员中许多进步分子陆续参加了政权建设，三区的范苏、范乐山，四区的王抗东，五区的周永康，七区的祝文学等均在抗日政权建设的早期参加了政府工作，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早有抗日革命动机的青年孙异、张治平、贾其锋，当他们识破了国民党保安四旅何克谦假抗日的面目后，即返回家乡参加了革命工作。国民党靖江县党部书记长盛仁东是一个坚持抗日进步的人士，黄桥决战胜利后，我们就邀请他参加了苏北参议会，不久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八区的祝惟干是国民党靖江县教育局的督学，在党的影响下，任靖西办事处主任；四区的张洪作了四区区长，他们两人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后，均被吸收入党。三区的高继续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党，长期脱党后也参加了抗日政权，做了三区第一任区长。祝惟干在一九四三年起还担任了靖江县县长。再如泰县，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泰县召开军政大会，聘请各界代表一百六十多位共商本县抗日大计。徐观伯为议长，杨为群、周泽、黄泽亭等为副议长，议员中就有孙明甫。除周泽是共产党员外，徐观伯是力主抗战、正直进步的民主人士。黄泽亭和孙明甫都是地主，而且犯有推行“伪化”的错误，特别是孙明甫这个大地主，在伪军中寻求靠山，干了不少坏事。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行，我们进行了严肃而适当的批判斗争（主要是劝他们保持好民族气节），当他们开始悔悟认

错，表示愿意洗心革面，走抗日之路后，我们仍持欢迎态度，并且在参政会里保留他们的一席之地。这种既斗争又团结的政策，对教育和争取地主阶级中一些做过坏事的人起了良好作用。社会上层分子真正跟共产党走的，很坚决抗日的，不多。如西县县长季恺却是不多中的一个。这人出身大地主，芦港就有他家雕梁画栋的大宅院，大革命时期有血债，是李明扬的高参、秘书处长。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表现很好，在李部任职时给我们送过情报，我们在郭村时他对李明扬做了不少工作；“二五”减租时带头执行法令，起了推动作用；土地改革中表现也是好的。应该说表现很积极，是为革命事业作过贡献的。建国后任无锡市城建局长。“文化大革命”中，把他抓了起来，要判他死刑，多亏陈老总出面讲：“要杀，我们过去早就杀了。你们说的那些，我们都知道；但他为革命做的好事，起的作用不能忘。”这样才保了他一条命。陈老总逝世后，他跑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抱着陈老总的骨灰盒大哭了一场，还照了相。“文革”后期，他还专程来北京看过我。至于专署，泰兴民主人士、教育家、中学校长刘伯厚，先是担任第三行政区参政会的议长，朱克靖同志南下后，就由刘伯厚担任专员。

乡村是政权的基石，当抗日民主根据地迅猛发展的时期，干部队伍跟不上形势的需要，我们在县、区两级

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机构，乡以下只有一些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更换了一些人员，大部分地方还来不及进行改造。一九四二年以前的基层联保主任、保长、甲长还有许多是国民党旧政权的留用人员。这些人情况相当复杂，相当多的人员是看风使舵的两面派，斗争形势好时与我们合作共同抗日，斗争形势逆转时则倒向敌伪与我军作对，或者两面应酬。一部分人员则是投靠敌伪势力的反共分子，或是横行乡里的“地头蛇”。经过一段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在全区范围内实行“新乡制”，废除旧政权的“保甲制”，乡下面设村，乡长和村长均由人民群众公开选举。照顾到农民的文化水平，选举时采取投豆子的办法，在每个候选人的身后放一大碗，想选谁就在谁身后的碗中投黄豆，以得黄豆数的多寡决定谁当选。“新乡制”的实行，使得基层政权牢固地掌握在我党领导的抗日积极分子手中，铲除了“伪化”的社会基础，扫除了“地头蛇”，人民当家做主，深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 坚持斗争 迎接胜利

日本为了把中国变为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更加急于结束侵华战争或迅速巩固占领区，稳定中国战局。因此，他们一面大力扶植汪伪政权，一面根据御前

会议制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对蒋介石“除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外，应尽政略和战略的所有手段……竭力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图迅速使其屈服。”同时倾注

全力打击于敌后战场 再加强调打土共败寇 新加坡



行各种不同的辅助斗争，以达到武装公开坚持之目的。”会议对精兵简政、“三冬”（冬防、冬学、冬耕）工作、军事建设以及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等问题，确定了具体方针和实施步骤。

九月中旬，由我主持在如西县东燕庄召开三分区（一旅）、三地委联席扩大会议，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以及华中局、苏中区党委会议精神，讨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和主力地方化的实施方案。

以苏中来说，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一般是统一的，党、政、军、民各组织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一九四一年后又建立了各级军政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集体领导和统一指挥。第三行政区也成立了军、政、党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委员会，由我担任书记。

根据中央政治局的上述《决定》，确定以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党、政、军、民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实行一元化领导。由于一师兼苏中军区政委刘炎同志患病休养，由粟裕同志任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任副书记。原来第三行政区的地委书记是韦一平同志，成立以江都、高邮为中心的第一行政区后，韦一平同志调去任地委书记，由我兼任三地委的书记。

那时，我们一旅的干部最少，我的兼职就很多：一师副师长兼一旅旅长、兼政委，又是三地委书记兼三分

区政委。一旅的领导干部也很少，没有副旅长、副政委，参谋长是张藩同志（以后任副旅长），政治部主任是吉洛（姬鹏飞）同志。调出的干部也很多，除韦一平同志外，原来的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同志早就调出，乔信明同志调到二分区当副司令员，惠浴宇同志调到第一行政区当专员，以后又要调吉洛同志任四地委书记、三旅政委。韦一平、惠浴宇同志已调一分区，如再调走吉洛同志影响就大了。

军区政委刘炎同志为此专门做了我的工作，找我谈话，要我顾全大局，由于四地委的书记向明同志要调动工作，要吉洛去接替。刘炎同志说，当陶勇同志的政治委员很不好当，他个性强，不易听取不同意见。向明同志是有水平的，地方工作经验丰富，但没有军队工作经验，因此关系不很融洽。日伪对苏中四分区的“清乡”即将开始，向明同志又将调动工作，所以上级考虑再三，从斗争需要出发，调吉洛同志到三旅当政委，任四地委书记。各地方要独立坚持斗争，第一把手很重要，四分区要粉碎日伪的“清乡”，没有一个得力的第一把手是不行的。我当然要服从大局，吉洛同志就调四分区了。吉洛同志有水平，社会经验丰富，比较稳，处事不急躁。我们相处两年，比较合得来。吉洛同志调走后，由阮英平同志任主任。几个得力干部一调走，我的担子就更加重了。许家屯同志是本地干部，虽然党龄短一些，但比

较年轻，有工作能力，当时是如西县委书记，我建议提他担任三地委的副书记，得到了区党委的批准。

十二月间，撤销各级军政委员会，建立了统一领导的各级党委。一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韦一平；二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陈时夫，副书记章蕴；三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叶飞，副书记许家屯；四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吉洛，副书记钟民；兴东泰地委书记黄逸峰，副书记戴为然。各县县委书记都兼县团政委。

在实行一元化领导过程中，党内还进行了加强民主集中制和增强党性的教育，党政军民各组织之间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了在工作制度、工作方法、相互关系等问题上存在的某些缺陷，增强了全局观念。各级党的组织逐步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党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更有利于坚持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

在此同时，实行了精兵简政。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共三地委发出《关于目前精兵简政工作指示》，指出精兵简政是粉碎日伪“清乡”，克服困难，坚持斗争，保存力量，准备反攻的胜利途径。提出了准备反“清乡”的五大政治号召：一切为了坚持原地斗争，反对退却逃跑；一切为了胜利，反对盲目硬拼；一切为了革命利益，反对个人打算；一切为了抗战胜利，要做困难时的英雄；巩固内外团结，维护党的绝对领导。根据以上精神，机构合并，减少层次，干部下放降级使用，减少非战斗人

员，处理老弱病残，清洗不稳分子。

为了坚持原地斗争，大批干部充实基层，并且在大胆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的基础上，提出了干部地方化。三分区和一旅在培养和提拔本地干部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因为调出干部多，地方工作干部老的也不多，必须大胆提拔本地干部。这个问题也就很突出。那时的团长、政委都是老红军，营、连、排各级干部中大多数也是老红军。主力地方化的时候，县长兼县独立团团团长，县委书记兼政委，都是本地干部，但党龄短，有的主力团的团长去当副团长，政委去当副政委，主力团去的干部是老红军，地方上干部大多是新党员、新干部。有些人就不服气，思想不通，向我提意见，说我偏爱知识分子。哪里是什么偏爱，斗争需要嘛！本地干部中有些是外地入党回来的，有些是我军到达以后发展的，共同的特点是从救亡运动的影响下走向革命，参加党，参加革命工作。这批人中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本地干部与当地群众关系密切，本乡本土，这对坚持斗争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对地方情况熟悉的程度，外来干部是不能比的，我虽然在三分区工作了三四年，还是不如本地干部了如指掌。当年大胆提拔的一批本地干部，总的情况是好的，一些同志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一些同志担任过或者现在仍在担任着重要职务。

干部地方化，主要是指外来干部。要坚持原地斗争，必须与群众有密切联系，否则情况紧急时就没有群众掩护。大批干部下到基层，这对加强基层建设是有利的。还有一些同志去做学校工作，因为三分区文教工作基础好，单是泰兴县就有十三个中学，象沪光中学还是从上海迁来的。很多青年学生以后参军了，或者参加地方工作，出了一大批干部。这批年轻干部以后成为解放战争坚持敌后斗争的骨干力量。

精兵简政以后，一旅和三分区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分区司令员是陈玉生同志，出布告是共同署名。地委副书记许家屯同志和专员朱克靖同志也各带一个精干的班子一起行动，合署办公，行动灵活。

根据主力地方化的方案，旅保留一个主力团外，其余则以营或连为单位分别编入各县独立团，充实和提高了县独立团，达到有独立活动和作战的能力。由曾如清同志带一个营到泰县，组建泰州独立团；吴森亚、张孤梅同志带一个加强连去泰兴，充实泰兴独立团；以分区独立团的一部编入靖江独立团，另一部编入如西独立团；另有一个分区特务营。各个独立团都有五个连队以上的兵力。三团则与泰东警卫团合编的泰东独立团，划归二分区编制。这样编组，正确地、辩证地解决了主力地方化和地方军主力化的矛盾，使地方军和主力军的战斗力都得到了提高，各县独立团都能独立活动作战。要进行

一个重大战斗时，旅主力团到一个地方，立即能得到一两个县独立团配合作战，这就非常有利于坚持斗争。

主力地方化后，在十月十九日，我泰州独立团打响第一仗，分两路合围到东夏庄抢粮的伪独立十九旅孔端五部六百余人，并有雅周区千余民兵配合行动。俘敌营长以下六十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部，并夺回被抢的粮食衣物，救下被绑架的青年多人，受到苏中军区的嘉奖，在黄柯庄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大大鼓舞了地方兵团作战的信心。接着泰兴独立团于泰兴东河下伏击，毙伤日军七名、伪军三十三名；如西独立团于陈家庄北泽庄伏击，击毙日军侦探长丸山军等两名少佐。到年底，各县独立团都有扩大，如西、泰州、泰兴三个团都有千余人，靖江独立团较小，也有五六百人。

一九四三年春，日伪开始对四分区进行“清乡”，对三分区进行“清剿”，三、四分区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分区组织六十余人的短枪队，由三专署公安局长带领前往四分区，参加内线的反“清乡”斗争。外线也积极配合。五月四日，我集中泰州、泰兴、靖江三个独立团的主力，在靖江城至新港公路五号桥伏击伪十九师七十三团陈正才部。经过两小时激战，全歼该敌，毙伤伪军百余人，俘伪营长以下官兵四百零八人。五月四日拂晓，如西县蒲西区游击队和民兵三百余人，在如西独立团率领下，合力破毁敌“清乡”封锁线，将白蒲至林梓的

竹篱笆全部拆除焚毁，缴获电线两千余斤。五月十六日夜，我主力一部率如西县蒲西、南马塘区群众八百余人，将丁埝至林梓沿河十二里的封锁竹篱笆全部破除，缴获电线五千余斤。五月十二日，如西独立团向企图封锁我三、四分区联系的三腰桥新筑的敌伪据点进攻，白蒲敌伪三次增援，都被我预伏部队击退，据点全部被摧毁，俘伪军三十余人。七月一日，我三分区部队配合四分区，乘敌人主要兵力集中于海启之机，动员“清乡”区边缘地带群众万余人，发动总破击，在一百四十余里封锁线上，把封锁篱笆全部烧光。

由于地方兵团的扩大，战斗力的提高与区游击队的发展，这从现在能查到的一份统计表也可以看出。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一年间共作战一百三十八次，收复敌伪据点十五个，攻袭敌伪据点十九个，毙伤俘敌伪军三千余人（内俘日军八人，毙伤日军一百四十四名，俘伪军一千六百八十五名，毙伤伪军一千二百六十名），争取伪军反正八百四十五名。

主力地方化后，地方兵团得到了加强，在坚持三分区的斗争中，担负起主力部队的作用，及时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激发群众敢于包围据点、抗捐抗粮的斗争勇气。靖江县群众包围生祠堂、马桥、西来镇，泰兴县群众包围丁家庄、港湾、广陵镇，泰州县包围张甸等敌伪据点，均取胜而归。地方兵团的战斗力也得到提高，泰

州独立团在繆高埭战斗中，一举歼灭伪军孔瑞五部九百余人，俘六百余人，伪军旅长孔瑞五被击伤，仓皇逃回蒋垛。泰州独立团和分区特务营参加了车桥战役，胜利完成了任务。以后这些县独立团就逐步上升为主力部队。泰州独立团扩编为苏中军区第三特务团，在全苏中范围内作战，成为主力部队，迎接反攻的到来。大反攻到来的时候，三分区部队一集中，就成了两个旅，在解放战争中的二十军五十九师，二十四军的七十二师，二十九军的八十五师就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第十九章 整风 生产 练兵

### 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这个认识，是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整风实践才获得的。

敌后的整风运动和延安不同，和延安中央党校更不同。它没有稳定的学习环境，必须服从战争的需要，学习的时间拖得很长，时断时续，时紧时松，逐步取得成效。我很羡慕去延安学习的同志，能在党中央、总学委和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学习，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本来，我有这种机会的，党中央曾决定在一九四一年内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已当选为出席“七大”的代表，由于担任东进任务而留下了。否则，我将和张鼎丞同志等一起赴延安，也将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

一九四二年二月，毛主席在延安作了《整顿党的作

风》、《反对党八股》两篇重要报告，指出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又以反对主观主义为重点。党中央号召全党整顿三风，并陆续发表了二十二个文件。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华中局宣传部发出《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及讨论中央决定的通知》；七月二十六日，华中军分委作出了《关于各战略单位整风的决定》，要求依据战争环境和部队特点，组织党员干部认真阅读规定的整风文件，除少数团以上干部调华中党校学习外，其余排以上干部一面坚持艰苦奋斗，一面进行整风学习。这年冬天，为对付日军大“扫荡”，整风学习暂时停止。苏中三分区由于情况紧张，战斗频繁，整风学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种情况，恐怕在敌后地区也是普遍存在的。

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重新作出自己的整风计划。”并指出：“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前一种是革命队伍中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后一种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四月十日，华中局发出指示，决定把整风学习作为全年的中心任务。六月，我参加了苏中区党委第四届扩大会议，

会议作出了七月开始整风的决定。但是，六、七两月，苏中地区日军开始对四分区进行“强化清乡”，对三分区实行“清剿”。我四分区、三分区均以全力投入反“清乡”、反“清剿”斗争。七月一日，我三分区部队配合四分区，趁敌主要兵力集中海（门）启（东）之际，动员边沿区群众万余人，发起总破击敌人封锁线。八月份又集中力量粉碎日伪军对三分区的“扫荡”。以致无法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整风学习。九月，三分区根据苏中区党委的电示，作出以整风为第一位的任务，普遍开展了整风学习。主要采取在职学习的方法，建立了学习组织和学习制度。地委、旅和分区领导干部编为甲组，县团级干部编为乙组，其余干部编为丙组，按不同内容、不同要求分别进行学习。在个人学习的基础上，小组漫谈讨论，交换心得体会，然后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进行自我总结。当时，部队中军阀主义残余有所抬头，在主力部队更为突出，影响部队内部的干部之间团结和官兵之间团结。我根据自己调查研究和本身的学习体会，就军阀主义残余的表现、危害、思想根源和克服方法等方面，写成《反对军阀主义》一文，发表在师政治部出版的《抗敌杂志》上，以提高认识，纠正军阀主义残余的错误倾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此期间，在进行纯洁内部、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产生了一些绝对化和扩大化的错误，把许多由上海动员参加我军工作的知识

分子，因为家庭历史关系复杂等等原因，被怀疑为托派分子或反革命分子加以审查，有的甚至被拘留审查，幸而我们自己及时发现这个错误加以纠正，没有导致产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还是伤害了一些同志。

一九四四年三月，车桥战役后，苏中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苏中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了。分批抽调干部分别到区党委党校、军区政治部整风队以及地委整风队进行离职学习。苏中公学和抗大九分校亦进行专门整风学习。

我们在整风中有个特点，除了学习中央统一规定学习的整风文件以外，还专门学习华中局印发的刘少奇同志的著作《论党》。这本书不是后来全国出版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而是他在华中局党校和其它场合的讲演，和在华中地区发表的文章。记得有《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党》、《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论党内斗争》、《人的阶级性》、《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等文。这些著作和论述是针对当时华中党组织中存在的实际情况和问题而提出的，我们学习起来倍感亲切；但它又是总结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系统的建党学说。《人的阶级性》一文，精辟地阐述了阶级性和党性的关系。《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续篇，把党员和党的关系比作细胞与人体的关系。他要求“每个

党员应该成为党内积极的、活动的因素，应该起积极的、推动的作用，而不应起消极的作用。”论述了民主集中制，论述了党员和领袖的关系。他认为党的组织结构，同其他事物一样，是矛盾的统一体。党是由各个不同的党员结合成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结合而成的统一组织，就是党的基本组织结构，而结合的形式就是民主集中制。”一方面党员决定了领袖，另一方面党员又必须服从领袖。“党内没有不受党的组织支配的任何个人，如果领袖不受党的支配，而且要支配党，就不成其为领袖。但是党一定要有领袖，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这说法是错误的。只有民主或只有集中都不能达到党的团结和统一。统一不只是集中，而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同时，没有集中也就没有统一。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就会产生专制政体，在党内就变成了家长制。所以，民主集中制才是党的正确组织原则。《论党内斗争》一文，着重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特殊条件，并指出我们党内斗争中一种严重的偏向，是斗争进行得过火，是党内斗争的绝对化、扩大化，走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倾向，即党内斗争中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党内组织上的官僚主义错误倾向。列举了党内“左”的过火的斗争的各种表现，及其所造成的恶果，还分析了无原则纠纷与无原则斗争的几种表现。这些论

述，对于认识和总结我们党所经历的道路和经验教训非常有益。一九四四年的整风运动也是为战略反攻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 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九年就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要求部队、机关学校开展生产运动。在一九四二年又提出了战斗、生产、教育为敌后根据地的三大任务。《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为该报撰写的社论：《敌后的敌后也能搞生产》。号召各根据地毫无例外发展生产。指出整风和生产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两个“环子”，必须狠狠抓住。新华社也不断播发中央机关、延安和陕北各地以及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消息、事迹和经验。陕北的一些著名劳动模范，也是根据地军民熟知的人物。

苏中地区的大生产运动不如其它地区那么轰轰烈烈。这有客观原因，也有认识问题。有人认为苏中开辟较晚，尚难进行生产工作；有人认为苏中富足，不需要进行生产工作；大多数人认为苏中战斗频繁，不可能进行生产工作。所以在一段时间内，还没有把群众的自发要求逐步变为有领导的群众运动。一九四四年县、区、乡三级都设立有中上层人士参加的生产建设委员会，县

设生产建设科，区设生产建设股，从组织上保证生产建设的领导，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大生产运动中，部队按照后方机关、地方武装、作战部队、医院、工厂等不同情况，制定了以农副产品及日用品自给、半自给为目标的生产计划。有开荒种粮种菜的，有饲养家禽家畜的，有开办作坊、组织运输的。当时一团是苏中主力部队，在整个苏中地区活动，没有固定地点，但在短期休整期间，还是进行了北行、施家桥、固津三次大规模的开荒种粮活动，每次开荒两三百亩。休整时，全体部队参加劳动；执行战斗任务时，各连派出数人，组成生产队留守，进行田间管理。各县独立团做到菜金自给八个月，保证部队的油盐肉食供应。生活改善了，广大指战员的体质普遍得到了增强。

这个时期的军工、军需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苏中三分区离上海近，经常派人到上海扩军，上海地方党也动员工人、学生参军。我们就把技工、上海人称之为“外国铜匠”的，和学理工科的大学生，调集到旅和师部军工科。这些技工师兄师弟很多，再通过他们动员熟悉的朋友到根据地参加军工生产。象程望、吴凤仪、袁德等人建国后都是国防工业的骨干。还有个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洛克，也在长期的军工生产的实践中，成为不错的专家。一旅、三分区军工科人数最多时达三百人，分为榴弹厂、弹药厂、修械厂等。一九四四年生产的手榴

弹已能自给，迫击炮弹、枪榴弹、掷弹筒弹可自给百分之七十，步枪子弹可自给百分之三十。除完成修理枪械外，还能够自制掷弹筒、六〇轻型迫击炮等。

一九四二年冬精兵简政时，为了保存军工骨干，将技术突出的徐昆、张震、丁逸三同志分配到一团。当时军工科科长许松同志和一团领导协议，一旦军工科恢复和发展生产时，随时调回。但落到一团团长廖政国同志手里后，再也调不回了。就象老母鸡孵小鸡，三人为骨干，配上一些普通工人，调些战士当杂工，小小兵工厂就开张了。把部队作战时的子弹壳都收集起来，配上新底火，装上火药，自造弹药。随后，派人到上海、苏南等地买来无缝钢管、自来水管、铁轨……，制造掷弹筒、六〇炮，锻制三刃刺刀。再后来，改造八二迫击炮为曲射平射两用炮，研制步枪送炸药、迫击炮送炸药……愈出愈奇。

以后，旅军工科所属工厂集中到师军工部，驻宝应安丰附近的林上。环境安定，生产扩大。各式迫击炮弹大批量生产；轻迫击炮：七三口径的完成五十门，五二口径的完成二百七十门，生产上了轨道。

一九四四年十月，粟裕同志率三旅南下之前，和我一起去林上军工部视察。我在大会上讲话，表扬了军工部完成了大批迫击炮和炮弹的任务。军工部在大会上授予十位同志以劳动模范称号。



一旅、三分区最早建的军需工厂是被服厂，以后又陆续建立了军鞋厂、毛巾厂等多处，生产了许多被服装具和日用品，保证了部队的军需供应。

## 军政大整训

《中央关于整训军队指示》中，分析我军当时情况时指出：“我军经过了七年抗战锻炼，从这方面来说是提高了。但是我军现在进行的是极端分散游击战争，这是完全必要的；极少集中整训与集中作战，从这方面来说是退步了。”因此，“要求一年内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都应得一次有效的大整训。”“一切准备将来供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整训内容分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军事整训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练兵的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练兵要“实行群众运动的方法”，“使到处成为操场，到处成为课堂，时间抓得很紧，人人不甘落后，使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

“实行学用一致的方法”，“练兵内容要切实实用，不是为练兵而练兵，而是为战胜敌人而练兵。”“一年整训期内的政治工作须作一个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必须保证整个整训任务的完成。”《华中局关于部队整训的指示》把这次整训的意义，讲得非常明确，“是为了迎接快要到来的大举反攻日寇，把它驱逐出中国大城市和

交通要线，因此在思想和技术上应做一番准备。”

华中局上述指示中还规定了政治教育的内容：“以整风教育为主要内容，辅以时事教育及其他必要的政治文化教育。”并且在应注意的问题上指出：“现在干部的整风尚未完毕，除一部分干部经过整风学习外，其次仍须继续抓紧进行整风，各部队战士的整风可以在整训中进行，以坦白大会、检讨会等方式进行反省检讨。”部队首先开始政治整训。

这时，重新发表了古田会议决定，新华社播发了谭政同志在留守兵团关于政治工作的讲话，和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的文件，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作为连队政治整训，也就是连队整风的重点，改善官兵关系。在学好文件，搞通思想的基础上，召开连队民主大会，干部带头检查管理教育上的缺点错误，虚心听取战士的意见，提出改正缺点错误的措施。许多战士也自觉地进行了检讨。在此基础上，召开官兵团结大会，干部战士分别订出“爱兵公约”和“尊干公约”。这一政治整训带有很大的群众性，所以称之为“拥干爱兵运动。”

拥干爱兵运动采用创造和发现典型，向全体推广的典型与一般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说服教育，打通思想，转变落后分子的骨干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表扬先进，奖励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和模范工作者，树立先进带动全体的方法，使部队政治工作大大前进了一步，成

为解放战争中诉苦教育、立功创模、团结互助的先河。

拥干爱兵运动先在一团试点。发现特务连有个落后战士李少清，由于害怕艰苦，表现不好；加上连队干部和排长管理教育方法生硬，抵触情绪很大，经常装病、吵架、顶撞，成为全连有名的落后分子。排长秦金龙学习文件以后，觉得李少清成份很好，出身很苦，本质还是好的，从自己管理方法上找原因，感到自己排长当久了，架子大了，不关心战士了，处理问题就简单粗暴。他越想越惭愧，连夜找李少清谈心，检讨了自己的缺点。李少清也大为感动，检查了自己害怕艰苦，顶撞领导。两人谈到天明，越谈越心贴心。李少清患感冒，排长问寒问暖，亲自下伙房烧病号饭端到床前，更使李少清深深感动。李少清悄悄写了保证书，上面写着：“尊重干部保证做到的五条。”指导员刘时雪发现后，召开了“李少清进步大会”，团里的油印小报《前进报》还出了《李少清进步特刊》，全连掀起了学习李少清的热潮。团政治处抓住这一事例，帮助战士们在李少清的保证信基础上，订出“拥干公约”；又帮助干部在秦金龙大会上口头表态的基础上，订出“爱兵公约”，召开了“拥干爱兵团结大会”。这一经验在全团推广后，官兵关系得到改善，调动了干部战士的积极性，全团面貌一新。

特二团发现的典型是曹立三。曹立三原是兴化县民兵大队长，参军后当战士，有地位观念，不安心，闹情

绪，经过拥干爱兵运动，思想有了很大转变，决心当好一名普通战士。曹立三的转变，对根据地新参军的青年农民影响很大，进一步明确了参军目的，决定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杀敌立功。根据地参军战士中的这个教育运动，就命名为曹立三运动。赖少其同志为此写了一个大型广场歌剧：《曹立三转变》。广泛演出后，对推广这个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经过政治整训，部队转入了以提高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大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练兵运动。各级干部深入训练现场，与战士同课同操作，互教互学，坚持学用一致，教学与实践相结合，采取沙盘作业、评议战例等方法，总结正确运用战术技术的经验，提高了训练效果。对运动战、攻坚战、近战、夜战、巷战、步炮协同、爆破登城以及正规养成等内容，也进行了训练。

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留守兵团二七〇团等部队的练兵经验，经新华社播发全军。干部们普遍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对于“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经验，讨论得十分热烈。官教兵，应该；兵教兵，老兵教新兵，也没有什么异议；兵教官，很多人就有不同看法了。兵怎么能教官呢？兵拿什么教官呢？兵能教官要官做什么？同意兵教官提法的少数人，也提不出说服人的理由。正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有个营部书记，名叫巴赛，上海下来的青年学生，没有进过抗大，平时练兵也不大

参加，打仗时带伙房油盐担子、骡马、担架，可说战术、技术都不摸门。全团会操，团长下了命令，排以上干部集合，进行投弹测验。这个巴赛，轻轻一摔，手榴弹飞出七十米！再来，又是一个七十米！参加会操的干部战士都看呆了，原来这个洋学生，在念书时是个标枪运动员。能者为师，于是当了投弹教员。可见虽然不是“官”，也有一技之长可教。一时间，能人都请了出来，打野鸡、野兔的猎户可以教射击，渔家儿子可以教游泳，国民党军队的老兵可以教队列，学过武术的可以教擒拿格斗……

练兵中注意学用一致，注意与实践相结合。我到一团所在的北行去，只见练兵场上高高竖起两根竹竿，竹竿顶端扎上两根横竿，横竿之间又扎着三个竹圈。离开那个时代，就弄不懂竹竿竹圈和练兵的关系了。那时日伪军碉堡高高矗立，为了视角广、射界宽，上层的瞭望孔和射击孔都比较大，于是战士们根据这点练习高空投弹，把手榴弹从瞭望孔、射击孔投掷进去，杀伤敌人。那么远，那么高，那么小，能投的那么精确吗？那天表演给我看的是一团一营一连一班副班长王正发，人称“榴弹大王”。只见他一个箭步，右臂一扬，铁弹凌空飞越竹圈，而且连中三元。其它类似的创造还有多种。

练兵中还注意发挥各部队的专长，并且有意识的培养各个部队的专长。一团、特三团擅长野战，这方面就

多研究些，多训练些；七团、特四团善于攻坚，也就加强攻坚训练。在各个团队中又注意培养各个连队的特长，有夜摸连、攻坚连等。当然，发挥专长并不是偏废其余，而是有所侧重。

这次军政大整训，可说是一团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第四次大练兵，又在军政素质上有了很大提高，为以后进行大规模攻坚战、运动战进一步打下基础，为进行反攻，为以后进行的车桥战役打下了基础。

## 第二十章 车桥痛歼日寇

### 三仓河会议

一九四四年二月春节前后，敌后抗日根据地苏中地区在驻地东台县三仓河召开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到会的各分区、地委和各旅的负责人和苏中区党委负责同志一起，一面就着木炭盆取暖，一面讨论形势和任务，安排新的一年工作。

一九四三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这年盟军在意大利登陆，意大利宣布投降，苏联红军发动了强大的冬季攻势，德寇已基本被驱逐出苏联国境，德国败局已定。在亚洲，日寇在太平洋战场连续失利，遭到中国敌后各战场军民沉重打击。华中敌后也发生了变化，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三分区的反“清剿”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军已逐步取得战争主动权。“今年消灭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的响亮口号传遍

各地。但斗争仍是艰苦的，日军妄图依靠大陆，作最后挣扎。苏中抗日根据地当面敌寇军事力量仍很强大，各个分区被分割的局面还没有改变，领导机关经常处于游动状态。由于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地方，训练干部和训练部队、发展生产都很不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迎接大反攻的到来，参加党委扩大会的同志经过分析，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新的战役，以改变当前的局面。我们认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主观条件是具备的：反“清乡”、反“清剿”斗争的胜利，使军民斗志高昂；主力地方化以后，部队实力得到了加强，在斗争中又发展了一批仅次于主力团战斗力的县独立团；通过集中的冬季练兵，部队的战术、技术都有了新的提高。同时，政治工作也发挥了威力，部队开展了群众性的拥干爱兵运动，士气更加旺盛。新的战役选择在哪里呢？会议经过分析和比较，一致同意发起车桥战役。因粟裕同志要继续主持会议，决定由我负责指挥这一战役。

## 攻 坚 打 援

车桥，是淮安城东南二十余里的大镇，位于淮安城、泾河镇、泾口镇、曹甸镇之间，是日伪控制淮安东南宝应地区的重要据点之一。敌伪军在车桥和泾河、曹甸、



泾口一线构筑了据点，分割了苏中一、二分区。但是敌伪据点，空隙较大。这里又是日寇华中派遣军驻扬州第六十四师团与驻徐州第六十五师团的接合部。两部之间配合较差，便于我军插入其接合部，以打开苏中根据地的局面，控制苏淮边区的战略机动地区。

战役发起前，我将一团、七团、五十二团等集结于泾口、曹甸一线以东的蒋营地区。师指挥所位于收成镇。

经过反复权衡，我们决定先集中兵力打车桥。第一，因为车桥是该地区敌军指挥中心，拿下车桥则泾口、曹甸孤立，便于我军尔后进攻，扩张战果；第二，车桥处于敌中心地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以为比较安全，估计不到我会绕过外围打车桥，便于我军采取掏心战术，突然进攻，出奇制胜；第三，车桥周围地形比泾口利于攻击部队的接近；第四，车桥敌军虽然来援方向较多，但距敌两个师团部驻地徐州和扬州都较远，一时得不到大部队增援。而且敌军主要增援的方向——距车桥十二华里的芦家滩一线，有良好的设伏阵地，便于我军伏击来援之敌。

这是一场硬仗。敌伪军在车桥垒高沟深，设防十分严密。四周筑有大土围子，外壕里面还有许多土围子，沿大小土围仅碉堡就设有五十三座，还有许多暗堡封锁地面。里面驻有日军八十余名，伪军六百余名。很明显，

敌人以深沟高垒对付我们，我军必须发扬高度的进攻精神，实行攻坚。我们还要准备打援。敌人控制点线，交通便利，增援容易，如果没有力量消灭援敌，也就无法拔除据点。只要援敌离开据点，就便于我在运动中歼灭他们。因此，我们把参战部队分为三个纵队，确定攻坚、打援同时并举而以打援为主，以一个纵队担任攻坚，两个纵队担任打援。

## 攻 取 车 桥

三月四日午夜，月明星稀，车桥高耸的围墙、林立的碉堡，清晰可见。午夜二时许，攻击车桥的七团传来捷报。一、二营分两路向土围实行袭击，突击队员泅过外壕，同时架起数十架云梯，登上围墙，随后战士们潮涌般地过了深壕。三道流星窜上夜空，北面的一、三连首先突破围墙。

占领碉堡的伪军负隅顽抗。被誉为“飞将军”的六连战士陈福田，腰上别满手榴弹，背上梯子，冒着弹雨，飞身爬上碉堡顶盖，抡起十字镐挖开窟窿，将一连串的手榴弹塞进了碉堡，顽抗的敌人被消灭了。接着三连乘胜继续攻击伪别动大队，占领了涧河以北的街道房屋，监视小圩内的敌人。

一连向围墙上的两个碉堡发起进攻时，战士蔡心田

发挥“百步穿杨”神技，飞步窜近碉堡，一枚手榴弹凌空而起，准确地从敌枪眼里投进了碉堡，突击组冲了上去，全歼驻守伪军。接着，他们又向伪军补充大队部发起攻击。

告捷的流星此起彼伏地窜上夜空。不到一小时，一千余健儿次第攻入市镇，向街心发展。二连泅渡了两道两丈多宽的外壕，突破围墙，在伪军尚未来得及占领碉堡时，就将其大部歼灭。四连从西南角突破围墙后，越过敌火力封锁，在墙上开洞，迅速打进警察局。伪军猝不及防，全部被俘。六连泅水渡壕时，被伪军哨兵发现，前卫班奋勇前进，活捉哨兵，先后占领两个碉堡，随即向纵深发展，跃过第二道围墙，攻击东南碉堡。

五日上午十时，伪军补充大队驻守的两个碉堡，被我七团攻占。我军冲进屋内进行白刃战，全歼守敌，俘虏伪大队副以下八十余人。十一时，伪军一个中队全部投降。

车桥镇上硝烟正浓，三师参谋长洪学智同志率一个骑兵排，来到我的指挥部，带来了七旅部队攻克朱圩子的捷报。三师部队的策应，保障了我师作战部队北面侧后的安全。指挥攻坚战的三旅旅长陶勇同志陪同洪学智同志进入车桥镇里，他仔细地观察了敌人防御体系，称赞攻坚部队的勇猛、灵活。

下午二时许，车桥内的碉堡陆续被我占领，只剩下

日军和伪军一大队部的两个小围子尚未攻克。不久，我攻击部队又以山炮、迫击炮向敌据圩子发起轰击，将敌一些大碉堡及暗堡打塌。

## 芦家滩歼援敌

正当攻坚纵队围歼凭坚固守的日军之际，车桥西北的打援战斗也已打响，成为师指挥所注视的焦点。

车桥西北的打援地点选择在芦家滩一带，南有涧河，宽二十余米，水流湍急，河岸险陡，不易徒涉；北面是一片草荡，宽约一里，长约二里，芦苇密布，淤泥陷人；中间形成狭窄口袋形地域，淮安到车桥的公路就由这里穿越。来援之敌进入这个地域后施展不开，有利于我军在这里歼敌。就在这里，一团三营构筑了阻击阵地，在阵地前沿敷设了地雷；突击部队主力一营、二营和特务营隐蔽于芦家滩以北和西北一线，待机出击。

五日下午四时，师指挥所接到一团报告：淮安来援日军乘坐七辆卡车，于三时十五分进至周庄附近。根据车辆和装载量判断，我们估计日军约为二百四十余名左右。

这天东北风大起，当地黄尘遮日，飞沙扑面。一团三营战斗警戒分队在周庄与敌接触后撤回。敌继续进至韩庄附近，进到我阻击阵地前约五百米，三营轻重机枪猛

烈开火。敌军在慌乱中，闯入我在公路以北预设的地雷阵。触发雷、引发雷，一阵接着一阵爆炸，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伤亡约六十余，锐气大挫。敌后续部队不敢沿公路前进，向我三营阵地迂回，企图绕过草荡。我二营发现后，立即予以阻击，迫使日军缩回韩庄固守。

根据情报，师指挥所查明：在我军攻打车桥后，驻淮阳、淮安、泗阳、涟水等地日军第六十五师团第五十二旅团的六十大队，先后在淮安集结，由三泽大佐统率，将分批驰援车桥之敌。

果然，不久敌第二批增援部队约二百人又到；午后五时三十分，第三批援敌一百余人赶到；紧接着，第四批跟着到来……但由于遭我侧击，这些增援日军都猬集于韩庄。

黄昏，风沙依旧，暮色浑暗。韩庄之敌多次偷袭我三营阵地。七时许，敌又集结主力猛攻，企图突破我正面阵地，均被我军击退。我军愈战愈勇。由一团二营和三分区特务营组成的突击部队犹如猛虎下山，分成四个箭头扑向日军。六连首先攻入，进占韩庄西头。闽东红军老战士三排长陈永兴，在手榴弹爆炸声中，率先冲入敌群。六班长许德胜端枪紧跟，率领战士与鬼子拼开了刺刀。日寇横尸六十余具。四连和特务营一连分别由北、西两个方向攻入韩庄，随后五连也自东面突破，把日军截成四段，和敌人展开白刃战。十时许，三营俘虏的日

军军官中，有一名身负重伤而又狂呼乱叫的军官，身挂银鞘指挥刀，战士们把他抬到包扎所时，已经死了。经俘虏辨认：正是三泽大佐！

正当在韩庄展开白刃战之际，草荡东侧发现一簇簇火光。原来一部分日军由伪军淮安保安团三十余人带路，趁夜暗从我军阻击阵地右翼徒涉偷越芦苇荡，进至草荡东北，遭到一团七连和泰州独立团一、二连的堵击。敌一部逃向三面环绕险阻河道的小马庄。午后十时许，一团一营攻击小马庄之敌。三连三班班长刘绍勇带领全班首先飞速越过庄北小桥，抢占房屋。经过逐屋争夺，反复冲杀，我军迫使敌人退据数间小土屋。

六日二时许，经我打击，敌援兵溃乱，四散逃窜。有的跳进芦苇淤泥里，有的窜到我打援纵队指挥所附近，被警卫员、通信员捉住。天色大明后，战士们仍在到处搜捕溃敌。“活捉鬼子呀！”“缴大炮啊！”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正在此时，西面又响起了一阵马达声，汽车载着一百二十余名日军，企图进至小王庄、韩庄之线，遭我三分区特务营、一团二营拦路阻击，敌转身逃回周庄据点。就在汽车马达轰鸣声中，一群头发焦枯，脸面烧肿，浑身污秽的鬼子，没命地向公路奔走，被我一连跟踪追上，统统捉了过来。

与此同时，偷渡芦苇荡的三十余名伪军，绕道到师

指挥所附近后,也被山炮连战士一个不剩的“照单全收”了。担任曹甸、塔儿头方向的打援左纵队,也在大施河击退了来援日军。至此,宝应城以南的日本侵略军全部龟缩在据点里了。

车桥战役以歼灭日军八百(内俘中尉以下四十八人)、伪军八百余、缴获九二式平射炮两门及其它军用品无数的辉煌胜利向全国人民告捷。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在《抗战八年来八路军新四军》一书中曾经指出:“在抗战史上,这是一九四四年以前,在一次战役中生俘日军最多的一次。”

### 乘胜扩张战果

车桥战役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不久,曹甸、泾口、泾河、周庄、塔儿头、望直港、张家桥、扬恋桥、蚂蚁甸、蛤拖沟、鲁家庄等十二市镇日伪据点全部解放,百万人民重睹天日!人民莫不欢腾万状。

芦家滩打援部队将俘获的日军官兵陆续押送到师指挥所。师政治部敌军工作部成了最热闹的地方,远道而来的居民和战士们围看战俘,欢快地议论着。敌军工作部部长陈超寰同志告诉我,战俘们惊魂初定,感慨万千。日军炮兵中尉山本一山说:“这次战斗失败,我们犯了轻视新四军的错误。”一等兵水野正一伸着大拇指说:“我佩

服新四军作战巧妙，惊叹新四军士兵攻击精神旺盛。”伍长石田光夫感慨地说：“我现在清楚知道了，日本兵战斗意志，完完全全比新四军低下。”他们凄然喟叹：“皇军日暮途穷了！”

第二天，新闻台收到了延安新华社广播“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的消息，赞扬我新四军一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第三天又详细报道了车桥战役的经过。

这是来自延安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鼓舞了所有参战部队和全军区的军民。车桥之战是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反攻的标志。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在望了。



## 第二十一章 天目山反顽

### 发展苏浙皖 迎接大反攻

车桥战役以后，苏中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转移到宝应地区。利用这一相对稳定的环境，在党校和军区整风队，集中大批干部开展整风运动，并组织大生产、整训部队，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反攻做思想物质准备。

这时，苏联红军开展强大攻势，德国法西斯已面临总崩溃，布加勒斯特、索非亚、贝尔格莱德相继解放；法国地下武装力量解放了巴黎；美、英军队占领了布鲁塞尔。在太平洋上，美军向菲律宾进攻，并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在中国战场上，日寇遭受我解放区军民猛烈打击，处境日益危殆，但为了挽救其败亡命运，一面大举进犯湖南、广西，企图打通朝鲜至马来西亚的陆上交通，一面以进犯浙赣铁路的一部兵力转向东南沿海进攻，占领温州、福州等地，企图制止美军登陆，谋求沿岸和

海上交通的安全。而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消极抗战、保存实力、排斥异己、坐待胜利的政策，在日寇进攻下，百万大军一触即溃，八个月损兵六十万，河南、湖南、广东、广西广大地区相继沦陷，日军长驱直入我国西南腹地，东南沿海港口也全部丧失。

根据上述情况，党中央确定发展东南、华南各省敌后抗战，准备配合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和迎接战略反攻。一九四四年八月，中央军委决定派王震、王首道同志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湘粤桂边，依托五岭山脉创建华南抗日根据地，逐步与鄂豫皖湘赣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并打通与东江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准备配合盟军作战。九月二十七日，中央又给华中局发出《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总的方针和部署》的指示，要求“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华中在西进发展河南、南下发展东南的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江北兵力尽可能抽调南下，一切工作首先着眼保证南下任务的完成。”

华中局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于十月九日确定了发展苏浙皖地区的方针和部署，提出：“浙东部队应向天台、临海以南发展，与坚持浙南的龙跃部队打通联系；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工作中心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宁）杭国道伸向天目山周围，以便越过钱塘江与

浙东打通联系，造成连接苏浙的战略形势。”

鉴于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敷分配，中央要我带领一个主力旅渡江南下，会合十六旅，恢复六师，由我任六师师长，担任南进任务。粟裕同志请求由他亲自率领部队南进。十月二十三日，华中局同意粟裕同志率一个旅首批南下，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同志。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粟裕同志南下发展苏浙，我留苏中主持工作。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又电告华中局，粟裕同志南下后，要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苏南和全浙。十一月十二日，粟裕同志到达新四军军部，同张云逸副军长、赖传珠参谋长等拟定了发展东南的具体部署，上报中央，提出由粟裕同志先率一个旅及党政干部三百余人南下，会合十六旅，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间敌后地区，作为控制天目山全部的前进阵地，然后与浙东部队打通联系，控制会稽山；分兵一部进占象山敌后，再进温州地区，相机由浙入闽。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复电同意这一部署。

十二月二十六日，刘少奇、陈毅同志从延安致电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分析了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形势，并强调指出：新四军主力除防御李品仙顽军外，均应在战略反攻开始时南渡长江，实现“破敌、收京、入沪”，在广大江南地区大发展。除将主力逐步南调外，应进一步加强江北各根据地建设，使之成为坚强的战略后

方。

十二月二十七日，粟裕同志率一师师部和七团及三百多名地方干部，由苏北仪征过江，穿越宁沪铁路，于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到达浙江长兴仰峰界，与十六旅旅部会合。另特一团、特四团由三旅旅长陶勇同志率领，由扬泰地区渡江，经丹北到达长兴地区。以十六旅为第一纵队，浙东游击纵队为第二纵队，陶旅为第三纵队，执行南下任务，采取逐步发展、逐步巩固的方针，首先打开苏南、浙西局面，再与浙东打通联系，控制全浙江，相机向南发展；浙南游击队向瓯江以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福建党领导的游击队向福建沿海敌后发展。

我接替粟裕同志担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和苏中军区司令员，着手以原一旅旅部为基础，组建一师兼苏中军区领导机关。

不久，中央又来电示：为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已带一个旅南进外，决定再派第二梯队南下，军部准备移驻皖南，组成江南大营向东南大发展。具体部署是：第二梯队一路，由我率一师一个主力旅继续南下天目山，渡富春江，与浙东游击纵队会合，由此而南下浙南，进入闽浙赣老苏区；一路，由谭震林同志率二师主力南下皖南，由此面向皖浙赣老苏区发展；打开局面后，新四军军部南移皖南，由陈毅同志从陕北回来主持，也就是当年中央苏

区的局面了。苏中、淮南部队南下后，黄克诚同志的第三师接替苏中和淮南。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中央军委命令成立苏浙军区，粟裕同志任司令员，谭震林同志任政治委员。但是，谭震林同志始终未到任，这是由于形势有了变化，任务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日寇由于德国法西斯即将溃灭，太平洋战场上的败绩，中国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的威胁，蒋介石在美国支撑下一时诱降无效，不得不收缩兵力，先后撤出了南宁、柳州、福州以及新昌、兰溪等地。中央指示：暂缓执行上述计划，谭震林同志和我都暂缓率部南下。二月二十四日，中央电示苏浙军区：在敌打通浙赣铁路以前，苏南、浙东、皖南部队应以巩固现地为主，深入农村，整训、扩大部队，随时准备反击反共顽固派可能的进攻，准备将来大举跃进。二十八日，毛主席又指示华中局：“粟裕占莫干山后，应巩固现地，如顽来攻，则反击之。”

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虽然畏敌如虎，望风而逃，但对于抗日人民和新四军、八路军却是如狼如虎，视机反噬的。国民党军第三战区主力大部在日寇进攻浙赣铁路、占领浙江沿海时向闽北、江西逃跑，但仍留一部主力和地方武装控制天目山地区。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第三战区指令其苏浙皖挺进军，出动第二十八军和忠义救

国军所属五个团，向我军进攻，激战于孝丰地区，被我军击退。这就是浙西第一次孝丰反顽战役。

三月一日，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又以十二个团的兵力向我苏浙军区部队进攻，占我孝丰城外围白水湾、报福寺等阵地，企图夺取孝丰城，又被我击退，战史称为浙西第二次孝丰反顽战役。

很明显，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决不会就此罢休，必然要出动更大兵力来从我军手中夺取天目山这块逼向上海、南京的重要阵地。粟裕同志打电报向党中央建议：第一、二次浙西孝丰反顽战役，由于兵力不够未能歼敌。如果有三个旅，就可操胜券。建议由我率苏中一个主力旅南下。粟裕同志这一电报，同时报了华中局和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

苏中区党委陈丕显等领导同志都持不同意见，认为苏中部队主力，王必成同志于一九四二年冬第二旅南下，粟裕、陶勇同志于一九四四年冬第三旅南下，如果我再带一主力旅南下，苏中就没有主力部队了，这对苏中斗争是极为不利的。

我当时很犹豫。陈丕显等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一旅如再南下，苏中地区就没有骨干，对坚持这一地区的斗争不利；从长远来看，对战略反攻也不利。但是，粟裕同志的意见也是有道理的，打起仗来，只有两个旅，两次孝丰战役都未能歼敌，如再增加一个旅那就不同了。

粟裕同志要我向中央表态同意南下，又使我很为难。

为了支援粟裕同志，我考虑再三决定南下。那时我没有预见到抗日战争结束会如此迅速，苏中地区已比较稳定，没有什么仗打，而苏浙方面可以大发展，但需要再增加兵力。我也考虑了苏中的具体问题，经过交换意见讨论决定了具体部署。一是军区领导班子：以陈丕显同志担任区党委书记兼任军区政委，他主要精力是领导地方党政工作，因此我推荐姬鹏飞同志由四分区调任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可以作为阿丕同志的有力助手。以管文蔚同志任军区司令员，我推荐胡炳云同志、张藩同志任副司令员，并由张藩同志兼参谋长，以协助管文蔚同志。第二，军区领导机构刚刚组建，不宜再动，确定全部留在苏中不动。第三，原定带走一个主力旅，我提出由老六团部分基干组成的特三团留在苏中，使苏中保有骨干武装，南下部队除一团外，另有特二团和一个地方团。这样安排以后，苏中的领导同志同意我率部南下，即将以上部署电报中央和华中局。

中央军委于三月十一日复电同意我率部南下天目山。这由一团、特二团和江高独立团组成的旅，番号为第一师教导旅，旅长廖政国、政委韦一平。金明、章蕴等同志带领地方干部二三百人随军南下。四月七日从丹北和靖江地区分两路渡江，四月二十三日先头部队到达长兴地区与苏浙军区会合。第一师教导旅改称为苏浙军

区第四纵队。

我被任命为苏浙军区副司令员。党中央原确定成立苏浙中央分局，因为要领导苏南区党委、浙东区党委和浙西地委。粟裕同志感到局面还没有打开，向党中央建议先建立苏浙区党委。党中央同意这一建议，浙东、苏南、浙西均属苏浙区党委领导，粟裕同志任书记，我和金明同志任副书记。

### 第三次孝丰战役

国际形势正在激剧变化。四月三十日柏林解放，五月八日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三月十六日美军攻占琉璜岛，六月二十二日美军攻占冲绳岛。德国法西斯溃灭了，日本军国主义也在走向崩溃……

国民党顽固派在干什么呢？五月中旬，日伪出动十个团的兵力，并和顽军秘密勾结，向苏南江宁、茅山地区“扫荡”；又从杭州、湖州等地集中兵力，向莫干山、天目山地区进扰。国民党第三战区乘机调集十四个主力师，企图歼灭我苏浙军区主力于天目山地区。五月下旬，国民党顽固派以一个师进到富春江以北地区，企图切断天目山与金（华）肖（山）地区的联系；以另一个师向孝丰进扰。杭嘉湖地区的顽军则向莫干山地区蠢动。



开始，我军没有发觉国民党军的大举进攻部署，决定由我率领四纵队渡过富春江，会合二纵队，打通浙西与浙东的联系。以王必成纵队、陶勇纵队担任掩护，统一归我指挥。五月十九日，十一支队顺利南渡富春江。我率领三个纵队由新登地区出发，向富春江新登地区攻击前进。六月二日，攻占新登县城，十支队准备南渡富春江。第二天，顽军猛攻新登，王必成纵队在新登与敌激战。

中午，主力团团长刘别生同志，为了坚守虎山阵地，亲临前线指挥，率部展开白刃肉搏，多次击退顽军的反扑，不幸身负重伤，英勇牺牲在新登密山脚下。

此时从俘获文件和俘虏口供中获悉：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已大举向我进攻，由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担任总指挥；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为前敌总指挥。右翼兵团为突击一、二纵队共九营，七十九师全部，指挥官为突击纵队副司令官胡琪三；中路兵团为二十八军（欠五十二师）及忠救军，指挥官为二十八军军长陶柳；左翼兵团为五十二师、三十三旅及一四六师的一个团，指挥官是苏皖边区绥靖指挥部司令兼江南行署主任刘秉哲。其进攻部署为：第一阶段占领临安及天目山；第二阶段占领孝丰，尔后突击纵队深入莫干山地区，五十二师深入郎（溪）广（德）地区，企图将我军歼灭于孝丰地区或驱逐我军回江北。

六月四日下午，我召集王必成、陶勇、廖政国三位纵队司令员开会，研究是否在这一地区决战？王必成同志由于刘别生同志的牺牲，情绪十分激动，力主就地决战。我则认为新登远离根据地，在此地仓促应战，极为不利，天目山区从来缺粮，依靠宁国地区输入，国民党军切断粮道后，粮荒十分严重，人民群众已开始吃青苗；我军粮食靠苏南供应，时常发生断炊现象，此地距离根据地有三天路程，补给不上，难以持续作战。进攻的顽军大多系国民党的精锐部队，五十二师、七十九师，在皖南事变中是充当主要打手的；突击纵队按英国军队编制，纵队下属营，每营一千人，英式装备，据说原拟赴缅甸作战的，所以称为国际突击纵队。突击纵队是五月间专程调来进攻天目山区的。因此从兵力上、装备上、补给上我军均处于劣势。而更重要的，我军对顽军的具体位置不清，顽军弱点尚未暴露出来，仓促应战，没有把握。认为诱敌深入到孝丰地区决战为有利。

但那时王必成同志正在气头上，陶勇同志比较冷静。我和陶勇同志交换了意见，他同意我的意见。王必成同志情绪稳定下来后，也同意我的意见，一致同意：诱敌深入，诱敌进至根据地腹部孝丰地区，暴露了顽军在进攻中的弱点，再行歼敌。

当时，苏浙军区司令部驻在孝丰城附近的吴家道。我们取得一致意见，下定决心诱敌深入时已是下午四、

五点钟了。我们用电报报告粟裕同志，决定以一个纵队担任节节抗击敌人三天，诱敌深入孝丰地区进行决战，请速部署战场。

六月四日夜间，我军主动撤出新登。六月八日，我军又主动撤出临安。

粟裕同志电报华中局后，决定待顽军深入到孝丰地区时寻机决战。并疏散孝丰地区后方机关，部署战场。

### 反共迷梦破灭于孝丰城下

就在顽军北犯之时，日寇除向茅山地区“扫荡”外，六月二、三日向安吉东南线坑桥进攻，并将该地完全烧毁；赶筑宣长公路，以封锁广德、泗安、安吉、长兴之线，并不断派部队向东亭湖一带骚扰，企图切断我苏南浙西的联系。

当时的情势，如果不击退顽军的进攻，一种可能是处于敌顽夹攻之下，后果不堪设想；一种可能是被顽军击破于天目山北。除掉击退顽军进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哀兵必胜！我军决心集中兵力在孝丰附近组织新的战役，求歼进犯顽军一部，以粉碎其进攻。

这一段时间内，苏浙军区集中了可能集中的兵力进行第三次孝丰反顽战役，以两个团守备孝丰城，以七个团为突击部队隐蔽集结于孝丰西北地区，伺机实施有力突

击。

顽军向孝丰地区深入。开始，那个前敌总指挥李觉还是比较谨慎的，再三告诫各部：“不要受诱上当，丛林深谷，容易埋伏，务必严密搜索敌情。”然而，他们算来算去，优势总在他们手里。更何况从六月十三日开始，天目山地区的我方后方机关、仓库和医院，陆续撤退。加之，顽三十三旅进占我临安县城时，也未遭到我军打击。于是，刘秉哲等人从种种迹象判断，新四军必然“溃退”，于六月十六日、十七日连电李觉，一面建议，一面命令，五十二师急不可待地提前行动了。李觉也坐不住了，报告说：“二十五军集团军据各部报称，十八日止，东西天目山已无敌踪，扫荡之战，于焉告终。”带着升官发财的美梦奔向孝丰城来了。

六月十八日，顽三十三旅为了抢头功，采用了旧军队中的惯伎：谎报军情。宣称它已夺取了孝丰城。五十二师师长张乃鑫连忙派他的谍报队长去孝丰城联系。正好，给我军抓住了。连人带信件送到苏浙军区前敌指挥部来。顽军竟然长驱直入，分散冒进了！顽军的意图和部署清楚了！

六月十九日，五十二师孤军突出，由小白店和西圩市之间向孝丰西北扑来；而其它部队只进到孝丰东南的港口地区。两个兵团之间，东西相距约二十公里。

至此，我各个歼灭顽军的战机已经出现了。

六月十九日夜，以第四纵队担任迂回，首先向顽军左兵团突击，以一、三两纵队突击其中右路之敌。指战员斗志昂扬，响亮地提出：“歼灭五十二师，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复仇”，奋勇向前。经过一昼夜激战，一举歼灭五十二师主力。而奉命驰援的二十八军和忠义救国军，均因多次遭我打击，怯于被歼，未敢轻进。

此战，借助夜幕，聚歼骄横之敌，战斗较为顺利。

在我军围歼左兵团之际，中、右路顽军已经赶到，向我孝丰城东南、以东和东北之外围阵地猛攻，并企图抢占五峰山制高点。我军已先敌抢占。于是，南坡是国民党军向上抢山头，我军立即展开火力，把南坡的国民党军打得屁滚尿流，迫使顽军主力陷于孝丰城东南不利地区。

我军歼灭顽左兵团之后，立即迅速调转兵力。六月二十一日晚，我一纵队经大竹杆、山坞迂回切断了顽军退路；三纵队经孝丰东北向顽军右翼迂回；四纵队则向孝丰城正南之顽军突击。将顽军右兵团紧紧包围压缩在孝丰城南之草明山（当地群众称为茅头山）至港口、白水湾的狭小山谷地区之内。二十二日夜，围歼战开始。我一纵队一部由顽突击一纵、七十九师和突击二纵之间的接合部潜入山村隐蔽，至二十三时伏兵齐出；同时以一、三纵队四个团兵力穿插分割，切断了敌七十九师与突击二纵的联系。经连续一昼夜强攻，七十九师与突击一

纵伤亡惨重，胡琪三慌忙下令撤退，连夜向临安方向逃窜。二十三日下午四时，四纵队从虎岭关插到孝丰，对大茅头山发起总攻，全歼了号称“王牌军”的突击二纵。逃窜中的七十九师和突击一纵的残余部队，被我切成几段，实施多路突击，逐股歼灭。但因我军连续苦战，体力不支，仅追击至黄湖镇附近，顽右兵团的少数残余部队在混乱中向南溃逃。

是役，毙伤顽七十九师参谋长罗先觉、五十二师副师长韩德考、突击一纵队司令胡旭旰以下三千六百余名，俘顽军官兵二千八百八十七人，缴获山炮一门、战防炮一门、迫击炮十五门、轻重机枪一百二十一挺、步枪千余支。

至此，浙西第三次反顽战役胜利结束，彻底粉碎了顽军聚歼我苏浙军区主力、驱逐我新四军出江南的狂妄企图，为坚持孝丰、莫干山、杭嘉湖敌后新区，打通同浙东联系，并进一步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 运动战的一次锻炼

战后，苏浙区党委和苏浙军区的工作方针是：深入巩固苏南工作，开辟敌后之敌后的新区，休整主力，掌握敌顽矛盾，避免单纯顽我决战。为贯彻这一方针，决定不再进占天目山。因为如果再占天目山，有如下的不

利：

第一，主力大部仍将与顽军主力对峙，无法安心休整；而部队自新登至孝丰连续战斗一个月，极度疲劳，伤亡也很大，极需好好休整。

第二，主力大部如仍控制天目山，则粮食供应甚难，势必要由苏南供应；果如此，则苏南又将陷入供应战争的各项工工作，无法以全力进行深入巩固，不便发动秋收群众运动，打下深厚的工作基础。

第三，将影响以适当力量挺进敌后之敌后的开辟工作。

因此，于七月上旬开始分兵：一纵队全部回苏南就食休整；三纵队开至宁国东北、宣城东南之桥头、柏垫地区，并拟派一个团进入宣芜铁路以南地区，以打通与皖南的联系；四纵队控制浙西，逐步打通浙东联系。

第三战区的国民党顽固派确是被打痛了，从现在收藏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陆军第五十二师三十四年六月于浙西孝丰附近剿匪之役战斗详报》中有这么一段评述：“查这次苏浙皖边区奸匪（按：这是顽固分子对我军一贯的污蔑称谓）之啸聚及蠢动，较之二十九年冬新四军在皖南之抗命迥不相同（按：指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本师前此两次，均参与此役，深浅自知，其此次所凭藉的实力，较之过去江西时代固无逊色。然与二十九年相比较，则其素质、装备、战斗力及战斗方式等

更有显著的进步。故吾人今日对当面奸匪，更宜刮目相看，未可掉以轻心，如再估计过低，或竟颯预应付，将为无可补偿之损失。”

浙西三次反顽战役，特别是第三次，是苏中黄桥决战以来的大规模运动战。规模、双方使用的兵力、战争的残酷程度，都大致相同。这对于我军从游击战转变到进行大兵团运动战，作了准备。



## 第二十二章 撤离江南前后

### 胜利带来了新的矛盾

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八月九日，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八月十日，日寇被迫发出投降书。

一场激烈的斗争展开了。中国人民应该得到抗战胜利的果实，而蒋介石来夺取了。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声明中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它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八月十日到十一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受降及配合苏军作战等七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器，接受日军投降，并命令在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和东北将领吕正操、万毅、张学思各部迅速深入东北。八月十一日，蒋介石竟然下达了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他的嫡系

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要伪军汉奸“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很清楚，蒋介石要以伪军武装并借助日寇的军事力量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十二日，麦克阿瑟居然恬不知耻地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军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蒋介石感到有个硬后台了，明目张胆地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任援道为国民党南京先遣军司令官……

八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蒋介石，指出蒋介石的命令“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坚决拒绝。八月十五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总司令名义，致电美、英、苏三国，声明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接到毛泽东主席的声明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后，立即向华中各地的日伪军送出通牒，令其限期向新四军缴械投降，并派出代表就近与新四军各部接洽投降事宜，同时，公布了江苏省主席黄克诚、浙江省主席叶飞、安徽省主席罗炳辉、上海市市长刘长胜、南京市市长粟裕等名单，下达了《关于进入城市与交通要道后的工作指示》。苏浙军区奉命以一纵队攻取南京，三纵队进攻无锡、苏州，四纵队配合上海工人起义，

接管上海。同时根据延安总部命令，发出《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通牒》，通告有关接收京、沪、杭、甬沿线各地日军投降事宜。

日本投降前，蒋介石在美国援助下，编练了三十五个美械师。日本乞降消息公布后，美军除两个师在上海、青岛、天津登陆外，又派出大量飞机、军舰，把西南大后方的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运往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徐州、济南、天津、北平、张家口、山海关、包头、太原、郑州、洛阳等二十四个重要城市及交通枢纽。

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行了蒋日伪合流，中国人民又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

### “夺取上海”的插曲

德国法西斯溃灭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败亡是必然的；但是在什么时候，谁也不是巫师，谁也不能预言哪月哪日。日本投降，对我们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但投降之快，也出我们意料之外。

七月下旬，苏浙军区决定派四纵队再次南下，二渡富春江，与浙东第二纵队会合，扫除浙江中部浙赣铁路两侧敌伪势力，然后大举跃进，连接浙南，以实现党中央打开东南局面的战略意图。此时，十二支队已地方化，同地方部队结合，分编为吴兴、武（康）德（清）、临

(安)余(杭)三个支队，担负坚持和发展杭嘉湖、莫干山地区的任务。四纵队率十、十一支队于八月一日上午，在地方党的接应下渡过富春江。傍晚，十一支队在芳泉与日军一个大队遭遇，激战多时，将敌打退，击毙日军小队长以下多名。八月二日，二纵队三支队支队长蔡群帆同志率领一大队，和金肖支队支队长彭林同志率领该支队一部，与第四纵队在富阳大章村附近胜利会合。

会师以后，金肖支队和地方武装随十支队向金(华)义(乌)浦(江)地区进军。八月六日，在诸暨西部马剑歼灭忠救军两个营后，分四路进入浦江县，攻占中余、浦江、黄宅，进至义乌的后宅。十二日晚，十支队二营在支队长陈挺同志率领下长途奔袭，攻下浙赣铁路上的曹宅市。这样，四纵队初步完成南进任务，并准备越浙赣路东进东阳，然后发起会稽山战役，打通与浙南的联系。与此同时，十一支队在肖山、富阳两县攻歼伪军和土顽据点，扩展根据地。

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意料之中的，真的到来了，又感到有点突然。人民欢腾起来，四处放起了爆竹，敲起了锣鼓……

我接到紧急任务：率领四纵队主力横渡太湖，配合上海地下军的起义，任命我为上海起义军总指挥，武装解

放上海市。当时告诉我：刘长胜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张执一、张承宗、陈祥生，还有淞沪支队政委陈伟达同志任委员。据说以工人为主体的地下军已有几万人，已经占领新义铁工厂等，亟待主力部队前去。已经要上船了，刚好党中央来电，停止了这一行动。事后知道，上海地下军若干万，只是个估计数字，以后撤到郊区青浦观音堂大约三百余人。当然，还有不少同志如知名的工人领袖汤桂芬、范小凤、朱品芳等留在市区坚持斗争。现在看来，以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我军力量，上海地下党的力量，采取工人起义和我军外援的方式来解决上海问题根本是不可能的。张承宗同志的回忆录《解放战争时期上海的人民革命运动》一文中说：“九日凌晨，华中局通知刘长胜同志和我去开会。会上传达了中央的电报，中央明确指出：苏联已对日宣战，日本不能继续打下去，将很快投降。为此决定新四军准备进攻上海，要城工部立即派干部回上海，发动群众，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对此，饶漱石进行了解释，说陈祥生已在上海，组织了十万工人等等。刘长胜同志和我都没有应声，但不相信陈祥生所谎报的一套。”党中央及时来电制止这一行动是正确的。

八月十日，陈毅同志电示苏浙军区：“江南方面应立即有计划地分路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间太湖西

岸各地和浙西敌后各县，创造一整片农村局面，作为迎接内战，坚持斗争的基地”。根据这一指示，苏浙军区停止向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进攻，部队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迅速就地发展，向日伪军展开全面反攻。八月发表了《新四军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的通电》和《新四军苏浙军区对伪军伪警及一切伪组织的紧急通告》，命令京沪、沪杭、沪杭甬沿线各日伪立即向我缴械投降。

苏浙军区我军集中力量，不顾蒋介石指示日伪军拒不向我投降的乱令，发起大反攻。从八月十六日起，先后收复长兴、溧阳、金坛、溧水、句容、安吉、郎溪、广德、高淳、宜兴等十个县城和苏南、浙北大小一百余处集镇。浙东的第二纵队也拔除了宁波外围的鄞江桥、西城桥、周巷、庵东、观海卫、浒山、墩胜山等三十余伪军据点。该部淞沪支队还逼近上海西火车站，攻入北新泾及大团镇。第四纵队则奉命从金华近郊出发，昼夜兼程，横渡富春江，跨越浙西大地，向北急进……

## 撤离江南 开始新的斗争

就在此时，党中央向各战略区发来八月十一日《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战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

战，将是极猛烈的。”具体部署了任务：“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特别向江南等地指出：“第一阶段之时间可能甚短，对此应有充分估计。”《决定》说：“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 and 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群众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同时，对美国被难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但斯比科危险的可能性尚未过去。”

斯比科危险，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斯比科，这个英帝国主义派驻希腊的占领军司令，趁着德寇败退，于一九四四年十月带着流亡在伦敦的希腊反动政府，进入希腊，指使和协助希腊反动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寇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把希腊投入恐怖的血海之中。浙东游击纵队文工团曾据此编写和演出了活报剧《哀希腊》，藉以教育广大干部战士警惕“斯比科危险”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接着，却接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这使我们大吃一惊。在此之前，我们从新华社电讯里得知：蒋介石在八月十四日、二十日、二十三日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也在八月二十七日，和我们接到“通知”的同时，也为此到了延安。和国民党谈判，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何况抗战八年就谈了八年，有什么结果？大家耽心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忧心忡忡地说：“蒋介石是个大流氓，什么花样耍不出来！毛主席一天不回延安，我们一天睡不着觉！”至于那个赫尔利，大家都不相信他，报纸上早就登过他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他抹杀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污蔑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宣称不和共产党合作等等帝国主义滥调，不是已经证明他是一个反动政客吗？而美军在延安的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也说过，如果我党不派人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坦率得多么可爱！这不是可能存在的“斯比科危险”吗？确使一些同志想不通了。

以后知道，斯大林也致电我党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同志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在当时形势下，由于我党和广大人民坚决的反对蒋介石的内战阴谋，也由于美帝国主义当时还顾忌世界民主舆论一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和独裁政策，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即使谈判没有结果，也可使我在政治上获得极大的主动，而使国民党陷于被动。既要谈判，就要对谈判结果的两种可能情况有基本对策。毛泽东同志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九月十六日，党中央又指示华中局：“全国内战危机虽然较大，但和平局面也有可能，你们苏南、浙东、皖南三地区部队，如果和平局面出现，有转移到江北的可能，望你们立即注意控制北上道路，保证北上安全，准备于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九月二十日，党中央又指示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事已在重庆谈判中，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所以，苏浙军区在《双十协定》公布之前，就即部署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北撤苏中地区。

九月二十二日华中局电示：“粟率一、三纵王陶部迅速集结完毕，立即出动，叶率四纵及江南可能转移之部队及地方干部，为第二梯队，作两批转移，时间在浙东纵队转移至安全地区及宣传、秘密工作准备适当完成之后。”粟裕同志即率军区、区党委机关和一、三纵队从常州与奔牛之间越宁沪铁路，由西桥渡江北上到达苏中泰

兴。我则率四纵队策应和掩护二纵队（即浙东游击纵队）北撤。

四纵队从浙东金华地区赶回来后，即西去杭、嘉、湖，全力歼灭伪军第三十四师田铁夫部。这个田铁夫在苏中时曾和我军拉过关系，我们也以“同情军”的形式争取过他。这人草莽出身，民族气节差；不到两个月就叛变投敌。中国军阀混战中有不成文的惯例，排长拉队伍来就当连长，连长就升营长，田铁夫也就由国民党军的旅长到日伪那里当师长去了。日本鬼子还是很“鬼”的，把他调开“窝”，来到浙江，也就是把他的根子拔了，不得不死心塌地的跟着日本“皇军”了。十支队和他可是老对手了，在海安时一起驻防，田铁夫投敌后长期交锋。这次在杭嘉湖地区，从九月九日到十五日，新镇、石琢、善璉……直至田铁夫的师部所在地——双林，被我军一一打下，彻底歼灭了田铁夫所部。

四纵队在双林战役后，集中长兴待命。不日，接到军区命令，准备派十一支队插向海盐澉浦，接应二纵队渡钱塘江北上。但这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的二十八军和四十九军正向天目山区推进，前锋已进至武康、德清，因此，十一支队停止向澉浦前进，四纵队全力阻击国民党军东进，以掩护二纵队北上。

九月底，第三战区国民党军向北蠢动。二十八日中央和华中局电告：顾祝同近日积极布置进攻天目山我军。

而事实上，六十四师已经和我浙西部队接触，只是惧怕我军反击，未敢贸然前进。

浙东我军却遭到国民党军的无耻拦击了。第三战区顾祝同企图歼灭我浙东游击纵队于钱塘江口，仅澈浦至松江一线，封锁与进攻我军的就有三个师十一个团之众。浙东我军一部曾在澈浦被困，英勇战斗，终于击破国民党军的封锁。九月三十日，我浙东先头部队由杭州湾北渡，国民党军一二四师由杭州北上，七十九师一部由松江南开硖石，妄图合击；同时七十军又尾追。十月二日，向我军合围，激战终日。国民党反动派气势逼人，向新闻界发布讲话：企图“聚歼”尚未渡江的我部于浦滨。形势确实严重，我为他们捏了一把汗。华中局也于十月三日电示：“浙东部队能北渡即迅速北渡，如不能即退回原地坚持，揭露国民党一面和谈、一面积极进攻消灭我军的两面派阴谋，以激起人民的公愤。”浙东我军已无法后退，只能向前。十月四日拂晓，浙东我军一部北渡杭州湾，至澈浦登陆，但遭到国民党军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亲自指挥的三面包围。浙东我军向国民党军再三呼吁：我军根据国共谈判，让出浙东解放区北撤，希望让路。国民党军一贯以为我军呼吁为软弱，反而施行狂轰滥炸。浙东我军被迫作夺路突围之战。下午一时，战斗最为激烈，其中制高点扇子山峰之攻夺战达六次之多。血战十六小时，浙东我军始打开血路突出重围。我军英勇抗日

的勇士竟伤亡二百一十三名，殊堪痛心！

浙东游击纵队和地方干部大队渡过钱塘江口之后，我就开始率领四纵队经宜兴、溧水、句容等地，渡江至泰兴地区。我到黄桥刚住下，值班参谋就向我报告，四纵队司政后机关、苏南二地委干部队和十支队两个连所乘坐的轮船在长江里沉没了。我走到外面一看，黑夜茫茫，措手不及！赶紧动员当地干部、船工尽力抢救。当时很多同志总认为是日伪特务或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几经调查，弄清楚商船老板并无歹意，七日七夜运载我军北渡，轮机损坏，此次又由于超载而发生事故。据说“文化大革命”中，镇江地区作为一件重大事件作调查的，最后也是这个结论。这一事故给我们的损失是巨大的、上面提到的溱浦之战伤亡是二百一十三人，而这条轮船沉没牺牲竟达八百人！其中有四纵队政委韦一平、苏南二分区行政专员李建模、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吴志诚、宣传科长王一、副科长司徒扬等同志。韦一平同志是海南岛人，早年参加右江起义，随红七军转战到达湘赣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以后，韦一平同志任苏北特委书记，与惠浴宇等同志一起，在苏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级党委，扩大党的影响，开展群众工作，对开辟苏中根据地是立了功勋的。抗日战争胜利了，他却贡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李建模同志是抗日战争开始后常熟“民抗”的创始人之一，对江南抗日战争的发动和坚持是有

贡献的。吴志诚、王一同志都是上海来的知识分子。王一是上海的地下党员，在上海法政学院新闻专修科学习后，由上海党输送来新四军。记得郭村战斗时，他编印油印小报，自编自刻自印自发，受到广大干部战士的喜爱，喜称他的外号为“好消息”；后来小报象个样子了，人家又叫他“王老板”，是个出色的宣传家。司徒扬在文艺上造诣很深，新四军中流传颇广的《四季风车歌》、《打大仗》、《黄海渔民曲》等歌词都是他的作品。抗日战争胜利了，我们仍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为抗日战争胜利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 转战华东战场

## 第二十三章 涟水整编 北上山东

### 第一纵队的成立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朔风怒号，风沙满天，正是苏北平原萧瑟的初冬时节，古城涟水却突然热闹起来，穿着灰军服和杂色便衣的青年男女塞满了这个荒凉寂静的小城。这些来自浙东、浙西、苏南的部队和党政机关干部，是执行《双十协定》撤退八个解放区的协议而渡江北来的。

就在这里，十一月十一日，奉党中央命令，组成远征军，任务是挺进东北。任命我任司令员，原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同志任政治委员，原浙东区党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同志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原浙西军分区司令员贺敏学同志任参谋长。司令部由原苏浙军区与苏中军区抽调人员组成，政治部由原浙东区

党委机构及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部分人员组成。一些穿杂色便衣的青年就在涟水城穿上了灰军装，开始了武装斗争生涯。

纵队下辖三个旅：

第一旅是原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即原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廖政国，政委阮英平。这是一九四五年春由我带领由苏中南下的部队，抗日战争胜利后由浙西天目山地区经苏南北撤来苏北。第一团就是闽东红军组成的新四军老六团。第二团是以原江抗新六团、挺纵二团为基础编成的。第三团为原高（邮）宝（应）独立团。我对部队和干部都较熟悉。

第二旅是原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刘飞，政委彭林。第四团是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就是老六团挺进上海近郊后西撤时，留在阳澄湖畔的三十六个伤病员，发展起来的部队，苏南“清乡”时转移到苏中的。京剧《沙家浜》写的就是这个团创建的故事。第五团原是由五十三团三营与五十二团三营合编的江都独立团。第六团为东台地方武装编成的新部队。

第三旅是原浙东游击队（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旅长张翼翔，政委何克希。第七团由浙东游击纵队五支队与淞沪游击支队组成。第八团由浙东三支队与金（华）肖（山）支队组成。第九团由浙东四支队与三北（余姚、镇海、慈谿）特务营组成。

远征军编成后，立即筹划北上。预定的开进路线是：越过陇海路，经山东滨海地区，到达胶东，由龙口渡渤海到营口登陆。

当时，小道消息很多，把东北说成“天上有，地上无”。有的说：到处是队伍，只要有干部，几天就可以编成一个团。说什么，胶东部队有个班长，掉队了，给人家请去当团长。干了几天，委实干不了，偷偷溜回胶东来要干部。有的说：日本关东军的仓库任意搬，什么武器都有。说什么，和苏联红军军官联欢，灌他们酒，仓库里的枪支任你拿。华中军区也从淮阴来电报，要我纵把武器留下，到东北后重新装备。这使我很为难，打仗是要武器的，部队千里行军怎么能不带武器呢？不带武器的队伍只有挨打的份！我去电报申述了我的意见，复电只同意我们带轻武器，重武器都留下。那时候，在大反攻的热潮里，根据地参军的青年很多，武器却不能满足需要，很多新兵没有枪，有扛长矛的，有背大刀的重武器更是缺乏，一门山炮，一挺重机枪，人们亲昵地叫“老黄牛”、“小老虎”的，战士们可以讲出它不少神话。但是，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没有执行把重武器放下这一条。这倒不是本位主义，主要从部队完成任务这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事后证明，这个考虑并非多余，否则我们留下山东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

最近，从聂荣臻等同志的回忆录中读到，晋察



冀根据地首批进入东北的部队，确是由苏联红军把日本关东军的仓库交他们看管，取出一批武器发给扩编部队使用。党中央根据这一情况，曾经向各解放区发出通知，命令调往东北地区的部队，把武器装备留在原地，到东北重行武装。可是，以后苏联红军改变了态度。不仅收回了武器仓库，也不让我军住在沈阳，而让国民党军队接管。当各解放区的部队陆续到达东北时，哪里还有武器可以领到呢？以致出现了“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或无枪”的不正常现象。幸而我们没有把武器留下，到了山东才没有发生这种现象。

## 初到山东

十二月上旬，我纵到达山东根据地滨海地区休整，待命进入东北。此时东北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在秦皇岛登陆，占我山海关，又长驱直入攻占我锦州，切断了我军华北与东北的联系，并进占沈阳。党中央根据东北形势的变化，因此，命令我纵和晋冀鲁豫的杨得志纵队停止进入东北，以后又命令我纵留在山东地区作战，加入山东野战军序列，编为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我军在山东休整地点是滨海的老根据地：大店、相公庄地区。人民群众对待子弟兵非常热情，但对我们这支南方部队大为惊奇。地方干部归纳为：

第一奇，讲话象鸟啼，叽里哗啦，一句话也听不懂，好象来了一批外国兵；第二奇，个个留头发，好象来了一批学生兵；第三奇，不少人盖着五颜六色的绸面丝棉被，有人还穿着绸衬衣，好象来了一批少爷兵。他们悄悄议论起来：“这样的部队还能打仗？”年轻战士接受新事物比较快，学了几句山东话，加上手势比划，就能交流情况。山东老大爷、老大娘弄清了这支部队来自出产丝绸的鱼米之乡，穿件绸衣，盖条绸被，并不一定是地主、资产阶级；习惯于留个小分头，也不是“腐化堕落”，知道这支部队是长期在敌人腹心地区的梅花点线之中坚持战斗，在大江南北作战多年的队伍。

对部队来说，地区的转换毕竟是一个转变，首先是生活上的变化。部队是吃惯大米的，在有些人的头脑里，面食只是点心，高粱是酿酒的。这倒不是有“享乐思想”，而是本乡本土世代代就是这样生活的。山东人民非常照顾我们，尽量把小米供应部队，在当时当地来说这是上好细粮。但是炊事员们不会淘小米、煮小米饭，更不要说做出各式各样美味的小米食品了。小米饭里砂子很多，嚼起来满嘴嘎吧响。战士们对远离家乡本来就有情绪，于是讲怪话了：“肚子吃得象砂包，打仗省得做工事。”

我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有个连队的小米饭煮得特别糟糕，简直就象没有淘就下锅了。满嘴砂子触怒了一个

脾气急躁的班长。这个家乡给国民党军占领了的浙东四明山人，气呼呼地把饭倒在大路上，吼道：“沙子是铺公路的，难道我们的肚子里也要造公路吗？”这一行动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恼怒。当晚，有人沿村打锣，召集村民大会，连长、指导员也被邀去参加。群众七嘴八舌地批评起来：“新四军同志浪费了公粮！”“咱们老百姓想吃小米还吃不上哩！”“要是咱们一天能吃上一顿小米饭，那就够享福了。”青年们还责问道：“为什么要这样的耍态度？是对咱们吗？毛主席、朱总司令怎么教育你们的？”然而，有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发言了：“这不能怪新四军同志，南方人不会煮小米饭，他们淘不出砂粒来，为什么咱们不管这事呢？”于是，好心的老大娘、老大爷都说：“咱们拥军就要拥到实处，马上去帮军队淘小米，煮好小米饭。”当场就分工，第二天到各连炊事房去传授经验。连长、指导员开会回来，立即把已经睡下的战士、干部叫起来开会，指导员声音颤抖地叙述了会议的经过，激动地说：“同志们，要是今晚我不全部告诉你们，那么一整夜就是闭不上眼睛的！”那个泼小米饭的班长“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从此，部队吃到了又软又香又没有砂粒的小米饭。从此，部队即使吃高粱煎饼、柿子蒂、山芋干，豆饼末子……再也没有一句怪话。

## 华丰受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介石从峨嵋山上下来，摘取胜利果实，决心打内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国民党在美国援助下，动员一切力量进攻我解放区，全国规模的内战已经存在。”由于蒋介石的军队远离华北、华中，就利用日伪军的力量控制沦陷区，进攻解放区，当时称为“蒋日伪合流”。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蒋介石在挑动内战》一文中所说的“宁渝合流，蒋伪合作”。一九四六年初，我纵从滨海地区西进津浦线，一月八日以第一、第二旅向盘锯兖州地区拒不投降的伪军吴化文部发起攻击，以第三旅包围监视泰安、大汶口一线日伪军。一月十三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我纵奉命停止攻击，等候军事停战执行小组调处。一月二十二日于华丰、太平地区收缴日军窪田旅团轻重武器一部。

日军窪田旅团原已奉令撤到济南集结，但于一月上旬又奉国民党军事当局命令停止撤退，守卫华丰、赤柴矿区，并控制泰安、大汶口铁路。我军攻击兖州包围泰安时，派员下达通牒，我以纵队司令员名义命令他们不得参与中国内战，并听候下一步的命令进行受降。日军旅团长表示：愿守中立，如伪军求援甚切，则派小部队

向天射击以应付。并且表示他们希望能撤退去济南，但碍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命令，希望我军包围佯攻，造成撤退理由，以此继续向上级要求北撤。因此，在兖州战斗中，日军没有任何行动，这对我们集中力量作战是有利的。

国共双方停战令颁布之前，蒋介石于一月十日密令各地军队于十四日前将日军武装解除完毕。因此，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命令窪田旅团于十三日前撤到济南集中缴械，并命令大汶口伪军接替赤柴、华丰、东太平日军防务，泰安伪军接替泰安西南至大汶口的日军防务。

在我军包围内的日军，理所当然的应由我军受降。我纵的三旅一部配合鲁中地方武装包围泰安，集中主力阻止日军北撤，迫其就地缴枪。

赤柴日军于十二日下午五时撤走，我三旅进占该地，并将伪军击溃。日军集中于大汶口、东太平后，即分两个梯队开进，先头部队在百子坡被我军阻止，被收缴武器，其余部队退回原地。十四日，济南国民党军队一部南下，有接应日军北撤模样。这已是停战令生效以后，我以二、三旅分别将日军包围，一面施加军事压力，并断其吃水，增加他们的困难；一面派员递交我以纵队司令员名义通知该旅团就地放下武器的命令。派去的人是纵队政治部联络部长金子明，日本留学生，留着大胡子，

以纵队司令员代表的名义与窪田旅团长进行谈判。窪田旅团长同意放下全部重武器和仓库物资，要求携带轻武器到集结地域去，以防行进途中发生意外。我方同意了这一要求，但规定他们必须依照我方规定路线撤走。二十二日达成协议，双方签了字。为了防止日军违反协议，我又在他们开进道路上部署了兵力，严密监视日军行动。二十三日，日军交出坦克两辆，汽车三十七辆，各种炮十一门和掷弹筒、重机枪等武器，又点交了辎重仓库，按照我方指定路线北撤。我们有些同志看着“三八大盖”就眼红了，向我提出把日军在开进途中包围起来，逼迫日军缴出轻武器。我不同意。我说，既然有了协议，就要严格遵守，不能贪小利。过了一个星期，听说有个部队在泰安附近还是搞个小动作，切了一个尾巴，弄到了一些轻武器。这是很不好的，但没有引起纠纷，也就没有追究了。抗战八年，看着日军在我军监视下，垂头丧气地蹒跚行进，确也解气。

纵队部进驻华丰，我就住在日军旅团长原来住的房子里。这里是新汶煤矿区，即大汶口到新泰一带矿区。这使我亲眼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长期侵占我国的事实：它的军队打到哪里，它的资本家就跟到哪里，在刺刀下掠夺我国的资源。当时的新汶就是日本资本家与军事头目投资开发的一个大型煤矿，已经出煤。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才阻止了他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遭受日本资本家和军事头目欺凌剥削的矿工约有万余，其中不少人参加了我军。这些同志苦大仇深，又有爆破技术，在后来的解放战争的攻坚战中，起了很大作用。

## “王胜事件”

第一纵队是由苏中（一旅）、苏南（二旅）、浙东（三旅）三个部分组成的。纵队成立初期，各自为政、无组织无纪律的习气相当严重，这样便发生了“王胜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纵队部进驻华丰以后，二旅驻大汶口，距离较近。纵队命令他们派一个营看管华丰的日军仓库，等待纵队后勤部清点后分配。这仓库里，弹药、医药材料、被服、装具和其它物资很多。清点物资过程中，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长何能同志发现这个营把物资往大汶口搬运，就上去制止，但这个营不听指挥，继续搬运。何能同志赶来报告时，我们几个纵队负责同志正在开会，就由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汤光恢同志前去阻止。汤光恢同志去后，也没有制止住，而且这个营看到上级已经派人来制止，更加加快搬运速度，免得以后不让他们发这个“洋财”。汤光恢同志回来一讲，而且说有个副旅长带着部队干的，我很生气。副政委谭启龙同志劝我不要生气，由他亲自

去处理此事。谁知部队不认识他，仍是不加理睬，谭启龙同志被顶了回来，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更火了。竟然不听纵队副政委的命令！还了得！我便带了警卫员，坐了吉普车赶到现场。果然，部队还在向外搬运物资。我问：“谁带队来的？”有个干部回答说：“王副旅长。”我说：“把他叫来。”王胜来了，向我敬了一个礼。我说了一句：“你干什么！”当时，王胜如果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搬运，当场也就了结，待以后再作处理。谁知王胜这人太忠厚，竟慌得不知道如何处置了，也没有马上制止部队停止搬运物资，只呆呆地站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我更为恼怒，马上叫警卫员把他捆起来。警卫员看王胜是副旅长，不敢动手。我训斥了他，他不得不上去把王胜捆了起来。部队看到副旅长被捆，把正在搬运的物资丢在地下，一下走散。我把王胜带回纵队部，本来想给予撤职处分，二旅旅长刘飞同志知道后，赶来纵队部作了检讨，王胜禁闭一小时后就放了。以后，二旅把搬走的物资全部运了回来。这种事，如果在古代，是要军法从事的，哪能如此不听指挥！实在太不象话了，所以我把王胜捆起来。

这事，在整个部队都传开了，说我“厉害”，说“要当心点才行”。一九四八年初，在濮阳进行“三查三整”的新式整军运动中，为这事批评我军阀主义。后来陈毅同志告诉我：他和粟裕同志去西柏坡，向毛泽东、刘少



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谈了不少问题，直至午夜二时，大家有点精神不集中了，但听到叶飞捆绑副旅长时，大为吃惊。毛主席便问是怎么回事？粟裕同志汇报，把情况说了一遍，毛主席听后说：“哦，是这么一回事！”没有再说什么。

当时，纵队编成不久，部队纪律性也不好，游击习气较浓厚。这件事管得对，但方法方式是不妥当的。事后我向王胜同志道了歉。以后，王胜同志一直还是工作得很好。

## 济 南 见 闻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亦即是后来被叫做“和平民主新阶段”的那段时间。经过八年抗战之后，好不容易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人心思和。我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坚持不懈的斗争，在国内外赢得了舆论的支持，赢得了民心。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决心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和革命进步力量。当时就出现了国共两党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复杂局面。

八年抗战胜利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以为战争结束了，希望能过新的生活。我党提出和平团结建设民主新中国的口号，而国民党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决心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狂妄地提出要共产党领导的坚持了

八年艰苦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人民武装解除武装。我党已有第一次大革命时解除武装、人头落地的教训，当然不能同意。毛泽东同志说：“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我们是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十年内战的血泊里认识这个真理的。

时局的发展走了曲折的道路。我党为了争取和平的实现，又作了让步，原来协议把八路军、新四军编为二十个师，减少成编为十八个师。当时国民党提出了一个方案，我军编成的师与国民党军的师混编。即：在一个整编军内，国民党军两个师，编入我军一个师；或我两个师，他一个师。反动派的意图是很清楚的：吃掉我们，或溶掉我们。陈毅同志把这称之为：“面包夹火腿”。他说：“军队是革命的本钱。军队好比一把刀，过去我们是一个人拿的，今后要三个人拿了，而我们就要拿刀把。谁想动一动，他就会在刀口碰出血来的。只要我们保持革命的本质，我们就无所恐惧。”陈毅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就要有这种本领，人家是火腿，就夹掉它；人家来夹我们，叫它夹着一块钢，只会咬坏牙齿。”

当时，有的地区和平空气很浓，甚至提出要精减部队，在部队中抵触很大。但在山东地区，陈毅同志对部队、对党内，提出要作两手准备，一手要准备实现和平，另一手则要准备战争，我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没有两手准备，是要吃亏的。我们在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教育，

一方面，我们也实行精减，但只是精减一些老、弱、残废；另一方面，我们利用了这个间隙，抓紧整训部队，提高部队军事、政治素质，对和平或者战争，都做了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

一九四六年三月，周恩来同志与马歇尔、张治中到了济南，要会见国共双方驻军首长。陈毅同志作为山东解放军的代表，我作为副代表。美方的一位上校陪同我从大汶口前去济南，在济南，会见了周恩来同志和马歇尔、张治中，也会见了国民党济南第二绥区司令官王耀武、山东省主席何思源等人，开了扯皮的会议。看到周恩来同志，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们，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改变政协关于修改宪法的民主原则，从根本上推翻政协决议，看来蒋介石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已决定大打，要我们作好充分准备。陈毅同志的活动较多，交代我利用机会观察济南地形道路，虽然从《老残游记》中读到过有关济南的引人入胜的描写，但全面内战爆发在即，哪有闲心游山玩水，想着总有一天要打济南城的，四处走走，实则是观察地形，了解敌军的防御配置。

和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接触以后，对他们有了一定的了解。一方面感到他们的腐败，另一方面也见到他们一些有识之士。我当时对何思源的印象是不好的，觉得此人衣着讲究，谈吐空泛，政客的气味很浓。但对王耀武却是另一种印象，觉得此人头脑清醒，精明强悍，是

一个对手。

有一次，陈毅同志和王耀武有这么一段谈话。这时期济南反动报纸吹牛说：山东国军对共军象风卷残云，秋风扫落叶一样。

陈毅同志指着报纸问王耀武：“是真的吗？”王耀武很不好意思地说：“那是吹牛皮的。”陈毅同志说：“不信可以试试看，看究竟谁卷谁？你们需要对我们研究一下哩。我们对你们是有研究的，承认你们的长处。可是你们报纸总是说什么土匪长、土匪短，都是王婆骂街的一套。”

王耀武却说：“很感谢你，你真坦白，你说的是对的，我们就是这一套。你们有三大好处。”

陈毅同志问：“哪三大好处？”

王耀武说：“一是共产党方面肯读书，经常看到你们高级长官在报纸上写文章，讨论问题。国民党里有谁念书呢？有时间都吹牛拍马去了。二是共产党与老百姓的关系好。”

陈毅同志插话说：“你们不是讲共产党杀人放火吗？”

王耀武坦率地说：“那是宣传。”他继续说，“三是你们的军队打仗士气高，国民党方面不如你们。”

陈毅同志说：“我们也有缺点。一是读书没止境；二是与老百姓的关系也有不好的，与地主关系更是搞不好；三是我们军队的装备差。”

后来，陈毅同志说：这说明国民党方面有些有见识的人，但是由于国民党腐败无能，所以不能接受这些人的意见。

## 解放泰安、大汶口

一九四六年五月，形势越发明朗。中央明确指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六月一日，又进一步指出：“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面内战不可避免。”

山东形势也日趋紧张。蒋介石和白崇禧先后于五月上旬及六月三日亲赴济南布置内战。济南、徐州、青岛之敌均调集部队，伺机出犯。山东野战军为开辟战场，以利尔后机动作战，决心拔除山东解放区内残余的伪军据点。我纵奉令围歼泰安城的伪军警备第一旅宁春霖部和大汶口伪军第五路军吴化文的第一团赵广兴部。

伪军宁春霖部共三个团及一个特务营，全部驻守在泰安城和四关。泰安城墙高十米、宽三米，共长四千二百米；城壕深四米，宽五至七米。全城及四关共筑有碉堡、地堡两百零二个，明暗交通壕、散兵壕约七千八百米，街道阻塞墙六十二处，地雷群二十六处，照明灯三十三处，还有铁丝网及沙包等。

六月七日夜十时，我一、三旅对泰安发起攻击。八日下午四时攻占泰安四关，伪军被迫退守城内。不幸，一旅参谋长邱玉权同志为流弹所伤，抢救无效，这位老红军战士为解放祖国土地而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十日下午六时，开始总攻城垣。西关方面，八团架设云梯，一举登城。南关方面，一团架梯成功，迅即攻入城内。我各路部队突入城内后，很快就肃清了敌人。当夜十时结束战斗，俘敌副旅长、旅参谋长以下三千余名。

大汶口守敌是伪军赵广兴部约一千余人。这股伪军原是津浦路西肥城、宁阳地区的惯匪，拜把子，结金兰，封建帮会统治，凶悍成性，四出抢掠。

我二旅于六月六日发起战斗，黄昏后顺利扫清外围。七日黄昏攻入大围子，残敌被我压缩于西北角一隅。以后战斗胶着，形成对峙，伪军凭藉日军所筑坚固工事固守。七月初，残敌南窜兖州，大汶口为我解放。泰安、大汶口据点的拔除，巩固了我军后方，便于尔后机动作战。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为期三年多的解放战争开始了。

## 第二十四章 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的战略转变问题

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停战协定”，发动全国性内战，全面进攻全国的解放区。全国人民面临着由抗日战争向全面内战的转变，这场斗争关系着中国的命运，是回到反动黑暗的旧中国，还是建设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蒋介石独吞了抗战的胜利果实，不但接收了全部侵华日军的武器装备，而且又得到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援助，有五百多万军队，控制了全国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妄图在六个月内吃掉全国的解放区。全国内战已不可避免。为了对付这样强大的敌人，首先提到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就是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力量，建设一支强大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强大的敌人作战。

### 建设强大的野战军

从军事斗争的角度来说，由抗日战争转变到全国内

战，是从分散到集中、从游击战争到运动战的一个大的战略转变，这就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野战军。早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毛主席就电示“必须集中强大的野战军，山东、华中各须有一个至少三万五千至四万人的野战军，并须计算到连续战斗后的补充，动员民兵助战，地方党政亲自动手，协助作战。”

日本投降以后，山东八路军的主力全部去了东北，山东由新四军接防。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日，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与山东军区合并。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中央正式命令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新四军到山东的接防部队，第一批是第二纵队（罗炳辉部队，原新四军二师四旅、五旅，四师九旅）和第七师（曾希圣部队，原新四军七师十九、二十、二十一旅），我们第一纵队是随后来的。原定的任务是去东北，中途奉中央军委电令留在山东，编入山东野战军序列。

开头，华东是两个军区：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两个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山东军区的司令员是陈毅同志，政委是饶漱石，副司令员是张云逸同志；山东野战军则由陈毅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华中军区司令员是张鼎丞同志，政委是邓子恢同志，副司令员是粟裕同志；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则是粟裕同志，政委是谭震林同志。山东野战军由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七师，加上鲁南第八师（三个团）组成，以后二纵五旅又南调





华中参战。华中野战军有第一师（陶勇部队，后来的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第六师（王必成部队，后来的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还有姬鹏飞纵队（华中七纵，五个团）和张震纵队（华中九纵，六个团）。

山东是最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五个军区（胶东、渤海、鲁中、鲁南、滨海，后来滨海撤销，鲁中、鲁南合并了）。五个军区都有两个师的地方武装，以后的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纵队、第九纵队、第十纵队原来都是军区的武装。

我们第一纵队到山东，开始碰到的一个最大困难是补给和兵员补充问题。战争初期，地方同志还没有认识到建设强大野战军的重要性，比较重视地方兵团的建设，而没有重视野战军建设。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适应坚持敌后抗战的需要，必须加强地方武装。当时苏中军区就曾实行过“主力地方化”，把主力下放到地方部队作骨干，提高地方部队的素质，更好地坚持敌后抗战。但是，随着抗日战争转变到全国性内战的战略转变，我军的作战方针就必须由以游击战为主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这就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野战军，才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才能歼灭进攻之敌。晋冀鲁豫和华中在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晋冀鲁豫早在上党战役时就拥有一支六万多人的强大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也很充实，一个团二千五百人以上。而山东野战军在战争初期，由于兵力分散，没有

集中兵力，在一个时期内，无法打歼灭战，只打消耗战，部队减员，得不到补充。毛主席对主力部队不充实又得不到补充的情况非常重视，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给刘邓并告陈毅电：“你们应充实至少十五个主力团到二十个主力团，每团人数二千至二千五百，经常保持满员，作为突击力量，勿取平均主义。”八月二十八日给各战略区首长的电报中又指出：“我粟谭军从七月十三日至八月二十七日一个半月内，作战六次，歼敌六个半旅及交通总队五千，造成辉煌战果。而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只有十五个团。但这十五个团是很充实与有战斗力的。”八月二十九日又致电陈毅、张云逸、黎玉、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并各战略区指出：“野战军补充应有重点，胶济、苏北、苏中三战区各应补充野战军十至十五个主力团，每团二千五百至三千人（国民党有三千余人的大团），给以最好的武器与充足的弹药，以为突击力量，勿采平均主义。”但我纵的兵员补充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部队减员，特别是主力一、二旅减员更大。为了使战斗部队充实，迫不得已，十一月初乃将一、二旅各缩编为两个团，以后我纵就只有七个步兵团。战争的实践以及中央、毛主席的一再督促，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宿北战役前夕，一旅补充了鲁南新参军战士八百余人，二旅补充鲁中翻身农民一千二百余人，三旅补充鲁中一个新兵团。莱芜战役后，胶东地方武装两个团补

充我纵。至此，一、二两旅才又恢复为三个团，我纵又恢复为九个步兵团。至此，兵员补充和补给问题才彻底解决了。

## 战争初期的集中兵力问题

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蒋军对华东进攻的部署，第一步重点放在华中，第二步向山东进攻。我军的部署，集中兵力对敌，以华中野战军在华中作战，集中山东野战军位于徐州周围，以淮北为主要战场，支援华中作战。

我记得一九四六年六月，在临沂城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决定的作战方针和部署是：山东野战军全部集中徐州附近机动作战，这个地方是山东与华中的枢纽，又是敌人的指挥中心，这是主战场。这个部署是经中央批准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舒同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山东区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山东主要力量配合苏皖北部各区，攻取黄口、砀山、虞城、涡阳、夹沟、符离、宿县、任桥、固镇及徐蚌间各点，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并且指示，为了完成这一主要方向的作战任务，“山东以胶东对付青、潍，以渤海对付济南，其余鲁中、鲁南、滨海三区主力及新四军主力全部南下。”“粟裕、谭震林

主力对付江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这是一个集中兵力对敌作战的方针和部署，但是却未能贯彻实施。

一九四六年六月，按照预定部署，陈毅同志率第二纵队、第七师、第八师为第一梯队南下；我们第一纵队位置靠北，为第二梯队开进。但是，正当我们一纵队由临沂地区南下时，发现济南、青岛之敌向胶济线进犯，山东军区要求一纵队停止南下，北上到胶济线配合鲁中部队作战。陈毅同志来电同意山东军区的意见，命令我一纵到鲁中配合作战，予进犯胶济线之敌以打击，一个星期以后仍按原定部署南下，加入淮北战场。我纵到鲁中后，受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同志指挥。此时，济南之敌已进占明水、淄博，青岛之敌已进占青州，构筑工事固守，不再分兵出犯。我山东部队长于攻坚，一纵队则长于野战，在讨论作战方案时，鲁中同志主张围攻淄博，我们则主张攻城打援，由鲁中部队围攻淄博，由一纵队打援，吸引敌军来援，在运动中歼灭之。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最后大家同意采取攻城打援的方案。我三旅于七月七日攻击文祖镇敌九十六军一部，切断胶济线，占领打援阵地，部署打击来援之敌。但是，鲁中部队攻击淄博一夜，未能得手，天一亮，撤出了战斗。攻城部队一撤，敌人就不来增援了，我们打援就打不成了。这一仗没打成。七月中旬，我纵越过胶济铁路，进至临淄、金鸡岭一线，配合渤海军区部队打益都（青州）。益都驻

有敌第八军一个师。我仍采取攻城打援办法，由渤海军区武装第七师围攻青州，吸引东线之敌第八军荣誉一师增援，由我纵负责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十八日，攻城部队未得手，拂晓后即撤出战斗，敌援兵不出，我纵又打不成了！

两次围城打援都没有打成，无仗可打，我们便分电陈毅同志和山东军区请示，要求继续南下，执行原来的作战部署。陈老总立即回电，要我们火速南下，加入淮北战场。接到电令，八月二日我纵立即挥戈南下。不料，八月三日山东军区来电，要我纵停止南下，继续在山东内线作战。我们正在为难，陈老总催我纵南下的电报又到了，我纵即继续南下。十二日，到达临沂附近，山东军区又来电报，据称敌人有进攻临沂的企图，要求第一纵队留在鲁南地区作战，保卫临沂。并说已通报了陈毅同志和报告了中央军委。这样，我们只好停下来了。这样，陈老总手上实际掌握的部队只有第二纵队（缺五旅）、第七师和鲁南八师，数量和质量都不及华中野战军。由此可见，在战略防御阶段的初期，集中兵力问题，做起来很难。

从此以后，我纵就留在鲁南作战，担任保卫临沂的任务。鲁南军区只有一个师（第八师已调往野战军）。我们在鲁南先后打了三仗，但都未能打歼灭战，打了消耗战、击溃战，很窝囊。

十月五日敌整编第二十六师（附第一快速纵队）由徐州车运韩庄，以配合台儿庄一线之敌第三十三军进犯峰县、枣庄；韩庄之敌整编第五十一师亦北犯，进至大、小高家河一线。十月六日晚，我纵奉山东军区命令，在峰县以南樟山、白山、望仙山、文峰山、大明山一线阻击进犯之敌。但情报不确切，仅说敌整二十六师来进攻。但七日清晨战斗开始后，敌整二十六师进攻我四山子、老龙潭、牛山、杨庄、毛鼻山、铁白山、文峰山、桃花山、大明山、望仙山阵地。同时，敌第三十三军进攻我七邵、小石山；敌整五十一师进攻我樟山、白山阵地。激战终日，敌人越打越多，非但出动空军狂轰滥炸，而且还出动了第一快速纵队的坦克和自动火炮。这是我纵第一次与敌人坦克遭遇，既缺乏反坦克手段，也没有反坦克经验。午夜，奉命撤出战斗。八日敌占枣庄、峰县，十日又占郭里集。我纵在临沂以西税郭、出头磷以西一线，休整待机，防备敌人向临沂进攻。敌军整二十六师是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第三十三军是西北军，整五十一师是东北军，注意保存实力。敌人三个军不分兵，不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不轻易出动，使我很难歼敌。但是，我们部队摆在那里，还是起到了保卫临沂的作用，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仗是在十月底。十月二十七日枣庄、郭里集、峰县、台儿庄之敌全线向我进攻，企图攻占向城。我以

第三旅第七团担任宽正面的运动防御，节节抗击，诱敌深入，准备歼灭其突出的一路。二十八日，我主动放弃峨山、税郭、兰陵。二十九日，敌第七十七师占傅山口，当晚缩回萝藤；敌整二十六师一部占上桃园，当晚缩回税郭。夜间，我派第一旅反击敌整二十六师至冢山头之线扑空而返。三十日，拟再诱敌深入，制造战机，歼其一部。此日，敌第七十七师第三十七旅再占傅山口，敌第七十七师第一三二旅占马家楼。我原拟诱敌深入到向城，再寻机歼敌，但这时临沂来电话说：“如果把敌人放到向城，临沂震动，军区和省级机关就要跑反了，必须迅速出击，阻止敌人东进。”我只好执行命令，立即出击！于是，以第一旅出击歼击傅山口及其以西之敌；第三旅攻占店子街、马家楼、萝藤、石拉后，向西警戒，配合第一旅解决傅山口之敌。三十日十时全线发起出击，将敌七十七师全部击溃，击毙敌三九六团团团长张北福，并将敌一个团包围于马家楼大围子里。十七时，敌整二十六师自峯县开来坦克八辆，向傅山口一线攻击，被我阻击于沙河一线。敌军在坦克掩护下，全线溃退，马家楼被围之残敌亦于十八时三十分乘隙向西南脱逃。打了个得不偿失的击溃战！

两个仗没打好，我们在鲁南与敌人形成对峙僵持的局面，很苦闷。我们便利用空隙时间，重点研究了攻坚和打坦克问题。第一旅还组成二百人的学习队，专门到



山东部队学习爆破攻坚的技术和战术。这两方面的突破，对我一纵以后打大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时，在淮北战场，初战歼敌一个旅后，由于我军兵力不足，而敌人三个军又不分散，也再无法歼敌，陷入困难局面，陈毅同志也很苦恼。中秋节后，陈老总带第八师到临沂，准备集中我一纵和第八师在鲁南打一仗。陈老总是下了很大决心，要在鲁南打一个歼灭战的。在临沂一次干部会上，陈老总说：打赢了开“庆祝会”，打不好开“斗争会”，我打死了开“追悼会”。这“三个会”的说法，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十一月上旬，鲁南之敌调整部署，加强纵深配备，准备继续东犯，占领向城，进窥临沂。陈毅同志决心乘敌调整部署之际，集中主力出击峯县、台儿庄之间交接防务之敌，歼击由峯县南撤的敌第七十七师。由我一纵担任阻击峯县之敌的任务。鲁南第八师（三个团）担任攻歼南、北罗和马兰屯地区之敌的任务。十一月十日晚发起战斗，我一纵以第三旅首先夺取峯县以南圈沟、泥沟一线，打开缺口。十一日晨，峯县之敌整二十六师在七辆坦克掩护下向我进攻，我反坦克未奏效。十三时，敌坦克增至二十五辆，步兵增至一个旅，连续向我猛烈攻击。我命令第二旅出击。第二旅第四团通过约五华里开阔地，向进入圈沟之敌拦腰截击。敌军遭我军奇袭后，一度四窜，并以二十五辆坦克排成三角阵势，阻止我军前进。

我第四团以小包炸药、集束手榴弹、手雷、汽油瓶等向敌坦克攻击，但由于地形限制，虽经英勇拼搏，均未奏效，伤亡较大。敌人也无法前进，激战至黄昏，以坦克和猛烈炮火作掩护，撤回峰县。当日，友邻第八师攻击敌第七十七师，追击至运河边，并在南、北罗包围了敌军两个团。晚上，陈老总召集开会，第八师领导同志提出，要求一纵派一个旅增援他们，并指名要第一旅，否则以该师三个团的兵力歼灭不了被围的两个团敌人。我也提出了意见：今天，第二旅阻击敌快速纵队，伤亡很大。明天，敌人肯定要拼命攻我泥沟、圈沟阵地，如果把一旅调出，就没有把握挡住敌整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的冲击，第一旅确实调不出来加强第八师。眼巴巴地可以消灭敌人两个团，但就是缺少兵力，至少缺一个旅的兵力，结果吃不掉。陈老总一支香烟接着一支香烟地抽着，紧皱着眉，一声不吭。深夜一点钟了，该下决心了，陈老总一甩烟蒂，说了一句：“只好不打这一仗了！”眼看到手的胜利果实只能白白地丢掉了。

战后休整，陈老总召集我们开会，讨论研究下一步作战方案，大家都有意见，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在这次会议上，我不得不说心里话了。我建议陈毅同志不要受各方牵制，集中三个纵队兵力在手上，就有办法寻求战机，歼敌一个旅或两个旅，否则，兵力不集中，什么仗也打不好。事实上，大家都已感觉到这个问题，不过

都不好说出来，我实在憋不住，把它说出来罢了。其实，陈毅同志也深为苦恼。三个多月的困境，使大家都感到只有集中兵力作战，才能改变困难局面。

蒋军在占领了两淮之后，大举分兵四路进攻，妄图全部占领华中，割断华中同山东的联系。至此，时机成熟了，陈毅同志遂下定决心，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只以鲁南、渤海军区武装钳制由台儿庄、峒县出发向临沂进犯这一路之敌，毅然亲率一纵和八师由鲁南南下，集中兵力打击由宿迁进犯之敌。果然，一旦放下包袱，改变各自为战的局面，集中兵力作战，就取得了宿北战役的胜利。随后，山东、华中两支野战军全部集中，成立华东野战军，彻底解决了战略防御阶段集中兵力问题，因而在宿北战役之后，连续作战，取得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一个比一个规模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由此看来，我们应当客观地承认战争初期集中兵力的问题，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却难，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才能做到的。

## 第二十五章 苦战骆马湖

### ——宿北战役

宿北战役，是解放战争初期，华东战场完成战略转变，集中兵力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然而，此仗的战斗过程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而是曲折的，甚至一度极为风险。作为当事人，我觉得应当如实地把这段史实记录下来，以利后人。

#### “水到渠成”的一仗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伪“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蒋介石为了政治上的需要，想在军事上取得一个胜利，妄图迅速占领我苏北解放区，割断苏北和山东的联系，调集了二十多个旅的兵力，分四路同时进犯：以精锐主力之一整编第十一师会同整编第六十九师，共六个半旅的兵力，由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自宿迁向沭阳、新安镇进犯；以整编第七十四师、第二十八师五个旅的兵力，由淮阴向涟水进犯；以整编第六十

五师、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共五个旅的兵力，由第一绥区司令李默庵指挥，自东台向盐城、阜宁进犯；以第三十三军及整编第二十六师、第五十一师九个旅的兵力，由峄县、枣庄地区向临沂、郯城进犯。敌人四路并进，我军决定集中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五个团），打宿迁这一路，另外三路敌人分别由华中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牵制。

首先打宿迁出犯之敌，吃掉这一路的全部或大部，尔后伺机歼灭另一路，这个作战方案的依据是：整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是三青团中委，急于想先进新安镇，封锁陇海路，抢夺头功，向蒋介石邀赏，而他的广东部队尚未受我打击，骄狂轻率，前进较快；胡璉的整十一师虽系陈诚的起家本钱，为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但刚调来宿迁，因此先打戴之奇这一路对我军有利。而且整六十九师除原辖的六十旅及重建的二七六团外，其四十一旅原属整二十六师马励武部，预三旅原属整五十七师段茂林部，工兵五团属国防部，各成系统，矛盾较多，战斗力较弱，容易击破并歼灭之。宿北的地理位置，也有利于我军于战后向北、向西机动作战，保持主动。

陈毅同志向中央报告了战役计划。毛主席很快回电，并询问粟裕同志的行止，主要是关心山野和华野是否集中兵力的问题。陈毅同志如实报告情况后，中央军委立即批准了这一作战行动。

这一作战行动的计划是：正面阻击，两翼夹击，先解决敌整六十九师，再解决敌人的王牌军整十一师。华野九纵就地于宿沭、宿新公路一带正面阻击敌人，迟滞与消耗敌人，为我主力开进、展开争取时间；以山野一纵与八师为左翼，从骆马湖方向直插敌侧后，由西向东发起攻击；山野二纵（欠第五旅）和七师（欠第十九旅）为右翼，从沭阳方向直插敌侧后，由东向西发起攻击。

此仗的关键是：一，要迅速抢占峰山，控制制高点。峰山标高百余米，乃是全战场的制高点。敌预三旅占领后，利用日军原有的壕沟、碉堡，又加筑了地堡，设置了鹿砦。山前即是宿新公路，南距晓店子十二华里，北距峰山八华里，占领峰山制高点，即可控制整个战场。这一任务由山野八师担任。二，要向敌纵深穿插迂回，实行分割围歼。宿北进攻之敌两个整编师共有六个半旅，如不能迅速分割这两个师，我军就很难以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之。只有大胆实行纵深穿插迂回，分割整十一师与整六十九师的联系，才能夺取整个战役的胜利。这一任务由我纵队担任。山东野战军前指随八师行动，直接指挥一纵和八师作战。

### “敌人全线溃退”

十二月十三日，敌整十一师一一八旅沿宿沭公路进

占来龙庵，整六十九师进占人和圩、安仁集、邵店子、嶂山镇、峰山、晓店子地区。

是日，野司下达命令，采取长距离突然急袭和南北对进的手段，右翼部队围歼蔡庄、宋营、刘圩子、罗庄、人和圩地区之敌；左翼部队首先歼灭进占新店子的敌预三旅与进占嶂山镇的敌第四十一旅；得手后乘胜再歼晓店子的敌整六十九师师部及其第六十旅，尔后集中兵力歼灭整十一师。

十二月十五日，我第一纵队各部到达集结地域新店子附近，南北对进的各路攻击部队，也大部进入战役集结地域。我们等待山野前指召开作战会议，具体研究作战方案，然后当晚或第二天发起攻击。这是惯例。然而，等来等去也没有等到这个通知。黄昏，部队正在吃晚饭，山野前指突然来了电话命令：宿迁北犯的敌人已向南全线溃退，决心进行全面追击。命令第一纵队迅即向井儿头、曹家集出击，由西向东与第二纵队会合，将敌人在撤退中消灭，勿使其退至宿迁城。

我们一纵接到命令立即出击。我展开三个旅，从峰山到最南边，三路穿插。第一旅迅速抢占井儿头，第二旅攻击晓店子，第三旅直插曹家集。我跟在中间的第二旅指挥。与敌人一接触，情况并不象山野前指电话命令所说的那样。第二旅攻击晓店子受阻；第一旅到达井儿头、许庄一线，没有发现敌人有溃逃征候。第三旅以第

九团为前卫，越过骆马湖洼地，进到曹家集以西地域。我越看越不对头，敌人不象溃退，敌人所占村庄都点烧燃照明柴，一堆接着一堆，火光中可见敌兵正在构筑工事，加强防御。再一听，南边第二纵队方向也没有枪声。战后才知，二纵进到来龙庵西南一线，因无敌踪，撤回原防。根据当面情况判断，敌人并未撤退，而是发现我军企图后收缩兵力，调整部署。此时已是后半夜两点钟了。于是，决定部队撤回原集结位置。

拂晓后，第一、二旅均撤到指定地域。三旅在最南面，进入了敌军纵深，事关重大，由纵队副司令员何克希同志亲自去传达撤退命令。何克希同志赶到三旅旅部布置撤退，但三旅前卫两个团（第八团、第九团）由于当时缺乏较好的通讯工具，主要依靠徒步通讯，待接到撤退命令时已经是上午八时，撤也撤不回来了。我一接到报告，一身冷汗，孤零零的两个团钻进了敌军主力整十一师纵深之内，正象有人说的：恐怕要给“包饺子”了。真是急坏了！

战争中确有偶然性，而这些偶然性能使一方在战争的天平上的比重发生变化；当然，偶然性是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下面的例子就说明我军英勇机智的必然性而产生的偶然性，促进了战斗发展的进程。我第三旅两个团向敌纵深挺进途中，捕获敌电话架线兵数名，查明了曹家集之敌系整编第十一师师部及其直属队，第



十八旅位于曹家集东北地区。敌整十一师师部正向宿迁运动，刚好被我第八团、第九团碰上了。战机难得！第八团第一营攻击王圩，其余部队占领冯庄、郭庄，阻击来自东北方向之敌。第九团参谋长俞慕耕率部，一举突入曹家集，歼敌工兵营、骑兵营大部，俘敌六百余名，并将敌炮兵团击溃。随即占领运河桥梁，距敌师指挥所仅二三百米，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天明后，敌人发现攻击该地的我军兵力不大，孤军深入，调其第十八旅全力反扑，来了一个反包围，一下子把我八、九团围住。这时，撤退命令也已到达，即以第八团一部占领三台山南侧许庄，向宿迁、晓店子方向警戒，以控制后撤道路。下午三时，第八、第九团才全部撤出战斗，进入新店子地区集结整理。

战后有人曾问：究竟山野前指从什么迹象上判断敌人“全线溃退”下达出击命令的？谁也不回答这个问题。

### 置之死地而后生

十六日，敌预三旅、第六十旅整天与我第八师争夺许庄战场制高点。中午野司作出歼灭敌整编第六十九师的总攻部署。要求第八师在十七日拂晓前攻下峰山，保障第一纵队侧翼。第一纵队由峰山以南、晓店子以北地

域楔入敌军纵深，在敌整六十九师后方占领阵地，向南向北构筑工事，割裂敌整六十九师和整十一师的联系，达成战役上的分割包围态势。

鉴于能否割裂敌两个整编师的联系，是歼敌整六十九师的关键。我纵决心以第一旅在前，第二旅在后，打开老虎洞后，直插傅家湖；以第三旅第七团一个营攻占许庄，保障纵队翼侧安全，两个营向南直插，控制三台山高地及其以东张林、蔡林一线阵地。

十六日黄昏，我率第一旅、第二旅借夜幕掩护，利用敌照明柴火光，从敌军占领的村落的间隙，大胆隐蔽穿插。第一旅第二团攻占老虎洞，第一团攻占高庄，打开缺口，楔入敌阵，前锋直指傅家湖。第二旅第四团包围罗庄之敌，第六团控制老虎洞阵地。第三旅第七团自老虎洞西南地域楔入，攻占晓店子以北的许庄，随即以第三营转入防御，团率第一营、第二营利用破晓前的浓雾，继续隐蔽猛插，攻占张林、蔡林、三台山、高家洼。我纵经一夜穿插，完成了对敌整十一师和整六十九师的战役分割，也完成了对敌预三旅与第六十旅、第四十一旅的战术分割任务。我随即调整兵力、火力，构筑工事，积极准备抗击南逃北援之敌。

与我纵穿插分割同时，友邻部队第二纵队向西进占苗庄、李圩；第九纵队攻占了人和圩东北李庄；第八师进至仇庄，准备对晓店子之敌发起攻击。至此，我纵和

友邻各部完成了对整六十九师的战役合围任务。

我纵楔入敌人纵深，在敌人纵深地区夺取了十几个庄子，控制了一块长约六七公里，宽约一二公里的三角地带，构成向北、向西、向东南的三面防御，给敌以严重威胁。但是，我纵本身却四面受敌，西有晓店子的敌预三旅，北有并肩相靠的敌第六十旅、第四十一旅，南有整十一师三个旅。这样，既要阻敌预三旅与第六十旅东西相互靠拢或南逃，更要南堵敌整十一师的北援。显然，任务是艰巨的。

十七日八时，整十一师在飞机、炮火掩护下，沿宿新公路猛攻我友邻八师峰山阵地，中午友邻部队后撤。敌军遂向我三旅第七团三台山、蔡林、巷庄阵地猛攻；晓店子的敌军也同时向南向北反扑我第七团三台山、许庄阵地，使我七团遭受敌人南北夹击。我七团顽强抗击，连续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在第七团阵地上指挥的第三旅参谋长谢忠良同志，鉴于敌攻势猛烈，急调该团预备队第七连进至沈庄，加强阵地最后之防御。下午一时，宿迁之敌第一一八旅及曹集之敌第十八旅约一个团，在八架飞机和大量炮火掩护下，分路向我蔡林、巷庄阵地猛攻，经激烈战斗后，阵地为敌所占。敌第十八旅的一个团亦进至叶庄、上涧沼地域。

敌第一一八旅占我蔡林、巷庄后，继以两个团兵力向我张林、高家洼阵地猛攻。敌第十八旅进占叶庄、上

涧沼后，亦向我高家洼阵地进犯。宿新公路上敌炮车、卡车川流不息，纷纷北调。

正在这紧急情况下，山野前指负责同志给我来了电话。他说：飞机狂炸、大炮猛轰，敌人连续攻击，八师峰山阵地很难抵挡，要求撤退。他已经同意。当时，前指跟随第八师指挥，告诉我这情况后，要我一纵也撤退。我一听，好似晴空霹雳！谁都懂得：大白天，开阔地，又处在敌人纵深，四面受敌，一个纵队万余人，怎么撤？我告诉他：敌整十一师正向我纵阵地疯狂进攻，并以大量飞机、大炮封锁我纵后路，而且四面受敌，如果此时撤退，非但将使整个战役意图落空，而且还将使部队造成极大混乱和损失。我并且希望他来一纵加强指挥。他说：敌人封锁得很厉害，带一个警卫班也进不来。但他仍坚持要我纵撤退。我说：“通路被敌人火力封锁，既然一个班也不能通过，一个纵队怎么能通过撤出来呢？”我建议就是退出战斗也要等到黄昏以后。他却回答说：“八师已经撤了，你们撤不撤我不管了。”怎么能甩下一个纵队不管呢？！我一听，激动起来，他把电话挂断了，我气得摔掉了电话机。

当时在纵队指挥所的纵队副政委谭启龙同志、参谋长张翼翔同志也很震惊，脸色都变了，齐问：“怎么办？”

我说：“白天不能撤，撤是送死！两面敌人一夹击，全纵队完蛋。只有坚持到黄昏，才能一个冲锋打开口子，

实施突围。”

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于是，我把三个旅的旅长、政委召集来开会，进行部署。我说：我们要坚持四个钟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而坚持四个钟头，就必须确保高家洼、沈庄之最后阵地。这个阵地不保，我纵全部就将被夹击，撼动全局。因此第七团能否守住阵地是关键，急调第六团第三营驰援高家洼。命令各部队除少数警戒分队外，一律在战壕里睡觉，养精蓄锐，准备黄昏冲锋突出去。

第七团扼守的最后阵地是座小山，东西只有一公里，南北不到两公里。第三旅参谋长谢忠良指挥该团，我下了死命令，要他无论如何必须死守。他表示：“人在阵地在”。亲自在山头指挥。敌王牌军整十一师第一一八旅步兵在十二架“空中堡垒”和榴弹炮团火力的掩护下，发起多次猛烈的集团冲锋，我张林、高家洼阵地上的工事大部遭受摧毁。同时，敌以一个营自张林、高家洼之间楔入，猛攻我沈庄阵地，企图打通与晓店子的联系。北面之敌第六十旅企图与北援的整十一师打通联系，晓店子敌预三旅亦数次北犯我许庄阵地，企图封锁老虎洞缺口，断我通路，陷我于绝境。我纵受敌三面夹击，战斗引向最后阵地，我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敌人第一次攻击后，一个营的阵地丢失了，只跑回来五六个人。敌人又开始第二次攻击，又是密集队形的集团冲锋，中间一

个营的阵地又失守，只跑回来六七个人。十五时三十分，第七团只剩下最后的阵地了，但离突围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局势危急，必须当机立断！我下决心，决定提前一个小时出击！命令一下，第一旅、第二旅，排成连方队，端起刺刀，向正在进攻我七团阵地敌人翼侧猛烈冲击。我突击部队以锐不可当之势，以一当十，杀向敌阵。敌整十一师在我突然、猛烈的反击下，猝不及防，全线溃退。我乘胜奋勇追击，直至唐湖地域，逼近宿迁运河边。

不料，我们一出击，北面敌整六十九师乘机南窜。我们只有一个营向敌整六十九师警戒，手上又无机动部队阻击。敌人队形很乱，从我纵队指挥所附近溃退。我们把警卫部队、机关干部、勤杂人员、民工等组织起来，冲向敌群。敌人士无斗志，四散奔逃。我即命令第一旅和第二旅部队停止追击整十一师，迂回包围整六十九师一部，把敌人全部兜住，全歼于田野。

这个意外的胜利，野司的同志非常高兴，真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我报告野战军司令部时，那位值班参谋连声说：“首长听了，好高兴呀！”野司首长特来电话祝贺我纵的胜利。

十七日午夜，我友邻第八师攻占晓店子，全歼守敌预三旅。敌整六十九师残部集结于人和圩、罗庄、苗庄各点。十八日，各部队密切协同，全歼该敌，完成了原

定的首先歼灭敌整六十九师的任务。

野司原拟按原意图续歼敌整十一师，因该敌已缩据宿迁，凭六塘河组织防御，而两淮之敌已于十六日攻占涟水，东台之敌于二十日占盐城，决定停止对敌整十一师的攻击，宿北战役遂告胜利结束。此役共歼敌二万四千余人。

## 战 后 余 话

战役结束，野司召开总结会议。我向陈毅司令员报告了山野前指负责同志要我纵大白天撤退之事，并提出：前敌指挥员怎么能丢下一个纵队不顾呢？要求在总结会上提出严肃批评。陈老总沉思一下说：“这就不必了，打了胜仗了嘛！”我想到他当时也有难处，想到团结同志共同工作，也就不提此事了。

宿北战役这一仗，开创了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全歼敌人一个整编师的战例，胜利是很大的。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蒋介石孤注一掷的失败》说：“这是苏皖解放区超过以前十一次大捷的空前的大胜利，也是今年七月以来整个爱国自卫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陈毅同志赋诗：

“敌到运河曲，试看峰山下。

聚歼夫何疑？埋了戴之奇。”

可见他的郁闷心情为之一扫。但这一仗该总结的问题也是很多的。如果部队高度集中，哪怕再增加一个纵队，则不但能全歼敌整六十九师，还能全歼整十一师。那时的整十一师比较好打，因为对我军作战还缺乏经验，以后就比较难对付了。

过去山东野战军一分为二，一直未能集中兵力作战，因而在一段时期内打不好仗，直到宿北战役，山东野战军才集中了。而山野、华野两支野战军全部集中作战，那是宿北战役以后的事了。



## 第二十六章 新年的献礼

### ——鲁南战役

#### 孕育春机的冬天

宿北战役以后，野战军首长曾有意图，东开沐阳地区打击由两淮北犯的敌整七十四师。敌情瞬息万变，我军部署也一再变动。但是广大指战员思想通了。有首快板诗说得好：“山东起得早，赶快打背包；华中吃中饭，追上敌人了；包围四处打，把它歼灭光。运动战，就是好！运动战，就是好！”所以根据敌情变化，在陇海路上南来北往，部队情绪很高，期待着另一个胜利。

那个冬天很是寒冷，滴水成冰。山东、华中两大野战军会合了，指挥员们心里暖烘烘的，胜利的未来暖和着他们的心。

一九四七年的新年献礼——鲁南战役的大胜利，就是“运动战就是好”的例证。

鲁南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消灭敌整编第二十

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然后消灭敌整编第五十一师，共歼敌五个旅全部及其它等部共约五万人，活捉了整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整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以下三万九千余人。这是华东战场集中兵力后的重大胜利。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中旬，鲁南枣庄、峰县、台儿庄地区之敌，为策应苏北作战，乘我主力南下之机向东进犯，企图进占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城。十二月二十日，中路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先头进占向城、卞庄，南路敌第三十三军先头占兰陵、洪山、长城等地，北路敌整编第五十一师先头进占税郭。南北两路之敌慑于我军宿北大捷，不敢继续东进。但敌中路整二十六师以第一六九旅占卞庄、向城，第四十四旅占青山、石城崮地区，第一快速纵队及炮兵第五团分布于鱼沟地区，师部率警卫营驻马家集；而敌第三十三军主力仍在台儿庄，敌整编第五十一师主力仍在枣庄。这就形成了敌整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孤军深入的态势，而且东西摆成一线，易受我军夹击，工事构筑尚不很坚固，成为我军围歼该敌的有利条件。陈毅、粟裕同志遂下决心首先集中第一纵队、陶师（陶勇纵队当时是华中野战军第一师，以后是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鲁中第四师、第九师、鲁南第八师、警备旅等，歼敌整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尔后再择机歼敌第三十三军或整五十一师。部署分为两个纵队：以第一纵队、陶师为左纵队（十五个团），归野指直

接指挥，第一纵队集中兵力围歼卞庄之敌，完成任务后，配合陶师歼灭敌快速纵队及第一六九旅残部；以第四、九、十、八师及警备旅为右纵队（十二个团），归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同志指挥，围歼敌第四十四旅，尔后视情况攻歼马家集敌整二十六师师部，打乱其指挥机关。

### 竟有这样的“指挥官”

敌整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是黄埔一期生。这个部队原属薛岳指挥，有一定的战斗力。但是，军官对士兵剥削严重，部队流行着牢骚话：“要吃苦，跟马励武；三月不关饷，还找二百五。”事实证明，这个马励武确是个笨蛋。宿北战役以后，他畏惧我军回师被歼，不敢前进，但也不敢退回，也不调整部署，只原地构筑工事驻守，而他自己竟然丢开部队回峰县过年去了。马励武被俘后，自述说：“但是迄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晨，并无战斗动作。我认为可能今后过几天才能有仗打呢，乃于元旦上午在前方师司令部举行庆祝元旦及会餐之后，即将前方指挥任务交由副师长曹玉珩和参谋长郑辅增负责，并在电话中征得驻在峰县的整二十七军军长李玉堂的同意，回到峰县，当面与其商谈作战部署并作新年的祝贺。我随即乘车离开前方。当晚才到峰县，与李玉堂面谈后，回到后方师司令部，参加元旦晚会观看京剧团演出的

《风波亭》。正看得愉快时，忽接李玉堂的电话，谓前方已经打起来了，据守备枣庄的整五十一师师长周毓英的报告，在其某部方面可闻到剧烈的枪炮声。我即电话询问前方，但此时电话不通了，不得已乃用无线电话与前方保持联系。次日，即一月二日晨，我令武装部队约两个连沿公路侦察，并拟即回前方。但据侦察报告，谓交通已阻断，武装乘车极不安全，不能回防。请示李玉堂后即在峰县指挥，但前方情况已完全不能了解了。”有这样的指挥官，能不打败仗！

## 活捉坦克

战争中常常出现一些出人意料的现象，鲁南战役中活捉坦克确是有趣的故事。

鲁南战役第一阶段从一月二日二十时发起战斗，仅历时四十二小时，即迅速干脆地歼灭了蒋介石嫡系整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我一纵主要使用了第二旅攻歼卞庄之敌。战斗开始，我一举攻占卞庄西北之一〇二高地，同时向塔山发起攻击。一月三日晨，大雨倾盆。八时，敌第五〇五团在坦克掩护下出援，为我击退；十五时半，我攻占塔山制高点；十六时，卞庄之敌在飞机掩护下突围，遭我严重打击。一月四日上午，彤云密布，雨雪霏霏。敌整二十六师大部为我军各部队歼灭，其残

部及第一快速纵队即全部脱离工事，企图全线西窜。据马励武被俘后自述：“迄二日晚与薛岳联系，得其指示谓准予一月三日拂晓撤至峰县附近，并谓即派飞机掩护。我即电令前方遵照薛岳指示撤退。”“不料事出意外，天不凑巧，三日侵晨，忽然大雨倾盆下了很久，飞机既不能掩护部队撤退，坦克、炮队及机械化车辆陷入泥泞状态，这就陷军队撤退于大不利的危境。”马励武把敌整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的被歼灭，归之于“天不凑巧”。当然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和敌快速纵队打过三仗，已经有了打坦克的经验了，只是由于雨雪天给我们以更为有利的客观条件。道路泥泞，公路也被我们破坏了，机械化车辆、坦克、炮队不好走。被我军打坏的敌坦克或车辆瘫痪在道路上，后面的车辆、坦克就再也无法通过了。敌第一快速纵队位于渔沟地区，村庄的名字有常家渔沟、孙家渔沟、马家渔沟等等。从这些地名看，当年可能是河沟沼泽地，如今还到处是洼地。公路不能走，敌人的坦克、自动火炮只好向两侧展开，从道路两旁的洼地里走。哪知道，一下雨洼地泥泞，坦克一下去就陷进去了，走不动了，敌坦克驾驶员也慌，不敢爬出炮塔来，坦克又有很大的死角，只能看到前面，后面和左右都看不到，任由我军战士冲上去打的打，炸的炸，无可奈何，只好挨打。除了敌整二十六师副师长曹玉珩、参谋长郑辅增乘坦克逃回峰县外，第一快速纵

队全部被消灭，缴获到完完整整二十四辆坦克，外加美械榴弹炮一个团、机械化步兵两个团。虽然敌整二十六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被吹嘘为“金刚钻”、“南京的长城”，它的被歼灭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主要还是敌第一快速纵队的被全歼，极大的震撼了国民党军官兵。这支快速纵队是有战斗经验的部队，原番号是装甲兵团，参加过美国史迪威将军指挥的缅甸战役，战斗力较强。消灭了敌第一快速纵队，我们第一纵队的部队特别高兴，因为吃过它三次亏。前三次仗都是在即将取得胜利时被它一冲，没打好仗。为了对付敌人的坦克，我们在战前作了模拟训练。没有充分准备，恐怕很难一下子消灭它。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战火的硝烟稍停，纵队指挥部前移。我看到一团几个战士围着一辆坦克，一面用铁镐敲着，一面喊：“快出来，解放军优待俘虏！”跟着我的参谋问道：“怎么回事？”有个战士，可能是个班长，生怕我们抢了他的战利品，自豪地说：“这是我们活捉的铁乌龟，跟你们无关！”参谋笑了：“我们不抢你的战利品，就怕它马达一发动又跑了。”那个班长狡黠地一笑：“它能跑得掉！烂泥地！再说，我围了高粱杆，烧它！”参谋看到我要赶路，拍拍班长的肩膀说：“好样的！”我们走后，战士火烧坦克，那个“顽固蛋”驾驶员钻出坦克投降了。

## 再歼敌整五十一师

峰东歼灭敌整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后，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我第一纵队奉命兼程南下，追歼逃敌第三十三军所属的第七十七师。一月四日晚抵洪山镇、大小良壁一线。五日晚进占岔河，敌已越运河西窜。六日因运河流速太快，架桥未成，七日上午奉命停止攻击。

陈毅同志鉴于南线之敌第三十三军已越运河向西南逃窜，北线之敌整五十一师全部、第五十二师一个团及整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残部退缩枣庄、峰县等地，遂决心以陶师、鲁南第八师、警备旅、鲁中第四、九师等部队乘胜围歼枣庄、峰县之敌。我纵奉命西进峰县以西和以南一线，对台儿庄、涧头集、韩庄等地警戒。战斗于一月十日发起，十一日二十四时，峰县城即为我鲁南八师等部攻占。同时，陶师全歼自郭里集向枣庄龟缩之敌一个团。十二日，陶师对枣庄发起攻击，未得手。为使陶师能全力攻歼枣庄之敌，野司于十三日命令我纵攻歼齐村之敌，务于两日内解决战斗。

枣庄、齐村守敌为整五十一师，该师除一个团于峰县被歼外，师部率师直属部队及第一一四旅驻枣庄，第一一三旅旅部率第三三七团及辎重营驻齐村。

齐村位于枣庄以西约六华里处，中部有南北沙河一道，河东是大围子，河西是小围子，围墙外有深宽各两米的外壕一道，外壕外有鹿砦两道。围墙上有高碉堡，围墙内还有小围子、碉堡、暗堡等纵深工事。我以第一旅担任攻歼齐村之敌。十三日晚，我第一旅进占齐村外围。十四日十八时开始炮击，实施连续爆破，炸开大围子的石砌围墙，炸毁东南角的大碉堡，随后又炸毁东门门楼。后来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在此战中大显身手，每炸必成，一个人就俘敌一百余名。同时，炸开了小围子，全歼敌辎重营。十五日白天击退敌多次反击。黄昏，总攻敌第一一三旅旅部及第三三七团团部所据小围子，夜半三时许，全歼守敌，生俘其少将旅长李玉堂、少将副旅长李朴全以下二千五百余人。

我纵顺利把齐村拿了下来，陶师却攻枣庄未下。枣庄敌人利用日伪军构筑的工事，比较坚固，打了五天，伤亡不小。陶师刚从华中北来，他们也遇到了我纵刚到山东时碰到的不会攻坚的问题，吃了苦头。陶勇同志是个充满革命英雄主义豪情的人，从不肯服输，但此时也沉不住气了，向粟裕同志提出停止攻击枣庄。粟裕同志征求我的意见，我主张坚决攻下枣庄，并说我纵攻击齐村只使用了一个旅(第一旅)，其余两个旅是生力军还未使用，可以调二旅归陶师指挥配合攻击枣庄。粟裕同志在电话上听了我的意见后，要我到他那里商量决定。我



先到陶勇同志那里，劝他继续打，不能服这个气。其实攻坚没有什么秘密，关键是爆破。他问我齐村方向情况，我说已经拿下来了。他问我伤亡大不大。我说不到一百人。他问我怎么打的？我说，刚才讲了，关键是爆破。我和陶勇同志一起到粟裕副司令员处，我向粟副司令员建议下决心继续打，并说我纵的两个旅还没用上，也已学习爆破攻坚经验，可以让第二旅配合陶勇师打，肯定能打下来。粟副司令员知道第二旅的战斗力不如第一旅，而鲁南八师攻坚经验丰富，所以他提出再调八师过来。最后决定增加鲁南八师及一纵第二旅，配合陶勇师围攻枣庄。我调了第一旅第二团加强第二旅，以第二旅第四团和第一旅第二团组成攻城部队。陶师由正北、西北、正西、西南同时夹击南大井之敌，并以一个旅围困东大井之敌，鲁南八师第二十三团由正南老车站、鞠仁医院向东攻击；我纵第二团、第四团由东南向西北对洋街及老枣庄攻击。

十七日黄昏，我纵第四团炸毁东南角地堡，打开缺口，占领天主堂。同时，陶师攻占北大井。十九日晚总攻枣庄大围子。我纵第二团攻占老枣庄；第四团连续爆破得手，炸开鹿砦、围子，首先突入大围子，向敌纵深发展，进至小新街。同时，陶师自南大井之西突进。鲁南八师第二十三团爆破未得手，由我纵突破口投入纵深战斗。二十日，陶师攻占中兴公司，全歼守敌。

鲁南战役共计歼敌两个整编师、一个快速纵队计五万三千余人，缴获除上述坦克二十四辆外，还有汽车四百七十余辆、各种火炮二百余门，为华野组建特种兵部队提供了物质基础。

战后，我对粟司令员说，我们一纵队初到山东，因为不会炸爆，无法攻坚，以后向山东部队学习爆破技术，攻坚才有把握了。通过这一仗，华中部队才体会到为什么我们一纵刚到山东时没有打好仗的原因。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陈毅同志任司令兼政委，粟裕同志任副司令员，谭震林同志任副政委。我一纵仍为第一纵队，改旅为师。二纵仍为第二纵队，鲁南八师为主组成第三纵队，陶师（华中一师）为第四纵队，王师（华中六师）为第六纵队，华中七师为第七纵队，鲁中部队组成第八纵队，胶东部队组成第九纵队，渤海部队组成第十纵队，加上两广纵队，共十个纵队。还有一个新组建的特种兵纵队。这样，华中和山东的部队才真正统一和集中起来了。

敌人遭受鲁南战役惨重打击后，复集中二十三个整编师五十三个旅，共三十一万人的重兵，分由陇海线徐州至海州段，津浦线徐州至济南段，及胶济线中段，三面向鲁南进犯；其主力十八个整编师三十九个旅，置于徐州及其以东地区，陈诚并亲自到徐州指挥，声言要在鲁

南与我进行“决战”；并称：“国民党胜败全系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然而，等着陈诚的，却是新的更大的失败！

## 第二十七章 紧钳李仙洲

### ——莱芜战役

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山东《大众日报》社论《向会战中的功臣们致贺》中写道：

“在陈毅将军、粟裕将军部下的常胜军中，有紧钳四万余蒋军奠定莱芜战役各路大军一举歼敌之基础的‘广州’部队，尤以其中的‘人民功臣第一连，和‘屹立在安乐山上’的第八连卓著功绩。”

文中的“广州”部队是我第一纵队的代号，“人民功臣第一连”是第一师第一团的第二连，“屹立在安乐山上”的第八连属第一师第二团。

“紧钳四万余蒋军奠定莱芜战役各路大军一举歼敌之基础”，并不是报纸编辑寻找来的形容词，这是战役实际的反映。

#### 出敌不意，放弃临沂

一九四七年初，国民党军鲁南战役惨败之后，以总

参谋长陈诚代替薛岳指挥，集中优势兵力，向鲁南进犯。蒋介石判断我华东野战军在苏北、鲁南连续作战，“伤亡重大，不堪再战”，并侦悉我军主力集结于临沂地区，认为该城是山东解放区首府，我必全力固守；同时企图借助于军事上的胜利，对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英、美三国外长会议起到一定影响，便急忙制定一个“鲁南会战”计划。在陇海、胶济、津浦三线上集中二十三个整编师，五十三个旅，共约三十一万多人，企图在临沂地区与我华野主力决战。

敌以十一个整编师二十九个旅的兵力，组成南北两个集团，以临沂、蒙阴为目标，南北对进，夹击我军。南线，以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八个整编师二十个旅，组成主要突击集团，自台儿庄、城头一线，分三路沿沂河、沭河北犯临沂。北线，以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九个师（未整编）由明水、周村一线，向我莱芜、蒙阴进攻。另外，王敬久集团四个整编师，集结于鲁西南地区，企图阻晋冀鲁豫野战军东援和华野西去。陈诚自以为兵力众多，夸口道：“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胀死老母猪！”同时，他作了自称为“烂葡萄”里夹上“硬核桃”的安排，每一路进攻之敌都以主力师为骨干，左路夹整编第十一师，中间夹整编第七十四师，右路夹整编第二十五师等主力，平推前进，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被各个歼灭的命运了。

在这种形势面前，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反正的伪军头目郝鹏举，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率部叛变，被蒋介石封为第四十二集团军，担任进攻临沂的翼侧掩护任务。

早在鲁南战役攻打枣庄时，陈毅、谭震林同志就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于打枣庄后急需略事休整，尔后拟南下打欧震及七十四师。”而对北线王耀武部则“牵制之”。毛主席同意了这个设想。一月下旬，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电报中央军委，他们已“同住华野”，并报告了在临沂外围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拟“先打敌右翼二十五、六十五两师，再引诱七十四师、十一师北进，再行歼击”的预案。毛主席鉴于华东我军连续获胜，一再告诫力戒急躁，不宜打得太早。一月二十八日电示，明确提出了“后发制人”的指导思想。来电说：“如果陈诚之进攻将于二月上旬或中旬举行，我军似以待其进攻再打为有利：一可使我军获得充分休整时间，二可打敌立足未稳，三可连续作战歼灭多数之敌。但如敌进攻时间推至二月底或三月初，则我军不宜等待太久。”三十一日又电示：“蒋军日内即将进攻，似此甚有利于我在野战中大量歼敌，我军方针似宜诱敌深入，不但不先打陇海路，即敌至郯马地区，是否就打，亦值得考虑。”两电的基本思想，“待其进攻再打为有利”，“似宜诱敌深入”，是很清楚的。

我纵奉令于一月二十一日自峰县地区东开，于二十三日抵达马头、重坊一线。二十七日奉令以第三师展开于郯城以南一线，阻敌整七十四师北犯。二月一日，中路之敌攻我纵阵地，下午三时敌再度组织进攻，我即放弃郯城。二日，我纵奉令将防务移交第三纵队，北去费县以南一线。三日，第三纵队对敌展开顽强阻击，目的是要造成敌左右两路比较突出，以利我寻机先歼其两翼中的一路。谁知敌人非常谨慎，左右两路敌人不但不冒进突出，反而向中路靠拢。此计不成。

二月四日，毛主席电示：“……敌愈深入愈好，我愈打的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目前敌人策略是诱我早日出击，将我扭打消耗后再稳固地进占临沂。你们切不可上当。”

二月六日晚，野司命令我第二纵队以突然迅猛的动作向东南挺进。七日在白塔埠、驼峰地区，一举歼灭敌右路军侧翼由伪军改编的第四十二集团军主力，生擒了郝鹏举，并有直取海州之势，以吸引敌人主力东援，再寻机消灭东援之敌。不料各路敌军竟置郝军于不顾，右路反而向后退缩，仍未能调动敌人。此计又不成。

南线调动不了敌人，野战军首长乃将主力撤到临沂以北休整，并毫不犹豫地放弃临沂，决心挥师北上，首歼自胶济线出动占我莱芜、新泰之敌。毛主席批准了这

一部署。

二月八日，北线之敌继续南犯，第四十六军占新泰，第七十三军进至颜庄，第十二军进至莱芜、吐丝口镇。不但孤军深入，而且兵力也比较分散，加之第七十三军是蒋介石嫡系，第四十六军属桂系，第十二军原是东北军，内部矛盾较大，利于我军歼灭。

二月十日，华野前委决心歼灭李仙洲集团于新泰、莱芜地区。

是日，除留第二、第三纵队伪装全军模样，于南线采取宽正面的防御，节节阻击敌人外，我军主力分三路隐蔽地兼程北上，于二月十六日前，进至莱芜周围地区集结。同时，部署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桥，造成我军将西渡运河的假象，以迷惑敌人，隐蔽我军企图。

二月十五日，我军主力放弃临沂城。敌人得意忘形了。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在南京叫唤：“攻占临沂为国军在鲁南决战的空前大胜。”陈诚更是吹嘘：“陈毅残部已无力与国军作战，欲与刘邓部会合，国军正追剿中。山东之大局指日可定。”

### 敌军猬集莱芜城

一片喧闹声中，坐镇济南的敌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



耀武却对我军的行动发生了怀疑。他又从空中侦察中发现了我军主力有北上莱芜、新泰的迹象。他既怕我军围歼孤军深入的李仙洲集团，又顾虑济南兵力空虚。遂于十六日命令李仙洲集团全线后缩。但是，蒋介石和陈诚却相信“在临沂外围歼灭共军十六个旅”的谎言，判断我军放弃临沂是由于“伤亡惨重，不堪再战”、“东临大海，西际湖山，局踞一隅，流窜非易”。蒋介石并给王耀武亲笔信，判断我军“现已无力与我主力部队作战，并有窜过胶济路、北渡黄河避战的企图。为了吸引敌人，不使北渡黄河得有喘息的机会，而在黄河南岸将敌歼灭，以振人心，有利我军以后的作战。切勿失此良机，务希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十七日，王耀武按照蒋介石、陈诚的命令，复令第四十六军再占新泰，第七十三军的第一九三师进占颜庄；第十二军除新三十六师由蒙阴寨退至吐丝口镇外，该军主力则由莱芜、口镇退至明水。王耀武对蒋介石的命令打了折扣，总算保存下了第十二军的主力。听蒋介石的命令，没有不打败仗的！

虽然两次敌情变化，我军仍坚持原作战方针：对新泰敌第四十六军割而不围，对李仙洲兵团部及第七十三军围而不攻，对吐丝口镇的敌新三十六师则围而歼灭之。

十九日，王耀武发觉我军攻新泰、莱芜意图后，又

令敌第四十六军及第七十三军第一九三师自新泰、颜庄地区星夜北撤，第七十三军第七十七师迅速自张店经博山南下归建。根据这第三次敌情变化，野司对战斗部署稍作调整，以第八、第九纵队为右路军于和庄歼灭敌第七十七师。预定二十日下午三时开始战斗，避免过早打响，影响整个战局。其余各纵队则于二十日黄昏后进入战斗。但第八、第九纵队却于二十日下午一时就提前打响，二时正式投入战斗，于是情况又起了变化。

敌发现其第七十七师在博山以南至和庄地区挨打，即令第四十六军于当晚自颜庄星夜撤向莱芜，并拟以一九三师两个团于二十一日上午自莱芜来援，接应第七十七师归建。野司遂命令第四、第七纵队于当晚插至莱芜、颜庄之间，截断敌第四十六军退路，第四纵队并参加攻击莱芜。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结果敌四五万兵力猬集莱芜城！

## 紧钳四万蒋军

我纵于二月十九日晚到达莱芜城西南集结，承担于二十日晚十时开始协同右路军攻歼莱芜城及其外围敌之任务。第一步首先集中力量解决莱芜城西北及西南外围之敌，第二步再配合右路军攻城。对于二十日夜间的敌情变化，我们开始并不知道，仍按原定任务执行。当晚，

第一师攻占莱芜城西北四〇〇高地、北铺庄、小洼等要点；第二师进占城东戴家花园、吴家花园一线；第三师攻占城西小曹村、曹家村、任庙庄，直逼莱芜城西关。二十一日七时，敌军第十五师在师长杨明亲自指挥下，以飞机、炮火掩护向我矿山八〇〇高地、小洼进攻。敌人越来越多，敌炮火越来越猛，我看前面烟雾弥漫，爆炸声震耳欲聋，估计敌情有变化。我立即报告野司。野司也不清楚敌情变化，只告知第四、第七纵队还无报告。于是，我下命令给各师：构筑工事，准备苦战。恰在此时，我第八团与敌第四十六军前出部队都误认为是各自友邻，敌军派人来联系。我第八团发现是敌军，俘其一人。我亲自审讯此人，才弄清了敌李仙洲集团两个军已猬集莱芜，原来由五个纵队担负包围李仙洲集团的任务不得不由我纵担当起来了！

还是当年的新闻报道更准确一些。回忆终究是回忆，难免有误记。这里抄的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山东《大众日报》的头条，并经过新华社播发的，标题叫做《紧钳四万余蒋军》：

歼敌五万余众之莱芜歼灭战中，华东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紧钳蒋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总部暨七十三军、四十六军于我包围之中，经三昼夜激战，予该两军主力以惨重杀伤，

迫使蒋军丧失斗志，仓皇突围溃窜，奠定二十三日我各路大军一举聚歼蒋军四万余众之胜利基础。战斗第一夜（二十日），“广州”部队向莱芜城东、西、北及西南等地挺进，当夜除城西北的矿山高地外，其余外围据点全部为我肃清，李仙洲总部与七十三军即陷入包围。二十一日晨，城内蒋军二千余在九架飞机掩护下，分路向西关、北关我军阵地猛犯。我一大队一连在敌交叉火力网下，与千余敌人反复肉搏，坚守阵地，予敌惨重杀伤。南关我某大队三连的一个排，六连一个班，深入吴家岭（城南十里）附近阻击自颜庄北犯之四十六军。西关小曹村（城西四里）战斗中，我七大队三营攀上二人深的壕沟，在村内与敌展开逐屋争夺战，战士们在战斗中互相鼓励为人民立功。马春田一气摔出四十多个手榴弹，八连战士沙纪有两眼挂彩失明，仍坚持不退，把枪交到连副手里，握好手榴弹准备与敌决战，全营共击退敌人猛冲达四次之多。入夜，我主动放过由颜庄北退之四十六军全部，由南门进入莱芜城，至此蒋军遂全部被压缩成一团。二十二日，蒋军增强城西北兵力，企图强夺我军阵地以确保其突围道路的安全。我扼守城西北高地的二大队

八连一个排及机炮连一个排，坚守山头阵地，反复打垮敌人八次冲锋，自晨至暮，阵地屹立未动。当夜，我六大队与敌激战于矿山脚下，同时我一支队也伸展至莱城北十五里之南白龙，向七十三军的一九三师猛攻，蒋军伤亡惨重，其侧翼掩护兵力无法向北伸展。战斗至最后一天（二十三日）清晨七时半，在飞机十余架轮着扫射轰炸下，李仙洲亲率其七十三军（缺七十七师）、四十六军分四路沿莱（芜）吐（丝口）公路及左右大路向吐丝口方面仓皇突围。下午二时许，敌左路七十三军之先头部队刚越过小官庄（莱芜北十七里）时，我三支队自小官庄一线拦腰杀出，直捣南白龙，敌被切为数段，狼奔豕突，纷纷四散逃窜。此时，我各路大军紧缩包围，勇猛冲击，万千蒋军挥帽缴枪投降。不到两小时，此蒋军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所亲自统率之四万余蒋军，即告全部覆灭。

这则消息，写的是我第一纵队，支队是师的代号，大队为团。我不想再具体说当年的战斗过程了，只补充这则消息没有说到的当年我军最后歼灭李仙洲集团的部署。

野战军首长得知李仙洲集团全部已猬集莱芜城被我一纵队包围这一情况后，立即调整部署，以四、八纵队为右路军归八纵王建安司令员指挥，进至莱(芜)吐(丝口)公路以东，右路军(一、二、七纵队)归我指挥，位于吐丝口及莱吐公路以西。由于二、七纵距离尚远，要求我纵无论如何要坚持到第三天中午左右军各纵赶到后，才能放敌人出城逃窜，让敌人先头到达吐丝口，后尾已脱离莱芜时，我军左、右两路大军在莱吐公路两侧夹击，在莱芜至吐丝口之间将该敌全部歼灭之。按照野司部署，一纵坚决完成赋予的任务。二十三日上午敌分两路平行向北突围，与我纵前哨接触。我即通知六纵队在吐丝口部署拦截堵击逃窜之敌，至中午十二时放开大路让莱芜之敌北窜。正象前面消息所说的，中午十二时我将敌人放开，敌人仓皇逃窜，不成队形，拥成一团。下午二时许，敌先头还未到吐丝口，后尾已离莱芜城时，我集结位于莱吐公路两侧左、右两路军勇猛出击，我四纵队立即抢占莱芜城和矿山，切断了敌军退路，我六纵在吐丝口拦阻敌人。敌军拥挤在莱吐公路之间，被我军猛烈炮火轰击，到处乱窜。我纵在西面一压，敌人向东面溃窜，我右路军及六纵队张开口袋，将敌人全部网住。仅仅两小时时间，即干脆彻底全歼了李仙洲集团，俘敌四万余人。

敌军被歼之时，国民党军的飞机不断在上空盘旋。

原来敌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正在战场上空指挥空军尽力轰炸和扫射，务期协同地面部队突围。王叔铭看到蒋军一片混乱，不得不用无线电向李仙洲建议：反攻既不能成功，突围更非易事，不如退回莱芜固守待援。但李仙洲欲进不成，欲退不能，王叔铭也无可奈何，眼巴巴看着四万余官兵，包括李仙洲本人在内，均被我军俘获。我们的战士指着飞机讽刺道：“飞吧，你飞来飞去，只两个钟头就把几万兵送终了。快飞回南京去向蒋介石报丧吧！”

莱芜战役共歼灭敌一个指挥部、两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六千余人。战役结束后，本拟向北扩张战果，但王耀武怕我乘势进攻济南，二十三日晚星夜将胶济线西段的敌第十二军撤至济南，加强城防。我军乘胜解放了胶济路西段南北县城十余座，控制铁路二百余公里。

此役，我第一纵队伤亡不小，缴获不大。粟裕副司令员三月八日在高干会议上作《莱芜战役初步总结》时说：

“在各纵的配合上说，一纵最吃力，虽然缴获不大，但在整个战役中起了决定作用，应算第一功。”原来一纵有些同志还有情绪，觉得这一仗吃了亏。粟裕同志这样一说，大家也就想开了。

## 难忘的沂蒙山人

提起莱芜战役，不得不感谢沂蒙山的人民。沂蒙山区的老百姓确实了不起，他们支援八路军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中又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了保证莱芜战役的胜利，他们尽了最大的力量，作了最大牺牲。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莱芜就有六千八百人参加我军。战役中，鲁中五百万人民英勇参加后勤工作，其中有五十万人在战地服务。沂源县出动四个民兵团参战，其中陈学雨爆炸队二月十六日到博山附近，炸死敌军十多名，又连夜赶到莱芜、新泰前线，连同其他七个爆炸队，先后设地雷炸死敌军三百余。每条小径和山沟都奔走着运输队，他们不间断地把白面饼、煎饼和小米运向前方。一百二十户人家的朱家宅子，在二月十五日一天内做好一千八百五十斤煎饼，蒸好一千二百斤白面饼，打出二千八百斤小米，磨好一千八百斤麦面，集中六千斤柴草，运到前方。靠近莱芜城的颜庄区群众一次就为部队办好煎饼和小米各二十万斤，而他们自己却吃糠咽菜！这地区都是山，没有草，为了解决部队牲口的草料问题，我亲眼目睹老大娘揭屋顶、拆草房，真是“破家支前”，供应部队。没有老百姓的支援，这一仗是没有办法打的！



莱芜战役，是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大踏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解放后拍的电影《南征北战》就是以这次战役作为背景的。至此，从宿北战役开始至莱芜战役，在战争初期集中兵力的战略转变问题才完全解决了。

## 第二十八章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 ——孟良崮战役

#### 不性急、不分兵，忍耐待机

莱芜战役后，山东战场形势大好，鲁中、渤海、胶东三个军区连成一片。三月一日，我第一纵队奉令在张店、周村、淄川之间地区集结，进行为时一个月的休整。

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国民党大军压境，休息几天，睡个囫圇觉就不错了。如今休整，而且一个月之久，全军上下一片雀跃。总结战斗经验，训练基层骨干，进行以诉苦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教育，溶化解放战士，开展立功创模运动……做不完的工作。只不过不行军，不打仗，吃定心饭，睡安稳觉，恢复体力，已是十分难得。这些，都是解放战争以来用生命和土地的代价夺取来的。

蒋介石不会承认他的失败，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崩溃已经开始。

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的八个月中，占领了我解放区一百零五个城市，却被消灭了七十一万兵马，这就相当于每占一座城市，即须付出七千兵力的代价。敌军由于深入我解放区，与我解放区的全体人民直接作战，战线延长，兵力分散，在各个战场都陷于被动。从一九四七年三月起，敌人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并将进攻重点置于山东和陕北两解放区，企图先占领陕北和山东，再占领华北和东北。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的六十个旅，约四十五万人，向我山东解放区进攻。敌人的号称“五大主力”王牌部队中的三支部队：整编第十一师、整编第七十四师和第五军都部署在山东战场。整编第十一师是陈诚的起家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御林军”，第五军则号称“主力中的主力”，分别配属于汤恩伯、欧震、王敬久三个兵团内。首先占我鲁南山区，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继分路自临沂、泰安之线并肩进犯鲁中，寻找我军决战，妄图聚歼我军于沂蒙山区。

此时，我解放军除一面在山东和陕甘宁两解放区继续采取积极的防御作战外，同时在东北、河北、山西、豫北等地区陆续打击敌人的进攻，收复失地，并在反攻中大量消灭敌人。

敌人向山东的重点进攻，开始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三个兵团并肩北犯，重心在新泰、蒙阴地区。我华

东野战军原拟以二、七、八纵队南开，组成左翼兵团，出击郟城、马头地区，围歼敌六十五师，切断陇海路徐州以东交通，调动汤恩伯兵团南援，造成歼敌良机。我纵亦奉令南下，任务是与其它纵队配合，歼敌于运动之中。谁知敌军侦悉我军主力南下，立即调整部署，相互靠拢。野司紧紧抓住各路敌军尚未靠拢之际，决心集中主力，向敌两翼出击。四月二十六日，西翼我三、十纵队攻占泰安城，歼敌七十二师；我纵攻占宁阳城。东翼出击青驼寺，歼敌六十七师三千余。野司拟集中兵力歼敌整十一师，我纵奉命兼程东返，谁知赶到新泰附近，突然遭敌第五军袭击。情况变化，此计又不成。

原定第六纵队和我纵、第七纵队南下鲁南、苏北，威胁敌后，创造战机。可是第六纵队经卞桥进入鲁南敌后以后，敌人除在临沂、海州间局部变动，准备阻截我军继续南下外，正面进攻的敌人还是继续进犯。南下调动敌人未成。这时候，毛主席及时指示华野：不要轻敌，不要分散兵力，对于密集之敌，要有极大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过早惊动敌人后方，让敌人大胆前进，总有歼敌机会。当然也希望华野能再打两三个战役后转入外线。电示也指出：青驼寺一仗，“但因一纵远去宁阳，来不及集中兵力打七十四师等部，失去一歼敌机会。……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耐心待机这是很对的。”

野战军首长认真研究了毛主席的指示，接受了前阶段的经验，决定将主力再后退一步，集结于莱芜、新泰以东待机。我纵和第七纵队停止南下。

我军的这一行动给敌人造成一个错觉，以为沂蒙公路一带我主力已转至泰安地区或淄川、博山地区。于是中路敌军汤恩伯兵团猖狂起来，想抢头功，前出到三路敌军的先头。其整编第七十四师更是头脑发热，他们进攻解放区以来，还没有受到过重大打击，十分骄傲，放肆地突出本兵团序列十多里，进入蒙阴以东、坦埠以南地区，企图抢占沂水、莒县县城。这就为我提供了打其一股的有利战机。

## 从“百万军中‘剜出’上将”

野战军首长决心打这一路敌人。下这个决心是经过反复考虑的。因为按一般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而这次是先打强敌，这在我军战史上是少见的。而且这次战役，敌军总兵力四十五万人，我军只有二十余万人。孟良崮战役就是不同于一般规律的特殊战役，这就显示了战役组织者和指挥员的魄力和军事艺术。敌人的弱点是明显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突出于其友邻部队之前，到达岸堤；整编第二十五师一个团进到黄斗顶山，主力在桃墟尚未出来。所以，野战军首长原拟歼敌整编第七师

及整编第四十八师，改变意图为先歼整七十四师和整二十五师。最后，野战军首长的决心改得更为明确：集中力量歼灭整七十四师，宁愿放走整二十五师全部，不愿放走整七十四师一个连！全歼蒋介石的“御林军”，将起极大的政治影响和心理影响。整七十四师是王耀武的基本部队，王耀武任军长（原番号为七十四军）时，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时是该军五十八师师长。日本投降后最先空运南京受降，系国民党陆军总部直辖南京卫戍部队，深得蒋介石宠爱，指该师为典型部队，命令其它部队一切训练教育以该师为标准，号称“模范军”。整七十四师全部为美械装备，较他部为优。辖三个旅，三万七千多人，兵员足，战斗力强。该师前锋占坦埠、岸堤、黄鹿寨一线后，五月十三日又退缩孟良崮山区，其两侧的整编第二十五师、整编第六十五师和整编第八十三师，相距并不远，特别是整二十五师紧靠孟良崮地区。要歼灭该师，就必须把它从敌人第一线八个整编师中剝割出来。敢不敢吃掉它？如何吃掉它？是对华东野战军的一场考验。

孟良崮战役部署开始时，因为在此以前，我纵接连打了几个战役，特别是莱芜战役，比较疲劳。所以，没有我们第一纵队的任务，而是作为总部的预备队的。开作战会议时，我就没有去，由谭启龙副政委和何克希副司令员参加的。会上，研究部署时却发生了变化 在作战

会议上陈毅司令员对这仗的打法这样讲：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分散、孤立之敌，这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在敌人强大兵力展开进攻时，通常是打击敌人的侧翼有利，但是当敌人连续遭到这种打击而防范严密，特别谨慎，同时中央之敌却比较轻敌冒尖，并疏忽大意，而我军又在其附近隐蔽了相当兵力的情况下，采取一面抗住援敌，一面集中优势兵力猛攻中央之敌的战术，同样可以达到战役目的。这次围攻整七十四师，就是这种打法，这叫做“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陈司令员讲：要取这颗“上将首级”就要把这个“上将”从“百万军中”剜割出来，然后再攻上去；另一方面还要挡住外围敌人的增援，的确是一个十分艰苦的任务，必须经过一番苦战。要把整七十四师剜割出来，就需要一支部队楔入敌人纵深，切断整七十四师和整二十五师的联系。野战军首长开始打算使用第八纵队，考虑再三，担心第八纵队路程远不大可能预期进入攻击位置断敌后路，而且第八纵队很少担任楔入敌人纵深、穿插分割的任务。于是谭震林副政委提出由一纵担任这一任务。陈老总和粟裕副司令都表示赞同，觉得使用一纵较合适，因为一纵经常担负穿插分割任务，较有经验。会上，野战军首长要谭启龙、何克希两同志表态受领任务，但他俩不敢表态，理由是原部署没有一纵任务，没有准备。会议后，陈老总要他俩回来向我汇报，并单独召我去指挥部。

那时候，虽然战云密布，因为没有我纵任务，我感到轻松，正在下围棋哩。我听了谭、何两同志汇报，立即飞马去华野指挥部。华野指挥部设在坦埠东北西王庄的一条山沟里，千山万岗当中，地形很隐蔽。山沟外面，敌机盘旋不停，时而轰炸，时而扫射。正面进攻的敌人炮声已经清晰可闻。一张山东老乡小矮方桌，几条破旧的小板凳，陈、粟、谭三位首长都在。谭震林副政委一见到我，就说：“你这个‘梅兰芳’不上台，这个戏不好开场嘞！”粟裕副司令员给我讲了整个部署：第一纵队为右翼迂回攻击部队，主力自旧寨以西楔入，割裂敌整七十四师与整二十五师之联系，尔后配合友邻部队围歼整七十四师；并以一部阻住蒙阴敌整六十五师东援。第八纵队为左翼攻击部队，第九纵队为左翼迂回攻击部队，与第八纵队会师于垛庄，后继向孟良崮攻击。第六纵队自鲁南进入垛庄、青驼寺之线，断敌后路。第四纵队于正面，先阻敌北犯，待其它纵队完成对敌迂回分割后，即合力向南出击。其它部队分别阻击和拖住增援的敌人。随后，他又讲了为什么要使用第一纵队的理由。陈老总问我：“怎么样啊？”我说：“既然这样，我们承担这个任务。但我们部队确实太疲劳，也没有思想准备。”陈老总说：“总之，任务艰苦，责任重大，一定要完成任务。如果你们任务完不成，整个战役部署就完了。我们已把独立师加强一纵，你就有四个师兵力了。一纵战斗作风是好



的，是可以信赖的。”独立师是由中原突围到华中的原中原军区第十三旅（皮定均旅），莱芜战役后列入我一纵建制。

此战关系到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关系到全局胜败，我怎么能回避这个责任呢？我代表我纵全体同志承担了

这个任务。

我回到纵队部，四个师的师长政委都在等着我了。那些长期与我一起作战的同志一听到作战任务，什么话都不讲，只等具体命令。独立师的方升普师长，久经征战，也是渴望建立新的战功。大家交换意见以后，我站起来，用红铅笔沿沂蒙公路一划，地图上出现了一条弧线。我指着这条线说：“同志们，责任重大，我们一定要不惜牺牲完成任务！一定要分割敌整七十四师和整二十五师，并从中间穿插过去！具体部署：以第一师攻取塔山、尧山，打掉整二十五师的牙齿，割断整二十五师和整七十四师的联系，并阻击敌整六十五师东援。以第三师为第二梯队。以二师、独立师归二师师长刘飞指挥，从这个口子向纵深穿插，与友邻会师后全力攻击孟良崮。由我带领一、三师，何克希副司令员、谭副政委随三师、独立师行动。

我纵战前动员工作就十分仓促了。五月十一日部队从鲁村附近南下，只作了一般性的战斗动员；十三日纵队政治部才印发了野司首长来电和自行拟订的动员口

号。野战军政治部发出的动员口号，我纵直到战斗进行两天后才收到。但在一个月整训中，诉苦教育和立功运动的开展，部队的政治素质提高了，革命英雄主义发扬了，士气旺盛。我在行进中观察了一下部队情况，确是斗志昂扬，走起路来的脚步声都铿锵的。

五月十三日黄昏，战斗开始。我赶到老鼠峪子，督促二师、独立师前进。我一纵部队开进时，敌整七十四师也正在向孟良崮开进、收缩。由于两军过于靠近，我亲眼看到山地敌军的运动。敌人在山岗，我军在山坡，我知道他们是敌军，敌军却以为我军是友邻整二十五师，不吆喝口令，不打枪。当时暮霭浓重，视线不清。这时机是稍纵即逝的，决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如果犹豫了，部队停下来，敌人就会发觉是“共军”，火力一压，处境就十分危险。这时候，谭启龙副政委从第二师给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第二师师长刘飞报告，他把第六团一个营带了进来，其余部队到重山山口，遭到宫庄敌人阻击，加上空中和地面炮火的阻击，进来不得。”这个节骨眼上，部队怎么能停下来呢？我在电话上下了一道死命令：“不理敌人，继续前进！”以后，刘飞同志向我报告：“把整二十五师的阻击部队打垮了！第四团、第五团和独立师都带进来了！”同时，一师攻占塔山、尧山。至此，我一纵完成穿插分割任务，切断了敌整七十四师与整二十五师的联系，打退了敌整六十五师的进攻。五月

十四日二时，独立师攻占天马山、界牌，但第八纵队因路远未能赶到与我纵会师。天明，从报话机上侦听到敌整七十四师各部都在行动。估计该敌可能想恢复与整二十五师的联系，还可能迅速撤向孟良崮。上午九时，野战军指挥部指示，要我纵独立师和第二师不顾牺牲，猛攻孟良崮。除一个团宽正面阻击敌整二十五师外，其他五个团全力攻击。当时，敌整七十四师已后撤，我第八、第九纵队不可能赶到，而第六纵队也要第二天才能赶到，一定要攻占孟良崮才能阻住敌人。因此，我又命令第一师除留一个次要团守备黄斗顶山一线阵地外，其余两个团和三师攻击前进。下午三时，从报话机侦听到敌整七十四师率三个旅已到达孟良崮，因此已不是以一个纵队所能完成的攻击任务了。我随即发电报建议：敌已占孟良崮，且我大量部队已攻占界牌及垛庄并向西前进，情况已起变化，宜采取围攻。野战军指挥部电示我纵暂停对孟良崮的攻击。

五月十四日整天战斗火炽。塔山、尧山被敌重占，又复夺回；凤凰山、曹庄、天马山、蛤蟆崮不时告急。蒋介石得战报后，亲自指挥作战。敌整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狂妄地提出，要坚守孟良崮，以他为“磨心”，拖住我军，四面围攻，企图“碾”碎我一纵。于是，蒋介石严令敌整二十五师、整六十五师、整八十三师和第五军等部，从东、南、西三面猛烈攻击。我纵各阵地均遭受敌

军迭次进攻，血战竟日，整天笼罩在烟火里……

五月十五日拂晓，独立师第一团和第二师第六团夺回三三〇高地和二八五高地，重占围攻孟良崮的有利阵地。我各友邻部队亦进逼孟良崮：第九纵队攻占孟良崮高地一处；第八纵队正围攻庐山；第六纵队已进抵垛庄；第四纵队前锋直逼五二〇高地。但敌各路部队在蒋介石严令下，不断向我军进逼，情况趋于紧急。敌整七十四师遭我各路大军压缩于孟良崮荒山后，在各路进援部队的呼应下，企图以五十八旅掩护向西南突围。我即令第一师第一团进抵北庄，第二师第四团进抵石王河集结，以截敌突围。张灵甫发觉我大部队抵达其周围，后路已为我军切断时，则改变为固守孟良崮及以西之六〇〇、五四〇、五二〇一带高地坚守待援。

陈老总给我来电话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又来了指示，说不要贪多，首先歼灭整七十四师，然后再寻战机。现在敌人的十个整编师已经围在我军四周，先后打响。当前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同兄弟纵队把整七十四师这个轴心敲掉，这样，敌人就没有巴望了，我们也就免得两边作战了。如果拖延下去，情况的逆转是可以预料的。”

我把陈司令员的指示转达后，纵队的几位领导同志都感到担子沉重，也感到我纵两面作战，兵力不够。我掂量了一下陈毅同志讲话的份量，下决心说：

“从阻击部队中抽兵！集中力量向孟良崮攻击！一面挡住‘百万大军’，一面取‘上将首级’！我们一定要做到！”

谭启龙、何克希、张翼翔等同志都同意这样办。研究了具体部署后，我抓起电话，亲自向各师师长交代任务。我又把一师师长廖政国同志找来，我问他：

“我把主力部队都拿去攻击孟良崮了，只留给你从地方上刚升级的三团、九团，加上你师二团，扼守六十多公里的阵地，挡住敌人两个整编师，保证主力拿下孟良崮。你看行么？”廖政国同志有勇有谋，打仗从来不讲条件，他一声未吭，接受任务就走了。

敌人遗尸遍地，还是成群成团地向我阵地上拥，炮火没有间歇，部队不分队形，那才象敌人污蔑我军的所谓“羊群战术”、“人海战术”哩！中午，三山店、交界墩的我阻击部队伤亡殆尽，被敌人强占。下午四时，界牌又被敌人占领。随后，天马山、覆浮山、蛤蟆崮全线告急，敌人已攻上天马山的山腰，接着部队与指挥所失去联系……

我手里已没有预备队，别的部队也赶调不及，怎么办？正在这时，第一师廖政国同志来了电话：已将敌人击退，天马山阵地稳定。他说，正在天马山危急之时，正有一支部队在山沟里向东急进，这是我第四纵队第二十八团的一个营。廖政国同志立即对该营营长说：“我是

一师师长，命令你们立即赶援天马山。”那营长说：“我营奉令跑步赶去攻击孟良崮，任务紧急。”廖政国同志向烟火弥漫的天马山一指说：“天马山阵地的得失，关系重大。如果敌人打通联系，全局皆输。我手里只剩下七八个警卫员，只有使用所有到达这个地区的部队。”那营长考虑了一下说：“好，为了整体利益，我们执行你的命令。”这个营赶到天马山，和守军一起，终于将敌击退。这种情况也只有人民军队才能出现！

### 孟良崮上神鬼嚎

这天晚上，已是十点多钟，陈老总与我通了电话。他说：“敌整九师、整十一师已靠近蒙阴，第五军已到新泰，整六十四师已到青驼寺。如在明天（十六日）拂晓前不能全歼整七十四师，则我军将陷入敌人包围。”陈老总在电话里沉默了半晌，然后又说：“叶飞啊，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拂晓前拿下孟良崮，消灭整七十四师，我们就全盘皆活了！”陈老总授权我统一指挥第一、四、六、九纵队总攻孟良崮。他果断地说：“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拼掉两个纵队，也要完成任务！”我承担了这个指挥任务。粟裕副司令员接过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可以组织好总攻？”我回答：“需要两个钟头，下半夜一点可以实施总攻。我已规定了总攻信号，并同四纵、六纵已接通电

话，但第九纵队同我电话还没联上，请总部通知它作好总攻准备。”

五月十六日一时，总攻开始，各纵队协同很好。二时，我第一师第一团，第二师第四、六团，独立师第一、三团与友邻第四纵队所部攻占五二〇、五四〇一线高地；第六团也配合出击，拂晓占领附近山头。

总攻开始以后，野战军首长几乎每隔五分钟就来一次电话。战斗空前激烈，情况变化多端，电话铃声也就不断响着……

敌整七十四师不断告急，西面敌整六十五师、整二十五师在蒋介石严令下拼死支援。我纵阵地失而复得，反复争夺，终于挡住了他们的进攻。

五月十六日拂晓，前线各路大军密集，哈气成云，同心协力，直取孟良崮。强大炮火惊天动地，孟良崮象火山爆发。下午六时，敌整七十四师被我全歼，狂妄的中将师长张灵甫的尸体也抬下山头，山谷里响起一片欢呼声。可在这时，垛庄方向仍有一片枪声，真使我大惑不解，立即派人去第六纵队查询。第六纵队司令部的一位同志写了回条，颇幽默。他写道：“万枪齐鸣，山呼谷啸，并非敌骑进攻，而是我军战士胜利后略表狂欢之心情耳！”

敌整编七十四师被全歼后，进犯鲁中的敌人全线溃退，吓得四十余天不敢出战。蒋介石不怪自己无能，总

是迁怒部下。战役结束后，敌整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被押到南京“军法会审”，敌整二十五师师长黄伯韬也被撤职留任”，“带罪立功，以赎前愆。”

此战胜利，陈老总是非常高兴的，当时就口占一首七律：

孟良崮上鬼神嚎，  
七十四师无地逃。  
信号点点星灿烂，  
照明处处火如潮。  
短兵肉搏争山顶，  
炮击血飘湿战袍。  
蒋贼主力今歼灭，  
我军个个是英豪！



## 第二十九章 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

### 华东作战一年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止，是敌人的战略进攻，我军的战略防御阶段，时间正好一年。我华东战场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坚决地迎击敌人的进攻，到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也就在这一段时间。

陈毅同志在一九四七年底作了《一年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的讲话，他首先说：“一年伟大的自卫战争总结，首先是战略总结。好比毛主席和蒋介石下棋，‘黄河为界，落子无悔。’一年来自卫战争的胜利是战略的胜利。虽然我们打胜仗靠同志们不怕牺牲流血的精神，但主要是靠统帅部，靠毛主席的战略指导。许多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兵都说：‘你们的战略上凶，我们就是战略上失败了。’俘虏来的蒋军师长、旅长等更是这样说。他们对我们部队看不起，认为我们部队不懂军风纪，武装杂乱，甚至连

口令也叫不好，有时闹笑话。他们不服气，说什么你们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胜仗？我们的战士干部回答道：不管怎么说，总是把你们俘虏来了！的确，我们比战术、比技术是比不过人家的，如操场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往下愈差。但是，愈往上比，我们则愈强，如师以上战役组织比蒋军强，纵队更强，野战司令部又更强，到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们高明多少倍。说穿了，国民党的战略指挥主要是美国人，因此我们的战略胜利，不仅打败了蒋介石的统帅部，而且打败了美国的统帅部。我们的战略有世界意义，在全世界是崭新的、优秀的。”

陈毅同志阐述道：“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全部消灭敌人。即是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创造时机，选择战场，集中兵力，全面包围消灭敌人，以此改善我们的装备，改变敌我形势，到一定时机转入反攻。采取这种战略方法要舍得丢地方，抛出空间，争取时间，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以退为进，先退后进，逐渐改变敌我形势。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基本方针和战争全部过程就是本着这个原则。如华东战场我们把敌人诱入山东，一直牵到胶东烟台那个牛角尖上。西北战场诱敌进到绥德、葭县。冀鲁豫战场也是三进三出，敌人进到黄河沿岸，甚至渡河攻占大名府，敌人不断占我们地方，也不断被我们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它每

进一步，占领我们一个重要城市，必须付出几个旅的代价，反复如此。到一定程度，敌人后方空虚，进攻也就不得不停止。于是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跳到敌人后方，进行反攻；敌人处于被动，掉在我们反攻大军的后面。整个战争过程就是让出地区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敌我军事思想斗争也就是这一问题。战争的复杂奇妙为古今中外所未有。”

陈毅同志说：“毛主席这个军事学说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军事特点，一般人不易理解。”他举例说，一九四六年六月底，“驻青岛美国海军陆战队克里门将军到临沂找我，他自吹法国登陆有他，北非登陆也有他。他希望我到青岛与王耀武见面，我拒绝不去。他说：‘那么战争非打不可了。’我说：‘不是我们要打，是国民党要打进来，我们一定要应战。如果你真有调解的诚意，去跟国民党讲，只要国民党不打就行了。’他又问我：‘战争打起来，你们有没有把握？’我说：‘初期两淮、临沂要放弃，甚至张家口、延安也可能失守。’他问：‘为什么？’我说：‘国民党力量大，你们美国又帮助他。’他说：‘那你们何必打，讲和算了。’我说：‘不然，半年以后形势会完全变化，我们会打垮它。’我给他算起账来，国民党进攻两淮，我们可消灭它多少；进攻临沂，消灭它多少；进攻延安消灭它多少……最后，他耸耸肩膀说：‘我不懂，你们又要丢地方，又要消灭敌人，中国问题真复杂。’我告诉他：‘现

在你不懂，一年以后你就懂了。日本开始也不懂，八年以后懂了，只好无条件投降。’”

实际上，我军的干部也有一个理解的过程。记得陈毅同志在孟良崮战役后的一次讲话中说：“有位同志对我说，‘现在我相信你了，以前总怀疑军长犯了机会主义。’我清楚得很，去年七月以后几个仗未打好，你们怪话多得很，什么‘军长下围棋行，打仗不行’。以后打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几个好仗，又说什么‘英明领导，天才地才’。这叫做不懂军事辩证法！战争不是容易的事，个人作用很小，微乎其微，主要靠集体的力量，靠党，靠群众。”他大有感慨地说：“胜利时的英雄，和平时期的英雄，人人能当；可是在不利的环境，在低潮逆境下，能坚持一定之规做艰苦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 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

早在公元前四〇〇年间的《孙子兵法》就写有：“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击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虚实篇》）阐述了集中兵力的重要性。马克思在他的军事著作中也论说过这个问题，他在一八五七年九月写的《印度起义》中指出：“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他指出：“英军在印度作战的计划却是分散兵力”，而应该“尽量缩减警备部队的人数，使他们立刻摆脱妇孺的拖累，撤出没

有战略意义的据点，从而集结尽可能多的部队用于野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26页）然而，懂得集中兵力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一回事！所以毛泽东同志说：“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

解放战争初期，我从下级的角度觉察到，陈毅同志的指挥也是很困难的，一直无法解决集中兵力问题，直到淮阴失守以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开头是华中打华中的，淮北打淮北的，山东打山东的，山东又是各军区各自为战。其实，毛主席在“集中大部打敌一部，用力省而成功多，既能全歼，又能速决”的电报指示中，已经总结了华中野战军所以能取得七月十三日到八月二十七日七战七捷的经验是：“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八月二十六日集中十个团打敌两个团，八月二十七日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无战不胜”。但是运用这一原则，并非易事。

陈毅同志的体会当然很为深刻，一九四七年底，他在《一年来自卫战争总结》的讲话时，专门讲到华东战场集中兵力的问题，把宿北战役之前和宿北战役以后的情况作了对比。他说：“在日本投降时，山东有部队三十万，内野战军五万；华中二十万，内野战军三万。初期五十万军队，在第一线作战的只有八万人，其余都是分兵把口，地方部队调都调不动。苏中七战七捷是蒋军分散，一个旅为一路前进，我们集中兵力，所以打了七次胜仗。

淮北敌人把三个军集中一起，不好消灭，双方兵力相等，只消灭它一个旅。后来华中撤退，集中了三十万兵力，经常保持六个人打敌一个人，所以有宿北、鲁南、泰安、莱芜、孟良崮等五次胜仗。只保守一个地方是不行的，主要战线胜利了，其它各地都可解决。撤退到山东也是为的保卫华中，这点当时许多人不了解，对集中兵力有很多意见，在厕所里写起打油诗来：‘反攻反攻，退到山东，口吃煎饼，手拿大葱。有何意见？打回华中！’后来，他们了解集中兵力的好处以后，又有人批评集中兵力过晚了。不知集中兵力要逐渐地集中，一下子把地方部队全部集中也不好，使地方政权天天打游击，无法进行工作。集中兵力时，在次要方面仍需要留些牵制敌人，不可过分集中，最多集中到地方兵力不超过三分之一。要采用割韭菜的方式，不可连根拔掉。”

陈毅同志说：“敌人分兵进攻被我各个击破。苏中粟裕指挥十个团和一个地方旅（四个团），后增加三个团，共十七个团，打了七仗，七战七捷。第一、二仗是以十个团打敌人两个团，三、四仗是十四个团打敌人四个团，后来是十七个团打的。都是以多打少，四个人打一个人，或五六个人打一个人，我们占绝对优势，所以打了歼灭战。”陈毅同志说：“初期在淮北我们部队十五个团，加一个地方旅，共十八个团，敌人经常三个军在一起，双方兵力相当，只消灭敌人一个旅。且战场狭小，这样总是

消耗战，说明没有优势兵力不能打。在胶济线敌人有二十个保安团，二十四个正规团，共四十四个团，我们也有十来万人，但兵力没有集中，也是消耗战。……这说明只有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才能打歼灭战。在战役战斗上双方相等，或我居于劣势的兵力，是很难打歼灭战的。”并不是陈毅同志不知道集中兵力，而是集中不起来，这里也重要，那里也重要，形成分兵把口，各自为战，形成不了拳头，打不痛敌人。转变过来，这要有个过程。从华东战场来说，这个过程大约是五个月时间，到宿北战役才转变过来。为什么宿北战役以后，接连打胜仗？就是实现了彻底的转变，甩掉了包袱，集中了兵力。

华东战场在解放战争初期，中央确定集中兵力在主战场作战，集中山东野战军主力在淮北战场作战，山东战场和华中战场则是配合主战场作战。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主要进攻方向在华中，直到占我两淮以后才将主要进攻方向指向山东。所以华东我军将主战场决定放在淮北战场徐州周围的部署是适当的，因为这里是可以机动作战的位置。而在战争初期，力求初战必胜，以提高士气和锻炼部队，苏中虽然不是主战场，但在初战取得连续大捷，我军士气大振，全国人心振奋，其意义即在于此。

## 战局变化促使我军兵力集中

上面说到解放战争初期，就是让出地方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过程，以退为进，先退后进，逐渐改变敌我形势。其实，让出地方的过程也就是集中兵力的过程。分散兵力，分兵把口，各自为战，无非是不想让出地方，不愿打烂坛坛罐罐。但是，敌强我弱，战争的发展必然是无力保住坛坛罐罐，不管主观上如何想，“御敌于国门之外”是做不到的，相反地会导致失败，地方丢光，坛坛罐罐打得稀巴烂。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明证。只有在战争初期，让出地方，卸下包袱，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改变力量对比，夺取胜利。

从华东战场看，一九四六年九月苏中七战七捷后，华中我军向北逐步转移。国民党军占我苏中地区全部城市，继向苏北淮阴、淮安、涟水、睢宁等地进攻。九月十日，敌李延年指挥三个整编师，由宿迁等地沿运河两岸向我两淮进攻。我军杀伤进攻之敌后，于十月十九、二十一两日，先后放弃两淮。淮阴是华中解放区的首府。两淮的放弃，使华中我军彻底卸下了包袱，野战军获得了高度的机动。随后，华东我军进行了宿北战役。所以有人说“俏皮话”：蒋介石的进攻帮了我们的忙，帮我们卸去了包袱，集中兵力。



宿北战役是华东战场集中兵力于主战场的开始。国民党军占领两淮后，进一步分兵四路进攻（由宿北东犯是其中一路），其意图是完全占领华中，并隔断华中与山东战场的联系。为击破蒋介石这一战略计划，才开始集中山野和华野作战。但是，此时尚未能将山野和华野的主力完全集中在一个战场。华东我军的部署是牵制国民党军的三路，集中兵力歼灭宿迁这一路敌军，由此产生宿北战役。但此役还未能将华野和山野两个集团主力完全集中宿北战场，而只能做到集中山野主力一、二纵队，鲁南八师并加上华中之九纵于宿北；华野主力一师（后为华东野战军四纵）、六师（后为华东野战军六纵）及隶属于山野的新四军七师则分别担任阻击其它三路，我军主力只是相对集中于主战场（总兵力实际上只有三个纵队，共二十三个团）。由于兵力并未形成绝对优势（实际与国民党进攻兵力相等），所以战局一度形成紧张、相持，甚至几乎发生被迫撤出战场的不利局面。如果，当时我军对其它三路敌军都使用地方武装箝制，能将华野全部集中于宿北战场，则宿北战役，不只可以歼灭敌六十九师，还可将敌整十一师也一起歼灭。宿北战役胜利的生动事实，使我军各级指挥员及地方领导同志都亲眼看到、亲身尝到了集中兵力的甜头，才开始克服了各自为战的局面，统一了集中兵力作战的思想。宿北战役胜利的意义，不仅在于一次能歼敌一个整编师（军），更

重要的是在于统一了思想，实现了集中兵力的战略转变。

鲁南战役实际上是宿北战役的继续，也是集中兵力的继续。宿北战役之后，由鲁南台儿庄、峯县进犯临沂之敌，慑于我军宿北大捷的威力，大起恐慌，畏惧被我歼击，不敢继续前进进犯临沂；因无命令，又不敢擅自撤回，结果滞留原地，不进亦不退，予我军以歼灭的良机。我军抓住这一战机，集中山野的一纵、八师之外，又将华野的一师（陶师）和山东军区鲁中四师、九师，滨海十师，鲁南警备旅全部集中于鲁南，进行鲁南战役。由于鲁南战役我军集中了绝对优势兵力，所以战役进展顺利，在歼灭敌整二十六师及快速纵队以后，连续作战，攻克峯县、枣庄又歼一个军，这就出现了比宿北战役规模更大战果更大的胜利。同时，山野、华野两个主力完全集中并改编为华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编成是完成集中兵力的标志。

但是，宿北、鲁南两役在集中兵力上仍然有其局限。毛主席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电示：“三十五天内你们歼灭第六十九、第二十六、第五十一等三个整师，取得空前大捷。主要缺点是未能于宿北、鲁南两役集中山野、华野全力于一个战役，而被欧震、李延年牵制了我军二十个团以上，否则胡琏、冯治安两部已被歼灭。今后打欧震务必集中五十个团于一个战场上作战。”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宿北战役中，我军兵力还不

够集中，由于华野主力使用于牵制方向，宿北战场由华野九纵（五个团）参战，而且山野二纵缺主力第五旅、七师欠第十九旅，兵力不足，丧失了歼敌整十一师（胡璉）的大好战机。按作战情况，箝制方向只须使用一个支队或地方武装就可以了，鲁南当时就是由警八旅担任箝制敌整二十六师和第一快速纵队的任务。鲁南战役中，华中野战军主力陶师参战后，第一阶段顺利完成任务，但进入第二阶段作战后，由于兵力不足，没有能将冯治安的七十七师围住，以致该部越运河西岸，不得不放弃作战。

华东战场的高度集中兵力则在放弃临沂之后。那时鲁南陷为敌后，王耀武、李弥占据胶济铁路，鲁中、滨海、渤海、胶东部队组成了新的野战军，集中使用于主战场的野战军达到九个纵队，另有两广纵队和特种兵纵队。

毛主席在一月二十一日上述电示之后，一月三十一日又电示：“许世友、王建安野战军须立即组成，开至胶济线南待机歼敌，以对付蒋方南北夹击之计。”二月三日再度电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你们将王建安、许世友、宋时轮三部南调是很对的。”至此，华东战场集中兵力的战略转变，从宿北战役开始，至鲁南战役结束后就完全实现了。华东战场有了这样强大的主力在手上，也就取得了战局的主动权。

## 国民党军分散兵力败局已定

蒋介石发动全面进攻初期，恃其优势的兵力，加上接受了投降日军百万的装备，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援助，真是忘乎所以，不可一世！但是他犯了兵家大忌：胃口太大了！野心太大，战线过长，存在战略意图与兵力、战术要求与战略意图的矛盾，哪能不败！

战争开始时，敌军的全部力量为四百三十万人，使用于作战的为其全部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师）、二百万人的百分之八十，即一百九十三三个旅（师），约一百六十万，为我军的两倍半。然而，国民党军分兵七路进攻解放区：程潜进攻中原，汤恩伯进攻苏中，薛岳进攻淮北，王耀武进攻胶济线，杜聿明进攻东北，刘峙进攻豫北，李宗仁去北平；只有胡宗南在西北取守势。由于兵力分散于各战场的结果，被我军各个击破。

国民党军分路进攻，优势逐渐消耗。有一次，陈毅同志闲谈中对我说：“汤恩伯在苏中指挥十个军，分兵使用，以四个军守江防，六个军进攻，一个军一路，每军又是一个旅在前面，名义上有十个军，结果在前线与我们打仗的只有两个团。我们在战略上虽占劣势，但在战役战斗上集中兵力，却成为优势，华中我们集中三万人，每仗打他两个团，在战役上兵力我占优势。”

华东战场在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诸役大量歼敌后，国民党军极为震动。蒋介石发现所谓“全面进攻”，兵力分散失败了，转而采取重点进攻战略。蒋介石的“重点进攻”，是企图集中兵力，攻我两翼，切实占领黄河以南地区后，再集中兵力攻取黄河以北的战略方针。所以将其进攻方向集中于陕北和华东战场。当然，攻取陕北和华东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延安是解放区的首府；华东则是威胁“京畿”，直接威胁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政治经济命脉。

蒋介石在军事上并不是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愚蠢，完全懂得作战的基本原则，不断命令部下必须遵循“集中机动使用兵力”，并且以“重点进攻”来贯彻这一军事原则。但是，把后方兵力都集中到山东一线，后方没有兵力防守，形成了空心战术。毛泽东同志关于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向敌后跃进的战略设想和战略部署也由此形成。

但是，蒋介石胃口那么大，想要的地方那么多，目标那么分散，这就造成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局面。苏中战役中，国民党军比较分散，造成我军各个歼灭的良机。莱芜、孟良崮战役也是例证。蒋介石由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陷于被动，连续挨打以后，被迫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重点进攻固然增加了华东和陕北我军的压力，而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我军便同时向防

守之敌发动反攻了。

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四战四捷，一仗比一仗规模越来越大，战果也越发辉煌，这是值得研究的一段战争史。但是，不能孤立地研究一个战役，必须从战略方针和战略转变过程来考察问题。

如上所述，在解放战争初期，即战争的第一年，在华东战场贯彻和实现毛主席关于集中兵力的军事思想，是有一个过程的。应当承认，实行战略转变，特别是集中兵力问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是一个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解放战争的第一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对全国解放还实行全面进攻，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蒋军对华东进攻的重点，开始虽然放在华中方面，但同时山东亦实行进攻。这时在我军进攻面前，就有一个集中兵力问题。针对蒋军进攻华东的部署，华东我军原来也想集中兵力作战，预定作战方案是华中野战军集中兵力在华中作战，山东野战军主力（加上鲁中、鲁南、渤海三区军区武装）南下，位于徐州周围，以淮北为主要战场，以支援华中及山东作战，这是一个集中兵力对敌的作战方针。但是，这个方针未能实现，贯彻不了，各自为战，所以除了华中七战七捷之外，淮北战场初战歼敌一个旅以后就再未能歼敌，山东因各自为战，加上敌军在占领了胶济线的青州、淄博及南线峰县、枣庄之后，即不再

深入，亦未能歼敌，形成了相持的僵持局面，大家都  
很苦恼。战争教育了各级干部，也教育了人民。在战争的  
严酷事实面前，才使大家真正认识到毛主席集中兵力的  
军事思想，因而在两淮失守之后，集中兵力才得以实现。  
一旦实现了这个战略转变，所以就出现了宿北战役胜利  
之后，不但不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而且一仗比  
一仗规模更大，胜利更大。战争的实践就使广大干部和  
人民真正体会到毛主席集中兵力的军事思想，进而使集  
中兵力问题得以最后彻底解决了。这就是贯彻和实现  
毛主席军事思想的认识和实践的过程。

## 第三十章 雨季，特殊的进军

### ——鲁南突围

鲁南突围，是我华野第一、第四纵队的老同志难忘的往事，成为老同志们经常谈论的话题。的确，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三年概述》中只有简单的叙述：“（华东野战军）左路于七月六日收复费县，歼敌整编第五十九师之三十八旅全部另一个团。九日更收复枣庄、峄县，进击津浦路徐州至兖州段。右路于七月八日再克泰安，十三日克大汶口，横扫津浦路西，连克宁阳、肥城、东阿、平阴等城，迫敌于七月十一日开始由鲁中分路西撤（到七月底敌由鲁中抽出十二个旅于鲁西南）。于是敌人在山东的重点进攻，便基本上被我打破了”。而当年，左路我军却是艰苦无比，险象百出，好不容易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当时，老作家黄源同志对我说，如果日后有人写出这段经历，很可能是新的《铁流》。很巧，华野政治部文工团正随我一纵行动，和我们一起历经艰险。作家茹志鹃、邓友梅等就在这个文工团，他们



以后写的中、短篇小说就有以这段经历为背景和撷取此中素材的。邓友梅写的中篇小说《追赶队伍的女兵》还拍摄成电影。黄穗写的《向敌后进军》、枫亚写的《向敌后出击》，都在全国解放以后出版了单行本，朴实无华地真实地记述了当年的人和事。

### 左路军费县大捷

孟良崮战役后，进犯鲁中之敌全线溃退。四十余天，蒋介石才喘过气来，复以三十二个旅、二十四万人，于六月二十五日开始进犯我沂蒙山区，莱芜到蒙阴不足百里的战线上，竟然集中了十八个旅的兵力！步步为营，密集平推，企图把华东我军挤到胶东半岛的牛角尖，与我决战。

那时华东战场的局势是严峻的。国民党喉舌中央社天天叫嚷说：共军背靠大海，海水是喝不干的！退到胶东，胶东是牛角尖，烟台是没有桥可以通到大连的，何况还有海军阻击；如果往西过微山湖与刘伯承会合，有强大兵力阻击；如果固守鲁中山区，要被国民党强大炮火“扫荡”；如果倒回华中，到处重兵，必然消灭；如果渡河“北窜”，又有“国军”精锐兵团。在他们看来，胜利是稳拿到手的了。

华东战场是主要战场之一，在局部情况严峻的条件

之下，如何对付敌军的进攻呢？

野司首长根据中央指示：出击敌后，调动正面敌人，打乱敌人重点进攻部署，策应刘邓大军南渡黄河，并确定采取正面阻击两翼出击战法：正面由野司直接指挥第二、第六、第七、第九纵队阻敌前进；右路兵团（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由陈士榘、唐亮同志指挥，向津浦路以西，出击鲁西敌后；左路兵团（第一、第四纵队）由我统一指挥，出击鲁南敌后，以策应刘邓大军进军中原，调动进犯鲁中地区之敌，以便在运动中伺机歼敌。

时值雨季，闪电惊雷，瓢泼大雨不停，山溪暴涨，浊流滚滚。

我纵于六月二十八日出发，经五百华里行军，插入鲁南敌后。这时的鲁南已经大变样了，每到一地，阒无人声，一片凄凉。敲了半天门，才有瘦削的衰颓的老人颤微微地打开大门，孩子们蜷缩在炕角里，屋里空荡荡，家具、被褥、粮食……什么都没有。等到弄清我们是解放军后，泪流满脸地向我们控诉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罪行。真是家家遭抢掠，庄庄添新坟！老根据地人民遭受的摧残激起了指战员们极大的阶级义愤，纷纷要求投入新的战斗，杀敌立功。

七月一日，也就是刘邓大军南渡黄河之时，第四纵队发起攻击费县之敌第三十三军第五十九师第三十八旅。外围已肃清，除被歼一部分，大部分敌军被压缩在

城内。

费县周围为山峦地带，北障钟罗山，西南倚洞山，东濒沙河，城墙厚约五米，高约四米。敌军是西北军的一部，虽然是杂牌军，装备差，自动火器少，但有实战经验，善于守备。

七月六日，我纵以第一师第一、二团配合四纵攻击费县。七日二时许，该师接下南关攻击阵地，拂晓发起攻击，由南关的东南角及西端突入城垣；八时，即与四纵各部全歼守敌。战斗硝烟未熄，敌人飞机成群袭来，狂轰滥炸，把我第一师生擒的敌军第三十三旅旅长翟紫封也炸死了。

费县攻克后，左路兵团奉命乘胜进攻峰县、枣庄，威胁台儿庄、徐州，以配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作战。七月九日我收复峰县、枣庄，迫敌冯治安部退守运河一线。当时，徐州之敌调走一个军追击刘邓大军，城防空虚，受到我严重威胁，被迫将其西调之一个军回保徐州，我完成了战役计划。

## 邹滕未下 鲁南待机

根据野司命令，我左路兵团继续挥师西进，进攻滕县、邹县，控制津浦铁路徐州兖州段，配合右路兵团斩断敌重要补给线，威逼调动占我鲁中之敌，寻机歼

敌。

野司当时给我们的任务是相机攻占滕县和邹县，但由于兵力分散，以一个纵队的兵力攻打一个方向，邹、滕均未能攻占。滕县城位于敌军主要补给线津浦铁路中段，是敌军粮弹物资的补给站，是敌战略上重点防守的一点，故工事较坚固，粮弹较充足。该城守军为整编第二十师师部及炮兵团、第一三四旅旅部率第四〇〇团、第四〇一团全部、第七十四师炮兵团、保安第六团及伪县政府警察、还乡团等。滕县南三十里的官桥，有敌伞兵纵队一个营据守。滕县北的邹县城为敌第二十四军一个团及地方武装一部据守。整编第二十师即第二十军与第二十四军均是川军部队，而我军兵力分散，加上攻城器材缺乏，弹药因雨季转战淋湿后大多失效，虽经我连续四天攻击，形成相持状态。本拟集中一、四纵队兵力再行强攻滕县城，但由于我军对津浦铁路及鲁西南敌后地区的连续出击，严重地威胁鲁中之敌，敌以五军、七军及整五十七师等七个整编师匆促回援，鉴于调动敌人的任务已经达成，即放弃对滕县敌的攻击。七月二十日，我主动撤出滕县、邹县战斗。

七月二十三日，我一、四纵队进抵枣庄东北集结待机。野司的意图是待华野北线部队南麻、临朐战役得手之后，南北夹击敌一个兵团，决定我们在鲁南待机。

## “西瓜”与“面包”

我华野北线部队于南麻、临朐地区反击敌整十一师、整八师，由于暴雨，没有打好。而鲁南也是连日大雨，大小河沟水位暴涨，兰陵以南地区，地势低洼，淹成一片泽国。交通断绝，北进困难。这样，不仅没有达到南北夹击的战役企图，反而被敌人抓住我华野两个主力纵队孤悬鲁南敌后的弱点，妄图吃掉我们。敌人在电报和无线电话中，把一纵称为“面包”，四纵称为“西瓜”，只要打开报话机，就可听到吃“面包”啃“西瓜”的一派狂言。他们认为“面包”、“西瓜”吃定了！因为，合击我两个纵队的是五个整编师的兵力，后续欧震兵团的三个整编师即将赶到，南面的台儿庄、运河一线又有冯治安部两个军，无论如何是突不出重围的！好不容易围住了我两个主力纵队，蒋介石也来了劲头，亲自指挥围追堵截，要报孟良崮七十四师被歼之仇。

野战军首长也为我们两个纵队的处境焦虑。陈、粟、谭在养申电文中指示我们：“以插回蒙山争取东返会师为行动方针。” 如果我们在枣庄地区或兰陵地区，“应有决心在鲁西地区机动转移一时期，打一两胜仗，不过早暴露东返企图”；如果我们在峰枣地区，则可派一个师“引敌人向西北，你们才能迅速向东”；并问我们“能否

分出一个到两个师协同鲁南地方武装开展局面，使主力掩护适当地点，然后于适当时机突然向东或东北经费县以西地区回蒙山。”给我设想了东返会师的不同方案，但又给我们指出：“总之，靠你们机断处理，或两个纵队集结行动，或分两路行动，均诸考虑实施，一切机断处理，争取胜利转移为要。”野司首长的主要倾向是一、四纵队东返，但究竟如何行动，则由我“机断”。

当时，向北、向南突围根本不行，敌人摆有重兵；向西则是津浦线，敌人正在调动，准备拦阻我军；只有向东北渡沂河，然后跃入沂蒙山，但是山洪暴发，沂河猛涨，没有桥，根本无法渡河。虽说沂河水暴涨暴落，一时也难以退尽，战争中的时间宝贵万分，一时之差，很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再说，敌人也必然估计我军寻求时机东返，不能投其所好。我和陶勇同志考虑再三，决定向鲁西南突围，只要能突破敌军的包围，就能与我第三、第八、第十纵队组成的右路兵团会合。问题是怎样突出去。我们知道，要突破敌人重兵阻拦，越过津浦线，跨过独山湖，向鲁西南突围是不容易的。

我们的行动，要根据对敌人情况作出准确的判断，才能下正确的决心，因此收集到准确的情报是十分重要的。华野两个主力纵队陷于困境，也引起了延安总部的关注。延安总部及时地给我们发来了情报。从实战情况来看，证明这些情报是很准确的，但是战场情况转瞬万

变，因此这些情况要比我们自己搞到的要迟一天时间。我们弄到的情报所以快，我们的电台主任秦基同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及时而准确地破译了敌军的电文。我那时，掌握两部电台：一部向上保持联络；一部收听敌台，及时破译，掌握敌情。

根据敌情判断，国民党军全力防我一、四纵队向东突围，拟合围我于鲁南地区。我决心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首先示形于东，造成敌人错觉，随后再以有力一部继续向东佯动，引敌东去，这样就可使我一、四纵队主力与追击之敌拉开距离，趁机西去，跳出敌人合围圈。要达到这个战略意图，向东佯动的部队必须是强有力的，这才能造成主力东去的声势；而且又必须是具有牺牲精神的，在敌人重围之中，很可能遭受重大伤亡甚至为主力突围而牺牲。写到这里，我深深地怀念四纵司令员陶勇同志。陶勇同志从抗日战争的郭村战斗中与我并肩作战以来，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次鲁南突围，更是顾全大局，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地为胜利突围而勇于承担重任。四纵队领导机关与我纵队部总是相距不远，每到宿营地，陶勇同志总是赶来我处，共同研究敌情，商量对策，促使我下决心，并使其顺利实施，完成作战意图。他同意我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并主动提出由四纵的彭德清师担任佯动掩护任务。彭德清师即第十师，第四纵队的主力，三年游击战争锻炼出来的坚强部队。

佯攻掩护需要这样一支坚强部队，但是此去是否能回归？这是个未知数！陶勇同志为了使两个纵队顺利突围，忍痛使用彭德清师，这种心情和气魄是可以想见的！的确，使用十师是最妥方案，由于该师只两个团，兵力不足，我又以第一师参谋长余光茂同志率第三团加强该师。我和陶勇同志商定了，一、四纵队其他领导同志也取得了一致意见，于是行动开始。

七月二十四日，我们故意向东行动，直逼向城，与敌整七师、整四十八师激战终日，给敌人造成我军向东突围的假象。敌人一看，马上调整部署。二十六日敌伞兵纵队自台儿庄进占峰县，敌三十三军一部进占齐村，一齐向东压来。彭德清师与敌纠缠后，天还未黑，就大张旗鼓地向东行动，向沂河前进。敌人果然上当了，得到情报，赶紧行动，向东追击。趁此时机，我率一、四纵队挥师西去，以第一师为前卫，在距敌军十华里外，疾速前进，进占齐村西北十五里的要隘山下，掩护全军通过。二十八日晚，我一、四纵队于滕县以南，冒着倾盆大雨，跨越津浦铁路。声东击西得手，我们就与追击敌军拉开了整整一天路程！

天亮以后，敌人才发觉追赶的只是一个师，知道中计，赶紧掉头，连即将渡河的彭德清师也不追了。但敌人失策了，要追上我们谈何容易，已相差整整一夜的路程，我们六个师已乘虚向西突围。而由于敌人改变部署，



我们原先估计将遭到重大损失的彭德清师完整地顺利渡过沂河，跃入沂蒙山。

一、四纵队的部队，过去常吵架。有时狭路相逢，少不了争先恐后，互不相让。互相有些看不起，因为都是主力部队嘛，什么时候总要争个高低。但配合作战却一直很好，总感到同是新四军部队，不能丢人现眼。这种感情确是微妙得很。它决不是山头主义，也不是小团体主义，也不是风头主义，而是渗透着阶级友爱的革命英雄主义，所以在严重关头，团结一致，显示了自我牺牲精神。

我们两个纵队虽然跨越了津浦铁路，艰苦的斗争仍然等在我们前面。对于要了解我军如何突破鲁南敌军包围圈的同志来说，这可能是最艰苦的一段了。那是独山湖水网地带，七八十里路汪洋一片。部队全部暴露，任由敌机疯狂扫射。连绵阴雨，被服装具全部湿透，鞋袜全无，赤脚在水荡或泥泞里行进。村庄已被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抢掠一空，粮秣无着。到处散布着还乡团的地主反动武装，不时响起冷枪，突然飞来流弹。确是吃尽了苦头，受到了考验，部队遭到很大损失，非战斗减员不少。有一次过河，水流湍急，谭启龙同志骑的马，力气小，加上过度疲劳，一个浪头涌来，连人带马都给冲走了。刚巧我在一边，顺手一把拉住，否则，恐怕他就见马克思去了。部队极为狼狈，空着肚子行军作战，疲

劳程度是无法形容的，倒在路边的泥坑就睡着了，炮弹和炸弹的交替爆炸也唤不醒他们。女同志就更加艰苦，政治部的、后勤部的，加上野政文工团的，为数不少。徒涉滕县以西的沙河和独山湖边水荡时，矮小的女同志就遭没顶之灾了。幸得随军的胶东民工担架团的大汉们把她们挟着背着，虽然免不了喝几口水，终于到达彼岸。一个个憔悴不堪，面黄肌瘦，披头散发，令人不忍目睹。但不走不行，不走就会全军覆没！

我和副司令员何克希、副政委谭启龙亲笔签具了“紧急动员令”：“……由于我们迅速调头，已经开始将敌人调动和撤开，但也由于连续大雨，影响了我们按原定计划行动。亦因此敌人已调来一部分兵力，企图拦阻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必须立即准备作战，粉碎任何拦阻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敌人！……今天的情况，正是考验我们每个干部党员党性的关键！共产党员更应该带头起模范作用！”这在部队中燃起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烈火。

七月二十八日晚，我一、四纵队冒大雨跨越津浦铁路。二十九日，因沙河水位暴涨，北上受阻。三十日，敌欧震兵团的整七十五师、八十五师、五十七师自滕县西犯，堵我北上，企图压缩我军于独山湖以东狭小地区后，加以围歼。我命令第二师先敌抢占休城东北的战家河，其余部队于白天冒着敌机的轮番扫射轰炸，分路徒

涉沙河等三条急流。此时，敌已进抵沙河东岸，与我第二师隔河对战。当晚，部队开进，敌仍尾我追扰。第四纵队第十二师抢占大古村一线高地，掩护其余部队向西北挺进。我后卫第一师接替该高地时，敌整五十七师趁隙占领，经一师猛烈攻击后夺回。三十一日，一师阵地整天为敌猛攻，数度告急，敌未能得逞。入晚，部队继续北上，第一师扼守郭里集东北的王山、卧牛山一线，以掩护全军通过郭里集至马坡一段水阔八里、深及胸部的泛滥地带。敌人当然不会放过我们，攻击更为猛烈。我扼守王山的第一团第九连的一个排，英勇奋战，伤亡殆尽。八月一日，白天行进，通过泗河，终于在这个建军节的纪念日，与右路陈、唐兵团胜利会师。当晚，部队进抵济宁以东，准备在济宁以南，西渡运河。二日晨，敌整八十四师阻我西进，激战终日，遭我严重杀伤后，回窜济宁。三日一时，我绕过济宁，于大长沟分三路抢越运河。敌第五军经兖州西犯，于三日六时赶到大长沟，但我军已胜利进入鲁西南大平原嘉祥地区了。

人民解放军究竟不是“面包”和“西瓜”，不是那么好吃。想吃，想啃，是要嗑掉牙齿的！

## 陕北来的贺电

部队到达鲁西南之后，由于十余天的过河涉水，艰苦

战斗，加之部队成员中俘虏成份较多，减员很大，情绪低落。我的心情也很沉重，尽管是从危难之中摆脱出来的，也觉得两支主力纵队受到这么大的损失，有些对不起党。

到达鲁西南以后，收到的第一个电报，是毛主席从陕北发来的。这是个鼓励我们的电报，全文一百多字，是给我并转一、四纵队全体指战员的。他对于我们的胜利突围，“很感欣慰”，并予嘉奖。他鼓励我们振作精神，准备再战。收到主席这个电报后，我心里好受了些。收到的第二个电报，是陈老总的，也是安慰和鼓励我们的意思。

记得中央的慰勉电是八月六日发来的，指出由于我军的行动，“目前形势对我有利，敌已分散，我已集中。……我军实力更厚，领导更强，对于争取新胜利极为有利。中央转向你们致慰问之意，并问全军将士安好。”后来，我又看到毛主席八月七日照刘邓并告陈粟的电报中问到：“叶飞、陶勇现到何处？运河西岸是否已筑工封锁？……望即告。”殷殷关切，力透纸背，今日读来，犹深自感动。当时向全军指战员传达中央嘉勉电时，读至“并问全军将士安好”，全场一片唏嘘声……

随后，一、四纵队与右路兵团合编为华野西线兵团，转战鲁西地区。

## 第三十一章 解放战争的第二个战略 转变——外线出击

### 从内线作战到外线作战的转变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概述》称：“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全国规模的向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进攻阶段。”“我军的战略进攻，首先由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大军〕，于七月初由黄河北岸挺进鲁西南地区，揭开了序幕。”

解放战争究竟分几个阶段？按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说，战争的一般规律是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反攻、战略进攻。反攻与进攻是不同的，是从战略退却到战略进攻的转变。《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概述》称：“这样前后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即将敌人的战略进攻粉碎了，同时使解放军转入了战略进攻。”也就是说，解放战争只有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到底是三阶段，还是

两阶段？

我的看法是，一年之久的内线作战，属于战略防御阶段。外线出击为战略反攻开始阶段，三大战役为决战；反攻阶段的决战胜利后即转入全面战略进攻，解放全中国。渡江战役时，敌我力量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开始了战略进攻阶段。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日毛主席在陕北召开了中央前委扩大会议，九月一日又为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规定“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

战略反攻的矛头指向哪里呢？毛主席选定了大别山地区，以便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逼使蒋介石调动部队回援。毛主席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箝制的周密部署：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由陈毅、粟裕同志率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后一军，挺进豫皖苏地区；由陈赓同志率太岳兵团为右后一军，自晋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三军互为犄角，逐鹿中原。以陕北我军出击榆林，

调动进攻陕北的敌人北上；以山东我军在胶东展开攻势，继续把进攻山东的敌人引向海边，两翼箝制，便利前述三军的行动。尔后，东北、华北我军也分别转入反攻，形成全面反攻的总态势。

所谓外线作战，简而言之就是转入敌后；转入外线，就是把敌人引到敌人的后方去打。敌后是一个广阔的地区。这时，敌人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四百三十万人，降为二百七十三万人；其正规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约二百万人，降为一百五十万人。而期后方则异常空虚，十三个省中，仅有二十一个旅，在湘、桂、黔、闽、浙、赣等六个省，当时几乎无一个正规军。这一个变化使我军转入战略反攻，敌人便被迫转入了战略防御，有利于我军进行外线作战。

转入外线，是个大的战略转变，有如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转变一样，有个适应过程。从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实践看，这个过程大致上也是半年左右。外线作战的最大问题是远离根据地的无后方作战，这是新课题。

《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指出：“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因为到国民党区域创立新根据地需要时间，需要在多次往返机动的作战中大量歼灭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建立人民武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这以前，困难是不少的。”

六月三十日夜，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以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黄河天险。经过二十八天激烈的连续战斗，歼敌五万六千余人，打开了跃进大别山的通路。八月十一日，胜利越过陇海路后，八月二十七日到到达大别山地区。

华东野战军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大军）密切协同转入外线作战。

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之后，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之蒋军，经过调整部署，再次以三十二个旅，二十四万人，于六月二十五日又重新大举向我沂蒙山区进犯，采取“密集平推”战术，齐头并进。华东我军主力一部在正面箝制敌人，分两路向敌人后方出击，调动敌人。以一、四纵队组成左路军，由我指挥出击鲁南，于七月六日攻克费县，歼敌一个旅又一个团，九日乘胜收复峯县、枣庄，进击津浦路徐州至兖州段，徐州、台儿庄受我军威胁，迫徐州之敌调回追击刘邓大军之一个军回防徐州。以三、八、十纵队组成右路军，归陈士榘、唐亮指挥，于七月八日再克泰安，横扫津浦路西，迫使进攻沂蒙山区之敌于七月十一日开始由鲁中分路西调。

此时，我华东野战军乘敌调动之机，即拟由正面我军首先歼击南麻、临朐之敌，得手后，配合左、右两路大军在鲁南、鲁中之间地区，在运动中再打一仗，大量歼敌，然后转入外线作战。但时值雨季，南麻、临朐战



役失利，因而原定在运动中南北夹击敌军之计划不能实施。蒋军发觉我左路军在鲁南陷入危境，遂调集四个兵团妄图在鲁南围歼我左路军一、四纵队。我左路军在鲁南艰苦奋斗，胜利突围，在鲁西南济宁以北与我右路军会师。九月，华野领导机关，率六纵队南渡黄河，进入豫皖苏地区，和左、右两路大军会合组成华野外线兵团（即西兵团）在外线作战，策应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调动了进犯山东解放区的敌人，粉碎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给留在山东解放区内线作战的山东兵团（即东兵团）创造了转入反攻极为有利的逐步歼敌条件。

华东野战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后，华东战场我军组成三个集团：以一、四、六、三、八、十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组成外线兵团（即西兵团），在外线作战。以七、九、十三纵队组成内线兵团（即东兵团），以第二纵队及华中第十一、第十二纵队组成苏北兵团，分别在山东、华中解放区内线作战。

## 挺进豫皖苏

一九四七年八月上旬，我一、四纵队与三、八纵队会师鲁西南后，为配合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牵制敌兵力于鲁西地区，与敌周旋作战达一月之久。九月初，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率六、十纵队南渡黄河，进入

鲁西南，与华野外线兵团及冀鲁豫十二纵队会师，遂转入向敌进攻，经历沙土集战役、土山集战斗。在此期间，刘邓大军于八月二十九日渡过淮河以后，在不足二十天时间即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攻占了豫东南、鄂东、皖东南大部县城，直迫长江沿岸，完成了战略展开。陈赓兵团亦于八月下旬渡过黄河，进入鄂豫陕地区。为彻底完成中原反攻态势，乘敌豫皖苏兵力空虚之际，我华野进入鲁西南的六个纵队及冀鲁豫十二纵队组成东西两个兵团，于九月二十六日晚，摆脱鲁西敌军的纠缠，跨越陇海路的徐汴段，挺进豫皖苏地区。

豫皖苏地区，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我游击根据地，日本投降后大部为国民党军侵占；解放战争初期，刘邓大军曾在该区作战，大军转移后仅留少数敌后武装坚持斗争，此时全部为国民党政权所控制，城镇为敌保安团队所盘踞。

我纵于九月二十四日晚自鲁西定陶西南地区向西南进发，经两天急行军，二十六日晚攻占内黄车站，并破击陇海铁路内黄至野鸡岗段。二十七日奔袭杞县县城，二十八日拂晓全歼守敌。二十八日攻占通许县城。三十日夜通过黄泛区。十月一日攻占尉氏县城。二日攻占鄢陵县城。三日奔袭敌西华县政府所在地逍遥镇，继向西华县城进击，敌闻风逃窜。五日到达太康地区集结。此番作战共计俘敌九百余，除内黄车站为敌二十四师一个

连外，均为地方保安团队。

这一时期我华野各部以排山倒海之势，攻克了城镇二十余座，在东西六百里的广阔平原上，正面推进了三百里。我军所到之处，国民党政权基本被摧毁，保安团队大部被歼或溃散流窜。敌人仓皇从鲁西南、山东抽调兵力南下，并加强防守津浦、陇海、平汉沿线的徐州、蚌埠、开封、郑州、许昌等主要据点。

至此，我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及陈赓兵团，都打出了外线，展开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黄海的大中原的原野上，鼎足而峙，互为犄角。

我在上面谈到解放战争第二个战略转变是外线出击。转入外线作战，确是个大的战略转变，如何进行无根据地为依托的无后方作战，恐怕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所遇到的一个难题。中国红军长征是史无前例的壮举，但脱离根据地后遭受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遭到无数艰难险阻。这一点，毛主席是深有体会的，甚至考虑到部队必要的休息问题。八月十二日他给刘邓并告陈粟的电报中就提到：“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毛主席对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一举跃进至敌人的深远后方去作战，这种独特的进攻方式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毛主席

估计此举有三种可能：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打游击；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刘邓大军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

应该说，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完全脱离后方，敌人集中兵力对付他们，一面是武汉的白崇禧，一面是徐州的刘峙，遇到的困难确实比华野外线兵团要大得多。这方面已有很多文章论说了，至于华野外线兵团不象大别山那样完全脱离后方，还靠着冀鲁豫解放区，应该说是半外线，因为没有远离后方。尽管如此，华野外线兵团终究是离开了根据地作战，也还是有一个适应过程。

## 粮食——根据地建设

进入陇海铁路以南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部队开到村庄，老百姓逃跑一空，不了解我们是什么人，以为是国民党军队，怕抓丁，怕抓伕；也有的是受了反革命宣传欺骗而逃跑的。但是，这一地区终究是有我党我军影响的，我纵连续攻下内黄车站、杞县、通许、尉氏、鄢陵、逍遥、西华等城镇，摧毁了国民党政权，歼击了保安团队，扩大了政治影响，群众才安定下来。最大的困难是粮食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十几万人的大部队，吃饭是个大问题，没有政权，没有兵站，需要自己筹粮。部队到一个新地方，靠后勤人员去弄粮食远

远不够，于是—一个连队起码要派出—一个班出去征集粮食。后来我们发现农村的粮食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上，这就对我们征集粮食提供了方便，比到每家每户去征集省事多了。我们宿营时，往往选择有地主的村庄，一到就开仓济贫，把地主的粮食留—半分给贫苦农民，以此发动群众。这些地方正是当年李闯王活动过的地方，我们也象李闯王—样开仓济贫。办法很灵。发展到后来，出现了群众来报信：某村某寨有某地主囤粮若干担，恳请解放大军速去驻扎，解民倒悬，等等。因为部队去住了，他们可以分到粮食，粮食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但这办法有副作用，缺乏调查研究，易于侵犯富裕农民的利益，易于给游手好闲的流民钻空子：而且—扫而光，第二次部队经过时就不易筹粮了。

后来，中央纠正了“开仓济贫”的口号和某些不适当的做法。“开仓济贫”并不能反映我党废除土地的地主所有制，彻底消灭封建主义的土地纲领。正如以后中原局《关于执行中央五月二十五日指示的指示》所批评的：“我们普遍实行了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事实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勇敢分子，大多数基本群众并未得到，或少得到利益，这种办法，虽然也起到—时刺激群众热情的作用，但不能解决多大问题，而且地富还利用以分散财产，制造群众之间的许多纠纷，尤其因为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部浪费，使军队供给很快发生

困难（特别是粮食），很快的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而尤以在军粮供应上损害中农利益最大，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此外，我们曾经普遍地采用了粮食菜金的办法，影响也很大。从分浮财和粮食菜金两项中所消费的粮食，其数目之大，实难估计，如不纠正这两件事，就可以弄翻群众，搞塌根据地。”并且指出：“这是由于无后方作战和在左的错误下自己所造成的困难。”

豫皖苏地区解决这个问题是建立政权，建立秩序。在新政权建立之前的过渡时期，暂时地有领导地利用旧政权，维持社会秩序，解决军需。这就改变了一切经由群众直接解决的办法，也防止了混乱。

再就是伤兵无法安置，只能往解放区运。中原局指示中指出：“一般同志到新区去，苦于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急于建设一个后方，安置伤员和机关，也促成了急性病的发展。”当时，毛主席给刘邓并告陈粟的电报中就指出：“不要希望短期内就能在大别山、豫西、皖西等地建立巩固根据地，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都只能是临时立足点。必须估计到我军要有很长时间（至少半年）在长江黄河之间东西南北地区往来机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并在歼灭敌人几十个旅之后，方能建立巩固根据地。”实践证明，毛主席这个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外线作战战略转变的过程大致是半年左右。

## 多打胜仗是关键

毛主席关于《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电示中，非常具体地明确地指示：“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

我华野西线兵团进入豫皖苏后，敌主力五军、七十五师、二十四师等部追踪而来。这和根据地有个很不同的情况，它们老钉在我军后头，象是“尾巴”一样。我们的情报来源，破译敌人的电报只能知道一个大行动，再就是上级通报，这都是来得较迟。只能依靠战场侦察了解，但侦察部队报来情况时，敌军常是跟随而来了。这使我想起三年游击战争时粟裕同志和我谈起的当年挺进师进入浙西南的处境了。那时粟裕同志称赞我们闽东独立师“狡兔三窟”，我们现在一“窟”也未营成，必须要使“广大群众站在我军方面”。要做到这一点，有军政两个方面，而第一是多打胜仗，才能站下脚跟，才能争取群众。

在适应外线作战的过程中，打了两次仗

第一仗，破击陇海铁路。那时，我华野外线兵团和

刘邓大军、陈赓兵团配合作战，已迫使中原敌人转入重点防御。敌人企图全力确保陇海、平汉、津浦三大铁路交通线，以保证其运输补给并调动兵力之用，并以此企图随时集中兵力向我分进合击。我华野外线兵团为分割敌人，掌握主动，创造战机，使苏鲁豫皖解放区连成一片，便利今后机动作战，并策应陈赓兵团对平汉铁路的行动，野司决定对陇海铁路的徐州、兰封段展开破击战。以第四、第十纵队附冀鲁豫地方武装部队组成一个兵团，破击砀山至兰封段铁路，拔除沿线据点，并相机攻取虞城、朱集；以第一纵队、冀鲁豫第十一纵队附冀鲁豫三分区武装组成一个兵团，由我指挥，破击郝寨至砀山段铁路，拔除沿线据点，并相机攻占砀山城。十一月八日晚，我纵各部分别进入攻击位置，分别包围砀山城、车站和李庄车站。当日黄昏，敌由商邱增援砀山暂二十四师张岚峰部一个旅。我决心延迟进行攻城，巩固已得的四关阵地。十日十五时开始炮击，十六时各部同时发起总攻，十五分钟后，第一、二团先后胜利登城，第五、六团亦在一度对峙后冲入城内，二十二时结束战斗，全歼守敌四千余名。与此同时，彻底破坏铁路七十余里，占领李庄至黄口的沿线车站与敌据点。十一月十一日又向东南开进，扫除陈寨、回龙集等据点多处，解放萧县城，进占曹村车站，直逼徐州南郊。

第二仗是在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中国



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概述》是这样记载的：“敌人为了阻止我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曾由白崇禧指挥着三十三个旅，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间，进行一次‘清剿’，企图摧毁我新解放区。我刘邓野战军，一面予白匪以迎头痛击，歼其一万一千人；一面以主力一部越平汉路西进，开辟了桐柏、江汉两新解放区。同时我陈粟野战军及陈谢兵团联合向陇海线民权至碭山段，及平汉线新郑至确山段，发动大规模的破击战，以配合刘邓野战军作战。在十二月一个月中，共歼灭敌整编第三师、暂编二十四师及骑兵第五旅共四个旅，及其它部队四万五千余人，吸引了白崇禧部分兵北援。于十二月底我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及陈谢兵团，胜利地会师于平汉线遂平、西平地区，并攻占许昌、漯河等敌军补给站。从此中原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不但使鄂豫皖、豫皖苏及豫西三个新解放区打成一片，而且我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及陈谢兵团亦从此由各自为战转为直接的密切配合作战。”

十二月十二日我第一纵队攻克朱仙镇，十三日克中牟，十四日克八岗，全歼敌保安团队，完成郑州东白沙镇至中牟铁路的破击任务。二十日向西南洧川地区开进，二十二日下午沿平汉路东侧急速南下，二十五日到达漯河及其以北地区集结，拟进至西平以南吸引敌整二十师北援西平，以歼灭该敌于运动中。但敌第五兵团部及整编第三师已于二十六日为我华野第三纵队及陈赓兵团歼

灭于西平地区，该敌困守确山。我纵即移至郾城东北地区。一月三日自郾城地区北上，六日攻占许昌城。由于漯河、许昌是敌军补给站所在地，我军得到了很大补充，日子好过起来。敌军被迫分兵扼守要点，不能有很大的机动兵力来尾追我们，我纵终于在许昌地区得到了近一个月的休整。

## 第三十二章 濮阳整训

### 濮阳整训，迎接新的战略任务

一九四七年七月，人民解放军外线出击作战后，全国战局起了很大变化，我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进攻，蒋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又由全面防御改变为重点防御。我军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蒋军已丧失了主动权。只有南线大别山地区和淮河以北地区我军暂时还处于困难地位。蒋军尚有较大的机动兵力可以实行战役性进攻。当时中原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却仍占一定优势，计有三十四个整编师，共七十九个旅，除以相当兵力担任重要点线的防御外，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并能对我军进行战役性进攻。它的战略部署重点仍在大别山区，企图不让我刘邓大军在此建立根据地；同时，加强其长江防线，防止我军南渡长江或西进，以确保南京和武汉的安全。在大别山地区活动的刘邓大军由于长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处境相当困难；华野及太岳兵团向外

线出击后，同敌人形成拉锯状态，处境也较困难。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为了逐步分散敌人，改变中原战局形势，吸引敌人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确定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由粟裕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我任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张震同志任参谋长。并相应地成立中央分局，粟裕同志任书记，我任第一副书记，金明同志任第二副书记。选择适当时机，渡长江南下，在闽、浙、赣、皖、湘、鄂等南方数省实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计划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的几个地段渡江进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

根据这一战略决策，中央军委命令我一纵和四纵、六纵北渡黄河休整。各部到达鲁西南考城、曹县地区后，敌五军、整编七十五师、八十五师等部与我军纠缠，五十五师两个旅进占考城，五十八师一部进占兰封，企图寻我决战。二月十八日，我纵攻克考城；十九日，六纵攻克兰封。野司命令我纵于陇海铁路两侧地区与敌五军、整七十五师等部继续周旋，以策应兄弟部队北渡。二月下旬，四纵、六纵乘隙北渡黄河。为了迷惑和摆脱敌人，我纵于二十九日晚急速南下，经西陵寺至太康以东地区后，然后向西绕至太康以西，吸引敌军纷纷南下。我纵乘机于三月五日以每晚八十里至一百里行程突然挥师北

上，摆脱了敌人的纠缠。七日，全纵先后到达临濮集以南地区集结。九日，各师次第渡过黄河。十二日到达濮阳以南地区，一面积极进行渡江南下的准备工作，一面整训部队。

首先从纵队部和各师抽调干部和战斗骨干组成先遣支队，一律逐级加强，以团级干部担任营职、营级干部担任连职……。由纵队副政委谭启龙同志率领，挺进江边，并与江南地方组织和游击队取得了联系。根据当时情况，第一步准备到皖南。

抽调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组织强有力的民运工作队，进行新区政策教育，以便进行新区建党建政工作。

充实部队。定陶整训时已补充了一批山东翻身农民参军的新战士，此次又补充了由河北南乐、内黄等解放区参军的翻身农民，使一纵兵员达到三万零六百余人。过去，一、四、六纵队的兵员补充，主要靠战争中俘虏来的解放战士，最多时几乎有百分之八十的比例。当时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很重要任务，就是将这些刚从国民党军队里俘虏来的士兵，以最快的速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这方面的工作很有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时俘虏兵第二天就能参加战斗。但要保证部队的质量，特别是部队的政治素质，最好是一半解放区的有觉悟的农民，一半是有战斗经验的解放

战士，那就既有一定的政治素质，又有一定的军事技术。我一、四、六纵外线出击后，战斗频繁，伤亡较大，远离原有的根据地，兵员补充缺乏来源，不得不补充大量俘虏来的国民党士兵。当然其中极大多数是被抓壮丁的贫苦人民。但也有不少人染上旧军队习气和受到反动教育的影响。如今要远离根据地到江南去作战，不但需要正确执行新区政策，做好群众工作，同时还要做好巩固部队的工作。解放区翻身农民青年的补充是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接着，部队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

### “三查” “三整” 新式整军

由于我纵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原来对部队偏重于一般的形势任务教育，缺乏系统的基本的政治思想教育。同时，如上面所讲部队来自旧军队的兵员成份增多，也带来了不少旧军队意识。更因战争严酷，行动频繁，长期处于艰苦环境，部队内部反映出各种类型的个人主义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意识，极需有一个时间来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特别是执行远离根据地，挺进江南的新任务，更需要加强部队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阶级觉悟，纯洁内部和加强纪律性，并加强大规模的军事练兵，广泛开展军事民主，提高部队战术技术水平，为完成今后更大的

战斗任务打下基础。所以，我纵在濮阳地区能有近三个月的整训，这在战争期间是非常难得的，这对我们提高部队军事、政治素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濮阳整训是在“三查”、“三整”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上进行的。一九四七年十月中旬，我纵曾在定陶、曹县地区短期休整，进行土改学习和诉苦教育。一九四八年一月，又在许昌地区进行过初期的“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的新式整军运动。在此时期部队参加群众工作，参加土地改革，协助发展地方武装，部队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增强了战斗意志与群众观念。通过发扬民主运动，揭发了错误思想和行为，并整顿了组织，清除了暗藏的敌特破坏分子。由于时间短，整个运动不够普遍深入，由于没有经验及某些“左”的情绪，提出了所谓“贫雇农当家”的不正确的口号，在运动中发生了一些偏差。把农村阶级斗争的一套方式搬到部队来运用，发生了穷追硬斗的过“左”倾向，影响新式整军运动的健康进行。

濮阳开展新式整军运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纵队党委研究总结与吸收了许昌查整的经验教训，高度发扬了三大民主，在全体干部中展开了群众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自

自觉地查阶级、查思想、查工作与整组织、整纪律、整作风。在广大战士中开展民主运动，提高为解放全中国、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而战的觉悟性。这就形成了极为深入广泛的群众性的思想改造运动，揭发了部队内部的各种类型的个人主义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深刻地批判了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行为，澄清了思想，提高了政治观念，改善了官兵关系，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坚强团结。与此同时，部队大规模地进行了军事练兵，使部队的军事素质大大提高，还提拔了一部分经过考验、立场坚定的由群众推荐的优秀战士作为部队的基层干部。使我们纵队呈现了空前的朝气和活力，濮阳整训使我纵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大大提高。

### 朱总司令动员“钓大鱼”

正在准备向部队进行南征动员的时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采纳了华野陈、粟首长的建议：暂缓渡江，在中原地区与敌人决战，歼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

五月中旬，朱德总司令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亲临濮阳视察。十四日接见了兵团团以上干部，十五日接见了连、排、班及士兵代表，并且作了深入浅出的亲切讲话。他阐述了建军的基本原则，针对我兵团三



个纵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注意事项，号召我兵团以“钓大鱼”、“耍龙灯”的战术手段，疲劳和消耗敌人，争取在半年内歼灭中原战场上国民党主力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等部，以求巩固与扩大中原解放区。

朱总司令对我们三个纵队的光荣历史，作了充分肯定。他说：“自主力红军从中央苏区撤退、长征北上后，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叶飞等同志留在那里领导留下的部队坚持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的‘清剿’非常残酷，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斗了三个年头，保持了党的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我国革命历史上是光荣的一页。”他又说：“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有很大成绩，部队有很大发展。自卫战争开始，你们首先在苏中战场取得多次的胜利，接着又在山东战场取得了胜利。……”

朱总司令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动员部队在中原作战，歼灭敌军主力时说：从最坏设想，无非打散了，再收拢回来就是了。他向陈毅同志询问道：“我们从三河坝到湘南，也就是那样呀？”陈毅同志点头道：“是嘛，共产党的队伍是打不垮的嘛。”

我印象特别清楚的是朱总司令和士兵代表讲的一段话：“你们三个纵队自从三查运动以后，比以前已经大大的进了一步，这个进步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战士和我们连排长都认识了这个军队是自己的军队。我们的

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就是说是群众自己的军队。……这认识来自阶级觉悟。我们打仗究竟为谁，过去许多同志不知道，我们有的同志说国民党军队为蒋介石打仗，这是对的。可是说我们为毛主席打仗，那就错了。同志们要知道，正相反，毛主席和我都是为你们，为士兵服务，士兵又为人民打仗，为自己打仗的……自古以来，军队都是反动统治阶级自己的军队。军阀的军队，蒋介石的军队是地主资本家为保护他们的利益，剥削工人农民而组织起来的，名为保护人民，实际上是保护他们自己地主资本家的国家。当兵的都是工人农民……帮敌人打亲兄弟，这叫不觉悟……代表们回去以后要动员大家一面打仗一面宣传，使工农弟兄们都觉悟起来，我们胜利就更快，更容易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

朱总司令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了我军胜利的力量。接着他严肃地指出了我们三个纵队的缺点，他说：“首先就要不侵犯群众利益，这一条你们过去做得不太好，最近大有进步。”

这正如我在上面讲的，一、四、六纵队的兵员中俘虏成份过多，必然带来的副作用。

朱总司令在建军问题上作了深入浅出的阐发。他很强调政治建设，他强调：“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就会所向无敌。”他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部队建设的两个主要方面，只能都搞好，不能只搞好一

个。”因此，朱总司令又要求干部，“在军事建设上，首先要求同志们学战术”。

朱总司令以非常形象的比喻，阐说了在中原地区歼灭敌军主力的战术。如何对付五军、十一师和七师等敌人主力部队，朱总司令说：“我替你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钓大鱼的办法。钓住一条大鱼你不要性急，不要一下就扯上来，这样就把这条大鱼钓到手了。对第五军就要用这个办法，要用‘引’的办法。它来攻，我就退，有条件就阻击一下，没有条件就不阻击，把它拖得很疲劳，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时，再用大部队去奔袭歼灭它。你们一定要下决心钓到一两条这样的大鱼。”

最后，朱总司令鼓励大家：“我想你们一定会取得更多更大胜利，完成党和人民给予你们的光荣历史任务。”

## 军事练兵 群威群胆

朱总司令在我军指战员中有极高的威望，能够见到他老人家并听到他的指示是指战员多年的愿望。他的讲话给予全军同志以莫大鼓舞，激励了部队的求战情绪。遵照他的指示，针对敌五军的作战特点，投入了热火朝天的军事训练。

说来好笑，我们以敌五军为对象，敌五军也是以我一纵为对手。常打交道，相互非常熟悉。我纵指战员一

听敌军的炮火，就知道是敌五军来了；敌五军官兵一听连续爆破后紧接着排子手榴弹爆炸声，也就大呼：“一纵队来了！”相互熟悉了，也好打，也难打，就看谁的气概压倒谁了！当然还要在战术上技术上针对它的长处和短处压倒它，制服它！

在战术上，以村落攻坚打子母堡为主；在技术上，着重锻炼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四大技术和进一步开展普遍的爆破运动。整整一个月的练兵，部队在军事素质上有了显著提高。

七团是我纵三师的主力团，练兵初期第一次射击中有二百零一人脱靶，占参加射击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训练结束时脱靶人数减至六十五人，占参加射击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一。对各兵种采取了特业训练的办法，各种炮兵、轻重机枪、特等射手都分别由师、团、营三级组织集中训练，解决炮火集中使用，迫击炮、六〇炮在纵深战斗中直接掩护步兵作战等问题。

特别应该提到爆炸技术的普遍提高。非但大多数同志学会了手掷小包炸药的使用，并在结合运用攻击子母堡演习中取得良好效果。而且各部着重培养了爆炸班、排进行爆破技术的专门训练。迫击炮、六〇炮、掷弹筒送炸药的技术更有所创造和提高。

爆炸技术或称爆破，这是我军的独创，不见于古代兵书或现代战斗条例。这应该说是从坑道爆破发展而来

的战术和技术，从个人爆破发展到使用迫击炮、六〇炮送炸药，这就解决了我军装备落后、缺乏炮火的缺陷，爆炸技术就成为我军攻城夺地的重要手段，而且确实威震敌胆，被称之为“无声炮”。濮阳整训中，炮兵的同志就研究出：掷弹筒加两个药包就能将一至三斤炸药射出一百八十余米，迫击炮则可将二十斤炸药射出一百二十米左右。补救了我军炮兵少，火力不强的弱点。

这确如毛泽东同志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所说：“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的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 从三团看部队成长的道路

一师三团于鲁南出击时，归四纵十师指挥掩护主力向鲁西南突围，在濮阳整训前归建。他们脱离主力后，八月中旬进入滨海地区，参加了胶东保卫战。三团不但在阻击防御战中能坚守阵地，而且在解放诸城战斗中完成了攻坚任务。

这个团原是胶东地方的一个新建团：西海分区独立

团，于莱芜战役后归建我纵。刚编入一师时，还有点县大队的样子，作风散漫，游击习气较重，不习惯野战军生活，连走路也不会走，夜行军常常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一师是我纵主力，常担任艰巨任务，有人担心这个团能够适应吗？能打出来吗？一师的领导倒是有信心的，认为这个团兵员都是根据地长大的翻身农民，政治素质好，干部也较纯洁，有朝气，决心在战斗中锻炼它，尽快提高它的战斗力。

第一仗就是孟良崮战役，一师攻取黄斗顶山、尧山、塔山敌军阵地，三团随一团后跟进。敌整七十四师退守孟良崮山区，一师于覆浮山、蛤蟆崮、天马山阻击敌六十四师。二十五师东援，一团奉命参加围攻孟良崮，三团遂担任覆浮山、蛤蟆崮一线防御任务。五月十六日八时正当敌七十四师告急之际，四周敌援军猛攻我军阵地。敌六十五师约两个团在飞机配合下，分路猛攻我三团覆浮山阵地，三团连续击溃敌五次冲锋。十二时，扼守覆浮山西北小石岭口以东小高地的八连，弹药耗尽，阵地为敌所占，我两次反击后夺回，并俘获敌一部。下午五时，攻击我三团蛤蟆崮阵地之敌被击退。敌集中兵力猛攻我天马山九团阵地，以一个营的集团冲锋，进至山腰，直逼主峰。我一师已别无机动部队，即令三团派部队不顾一切出击天马山。三团即抽一个连驰援天马山，当时部队弹药已大部打完，仅有个别战士保留数发子弹，该

连由山北部向上猛冲，俘敌副连长以下十余名，余敌狼狈西窜，天马山阵地再度稳定，保障了各部最后全歼敌七十四师。战后的战斗总结多次提到这个团，“尤以一师三团虽为刚编入我纵建制之团，又为来我纵后之初战，整个部队上下更显示了坚强的决心与信心，发挥了高度积极性。”“刚从地武编入我纵的三团，提高了防御作战的战法与胜利信心。特别值得提出的，就是通过这次……紧张的防御作战，对防御战在大兵团作战中的重要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此次三团在防御作战中的缴俘，正说明了：只要指导思想积极，战术灵活，不但能减少伤亡，而且求得缴俘也完全是可能的”。

随后，我一、四纵队出击鲁南，三团拨归四纵十师指挥，担任调动敌人、掩护主力突围任务，八月中旬到达滨海地区。九月三日敌进占诸城，三团完成了对敌整八十三师的阻击任务；四日又击退了向大沟头进攻的敌整九师；继又挺进胶济铁路以南，阻击高密出援之敌。十月十三日，四纵十师奉命攻击诸城，三团炸开北门，迅速突入城内，直逼伪县政府，逐屋争夺，与十师二十八、二十九团一起，全歼诸城之敌，拔除了滨海地区敌人最后一个据点。

不到半年时间，三团由一个地方武装锤炼成既能防御又能攻坚的具有一定战斗力的步兵团。纵队政治部派工作组深入调查后，认为三团所以能够快速成长，是由

于：

第一，这个团的政治素质是好的。指战员年轻、纯洁，易于接受革命影响，绝大部分是翻身农民，有保卫土改成果和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的阶级觉悟和政治积极性。

第二，进行光荣传统教育。三团由一个分区的地方武装升级到野战军，充满了光荣感，受到一纵和一师的斗争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激励，又增加了自豪感，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用三团战士的话来讲：“在这里，我们是老三，艰巨的任务有老大哥担任；出去了，我们代表一纵队，代表一师，可得有个主力部队的样子，咬着牙也要完成艰巨任务。”

第三，从主力部队调配一定的战斗骨干。干部是部队成长的决定因素之一，什么样的干部就带出什么样的部队。实际上，主力部队战斗任务重，伤亡大，新成员反而较一般部队多，主要是干部和骨干把战斗作风一代又一代带下去，保持着这一部队的战斗传统。所以，有些主力连队一仗下来只剩下不多几个人，补充大量新兵后，战斗力还是很强。三团的作风象一师，道理也就在这里。

第四，在战斗中和艰苦环境中锤炼部队。一师在较为重要的任务上使用三团，是很有魄力的。当然，孟良崮战役中使用三团反击天马山也有客观原因，已经无兵



可派，但师指挥员也要信任他们能够完成任务才好。在部队成长过程中确有这种情况：只具有一般战斗力的部队，老是担任次要任务，战斗力再也提不高；而战斗力强的部队中，却能使新部队迅速提高，因为担负的任务不同，锻炼不同，而且标准也不同。三团的战士说得好：“我们有个标准，就是一团老大哥。我们就是向这个高目标努力的。”

当然，三团的成长有它自己的特点，但从纵队其它部队的成长道路看，也是有其共同点的。

## 第三十三章 中原钓“大鱼” ——睢杞战役

### 决胜千里外

睢杞战役，亦称为豫东战役，是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一次大兵团的歼灭战。此战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从此，在中原战场，敌人完全失去了对我军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并更加动摇了据守战略要点的信心。由此，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确定：华野一兵团不再渡江南下。

回顾这一战役，必须追溯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兵团渡江南下和暂缓渡江的战略决策。在上一章内，我曾简略的提到这一点。

毛泽东同志派遣华野一兵团渡江南下的战略设想，是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的基础上，作更为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跃进，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

略进攻。

把战争引向敌人深远后方的设想，在解放战争中，我所接触的不仅是这一次，而是还有过三次：

解放战争初期，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给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陈毅、舒同的电示，明确提出：“……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

孟良崮战役前，原拟派一支队伍南下，不仅是到苏中，而是到江南。现在可以在《毛泽东军事文选》中查阅到，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毛主席致陈毅、粟裕电示：

“……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因此请考虑一、六两纵队是否暂缓南下为宜，因过早挥师南下，敌可能惊退，尔后难于歼击。”五月六日毛主席又电示陈毅、粟裕：“不但一、六纵队不宜过早分出，即七纵亦以宜暂留滨海地区一个月左右作为箝制之用，一个月后看情况再行南下。”当时，我军在鲁中青驼寺因分兵未能歼敌，所以毛主席电示：“不宜过早分出。”意思是很清楚的：“不宜过早”而不是不再“分出”。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主席给刘、邓、陈、粟、谭和华东局的电报，指示刘邓大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并提出，“叶（飞）陶（勇）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

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域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两广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成立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七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再次电示：“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飞纵队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此时，我一一四纵队正撤出滕县、邹县战斗，回师向东，又转头向鲁西南突围。如果我和陶勇同志当时知道毛主席有此电示，很可能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苏中。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电示组成一兵团渡江南进，计划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的几个地段渡江进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或一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由此可见，毛主席在刘邓直出大别山时，就要叶陶两纵出闽浙赣了。一月二十七日的电示是这个战略设想的继续。

以后，中央和毛主席采纳了陈毅、粟裕同志的建议，华野继续依托中原、华东两解放区，会同中原野战军作战；同意华野一兵团在整训结束后，四至八个月内，暂

不向江南作战略机动，以便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粉碎敌人在中原的防御体系。五月五日，党中央把这一决定电告了刘、邓和华东局。

中央电示是：暂不渡江；四至八个月内，暂不向江南作战略机动。可见中央没有完全放弃此战略行动，而有待在中原地区作战后形势变化如何再定。睢杞战役之后，中原局势已起变化，这才停止这一已没有必要实施的战略行动了。

毛主席这一军事思想，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的。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实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

‘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多次提出：“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相机出闽浙赣”、“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正是为了“威胁敌之根本重地”。

所以，在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略防御阶段中，毛主席就不只一次地考虑实行打到敌人后方去，以打破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和重点进攻。毛主席在解放战争初期这一思想，还不仅仅从军事战略上的考虑，而还有更为远大的政治和经济战略的考虑，即针对蒋介石把战争引向解放区，使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枯竭，“汲干水打鱼”的方针，而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削弱敌人利用其统治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以进攻解放区。解放战争第二年，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主要标志就是把战争打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我军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这是毛主席这一军事思想的全面实现。

但是，毛主席又是审时度势、实事求是的，当战局已经发生变化时，决心也随之而变化，而且以主观上的努力来促成这个变化。睢杞战役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转瞬万变中抓住的一个战机。统帅不仅要指挥自己的部属，而是要使敌人听自己的指挥——就是调动敌人。

## 攻克开封 诱敌来援

上一章讲得很清楚，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来到我一兵团视察，提出了具体的任务是：消灭国民党军主力第五军等部，具体的战术手段是“钓大鱼”。

我一兵团立即投入中原战场。那时中原的形势依然是严峻的。

敌人在中原战场上除保安部队外，有正规军二十五个整编师，企图控制陇海路东段、津浦路和平汉路南段的交通线，以郑州、信阳、蚌埠、开封、商丘等城市为据点，乘我华野抽出三个纵队主力在濮阳整训之际，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兵力，寻我主力决战。

五月三十日晚，我三个纵队整训完毕，南渡黄河，这一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急调邱清泉兵团主力和整编第七十五师北返鲁西南地区，迎击我渡河部队。同时，又增调整编第八十三师、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和第六十三师一个旅，企图与我渡河部队决战。这样，敌集中在鲁西南战场的兵力将达到九至十一个整编师，而且队形密集，不易分割，我军难以达到各个歼敌的目的。

六月三日，毛主席来电指示：“在整个中原形势下，打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但要有耐心，要多方调动敌人，方能创造机会。”“你们到达适当地区后，不是休息

三天，而是休息半月左右，全军精心研究技术战术，养精蓄锐。即使有打小仗的机会，主力也不要去打。……再采取调动敌人的行动，于运动中歼灭敌人。……不要急于求赫赫之名，急于解决大问题，而要忍耐沉着，随时保持主动。”

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和当前的敌情，粟裕代司令员觉得在此情况下，寻歼敌整编第五军不是很有把握，而豫东广大地区敌兵力空虚，乃改变在鲁西南作战的计划，转向豫东，攻城打援，决心先打开封，后歼援敌。首先以主力一部（陈唐兵团），围攻敌守备兵力比较薄弱而又处于敌人防御要害的开封，吸引徐州之敌来援，集中主力一、四、六纵队于运动中歼灭来援之敌。六月十七日晨，中央批准了这一部署。同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同志也来电赞同这一部署。

于是，第三、第八纵队组成的攻城集团由陈士榘、唐亮指挥，对开封发起攻击；二十二日晨，全歼守敌。

我军攻占开封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十分震惊，一片混乱。六月二十四日，伪立法院匆忙举行秘密会议，检讨中原战局，与会者惊怨交集，对军事当局大加指责。蒋介石为挽回败局，命令邱清泉兵团及第四绥靖区刘汝明部由鲁西南向开封攻击前进，同时以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七十二师及新编第二十一旅组成一个兵团，由区寿年任司令，自民权地区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在开



封地区与我军决战。本来我军实施开封战役的目的，除攻占城市全歼守敌外，更重要的是引诱敌人来援。敌人既然要开封，就将计就计，把开封让给它。敌人回占开封，就让它背上包袱，分散兵力，使我军能集中兵力寻歼援敌于运动之中。

此时，敌胡璉兵团被我中野一、三纵和华野十纵阻击于上蔡以北地区，敌孙元良兵团被我中野九纵及豫皖苏军区部队阻击于中牟。毛泽东同志又部署山东兵团攻打兖州、济宁。苏北兵团攻克陇海铁路东段分散之敌，调动徐州的敌军。六月二十六日，毛主席电示：“敌八十三师调援兖州，二十五师一部到滕县，主力有返徐州讯。蒋介石、白崇禧似均判断我粟裕、陈士榘、张震南进与刘伯承、邓小平会合打十八军等，故令邱清泉、区寿年从民权、兰封、开封之线向西南急进，以期合击我军。邱军又以一部来开封。在此情况下，粟陈张部署在睢县、杞县、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敌指挥官中区寿年和我军作战较少经验。”

粟裕代司令员决心：抓住有利时机，连续作战，主动放弃开封城，围歼较弱的一路援敌区寿年兵团。以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两广纵队和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组成突击集团，指定由我指挥，隐蔽集结于睢县、

杞县、太康之间的民权地区，实施南北夹击，围歼区兵团。其他部队由野司直接指挥，组成阻援集团，陈唐兵团担任隔离邱、区兵团，阻止邱清泉兵团东援，中野一纵，华野十纵，仍担任牵制阻击敌胡璉兵团任务。

## 围歼区兵团 活捉区寿年

攻歼区寿年兵团之战，即睢杞战役，于六月二十九日晚发起战斗。

区兵团在部队数量、技术装备上虽弱于邱兵团，但该兵团原为十九路军之一部，战斗力是很强的。区寿年此人，实战经验比较丰富；此次由第六绥区副司令兼任第七兵团司令，行动比较谨慎，与邱清泉的骄狂成为鲜明对照。而我突击集团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中野第十一纵队是军区武装；两广纵队仅三个小团兵力；渡河南下的三个纵队则连续担任阻击任务，较为疲劳。但是三个主力纵队经过濮阳整训，又受到朱总司令视察的鼓舞，士气很高，求战心切，军事技术也有很大提高，而且经过补充，兵员充实。所以我突击集团在素质上是大大占优势的。因此中央认为“在睢县、杞县、通许之线（或此线以南），歼敌一路是很适当的。”但也指出：“如能歼灭七十五、七十二两个师当然更好，否则能歼灭第七十五师也是很好的。”

当时，蒋介石却低估了我军战力，认为我军经过开封战役已被打伤，“似无积极企图”，邱清泉进占开封后，主力直扑通许，而区寿年却判断我军“有向平汉路进攻模样”，踌躇不前，距离拉开，形成了四十公里的间隙。加之，当时所得情报，由于我山东兵团围攻兖州，敌黄伯韬兵团改援兖州，徐州方向已无机动兵力。所以野司首长为了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歼灭敌人，不待查明区兵团的具体部署情况，即于二十七日下达了围歼区兵团的作战命令。

敌区兵团前进迟缓，二十七日仅进至惠济河南。野司首长同意我采取跃进，实行战场分割敌人的部署：以第四纵队并指挥两广纵队由杞县向尹店、吕屯、白云寺地区攻击前进；第一纵队由睢县向龙王店、陈小楼攻击前进；第六纵队由西陵寺、裴村店、蓼堤岭攻击前进；中野第十一纵队由内黄向尹店西南前进，担任阻击徐州方向可能来援之敌之任务。当晚二十时，区兵团已经收缩，未获战果。二十八日拂晓，我一纵楔入敌七十五师和七十二师接合部，夺取十六个村庄，完全割裂该两个师的联系。六纵完成对杨拐、榆厢铺敌之包围。四纵占领龙王店西北一线。十一纵进击龙塘岗一线，将敌新二十一旅压缩于陈小楼地区。至此，我已完成将区兵团分割包围的任务。我分割敌七十五师与七十二师的一纵一师部队虽受敌东西夹击，苦战终日，分别击破反扑的敌军。

二十九日晚，该师攻击常郎屯之敌，战况激烈，一纵投入最后有生力量的纵队警卫营，不顾一切打开战局，三十日八时全歼守敌。同时，十一纵与六纵十八师歼敌新二十一旅大部，并与四纵会师，继续肃清敌新二十一旅残部。七月一日，总攻龙王店，经过反复冲杀，拂晓我各部相继突入，天明全歼守敌区寿年兵团部、七十五师师部及十六旅的四十六团，活捉了区寿年和师长沈澄年。区寿年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内战不得人心，只有失败的下场。

### 保持主动 胜利转移

且说南京，惊慌失措不必描述，蒋介石也坐不住了。七月二日，不惜以统帅身份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乘飞机亲临杞县上空督战，严令邱清泉迅速攻击前进，与区兵团会合。并急令已由徐州北援兖州至滕县的敌整编第二十五师火速西调，凑集第三快速纵队、交警第二总队，组成一个兵团，由黄伯韬任兵团司令，日夜兼程驰援睢县。

战后，缴获到蒋介石于七月二日下午六时于徐州写给邱清泉的“手令”，全文抄录如下，以为佐证。为了阅读方便起见，加了标点。

雨庵军长弟勋鉴：龙王店失陷，区寿年、沈澄年二同志若非阵亡，必已被俘。中原战局，重万分。两日来连电令

弟全力东进增援，而弟违令迟滞，视友军危急不援，以致遭此最大之损失。得报，五中惨裂，不知所止！故今午特飞杞县，甚望与弟空中通话，督促急进，以救榆厢铺与铁佛寺友军之危！此时，惟有弟军急进，一面救援七十五师在榆厢铺之一旅与铁佛寺之七十二师；一面与西进之二十五师会合，方能挽坠势，亦所以保全弟军不致孤危被歼也。二十五师今午已攻克王老集，刻正攻击董店，距铁佛寺仅四公里之遥，则七十二师或可在今晚与廿五师会合。但弟若再不全力东进，则该两师已受龙王店失陷的影响，仍觉兵力单薄，孤危可虑。总之，无论战局如何变化，仍须以弟部与廿五师、七十二师会合作战，方有转败为胜之望，否则必被各个击破。如此次中原作战失败，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而此责任全在吾弟所率领第五军负之。以弟部不惟为中原之主力军，而且为全国各军中之主力也。因未能在战场上空与弟通话，故在徐州停机，写此一函空投，以期吾弟能负重责，挽回全局，将功赎罪

也！

冀豫

戎社

中正手启

焦虑之情，跃然纸上。公平地说，蒋介石在军事上也并不是无能之辈，军阀混战中他屡战屡胜，并不是单靠收买之类的政客手段，战场上的胜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他那一套比大军阀头目确实高明，而与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艺术相比，只能被玩弄于掌股之间了！开封一打，驱使邱清泉、胡璉、孙元良、区寿年纷纷赶向开封；兖州一围，又慌忙派黄伯韬北援；区寿年被歼，邱、胡、孙、黄又被他赶来睢杞地区。看起来，蒋介石指挥大军数十万驰骋于中原战场；实际上，却是被毛主席所指挥，所调动。

“总统手令”虽然严厉，率领“全国全军中之主力”的那位“雨庵军长”，仍然为我陈唐兵团阻击于桃林岗之线，挫败了它的进攻气焰。

但是，我中野十一纵队阵地却被敌二十五师所突破！中野十一纵队是冀鲁豫军区地方部队，敌方第三快速纵队的装甲部队突然出现在面前，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技术装备，力量悬殊，在敌人强大火力轰击下，阵地被敌突破……

我原拟以第一纵队的一、三师进至睢县以东、围攻五里庙、铁佛寺之敌七十二师。第十一纵队杨桥至刘楼一线阵地被敌突破时，一师正好赶到，一看情况危急，一面向纵队请示，一面命令师特务营向王老集出击，机动迎击敌黄兵团；并先敌抢占柴砦、董店，阻击该敌与七十二师靠拢。竟日处于敌军东西夹击的紧张状态之中。七月二日，我一、三师西与敌七十二师、东与敌黄兵团两面激战于赵堂、董店、柴砦、王老集一线。战场力量的对比有了很大变化，开始是一个兵团对一个兵团，此时变成一个兵团对付两个兵团了。

此时，野司命令第三、第十纵队及第八纵队一部，继续阻击邱兵团；命令我指挥第八纵队大部及第六纵队一个师围歼敌整七十五师残部，第一、第四纵队及第六纵队大部、两广纵队攻歼黄兵团，中野第十一纵队监视敌七十二师，并为战役预备队。野司首长的决心是很大的，给我和一、四、六、十一纵、广纵、骑兵团各首长的电令非常明确：“我军应乘黄兵团立足未稳、工事未固，于本晚分别完成包围，随即发起攻击，明日白昼也继续攻击，力求速决，否则战斗时间拖长，对我颇为不利。但快速原则之执行，亦不是无准备的盲目乱碰，望各首长遵叶司令之具体部署，迅速坚决执行，务求于明（三）晚完成歼灭黄兵团之任务为要。”

根据预定作战计划，我军迅速歼敌整七十五师第十

六旅旅部及两个团，主力则在敌黄兵团正向我进攻时全线出击，对黄兵团实施突击。战至四日拂晓，我军歼黄兵团两个团，并将它压缩于帝丘店及其外围十余个村庄内。五日，敌步兵由坦克引导，在飞机和炮兵火力的支援下，于帝丘店附近向我进攻部队实施疯狂反扑。特别是我柴砦第七团阵地被敌狂轰烂炸，坦克步兵联合猛攻，激战七小时，阵地屹立未动。我给予敌人大量杀伤后，将其击退。黄昏后，我再次向敌发起进攻，至六日晨，一纵攻下王老集，全歼守敌整二十五师三二四团全部另两个连。其余各纵各有进展。黄伯韬被迫把部队收缩到帝丘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带。

七月五日晚的攻击是很关键性的，我攻击部队没有完成肃清帝丘店外围的计划，因此预定六日总攻帝丘店也就不可能了。如果完成肃清外围的任务，黄兵团的有生力量大部被歼，总攻时只需使用两个纵队的兵力，其余部队则可集中力量打援，全歼黄兵团的任务也可实现。由于五日晚未能按计划完成，总攻必须延迟到七日晚，敌人的援军就逼近了，将使我军陷于被动。这时敌情已有变化，敌整编第五军已从杞县向东北威胁我军侧背，整编第十八军先头已到淮阳，第二天可到太康，大炮也就可以打到我们背后了，敌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后重建）也已到达宁陵东北。野司首长果断地决定趁胜收兵。此战就以歼敌五万余胜利结束。



睢杞之战，打得很艰苦，很吃力。战区久旱无雨，井河干涸，酷暑盛夏，部队昼夜苦战，伤亡渐增，建制不全，兵力不足，但指战员以惊人毅力克服困难，野战军首长尤其是粟裕同志英明果断，终于战胜敌人。战场情况，瞬息万变，胜利得来确实不易！但这一胜利使中原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敌人完全丧失了战场主动权。这对于我军以后能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七月十一日，党中央给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敌区寿年兵团、黄伯韬兵团等部五万人的伟大胜利。”“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当此盛暑，特向同志们致慰问之意。”

我和指战员们一样，以胜利的喜悦的心情阅读了这份贺电，充满信心地迎接解放战争新的年度的到来。

## 第三十四章 淮海决战中的 华野第一纵队

睢杞战役结束后，中原战场之敌已被迫转入“重点防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呈摇摇欲坠之势。我华东野战军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六日，采取“攻济打援”的作战方法，举行济南战役。

我一纵原在淮阳以北休整，九月九日奉命与八纵并肩北上，待命参战。当时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电示：“叶飞所指挥的三个纵队，应于本月下旬结束整训，北移嘉祥、巨野地区。”（八月十二日电）“叶飞所率一、六、八纵应于攻城发起前若干天出动北移，不过早也过迟。”（八月二十二日电）“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援敌。……而以一、四、六、七、八、十一、韦杰等共八个纵队担任打援，而以其余各纵担任攻城。”（九月十一日电）我一纵属于打援集团。二十二日在济宁地区受命参加攻城战斗，因攻济部队进展顺利，复回师参加打援，二十五日济南战役顺利结束，徐州之敌未敢来援。

济南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进行淮海战役。

我在淮海决战的前夕病倒了，严重的黑热病，使我不得不到济南治疗休养，未能参加淮海战役。淮海战役规模空前，战果巨大，不能无记，现以我和张翼翔同志联名合写的《淮海决战中的华野第一纵队》一文附录于下。

### 淮海决战中的华野第一纵队

叶 飞 张翼翔

举世闻名的淮海决战，已经过去三十七年了。我们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在这次战役中，坚决遵循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在淮海战役总前委和野战军首长的正确指挥下，与兄弟部队一起驰骋疆场，浴血奋战六十五个日日夜夜，以七千余人的伤亡代价，赢得了歼敌四万余人的胜利。回想起这段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总是思绪万千，精神振奋，激动的心情难以平抑。从而更加激起了我们对伟大的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战略家毛主席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限敬意和深切怀念，更加激起了我们对千千万万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光荣献身的革命先烈的深切悼念。

## 急袭窑湾 全歼敌第六十三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晚，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向盘踞在徐州地区的敌刘峙集团发起进攻，揭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早在十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十月十四日，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在曲阜召开了有各纵队领导参加的作战会议。确定第一阶段的作战计划：以七个纵队向新安镇、阿湖地区实施主要突击，歼灭黄伯韬兵团；以三个纵队南北对进，突击运河车站及其以西地区，分割黄伯韬、李弥两兵团之联系；以山东兵团进攻台儿庄之敌第三绥区部队，尔后强渡运河，直出陇海路，切断黄兵团退路，阻击徐州之敌东援；以两个纵队协同中原野战军，逼进徐州。这一部署的特点是，以宽正面出击的动作，造成合围徐州之势，以迷惑敌在我完成对黄伯韬兵团包围之前，无法判明我军的真正意图。

按照这个计划，我们纵队于十月二十六日从兖州地区出发，和兄弟部队一起，以摧山倒海之势，分数路挥师南下。我纵广大指战员肩负着人民的期望，满怀胜利的信心，迅速逼近位于徐州以东新安镇、阿湖地区之敌

黄伯韬兵团。

我军挥师南下，敌人惊魂落魄。国民党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坐卧不安，连电告急。蒋介石为遂行事先拟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一面严饬刘峙集团加紧收缩兵力于徐州地区，一面急令其参谋总长顾祝同飞抵徐州督战，妄图以攻势防御击退我军进攻，并乘我华东、中原野战军尚未会师之隙，歼我华野主力一部。处在敌人所谓“一点（徐州）两线（津浦、陇海）”防御部署右翼的第七兵团司令官黄伯韬慑于被我军就地歼灭，接到命令后，仓皇率领所部第二十五、四十四、六十四、一〇〇等四个军，向徐州方向退却。为防我军跟踪过河，不待其后尾撤完，便将运河铁桥炸毁，将船只尽行破坏，以致把担任左翼掩护任务的该兵团第六十三军丢弃在运河以东。

鉴于徐州敌人有总退却征候，十一月九日，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电示华野、中野，指出：“你们按照敌要总退却的估计，迅速部署截断敌退路，以利围歼是正确的。”要求我军务必做到：第一步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歼敌全部于长江以北。强调指出：“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胜利”。命令中野主力直出宿县；华野乘敌慌乱西撤的有利时机，迅速歼灭黄伯韬兵团。

根据上述指示，野战军首长立即作出了各个纵队展开追击、截击的部署。同时发布了政治动员令，号召全

军“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为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里，坚决追到哪里，全歼黄兵团，活捉黄伯韬。”

十一月九日，华野参谋长陈士榘面示我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翼翔：敌六十三军已于昨日下午二时撤离新安镇，企图经窑湾渡运河西逃，在其逃经堰头时，已被九纵歼灭了一个团；你们纵队应立即向窑湾方向开进，首先追歼该敌，尔后协同友邻，直捣黄伯韬司令部。

这个任务传达到部队后，我纵广大干部战士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决心将敌六十三军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在窑湾镇。广大指战员不顾半个月来急行军的疲劳，紧紧咬住逃敌，穷追不舍。敌人沿途落荒逃窜遗弃的军用物资，狼藉满地。此情此景，更加坚定了我们抓住和歼灭这股敌人的决心。经过近百里的追击，终于当日傍晚将敌六十三军紧紧地包围于窑湾地区。而黄伯韬率领的另四个军，也已被我友邻部队分别包围在碾庄圩和曹八集一线。至此，整个黄伯韬兵团被我华野主力重重包围，成了瓮中之鳖。

窑湾镇，面临运河，北靠沂河，位于两河会合之处，南、西、北三面被运河环抱，东面有一条三四米高的围墙，墙外有断续外壕和水塘相连。镇四周地形开阔，多小村落。镇内居民三千余户，素有苏北“小上海”之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先后在这里筑有防御

工事和若干碉堡。敌第六十三军逃至窑湾后，眼见无法渡河逃脱，遂决定固守待援。为迟滞我军进攻，敌不分昼夜地加修工事，并控制了周围三公里的大小村庄，进行仓促布防：以第五十二师两个团防守大东门和南门，并以南门为重点；以第一八六师两个团防守小东门和北门；以第一八六师另一个团位于天主堂军指挥所，作为预备队。

该敌原系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的部队，战前从南京、芜湖一带调到淮海战场。军长陈章是十月初由第六十二军副军长升任的。对此，黄伯韬曾忧心忡忡地说：“战前换将，兵家所忌”。六十三军大多数官兵都是广东人，初到苏北、鲁南，水土不服，加之吃不饱、穿不暖，士气低落。他们仓皇逃到窑湾后，绝粮断炊，濒临饥寒交迫的困境，军心更加动摇。

我纵根据窑湾的地形特点和敌人仓促布防、立足未稳、工事不坚、士气低落、军心动摇的情况，决心不予敌以任何喘息机会，采取急促勇猛的战斗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击，打敌措手不及。为此，纵队在行进间即令第一、二、三师，分别由东、北、东南三面包围压缩敌人，首先肃清外围。同时做好不经调整部署，即可转入总攻的一切准备，务于十二日前全歼窑湾之敌。

粟裕同志听了张翼翔同志对上述决心和部署的报告

之后，当即在电话中询问：“你们一个纵队消灭敌人一个军，有把握吗？”“有！”张翼翔同志坚定地作了回答。“好，预祝你们胜利！”粟裕同志还兴奋地告诉我们：东北野战军已将卫立煌集团四十七万余人，就地全歼；华北傅作义集团六十万人，面临东北、华北我军夹击之势，成为“惊弓之鸟”；徐州刘峙集团这个庞然大物，也是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他还提醒我们：敌六十三军虽然士气低落，军心动摇，但受反动宣传较深，不了解我军俘虏政策，有可能负隅顽抗。因此，要注意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

全国军事形势的根本变化和野战军首长的指示，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十日拂晓，各师按纵队的部署，采取击破一点，大胆猛插，直捣纵深的战术手段，同时向窑湾外围发起攻击。第一师师长廖政国、政委曾如清率领全师在战斗中边打边侦察，迅速夺占上、下刘宅，并查明大扬场、小上窑敌之部署，旋即出敌不意地攻克上述两地，歼敌一部。随后，该师直插渡口、圩场。敌惧怕被歼，龟缩镇内。当夜，第一师肃清了镇东外围之敌。与此同时，第三师师长陈挺、政委邱相田率领该师主力，猛冲猛打，相继攻克陆营、阎场、三湾、二湾、头湾等地，战至翌日下午三时，全部扫清了镇东南外围之敌。第二师师长程业棠、政委张文碧指挥所部与敌奋战至十日晚，先后抢占了臧口、上窑湾、洪兴场、钱口、谢场、



西口、白公社等地，俘敌一部，控制了镇东北外围。是日夜，纵队侦察营亦渡过运河，占领了韩湾、小集一线阵地，切断了敌人的西逃退路。至此，窑湾外围大部为我控制。

为迅速全歼龟缩在窑湾镇的敌六十三军，十一月十日上午，纵队在腰庄召开了有各师师长、政委参加的作战会议，经过深入研究，并报请野战军首长批准，决定：以第一师担任主攻，配属105榴弹炮六门和山炮五门，首先由东门或大东门突破，歼灭该镇中部之敌，继而向两侧和纵深发展，与第二、第三师打通联系；以第二师配属75炮和山炮各三门，由北门突破，歼灭该镇北部及西部之敌，打通与第一师的联系；以第三师配属山炮六门，由南门及南门、大东门之间突破，歼灭该镇南部之敌。会上，纵队副政治委员陈时夫作了简要的政治动员，要求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认真做好战时思想政治工作，强调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带头杀敌立功，做部队的表率。会后，我们纵队几位领导和师、团领导，都亲临前沿勘察地形，研究打法，选择突破口，周密部署兵力火力。整个部队士气高昂，信心倍增。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我们纵队按预定计划，集中强大的炮火向敌人主阵地和军指挥所猛烈轰击。顿时，镇内硝烟弥漫，到处起火。担任主攻的第一师先

头部队第二团第二连，乘敌火力点被我压制之机，迅速勇猛地连续炸开两道鹿砦和围墙，一举突入小东门，并在半小时内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反冲击，巩固和扩大了突破口，为全师打开了进攻的通路，荣获“窑湾战斗第一大功连”的光荣称号。第二团乘胜在一小时内全部进入突破口，并分路向纵深和两侧发展进攻。随后，第一、第三团也相继投入战斗，积极向敌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分别从南门和北门发起进攻的第二、第三师，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但因地形不利，敌人拚命顽抗，几次突击均未奏效。纵队鉴于第一师进攻发展顺利，即令第二师第六团改由小东门突入镇内，直插北门，策应第四团。二十一时，在第六团配合下，第四团突破北门，并倾全力向南发展进攻。这时，第三师主力在第一师的策应下，也突破了大东门，并乘胜向西发展。但是，困兽犹斗，正如野战军首长所指出的那样，敌六十三军由于不了解我军的俘虏政策，加之老兵油子多，仍负隅顽抗，妄图固守待援，进行垂死挣扎。

我纵经过调整部署后，以更加迅猛的动作向敌纵深实施突击，扩张战果。

第一师广大指战员，在廖师长、曾政委的灵活指挥下，充分发挥了随伴火炮和炸药的威力，与敌展开了反复冲杀，逐屋争夺。该师第二团第五连在与敌人激战中，伤亡很大，全连只剩下二十个人，仍然顽强地战斗着。

他们高呼“冲进指挥所，活捉敌军长”的口号，一直冲杀到敌军部，并机智地利用俘虏喊话，宣传我军政策，一次俘敌二百余人，荣获“窑湾战斗第二大功连”的光荣称号。

在我军发起窑湾攻击战斗时，敌刘峙集团以三架飞机数次向六十三军阵地空投粮食和弹药，妄图促使该敌作绝望挣扎，以延缓其覆灭的命运。然而，尽管刘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也挽救不了六十三军被歼的命运。我纵指战员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席卷窑湾镇，逼使残敌纷纷向我投降。敌军长陈章见大势已去，待援无望，慌忙带领卫兵向运河方向逃窜，企图泅水潜逃。可是，他刚逃到河边，就被我严阵以待的截击部队当场击毙。十二日拂晓，窑湾战斗胜利结束。我纵共计歼敌第六十三军两个师五个团一万三千余人，给敌黄伯韬兵团以沉重打击，为我华野完成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赋予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受到野战军首长的通令嘉奖。这次作战，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我军应用急袭战法，以一个纵队的兵力歼灭敌人一个军的战例。

### **迭挫援敌 保障友邻歼灭“两黄”兵团**

窑湾战斗刚结束，野战军司令部通知纵队领导前往

野司接受新的任务。

原来情况是这样的：敌黄伯韬兵团被我军严密包围之后，蒋介石大发雷霆，责备刘峙无能，令杜聿明回徐州任“剿总”副总司令，率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并限于二十日与黄伯韬兵团会师；同时令黄维兵团急进宿县，另组织第六、第八两个兵团北援。至此，敌在徐州猬集兵力近八十万人，企图与我会战，在中原战场作最后的挣扎。为阻击东援之敌，保障主力歼灭黄伯韬兵团，我纵奉命加入阻击兵团，西与鲁中南纵队，东与第十一纵队并肩由房村东西向狼山、鼓山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翼侧攻击，以攻势行动阻敌东援。十一月十三日，我纵渡过运河，经三天急行军抵达房村地区，迅即向狼山、鼓山发起攻击，威胁东援之敌右翼，配合正面防御兵团阻敌东援。

狼山、鼓山系敌邱清泉兵团的右翼，为敌我双方必争之地。提起邱清泉兵团，我纵干部战士无不恨之入骨。这个自诩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军”，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以来，常在进攻我华东和在中原战场作战中打头阵，既骄横，又狡猾，气焰十分嚣张。早在一九四八年五月，朱德总司令亲临濮阳，向我们纵队和第四、第六纵队团以上干部作动员报告时，就号召大家努力学习战术，用“钓大鱼”的办法，寻歼该敌。豫东战役中，这条“大鱼”虽然被我军打得鳞甲残伤，但没

有把他钓出来。大家听说又要与该敌作战，顿时整个纵队同仇敌忾，情绪激昂，纷纷表示决心，誓在淮海决战中，钓住这条“大鱼”，不使其漏网。

十一月十八日下午五时，纵队根据“野司”统一部署，令第二、三师分别向狼山、鼓山守敌邱兵团所属第七十军发起攻击。经两日激烈战斗，予敌以严重杀伤，并攻占了鼓山和狼山大部分高地。此时，邱清泉为解除其右翼的威胁，严令第七十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多次向我狼山、鼓山阵地猛扑过来，战斗甚为激烈，阵地得而复失。我纵队干部战士虽然伤亡也很大，但士气极为旺盛，以“不完成任务，决不下山”的英雄气概，与顽敌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搏斗。敌连攻数日，死伤惨重，东援无望。我阻击兵团经过顽强抗击，殊死战斗，终于粉碎了敌援黄伯韬兵团的企图。

当我军正在围歼黄伯韬兵团的时候，蒋介石的嫡系精锐主力黄维兵团，自恃其装备精良，气焰嚣张，欲抢“援徐”头功，孤军冒进。结果沿途遭到我中野部队节节阻击，疲惫不堪，员额大减。据此，淮海战役总前委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令中野集中全力在华野一部配合下，乘隙围歼黄维兵团，令华野主力阻击“徐敌”南援，保障中野作战。

为坚决阻击“徐敌”南援，保障中野歼灭蒋介石赖以解除徐州之围的黄维兵团，完成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

作战任务，野战军首长决心以五个纵队南下求歼李延年兵团，以八个纵队编成东、南、西三个阻击兵团，统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兼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分别在徐州以南夹沟至符离集之间五十公里的正面上，采取弧形大纵深配置，组织防御战斗。我纵奉命与第四、第十二纵队编成东阻击兵团，由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郭化若统一指挥。我纵位于兵团的最右翼，任务是以水口为中心组织防御，阻击邱清泉兵团南援。

鉴于邱清泉兵团背靠徐州，补给方便，武器精良，战斗力较强；而我纵经过连续二十多天的行军作战，减员较多，部队十分疲劳，有相当一部分连队建制不健全等实际情况，纵队党委经过深入分析敌我形势，认真总结过去与该敌作战的经验教训，决定在全纵队大张旗鼓地进行思想动员。纵队政治部发出了坚决阻击邱清泉兵团南援，保障中野全歼黄维兵团的动员令，号召大家发扬我军连续作战，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恰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关于《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发表了，我们立即组织部队学习。毛主席关于“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便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的英明论断，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完成阻敌任务”的决心书、保证书，象雪片一样飞往各

级领导机关。同时，我们还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反复勘察地形，研究防御战术，制定防御措施。

水口村位于旧黄河南岸，是个东西长三华里的大村庄，与狼山、鼓山仅一河之隔。村北面有一道约五至七米高的河堤为天然屏障，有利于我军防守；旧黄河干涸无水，岸北地形开阔，有利于我发扬火力杀伤敌人，但是，也便于敌人机械化部队运动。水口村是敌邱清泉兵团南援的必经之路，守住该地，对阻击敌人南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根据敌情和地形特点，纵队决定采取纵深梯次部署，组织三道防线：以第一师在水口、小店、下洪地域，担任第一线防御任务；以第三师在玫瑰山、赵家崔地域，担任第二线防御任务；以第二师在宝光寺、褚兰以南地域，担任第三线防御任务。各师、团受领任务后，即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迅速进入阵地，并进一步勘察地形，对阵地编成、兵力部署、火力配置、工事构筑等，进行了反复的研究，确定了有重点有纵深地构筑工事和配备兵力与火力。各部队不顾疲劳，不畏严寒，夜以继日地构筑野战工事，截至二十三日，全纵队构成了一个以堤埂为依托，以地堡群为骨干，与交通壕和散兵坑相连接的梯次纵深防御体系。仅第一师在水口地区就构筑了地堡群四十三个，射击工事三十二个。大家兴奋地说：“让敌人的‘王牌军’，在我们筑起的‘铜墙铁壁’面前碰个头破血

流吧！”

十一月二十四日五时，敌邱清泉兵团第七十军一部向我第一师水口阵地发起进攻。当敌进至我前沿阵地约三百米时，我各种火器猛烈射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窜回旧黄河以北，抢修工事，作为继续向我进攻之依托。为破坏敌人进攻准备，第一师乘敌立足未稳，连夜组织部队向该敌实施多次反冲击，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该师特务营一个排，直插敌营部，击毙营长，俘敌一部。该师一团三连一排，在副指导员率领下，突入敌纵深，与顽敌白刃格斗，全排只剩下八个人，仍然坚持战斗。敌遭到我军突如其来的冲杀，伤亡惨重，被迫后撤至尖山地区。

二十五日，邱清泉兵团主力第五军攻占我友邻阵地杨家洼后，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分路向我纵防御阵地猛攻，战斗空前激烈。我们的战士以“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气概，同疯狂的敌人进行了顽强的阵地争夺战，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冲上去，前赴后继，寸土不让。经过六昼夜的鏖战，大量杀伤和消耗了敌人，挫败了邱清泉兵团的南援企图。

我纵广大指战员在狼山、鼓山和水口地区的英勇顽强的阻击战，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迟滞和遏止了敌人的救援行动，有力地保障了友邻部队歼灭敌黄伯韬兵团和黄维兵团。



## 乘胜追击 参加围歼杜聿明集团

徐州之敌南援和蚌埠之敌北援的企图被我军粉碎后，困于双堆集地区的黄维兵团愈加惶恐不安，连连呼救。蒋介石为避免其嫡系主力重蹈黄伯韬兵团之覆辙，遂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放弃徐州，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绕道肖县、永城南下，袭击我中野侧背，以解黄维兵团之危，偕同南逃。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杜聿明集团放弃徐州，向两淮或武汉方向逃跑的可能早有预见，十一月二十八日电示总前委和华东、中原两军作好准备，“以利应付意外”。野战军前委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于十一月三十日向全军发布了《为全歼当面之敌，争取淮海战役全胜的动员令》，要求各部队在徐州之敌倾巢南犯或向西南或向两淮逃窜时，应不顾一切，不惜任何伤亡代价，坚决干脆地予以就地全歼。

十一月三十日晚，杜聿明集团率领三个兵团及徐州地区国民党军政机关、后方人员并裹胁部分青年学生共约三十万人，放弃徐州，分多路纵队，蜂拥而下，向徐州西南滚进。野战军首长当即以十一个纵队的强大兵力，采取多层多路尾追、平行追击和迂回拦击相结合的战法，展开全线猛烈追击。我纵以第一师为右路，第三师为左

路，第二师和纵直居中，迅速越过津浦线，向肖县方向追歼逃敌。

为了抓住敌人，纵队党委和领导机关发出了紧急指示，号召各部队不要为小股敌人所迷惑，大胆插入敌纵深，勇猛追歼。广大指战员热烈响应纵队号召，不顾疲劳，历尽艰难，象猛虎下山一样，直扑敌人。第三师第八团有一个排长叫郭荣熙，他在追击途中发现敌十二辆坦克向我反击，掩护其主力撤退，立即率领一个爆破班，勇敢机智地接近敌坦克，以迅速突然的动作，连续炸毁三辆，俘获两辆，其余七辆慌忙逃跑。郭荣熙荣获战斗英雄称号。他们的英雄事迹，给广大指战员以极大鼓舞。

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如丧家之犬，慌忙西逃，沿途遗弃的粮秣弹药、军用物资、战斗文书，到处可见。在我军强大兵力的追击下，敌掩护部队整营、整连地被我歼灭；被我穿插部队甩在后面的敌人，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便成群成群地当了俘虏。十二月四日，我们纵队攻占了芒砀山，与第九纵队胜利会合，并封闭了杜聿明集团西逃的通路。十二月五日，我华野主力将杜聿明集团包围在永城东北李石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

杜聿明集团被我军包围后，蒋介石仍在做解救黄维兵团的黄粱美梦。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杜聿明重新调整部署，企图以三面掩护、一面突击、逐次跃进的战

法，拼力向西南突围。针对敌人的部署与企图，华野首长决定采取三面突击、一面阻击的战法，乘敌立足未稳，调整部署之机，大力紧缩包围圈，坚决阻敌向西南突围。我纵奉命以李石林为目标攻击前进。当面之敌系李弥兵团部及第九军和第四十一军一部。为保持连续攻击能力，纵队决定各师、团轮番作战，首先以第二、第三师向赵破楼、王白楼攻击，第一师为预备队。

在紧缩包围圈的战斗中，我们纵队广大指战员以坚强的意志，同敌人进行了反复激烈的争夺战，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围攻夏砦时，敌人的碉堡群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在紧急关头，第一师第一团特务连副排长庄德佳和三连战士赵林，临危不惧，抱起炸药包，向敌人碉堡群冲去。赵林小腿中弹，鲜血染红了棉裤，但他忍着剧痛，一步一步地爬向敌碉堡，将敌碉堡炸毁，他自己也壮烈牺牲。庄德佳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用炸药包、手榴弹与敌人拼搏，直到光荣献身。在烈士精神的鼓舞下，我们的战士越战越强，截至十二月中旬，相继攻克刘庄、豆庄、蒋庄、阎庄等敌占村落数处，同野战军兄弟部队一起，将敌两个兵团八个军二十万余人，紧紧围困在以陈官庄为中心的的东西十公里、南北五公里的狭小地区内。

十二月十五日，中原野战军在我华野一部的配合下，将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黄维兵团全部歼灭，夺取了淮海战

役第二阶段的彻底胜利。消息传来，我们纵队全体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群情振奋。

十七日，野战军召集各纵队领导人会议。会上野战军首长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联合举行的平津决战已经切断傅作义集团西逃退路。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淮海前线全军转入战场休整，对杜聿明集团采取“围而不打”，两个星期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与会同志无限敬佩地说：毛主席全局在胸，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蒋介石根本不是对手。

遵照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及野战军首长的部署，我们纵队与兄弟部队一起，采取大规模近迫作业的办法，将战壕延伸到敌人阵地的最近处，一面包围监视敌人，一面轮番休整部队。在二十天的休整中，纵队党委和领导多次举行会议，决定抓紧时间，做好总攻的各项准备工作：恢复和整顿了各级战斗组织，吸收了大批优秀分子入党；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军队向前进”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阶级觉悟；通过广播喊话、送食品、遣返俘虏等各种方式，开展了群众性的对敌政治攻势，促使蒋军许多官兵陆续向我投诚；针对敌人防御特点，进行了敌前练兵，重点研究了对付敌坦克、地堡群和防敌施放毒气等方法，普遍补充了弹药和粮秣。部队经过二十天的休整，养精蓄锐，兵强马

壮，意气风发，士气旺盛。

杜聿明集团在我军的严密围困下，每况愈下，已陷入粮尽弹绝的困境。尤其是十二月下旬以后，连日风雪交加，气温骤降，空投锐减，不少士兵冻饿而死。敌人为了抢夺物资粮食，曾多次互相开枪火并。但由于杜集团多为蒋介石嫡系，政治上反动透顶，顽固不化，拒绝向我军投降，企图作绝望挣扎。

一九四九年新年过后，鉴于平津战役已胜利完成对傅作义兵团的分割包围，截断其西窜南逃退路，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遂命令淮海前线我军，于一月六日下午四时，向杜聿明集团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总攻。我们纵队的任务是，在友邻第四、第十二纵队的协同下，首先歼灭夏庄之敌。接着向朱楼、邓楼、竹安楼方向突击，分割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联系，与第三纵队一起歼灭李弥兵团残部；尔后西进，参加聚歼杜聿明指挥部及其主力邱清泉兵团。

傍晚，我纵队第二师在强大炮火掩护下，采取连续爆破、连续突击的战法，一举攻下了敌人的要点夏庄。与此同时，第三师也夺取了夏庄至夏砦间的敌人碉堡群。是日夜，纵队决心以第三师第七、第九团夺取罗河堤，割裂朱小庄与丁枣园敌人的联系。罗河堤，是朱小庄与丁枣园敌人的天然屏障，也是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的接合部，敌人在河堤周围构筑了地堡群，并以猛烈的火力

拼死据守。第三师先以第九团多次强攻，仍然不能突破敌人防线。罗河堤攻不下，就难以攻占朱小庄、丁枣园，割裂邱、李兵团的联系，势将影响全纵队任务的完成。第三师经过调整部署，投入预备队，反复争夺，终于有一个营攻占了长约两百米的一段堤埂，楔入了敌人的主要防御阵地。敌人大为震惊，立即令丁枣园、朱小庄之敌向我军猛扑，展开了一场残酷的白刃战。我军英勇顽强，义无反顾，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穷凶极恶、惨无人道的敌人一计未成，又生一计，竟向我军施放了毒瓦斯，同时出动飞机向我疯狂扫射。顿时，阵地上浓烟弥漫，烈火熊熊，烧灼得到处是一片焦土。该营干部战士在毒气和烈火中翻滚着，他们用湿毛巾掩着口鼻，流着泪水，彻夜奋战，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了，仍然坚守阵地，巍然不动。

经过我各路大军勇猛作战，基本上打烂了杜聿明集团的防御体系。我位于东南方向的第三、第四、第十纵队三支劲旅，正在尾击李弥兵团残部。我纵以第三师一部兵力继续牵制罗河堤上和丁枣园的敌人，暗中将主力转入近迫作业。九日下午二时，第三师从三个方向对朱小庄之敌发起攻击，仅三个小时就将守敌全部歼灭。接着，乘胜向丁枣园发起钳形攻势。

据守在丁枣园的敌人，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第四十五师。该敌拼命抵抗，垂死挣扎，以

猛烈的火力连续四次向我反冲击。为了将其全歼，我第三师一面施以军事压力，歼敌一部；一面展开政治攻势，瓦解其军心。十日晨，这个所谓精锐师的残部，包括师长、副师长三千余人，被迫向我投降。曾几何时，趾高气扬、骄横跋扈的敌师长崔贤文，一扫昔日的威风，饥肠辘辘，顾不得许多面子，投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伸手向我们要馒头吃。蒋介石的最后一支“王牌军”就这样狼狈不堪地全军覆没了。兵败如山倒，杜聿明集团全线崩溃。我纵即令各师奋勇出击，大胆穿插，开展了大抓俘虏的竞赛。仅最后围歼阶段，我纵就俘敌近一万七千人。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它以圆满实现毛主席“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战略决策和歼敌五十五万余人的光辉业绩，载入史册。

## 第三十五章 飞越长江天堑

### 把革命进行到底

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之后，是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划江而治呢？宜将剩勇追穷寇呢，还是沽名钓誉学霸王呢？这是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也是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问题。

这时，敌人不仅在军事上，并且在政治上、经济上，均已面临绝境。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国民党统治集团惶惶不可终日，四分五裂，南京、上海、广州……都自称“政府”、“发言人”，成为国际政治上的笑柄。蒋介石宣告下台，退居幕后。李宗仁虽然认为“中共全盘胜利已成定局”，也不免蠢蠢欲动，想分一杯羹，终于为老奸巨猾的蒋介石火中取栗。至于美帝国主义的哀叹，则在艾奇逊为编纂《白皮书》致杜鲁门的信中写得很清楚：“不幸的但亦无法避免的事实，是中国内



战不祥的结果，为美国政府始料所不及”。无可奈何地供认：“美国也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于是，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残存的国民党政府进行“和谈”阴谋，另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企图在革命阵营内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或带上温和的色彩。

这样的背景下面，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蒋介石提出了愿意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居然还提出了妄想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条件。此中阴谋是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的。一月十四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八项和平条件。李宗仁代理总统后，表示“中共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四月，国民党以张治中为首的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共代表团进行和平谈判。四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南京政府代表团，四月二十日被南京政府所拒绝。这就使中外人士看清了他们的嘴脸。

当时，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威胁是存在的。但是，正象毛主席说的，除非美帝国主义的参谋总长是个“疯子”，否则它是要考虑后果的。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威胁，一是时机，主要是它能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成果，如果错过这个时机，美国就干涉不起来了。但也有第二种可能，蒋介石千方百计挑起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拖它下水，把战争的重担压到美帝国主义头上。

因此，两种可能同时存在，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

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这一电文中，指示全党：“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说服。”

渡不渡长江？也就是将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一个对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性的决策。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心是坚定的。周恩来同志就向国民党政府代表附明确表示过：第一，我们并没有宣布过停战，只是在和谈进行中，暂时不渡江，人民解放军正在等待向江南推进的命令，如果南京方面拒绝和平协定，预定四月二十日渡江南征；第二，如果协定签字，我军必须渡江接收江南地区。也就是说，不论战与和，渡江南进都是肯定的。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毛主席电示渡江前线总前委：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一举渡江成功。”

## 渡江作战的军事部署

我由于患严重的黑热病，不得不到济南治疗和休养。很遗憾，我没有能参加淮海决战。淮海战场歼敌五十五万五千余人的捷报传来时，我也战胜了黑热病，只是医生们的意见，还要休养一个月，才能康复。

休养不到一个月，来电催我了：赶快到十兵团上任，负责抓渡江的准备工作。这时，全军已整编完毕，华东野战军编为第三野战军，辖第七、八、九、十兵团。第十兵团辖第二十八军（原华野十纵）、第二十九军（原华野十一纵）、第三十一军（原华野十三纵），由我任司令员，韦国清同志任政治委员。实际上，我在济南也蹲不下去了，大军南下，饮马长江，眼看渡江战役发起在即，委实安不下心来。特别是我十兵团准备渡江的地区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苏中三分区，熟悉的地区，熟悉的人，引起回忆，牵动情怀。一接到电报，立即动身，赶到泰州。

那时的长江以北，一片胜利景象，一片欢笑声。大

军云集，渡江南征只待一声令下。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经常过长江。但那时是游击战争中的偷渡，如今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是面对敌军设防的长江天堑的强渡，能不能取得渡江作战的胜利？美帝国主义会不会进行武装干涉？

国民党政府有位国防部副部长说：“长江自古天险，共产党能渡过来？除非它是天兵天将。”狮子开大口，无非是有美国人撑腰。

这一点，毛主席在决策前是慎重考虑过的。所以，在渡江的兵力使用上，第二野战军紧靠第三野战军，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进军，第四野战军迅速南下，都是考虑到对付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这种可能性的。当时，国民党军队于安庆、南京至上海段沿江地区及杭州、金华、衢县、歙县段浙赣铁路以北地区布防，约二十四个军七十二个师，其中直接担任江阴至南京段防御的是六个军三十四个师，用作机动者两个军六个师。以我三野的兵力和气势都是绝对优势，是可以完成作战任务的，但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美军干涉，第二野战军投入渡江作战就很有必要了。因此，我军以第三野战军组成上海南京段的东路军，芜湖安庆段的中路军；第二野战军组成安庆九江段的西路军，突破长江防御。突破敌军长江防线后，由三野十兵团占江阴、无锡、苏州；九兵团主力则迁

回南京以南，指向上海；七兵团沿京杭国道，直插杭州；完成对南京的包围。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出徽州，沿浙赣路前进，保障三野侧翼，其余部队摆在浙赣路沿线。意图是，万一发生美国武装干涉，我军有足够力量对付它。突破长江天险，我所在的十兵团担负了重要任务。十兵团属东路军，在江阴段突破敌人江防，这是敌人防守的主要地段。即使渡江顺利，占领滩头阵地，也可能要遭到敌军的東西夹击。作为兵团司令员，我感到责任重大，不仅是军事上的，更重要是政治上的。

第三野战军在渡江前夕组建兵团时，把原来的建制打乱了。十兵团的任务如此艰巨，三野领导机关决定，第二十三军（即陶勇同志任军长的原华野四纵）由七兵团拨归十兵团指挥。这就解除了我指挥上的不少顾虑，二十三军是华野主力，它的战斗作风我也比较了解。

### 紫石英号事件

帝国主义会不会进行武装干涉？这是全国人民也是全世界瞩目的问题。

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挑衅，党中央的军事上的部署已在上面说了。中国革命斗争不是孤立的，有个世界大局的问题，全局上要有敢于击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挑衅的气魄，局部上又要谨慎从事，尽可能地避免发生直

接的武装冲突。所以党中央命令我军：如果和帝国主义军事力量发生冲突，我们不要打第一炮、第一枪，不要挑起冲突。但是如果它们敢于先打第一炮、第一枪，就要坚决予以回击。

没有料到，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试探的，不是美帝国主义自己，却竟然是那个日趋没落的“大英帝国”。这个“帝国”曾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又在长江中横行霸道，曾炮轰过南京和万县。

四月二十日上午，英国海军舰只紫石英号、黑天鹅号、伴侣号、伦敦号与国民党军舰相伴，由东向西驶进我二十三军防区游弋。当晚，我中路军突破安庆芜湖线，渡江至繁昌、铜陵、荻港地区。二十一日下午，在我东路军渡江前，紫石英号、黑天鹅号等军舰竟然再次从长江上游向我战区驶来。

大约下午四点半钟，离渡江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二十三军军长陶勇同志来电话报告，就在我渡江地段对面江上二公里处，有二三艘兵舰，游弋不走，请示是否将其驱逐。

我接到电话后，开始以为是将要起义的国民党舰队，因为军委和总前委通报过，林遵将率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并规定了联络信号。我便打电话问：“这些军舰是不是挂的规定起义的联络信号旗？”陶勇同志说：“挂的是花花绿绿的旗”。并说：“这些军舰老在我们正面长江上

不走，妨碍我们渡江，有点不怀好意，是否把它打掉？”我考虑只有半个小时我十兵团就要启渡，事不宜迟，随即命令前沿观察所升起信号，警告外国军舰迅速离开我军防区。如果不听，就开炮赶走它！

榴炮六团接到命令后，就在前沿观察所升起信号，发起警告。

英国军舰没有任何反应。忽然，舰上人员都集中在舰尾上，炮口转向我军阵地，继续向前行驶。此时必须当机立断。既然你这样猖狂，渡江时间已近，不能再等待了！

“开炮！”

榴弹六团和部署在沿岸阵地上的炮兵都投入了炮战。长江上水柱突起，烟卷波涛。

黑天鹅号带着浓烟，溜了。紫石英号也被击中，在江上颠簸着。我军指战员伤亡达二百五十二人，团长邓若波也中弹身亡……

正在这时，野司来电话查询：“你们怎么同英国军舰打起来，谁先开的炮？”我立即回答：“英国军舰先开的炮。”电话搁下后，我马上摇通了陶勇同志的电话。我说：

“江面上的军舰是英国军舰，我们把英国军舰打伤了，上面来查情况哩。”陶勇同志怒气冲冲地说：“有什么好查的！我最好的团长邓若波都给他们打死了！文武双全的人才哪……”他说不下去了。我和陶勇订了“攻守同盟”，都

说英国人先开炮。解放后我俩谈起这事，只有一笑了之。

当晚，我兵团胜利渡过长江。第二天，我军向常州无锡前进。就在这时，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布朗特率领英国军舰开来报复，把我们后勤船只搅乱了。我军又以猛烈炮火予以迎头痛击，将其击退。我手头有一本《渡江一日》，是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一九五〇年编印的。其中有一篇《长江线上的炮兵》，作者乔人。有这么一段描写，紫石英号瘫痪在镇江江面上的第二天，“……上午，有两艘英舰从下游上驶，搜索前进，到我阵地左侧时，停泊在江面窥探二小时，鬼鬼祟祟，看样子即知道是企图报复……敌旋即调动炮位，对着我阵地，降落英旗，开始发炮！于是一场恶战开始了！……从炮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炮弹在敌舰上开花，两门炮被打翻了，炮手飞得不知去向，舰身穿了十几个窟窿，夹着尾巴歪歪斜斜的逃走了。炮手们说：‘你再来跟我们试试看！’”

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的军舰在中国横行霸道了整整一个世纪，终于撞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拳之下，他们这时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义和团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也没有料到，再过十年，还要在台湾海峡，也是用大炮来告诉美国人这个道理。这是后话了。

英国皇家海军发表了闪烁其辞的“简单声明”，拐弯抹角地说是“受到敌对部队攻击”。英国舰上人员亡四十二人，伤六十六人，其中包括舰长卡格列。远东舰队第



二指挥官、皇家海军中将马登的军服也被弹片撕破了。这一下，伦敦热闹了。出名的反共顽固头子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要求美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实行武力的报复”。英国首相艾德礼胡说什么：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江。还撒谎说：人民解放军“准备让紫石英号开往南京，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该舰要协助人民解放军渡江。”四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斥责了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狂妄，揭露了艾德礼的谎言，严正提出：“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上、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现在看来，我们虽然炮击的是英国军舰，打中的却是帝国主义分子的神经中枢，使它们终于不敢轻举妄动！正如《毛泽东选集》为《声明》作的题解所说：“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并且表明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意义是很大的。

帝国主义分子是什么手段都做得出来的。英国当局经由紫石英号舰长同我军代表多次谈判，要求放行。而在谈判期间，紫石英号军舰于七月三十日夜，乘江陵解放号客轮经过镇江下驶，竟然强行靠近该轮与之并行，掩护逃跑。当我军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军舰悍然开

炮射击，并撞沉木船多只，逃出长江。

## 江阴要塞起义

关于江阴要塞起义有各种不同说法。评价历史，应该实事求是，江阴要塞起义是历史事实，不能否认。但也不能说，没有江阴要塞起义，我军就不能从江阴渡过长江。我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到繁昌、铜陵、荻港地区。这对于我东路军的渡江作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而江阴要塞起义，使我东路军能顺利渡江、迅速登陆，并夺取了江阴要塞，打开了国民党军长江下游防线的重大缺口。

江阴这地方，是长江下游江面最窄的地方，仅一千五百米，素有“江防门户”之称。这里又是向南、向东发展的有利地区，倚江据险，宋朝南渡后置营寨于城北，设军州，为战守要地；明代是防歼倭寇的战场；鸦片战争后向德国克虏伯工厂购置大炮，建立炮台。江阴要塞是有名的，历史上就是作为重镇防守的。日军侵华时，也是由无锡从陆地迂回夺取的，因为从江面正面夺取比较困难。我军渡江时，这里是国民党军的防守重点，不是它的薄弱点。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重要军事头目接二连三地前来视察；四月十七日，李延年还陪同美军顾问团的头目前来出谋划策以加强防守。

当时我军为什么要选择这里为突破口呢？选东面一些，江面太宽，部队不易于拂晓前登陆建立滩头阵地；选在西面，靠南京又近。从地理位置来说，最理想的是江阴。要塞掌握在敌人手里，对我军渡江极为不利；但一旦我军掌握这个要塞，对我军整个战役都有积极作用。好就好在这里。

我到泰州以后，华中工委立即把江阴要塞的地下组织的关系交给我。一九四七年初，华中工委就通过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同志，与他的两个弟弟：江阴要塞炮兵总台长唐秉琳、工兵营长唐秉煜、表弟守备总队长吴广文等建立了联系，成立了党小组，并在江阴城内建立了联络站，工作很有基础。我把掌握这一关系的华东局社会部情报科长王激明，接来兵团部和韦国清政委一起听取了汇报。王激明同志做这一工作是比较有经验的，在济南吴化文起义的工作中搞得不错。我交代他：你和江阴要塞党支部的基本任务是，保持六十里防区，控制三到四个港口，不打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我和韦国清政委向他强调说：完成这项任务就是渡江的第一功，其它事情我们办。在方法上，注意要他们掌握几个连长、排长，利用他们的封建关系掌握士兵。口号可以提得灰色些，跟这些人讲：要打一起打，要逃一起逃，要当俘虏大家一起当。不要因为胜利在望，麻痹大意，暴露自己，以致前功尽弃。在领导关系上，通知要

塞地下党同志，起义工作由王激明同志管理，由王对兵团党委负责。王激明建议：是否派些干部去，把要塞的关键部门直接掌握起来。我们研究后，由二十九军派团长李干，营教导员徐以逊、陆德荣、王刚四位同志去，由政治交通员吴铭同志带去江阴，由唐秉琳等作了具体安排。

四月十五日，王激明来信报告了安排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我亲笔复了信：

激明同志：来信收到，我军行动已推迟到本月二十日以后，可告吴铭。因此，你暂不必南去，再等三四天以后去更好。同意吴铭来信所规定的联络信号，信号是要在行动时候采用，以免暴露。请告吴铭他们，不要心急，不要松懈，按我们前天所谈的告诉他去做。保持交通关系最要紧，但在这几天内，如无特殊情况，交通不要太频繁，可适当减少一些。此致  
布礼！

叶 飞 1949. 4. 15

这封信，居然保存了三十多年。当调查江阴要塞起义这段历史时，他们拿出来，要我作证明。现照录如上，亦可作一佐证。

四月十八日晚，王激明由江南工委护送到江阴要塞，做好了起义的准备。二十一日零时刚过，我渡江先头部队即在江阴要塞炮台火力范围内的长山北麓登陆，在接应同志的带领下，迅速击溃了敌二十一军一部，控制了长山。另一路先头部队也在肖山顺利登陆。二时，要塞地下党组织逮捕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

那天晚上，我们从报话机里听到要塞炮台和八圩港驻敌二十一军争吵不休，八圩港之敌骂要塞炮兵不打“共军”，反把他们打得鬼哭神嚎，连联络的电话线杆都打断了。我一听，心里说：“行了！”果然，我军渡江，江阴要塞在总台长唐秉琳、流动炮团工长王德容、守备总队长李云葵、吴广文率领下宣布起义，调转炮口，配合我军作战。

我军渡江这么顺利，与江阴要塞起义有很大关系。第二天，英国旗舰向我们报复，当时我们重炮还没有过江，怎么办？就是靠要塞的大炮打的。这里的炮射程远，威力大。当然，如果没有江阴要塞起义，我们也可以从江阴渡江的，但不可能那么顺利渡江，可能要付出重大伤亡，这是事实。所以，江阴要塞起义是有功的。

## 长江果真是天堑吗

百万雄师过大江，确是千古壮举。中国历史上渡江

作战惨败的教训是不少的。所以，自从《南史·孔范传》出现“长江天堑，自古限隔”的字句以后，长江就和天堑连在一起了。人们所熟知的赤壁之战，曹操丧师八十三万，片甲不归，是令兵家丧胆的战例。

曹操为什么大败？人所熟知的的原因是：一是北兵不善水战；二是不习惯南方潮湿天气，“瘟疫”流行；三是中了反间计，杀了知水战的荆州降将蔡瑁、张允；四是上了庞统的大当，利用北兵不惯船上生活，把船只钉在一起，无法机动；五是中了苦肉计，黄盖带来了一片大火……干了一连串的傻事，以致一败涂地。

赤壁之战是公元二〇八年，距我军渡江作战已经一千七百多年了，然而我军使用的渡江工具仍然是曹操那个时候的木船。很巧合，曹操在巢湖练水军，横槊赋诗，不可一世，而我军也有一部分是在巢湖练兵。那么，人民解放军为什么没有重蹈曹操的覆辙呢？

渡江，首要的当然是船只。我到十兵团的集结地，不仅地方干部熟悉，连老百姓也熟悉。动员船只就有很大的方便。据当年三野管后勤的副参谋长刘瑞龙同志写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船只问题。不算安徽地区，单是苏北就调集了八千只船，其中渡江船二千六百只，运粮船一千二百只，随军弹药船一千一百只，渡江前内河运输船二千三百只，机动船八百只。

高邮帮、兴化帮的船只纷纷向江边驶来，和泰州、

靖江的船只只会合在一起。船工都是长江上乘风破浪的老把式。但是要把这样成千成百条船编成一支整齐划一的队伍，显然是很艰巨的。那些水手保持历代相传的旧习惯，乱吆乱喝。至于我军那些生长在北国的解放军战士怎样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上沉着作战也是难题。骡马牲口、火炮、弹药如何运过长江？木船如何对付兵舰？怎样掌握潮汛？怎么在逆风逆水中继续前进？船只前进中怎样才能射击命中？……

我们的渡船工具和曹操时代比进步不大，但军队和人民却不可同日而语了。经过训练和演习，船工们改变了面貌，船编了号，选出了班排长。一声集中哨子，船只立即一艘艘箭似的从小港里驶了出来，静悄悄地排成队伍。一声向后转，几百条船随着篙子的点动，一下子都旋了过来。随着前进哨子，船队又迅速向前疾驶。而战士们呢，非但学会了游泳，学到了撑船打篙，还研究了水上浮动打枪打炮的诀窍，发明了土造浮水衣、救生器……

渡江作战时，我先头团二连在江心敌人密集的火网中，船工张玉香的后背中弹负伤。他的父亲张校华说：“儿呀，你忍着，同志们生命全在这条船上，越等越糟。”他拼命划船，奔到了全连的前面。四连一班的船上，老船工胡文安和他的儿子互相鼓励：“越靠岸越要划得快一些，送大军过江就是这一刻了！”当离岸四五百米时，

敌人的重机枪和六〇炮开火了，水花溅上船来，浸透了水。胡文安沉不住气了，手里的浆慢下来。战士徐长姜立刻代替他划浆，而胡文安的儿子却一直勇敢的立在船头，更用劲的挥舞着木浆，船象箭一样的从敌人重机枪火力的封锁下前进……

长江天堑，也是可以飞渡的。正象有位同志在渡江作战报道中讲的：我军是人民用双手托着渡过长江的！

木船渡江，必须有风。历史上有借东风的故事，把诸葛亮写得神乎其神，向老天爷借来东风，火烧曹兵八十三万。渡江战役中，盼风风到，也有“天助我也”的幸运事。记得规定启渡时间是下午五点半，但到了四点多，江面上仍是没有一点风，这可把我急坏了，也把全体指战员急坏了。真有巧事，四点一刻刚过去，起风了，而且呼呼地刮了起来，指挥部里所有人都跑到外面让风吹着，当时我们那个高兴劲呀，简直难以用文字来形容，真可谓“天助我也”！

渡江时，陈、粟司令员给我个别交代任务，要我跟着第一梯队船登陆，担任先头军军长的角色。因为作战地段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易遭东西夹击，所以要我随第一梯队军行动，目的是让我直接掌握情况，实施强有力的指挥。实际上，我不但在第一梯队军，而且一直跑到第一梯队师的位置。当时我对参谋长不很了解，曾建议政委韦国清同志留在兵团部，随后跟进。但韦国清同



志不愿留在兵团部，表示要跟我一起行动。我当然不能不同意他的意见。

渡江后，我们抢占要点，实施远距离包围。不能说江防敌军没有反击，我当时指挥四个军，是有对付国民党军反击的准备的。但是敌人的反击只能称为：“不是反击的反击”。跟我们在江北打仗大不一样，敌人战斗力很弱。真是士无斗志，不堪一击！我们拂晓前登陆，上午十时左右就插到宁沪铁路线。常州守敌名义上是一个军，是敌人准备在纵深的机动反击部队。我军在江阴渡江段登陆后，该军向我登陆部队实施反击，被我二十三军击溃，一路追击，越过奔牛，直捣湖州。二十九军占领无锡、苏州。二十八军占领常熟向东警戒。三十一军配合二十三军向湖州猛进。我中路军、西路军占芜湖、宣城、广德等地。南京成了口袋底，李宗仁仓皇离去，我八兵团三十五军自浦口进入南京城。

南京，历史上的打法，都不是直接攻打，象这次一样，一包抄，不打自溃。我们占领南京，就是这样打的，垂手而得。南京的解放，事实上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

如果说，渡江作战中我有什么插曲，那么我随第一梯队渡江没有随带电台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插曲。我上了船才发现身边只带了一个警卫排，电台都留在兵团部了。我有点恼火，即使是轻装，电台不带是不行的，参谋机

关连这件事也没安排好，可见新建机关的工作还没有走上轨道。一路顺风，拂晓五点多钟到达长江南岸登陆。我预定的位置是二十八军军部登陆后占领的一个村子，我们进村前，天尚未亮。我和韦国清同志在村外路旁休息，先让一个参谋去联络，这个同志叫黄云，绰号“小广东”，很机灵。他进村后问哨兵，发现是国民党军的哨兵，三言两语一问，他估计可能是国民党军的团部，便急中生智说：“师长到”他把国民党军的哨兵带来见我。我看黄云回来，便问：“联络上没有？二十八军军长怎么没来？”黄云说：“来了。”我一看是个国民党兵，十分诧异。审问了这个哨兵，才知道二十八军军部还没有占领这个村子，这里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团。好险！如果我们糊里糊涂进村，岂不要当俘虏了？不当俘虏也要被打得稀里哗啦！于是我带着大家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走出一里路，才找到二十八军的先头登陆部队。

兵团部随第二梯队渡江。当时，兵团部由参谋长率领已经启渡了。江上突然发生情况，有人打起谣风来，说是国民党军舰封锁了长江，如果渡江，非给轰沉不可……兵团第二梯队缩了回去。其实，这是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时，有几艘军舰的反动军官，不愿弃暗投明，欺骗士兵，开军舰逃向吴淞口。待情况查明，天已大亮，等到第二天晚上，兵团部才渡过江来。

由于兵团部没有及时跟进，使我与总部失去联络整

整一天。这可把总部急坏了，不晓得我到哪里去了，部队进展情况也不明。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故！事后，陈老总查明问我：“你怎么搞的？整天不与我联系，你跑到哪里去啦？”我只好搪塞说：“电台和兵团部在第二梯队过江耽误了。”

渡江战役共歼敌十四万三千余人，取得飞渡天堑的伟大胜利。中央贺电说：“全国欢腾，环球鼓舞。”“国民党反动派恶贯满盈，既发动反革命内战于前，又拒绝和平协定于后，自以为长江天堑可以限制人民解放军前进。”当然，中央也提出了新的任务：“同心协力，共同为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解放全国人民，建立统一的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 第三十六章 解放上海之战

### 解放上海的问题

第二、第三两大野战军百万雄师胜利地进行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杭州，控制了沪宁铁路、浙赣铁路、长江三角洲地区之后，我军态势是：第七兵团在杭州，第八兵团在南京，第九兵团在松江地区，第十兵团在苏州、无锡、常熟地区集结；二野主力则集结于浙赣路。当时没有乘敌人混乱之时，立即进攻上海，而是休整了一个月之后，才发起解放上海战役。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是现在研究和探讨解放上海之战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解放上海之战，主要已不是军事上的问题，因为上海这时已成孤岛，而我军已占绝对优势。为什么需要经过一个月之后才发起上海战役呢？主要是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是国际上的问题，要作充分准备！部队疲劳，调整建制，补充粮弹，也需要时日，那是次要的。

第一，解放上海，会不会引起美帝国主义的介入，实行直接武装干涉呢？

这个危险的确是存在的。蒋介石是准备在上海进行最后赌博，拉美国下水。上海是我国的第一大城市，“冒险家的乐园”，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据点。我军渡江以前，即由所谓“海上闻人”杜月笙出面，与“绅商各界”搞了一个上海“国际化”运动。他们“号召”中外各界“有识之士”，一起努力，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地方秩序则暂由外国军队“维持”。美方的喉舌《大美晚报》也曾以“国际化的上海”为题，吞吞吐吐，试探人民意向。徐铸成在《杜月笙正传》一书中写道：“那时，司徒雷登曾来上海，杜月笙与潘公展等一起开会，曾商定了一个方案，以市议会的名义，发起一个上海人民‘自救救国’运动”。蒋介石还把杜月笙、潘公展召去面授机宜。杜、潘在中汇大楼邀宴美、英巨商及“各界领袖”征集意见。随后，成立“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打算成立十万人的“上海地方自卫队”。这个所谓“自卫队”即“商团”，也就是旧上海租界里的“万国商团”。“万国商团”原是各洋行的外国人组织的武装，以后中国买办把洋行中国职员及一部分买办子弟组成华人队，在辛亥革命、五卅惨案、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时，都是协助外国驻军监视和镇压中国居民的工具。很清楚，这是蒋介石企图拉出美国来“保卫”“国际化”

的上海，拖它下水，“自救救国”无非是一个幌子。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所谓“国际化”只剩黄粱一梦。渡江战役后，蒋介石从幕后又走到了幕前，五月初他从奉化赶到上海，在团长以上官长会议上“训词”：不出三个月的时间，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定爆发，固守上海三个月是不成问题的。以后在复兴岛召开的会议上讲得更为露骨：“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一个准备时间，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六个月”。汤恩伯也说：“总裁指示，只要我们能将上海保住半年，美国就会来直接援助我们，那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就可整个解决国际共产党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就可以一起解决了。”国民党上层普遍谈论：“老头子一定是跟美国人商量好了，只要美国出面就有办法。”这决不是幻想，那时，美国和英、法等国的军舰正在吴淞口前，大炮的炮衣都是卸下的……

因此，解放上海时，必须把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估计在内。所以，解放上海之战，从军事上说，主要不只是对付国民党军坚固的永久设防城市的问题，还必须要有对付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的准备。上海之战的复杂性、严重性、艰巨性首先在于此。

第二，解放上海，必须完整保存这个城市，不致受到破坏。

毛主席指示我们：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城，而且要做到政治进城。上海，正象中共中央贺电中所讲：它是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所以，当蒋介石意识到这城市将回到人民手里的时候，他采取了两手：一是掠夺，二是破坏。据唐文所写《国民党统帅部关于京沪杭作战的决策和争吵》一文揭露：汤恩伯得到蒋介石手令，要他将约值三亿多银元的黄金、白银赶运台湾。据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经理处长郭旭的文章揭露，运去台湾的，有黄金一万一千多大条（每大条十两），白银三亿多两，银元几百万元。而更重要的，上海是中国工业的摇篮，现代的新兴的先进工业技术就集中在这里。所以蒋介石在撤离这个城市时，下命令毁灭这个城市。工兵已在发电厂、煤气厂、自来水厂……等处理好炸药，接好导火索，就等一声令下了。这个城市如能完整地保存下来对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十分有利的；如果破坏了，那将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如何使上海的工业、金融、商业、文化、科学的成就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已经是摆到我们的日程上了，这就不是单纯武装夺取的问题了。

因此，解放上海之战，摆在我们面前的最严重的问题，除了美帝直接武装干涉的危险之外，第二个问题就是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了。

第三，解放上海，必须把这个全国的第一大城市、

也是亚洲的第一大城市接收好、管理好。

我们能不能接收好、管理好上海这个远东最大的城市，国际舆论议论纷纷。陈毅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日丹阳的一次会议上说：上海“很复杂，诸如此类，我们都不大懂。我们不能自大，吹牛。上海一个月要烧二十万吨煤，六百万人这一张大口又要饭吃，要解决几百万人的粮、煤及生活问题。单是每天大小便问题不解决就不得了。每天的垃圾不解决，几天就堆成一座山……。我们会演戏唱歌，人家佩服。我们管理不好上海，就无法向老百姓说话……毛主席说，我们进上海是中国革命过一难关，它带着全国全世界性质。……同志们要懂得，我们进入京、沪后，全世界工人阶级、兄弟党都在注意。我们在上海、南京搞得不好，发出每一条消息他们都要欢呼，向我们祝贺。因为，这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世界革命有希望……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我们共产党人如果搞不好是会被人赶走的。共产党如果搞得不好，中国一定是共产党的”。接管，这就要靠上海地下党的努力。这些问题，中央和华东局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拿山东、江苏等解放区调运来了大批粮食、煤炭、棉花等物资。用上海资本家的行话来说，这是“一黑（煤）二白（粮、棉）”。当然，我们还有“一白一黄”（白银和黄金）以及“一黑”（枪杆子）作后盾。这方面的准备，此军事上的准备更重要，



当时驻在丹阳的三野总部就集中了我党的重要经济专家。曾山同志专门管这项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必须充分，所以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说，总前委和华东局在上海战役发起前一个月，最紧张最繁忙的准备工作都放在这里。

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一个月內紧张地进行，并大体就绪了，这才发起上海战役。

## 上海战役的作战部署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军胜利渡江，解放了南京、杭州及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之后，蒋军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八个军二十五个师约二十万人据守上海，企图凭借永久性设防工事，组织抵抗，防守上海，争取时间，抢运物资，掩护撤退，并阴谋拖美帝下水，实行武装干涉。其部署以第二十一、第五十一、第五十二、第五十四、第七十五、第一二三军约二十个师，防守黄浦江以西地区，其余部队防守黄浦江以东地区，另以海军和驻上海空军协同防守。

解放上海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如何接管好这个城市的准备工作都很充分，却疏忽了军事上的准备以及作战部署很不周密。战前，既未确定各部队作战任务，使各部队能作充分准备；临战，又没有召集参战部队首

长参加的作战会议，研讨作战方案，就下达了作战部署和作战命令。

解放上海的作战方案是首先攻占吴淞、高桥(浦东)，断敌海上退路，然后攻占上海市区。作战部署是以十兵团(缺一个军)为西路军，担任攻占吴淞的任务；以九兵团为东路军，将十兵团所属三十一军拨归九兵团指挥，担任攻占浦东高桥之任务。这个决策显然是高明的。但命令规定，西路军(十兵团)五月十二日由常熟出发，限十四日拂晓前到达吴淞口。并命令三十一军于同日攻占高桥。

常熟到吴淞口距离一百二十多公里，需要经过太仓，渡过浏河，经过嘉定、月浦、杨行、刘行永久性要塞设防地域，才能到达吴淞口。就是不打仗，强行军一天也只能走六七十公里。为什么命令西路军由常熟出发，限两日内到达吴淞口呢？这是因为轻信了情报，说是敌军准备起义，因而认为从常熟到吴淞口，不会有什么仗打。

我看了这个作战命令很有意见，就打电话给野司表示，西路军只有两个军(二十八军、二十九军)，既然又没有什么仗打，不必我去指挥，指定二十八军军长统一指挥就可以了。

粟裕同志知道我有意见，找我去面谈。我对先占吴淞、高桥，断敌海上逃路，然后攻占上海市区的部署是

没有不同意见的。二十九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没有经历过大战和硬仗恶战，宜在上海战役使用这个军，以后这种机会也不多了，使它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我也很赞同的。但是，攻占吴淞口，必须首先攻占浏河、月浦、国际电台区域，这是敌人上海设防的重点，是敌人设防的要塞地域，限定十兵团的两个军两天完成此任务，对此，我是有意见的。粟裕同志说：此仗虽然没有大问题，但是，上海是国际性城市，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介入，发生意外，还是你去指挥为好。这样，我就不好再提什么意见了，勉强接受了这个任务。

### 攻打永久性设防区域

我兵团正面之敌：一二三军（附警备第八师）守备外围各据点，五十二军担任主阵地狮子林、月浦、杨行、刘行的守备任务。一二三军军长是顾锡九，该军是在顾祝同的支持下，由江苏地方保安团队编成的。五十二军则是在辽沈战役中由营口登舰比较完整地逃来南方的，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所以汤恩伯把这个军配置于吴淞、宝山地段，以保障出海通道之安全。

从太仓到嘉定一线是敌一二三军三〇八师阵地。前几天的上海报纸上还刊登什么“太仓大捷”，还在上海市区搞了一个“祝捷”闹剧。

我二十九军部队从苏州出发那一天，阴沉沉的天空，还飘散蒙蒙细雨。正是江南梅雨时节，大地雾腾腾的，山青水秀的江南好象抹上了一层淡淡的黛色。真是一幅绝好的水乡烟雨图。

第二天拂晓，我二十九军顺利渡过浏河，攻下嘉定。

我有点犹疑了。过浏河时，确实没有仗打，十分顺利。国民党军队再不能打，也是有作战经验的部队，浏河这地方总该守呵。为什么不在浏河设防？这是上海第一道防线嘛！如果真是驻守上海的敌军要起义，为什么又没有人来联络呢？如果跟上面联系了，也总该给我们一个通知的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按野司作战命令的规定，第一天就到达嘉定城。兵团指挥部到嘉定后，我仍在想：如果真没有仗打，如果当面的敌军真的起义了，该多好！我宁愿我的顾虑是多余的！

第二天晚上，我二十九军投入两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以八十七师主力主攻刘行、月浦，八十六师保障其翼侧的安全。八十七师前进五公里，立即为敌军所阻。我命令他们由翼侧敌军接合部的间隙地带突击。八十六师二五八团攻击又受阻。我又命令二十九军从月浦和江边狮子林炮台之间的叶大村进行穿插，切断月浦和狮子林守敌的联系，仍然受阻。

二十九军被阻后，二十八军的攻击同样不顺利。特别是月浦前线，二十九军牺牲了团长吴文杰、政治部主任王里等同志，部队伤亡较大。激战到天明，战斗胶着，前进困难。我冷静下来，恍然大悟，敌人不但没有投降的征候，而且凭其永久性的设防要塞工事顽强抵抗。

那么，敌人要投降、要起义的情报有没有一点根据呢？作为一个历史问题来研究，还是有根据的。当时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准备弃暗投明，和汤恩伯联系，共举义旗。汤恩伯在读书求职时多次受陈仪的保荐和帮助，汤的发迹和飞黄腾达离不开陈仪，汤感恩戴德称陈为“恩师”，十分恭顺。谁知汤恩伯竟然出卖了陈仪，陈仪被扣，以后在台湾被杀害。

敌人在上海的防御工事是永久性的，是经过长时期修筑的。历史上，日本侵略军两次攻打上海，都是在刘行、月浦、杨行一线永久性设防地带受阻碰钉子，曾有过“三次换大将”的史实，后来都是侧翼登陆包抄后才得手的。应该说，我国的城市设防，最坚固的莫过于上海。汤恩伯在上海大肆吹嘘，说他在上海建成的工事是攻不破、摧不毁的“钢铁工事”，这也是有根据的。除掉抗日战争前修筑的外，日军占领时期的后期，为了防御美军的可能登陆，又改造和修筑了原有工事。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军事当局再次修筑了钢筋水泥的碉堡群。刘剑石、邹彬等写的《上海战役概述》（《文史资料选辑》

第66辑)说：“主阵地带前沿一般距市区三公里至六公里，在纵深内密布子母堡群，每堡至少半个班或一个班，有的为永久性的，有的为半永久性的，各主要碉堡群之间有交通壕连接；另外，主阵地带纵深内所有车站、飞机场、学校、工厂等重要处所及坚固建筑物，均构成抵抗据点。”事实确是如此。

原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同志在他的回忆录《淞沪攻坚战》中写道：

“十三日晚上，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担任主攻的二六〇团和助攻的二五三团立即发起攻击。战士们锐不可当地向月浦前沿阵地冲去。这时，隐蔽在树林、草堆和坟包中所有的敌堡，一齐开火，轻重机枪和冲锋枪疯狂地吼叫着。我们部队受到阻拦。清晨，在前沿阵地上，浓密的硝烟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几座中心敌堡仍然时断时续地在扫射着，战士们急得直咬牙，心中燃烧起复仇的火焰……”

“……在这个阵地中，敌人采取主堡与小堡相结合、暴露与隐蔽相结合的方式，以构成子母堡式的交叉火力网。主堡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四面有枪眼，胸、背墙厚达一米多，外面再铺盖枕木、积土和草皮，因此抗力很强。主堡周围是小堡，用土草堆顶，或利用土堆、田埂筑成，比较低矮，远看象坟包，很不容易察觉。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散堡，不规则地分布在阵地各处，以补主

堡火力的不足……副防御设施也很强，由外朝里一般有四道障碍……”

经过十三日晚至十四日拂晓对月浦、杨行的彻夜激战，不但正面攻击受阻，实行翼侧穿插亦不能得手，我军已进入敌人永久性设防的要塞地域，由狮子林、月浦、杨行、刘行到吴淞口距离六七十里，要在一天之内攻克这一要塞地域到达吴淞口，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我就决定放弃于十五日到达吴淞口的原定作战部署，决定采用近迫作业攻坚战术，逐段、逐点攻击，并将战况和我的部署意见报告野司。粟裕同志也同意我的意见，批准了我的部署，并增派生力军和特种兵纵队归我指挥，担任攻取敌永久性要塞设防地域之任务。野司逐次增加兵力，其实兵力再多也没有用处，因为每天只能逐点逐段，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进行攻击嘛！我就向粟裕同志建议，不必再增加兵力了，因为兵力再多也没有用处。

我军对月浦、杨行、刘行设防地带改为采用近迫作业攻坚战术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军每天每次攻击可以前进二三百米，伤亡也减少了。

五月中旬，一直是阴雨连绵。我军的进攻缓慢地，但是有成效地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榴弹炮、山炮、步兵平射炮……掩护步兵前进。步兵则送炸药包爆破碉堡工事，爬上敌堡掷手榴弹，用长竹竿挑着集束手榴弹炸敌堡枪眼……

“吃一堑，长一智”。吃了亏，改变战术，战役发展也就主动了。野司重新调整部署，决定提前从正面发起攻击。正面发起攻击的时机非常重要，过早和过迟都不行。早了，增加攻击的困难；迟了，敌人要破坏城市。时机只能选在敌人准备撤退、实施破坏之前。

二十四日，九兵团从正面发起攻击，二十军主力从高昌庙西渡黄浦江攻入市区，二十三军由龙华攻入市区，二十七军由徐家汇、梵皇渡之线攻入市区。二十五日清晨，我兵团二十九军攻占孙宅、南北曹宅，潮水般地向宝山、吴淞口方向席卷。浦东地区的我三十一军也于二十五日攻克高桥。

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把他的司令部搬上兵舰，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也把他们的指挥所迁到吴淞口要塞炮台上，作逃跑准备。二十六日，我军攻克大场、江湾、吴淞及苏州河以北市区，歼敌二十一军、一二三军大部，三十七军、五十二军一部，汤恩伯仓皇率五十四军及十二军、五十二军、七十五军余部由海上向舟山群岛方向逃跑，码头上乱作一团。二十七日，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二十一军及一二三军残部向我军投降。我军共歼敌十五万三千余人。

美国军舰逃到公海上，无可奈何地看着上海人民欢庆解放！



## 上海地下党的伟大功绩

上海战役有个很明显的特点，社会秩序迅速恢复。近处还有枪声，青年男女就站在马路旁观战了，也有人送茶水来了。特别是戴着红袖章的人民保安队员，报告敌情，做向导带路，帮助运伤员，协助捕俘和清查缴获物资……

我军进入市区，十分注意城市纪律。指挥所就在马路上找块空地方，安上电话机，架起电话线，部署战斗，指挥部队。干部战士都在马路上露宿，决不扰民。而且无畏的战士们，为了抢救人民，冒敌人炮火，宁愿牺牲自己。由此而取得了上海人民的信任。

上海能够被完整地接管，因素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地下党为此做了十分艰巨的工作。

上海地下党与中国革命斗争的关系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年轻的中国革命者一直是向往这里的。在一九二九年，我有幸到上海参加全国青工工作会议，想不到二十年后又率大军进入这个大城市。

上海的革命烈火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也是越燃越旺，是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灯塔。北平解放以后，党中央确定：由于我军力量强大，已占有绝对优势，因此上海解放不需要采取内部武装起义，而是要发动群众，

反对国民党破坏，保护工厂、学校、机关，配合解放军维持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接管城市。上海党根据中央指示和当时形势特点，开展反对破坏，反对屠杀，反对迁移，保护工厂，保护学校，保护机关，里应外合，配合解放的斗争。並普遍组织护厂队、纠察队、消防队，並在此基础上组织了秘密的人民保安队和宣传队。

我军进入上海市区，就有带着红臂章的人民保安队来取得联系，协助我们维持地方秩序，瓦解敌军，收缴零散敌军武器。而且由于他们的协助，人民群众帮助我们，解决了当时军民言语上的隔阂……

我兵团三十一军攻打高桥，高桥化工厂能够完整保存下来，是护厂队的功绩。上海电厂是敌人破坏的重要目标，也没有遭到破坏，市区激战几昼夜，始终灯火通明，这对稳定民心起了很大作用，真堪称奇迹。

上海战役可说是解放战争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确是取得了军政全胜。关于这次战役的回忆录已发表了不少。所以我在这里着重谈了这一战役艰巨的一面，不大顺利的一面。现在回顾起来，过江后胜利的形势发展太快，真所谓“横扫千军为卷席”，再加上还有接管城市的大量工作，在这种形势下，头脑发热，就容易犯错误。上海战役虽然没有出问题，但战前军事上过于乐观，疏忽大意，吃了苦头后才改正过来，这应当是吸取的教训。

# 解放福建和 福建前线的斗争

## 第三十七章 提前入闽 解放福州

### 新的决策

解放上海之战正打得热火朝天，中央和毛主席来了电令：提前入闽。任务交给了我十兵团。

为什么说提前入闽呢？因为中央原决定解放福建的任务是一九五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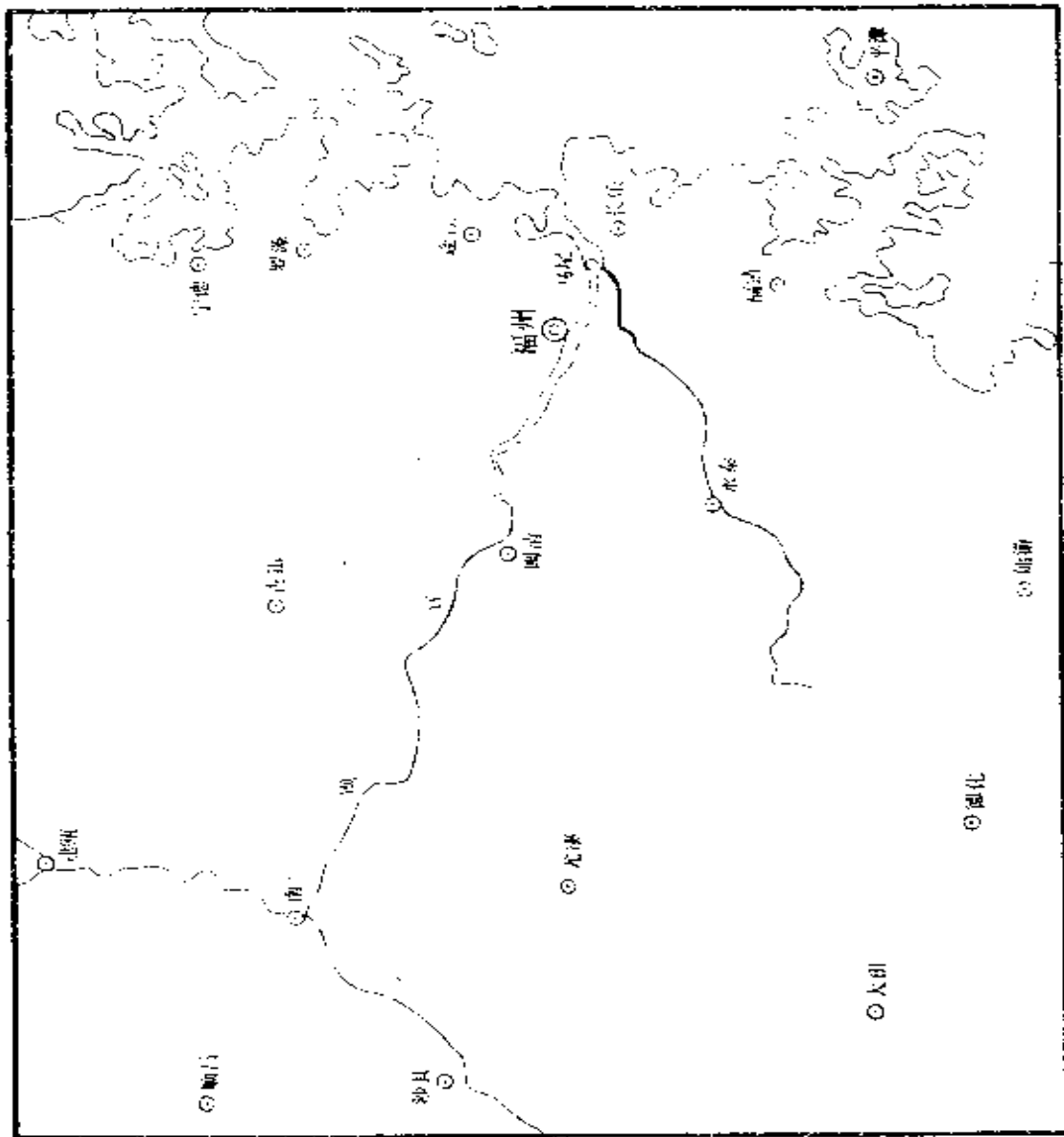
毛主席从来是高瞻远瞩，全局在胸的。对于解放全中国，早有通盘打算。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淮海大地战斗正酣，黄维兵团尚未歼灭；平津战役正在毛主席具体电令下包围北平，攻击天津，切断塘沽。而毛主席却告诉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同志，解放全中国的具体打算是：一九四九年五六月间进行渡江作战，三野、二

野协力经营东南：四野协同华北主力解决平津之敌后，则于八月渡长江，经营湖北南部、湖南全省及江西一部，第二步夺取两广：一野与华北主力夺取绥远、宁夏，再肃清兰州、潼关线上及其以南以北之敌，然后入川。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以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人的巨大胜利告捷；一月十四日解放天津，歼敌十三万余人。“中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一月十八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指出：“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〇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确定“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的省则是全部。”对福建来说，是相机占领靠近浙江的闽北一些地区，一九五〇年再解放全省。当时考虑，虽然“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基本地打倒了。”但是我军渡江占领京沪杭长江三角洲后，需要一段巩固时期。这里是蒋介石的老窝，江浙财阀的发源地，丢给我们的烂摊子要收拾起来，复苏起来，是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极大的精力的。然后，我们才能依靠长江三角洲这一富庶地区的人力物力，进军福建、两广、大西南，解放全中国。

而且指示中说得很清楚：“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

福州作战地区略图 附图五



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

中央对上述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毛主席、周总理看到形势发展比预想的快得多，渡江很顺利，全歼了南京地区的敌军，上海残敌逃掉不多，杭州顺手而得，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美帝国主义也没有敢动手。为了一鼓作气追歼土崩瓦解的国民党军，也为了最后消除美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危险，中央决定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

五月二十三日毛主席、中央军委电示三野：“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并电示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并指示，“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须的，有此准备即可能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并且指出：“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

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对一野、四野都作了相应的部署。

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决策，这是毛主席伟大的气魄和胆略，贯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要半途而废的思想。早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宣告了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一九四九年四月，胜利渡江解放南京后发表的，脍炙人口的诗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个思想就表达得很清楚了。当我在写作叙述当年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重读毛泽东同志这一著作及诗词，感到更为深刻和亲切。

## 入闽准备工作

五月二十七日中午，解放上海之战甫告结束，我十兵团就接到三野首长电示：未担任警备任务各军于战斗结束后撤至市郊休息，十兵团全部进行入闽准备。

兵团部及所属三个军随即集结于苏州、常熟、嘉兴一带休整，进行入闽的各项准备工作。

开始，三野司令部认为逃到福建的蒋军，都是残兵

败将，不会有大的战斗，入闽兵力的部署只准备使用十兵团的两个军。二三十年代我在厦门、福州做过秘密党的地下工作，又在闽东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对福建的情况我是熟悉的，我深感以两个军入闽兵力不足，因此，建议以十兵团全部三个军担负解放福州、厦门及福建全省的任务。华东局和野司同意了我的建议，决定以十兵团全部兵力入闽。并为防备在解放福州、厦门时美帝国主义的可能介入，进行军事干涉，以二野主力控制浙赣线，掩护十兵团遂行上述任务。

鉴于上海战役中十兵团伤亡较大，部队也相当疲劳，调整组织，配备干部，需要时日。加之入闽准备工作，政治动员，任务繁重。我又提出建议：部队休整一个月。当时，张鼎丞同志也认为入闽的接管工作，也需要时间进行筹措，赞同我的建议。华东局报党中央后，批准十兵团休整一个月。

党中央决定由张鼎丞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主持地方的工作。张老当时是华东局组织部长。他觉得经营福建的最大困难是干部力量不足。福建历来有“八闽”之称，也就是说，福建省从元代开始，就有建宁、延平、邵武、汀州、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八路或八府。这种长期沿用的行政区划是根据地形、交通、人口密度和经济情况形成的。全省共有八十多个县，福州是首府，厦门是对外的重要口岸，福、厦都是所谓五口通商城市。



因此，接管和经营福建省，需要有一个省级、两个市级、八个地区级、八十多个县级的党政领导班子和业务领导干部。当时张老手上只有由太岳、太行地区调集来的一套区党委、六套地委专署的四千多名干部。张老说，接管浙江有八千干部，我们去福建只有他们的一半，怎么行呢？这倒不是中央或华东局重浙轻闽，而是由于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的新的战略部署，很多工作就跟不上了。所以张老很赞成我建议的让部队休整一个月的要求，他可以做好调集干部等方面的准备。我又帮张老出主意解决干部问题，当时陈丕显同志任苏南区党委书记，通过他在苏南地区商调了两套市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又在上海、苏州吸收了几百知识青年，这样才有了五千余干部，组成福建省委及各级党政机构。后来有的人说什么当年入闽的南下干部太多了，外来的干部太多了，这只能说是对历史的无知。当年组织起这支干部队伍谈何容易！当然，南下干部与当地地下党干部之间曾经发生过一些矛盾，那时是带普遍性的问题。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非但是解放以后，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也是带普遍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里就专门论述过这一点。决不能天下打下来了，建设起来了，要把人家赶走了，这是“过河拆桥”。张鼎丞同志和我都是福建人，开始在福建搞革命的，可以说是本地干部，又是南下干部；又是军队

干部，就可以在这三者之间起调节作用。其实本地干部中间，这一地区与那一地区，这一部门与那一部门，又何尝没有矛盾。福建地下党和坚持武装斗争的干部较多，事实上大量的干部都妥善安排的。当时，省厅级领导干部不少是福建人。而福建人中又是闽西南人多，于是有些福州人讲怪话了，说是福州屏山的镇海楼大门向南开，闽南人得了风水，统治福建。这也是革命斗争的历史形成的，闽西南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得早，坚持革命斗争的时间长，参加革命斗争人多，干部也就出得多，应该客观地分析这些情况。

毛主席要我带部队回福建，早就有这个打算。我在回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往事时就提到一九四四年底南下浙西；解放战争初期、外线出击和组建一兵团南下等史实，要我去福建，因为我熟悉福建。同样，毛主席要张鼎丞同志去福建，外线出击时就有这个打算了。张老在福建影响很大，特别是闽西，老百姓把他叫“土地爷”的。

用人，组织干部队伍，这也是进军福建准备工作的关键。

## 冒 暑 进 军

这时，浙赣铁路已通车到上饶。第二野战军的杨勇

兵团驻在上饶，以一个师前出南平。六月上旬，我们先派二十九军参谋长梁灵光同志率领一个工兵营为先遣队，进抵建瓯，同当地党和游击队建立联系，了解情况，整修公路，筹措粮秣。古兵法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福建的情况“草”是不成问题的，粮的问题大。福建是个缺粮的省份，按正常年产量，一年缺粮三四个月，全靠外省调进补缺。十万大军入闽，粮食就是大问题了。当然，也有有利条件：二野已经解放南平，这是闽北重镇；而且山东、苏北的支前民工一直跟着部队打到福建，给我们极大支援。在这里，我以十分感激的心情，感谢山东、苏北老区人民给予我们的宝贵支援！张老提出“保证部队吃饱饭、打胜仗”的口号，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进军福建的最大困难是交通不便，武夷山、洞宫山、雁荡山、仙霞山、括苍山等高一千米以上，山峦连绵，道路崎岖，村庄分散，人烟稀少，仅有的几条公路也因多年失修，加上国民党军撤退时桥梁大部被破坏，都无法通车。河道也因水急，上石壅塞，大多不能利用，就是能利用的几条河道，船只载量也极小。

先遣队的任务是艰巨的。他们乘汽车出发，途经嘉兴、杭州、衢县到浦城。浦城以南公路被敌人破坏，改为步行，经水吉、建阳等地，于二十日左右抵达建瓯，与在福建坚持斗争的曾镜冰同志胜利会师。

在先遣队到达建瓯之后，我们收到梁灵光同志六月

十二日的电报，说：“有困难，可以克服。”六月十五日又收到先遣队的电报：“困难不少，问题不大。”梁灵光同志的电报，具体汇报了二野各部的位置和闽北游击队的情况，当时我军已控制闽北山区各小县的县城，而且闽北是我党长期坚持斗争的老区，有着长期斗争的光荣传统。

先遣队与曾镜冰等同志会师以后，六月底在建瓯县城广场召开庆祝会师大会，群情激昂，对人民群众支前情绪大大推进了一步。

曾镜冰同志是海南岛琼山县人。一九二七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一年进入中央苏区。一九三三年四月到闽北，以后在黄道同志领导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北上后，曾镜冰留下坚持斗争，一九三八年任福建省委书记，以后任闽浙赣省委书记，被选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以后解放战争时期，坚持武装斗争，任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在福建坚持了十几年斗争。会师后，他和当地其他领导同志听了梁灵光同志的汇报后，立即进行了研究和布置：黄垠禹同志配合后勤先遣组负责支前粮草工作，粘文华同志负责支前交通工作；苏华同志潜入福州收集敌情和做好接管福州的准备工作。曾镜冰同志亲自出任建瓯军管会主任。

七月二日，韦国清政委和我率十兵团部队从苏州、常熟、嘉兴等地，冒暑南进。

冒着炎夏向南方进军，确实艰苦，每天因中暑而非战斗减员的人数不少……

天气对于军事行动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过去说：六腊月不动兵。严寒和酷暑都是不利于军事行动的。但是，最不利的季节，出敌不意，却常常能收到意外的战果。何况这时的蒋家王朝已成丧家之犬，分别向台湾、广州、重庆逃窜，必须乘胜追击，勿使敌人喘息，为解放中国大陆而奋勇进军。

大军分两路入闽，部队从浙江嘉兴车站上火车，沿浙赣路车运西行，分别于浙江江山县和江西上饶下车。兵团部率二十八军、三十一军在江山下车后，经浦城长驱二百五十余公里，向建阳、建瓯进发；二十九军在上饶下车后，经崇安行程二百余里，于七月二十六日会合于建阳、建瓯和南平。为侦察宁海、温州方向敌军动向，保障东翼安全，另派出一个侦察营由金华下车后，经丽水、云和一线，行程三百四十公里，抵达福建寿宁、福安地区。

## 解放福州战役

全歼闽境残敌，策应各战场作战，当然是首歼福州地区之敌，尔后乘胜南进，解放漳（州）厦（门）。

我们从地下党和情报部门等几条渠道，搜集到驻守

福州的敌军情报。福建全境的敌军，共有十五万之众。其中龟缩在福州地区的有：福州绥靖公署、六兵团朱绍良、李延年所辖的二十五军、九十六军（位于城西北闽江西侧地区）、七十三军（位于福清及平潭岛）、七十四军（位于连江、琯头一线）、一〇六军（防守福州市区）等五个军十四个师六万余人。蒋介石企图坚守福州、厦门，以确保台湾。他还是那个战略意图，总想拖美国下水；也有人说，他想保住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反扑。朱绍良自知兵力不足，而且都是残兵败将，士气低落，战斗力很差，主张放弃福州，力主保住海上的退路。敌方对守不守福州有争论，蒋介石严令坚守福州，朱绍良不能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不能擅自撤守，但也没有派部队前出到古田。我也不占。古田成了缓冲地带。十兵团全部到达建阳、建瓯之线集结后，决定先攻取福州。

进攻福州的作战方案有两个。一是采取大迂回，断其陆上、海上退路，向南迂回，占领福州以南的福清、宏路，截断福厦公路，分割福州朱绍良兵团和厦门方向汤恩伯兵团之联系，截断福州之敌从福厦公路南逃的退路。执行这个方案困难较大，因为向南迂回的部队，要从尤溪出发，翻越百余公里崇山峻岭，然后从永泰钻出来，攻占东张，才能夺取福清、宏路。这一路全程二百多公里，山多，山高，没有公路，没有大路，只有山地

小径，不能携带大炮、山炮，只能轻装。第二个方案就是只向东迂回，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退路。两个方案相比，前者不但艰苦，而且也是一着险棋。险在哪里呢？担任攻占马尾任务的部队，只有二天路程；而担任攻占福清、宏路的部队，却要走五天，武器弹药不算，每人还要自带五天粮食，翻山越岭，天气酷热，长途跋涉，确实相当艰苦疲劳，但这是着险棋，险就险在疲惫之军，插入福州、泉州之间，可能遭到敌人南北夹击。如果采取第二方案，虽然比较稳妥，但由于没有大迂回占领福清、宏路，不能断敌陆上向南退路，即使追得再快，也不能顺利通过闽江桥，渡过乌龙江，可能变成赶鸭子，不能全歼敌人，福州之敌可能由陆路沿福厦公路向南逃去。所以我与张鼎丞、韦国清同志权衡再三，决心采取第一个方案，实行大迂回，在福州外围撒下一张大网，以求全歼福州之敌。

福州战役的作战部署：以三十一军为左路军，由古田出发，担任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逃路的任务，得手后即由马尾向福州攻击前进；以二十九军为右路军，由南平出发翻越沙县、永泰大山，担任攻占福清、宏路，截断福州朱绍良与厦门方向汤恩伯兵团之联系，断敌从陆上南逃之任务；以二十八军为中路军，担任由古田向福州正面攻占之任务。左路军于八月十三日晨向丹阳守敌施行攻击，十时占丹阳；继而向连江方向攻击，十六日

攻取连江城，歼敌七十四军一部、二十五军大部；继而攻下闽安、马尾，歼敌二十三师、二〇一师一部，完全控制闽江北岸，以炮火封锁闽江，断敌水上逃路。并即由马尾向西向福州攻击前进。右路军，由南平出发，翻越沙县、永泰大山，攻占福清、宏路，切断敌南逃陆路，并向南构筑工事，实施警戒。中路军，十六日下午，攻取福州外围的徐家村，勇猛逼近市区，由西郊西洪门向市区攻击。我三路军，密切配合协同动作，配合得很好。所以当我左路军由东向西攻击，中路军由西向东对福州发起总攻时，敌人即向闽江以南溃退。我右路二十九军已先敌占领阵地，迎头一兜，全歼在逃敌人。逃走的只有少数，共歼敌一个兵团部、五个军部、十四个师计五万余人，而我军伤亡不足五百人。我军于八月十七日占领福州。后来福州市大街命名为八·一七路以为纪念。可惜，只差半个小时，朱绍良、李延年乘飞机跑掉了。

实战证明，我军采取第一个大迂回的方案是正确的，如果采取第二方案，即不可能全歼敌人。福州战役的胜利，我军控制了福建中部，打开了局面，然后就可乘胜南下，续歼泉州、漳州、厦门地区敌人了。



## 第三十八章 渡海登陆的成功一战

### ——厦门战役

#### 挥师南下 解放闽南

福州战役的胜利，为迅速解放全省创造了有利条件。成立了福州市军管会，由韦国清同志担任主任，负责接管工作，我率兵团主力继续南下，肃清闽南漳泉地区之敌，尔后再向厦门、金门两岛进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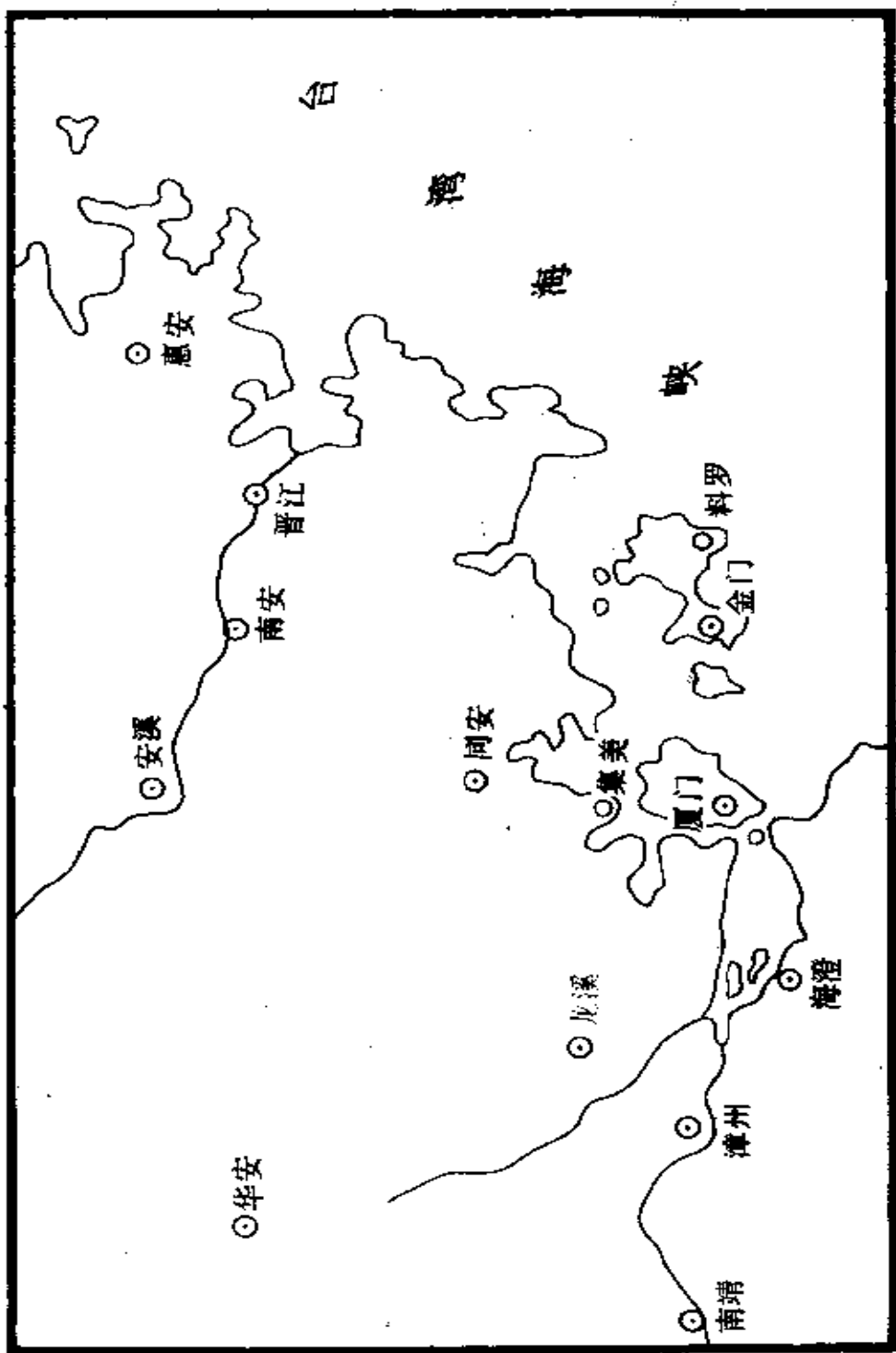
这时，蒋介石重新调整了指挥系统，撤销了福州绥署和第六兵团建制，由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八兵团、胡璉十二兵团和李良荣二十二兵团；并将兵力收缩防守厦门、金门、漳州及潮汕。显然，敌人企图凭借厦门海岛的有利地形及原有要塞的永久性工事来抵抗我军进攻，固守厦门作为台湾的屏障。

我兵团由福州挥师南下的目标，首先是解放闽南泉州、漳州地区。南下时，主力沿福厦公路行动，另一路

第二十八军两个师由海上南下。所以要派部队由海上走，一方面要渡海解放平潭岛，一方面是有意识锻炼部队适应海上作战。虽然部队经历了渡江作战，但渡江与渡海作战是两回事。我们部队都是“旱鸭子”，哪见过一望无际的大海，记得三十一军的后勤部长一上船就要呕吐。当然，这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也可以看到当时部队是不适应海上作战的。渡海作战，首先要有船只，这要感谢福建地下党组织和福建人民支援搜集船只。部队还必须有航海知识，否则就一点战斗力也没有！二十八军于九月十四日攻占大练岛，十六日攻占平潭岛，俘敌七十四军、七十三军六七千人。

八、九月份正值台风侵袭福建、浙江沿海的季节。正因为台风这一人类尚未征服的怪物，解放平潭时，部队登陆才两个团，突然遇到台风，刮了一整天，敌我双方的船只都被台风吹散，都不能增援。人们都熟知，一二八一年忽必烈出动十万之众攻打日本，被台风吞噬了这支骠悍的大军，弄得全军覆没。这就是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弘安之役”的著名战例。还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占领菲律宾的明多罗，由于强台风袭击，险遭全军覆没，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我们解放平潭虽然顺利，但我们的船只却被台风刮散了！这就使部队初步懂得了渡海作战掌握气象情况的重要。那时没有气象台，只能向老渔民请教。老渔民经验丰富，

漳厦厦作战区略图 附图六



一辈传授一辈，他们熟知台风来临的一些预兆。台风来袭前，一般比较闷热，晴天少云，视程良好，一般人看不出问题，他们却把辐辏状卷云叫做“扫帚云”、“马尾云”。谚曰：“马尾云，吹倒船。”台风近了，乌云滚滚，谚曰：“断虹现，天要变。”“静海起浪头，渔船快回头。”有时，大风和海浪强烈摩擦，引起“海啸”，谚曰：“东吼叫，西吼叫，台风来到鼻梁梢。”还有“海水发烫，船莫出港”，“海水发臭，台风随到。”……天虽有不测风云，人们还是能凭经验预先测知的！这些凝结着历代劳动人民智慧的老渔民，真是活的气象台！使部队懂得了不少潮汕气象知识。

我二十八军解放平潭以后，九月十七日又攻下大小庠岛、塘屿等地，完成了预定战斗任务。

解放泉州、漳州都没有什么大的战斗。我二十九军于九月十一日攻占湄州岛，十六日攻占南日岛，随后主力南下，十九日晨占领马巷，二十二日攻下集美，扫清了厦门外围之敌。我三十一军于十九日晨攻占长泰，另一路同时攻占同安、角尾、石尾，二十日渡过九龙江攻占海澄、浮宫，二十五日解放漳州，先后攻克岛美、城仔丙、东屿、高埔一线厦门外围阵地。这一阶段，共歼敌二万三千余，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形成了对金厦两岛三面包围的形势。这已是十月一日的前夜，总部一再催促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解

放厦门。

## 解放厦门的作战方案

厦门岛的面积是一百一十八平方公里，自然形成南北两半部。西、南、北三面临大陆，离大陆最近处一湮。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沙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本军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筑的要塞永久性工事。

厦门岛的西南是鼓浪屿，面积只有一点零九平方公里，距厦门岛约七百余米，距大陆最近处约一公里。四周多为礁石陡壁，能登陆地段较少。

守敌为汤恩伯集团五十五军全部，一六六师及六十八军从漳州方向逃来的余部，总兵力三万余人。具体部署是：以齐装满员的七十四师三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一八一师守东南面；以二十九师一个团和要塞守备总队，六十八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區；以二十九师两个团守鼓浪屿。在阵地编成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敷设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为了给困守厦门的官兵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用台湾来厦门“巡视”，还由台湾派来劳军慰问。汤恩伯、刘汝明、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

金汤”，“守三五年没有问题。”

虽然福州战役、泉、漳战役顺利，但我们对渡海作战攻取厦门这个要塞是认真对待，进行充分准备的，生怕在入闽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出问题。蒋介石严令汤恩伯死守厦门。过去日本人在厦门构筑的防御工作非常隐蔽，与海礁、岩石的颜色差不多，不易观察，非到近处不能发现。一点不夸张地说，我们从来还没有打过如此设防的岛屿。敌人离台湾又近，又有海空军，我军却没有海空掩护。虽然当时全国是势如破竹的形势，但我们认识到以木船渡海登陆攻取厦门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军完全没有经验，是不能轻敌的，因为这不是在大陆作战。

我们准备了近一个多月，主要是搞船。大军渡海登陆，需船数量很大，筹集不易。我二十八军虽有一些船，但在平潭岛吹散了大部分，只好在泉州湾继续搜集补充。二十九军也在泉州湾征集船只。三十一军则在九龙江征集。但大多数是江船，江船平底出海困难。因船只问题，我们不得不把攻击厦门、金门的时间推延了三次。

原定作战方案是厦门、金门同时攻击，这是兵团九月二十六日在泉州召开的作战会议所确定的。会上提出了：“金厦同取”、“先厦后金”和“先金后厦”三种方案。从来在军事上是金厦并称，金门厦门唇齿相依，相邻并

列，扼台湾与大陆海上交通要冲，紧紧拱卫闽南大陆，是东南海防要地。会议权衡了三种方案的利弊：

金厦并取——可以造成国民党指挥及兵力火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但征集船只问题一时难以解决；

先金后厦——可以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乘隙攻击；问题是厦门国民党军已有逃跑迹象，先攻金门，厦门的国民党军就有可能逃路，不能全歼；

先厦后金——当面敌情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易于奏效，但一旦厦门攻下，金门的国民党军可能逃跑，不可能全歼敌军。

权衡再三，大家认为：国民党军虽然在拼命作顽强固守的准备，但也显露其恐慌动摇的心理。比如，汤恩伯总部后方和厦门补给司令部移到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至金门总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至军舰上办公；技术兵团等撤往台湾。等等迹象来看，汤恩伯并没有坚守厦门的决心，应该趁敌军士气瓦解之际，一鼓作气，同时攻下金厦。会议并决定：由二十八军担任攻取金门，二十九军和三十一军两军担任攻取厦门的任务。

但是，十月上旬一检查，二十九军只有三个团的船只，三十一军有三个多团的船只，而二十八军只有一个多团的船只！时不我待，决心改变原定方案，先攻取厦

门，而后攻击金门。十月七日把这一决心电报野司，野司首长指示：“……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船阻援与载逃）牵制金门之敌，此案比较妥当……请你们依实情办理，自行决定之。”

我兵团决心先攻取厦门。确定以第三十一军及第二十九军攻取厦门，以第二十八军攻取大、小嶝岛，并作攻金门的准备，待攻占厦门后，再打金门。

十月十日，二十八军与二十九军一部先后渡海攻占大、小嶝岛，歼敌三个多团。十五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取厦门战斗。

### 佯攻鼓浪屿调动敌人

厦门之战是解放战争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作战，是在不宜于航海的台风季节里，进攻有重兵防守并有永久性工事的要塞岛屿。

厦门岛不大，长十三公里，宽十一公里。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没有空隙。

如何攻取厦门？

我判断敌人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渡海登陆，



佯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纵深机动部队南调援救，这是佯攻方向；主攻方向放在厦门岛北部高崎。首先渡海登陆强攻鼓浪屿，这是调动敌人很重要的一着棋，这是我又一次采取鲁南突围时使用十师首先东进以调动敌人向东，然后我主力突然向西突围的战法。当然，这是险着，我一生就用这两次。

具体作战部署是：以三十一军的九十一师并以九十三师一个加强团，担任佯攻鼓浪屿任务；以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八十六师和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在集美强大炮兵群的火力支援下，从西、北、东北登船，采取多箭头，在厦门北部高崎两侧三十里的正面登陆突破，夺取高崎滩头阵地，然后向厦门继续攻击。同时，把二十八军配置在大小嶝岛、莲河、围头沿海阵地，监视金门国民党军，并以炮火压制金门进行牵制。

十月十五日，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序幕。

鼓浪屿弹丸之地，由于风景优美如画，素有“海上花园”之称。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争相在这里划租界，开洋行，建教堂，设领事馆，成了“万国租界”。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军以两个团的兵力防守此处。

这天下午四时三十分，天气由晴转阴，东北风渐起，炮兵依原令提早三十分鐘开始破坏射击，但命中率不高。六时，我三十一军两个主攻团，九十一师二七一团（即

“济南第二团”和九十三师二七七团四个一梯队营的船队，扬帆鼓桨，从海沧湾、沙坛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战士和船工协力搏风击浪，一会儿波峰，一会儿浪谷，缆绳拉断，桅杆打折，力挽狂澜，奋勇前进。船队航至距岸二百米左右，鼓浪屿国民党守军开始以猛烈的火力拦阻。五十多岁的船工张绵娘，同丈夫和三个儿子同划两只船。在离岸一百米处，丈夫和小儿子中弹倒下，她顾不得上前去扶他们，接过船舵，一边继续驾船，一边鼓舞战士们奋勇杀敌。

九时三十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因为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飘回，大部分船只也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整个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杀伤。十一时后，九十一师组织三个二梯队营起渡，因为风浪大，大部分被飘回，只有两个排登陆上岸。尽管情况严重，突击部队的干部战士仍然奋力拼搏。在济南战役中荣获“青年战斗模范班”称号的二七一团一连八班，抵滩时遭敌火力严重杀伤，班长从华滋高喊口号，带领全班勇猛突击上陆。二七一团二连一个排单独于鼓浪屿西南面岩石下登岸后，在副团长田军指挥下，连续炸开鹿砦、铁丝网，突入滩头地堡。这时，七连二排也打上来，两个排合力继续向里突进。九十一师炮二连指导员赵世堂在抵滩时，船只被击沉，他率领十余名战士强行涉水登

陆，突入前沿阵地，直插日光岩西侧制高点，最后剩他一人，仍然坚持战斗。

战士们英勇顽强的战斗，果然造成了汤恩伯的判断错误，误认为鼓浪屿是我军的主攻方向，以为我军夺取鼓浪屿后，从鼓浪屿直攻厦门市，立即将他掌握的预备队一个师投入鼓浪屿，包围了我军登陆部队，战斗更为激烈。并将其控制于厦门腰部的机动部队南调。我们战士无愧于英雄称号，顽强战斗，直至全部壮烈捐躯，终于牵制了敌人，威慑了敌胆。战士们洒满鲜血的阵地，以后命名为：英雄烈士山。解放后，我每次去鼓浪屿，总要去凭吊一番，向烈士们表达敬意。

## 登陆夺取高崎滩头阵地

就在我军以有力一部强攻鼓浪屿之后，我二十九军两个师，三十一军一个师的先头登陆部队，于当日中午十二时，分别由北、西、东北登船起航，于拂晓前登陆夺取高崎滩头阵地。具体部署是：三十一军九十二师由西段的东渡至石湖山间登陆突破；二十九军八十五师由中段的高崎至西侧的石湖山和花屿间登陆突破；八十六师由东段的钟宅至花屿间登陆突破。东北风对我从厦门北面登陆却是有利的，船队顺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登陆突破地点，对高崎发起全

线攻击。

在西段，九十二师两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谁知这里是一片宽约一千米的淤泥滩，又正逢落潮，一脚踩下去，淤泥陷没膝盖。被国民党军发觉，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二七四团三营八连在副连长、排长和七、九班长负伤的紧要关头，八班长挺身而出，指挥全排剩下的十二名战士，攻下山腰地堡，坚守阵地。苦战四小时，打退敌军五次反扑，最后在兄弟连队策应下，夺取了山头，被授予“厦门登陆先锋排”的光荣称号。但是部队陷于淤泥，处于险境，幸好二十九军在岛两侧登陆成功，策应他们迅速通过泥滩，继续向寨上攻击。至十九日晨，九十二师有四个营胜利突破了石湖山、寨上一线，占领了前沿阵地。

在中段，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高崎是扼守厦门岛北部的重要卡口，国民党军在这里以重兵据守，自吹是“海上堡垒”。但是，我军主攻部队的船队趁夜暗秘密地，在高崎东侧的白莲尾、湖莲一线抵滩，先头班越过堑壕时，国民党守军才从酣睡中清醒过来。经过激战，至十六日晨六时，这个“海上堡垒”就土崩瓦解了。同时，另一主攻团也在高崎西侧的神山前沿抵滩，随即攻克神山。

在东段，八十六师在钟宅、下马一线上陆。这里多陡壁，经人工削修，高达三四丈。我两个营在夜色掩

护下，顺利登上陡壁，国民党军还以为是自己人哩！国民党军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进行反扑，苦战数小时，二五八团二营只剩下五十余人，仍然坚守海滩阵地。

十六日拂晓前，我兵团的突击部队在二十多里的进攻正面上，全线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厦门北半岛前沿一线的防御，并迅速地向周围扩张，沿岸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至当日上午九时，北半岛登陆即告成功，夺取并巩固了高崎这个最主要的滩头阵地。后续部队陆续登陆，在高崎集结。上午十一时，汤恩伯慌忙把已南调的机动部队北调向高崎反击，被我军一举击溃，我军即由高崎向厦门本岛追击，向纵深发展。

战后，被俘的国民党军七十四师中将师长李益智说，从我军进攻北半岛开始起渡直至抵滩登陆，国民党军一直被鼓浪屿方向的登陆所迷惑，放在岛腰部的机动部队，始则左顾右盼，继而南调增援鼓浪屿，北半岛就只有挨打了。他还说：没有想到你们从石湖山攻下来，从来没有想到你们这样打厦门。据说：一八四一年，英军进犯厦门，是从沙坡尾一线登陆；一九三八年，日军侵占厦门，是从五通道、浦口一线登陆；而解放军却选择钟宅至石湖山多泥滩多陡岸地段作为主攻方向，实出他们意料之外。

## 歼敌海滩

我登陆部队击溃敌人反扑之后，士气旺盛，不顾疲劳，乘胜猛插纵深，抢占要点，后续部队争先恐后，源源不断地从各突破口上陆。十六日下午，推进到岛腰的仙洞山、松柏山、园山和薛岭山一线。

这一线山头是南北半岛的天然屏障。抢占这一线山头，就控制整个北半岛，并可以以此作依托，向南推进。

位于中段的松柏山，是卡住厦门南北交通的咽喉。午后至黄昏，汤恩伯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向我反扑，即被我军击溃，敌二二二团团团长当场毙命。最后，特务头子、厦门警备司令毛森把他的特务营用卡车运载，急速赶来松柏山，进入山口后，我军将其截住，未等他们跳下卡车，即将其全歼。

十六日黄昏，被我击溃的国民党军狼狈不堪的向南溃退。我们的部队虽很疲劳，但抓紧时间喝了水，吃了干粮，一见敌人垮了，就象下山虎一样，勇猛追击逃敌。

汤恩伯知大势已去，带了一部分人逃向台湾，用报话机直接呼叫兵舰放下小艇接应。这时，适逢退潮，艇只难以靠岸，急得他在海滩上团团转，直跺脚。这情况，

我们从监听的报话机中收到了，听得非常清楚。我也使用报话机，命令追击部队迅速向厦门港追击，活捉汤恩伯。但是我们追击部队只顾追击敌人，不向后方联络，报话机呼叫数次一直叫不通。汤恩伯在海滩上足足停了一个小时才喊到小艇，夺路而逃。只是由于我军在追击中不注意通讯联络的毛病，被汤恩伯逃掉了，真是可惜！

十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战斗结束，厦门岛和鼓浪屿全部解放，宣告了十六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列强任意蹂躏厦门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驰名中外的“海上公园”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我也回到青少年时代上学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故土。

漳厦战役自九月十六日解放平潭岛开始，至厦门解放，计一个月整，共歼敌一个兵团部、一个要塞司令部、二个军部、七个师及其它部队，共五万一千余人。

## 第三十九章 金门失利

### 金门战斗准备工作中的失策

刚解放的厦门，象所有刚解放的大中城市一样，乱麻一团。厦门市委无从措手，二十万人的供应问题很突出。由于闽南地区人多地少，当时全年收成粮食只能维持四五个月，本来就十分紧缺。开春以来，六七万国民党军溃退到泉、漳、厦，横征暴敛，更加缺粮少草，贫苦百姓连糠菜也吃不上。这地区刚得解放，残匪还没有肃清，社会秩序还不稳定。我们虽已建立地、县政权，刚刚挂出牌子，一时还很难发挥作用，自顾不暇，难以支援厦门。何况厦门市委也无权指挥泉州、漳州两个地委。“民以食为天”，厦门存粮匮乏，粮食又运不来，接济不上，吃不上饭，人心不稳。特别是燃料更成问题，甚至出现了拆地板当柴烧的现象。情况的确严重，我只好应厦门市委的要求，把兵团指挥所由同安移驻厦门，主持接管工作。当时燃眉之急是解决粮食、燃料问题。我



责成兵团后勤部在十月底前筹措大米四百万斤、柴草六百万斤，保证部队和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并通知泉州、漳州两地委全力支援厦门。

事后表明金门尚未解放之时，我即将兵团部移驻厦门，这是一个失策，因为这影响了解放金门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如果派刘培善同志去厦门协助市委主持接管工作，我和兵团部仍驻同安，掌握全局，两方面就可以兼顾了。我为什么发生这个失误呢？这是因为轻视了金门，认为金门没有什么工事，金门守敌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即李良荣兵团，实际只有两万多人，而且都是残兵败将；厦门是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汤恩伯集团，兵力充足，已被攻克了，则认为攻取金门问题不大。厦门是通商口岸，如果接管工作不搞好，发生混乱，影响很大，对海外都有影响。所以我才做出将兵团指挥部移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的决定，而把解放金门的任务交给二十八军执行，本来预定作战方案也是由该军担任攻取金门的任务的。

二十八军部署于莲河、大嶝岛、小嶝岛、石井一线，进行攻击金门的准备工作。该军是山东部队，没有海岛登陆作战经验。福州战役结束后，我兵团南下时，有意让这支部队受些海上航行作战的锻炼，由海上进军，首先攻占福州以南的平潭岛等沿海岛屿。二十八军平潭登陆作战比较顺利。平潭岛上有我党领导的游击队，五月

间曾一度攻入平潭县城，群众条件较好，登陆部队有游击队员带路，登陆顺利是有特殊条件的。二十八军于九月十二日开始发起解放平潭的登陆作战，首先攻占平潭外围的大、小练岛、草屿，十五日晚总攻平潭本岛。平潭敌守军一个师，我军登陆后就把敌人打垮，大部分敌军被我俘虏，只有一个团守在一个小岛上。第二天，台风就来了，我军的船只都刮散了，好在敌人的船只也被刮散了。我军后续部队虽然上不去，但是敌人也无法增援。我军登陆的部队已有一个师部、二个团，终于全歼守敌。二十八军这次登陆作战前后，都没有遭到敌机轰炸。本来这一仗的经验教训还是不少的，但是打了胜仗后，就不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了。

当时在沿海登陆作战，关键在于船只，没有船只，部队根本就无法渡海登陆作战。这个经验在渡江作战时就有了，但是，渡海作战和渡江作战毕竟不同，例如台风和潮汐的问题，我们当时没有这个经验，后来吃了大亏。

我军占领了泉州、漳州之后，三十一军位于漳州，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位于泉州，分配了三个军征集船只的任务，准备渡海攻取厦门、金门。预定作战方案是同时在厦门、金门登陆，二十九军、三十一军两军攻取厦门，二十八军攻取金门。我军由福州南下是分海陆两路进军的，二十八军取道福州、泉州沿海，走海路南下。该

军在攻占平潭时，就已在福州搜集了不少船只，但是，由于台风侵袭，因此失散了大部分船只，当到达泉州湾集结时，船只已不多了，我即令该军在泉州湾征集船只补充，以备渡海登陆作战之用。三十一军在漳州征集船只。二十九军因位于泉州、同安之线，所以也在泉州湾征集船只。二十八、二十九两军在泉州湾争相征集，受了很大影响，进展迟缓。由于船只不够使用，因而渡海作战时间一延再延。直到二十九、三十一两军船只已搜集差不多了，可以启渡登陆作战了，二十八军船只还没有征集好，只好决定先攻取厦门，待二十八军准备好船只，再攻击金门。

我军由福州南下时，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同志、军政治委员陈美藻同志都因病留在福州治疗休养，因此二十八军只由副军长和军政治部主任负责指挥。我在离开同安进入厦门时，专门找了这两位同志来兵团指挥所交代攻击金门的任务。我向他们详细介绍了登陆作战解放厦门的经验教训，提醒他们要注意敌机轰炸船只，船只要疏散、伪装、隐蔽；告诉他们，登陆作战胜败的关键在于首先登陆攻占滩头阵地，然后迅速构筑工事，准备击破敌人反扑，巩固登陆滩头阵地，待后续部队全部登陆集结之后，才展开向敌纵深发展。我并且提醒他们，要充分准备击破敌人几次反扑。攻取金门，我军只能在一个方向上登陆，不能在其它方向登陆以牵制、调动敌

人，敌人就可以集中全力进行反扑，所以要充分准备击破敌人二次至三次反扑，巩固登陆滩头阵地，等后续第二梯队登陆集结后，才能向纵深发展。鉴于二十八军留一个师在福州，决定抽调二十九军的主力师归他们指挥，担任攻金任务。并要他们力争在一个星期之内，作好一切准备工作，以免时间拖得太久，情况发生变化。我和两位同志谈了两三个小时，他们表示坚决按我的指示办。

二十八军领导确也努力做了攻击金门的准备工作。在西迄厦门湾，北至泉州湾的一线上，协同当地党政机关搜集船只，但因航程较远，风浪很大，再加上敌机袭扰，船只集中不易。以致迫不得已，一再推迟发起战斗的时间。

厦门战役结束后，因为船只不够，我决定将三十一军的船只拨交二十八军使用，集中船只先攻取大金门，并将攻击时间延至十月二十日。后因船只仍不够用，再延至二十三日。为了做好准备工作，又推迟一天时间，改于二十四日夜发起战斗。

战机，战机，作战一定要抓住时机，战场情况转瞬万变，错过时机，整个形势也就可能发生变化。

大、小金门原有守敌为李良荣的二十二兵团，共约二万余人。除五军防守小金门外，大部分兵力守备大金门。大金门的守备重点在西半岛。这岛，位于厦门以东

约十公里，北距大陆约九公里。岛长二十公里，宽十四公里，形似哑铃，分东西两部。东半部多高山，西半部多丘陵，北岸琼林至古宁头段大部为沙质硬滩，礁石较少，易于登陆。

敌军是遭受我打击过的部队，所谓五军已不是邱清泉的那个五军，而是重建的。由于我军神速解放厦门，更使他们丧胆，看来胜利是有把握的。

### 金门失利的经过

我到厦门后，主要精力用于解决厦门的供应问题，把攻取金门的任务交给二十八军去执行。约十天以后，十月二十四日中午，二十八军电报报告当晚要向金门发动进攻。时间紧迫，我马上召集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和有关人员开会，分析情况。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蒋军十二兵团（胡璉兵团）已乘船撤出潮汕，去向不明。我查问胡璉兵团是否已到达金门？参谋人员回答说，胡璉兵团在海上徘徊，尚未到达金门。就在这时，机要人员送来一份情报，是胡璉向台湾蒋介石请求撤回台湾。可惜这份电报是昨天的！蒋介石的回电是严令胡璉按照命令执行。但蒋介石的这份回电，我们当时没有截到。我分析胡璉兵团的行动有两个可能，一是增援金门，一是撤回台湾；可能是蒋介石命

令胡璉增援金门，而胡璉不愿意，所以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撤回台湾，因而在海上徘徊。趁胡璉尚未到达金门之时，发起登陆，攻取金门，是最后的一个战机，如再延误，金门情况就可能发生变化。我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批准了二十八军开始攻击金门的战斗。

当天黄昏，二十八军发起战斗。二十八军得到二十九军一个主力师的加强，攻击兵力是足够的，但是到这时搜集到的船只仍然不够使用，一次只能运载三个团。二十八军先头登陆部队二个团和二十九军一个团于二十五日二时前后，在约十公里的正面上，顺利登陆，夺取了古宁头滩头阵地。我接到登陆成功的报告，也就放心了。谁知登陆后就发生了问题！

二十八军一个团于兰厝至龙口段登陆，另一个团于湖尾乡登陆，二十九军一个团于古宁头及其以东地段登陆，但是，没有一名师的指挥员随同登陆指挥。登陆部队也没有按照我事先交代的行动，没有先巩固滩头阵地，只留一个营兵力控制古宁头滩头阵地，就分两路向敌纵深猛插，把纵深敌人李良荣兵团击溃，一直向料罗湾方向追击。

这时，胡璉在蒋介石的严令之下已经进到了料罗湾，并且已有二个团在料罗湾登陆，其余部队正下船向料罗湾集结中。我登陆部队脱离古宁头滩头阵地已达十多里路。胡璉看到这情况，不能不拼命了。他下死命令将一

该兵团主力十八军投入战斗，来了个反包围，又派迂回部队占领了我军古宁头滩头阵地，切断了我军后路。我登陆部队使用的船只因潮水退落，在古宁头海滩上搁浅，被敌人全部击毁。二十五日晨，敌以第二〇一师、四十五师及第十八军等部，在飞机、军舰火力支援及坦克伴随下，向我登陆部队施行连续反击。我各部同敌人激战终日，伤亡很大。

二十八军手里还有四个团，靠得很近，但没有船，过不了海，无法增援。我二十九、三十一两军也没有船，无法增援，真是痛心疾首。原来预计当夜第一次运送第一梯队三个团登陆，船只返航后再运载后续第二梯队。但是，第一梯队所用船只因潮水退落，在海滩上搁浅，无法返航，遭敌海空军扫射轰炸，全部损失。第二梯队无法增援！

我登陆部队英勇苦战，二十六日晨仍在双乳山、乳山激战。

兵团部为解登陆部队之危，下令紧急动员船只，但毕竟由于时间太紧和老百姓手上的船只太少，仅仅征集到能运送将近二个营的船只。二十六日三时，运送四个连于湖尾乡登陆，歼敌一部。但因众寡悬殊，遭敌包围于滩头阵地，苦战终夜。到这时，我们手上一条船也没有，只能隔海眼睁睁地看着部队在敌众我寡的苦斗情况下奋力坚持而又束手无策。当时的沉痛心情真是难以

描述。

二十七日，我军与岛上部队完全失去联系。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岛上枪声沉寂。我登陆部队英勇顽强，苦战三天三夜，伤亡殆尽，无一人投降，被俘的都是伤员。壮烈牺牲的同志拼死精神令人敬佩！二十八军不愧是久经考验的部队，却因我们指挥的失误遭到重大损失，真是惨痛的教训啊！敌人的伤亡更为惨重，胡璉向蒋介石报告，伤亡九千余人。蒋经国战后上金门“劳军”，也不禁哀叹：“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 攻击金门失利的经验教训

攻金失利，全军震动。第二天，二十八军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两位同志来厦门见我，面色惨白，失声痛哭。我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振作精神，鼓励士气，准备再攻金门。这次攻金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他俩回去后，我就起草电报，报告华东军区陈毅同志并报中央军委，请求给我处分。陈毅同志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处分什么人的问题，而是接受经验教训。”中央军委也没有给我处分，命令我准备再攻金门。

金门失利，中央军委和华东军区虽没有给我处分，



但我思想包袱很重，只有积极准备再攻金门，立功赎罪。一九五〇年，美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中央、毛主席来电，解除福建前线再攻金门的任务，集中全力剿匪，限期肃清福建境内一切成股土匪。这样，我就失去了再攻金门、立功赎罪的机会，思想包袱更重了。我再次直接打电报给中央、毛主席，请求给我处分。我隐约听到军内有人议论此事，但毛主席说：“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

那么，攻击金门失利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呢？

最重要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当时蒋军有海军，有空军，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没有被消灭，而我军没有海军，没有空军，渡海登陆作战仅仅使用木帆船，空中没有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援。渡海攻取厦门之战，第一批登陆部队使用足够装载八个团兵力的船只，在敌空军轰炸下，损失相当大，已经非常危险，幸而克服了这一个危险，顺利攻克厦门。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中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击金门中碰了钉子。所以，指挥员尤其是我的轻敌，是金门失利最根本的原因。从这一战斗的具体组织指挥来说：

攻金失利战斗组织的第一个教训是船只不够，只能一次运载三个团，而这么少的这样宝贵船只又在第一

批登陆后搁浅在海滩上，全部丧失，以致后续第二梯队完全无法登陆。渡海登陆作战没有船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丧失战斗力。

其次，战斗指挥上的二个重要教训，就是违背了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渡海登陆作战，无论你兵力多大，首先要夺取和巩固登陆滩头阵地，然后才可以向纵深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军队诺曼底战役成功的经验，就是首先夺取了诺曼底滩头阵地，并巩固了这个滩头阵地，这是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金门失利恰恰是违背了这个规律。二十八军登陆，首先夺取了金门古宁头滩头阵地，这是对的；但是，第一梯队登陆部队没有立即构筑工事，巩固滩头阵地，后续第二梯队尚未到达，只以一个营兵力控制古宁头，就向纵深发展，又犯了违背渡海登陆作战的规律，犯了兵家之大忌。

攻金失利的第三个教训就是，第一梯队三个团的兵力登陆，竟然没有一名师指挥员随同登陆统一指挥，这也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战斗指挥中的问题也不都是前线指挥员的责任，兵团指挥机关和我也有责任。当二十八军报告当晚要发起登陆金门作战时，我只是关心胡璉是否已到达金门，没有要二十八军呈报作战命令审核，就批准他们发起战斗。这是当时我的疏忽，参谋机关也疏忽了此事，这是一大教训。

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不能仅限于此，不能仅从微观上接受教训，还应该从宏观上体会这次教训的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五十年代初，在我海、空军还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要仅仅靠木帆船横跨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现在来看，恐怕是会吃比攻金失利更大的苦头的。金门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接受攻金失利的经验教训的真正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金门战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接连几天为这个“辉煌战绩”进行“祝捷活动”。国民党报纸也大肆吹嘘，说什么“金门大捷，是反共复国的转折点。”据说以后还拍摄了电影。历史的车轮碾碎了这种痴人说梦。当时东南的战事已告收场，局势的焦点集中西南。胡宗南、宋希濂两集团数十万兵马败走四川，蒋介石还在妄想以此为本钱，“偏安西南，再图中原”哩！因此蒋氏父子，仆仆风尘，自台北飞重庆，又飞成都。而跟随他们的却是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的步伐，只能匆匆逃回台湾。胡宋兵马溃散，川滇将领起义，大西南插遍解放的红旗。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天，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决定国家（应是蒋家王朝）生死存亡的一年，就在今夜过去了！”

当然，没有攻下金门岛，对我来说始终是一大遗憾。后来中央、毛主席电令解除福建前线再攻金门的任务，

我悟不出其中的奥妙。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国政府与蒋介石集团签订所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是否“保卫”金门、马祖发生矛盾，因此而发生了一些摩擦。这使我看出了金门在我方、蒋方、美方三角斗争中的地位，但也仅此而已。懂得毛主席“绞索政策”的奥妙，那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规模炮击金门之后。这都是后话了。

## 第四十章 东山奏捷

### 台湾海峡乌云滚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不得不采取新的阴谋。美国总统杜鲁门悍然发动朝鲜战争之后，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即是他们发动侵朝战争的第二天，宣布美国政府决定以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然侵略我国领土、领空和领海，支持蒋介石集团进犯大陆。他竟然把这个强盗行径，无耻地称为“在该地区执行合法而必要职务”，明目张胆地宣称：他“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炮制台湾地位未定论，妄图霸占台湾。

就在这年的一月五日，也是这位杜鲁门先生，曾经不得不承认：“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的开罗宣言中，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中国主席曾申明他们的目的是：

使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而且信誓旦旦地说：“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它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

总统先生为什么出尔反尔呢？作为军人的麦克阿瑟就爽快得多了，他说：台湾“这个永不沉没的母舰兼供应舰，可以容纳十个到二十个航空大队，包括自喷式飞机至B-29型轰炸机各式不同的飞机，并可予短程海岸潜水艇以前方作战之供应。若取得了这个前方潜水艇基地，则短程潜水艇的效能，将因活动半径之扩大而如此地加强，以至威胁整个从南方来的海运并切断西太平洋的所有海通路。”真是垂涎欲滴，非攫取不可！而且他的目的性很强：要走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和侵占东南亚的老路。他说：“目前在台湾有许多密集的空军和海军作战基地，它的潜力比黄海至马六甲海峡之间亚洲大陆上任何类似的集中地方都更大。如果对第二次大战中日本的设备加以积极利用，则更可以在较短时期内发展一些新的基地。”（《1950年8月28日在美国海外作战军人协会演说稿》）

于是，这位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奉杜鲁门之命，到台湾与蒋介石密商以台湾为根据地向中国人民作战的具体

步骤。会商决定：美蒋双方海陆空军，归麦克阿瑟统一指挥，以“共同防守”台湾。麦克阿瑟于八月一日离台返日时，曾公开宣称：“余统率下之美军与中国政府（即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军队之间的有效联系，业已完成。”蒋介石则声称：“过去二日内，吾人与麦帅举行之历次会议中，对于有关各项问题，已获一致意见。其间关于共同保卫台湾与中美军事合作之基础，已告奠定。”这是美蒋公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挑战的表示。接着，美国的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在台湾成立了“台湾前进指挥所”，海军第七舰队成立了“海军联络部”；为便于统一指挥侵略台湾的海空部队，美国政府派遣了一个正式的军事使团到台湾，叫“美国远东军驻台考察团”。

华东沿海，特别是福建前线，形势是十分紧张的。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前，美国控制台湾，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控制了台湾海峡，实际上是一种牵制我们的动作。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不怕鬼，不畏强暴，派出了志愿部队，支援朝鲜革命人民，保卫祖国。也就随时有可能，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援下，由国民党军队发起对东南沿海的攻击。必须认真对待。

此时，中央、毛主席作出了相应的部署：指定陈毅同志负责指挥华东全局，浙江由谭震林同志负责，福建前线指定由我负责。

福建前线当时有两大任务：准备再攻金门，还要剿

匪。这两个任务都很重要。如果不攻下金门，就谈不上解放台湾。如果完不成剿匪任务，后方不得安宁，社会秩序也不会稳定。

福建要担任这两个任务是困难的，首先就是兵力不足。在没有解除攻击金门的任务之前，面对美帝国主义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当然我们的注意力和兵力配置要放在这里。以三十一军和二十九军为主准备攻金门，只能以二十八军执行剿匪和警备任务。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二军入闽，拨归十兵团指挥，他们代替二十八军的剿匪和警备任务；二十八军则集中准备参加攻金之战。随后，二十四、二十五军先后入闽。二十四军主要担负闽北的公路工程任务，二十五军则准备参加攻金。但由于大部兵力准备解放金门，剿匪进程不快。而一九五〇年三月以后，国民党特务机关不断派遣高级特务潜入内陆，以胡璉为“福建游击军区司令”，在金门设有“敌后工作指挥室”，受台湾“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加强了福建的土匪骚扰活动。

在当时新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下，攻击金门的问题，就必须考虑到可能产生的和已经产生的新变化。当时远东的、甚至可以说世界的矛盾中心集中在朝鲜，为了服从整个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暂缓攻金，以便等待和积极争取整个情况的变化和条件的成熟。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毛主席电令福建我军解除再攻



金门的任务，全力以赴进行剿匪，限于六个月内消灭一切成股土匪，并普遍实行土改。

### 提前完成剿匪任务

有人说，福建土匪多如牛毛，哪个朝代都没有绝迹。一是社会原因，旧社会逼迫有些人铤而走险，我们的工作还没有深入到他们中间。二则福建的地形条件也有土匪孳生的条件，山高林密，海阔港深，可以出没其间。三是解放的前进步伐太快，打下的地方，不及搜剿，不及清理，干部也缺乏，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和散兵游勇，还有地方的恶霸和反动地主，勾结一起，趁我后方空虚的一些地方，成帮结队，国民党又封他们什么“反共救国军福建省统一行动委员会”、“先锋纵队总指挥”、“自由救国军闽北七省总指挥”和不计其数的“司令”、“专员”、“县长”。到一九四九年冬，竟发展到大小二百四十余股，四万多人，拥有长短枪二万七千余支，机枪三百余挺，盘踞着东山、永安、清流、明溪、泰宁、将乐、光泽、三元、建宁等十座县城和若干乡镇，四处骚扰破坏，袭击我政权机关，杀害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这些土匪按其性质来分，大体三类：第一种是完全政治性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有计划留下，并为其掌握的，为数最多，共一百四十余股，约三万人；第二种是封建恶霸掌握的

地主土匪武装，这些长期鱼肉人民的土皇帝，共七十余股，约七千余人；第三种是历史悠久的惯匪，专以抢劫为生，有些匪首已有四五十年历史，且有三代相传为匪的，为数约三千余。

剿匪部队在“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教育基础上，依据“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政策，在匪情严重的地区，组成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机构，以主力部队为主，在地方武装和民兵协同下，实施重点清剿，采取奔袭、合围手段，力求一举扑灭大股土匪，随后即转入分散驻剿和追剿小股散匪。

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福建全省共歼匪五万五千余，包括国民党派遣潜入大陆的武装匪特十四股，解放全部被匪占县城。大批著名的匪首如贺可泉、刘午波、唐宗、吴全荣等纷纷就擒，匪众土崩瓦解，相继下山投降。至此，尚有残匪四千藏匿山地，三千流窜海上，股匪基本歼灭。

一九五一年一月，毛主席亲自来电慰勉，指示我们“继续不懈，坚持到底”，并在人民同意之下坚决迅速地处死那些“一切为民众痛恨的匪首、惯匪及恶霸”，彻底清除匪患。

残余的散匪人数虽不多，但均系极端反动的敌对分子，斗争越加艰苦。如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六〇团在仙

游、永春、德化三县边区，布置了对闽南著名匪首、“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副司令兼闽中军分区指挥官”刘子宽的包围网，岗哨一个接着一个，进行长期包围搜剿。战士们用枯草树枝搭成窝棚，用松树心劈成细条照明，吃着老毛笋和山芋叶子，日晒雨淋，爬悬崖陡壁，钻草丛山沟，经过二十七天不断压缩包围圈，终于擒获了匪首刘子宽和残匪百余名。又如三十二军九十五师二八三团以八个连兵力合围逃窜建瓯城东南里黎山一带的“暂编第四师”郑长吉股匪，经过一百三十里长途奔袭，五天四夜搜剿，活捉匪首“少将师长”郑长吉及残匪五十四名。当夜又出发，经五小时雨夜急行军后，在高山密林中经三天两夜搜剿，又活捉了“上校副师长兼十九团团长”郑长兴及残匪四十余名。至此，所谓“暂编第四师”才彻底消灭了。消灭散匪、潜匪比歼灭股匪费劲得多。

剿匪结合土地改革全面展开，匪出即剿，匪藏即发动群众分配土地，效果极为明显。福建省提前于一九五一年五月全部肃清了土匪，消除了后顾之忧。

## 巩固海防

福建完成肃清一切成股土匪任务之后，由于抗美援朝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二十四军、二十五军、三十二军

先后调离和整编，福建留下二十八军、二十九军和三十一军三个军。二十九军一个师改编为海军（当时叫水兵师），担任巩固福建前线海防之任务。此时我海空军尚未进入福建，担任巩固海防前线任务的兵力只有两个军。福建海岸线长达千余公里，处处可以登陆，面对台湾海峡美蒋的联合威胁，当时对巩固海防的作战方针有两种意见：一是把三个军全部投入防御，但这样做，纵深就没有机动兵力，非常被动和不利；二是只以两个军担任防御，而以一个军为纵深机动兵力，这样做比较主动和有利。我们反复研究考虑，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但执行这个方案也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只以两个军担任一千多公里海岸线防御任务，照顾不过来；第二个困难是纵深机动兵力只有一个军，要在一千多公里海岸机动很困难。我们从当时福建前线的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和克服这两个困难的办法是：把福建前线划分为两个作战方向，第一个作战方向是闽北福州方向，第二个作战方向是闽南厦门、漳州、泉州方向。对沿海防御的方针，决定采取控制海岛以防御海岸的方针，这样做就可以大大节约和减少第一线的防御兵力。福州方向控制闽江口及三都澳，沙埕港外各要岛，控制了海岛就控制了海岸线；闽南方向控制厦门、东山岛及泉州湾。采取这个办法就避免了分兵把口，处处防御又处处薄弱的弱点。解决和克服第二个困难，即机动兵力机动的办法，就是利

用福建沿海公路来使用机动兵力机动，即改变过去一贯采用的只以徒步急行军的办法，而使用汽车装载部队机动，这样，机动兵力的机动能力就强得多了。这实际上就是把步兵（机动部队）摩托化了，平时不配备汽车，一到作战，集中汽车运载机动部队就变成摩托化部队了。但是，当时十兵团没有装载部队的车辆，华东军区只有一个汽车团是可以机动使用的，控制在上饶。我们曾请求华东军区把这个汽车团调到福州，没有得到批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就从地方的运输车辆打主意，规定沿海作战部队需要汽车时，地方运输车辆全部集中归部队使用。当时福建海口被封锁，鹰厦铁路尚未修通，交通运输全靠公路，地方运输车辆比较多，一旦需要时集中起来可担负运输一个军，就可以把这个军变成摩托化军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同时，我们对福州前线每个作战方向，对敌人可能登陆向我进犯的地方，都制定了作战方案。

此时，福建还没有永久性设防，沿海都是野战工事、土木工事；一些要点也没有钢筋水泥工事。比如东山这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团担任守备任务，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东山岛是沿海防御的一个薄弱点，它是福建沿海最南端的岛屿，闽粤两省的结合部，这里是最易遭受敌人进攻的地方。福建和广东都注意到这个地方，但又鞭长莫及。因此，我们预先制定了东山岛一旦遭敌进攻

时，由闽南方向的三十一军及广东汕头方向的四十一军增援的方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东山岛一旦遭敌人进攻时，机动部队如何增援？如果靠两条腿徒步行军，从泉州到东山，起码要三天到五天才能赶到。如果从福州派出援军步行到东山，就要一个星期才能到达。东山岛只有一个地方团担任守备，只有野战工事，如遭敌进攻，不可能坚守太久，援军需在第二天最迟第三天到达，才不会出问题。福建前线沿海有一条从福州经厦门、漳州到达东山的公路，我们只有利用这条公路，用地方汽车运送增援部队。但平时是不能集中车辆的，会影响地方经济生活。于是我们搞了一个预定方案，规定战斗发生时，车辆集中地点，一接到命令，所有民用车辆便立即转入军用运输。东山战斗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就是靠这个办法。那时福建军民关系很好，作风也很好，一下命令，地方车辆就集中，一切服从战争需要。

闽东南很多河流平行单独入海，最大的一条江就是九龙江，从龙溪入海。公路要畅通，就必须逢水搭桥，如果没有桥梁，用驳船过渡，那比步行还要慢，这就存在一个“桥”的问题。当时，福州经乌龙江要摆渡，泉州的洛阳桥被敌人炸毁，九龙江桥也被国民党炸毁，只剩下桥墩。要修桥，单靠部队是困难的，国家也很困难，是抗美援朝的时候，还是靠地方帮助解决的。这也是一元化领导的好处，在战争需要的时候，地方全力以

赴。这不仅是国防建设的需要，对地方也有好处，所以地方对抢修公路桥梁的任务执行很积极。九龙江的桥，就是靠地方的财力和人力日夜抢修起来的，这对东山战斗的胜利起了一个重要作用。

福建前线的战略部署，还有一段插曲，就是与苏联专家的争论。苏联专家热情、细致，一丝不苟，但是脱离实际，硬搬教条。对他们，既感到给我们有帮助，又感到与我们的战略思想格格不入。由于这个争论，苏联专家告我的状，不只告到毛主席那里，而且告到斯大林那里。

福建前线开始没有苏联顾问，是后来来的。苏联大国主义由来已久，它派出的顾问很多人都是指手划脚，不是顾问，倒象是领导。顾问一来就找麻烦，发生了两次争论摩擦。一次主要的争论是：对我们的作战部署横加指责，要我们按他们提出的防御方案，在沿海作正面防御，单纯地消极防御。我们的方案是积极防御的方针，经华东军区、毛主席批准的，于是发生争论。我告诉苏联总顾问：我们的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的积极防御之方针。如果敌人大规模登陆，除了厦门坚守，其它如漳州、泉州都不守，让它进来。我们没有海军，无法切断敌人的海上联系。避开我们的短处，让它进来，敌人的海军就发挥不了作用，它的空军也是有限的。“关门打狗”，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苏联红军没有

我们的作战经验，他们的卫国战争也与我们不同。那个总顾问连连摇头，简直连听也不想听，好象我讲的是什么“海外奇谈”。第二个争论更是可笑，登陆作战要我们学习他们的经验。学习先进的经验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这就只能把自己禁锢起来了。我们在谈到登陆作战的经验时，说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同时要学习人家的经验。但没有讲苏军的战例，谈了美国、英国的登陆作战战例，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军队登陆作战经历较多，而苏军则缺少这方面的实战战例。这样，苏联顾问恼火了。他一回去，就对陈老总讲：你们的前线指挥员（指我）是个“英美派”。并向军委告我的状。苏联总顾问回苏联前，又向毛主席告状，说“叶飞此人靠不住”，要主席撤我的职，还说要告到斯大林那里。此事，陈老总告诉了我。后来彭德怀同志也告诉了我，他也是不买苏联顾问的账的。

## 东山岛告捷

我们有个金门失利，国民党有个东山失利；胡璉因金门得手升了官，却因东山失利倒了霉，也算是个报应！

那时，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桌上，美帝和李承晚集团还在装腔作势讨价还价。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吃了亏，



会不会在台湾海峡捞一把呢？我们是时刻警惕的。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前后，敌舰屡屡在我福建近海窥探，敌机也连连来低空侦察。刚好，游梅耀同志派去任驻守东山那个团的团长，我告诉他：“你团有坚守东山岛之任务，但你们团部设在东山岛外的陈岱镇，指挥岛上作战很不方便，应移驻东山岛上，以便直接指挥部队。”游梅耀上任后，就把团部移驻东山岛，紧接着就发生了敌情。

七月十五日，敌舰艇十二艘从金门出发，大有骚扰沿海岛屿之势。估计胡璉的目标是东山岛。

胡璉对东山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不敢轻视我们，他把所有军种都使用上了，空军、海军、陆军、空降部队都出动了。国民党进攻东山的兵力多火力强是前所未见的。胡璉此人，国民党将领常称他是匹夫之勇，其实他的实战经验比较丰富，失败之后也比较谨慎。他倒是对我方情况作了仔细的侦察，所以他判断我们在泉州地区的部队增援，最快也要三天才能赶到，他可以打三天。胡璉在发起进攻前一天的中午还派飞机侦察九龙江的桥有没有修复？回报说没有修复。这个侦察没有错，确实那天还没有修好，不能通车。但许多事情有偶然性，中午没修好，偏偏晚上修好了，把桥板架好了。战斗一开始，我军的汽车畅通无阻，这桥起了很大作用。

东山战斗开始很紧张，国民党把老本都豁出来了。

他从未使用过空降部队，过去他只把伞兵当陆军使用，但这次他把台湾的空降部队全部使用了；又有美国军官指挥，飞机狂轰滥炸，海军炮轰沿海工事，伞兵空降，然后陆军登陆部队在海军掩护下实施登陆。

登陆敌军由二十一辆水陆两用战车为前导，攻占东山县城后，扑向全岛制高点二〇〇高地；接着十余架飞机从台湾新竹机场飞到我东山岛背后八尺门上空，敌伞兵总队第一大队和工兵分队、警卫分队，降落在紧靠渡口的后村两侧高地，占领了陈岱集，切断了东山岛和陆地的联系。敌军以压倒优势铺头盖顶地出现在东山岛上，情势的确很是危急。除了东山岛上制高点二〇〇高地仍为我守军坚守外，东山全岛都被敌攻占了，按我们预定部署，因为这个岛比较大，一个地方团要守全岛不可能，因此预定作战方案，如敌军登陆进攻，我守岛部队节节抗击后，最后只坚守全岛二〇〇高地待援。陈老总在上海知道了战斗情况，也很着急，一直与我保持通话。战争中，有很多偶然性。我们有这样一个电话班，是守备部队的总机，所在的村庄被敌人占领了，他们没有跑，而是隐蔽起来，一直保持与福州的联系。国民党军搜索了整个村子，但连电话线路也没有被发现。战斗中，我与守山头的游团长通话，全靠这个总机。我对他们说：“一定要坚持，这样我就可以了解战况，就可以指挥作战了。”通过这个总机，我向守东山的游梅耀团长下

达命令，要他们死守一天一夜，援军就可赶到反击歼敌。他们确是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东山战斗时我虽然在福州，与东山前线却是息息相通，战斗进展了如指掌。战后，我给这个电话班记功，记了集体一等功。东山战斗打响，我所以能在福州指挥东山作战，全靠这个电话班。如果我离开福州，即使乘车奔赴前线，最快也要两日夜才能到达，就失去两日夜的联络了。上面说这是战争中的偶然性，这是起作用的偶然性；作为人民军队的顽强作风来看，这是产生于必然性中的偶然性。

东山在一开始确实是被敌人占领了，于是，台湾祝贺。但是，有个山头还在我们手里哩！

东山战斗一打响，我即按预定作战方案，命令三十一军（留一个师守备厦门）与二十八军一个师，分别由泉州、漳州以汽车运送增援东山守军，统一归三十一军军长指挥；并通知汕头友军（四十一军）由潮汕增援东山；并命令从福州到泉州、漳州沿线地方客货运车辆分别向泉州、漳州集结运载部队，因为这是预定的作战方案，而且都进行过演习。所以命令一下达，根本不需要动员，旅客自动就地下车，货车就地卸把货物卸在路旁。所有沿线沿途客货车动作迅速，立即分别驰赴集结地点装载部队。

我军主要增援部队也按预定方案开进。广东汕头一个军，从汕头方向开来；泉州、漳州地区的部队由汽车

运送，日夜急驰。白天行动，不顾敌机轰炸，被炸翻的汽车，推到路旁，不堵塞交通。时间就是胜利。我们的增援全速前进。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损失，开进中伤亡不到一百多人。

增援部队在战斗打响当天夜间、第二天拂晓前分别到达指定地点集结。第二天上午首先把占领陈家镇、八尺门的敌人伞兵部队一举全部消灭了，打通了与坚守东山岛二〇〇高地守军的联系。陈老总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他知道危险已经过去。增援部队迅速赶到，广东汕头部队也很快赶来，这是出乎胡璉意料的，他犯了个大错误。两路援军分别于第三天拂晓前向东山岛登陆，实施反击，配合岛上守军，迂回包围歼灭，但因未能迅速占领港口，一部分敌军（不到三分之一）从军舰上逃走。此战共歼敌万余，其中有伞兵七百余。

这一仗，毛主席非常重视。战斗第三天的中午十二时，增援部队已经登陆，毛主席到了总参作战室，跟我直接通电话。由于当时还没有直达线路，声音很小，是通过华东军区值班的副参谋长张翼翔同志转达的。主席最关心的：敌人东山登陆可能不是个主要方向。他提醒我：东山可能是吸引我们注意力，然后在另外地方登陆。主席问我：兵力够不够，需不需要增援？我回答说：有准备，已防备敌人在第二个方向登陆。我说：我的兵力够了，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个军机动兵力尚未使用，准备

敌人在另外方向登陆进攻时使用的。主席又问：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我想了一想，说：没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就是汽车已全部使用光了，但我已经下令把上饶到福州公路干线的地方车辆集中到福州机动，请求中央命令江西接替上饶到福州的地方运输任务。主席一听，奇怪了，问道：华东军区有一个汽车团，为什么不给你们福建前线？主席生气了，立即下令给华东军区：你们的汽车团立即开到福州。

东山战斗，敌人吃了苦头，没有敢在其它地方再有动作。此战获胜，毛主席很高兴，来电嘉奖。“文革”中红卫兵搜集了我十条“罪状”，其中军事上两条：第一是金门失利，第二是东山战斗没有打好。我说：你们的“情报”不确。金门失利，可以说我有责任；东山战斗是受到毛主席通令嘉奖的呀！你们把这一条当成我的罪状错了。

东山战斗上半年打胜，下半年朝鲜战场发起最后一仗，金城反击战，取得大胜。东山战斗不是蒋介石的单独行动，而是美国下的一着棋，事物总不是孤立的。

## 第四十一章 厦门海堤和空军入闽

### 移山填海

海中造堤，横断海峡，变海岛为半岛，并在堤上通行火车与汽车，在我国五十年代还是没有先例的。而这个巨大的现代化工程，又全部用石料干砌而成，基本上由人工操作，更是奇迹。这一奇迹就是高崎到集美的海堤，厦门从此与大陆连在一起。

厦门海堤（准确的称呼应是“高集海堤”）的修筑是一九五三年由福建省委提出的。我们首先是从国防上考虑的。厦门是个海岛，要靠海上运输，兵力调动，物资补给，困难很多，但厦门的地位十分重要，既是国防前哨，又是解放金门，以及下一步解放台湾的前进阵地，必须有尽可能便捷的交通。其次，当时福建铁路计划修至厦门，海堤修筑后，不仅铁路、公路畅通厦门岛，亦能更有效地使用岛上的海港，增强海陆联运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今天才有可能在厦门设立经济

特区，这是后话了。第三，当时有个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解放前的厦门是个畸形的消费城市，仅有的两家工厂在解放前迁去香港，只有一些商业和服务行业，十八万市民中约有三万人依靠侨汇生活，其他居民谋生乏路，生活贫苦，依靠政府的救济款维持生活，终非了局。以工代赈，修建海堤，可以解决存在的失业问题。其实，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经济危机时，所谓“罗斯福新政”，主要措施就是由国家大量兴办公用事业，解决失业问题。

陈毅同志很同意修建海堤的建议，报告了中央，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并拨出专款一千三百多亿元（折合人民币一千三百多万元）。

正是朝鲜停战前夕，战争即将停下来了，经济建设就突出了。百废待兴，建设项目纷纷上马，难免顾此失彼。修建厦门海堤工程涉及单位较多，主要有交通部、铁道部，还有华东和福建的有关单位，没有哪个单位愿意承担修建任务。有些人还认为修筑厦门海堤是不可能的事。他们说：新加坡修海堤用的是四吨重的钢筋水泥预制件，我们连起码的吊重机械都没有，没有施工条件，我们只有石块和人力，正好象俗话说的：“石沉大海”一场空。也有人说：修建这样的工程，要么出风头，要么翻筋斗，所以没有哪个单位愿意承担修建这个工程。

最后中央决定由陈毅同志负责，陈毅同志指定由我负

责工程的具体领导，《政务院关于修筑厦门市高集海堤工程的决定》中明文规定：“工程之具体领导即其行使管理、干部与职工之调配，政治工作，具体施工组织领导等由叶飞同志负责指挥。”实际上，就是由我来“承包”了。随即建立了专责机构——高集海堤工程管理局，掌握工程具体工作的进行，我责成厦门市市长梁灵光和副市长张维兹同志负责。

海堤工程结构，到底采用钢筋混凝土构件，还是就地取材采用石头，经过了反复研究论证。如果采用钢筋混凝土构件，从东北或上海订购钢筋混凝土构件，当时的条件，远道运输困难；更重要的，当时福建地方的技术力量只能把两吨重的石料投入海中，没有起重机械用来吊放四吨重的钢筋混凝土构件，此案脱离当时的实际，显然行不通。因此决定采用斜坡直墙的石条修筑海堤的方案，优点是：第一，闽南山多，石料蕴藏量丰富，石质好，都是花岗岩，可以就地取材，利用石料造堤质量是有保证的；第二，闽南石工多，采石和制造石条技术高，能工巧匠不计其数，闽南地区和厦门，住房全部都是条石砌墙，连窗棂都用石条作框，既坚固又美观，而且古朴典雅；第三，厦门失业者众多，采用石堤基本上靠手工操作，可以吸收大批失业人员，既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又可为国家锻炼一批建设队伍，符合于群众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一致；第四，用花岗岩的条石筑堤，



海堤的坚固程度并不下于钢筋混凝土制件。最后发生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海堤的设计问题了。福建本省的技术人才不多，国内还没有修建过海堤，缺乏资料，连北京苏联专家也不敢承担设计任务。

中央没有哪个部门愿意承担海堤设计任务，只好由福建地方自己来设计，自力更生。集中了福建的技术人才，包括厦门大学的技术人才来担任海堤设计任务。闽南的劳动人民是创造过奇迹的。泉州著名的洛阳桥就是闻名世界的石质梁式长桥，两吨重的条石交叉砌成的桥墩，经历过海浪整整一千年的狂暴冲击，安然屹立。筏型基础，种植牡蛎以固桥基，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科学创新。可见当年就有技艺高超的石工，就有在海底砌成条石巨墙的技术了。民间传说中的那位“夏德海”因为误听成“下得海”，而被蔡状元蔡襄派遣到海龙王那里去投递公文。可见当年就有潜入海底测量的能人，不过被人们把这些无名巧匠神化了。

在旧社会，手艺人为了糊口求生存，虽然身怀绝技，也是“传子不传女”的。闽南的石工渔民也有“传授技术就是出卖祖宗”的传统思想。在“多打一块石，就是为社会主义多摇一下橹”、“不为赚钱，而为争气”的崭新思想武装下，他们和传统思想决裂了，在工会领导下，组织了技术讲座、技术学习班、技术研究会、交流会、技术表演、师徒合同等活动。很多祖传绝技公开了，新

办法也想出了不少。有开采大片岩石的经验，有海上一列式拖带法，还有空心水炸采石法，三角架吊锤采石法，夹缝爆炸，滑道放沙，山坡板车，条石护坡，水底铺平，扬高台等等。例如，堤边护坡，原来设计采用三至五吨的大块石，这在采运方面都是极大的困难，工人们提出条石护坡。老工人根据经验认为：条石只要两吨重就够了，但要磨琢成整齐的长方形，直放，交叉架起，承受力可在两倍以上。经过试验果然质量有保证，而且美观，又节约了大批人力物力，并成为以后类似工程的范例。又如条石质量，起初技术人员误认为黄色石头都不好，不敢用，造成既积压又缺材的矛盾，但老工人从经验中识别石质，坚持质量是好的。经过试验，证明老工人的经验是对的；相反的，有些白色石料却是不好的。老工人说：如果在旧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讲；讲了，饭碗就打掉了。工程技术人员的信心大增，用条石修建海堤的设计方案终于制定出来并拍板定案了。

政务院批准海堤工程设计任务书以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开始初步施工，至一九五三年底，为工程准备阶段。主要是加紧勘测、钻探、绘图，整理资料，进行典型试验性的施工，集中力量做好技术设计。这时已调集五百多干部、三千多工人，工地上热火朝天了。但当时海底地质钻探工作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铁道部的自动钻探机他调，没有钻探机进行

海底地质勘探，就用福州钻探温泉的土办法进行海底地质勘探工作。最后，留有一段三百米长、七十米深的深水段未能勘查钻探。在工地上发动群众讨论，大家献计献策，劳动人民是蕴藏着无限智慧的，潜水工人就建议潜入海底进行钻探，三十米以下是潜水员禁区，难度非常大，但是这些“夏德海”的子孙果然“下得海”，多次潜水，终于摸清了“海龙王”的老底。

一九五四年一月，全面施工开始，工人增加到一万人。采石工地炮声隆隆，采石磨石一片欢腾，有线广播不断宣传苏春泉石工生产组、益安轮一列式拖带法等先进事迹。拖带法也是老工人提出的土办法：驳船拖着一列渔船，每只渔船载运两吨重的条石，驶到航道，船只突然掉头，成四十五度倾斜角，八根钢钎同时使劲，“扑通”一声，条石落进海水，渔船飘起，急驶而去，当时拍成电影纪录片，引为奇观。

春节前夕，来了新问题，惠安石工过去出外打工，清明、春节必然要赶回家。俗话说：“清明不回家，没有祖先；春节不回家，没有老婆。”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工程正处紧张阶段，来不得停工十天半月。青年工人陈宗庆本来择定春节结婚，和未婚妻商量后，提出了：“海堤完工，戴上红花，那时结婚，喜上加喜。”一时间，工人们纷纷提出：“一定要等海堤完成才回家。”将来海堤完成了，抱着自己的孩子，戴着红花

从堤上走过去。”我们又组织家属慰问队，配合政府和妇联做好家属工作，家属纷纷鼓励亲人。一位老妈妈说：

“告诉我孩子，家里不用介意，将来劳动竞赛的红旗多带几面回家。”工人们一破旧习惯，以艰苦奋斗服从计划为工人阶级的光荣，冒大雨，顶寒风，抢潮水，赶浪头，日夜施工。在鳄鱼岛、大里木岛的工人，工区初开辟时，因准备不及，一个多月住不到工棚，二十五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下起雨来没有蹲的地方，平时吃的水要从厦门岛送去。吃水不便，用水更难，但他们始终坚持工作，令人感动。我知道后，立即责成后勤部门迅速解决他们的工棚、用水和其它方面的供应，条件才有所改善。

接着，堤线深水部分的抛石，由于技术上对流速增加没有详细深入的研究，认为开放抛石会影响沉箱施工，迟迟不能抛石，造成山场石料积压。老渔民根据经验献计说，分散抛石，不致增加流速。一经试验，果然有效。但是，堤基是否坚实？于是，“夏得海”的子孙们下海了，潜到海底，摸查海底筑堤情况。他们在海底什么也看不见，全靠两手在海底堤基上向前摸索。当摸到石块抛得不平时，立即发出讯号，通知水上抛石队补抛；遇到小块石填得不平，立即扒平铺齐。陈拼火带领的“猛虎下山队”担负挖海堤水下底槽和安砌水下三角石护坡工程，一次再一次地潜入水底……有一次，著名的“土潜水员”陈水传正在水下向前摸进，突然摸到一处的石笼

内只有少量石头，许多石笼口破开，断定这是潮水冲走的。他不顾已到起水时的危险，迅速发出讯号，水上工作人员立即抛补，保证了堤基的稳固。堤基坚实，而且大大加快了施工进度。

厦门海堤是在敌前施工的大工程，整个工地经常受到敌机、敌炮的骚扰。一九五四年八月底，全国各民主党派发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联合宣言。九月三日，我军炮击金门，厦门形势顿形紧张，此后三个月，是工程为提前通车开展突击竞赛运动最紧张阶段。在“提早修好海堤，支援解放台湾”的号召下，虽然敌机每天成批轮着临空袭扰，工地遭到轰炸，装载条石的船只中弹起火，骆佃已等同志不顾敌机低空扫射，奋不顾身地跳下海去进行抢救，英雄事迹立即传播全工地。工人们提出了“与敌机抢时间，防空不减产”，“多搬一块石，就是为解放台湾多出一份力”的战斗口号，工效逐日飞速上升。终于，按计划提前半个月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完成海堤修建任务。十二月十日举行正式通车典礼。

最为壮观的是海堤合龙。海堤是从集美和高崎两面同时修筑的，合龙之时，龙口愈窄，水流愈急，每秒钟流速达五米，巨浪旋涡卷着船只，不是撞向石堤粉身碎骨，就是旋向海底尸骨无存。老渔民说，厦门潮水没有大潮、小潮、大退、急退之分；来潮时浪较大，流速并

不相差；平潮二十分钟，大退二十分钟。抓紧大退时机合龙最为有利。合龙时，载运条石的船只鱼贯而来，船只倾斜至九十度，驶至合龙口时，借助湍急流水的冲力，船舷接近水面，石块随即落水，趁着巨石破坏旋涡之时，船空载轻，飘然而起，急驶而去。真是险象百出。船的倾斜度掌握不好，石料倾倒后抓不住时机，都会船毁人亡。只见船只一艘接着一艘，巨石一块接着一块……石块终于冒出海水之上，人们不禁齐声欢呼。然而，到此还没有结束，……水性极好的青壮渔民纷纷跳下海去，把堆叠的乱纷纷的石头进行调整，交叉排列，好象砌墙一样。此种景象，真是毕生只能一见！

一九五四年，彭德怀同志首次来福建，视察厦门，就在这条十里海堤上疾驶而过。

## 劈山筑路

彭德怀同志回国后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他对解放金门、马祖，从而解放台湾，是很积极的。一九五四年彭老总来福建视察，就是专门研究解放金门问题。

解放金门，只是解决局部问题，最后是解放台湾，而台湾问题又是中美斗争的焦点。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进行艰巨的准备工作，既包括军事的，更包括政治的、

外交的、经济的各个方面。当时福建省的交通条件很差。这不但影响福建省的经济建设，也影响海防建设。朝鲜停战以后，我们的远射程炮兵可以大量调来福建了，可以集中力量来对付这个方向了，但必须解决运输问题。所以作了两个决定：

一是：决定调铁道兵团入闽，以两年时间，抢修鹰（潭）厦（门）铁路；

一是：修筑飞机场，准备空军入闽。而这两者，抢修鹰厦铁路则更为急迫。现代世界工业发达国家，铁路运输已经落后，空运和公路运输比较发达。但就我国来说，幅员辽阔，空运事业刚刚开始发展，公路运输亟待普及，铁路仍是主要的运输手段。五十年代，福建省连一寸铁路都没有，公路也只有几条干线，运输极不便利。不修鹰厦铁路不行，否则根本无法解决金门问题，空军也无法进驻福建前线。当时福建运输只靠公路，而汽车运输毕竟有限。海口又被封锁无法使用海上运输。所以抢修铁路就变成当时紧迫任务了。

如果说厦门海堤是移山填海，那么鹰厦铁路是劈山修路，修筑工程非常艰巨。闽西北山地属武夷山脉北段，是全省地形最高峻的地区，为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流域的分水岭。崇安、邵武、建瓯、大田是福建的“屋脊”，由石英岩、砂岩构成的山顶常为悬崖绝壁。向南进入闽东南丘陵地带，绝大部分为花岗岩丘陵，浅丘群中，可

见孤立的花岗岩低山，很多河流切丘陵平行入海，河流下游一般有冲积平原，也分布着低缓丘陵。铁路绕山爬坡，炸石开路，隧道多，桥梁多，工程十分艰巨，如果不是铁道兵部队的艰苦奋斗，克服各种困难，确是很难按时完成的。

抢修鹰厦铁路，决心是很大的，调集了七个师的铁道兵部队，全线铺开，限期两年，于一九五七年通车。福建地方全力支援，动员十万民兵配合铁道兵抢修鹰厦铁路。

鹰厦铁路最艰巨的工程是武夷山工段和分水岭工段。当时的铁道兵司令员王震同志视察这项工程时指出：凿通武夷山是“咽喉工程”，劈开分水岭是“心脏工程”。在大西南铁道工程修建之前，鹰厦铁路工程可算是最艰巨的工程了。

武夷山工程段，是交叉点上十二公里的工程群，人称“四大”：大填方，大挖方，大铁桥，大隧道。单说隧道就占全段总长的四分之一。

第一个隧道是铁牛关，中间是大禾山，最后一个是小禾山。

小禾山名曰“小”，却是全线最长的隧道，石质硬度在八至二十五级之间。一九五五年铁道兵开来时，上级规定掘进速度是日进二米四，连续几天的速度却一米还不到。干部战士硬是不肯离开工场，非要打到二米四。



地球还是要转，白天黑夜还是要轮换，打到二米四终于记录在第二天的日进速度表上面了。尖刀连连长尹尚龙几天几夜不眠不食，终于捉摸出了一个新办法：连环爆破。日进速度飞速上升，九月二十九日那天，大禾山隧道北口日进五米六，小禾山南口日进八米六，铁牛关隧道竟然日进十米八。正好王震同志来视察，高兴万分，一定要见见那位尖刀连连长。那位连长从工地上下来，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只认为首长又交代什么新任务，满脸灰土，浑身褴褛，拎着一顶安全帽，赶到工程指挥部。一见王震同志出来迎他，愣了。王震同志拍着他的肩头，哈哈大笑：“我道是哪个？原来是你这个尹尚龙？”这个尹尚龙，本是三五九旅的炮手，难怪放起连环炮来了。整个隧道工程提前两月完成。

武夷山工程是凿通山岭，分水岭工程则是砍掉山头。硬是在海拔六百米的分水岭上，一连砍掉七个山头，开凿出长达七百米的铁路通道。单是挖坚石硬土就达三十余万立方米。大爆破极为壮观，一炮掀掉一座最大的山头，满天飞砂走石。据工程技术人员估计：这一炮就可节省六千工。

十多万民工也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们担负着全线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路基土石方工程。山坡上的泥块不好运，民工们创造了“秋千运土法”，仿效过年时家乡切糯米年糕时用麻线分割的方法，用铁线夹，把粘土一块

块切下。松石上的钢钎不好打，福州民工郑行宫和朱木得创造了“弓力单人打钎法”；炸药威力不够大，福清、晋江、厦门等地民工广泛学会了“蛇穴挖洞法”、“放葫芦炮法”……

向南进入闽东南丘陵地带，困难虽多，也就不在话下了。鹰厦铁路按时通车，成了福建省贯通南北的大动脉。

## 银 鹰 凌 空

当时福建前线没有海空军是一大弱点。马祖岛是闽江的出海口，敌人在金门站住脚后，又占领了马祖，加上浙江沿海的一些岛屿还被国民党军占领着，这就从海上封锁了厦门、福州和温州。福州、厦门处在国民党空军袭击圈内，经常遭受空袭。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现代化的国防如果没有海空军，特别是没有制空权，就只能是国无防！

福州的民房大多是木结构建筑，一枚燃烧弹就烧了一大片。当然烧了低矮旧木屋，反而建筑起了一片砖瓦新建筑，有位记者在通讯里就把福州比喻为烈火中获得新生的“凤凰涅槃”。这篇通讯写得充满豪情，但是城市解放了，安全没有保证，一次空袭，一次大火，人民就要遭到一次损失。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人民还是谅解

的；朝鲜停战了，想法就不一样了。正因为朝鲜停战了，福建的防御力量也就有所加强，在前线配备了高射火器，使得国民党空军不敢太猖狂。否则，福州、厦门等处常常挨空袭轰炸，军民都不得安宁。但是，只有掌握了制空权，才能不受敌机骚扰，才能解决台、澎、金、马问题。

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福建省共修建了七个飞机场，数量之多，占全国之首。福建山地多，沿海多冲积平原，可耕地不多，机场又必须占用大片良田，但那时军民一心，同仇敌忾，一个通知，立即迁移，哪里听说过有什么“钉子户”的！还有，地质条件不好，修筑机场的工程难度很大。我们有些同志没有现代科学知识，总认为有块平地就可以让飞机降落，修筑机场哪要那么长的时间，谁知选个合适的场地不容易，修筑跑道的工程要求极高，才弄清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空军工程部的指导下，拿出移山填海的劲头，全力以赴。但是，有些机场由于地质条件不好，质量比较差。

有了机场，人们盼望已久的空军就可以入闽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中东形势紧张，国民党空军在美机掩护下加强侦察和袭扰活动。七月十九日空一军奉紧急命令，首批转场入闽。时值季风季节，正逢三十年来少见的暴雨。他们在气候条件不利的情况下，仅用了八天时间，于七月二十七日完成转场任务。杭州笕桥机场

的部队奉到转场入闽命令后，八小时完成行军准备，到达指定机场后，二十小时内就担负作战任务。空军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进驻了福建全部机场。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命令成立福建前线空军指挥所；七月二十四日，又命令成立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配备了一批有空战经验的同志担任领导职务。聂凤智同志就是由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调来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的。

敌人发现我空军转场入闽，妄想先下手为强。七月二十九日，敌机F84型战斗轰炸机四架窜至汕头、南沃空域，被我空军一举击落两架、击伤一架。国民党空军大为震动。八月十三日，我海空十团空转到福州机场，着陆仅一小时，敌机F86型歼击机以低空飞行潜入上空。我机立即应战，打得敌机屁股冒烟，落荒而逃。福州市民停立街头，爬上房顶，鼓掌欢呼。八月二十五日，我空二十七团驾驶员刘维敏单机与敌机四架空战，在两个空域格斗十四分钟之久，高度从一万米到八百米，多次大角度俯冲和急速上升，上下翻腾，左右开弓，击落敌机两架。刘维敏同志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漳州、平漳及闽江口连续空战，我军基本上夺取了福建沿海制空权。

战争的规模大了，就带来了新问题。过去打仗，甚至是对付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只需用民工支前，扁担、

独轮车、大车、小毛驴担负后勤补给就可以了。现在就不行了，没有一个工业基础，根本无法维持战争。飞机损坏，大炮损坏，汽车、仪器损坏了，在福建就没有办法修复。因为福建是前线，解放后没有搞什么工业建设，只好送到内地，送到上海去修理。这怎么行啊！在北戴河会议上，我就提出了这么个观点：如果停留在原来那种支前形式，前线不准搞工业，就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福建必须建立一定的工业基础。少奇同志支持我这一观点。后来，在福州、三明、厦门等地逐渐建起了一些工业，中央各部门也给予重视支持。福建的工业基础大多是在那个时候搞起来的。空军入闽，空战取得了胜利，掌握了制空权，就为接着发动大规模炮击金门奠定了基础。

## 第四十二章 炮击金门和绞索政策

### “九三”炮击

朝鲜停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它的失败，实行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到处建立军事基地，进行侵略。奠边府大捷以后，美国的打算又一次落空了，不得不在日内瓦坐下来，承认帝国主义政策的失败。但是，“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又一次有了中心宗旨与明确目标”，就是“遏止中国”，“遏止政策的具体化，使中国共产党人知道，如果他们试图征服自由中国的领土，那就意味着同美国开战。”（比尔：《杜勒斯传》）

一时间，美国“放蒋介石出笼”的说法甚嚣尘上。同时，美帝国主义加紧指使和援助蒋介石集团，向我大陆沿海加紧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活动。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美国又酝酿与蒋介石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条约》，并策划组织“太平洋反共军事同盟”。同时，国民党军增兵金门，袭扰我沿海地区，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

二十一日，竟然出动舰艇十四批二十五艘次，打劫商船，捕捉渔船，多次迫近我沿海突出部。

但是，刚刚由美国驻台湾的所谓“公使衔代办”升为大使的兰金在《出使中国》一书中道出了当时的背景：当时美蒋间关于缔结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停滞不前”，“第一是领土‘适用范围’的问题。换句话说，美国按照它目前已在做的那样，将负责协助台湾及澎湖的防御，可是，国民党的沿中国大陆的三十多个岛屿该将怎么办？第二是关于中华民国在将来可能收复的前领土问题。……华盛顿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订立这样的条款涉及面太广。……一个范围很窄并明确地以台湾地区及其附近的澎湖列岛为限的条件，将会在整个东亚引起不利的政治反响。……而且可能认为，这暗示了美国在承认北平政权是辽阔的中国大陆的主人敞开着大门。”

我国各民主党派发表了郑重声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诗人和音乐家谱写出了激昂的歌曲，《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唱遍了整个大陆。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我接到中央军委命令：为了打击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制止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的侵袭，在美蒋预谋签订《共同安全双边条约》期间，对金门国民党军实施惩罚性打击。

那时，福建前线的炮兵力量并不强大，只增加了一

个炮兵师，而这个师原来就是驻闽的，以后支援越南战争，奠边府大捷以后才归建福建前线。

根据以往规律，每隔一天，台湾便向金门开来一至二艘中字号运输舰。每次运输舰到来，三艘驱猎舰都到外海去接。我们根据当面这个情况，一九五三年九月三日下午一时五十分，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发动炮击，各炮群同时发射，大、小金门上顿时腾起一团团灰褐色的硝烟……

大、小金门的国民党军被突然的炮袭打闷了。一下子就摧毁敌炮兵阵地七个，击沉炮艇、拖轮各一艘，击伤驱猎舰三艘，击毁水上活动码头一个。

那位美国“大使”兰金向美国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说：“……如果赤色分子能够使所有的人看到美国对这些沿海岛屿不能或不愿有所作为，那末，他们就会赢得另一个回合”。

我军炮击金门是为了响应全国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美国怎么办呢？

美国国务卿，那个臭名昭著的杜勒斯九月九日“访问”了台湾，逗留了五小时，匆匆而去。当天，我们对金门实施猛烈炮击，以作回答。比尔的《杜勒斯传》写道：当东南亚组织成员国在马尼拉举行会议时，“共产党人就开始从沿岸的阵地上炮轰金门。当杜勒斯返国途中在台北停留时，这次攻击之剧烈，使得美国一些战略



家相信共产党人有侵入台湾的意图。除了密集炮轰之外，北京电台还作出好战的威胁，公开宣布要夺取这个岛”。

炮战持续了十几天。我海、空军都还没有入闽，防空力量很差。美蒋抓住我们这个弱点，从台湾派出飞机轮番轰炸福州、厦门及前沿炮兵阵地。福州当时木头房子居多，被炸得多处起火燃烧。我们向军委要求加强福建前线防空力量，从北京调来了一个八二高射炮团，部署在福州、厦门两地，重点是放在福州。我们的防空力量增强了，不断给来轰炸的敌机以打击，击毁击伤不少敌机，使敌人的气焰稍为收敛，福州、厦门的空袭稍见缓和。但是防空兵力毕竟还是不足，我们只能在福州、厦门构成对空防御，对厦门前线其它前沿炮兵阵地就顾不过来了。敌人发现了我们空防的这个弱点，就集中轰炸我厦门侧翼前沿炮兵阵地，沿屿大嶝、小嶝的我军炮兵阵地上浓烟滚滚。为了给疯狂的敌人一个打击，狠狠地教训他们一下，我们唱了一出“空城计”。国庆前夕，九月二十八日，突然将八二高射炮团从福州调至厦门，于二十九日拂晓前隐蔽进入阵地，构成一个对空火力网。二十九日中午大批敌机又肆无忌惮地飞来轰炸，我防空部队突然以密集火力猛射，击落敌机三架，击伤多架。敌机遭到突然打击，仓皇逃去。当晚，又把这个高射炮团调回福州，以掩护福州国庆节游行。当时福建前线防

空部队骨干只有这个八二高射炮团，我们对这个团的使用非常重视，经常用这种机动办法，使得敌人莫明其妙，不知道我们究竟有几个八二高射炮团。从此以后，福州、厦门及前沿阵地上空的紧张状态有所缓和。九月二十六日，国民党空军人员胡弘一从台湾冈山机场驾驶A T 6型200号高级教练机一架，起义来归。从“九三”炮击开始，我军共击落敌机十二架，击伤四十二架。击毙的驾驶员中有上校大队长陈康，他驾驶的那架飞机残翼上还标有“银空猎犬”四个字。

美帝国主义表面上是一只凶恶的老虎，其实是一只纸老虎。那位美国“大使”兰金头脑有点清醒了，在九月三十日给国务院写信说：“正当马尼拉会议开始阶段，偏偏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炮击，这并不是偶然的。再没有比某个美国发言人出来宣布在任何情况下第七舰队都不会援助金门等等，会使赤色分子更为高兴的了。……另一方面，正式地、公开地承担保卫所有有关的三十多个岛屿或其中任何岛屿的作法，又可能是不明智的”。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再次知道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了。

这次炮击从九月三日到二十二日。且不说蒋介石一再召开紧急会议，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为此也在九月五日慌忙与国防部官员举行会谈。正在马尼拉参加讨论成立东南亚军事集团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在用“相当多的时间和心思”来研究金门问题，并就此与美国太

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进行商谈。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浙江前线我军解放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二月五日，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掩护下，国民党军撤离上、下大陈岛。二月二十二日，美国通知国民党当局：美军将不协助他们守卫南鳧山岛。国民党军只能在三天之内撤走了。

这期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发表了《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必须停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

杜勒斯色厉内荏地说：“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暴力并没有使他在台湾问题上得到任何东西，他所得到的只是美国承诺要进行厉害的报复”。三十多年后，重读这段话，更加觉得有趣了。台湾国民党当局最后一任驻美“大使”沈剑虹在《使美八年纪要》一书中揭开了底牌：所谓“共同协定”，国民党当局“不仅意欲保卫台澎，而且意欲保卫金门马祖”，仍是想拖美国下水的老主意；美国则主张放弃金马，并由此“播下后来台北和华盛顿之间争执的种子”。毛主席利用了美蒋之间的这一矛盾。一九五五年八月以前，我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和美方官员有过不定期

的非正式的接触。周恩来总理在参加亚非会议的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表示愿就台湾海峡局势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两国驻捷克的大使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兰金说：“台湾的中国政府，对日内瓦的这几次会议忧心忡忡。”“继续不断的会谈仍旧是反复引起摩擦和猜疑的根源。”我方和美国、蒋方的斗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万炮齐发

大规模的炮击金门，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的。这是震惊世界的炮战，在斗争策略的运用上又是史无前例的一战。

炮击金门，是中央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时决定的。我原来没有参加这次北戴河会议，留在福州。我记得当时福建正是刮台风的时候，部队、机关都在帮助农民抢救粮食、作物，我也在下面工作。突然通知我回福州接电话，而且明确说要我到作战室去接从北京来的保密电话。一接电话，原来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同志。他告诉我，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要我负责指挥。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同志，已经到任接替我的工作。我虽然仍兼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地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区司令员指

挥，为什么要我来指挥呢？我有点疑问。就问王尚荣同志：“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他答：“是中央决定。”我又问：“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王尚荣同志感觉到我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刘培善同志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我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刘说：“那你就不用问了。”我只好回答：“既然如此，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

我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同志代替我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并立即组织前线指挥所。第二天，我即由福州乘车奔赴厦门，同去的有副司令员张翼翔同志和副政委刘培善同志，张兼任前线指挥所参谋长。此时，皮定均副司令员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七月十九日我们一行到达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二十四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七月二十七日收到毛主席致彭（德怀）、黄（克诚）信（注：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同志为总参谋长）：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放，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

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毛主席信上所说，“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指的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翻了旧统治集团，美帝国主义直接出兵入侵黎巴嫩，随后英国又侵入约旦。同时，美帝国主义于七月十五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美、英、法介入后，苏联也有所动作。世界进步舆论都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七月十七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和袭击准备。

我接到毛主席电报后，立即找张翼翔、刘培善同志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加之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暴雨十九天，冲毁大小桥梁四十三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在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

疾病丛生；特别是空军进入福建前线的转场尚未完成，海军入闽部队尚在调动中，认为推迟炮击时间较为有利。当即复电表示：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由于推迟了炮击时间，又进行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地面炮兵的集结和展开，炮兵对金门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作战图上；也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的入闽部署，制定了炮兵、空军、海军协同作战方案，一切作战准备都就绪了。同时，对部队进行了形势任务和斗争方针政策的教育。

首先，空军以逐步推进的方式转场入闽。由于福建的几个机场已抢修完毕，第一批转场部队于七月二十七日顺利进驻连城、汕头机场，尔后逐步向漳州及沿海机场推进，至八月十三日进驻龙田机场止，基本上完成了第一线机场的转场任务。

炮击金门的序幕是空战。没有这场空战，掌握了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就没有下一步的炮击。当时沿海机场的飞机起飞，不能朝大海方向，只能往后飞，升空后再调头。如果朝前起飞，就飞到台湾海峡上空了。我空军要在福建前线站住脚，首先必须要战胜敌人的空军，不然，掌握不了制空权。为了加强福建前线空战的指挥，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同志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

员。海军进入福建后，彭德清同志也调来任厦门海军基地司令员。七月的一天，空军进入福建。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福州上空，人民欢欣鼓舞，机关办公的、工厂做工的，学校上课的，全从屋子里出来，很多人爬到屋顶上欢呼。因为人民群众以前吃够了敌人空袭的苦头，天天有警报，不得安宁。在福建前线的空战中，美国自己的飞机不来，只是掩护台湾蒋军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掩护蒋军飞机在第一线作战。我们的飞机每次只能出动一半，另一半保护机场。国民党空军没有这个顾虑，不要留机动飞机守机场，机场由美国空军保护，所以蒋军的飞机一批接一批地飞来。这场争夺制空权的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甚为激烈。空战后期，国民党空军使用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空战中，我们有两架飞机不明不白地被打落了，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被击落的，后来才弄清是新式武器干的。国民党空军损失五十多架，大约占它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损失二十多架。空战后，敌人老实了。制空权被我们掌握了，为大批炮兵开进厦门，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

炮兵调来约三个师，还有一个坦克团。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重炮加上坦克，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轰轰隆隆，连街道都颤动了。空军、海军、大批炮兵和坦克进入福建，老百姓高兴极了，纷纷议论，都认为这一次不但是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是要解放台湾了。



八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海军130岸炮部署在厦门对岸角尾。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长达三十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我们能把炮兵阵地摆得那么开，那么密集，在厦门前沿就部署了一个炮兵师，主要就是因为空战的胜利，我们掌握了制空权。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北京来命令。

八月二十日，北京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北戴河。我乘坐专机飞到徐州上空时，北边正在下大雨，是雷区，不能飞越，于是绕道开封。谁知道开封以西以北也是雷区，这样飞机只好在开封降落。第二天上午，继续飞行，中午即到了北戴河。

二十一日下午三点钟，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知道这是要我去接受命令了。我一见到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都一一汇报了。彭老总、林彪也参加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也在座。地图没有挂在墙上，而是摊在地毯上。毛主席一面听我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主席一问，我即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听我这么一说，

主席考虑了十几分钟，然后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得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这是主席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同志拿了一张条子给我，那是林彪写给主席的。林彪这个人很会捉摸主席的意图，他知道主席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的问题，所以写了这个条子。条子的内容是，他看到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因此提出，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此人也有点莫名其妙，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这怎么行呢？看到条子，我很吃惊，便问王尚荣同志：“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王尚荣同志说：“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这关系到最高决策问题，既然没有要我表态，我就一句话也没说。

第二天，继续开会。主席下决心了，看来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主席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我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老总一起住。

毛主席交代我跟彭老总一起住，把我弄紧张了。我怎好和彭老总一起住呢？主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也不好问。彭老总也没派参谋来叫我住到他那里去。晚上我散步后回到房间里，正在发愁，恰好王尚荣同志来，他说：“老兄，主席不是交代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我说：

“我哪好去住啊?!”他知道我为难，就说：“我替你想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到你的房间里。”这下就解决问题了。我们商定，前线直接同我通话，我再通过他转报主席，主席的指示也由他转告我。我问：“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代我同他住一起的呀！”他说：“你不要管了，此事由我办。”这位作战部长真会处理问题。

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同志代我指挥。

八月二十三日中午十二时，炮击开始。第一次急袭，所有炮兵阵地同时向金门开火，一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火力的猛烈和密集，后来有人评论：“与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从纪录片上看，整个金门岛都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蒋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我们的炮火打得很准，一下子摧毁了敌人的许多阵地，特别是集中火力猛击金门胡璉的指挥所，打得非常准确，可惜打早了五分钟！后来得到情报，我们开炮的时候，胡璉和美国总顾问刚好走出地下指挥所，炮声一响，赶快缩了回去，没有把他们打死。要是晚五分钟，必死无疑。在阵地上的美国顾问被打死了两人。对此，美国人一直没有吭声。

毛主席决定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就要解放金门、马祖呢？当时，不但中国人，包括福建前线我们这些人，

还有台湾蒋介石，而且外国人，包括美国艾森豪威尔本人在内，都没有搞清楚。毛主席这一重大决策，是同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是一个有国际、国内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这是当时一切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有弄明白的。毛主席选择这个时机大规模炮击金门，摆出我军要解放台湾的姿态，一是警告蒋介石，二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调动当时正在侵略中东的美国第六舰队，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

福建前线我军实施对金门大规模炮击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三天睡不着觉，摸不清我军此举的意图。他从我空军入闽，在空战中已击败了蒋介石空军，牢牢地夺取了福建前线上空的制空权；我海军入闽，已基本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制海权；大批炮兵及坦克部队调入福建，鹰厦铁路已修通，福建前线包括汕头等地已修建了大批空军作战基地等种种迹象判断，我军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的行动，决不只是要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的前奏，下令将地中海美第六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七舰队会合，加强第七舰队，中东局势由此缓和下来了。艾森豪威尔不是毛主席的对手，完全被毛主席调动了。上面提到的《使美八年纪要》的作者沈剑虹（这段时间内，他是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写道：“一九五八年，即该约生效后第四年，中共

即掀起台湾危机，试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及‘台海决议案’的效能。当时八月间，对金门实施持续猛烈炮轰，同时公开扬言要攻占台湾及把美国逐出西太平洋”。“试探”一词，倒是用得很贴切的。杜勒斯于九月四日发表声明，公开要扩大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侵略范围，对中国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讹诈。美国从中东的第六舰队调来一半舰只，加上从本国和菲律宾调来的，美军在台湾海峡就有航空母舰七艘、重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十艘。美国第四十六巡逻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它好几批飞机也调来台湾，美国第一批陆战队三千八百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侵台美军司令部还公然扬言，要在八日的演习中以舰炮封锁我沿海岛屿。我军实行对金门大规模炮击，就这样把美帝国主义的注意力从中东转移到远东来了，地中海紧张局势趋向缓和。

我国外交部于九月四日发表领海线声明，宣布我领海线为十二浬，向全世界宣告保卫我领海不受侵犯的坚强决心。福建前线部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国人民的这一坚强决心。

八月下旬，我由北戴河回到厦门前线。此时大、小金门蒋占岛屿，包括金门唯一的港口料罗湾和海面，全部在我炮火射程之内，完全被我炮火封锁，截断了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金门蒋军的补给全靠台湾从海上运输，以海军护航，我军炮火即转向攻击其海上运输线，

专门打它的海上运输船只。蒋军舰只受到严重打击，不断被我海岸炮火击沉击伤，最后，金门海上运输线完全被我截断了。金门不但弹药补给中断了，粮食、燃料的补给也中断了，储备的炮弹在半个月炮战中消耗得差不多了，储备粮只有一个月，也消耗差不多了，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即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九月七日，美军以美舰护航，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海上编队左、右两侧护航，把蒋军舰只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军舰只相距仅二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美蒋联合编队从台湾一出动，我们在雷达上就看得一清二楚。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入，怎么办？打不打？如果一打，势必会把美舰一起打上，这就可能把美国拖下水，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不是前线指挥员有权可以作出决定的，这只能由中央、最高统帅毛主席才能作出决定的。我就立即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回答：照打不误。我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主席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才打，要我们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我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

我们是否还击？毛主席明白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同志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我转达的。我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再问王尚荣同志：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这样我就说：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这一下我就极为紧张了，因为要严格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这很不好办。美舰和蒋舰相距仅二海里，如果哪一个炮群瞄准不确，稍有误差，就会打到美舰。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我不予还击，这倒还比较好办。我为了准确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就亲自向三十一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我这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我又把毛主席的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各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我又交代把美蒋海军联合编队的队形、美舰蒋舰在编队中的位置及其相互距离、航速、预计到达金门料罗湾的时间，一一详细通报了三十一军及各炮群，要他们立即作好一切准备，以便一接到开火命令，都能准确无误地执行。同时，也将情况通报了空军、海军。这一切都安排就绪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九月七日中午十二时正，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在料罗湾港口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我立即将这一情况直报北京。北京接到我的电话后，毛主席即下令开火。我迅即命令各炮群按预定作战方案开炮，专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全线所有炮群接到命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于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美国军舰一走，蒋舰及所有运输船只孤零零地完全暴露在我军面前，遭受我军猛烈炮火的狠打了。这时，金门蒋军和在料罗湾的蒋舰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问：“美国朋友呢？美国军舰呢？”蒋舰回答：“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大骂“美国人混蛋”。他们更急了，使用报话机通话，连密码都不用了，我们的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蒋舰被我击沉三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这一场惊险的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宣告结束。这是我军大规模炮击金门以来，同美帝国主义第二个回合的较量。

金门炮战，美军已经介入，这次美蒋编成联合编队，美舰护航，但一旦遭我一阵猛烈炮火攻击，我空军、海军尚未出动，美舰竟然不敢向我开火，丢下蒋军掉头就跑，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当时我在厦门云顶岩前线指挥所里，还准备应付美舰向我军开火呢，当从望远镜里



看到美舰在我猛烈炮火之下溜走的情形时，真感意外。当时我一下还不明白毛主席命令的意图所在，我只是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事后我才明白，原来毛主席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美帝国主义的底全都摸清楚了。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帝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而已。如果要问：福建前线我军对美蒋联合编队敢于照打不误，其意义何在呢？取得了什么胜利呢？这次较量的意义和胜利，不在于击沉、击伤蒋军多少舰只，而在于把貌似凶恶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底牌摸清楚了。这些认识，是在攻击了美蒋联合编队的战斗以后，我才领悟过来的。从此以后，我就更进一步意识到福建前线面对台湾海峡，不只是我方和蒋方双方的斗争，而是我方、蒋方和美方三方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既是军事的，也是政治的，外交的斗争，稍有不慎和失误，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我就更加小心谨慎从事了。这时台湾海峡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拖美帝下水，而我们则力求

避免同美帝发生直接冲突，美帝也极力避免同我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当时台湾海峡非常微妙的三方形势。

这里要补述一下福建前线海军的作战。福建前线海军在这次炮击金门中，除使用岸炮外，只使用了轻型舰艇。九月以后，台湾海峡又受季节风的影响，风力经常在五至七级，涌大浪高，限制了海军轻型舰艇的活动，但是在这次炮击的过程中，福建前线海军在厦门海域协同作战，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战果。高速炮艇协同鱼雷快艇，首战就击沉国民党海军的江字号猎潜舰，接着又击伤永字号舰二艘，击沉、击伤中字号舰各一艘……这一阶段的海战，对海军的锻炼是很大的。

这里再叙述一下炮击金门战斗中的一个插曲。八月底，韩先楚司令员陪同军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同志、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同志也到达厦门视察。韩先楚同志到厦门以后，就向我提出使用空军轰炸金门。我考虑到毛主席并没有即行登陆解放金门的指示，炮击金门的作战方案并没有涉及使用空军轰炸，如果我军不实行登陆解放金门，那么现阶段没有使用空军轰炸的必要，特别是如果要空军轰炸金门，不但要使用轰炸机，还要使用战斗机掩护，这样的空军编队在金门上空作战，就很难避免同美国空军冲突。我这时已经意识到毛主席的意图，力求避免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我不同意韩先楚同志使用空军轰炸金门的意见。但既然司令员提出建议，我

为了尊重他，就建议把我们两人的意见报告军委和毛主席。韩先楚同志也同意。第二天王尚荣同志打电话给我，说：“电报收到了，送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把王尚荣同志回答的电话记录拿给韩先楚同志看，他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韩先楚同志刚到福建，可能不大了解情况。其实，在炮击金门的整个过程中，美国和我方都力求避免发生直接冲突，特别是双方都尤其注意严格管制自己的空军活动。美军在台湾海峡中线划定一个分界线，美机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地面指挥严禁其飞越划定的分界线。经常发生美军飞机越过分界线的事，其地面管制站总是立即大骂。当时我们在福建前线的监听站都备有懂英语的人值班，所以听得清清楚楚。而我们也严格管制我空军只在我沿海空域飞行巡逻，绝对不准越出规定的飞行空域，保持空中和美军的距离，以避免同美国空军发生直接冲突。

### 国防部文告：谈谈打打，打打停停，半打半停

一九四九年十月我军攻击金门失利以后，厦门前线和蒋占岛屿大、小金门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厦门和小金门的距离只有二千多米，我前沿阵地大、小嶝岛和大金门距离最近，不到一公里。蒋军以一个兵团的重兵防守金门。在厦门海堤未修建以前，我们也一直以一个军的

兵力防守厦门。双方对峙，经常进行炮战。在朝鲜停战以前，即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金门蒋军的炮兵火力占优势，加上此时我空军尚未入闽，我国海军处在初建阶段，亦未入闽。因此，在这三年时间里，蒋军不断以海军袭扰福建前线沿海地区，封锁了厦门港、福州马尾港；蒋军空军经常空袭厦门、福州，特别是对厦门的空袭更为频繁，已日以为常；金门蒋军自恃炮兵占优势，更经常炮击厦门，厦门全岛、包括鼓浪屿完全在金门蒋军炮兵火力的控制之下。厦门军民经常遭受蒋军炮击和蒋机轰炸，有时日夜数次，几乎成为家常便饭，这个英雄城市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农民照样种地，工人照样做工，学生照样上课，毫无畏惧，不愧为英勇顽强的人民。当时厦门完全成为一个战时的城市，国内其它地方的人到厦门，提心吊胆，看到厦门人民勇敢沉着，在战火下保持着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既吃惊，又钦佩。所以，福建前线和金门之间的炮战，并不是一九五八年才开始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下旬开始的对金门的大规模炮击，持续了一个多月，我军的目的已经达到，把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调到了台湾海峡，中东紧张局势趋向缓和；攻击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之战，又把美帝国主义的底摸得清清楚楚了。到了这个时候，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战斗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呢？

下一步的文章怎么作呢？顺理成章的是，下一步就只有登陆解放金门了，如果金门解放，那么马祖的解放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顺手牵羊就是了。此时金门已被我军炮火封锁了一个多月，海上补给线已断，金门蒋军的粮食供应已发生危机，弹药也已消耗得差不多，金门的防御工事也已被我军炮火摧毁得差不多，可以说是已到了弹尽粮绝之日了。此时如果我军发动登陆，金门垂手可得。所以，福建前线我们这些人，都在焦急地等待毛主席下命令了。我们都摸不透毛主席下一步的意图何在？总以为下一步的文章就是实行登陆、解放金门了。出乎我们意料，在国庆节后的第五天，即十月六日北京发表了国防部文告。文告全文如下：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到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果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

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1958年10月6日上午1时

这份文告的发表，标志着金门炮击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即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打打谈谈，打打停停，半打半停。

文告发表以后，金门前线炮声沉寂，但台湾海峡风浪依然。台湾当局和美国政权慌了手脚！

台湾当局一则说这是“骗局”，一则说这是“发动新攻势前的喘息”，一则说这是要“无条件投降”，一则说这是“离间中美合作的关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真是心慌意乱，语无伦次。

这是“骗局”吗？不是，因为炮击千真万确地停止了。

这也不是“喘息”，因为人民解放军并不打算攻占金

门。

这也不是要他们“无条件投降”，因为我们国防部长明明说是“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又怎么会是“无条件投降”？

至于说到“离间”，实际上台湾当局和美国人的关系本来就不美妙。我们只要求美国人休管我们中国人内部的事情，休想骑在中国人头上拉屎撒尿。蒋介石也心里有数，寄人篱下，仰承鼻息，滋味很不好受。

美国人的反应如何呢？

先提“停火”，后提“永久停火”。实在荒唐！正象毛主席说的：“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

十月六日国防部文告宣布暂停炮击金门一个星期，以没有美军护航为条件，是给金门蒋军以补充给养的机会，也是给台湾当局以考虑和平解决的机会。一星期届满后，为了再让金门军民得到充分补给，并给台湾当局以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十月十三日，我国国防部再次发布命令，对金门炮击再停两周。文告全文如下：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



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说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

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国防部长

1958年10月13日上午1时

但是，台湾当局坚持顽固态度，拒不接受和谈，并邀请杜勒斯到台湾策划进一步实施“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美国军舰在我停炮后又一度进入金门水域，公然违反我们暂停炮击的条件。因此，我国防部于十月二十日发布恢复炮击的命令。

炮击金门逐步发展成为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而且变成一个长期的斗争了。在军事上的斗争形式，就是单日打，双日不打。这种奇特的战争方式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为了了解它的由来，这里再摘录十月二十五日我国国防部长的《再告台湾同胞书》：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种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么？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

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

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我在这一章里引用的几篇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的文告，都是毛主席亲自撰写的。这些文告不仅是值得后人传诵的绝妙文章，更可以从中看出毛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伟大胸怀。今天重读这些文章，仍然值得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深思。

从此以后，炮击金门不但变为单日打，双日不打，

而且炮击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虽然双方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协议，实际上成为一种不成文的默契。我们对金门打炮，不打阵地和居民点，只打到海滩上。金门蒋军的回炮，同样也只打到我们的海滩上。后来又发展到逢年过节，停止三天炮击，让金门军民平安过节。金门方面也照此办理。美蒋完全被毛主席的高明策略牵着鼻子走，打炮也演变成美蒋我三方之间一种特殊的对话，一种不在谈判桌上进行的谈判。这真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毛主席决定不拿下金门，现在看来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留下一个“对话”的渠道。后来讲“三通”，其实前线和金门之间早就用各种特殊的形式“通”了。

### 金门炮战之余波：万炮轰“瘟神”

从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以后，我国政府对于美国侵犯我国领空、领海不断发出严重警告，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我国外交部又提出了第一百次警告。美国在远东地区，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的演习公然宣布是针对中国的。这年四月，美国太平洋地区武装部队总司令费耳特公然说：“始终存在着在台湾问题上同共产党中国人发生一场有限战争的危险。”这是公开的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

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已过了五年，到这时也正举行了一百次会议。其间，在一九五七年底美国政府就曾经违反协议，中断会谈达半年之久，只是由于我国采取了严正态度，并且对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玩弄“战争边缘政策”的军事挑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迫使美国不得不又一次回到谈判桌上来。

与此同时，美国还千方百计地玩弄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断放风，提出所谓“中华福摩萨国”、“托管”台湾等等永远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荒谬主张，妄想把台湾变成它侵略中国和远东地区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就在这个背景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七日到十九日“访问”台湾。艾森豪威尔的亚洲之行，实在不顺利。他被日本人民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他的“先行官”挨了一顿下马威，自己也吃了“闭门羹”。菲律宾受美国控制已久，那里的人民也起来反对他。

当然，蒋介石集团对艾森豪威尔的访问是抱有希望的，除了会谈和宴会外，还让这位“瘟神”在总统府广场对台北市民发表演讲。当时担任艾森豪威尔翻译的沈剑虹在《使美八年纪要》一书中写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九六〇年访华之行，使中美两国关系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高潮。他是历来第一位在位内访问我国

的美国总统。”

毛主席决定，在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并由我们把毛主席起草的“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司令部”的名义公开发布。“告同胞书”指出：

“艾森豪威尔要到你们那里‘访问’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杜勒斯虽然死了，美国并吞台湾的心并没有死。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就是杜勒斯的政策。”

文告庄严宣称：

“为了支持亚洲各国人民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支持台、澎、金、马爱国同胞反对艾森豪威尔强盗旅行的正义斗争，为了表示伟大的中国人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蔑视和鄙视，我们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在六月十七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六月十九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在金门前线举行反美武装示威，打炮‘迎送’。美国的武装力量，近来不断向我们威胁和挑衅。我



们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向美帝国主义示威。”

并且警告国民党军队：

“在炮轰期间，你们务必躲在安全地带，不要出来，以免误伤。你们的船，在这两天也要注意，切勿驶近炮轰地带，以免危险。倘若有人不遵我们劝告，甘心为虎作伥，胆敢扰乱伟大的反美武装示威，必遭严惩，勿谓言之不预！”

九月十七日，我福建前线所有火炮一齐开火，正是当时报纸所形容的：万炮齐发轰“瘟神”。轰得艾森豪威尔在海峡对岸心惊肉跳，夜不成寐，于是提前结束在台访问，匆忙走上归途。

## 绞索政策

朝鲜停战以后，彭德怀同志就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是最积极主张解放金门、马祖的，并为此做了许多工作。

彭德怀同志于一九五四年来福建前线视察，这是他第一次到福建前线，随同来的有黄克诚同志和陈赓同志

以及总参谋部人员。那次彭德怀同志在福州只住了三天，听取军区关于福建前线情况的汇报后，立即驱车前往厦门前线，由我陪同。他到厦门，是专门为了研究解放金门的问题。他听了我们关于解放金门的准备工作汇报，特地亲自登上厦门云顶岩指挥所，对金门进行仔细的观察。就在这次视察中，彭德怀同志指示要作好解放金门的准备，决定准备空军入闽，并为此而决定抢修鹰厦铁路，修建福建前线足够使用的空军机场。正因为如此，所以在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的后期，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并且都已经成熟了，我们都认为炮击金门的下一步文章，也是最后一步的文章，就是实施登陆，解放金门了。哪知道以后北京接连发表国防部文告，炮击金门变成长期化、经常化，单日打，双日不打，逢年过节还宣布放假三天，停止炮击。解放金门一事就此搁下，再也不提了。当时我们很不理解，以后毛主席提出“绞索政策”，我们才明白了。

“绞索政策”的含义是什么呢？毛主席告诉我们，金门、马祖是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绞索”，而更重要的也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这是美帝国主义自己套上的，因为它霸占台湾不放，同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就是一个“绞索”。美帝国主义自己套上了，我们为什么要帮助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把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绞索”解开呢？后来我从福建前线的斗

争中，特别从一九五八年这场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战斗中，才更进一步深刻理解毛主席“绞索政策”的意义。

毛主席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公开讲：“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脖子上，而且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他脖子上的绞索就将越紧。”

我军大规模炮击金门以后，美国人也发现了金门、马祖是他的一个大包袱，想扔掉它，几次压迫蒋介石退出金门、马祖，但是蒋介石不干，同美帝国主义闹独立性。蒋介石有他的想法，他不从金门、马祖撤退，其用意就是拖住美国不放。我们不解放金门、马祖，不让蒋介石扔掉这个包袱，也就不让美国人把这根绞索从自己脖子上脱掉。毛主席的政略、战略和外交策略真是高明，我们开始是不懂的，以后我们才懂。

一九六〇年美国进行总统选举，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竞选演说中提到金门、马祖问题，成为他们的一个辩论题目。肯尼迪在辩论时说：“如果能说服蒋介石，把防线划到台湾和澎湖周围，则美国卷入战争的机会将减少很多。”可见美国有些人以后也慢慢懂得这个道理了。

金门、马祖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微妙问

题。

金门炮战，世界瞩目。福建前线军民同仇敌忾，全国各族人民兴奋、高兴。一九五八年冬，全国除西藏外，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专门派出了慰问团赴福建前线慰问，大多随带各地剧团到福建前线慰问演出。全国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越剧著名演员袁雪芬、尹桂芳、傅全香、徐玉兰，河南豫剧著名演员常香玉，武汉著名汉剧演员陈伯华，以及各省许多剧种的著名演员，都到了福建前线，以精彩的表演，慰问前线军民；全国许多著名作家、画家也到福建前线采访、体验生活。这对福建前线军民是莫大的鼓舞。

金门炮战，非比寻常，自始至终都是在毛主席直接掌握与指挥下进行的。我作为前线指挥员，始终严格地执行毛主席的命令。在战斗过程中，遇到重大情况变化，或者有不同意见时，我都是直接请示毛主席作出决定的。前线炮兵部队、空军、海军和其它参战部队英勇奋战，涌现了许多英雄部队和英雄人物，安业民、杜凤瑞等许多烈士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前线民兵和军队并肩作战，出现了许多民兵战斗英雄和著名的厦门前线“小八路”。福建地方以及友邻地区全力支援这次炮战。前线军民共同努力，创造了金门炮战的军政全胜。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让人体会到炮击金门战斗的

## 深远意义

炮击金门，并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也是重大的政治、外交斗争。一九五八年实施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战斗，我们取得了引起全世界注目的辉煌胜利。这个胜利不只在军事上的，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外交上取得重大胜利。首先是支援了当时中东人民的斗争，把美国在地中海的第六舰队调到台湾海峡来，把美国的注意力从中东地区吸引到远东来了，从而缓和了中东紧张局势，这是对当时中东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支持。大规模炮击金门，实际上是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一次较量。炮击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一仗，揭穿了美帝国主义这只凶恶的老虎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这对当时世界上有些人害怕美帝国主义，弄清究竟是谁怕谁这个问题，是有作用、有意义的，提高了世界人民同美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其次，炮击金门的战斗明白地警告了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国人民的事，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最后，炮击金门的战斗向台湾当局提出进行谈判、和平解放台湾问题的方针。当然，当时还没有提出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台湾问题，而在金门炮战中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和平解放台湾问题，这是有深远意义的。

炮击金门的战斗后来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历史事件，许多研究国共关系、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史的著作中都

涉及到这次战斗，一些有关的政治家和军事将领在回忆录中也都谈到有关的情况和见解。这些文章，我也读了一些。作为这次历史性事件的参加者，我想也有必要把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和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以供后人参考。金门炮战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的局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党中央又提出“一国两制”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构想。台湾回归祖国，这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愿望，我深信，完成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一定会实现，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 叶飞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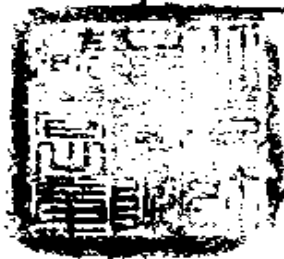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67950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21167950



# 叶飞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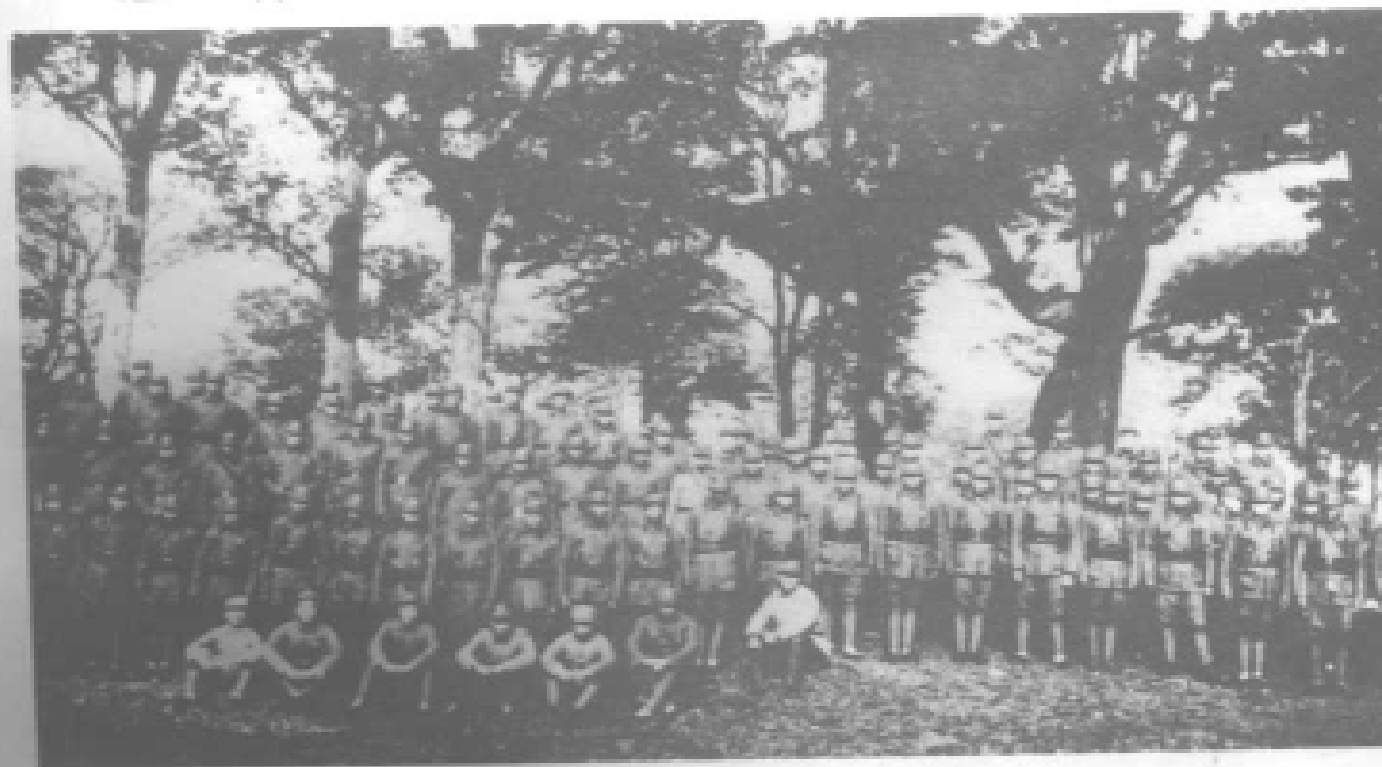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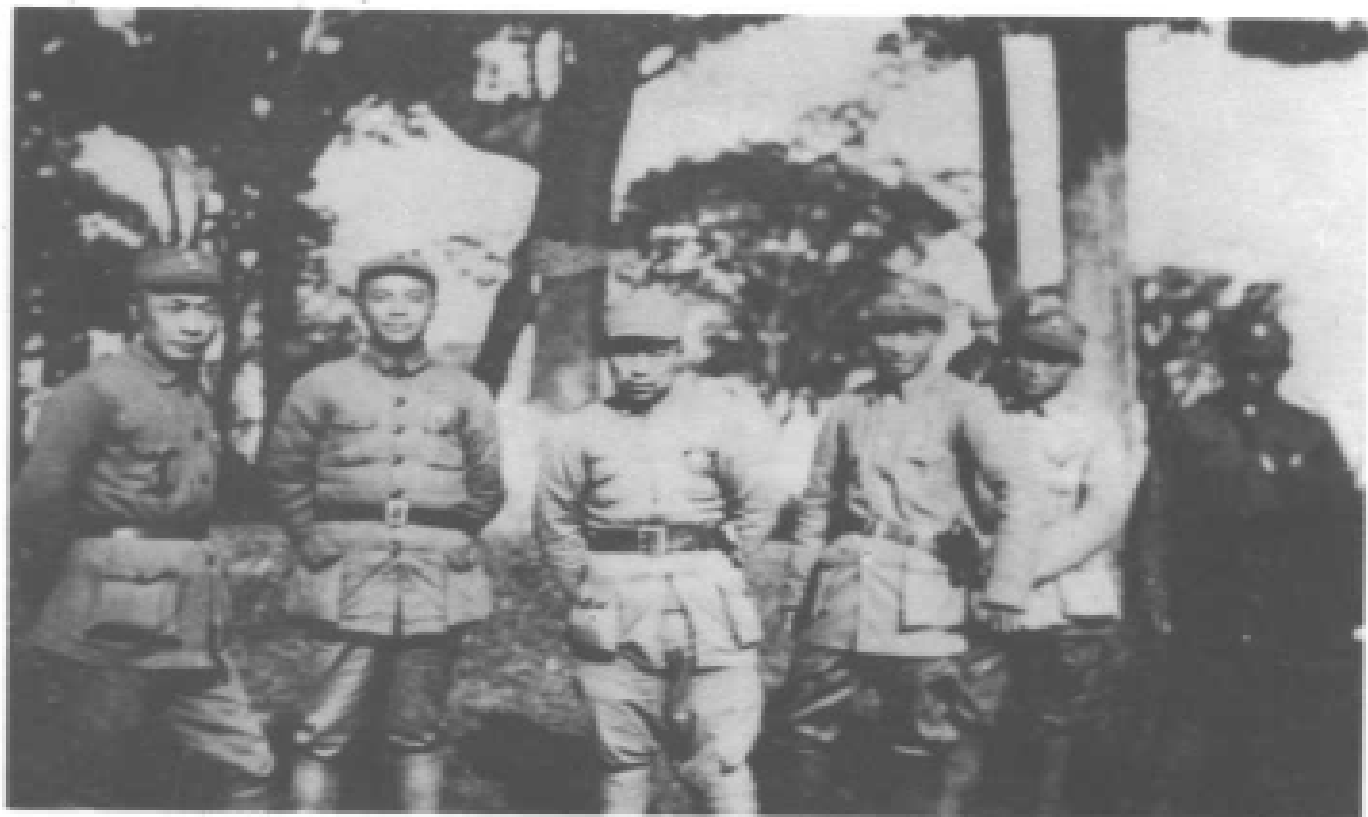
李兆



一九三八年一月，部分南方游击区负责人于南昌新四军军部合影。前排左起：张云逸、叶飞、陈毅、项英、黄道。后排：顾玉良（左一）、薛尚荣（左三）、李步新（右一）。



一九三九年五月，新四军六团东进前，陈毅司令员与六团连以上干部合影于一支队司令部驻地。前排左三为陈毅，左四为叶飞。



新四军六团东进江南苏（州）、常（州）、太（仓）地区时合影。左起：陈毅、刘炎、刘飞、叶飞、吴焜、乔信民。



一九三九年于阳澄湖上留影。



一九三九年十月，叶飞率部渡长江，北上抗日。



一九四〇年八月，于黄桥合影。中为吉洛（姬鹏飞）、右为张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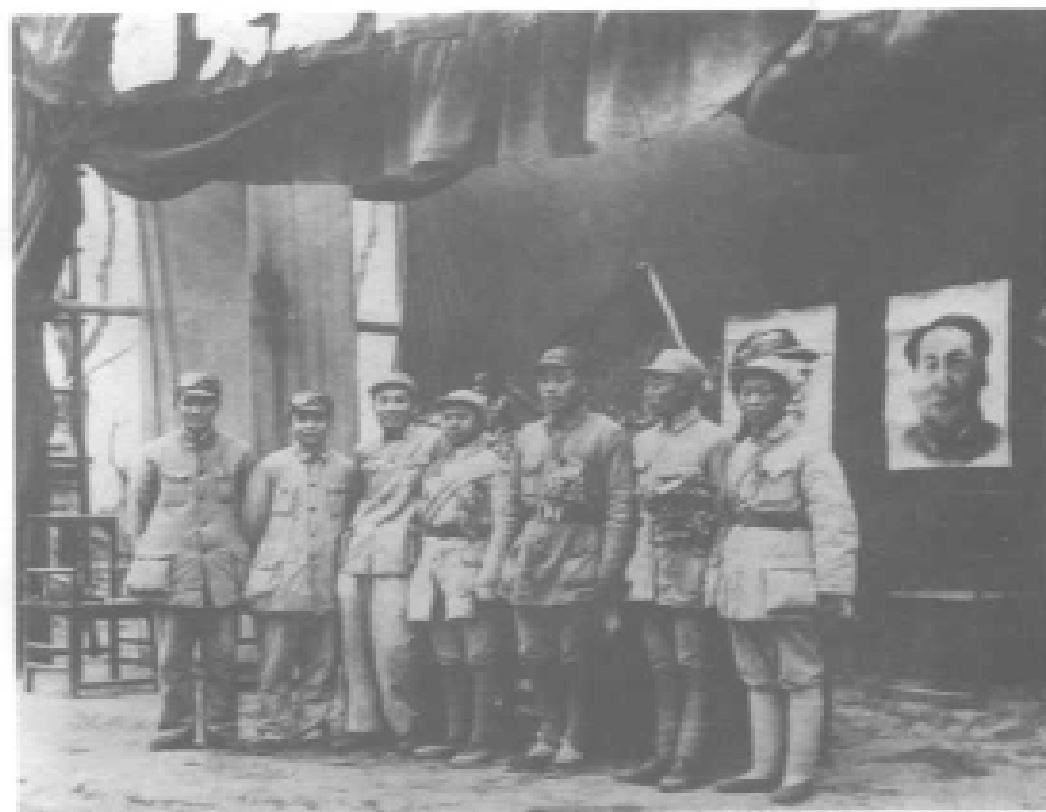
一九四四年冬，叶  
飞在苏中军区司令部、  
苏中区党委干部会议上  
讲话。



一九四五年八月，  
抗战胜利后于浙江留影。



一九四七年一月，陈毅与华东野战军的领导合影。左起：叶飞、丁秋生、韦国清、邓子恢、陈毅、唐亮、粟裕、陈士榘、谭震林。



莱芜战役后，在庆功大会上与战斗英雄合影。左一为汤光恢，左二为谭启龙。



莱芜战役后，在全纵队庆功大会上祝酒。



一九四八年，于华野濮阳整训中留影。

一九四九年合影。  
左起：王必成、粟裕、  
叶飞、陶勇。



上海战役中，叶飞在指挥战斗。





三野十兵团进军福州后合影。左起：刘培善、韦国清、叶飞、陈铁君、陈超寰。



五十年代初，在厦门前线与官兵同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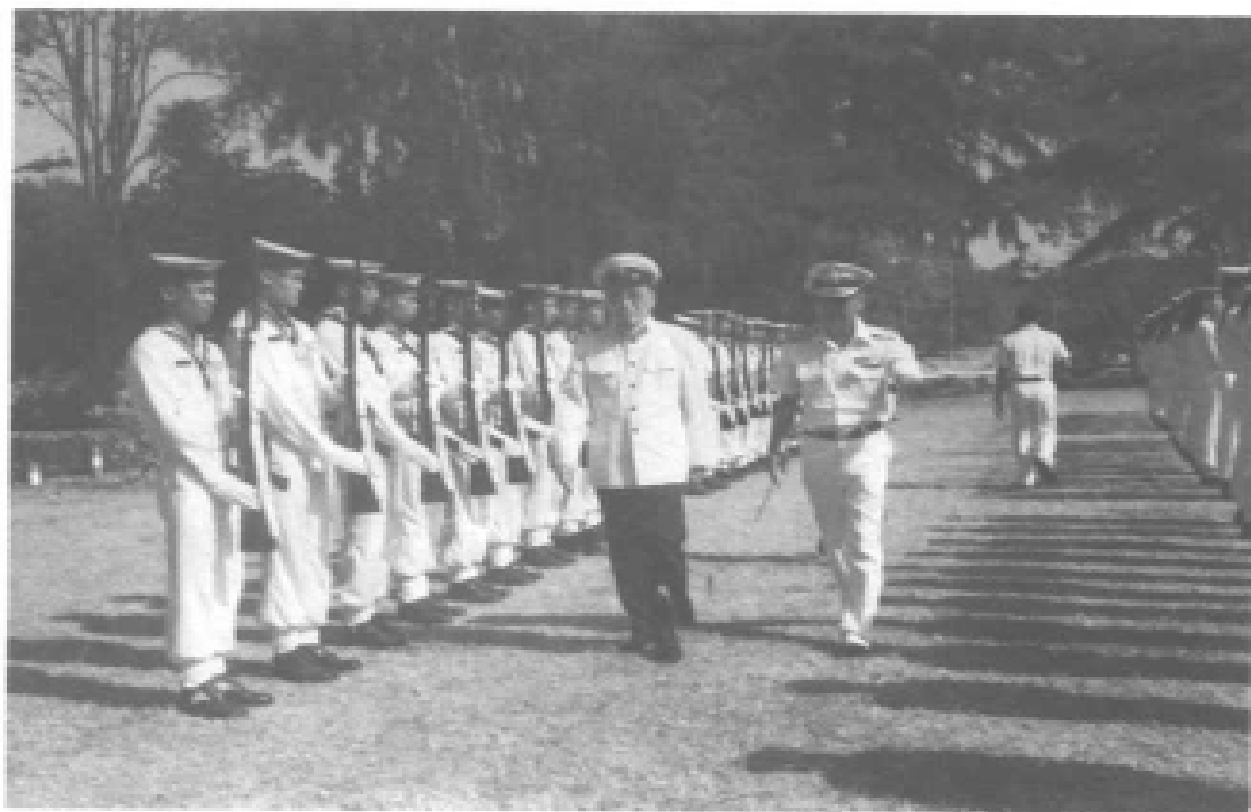
一九五〇年，陈毅视察厦门前线时，陪同陈毅在云顶岩指挥所视察。



一九六〇年，陪同朱德到福建前线视察，于厦门合影。



一九八〇年二月，叶飞同志获第一届陈毅杯老同志  
围棋邀请赛冠军。



一九八二年四月，叶飞同志出访泰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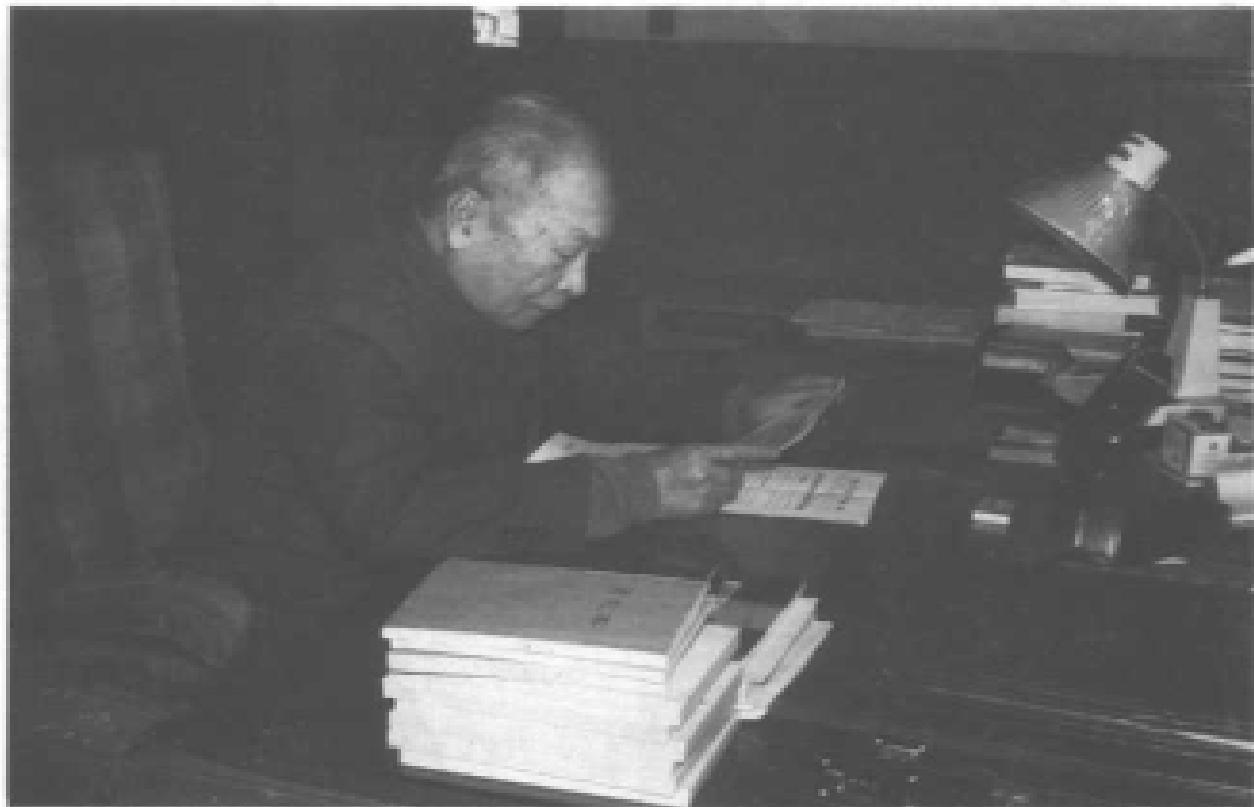
叶飞同志的母亲  
(菲律宾籍)。



一九八五年摄于北京。



一九八四年  
春，在杭州与夫人  
王于耕合影。



叶飞同志在工作（一九八六年）。

## 叶飞回忆录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5印张 377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 000

ISBN 7 5065-0292-5/K·21

定价: 9.80元

## 叶飞回忆录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1.5印张 377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1 000

ISBN 7 5065-0292-5/K·21

定价: 9.80元